

一部广受赞誉的里程碑式历史巨著

#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英]·尼尔·弗格森著

## 罗斯柴尔德家族

四部曲

它是一个神秘的金融帝国  
它是“大英天书”的世界首演  
你见过它操控着整个金融市场  
它到底有怎样的覆家史和真实面目？



中信出版集团 | 中信出版社

#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第一部 金錢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

第二章 “宮廷猶太人”

第二部 金融統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

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序

第一章 重新崛起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

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一章 猶太問題

第二章 “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

第三章 政黨政治

##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一部 金錢的先知

這類帶有反猶色彩的圖畫並不罕見：猶太人崇拜豬的情形能夠在許多木雕以及印刷品中見到，而時間則可以追溯到14世紀，而殘忍謀殺的故事在德國流傳開來則是在15世紀。而讓法蘭克福的圖畫變得與眾不同——至少在這個城市最傑出的人物約翰內斯·沃爾夫岡·歌德看來——是因為，它們「並不是個人仇恨的產物，而是作為一個公共紀念物出現的」。

## 第一章 家族生意 (1)

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所有這一切蘊涵著這樣一個道理：為了做某事你必須成為某人。我認為但丁偉大，但是他的背後是幾個世紀的文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經過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積累起來的財富。這些事全部隱藏得比我們想象的要深。

——歌德，1828年10月

一位旅行者抵達18世紀的法蘭克福，當他越過通往法赫特門的薩克森豪斯大橋時，幾乎不可能錯過反猶宣傳畫「Judensau」——該詞意即「猶太人的母豬」（見圖1 1）。畫在牆上的這幅畫內容猥褻，它描繪的是一群猶太人在一頭凶惡的母豬面前——或身下和身後——做著汙穢的事。其中一人吮吸著母豬的乳汁，另一個人（身著希伯來長袍）抓著母豬的尾巴，讓第三個人（也是一個希伯來人）吃它的排洩物。「猶太惡魔」則在一旁滿意地看著。如果旅行者再往上看，他還能看到第二幅更讓人覺得反胃的影象：畫面中，一個死嬰張著雙臂，身上佈滿了刀傷，身體下方是9支短劍。「在1475年濯足節星期四的這一天，」圖上的文字說，「只有兩歲的可憐小西蒙被猶太人殺害」——這是「特倫特的西蒙案件」的一個「解釋」，西蒙據稱死於「殘忍的謀殺」；這一傳說藉此抨擊猶太人謀殺異教徒的孩子只是為了將他們的鮮血放進未發酵的麵包中。

這類帶有反猶色彩的圖畫並不罕見：猶太人崇拜豬的情形能夠在許多木雕以及印刷品中見到，而時間則可以追溯到14世紀，而殘忍謀殺的故事在德國流傳開來則是在15世紀。而讓法蘭克福的圖畫變得與眾不同——至少在這個城市最傑出的人物約翰內斯·沃爾夫岡·歌德看來——是因為，它們「並不是個人仇恨的產物，而是作為一個公共紀念物出現的」。猶太人、母豬以及死嬰都是官方核准的標誌，它們由長久以來對城鎮中猶太人的敵對傳統積澱而成。

有關法蘭克福第一個猶太人社群的首次歷史記錄出現在12世紀中葉，當時的人口在100～200人之間。它的歷史也是一部蒙難史，猶太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受到異教徒迫害。1241年，法蘭克福3/4的猶太人在所謂的「猶太戰爭」中被屠殺。在隨後的數十年中，猶太社群憑藉

猶太人的努力得以重建，但是就在一個世紀之後，在1349年，同樣的情形再次出現。在這兩起事件中，謠言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第一次「戰役」中，人們擔心猶太人與蒙古人串通一氣；第二次則是一些苦修者散佈謠言稱猶太人將會把瘟疫帶進城裡。

不過，猶太人仍然存在於世界範圍內，也說明了為何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他在1236年宣佈猶太人「是我們忠實的傭人和奴僕」以及各市政廳傾向於鼓勵猶太人定居下來的原因。因為猶太人是稅收以及貸款的來源（猶太人當時可以不受禁止發放高利貸等法律規定的約束），官方向他們提供「保護」以及有限的優勢來換取現金。不過，保護和限制一直是並存的。1458年，在腓特烈三世的命令下，猶太人被集中到一個特定的「猶太人聚居區」（ghetto，該詞來自於義大利語中的borghetto一詞，意即郊區）：這是城市東北邊緣地區的一條狹長的街道，街道兩邊都建有大門。對於生活在這裡的110名猶太人來說，在所謂「猶太街」裡的監牢般的生活意味著一個「新埃及」。另一方面，外界一直存在的暴力威脅也讓猶太人聚居區帶有一點避難聖地的色彩。不過，1504年的殘忍謀殺指責以及5年後試圖宣佈「猶太人為異教徒」的陰謀警示人們，猶太街的地位極其微弱；到1537年時，猶太街的人口構成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路德教徒佔據了大多數人口，而他們對猶太人存在固有的敵意。猶太街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提供了某種形式的避難所；1542～1610年期間，它的人口數量增長為400～1380之間（人口增長與荷蘭的胡格諾教徒移居到法蘭克福是相對應的）。這些新興人口的流入所導致或與之相應的經濟與社會緊張狀態觸發了公眾反對猶太街的大規模暴力活動：「菲特米爾茨暴亂」，這場暴亂因其領導者文岑茨·菲特米爾茨而得名，菲特米爾茨當時是一個店主。不過這次暴亂並沒有出現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情形（猶太人被驅逐出城區），而且沒過多久，帝國軍隊就平息了暴亂。菲特米爾茨和其他暴亂的領導人被處以絞刑，猶太人重返家園，他們是皇帝「庇護」的人，其地位得到了再次確認。

## 第一章 家族生意（2）

在實際生活中，與之前一樣，「保護」意味著額外的鐵腕管制，其管理細節由斯塔提格凱特議會設定，這部法規每年會在主要的猶太人教堂宣讀。直到18世紀末期仍有法律效力，這期間，猶太人人口被

嚴格限制在500個家庭；每年的婚禮數量只能有12個，結婚年齡固定為25歲。每年從外部進入猶太街定居的人不能超過兩人。猶太人被禁止從事農場業或者交易武器、調味料、酒和穀物。他們被禁止在猶太街之外的地方生活，而且直到1726年，猶太人必須每時每刻都要佩戴區別身份的飾物（男人佩戴兩個同心黃色戒指，女人佩戴有條紋的面紗）。猶太人每天晚上、星期天以及基督教節日期間，只能在自己的社群裡活動；其他時間，他們被禁止兩人以上結伴在城中行走。他們還不得進入公園、旅館、咖啡店，同時也不得在城中風景秀麗的道路上散步，他們甚至不能接近城中古老的大教堂，進入官廳時也只能從後門進去。猶太人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才能被獲准進入城裡的市場，而且不得碰市場裡的蔬菜和水果。如果一個猶太人出現在法庭，他需要宣讀一份特別的誓言，誓言提醒在場的所有人「上帝對遭受詛咒的猶太人所施加的懲罰和咒罵」。如果一個猶太人在街上聽到「猶太人，本分點！」，他必須——即使發號施令的只是一個孩子——脫下自己的帽子，然後站到一邊。如果他偶爾去法蘭克福城外，也需要一個特別通行證。進城時，他需要支付是異教徒兩倍的費用。為了回報這些所謂的「保護」，每個猶太人還需要繳納費用稅（或者是人頭稅）。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法蘭克福猶太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是在高牆和大門之內的猶太街中度過的。今天，這個監獄般的街道已經不復存在。僅有的幾所房子在19世紀中期被法蘭克福政府拆除，剩下的一點點殘跡也在1944年5月美軍的轟炸中被夷平。不過，這條古老街道的一部分牆基最近被發掘出來，這些遺蹟至少能讓人聯想到當時猶太街中極為侷促的生活狀況。從北部的博恩海姆門到南部的猶太人公墓，只有1/4英里長，寬度不超過12英尺——有些地方甚至少於10英尺。即使一開始這個地方劃為猶太人居住區，相對於只有100人多一點點的猶太人群體，街道也顯得非常擁擠了；而到1711年時，生活在這裡的人數量不少於3024人。在如此侷促的地方安置所有人口，需要極為高超的建築技巧：房屋只有8英尺寬，建為4層，在每一排房屋後面再蓋另一排房屋。這樣的建築結構也使得火災變得異常危險——實際上，整個猶太街曾經在1711年、1721年以及1774年毀於大火。這也意味著這裡的生活既高貴又貧賤：高貴是因為對房屋的需求遠遠多過了供給，

因此在猶太街北部的一個4居室房屋的價格與歌德父親在格拉澤?希爾施格拉本有24個房間別墅的價格一樣；貧賤是因為衛生設施、光線和新鮮空氣的匱乏讓生命的期望值縮減了很多。在18世紀80年代，據估計，猶太人的平均死亡率比異教徒要高出58%。1795年一個旅行者覺察到「法蘭克福猶太人中的大部分人看起來像是行屍走肉，即使那些正處在青春年紀的人也不例外.....他們面如土色的容貌也將他們與其他極為絕望的居民區別開來」。後來，在部分高牆被拆除後，一些諸如安東?博格這樣的藝術家某種程度上浪漫化了猶太街；實際上，它變成了吸引維多利亞臣民旅遊的一個地方（查爾斯?格雷維爾以及喬治?埃利奧特就是英國旅遊者中的成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給年輕的歌德留下了極為震撼的印象，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地獄般的貧民窟：

### 第一章 家族生意（3）

空間狹窄，灰土飛揚，人群擁擠，各種刺耳的說話聲音——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一幅讓人極不舒服的畫面，即使對一個只是從大門旁路過、向裡面掃了一眼的人來說，也會有同樣的感覺。我猶豫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敢獨自一人進去那裡，而且從洶湧人流中逃出來之後，我還沒做好重返那裡的準備；那裡的所有人都會拉住你，不厭其煩地推銷或求購東西。

對猶太街更為熟悉的一個人是詩人路德維格?伯爾納，他就在那裡長大，生活的時間是18世紀80~90年代，他當時的名字是尤達?勒夫?巴魯赫。他回顧那段經歷時，帶有的不是一種懷舊的情感，而是非常憤怒的情緒，他記得：

那是一個狹長陰暗的監牢，18世紀最明亮的光線都不能夠刺透它的黑暗.....橫亙在我們前面的是一條望不到頭的長街，但我們身邊有的只是一點點的空間，以保證希望降臨時，我們能夠轉過身來。我們頭頂上不再是太陽展現出無邊力量的天空；人們看不到天空，只看到陽光。身邊的每個地方都散發著一種極其難聞的氣味，用來保護我們避免感染疾病的衣服同時也是賺取同情眼淚的道具，而且還能掩蓋住圍觀的猶太人眼裡的幽怨笑容。我們在汙穢物中艱難跋涉，放慢了腳步，也使得自己有了環顧四周的時間。我們每走一步都非常輕而小心，以免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溝裡玩耍、在汙穢物中爬來爬去的孩子

就像是糞堆上孵化的寄生蟲一樣。誰不願意遷就這些只有一點點玩耍心願的小孩子？如果一個人認為兒時的玩耍就是現實生活的寫照，那麼這些兒童的搖籃就一定是所有鼓勵、所有健康、所有生命歡樂的墳墓。你擔心這些塔一樣的房子會倒下來砸著我們？哦，根本不用擔心。它們經過了仔細的加固，就如關押叫聲清脆的鳥兒的鳥籠，坐落在永恆咒怨的基石之上；它們由貪婪的勤奮之手建成，抹牆的白灰裡摻雜著奴隸的汗水。別再擔憂，它們非常結實，永遠也不會倒。

就如伯爾納評述的那樣，即使在所謂的「開明」時期，當其他德國城市放鬆了對猶太人的限制時，法蘭克福卻依然我行我素，拒絕執行約瑟夫二世的「寬容公告」（1782年），並且查抄埃弗賴姆·萊辛同情猶太人的話劇《智者內森》。猶太社群1769年以及1784年發起請願活動，希望被允許在星期天離開自己的社群，他們的要求遭到了拒絕，理由是「試圖獲得與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與之前一樣，此類政策某些程度上是異教徒城市居民向當地議會施加壓力的結果。尤為典型的是，1788年，一個猶太數學教師獲得允許，可以在猶太街外生活和教學。隨即，要求撤回他執教資格的呼聲甚囂塵上。而1795年，一名猶太醫生（在社群外執業）的請求則遭到了斷然拒絕。這些基本上出於同樣的原因——7個著名猶太商人在一封聯名信中明確提到了這些原因——有關猶太人在節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群外行走的規定在1787年並沒有出現什麼鬆動，甚至更為嚴格了，因為此時推出了一種極為複雜的身份證制度：

作為人類，每個猶太人擁有與別人相同的權利，要求其元首提供保護也是正當的。不幸的是，較低層次的階層仍然束縛於他們父輩的偏見之中，即懷疑猶太人是否與他們一樣是人類。他們用各種方法虐待猶太人，許多老年人似乎很樂意看到自己的兒子虐待猶太人。士兵們甚至也捲進了這種迫害潮流之中。他們會利用新制度作為各種迫害行動的手段嗎？是的，他們以猶太人的衣著、髮型、鬍鬚等方面最為細小的差異為藉口，在猶太街的大門口實行最為嚴厲的檢查。只要發現最細小的差異，他們就逮捕這個猶太人，然後像對待竊賊一樣把他押到兵營裡去。

## 第一章 家族生意（4）



這種固執的歧視不僅僅是因為祖上的偏見。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異教徒的商業團體固有的擔憂，他們害怕獲得自由的猶太人會給他們帶來經濟上的挑戰。像猶太街這樣的貧民窟也能出現數學教師和醫生的事實，揭示了猶太文化的一些重要事實：它並不像外界看起來那麼封閉。歌德鼓起勇氣進入猶太街時，他發現猶太人「也是人類，勤奮而且樂於助人，而且不得不崇敬有些看似頑固的習俗，通過這些將自己與傳統聯絡在一起」。儘管——可能部分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艱難，但法蘭克福猶太人從文化上來說根本不是一個低等階層。

當然，猶太街的文化對於像歌德這樣的異教徒來說是陌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宗教文化，生活的節奏仍然由宗教法典《哈拉卡》主導著。每天早晨和傍晚，男人們都會在「敲門人」（他用一個錘子敲每家的門）的召集下在教堂裡做禱告。根據一個英國旅行者回憶，安息日「在他們的祈禱書中是用非常美妙的詞語描述的，‘一位新娘’以及她的歡迎方式，一週接著一週，這是種婚禮般的儀式。潔白的衣服鋪在地上，燈也被一一點亮向她表示敬意。再破舊的住處也籠罩著一層節日的氣氛」。按照當時的標準來看，這條小巷中3個初級學校以及希伯來語大學的教育是比較保守的。孩子們學習閱讀《聖經·舊約》的前五卷（Torah），這是摩西教育法的基礎；然後學習賴希（Rashi）評論；最後是猶太法典，這是有關宗教儀式規則的希伯來語評論和辯論集。猶太街有自己的消防站和醫院，有自己的墓地以及向窮人提供幫助的志願機構。

儘管猶太街被高牆圍困，儘管猶太啟蒙運動對其產生的衝擊有限（相對於柏林地區來說），但是它的文化遠不是孤島式的。儘管異教徒有時嘲笑他們說話的方式，海因裡希·海涅後來堅稱法蘭克福的猶太人說的「不是別的，就是法蘭克福當地語言，被圍困的人講起來與那些自由的人一樣好」。這種說法有一點誇張，但是這種誇張能夠被理解。那些猶太人確實努力保證自己獲得相對好的宗教教育——如上面提到的醫生——他們所講、所讀以及所寫的是「高地德語」。但是，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殘存的信件證實他是一個粗懂語法，而且經常不遵循語法的德國人，字裡行間摻雜著希伯來語；他寫信給幾個兒子時，使用的是希伯來字母，幾個兄弟之間通訊時也是如此。不過，猶太街裡的「猶太德語」並不是波蘭以及俄羅斯猶太城鎮的「亞

地西語」（Yiddish，一種猶太語言）；而且法蘭克福的許多異教徒商人寫信時十有####也不遵從語法要求。當法蘭克福的猶太人離開猶太街做生意時——去那些最能夠接納他們的街道——他們與異教徒商人之間不存在難以克服的語言障礙。

與18世紀大多數德國城鎮比起來，法蘭克福更像是一個商人城市。它位於幾條主要貿易路線的交匯處，即連線著南德意志（斯特拉斯堡、烏爾姆、奧格斯堡以及紐倫堡）城鎮與北德意志（漢堡、不來梅和呂貝克）漢撒港口的貿易路線；連線德國與大西洋沿岸、波羅的海沿岸以及近東經濟實體的貿易路線。法蘭克福的繁榮與每年兩次的貿易會密切相關，即自中世紀以來便在此舉行的春季和秋季貿易會。而且由於在歐洲流通著大量的貨幣（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期），這個城市的商業很自然地與銀行業聯絡在一起，尤其是貨幣兌換以及票據經紀（由更為複雜的交易帶來的借據買賣）。此外——某種意義上更為重要的是——法蘭克福充當著王子、貴族以及德國各公國統治者的金融中心角色。他們的土地收入和其他收入（租金、稅收等）以及他們的開支（豪華住宅、園藝以及娛樂）使得這些統治者成為工業化之前德國經濟中最大的顧客，儘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比當時的英國統治階層「窮」了不少。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人支出通常超過其收入，這為德國銀行家帶來了利潤豐厚但同時存在風險的賺錢機會。

## 第一章 家族生意（5）

1800年之前，在為統治階層服務這個領域，最為成功的公司是西蒙·莫里茨以及約翰·菲利普·貝特曼創立的公司，他們從阿姆斯特丹引進了「次等債券」體系。按照這個制度，一筆大的貸款可以分割成更具管理性的小筆貸款，然後向更多的投資者發售。一宗典型的交易是1778年貝特曼兄弟公司提供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2萬古爾登（約為2000英鎊）的貸款，他們以20份、每份1000古爾登的債券形式出售給投資者，然後將出售債券獲得的現金——扣除相應的手續費——提供給維也納財政部，從而確保債券持有人從維也納獲得合理的利息。在1754～1778年間，貝特曼兄弟公司貸出的款項總額接近200萬古爾登，而在隨後的5年中，他們貸出了超過54筆貸款，總額接近3000萬古爾登。法蘭克福其他銀行家也參與到相同的行業當中，最著名的一個人便是雅各布·弗里德里希·貢塔德。

貝特曼與貢塔德都不是猶太人。不過，到18世紀末期，毫無疑問的，猶太人已被認為是最精明的生意人，尤其在錢幣兌換和各種借貸業務領域更是如此。儘管對這一主題的學術研究已經超過了1個世紀，但是要明確地說明箇中原因仍然很困難。猶太人相對於異教徒金融家的一個優勢可能間接來源於他們的教育體系。

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曾經回憶說，「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商人，但是我做生意沒什麼組織性，因為我還是一個學生（學習猶太法典），沒學過任何（有關商業的）東西。」當需要建立信用網路時，一個結構嚴密的「外部」組織會員資格可能會帶來幫助，而且可能存在著某種發源於猶太教的商業品德。不過這些也能夠被與其他少數宗教族裔畫上等號，就如馬科斯·韋伯所做的那樣，他牽強附會地將「新教道德」與猶太人「（凡事都以）政治和投機為起點……是賤民資本主義」進行了對比。猶太人為何精於金融這個問題，最不讓人覺得反感的答案是：當時絕大多數經濟領域是不對猶太人開放的，猶太人沒有什麼選擇，只能專攻商業和金融。與此同時，這兩個領域裡的異教徒競爭對手似乎傾向於誇大自己生意面臨的「猶太人威脅」。法蘭克福非猶太銀行家的抱怨最早可以追溯到1685年，他們聲稱「猶太人從他們手裡搶走了票據交易」——這一宣告直接導致了一項禁令的產生：猶太人被禁止進入股票交易所。12年後，法蘭克福議會試圖阻止猶太人在法赫大街上租用倉庫，這也並不是議會的最後一次反猶嘗試。

此類衝突最著名的一個事例是圍繞約瑟夫·祖斯-奧本海姆的角色展開的，奧本海姆從符騰堡卡爾·亞歷山大公爵的「現場猶太人」升到了權力更大的樞密顧問官。1733年，他成為駐法蘭克福特使，他的特權地位使得他可以居住在猶太街以外的金天鵝旅館裡，那裡非常舒服。4年後，奧本海姆被處死，罪名是攫取的政治權力過大，已威脅到了符騰堡權貴的地位。奧本海姆儘管成了後來反猶傳說「猶太人祖斯」的原型，但是他仍舊是最著名的「宮廷猶太人」。到18世紀中葉，法蘭克福的猶太人擔當著諸多選邦國和機構的「代理人」：巴拉丁領地、美因茨選帝侯國、黑森-達姆施塔特公國、普魯士王國、維也納帝國法庭以及黑森-卡塞爾和薩克遜-魏瑪。如洛·貝爾·伊薩克1755年當上拿騷-薩爾布魯根王子的全權代理人，戴維·邁耶·卡普爾也在差

不多在同時成為了帝國法庭的代理人並挑戰卡恩家族的統治地位。這些人在猶太街裡形成了一個富有、享有特權的精英階層。

## 第一章 家族生意 (6)

### 邁耶·阿姆謝爾

就是這個部分（並非全部）與世隔絕的社群裡，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於1743年或1744年來到這個世界。有關他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更遠的先輩，我們掌握的情況很少。本傑明·富蘭克林曾發現，人的一生中有兩件事是難以避免的：繳稅和死亡——這些差不多也是我們能夠找到的有關羅斯柴爾德家族早期成員的材料。值得說明的是，這個家族可能從沒有被稱為「羅斯柴爾德」——字面意義是「紅盾」。我們知道，埃爾哈南的兒子伊薩克在16世紀60年代建了一棟叫做「紅盾」的房子，名字可能來源於某種經常掛在房子正面的盾牌。這種情況在猶太社群中非常普遍，人們通常以彼此的住址來標誌對方。但是，伊薩克的孫子納夫塔利·赫茨（死於1685年）離開這棟掛著紅盾的房子，移居到了另一棟叫做「辛特凡」（zurHinterpfann，意為「溫暖的平底鍋」）的房子裡。羅斯柴爾德家族從這個時候起被人稱為「辛特凡家族」。事實上，儘管納夫塔利·赫茨的兒子、孫子和曾孫繼續沿用「羅斯柴爾德」這個姓，他們也用過「鮑爾」這個姓，但可能直到之後的一代人，即邁耶·阿姆謝爾這代，羅斯柴爾德才被確定為家族的姓氏，儘管阿姆謝爾本人移居到另一棟叫做「綠盾」房子裡時，可能再次改過自己的姓。

對早期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我們能夠做出的評價就是他們是虔誠的、相對成功的小商人，售賣布料和其他東西。伊薩克去世的前5年，也就是在1585年，他的納稅額為2700古爾登。他死後，墓誌銘中寫道，他是一個「品德高尚」、「正直」、「誠實」的人。1個世紀後，他的曾孫卡爾曼的納稅額超過了他的兩倍，卡爾曼經營的是錢幣兌換生意，同時也賣毛線和絲綢；而且似乎他兒子——邁耶·阿姆謝爾的祖父摩西——成功地繼承和光大了父親的生意，他先後娶了一個收稅官以及一個醫生的女兒，從而延續了家族社會地位提升的過程。不幸的是，我們對阿姆謝爾父親阿摩謝爾·摩西的經濟成就近乎一無所知，儘管當時整個家族仍然居住在中等大小的「辛特凡」之中；這棟房屋的一樓是辦公室，二樓是廚房，再上面是狹小的臥室。這似乎說明家族

極為團結，但經濟發展卻陷於停滯。從他墓碑上冗長、過分的讚美之詞可以判斷出，阿姆謝爾·摩西死時，這個家族只是在猶太人社群裡獲得了廣泛的尊敬。

阿姆謝爾·摩西很明顯是一個喜好學問的人——根據他的墓誌銘，確實如此，「他總是給自己留出時間來鑽研猶太法典」。這可能也解釋了為何他在兒子邁耶·阿姆謝爾到法蘭克福完成小學學業後，將他送去菲爾特的希伯來語學校學習。這並不是說邁耶·阿姆謝爾希望成為猶太法學博士，一些歷史學家曾錯誤地認為他是出於自己的興趣。邁耶·阿姆謝爾死後不久，科恩便寫了一部簡短、充滿讚美之詞的邁耶·阿姆謝爾傳記，兩人很可能認識；科恩在書中說，邁耶·阿姆謝爾「學習自己的宗教，只是為了成為一名好的猶太人」。不過，邁耶·阿姆謝爾的學業由於父母分別在1755年以及1756年去世而中斷，兩人都是死於某種瘟疫；直到今天，德國城鎮裡仍間歇性地爆發席捲全城的瘟疫。那年，邁耶·阿姆謝爾剛剛12歲。

## 第一章 家族生意（7）

按照常理，他應該回到家裡，與姐姐古特爾歇以及兩個弟弟摩西和卡爾曼團聚。但是，他卻被送去漢諾威的沃爾夫·雅各布·奧本海姆公司（可能是他父親生意上的一個客戶）學習初級商業知識。這是一段難得的經歷，因為它讓他第一次直接觸及了「宮廷猶太人」的特權世界。當然，邁耶·阿姆謝爾對這個世界也應該已經有所認識。畢竟，在他出生前6年，祖斯-奧本海姆才被處死。此外，我們知道祖斯至少與邁耶·阿姆謝爾的祖父有過一次票據交易。但是此時，這個男孩可以近距離地觀察成為一個「宮廷猶太人」意味著什麼，因為奧本海姆的祖父塞繆爾曾是奧地利國王的「代理人」，他的叔叔則是科隆大主教「代理人」。正是在漢諾威，邁耶·阿姆謝爾開始獲得專業經驗，這使他後來也得到了「權宦代理人」的身份。他開始從事珍稀錢幣徽章買賣，這是個門檻頗高的行業，它的客戶幾乎都是貴族收藏者，而且必須瞭解塞繆爾·馬代有關錢幣徽章分級的複雜理論。

1764年，邁耶·阿姆謝爾回到法蘭克福——按照居住地法的要求，他的學徒生活結束後，必須回到原住地；很快他就將自己的專業經驗發揮了出來。他回到法蘭克福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成功地將一些珍稀徽章賣給了出身顯赫的客戶，這些人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後來的輝

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當然，邁耶·阿姆謝爾與黑森-卡塞爾威廉王儲的第一次交易價值微不足道。1765年6月在威廉的私人買賣賬戶中，邁耶·阿姆謝爾被稱為「猶太人邁耶」，交易金額不過是38古爾登30克羅伊茨（1古爾登≈7.5克羅伊茨）——少得可憐的金額，它只是1763年之後王儲與許多交易者進行的小額交易中的一宗，當時威廉痴迷於徽章與錢幣的收藏。不過，這次交易——以及另外無記錄留存下來的「多宗交易」——使得邁耶·阿姆謝爾1769年能夠提出獲得「宮廷猶太人」頭銜的要求，那年9月，他如願以償。一年後，他進一步鞏固了這個新身份。1770年8月（當時他26歲），他娶了沃爾夫·薩洛蒙·施納佩爾16歲的女兒居特林，施納佩爾當時是薩克遜-梅寧根王儲的「宮廷猶太人」。除了岳父社會地位帶來的好處外，這次的結合還給邁耶·阿姆謝爾帶來了一筆數目不菲的資金，總額達到了2400古爾登。這應該也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精心選擇婚姻物件的第一個成功例子：奠定血緣富貴成色的基礎，與奠定皇室庇護的基礎同樣重要。

在這之後的歲月裡，邁耶·阿姆謝爾成功地確立了法蘭克福知名交易商的地位，最初他與兄弟卡爾曼合夥，但卡爾曼在1782年去世；此時的業務也不僅僅是買賣錢幣和徽章，同時也買賣各種古董。從他精心繪製的目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為逐日擴大的貴族客戶提供服務的。到18世紀80年代，目錄中的物品除了古希臘、羅馬以及德國的錢幣，還包括了其他各種古董以及富有收藏者喜歡的「奇怪」物品，他們會將這些東西與自己收藏的錢幣陳列在一起，比如雕像、奇石等諸如此類的東西。每個目錄中的物品總價從2500～5000古爾登不等；但是，如果一個客戶對某件東西感興趣，邁耶·阿姆謝爾就會將它寄給客戶細看，如果客戶希望買下，雙方就會商定一個價格，這個價格通常低於目錄中的指導價。根據殘存的威廉王儲私人財產賬戶資料，威廉直到1790年之後才成為邁耶·阿姆謝爾的一個固定客戶，在這之後，他幾乎每年都會買一些東西。其他一些顧客包括歌德的資助人魏瑪公爵。

## 第一章 家族生意（8）

羅斯柴爾德家族財富的根基竟然是以郵寄方式向貴族收藏者出售古董，這一點似乎有點讓人吃驚，但毫無疑問的是，如果邁耶·阿姆謝爾不是通過買賣古董積累資金，他可能就不會有轉向銀行業的資源。

他作為一個古董商人究竟有多成功，我們還無法作出準確地判斷：1773～1794年期間，他的財產稅的估計數額一直是2000古爾登。但是，他在賬本中細心記錄的慈善捐贈數額（按照猶太法律，需捐出年收入的10%），在他的自傳作者伯格菲爾看來，等於是透露了他的年收入大概為2400古爾登——差不多與歌德家的收入持平，比當時的地方官員，如稅收官員的收入要多。根據這些資料以及其他一些有用的數字，伯格菲爾估計邁耶·阿姆謝爾在18世紀80年代中期的總資產大概為15萬古爾登（約合15萬英鎊）。

我們還知道，邁耶·阿姆謝爾在1787年時已有足夠的錢搬家。在他回到法蘭克福後不久，他和兩個兄弟就獲得了「辛特凡」的所有權，他們買斷了一些遠親的股份——「辛特凡」是他們的父母與遠親們合夥買的。在他回到法蘭克福的20年後，他（以3300古爾登的價格）將自己擁有的38%的「辛特凡」股份賣給了弟弟摩西，並且從1783年開始，他花費11萬古爾登購買了一棟相對較大的房屋——「綠盾」。按照異教徒家族，如歌德家族的標準，「綠盾」居住起來依舊非常侷促：只有14英尺寬，房間極其狹窄，床只能以一定的角度貼著靠街的牆放著。對於下一代羅斯柴爾德人來說，這棟房子同樣太過狹小：邁耶·阿姆謝爾的兒子們回憶過去的歲月時，毫無眷念之意，「我們當時全部睡在一個狹小的閣樓裡」。不過按照猶太街的標準，它已是一個非常愜意的安身之所。它坐落在整條街的中部——差不多正對著中部——它是1711年大火之後重新修建的，與眾不同的是，它有自己的水泵。這棟房子上面的3層中，每層有一個朝街的小房間、一個煙囪和一個入牆壁櫥——也有一個朝向後院類似的小房間。從後門出去是一個小院子，那裡還有一個兩層的建築，其中建有整棟房子中唯一的洗手間。有些特別的（也非常有用的）是，這棟房子有兩個地窖，其中一個的入口比較明顯，就是門廊裡一個活動門；另一個更大的地窖，是羅斯柴爾德與鄰居共享的，入口非常隱蔽，藏在樓梯下，並且與另一個地窖互不相通。比起老房子，新家增加的空間是必需的，因為，即便按照18世紀晚期的標準，邁耶·阿姆謝爾和他的妻子也是一對多產的夫婦。居特林·羅斯柴爾德從1771年（結婚那年）到1792年期間，幾乎每年生一個孩子。在19個孩子中，10個存活下來：舍恩歇（1771年）、阿姆謝爾·邁耶（1773年）、薩洛蒙·邁耶（1774年）、內森·邁

耶（1777年）、伊莎貝拉或貝蒂（1781年）、布魯爾或芭貝特（1784年）、卡爾曼或卡爾（1788年）、戈滕或朱莉（1790年）、杰特琛或亨麗埃塔（1791年）以及雅各布或詹姆斯（1792年）。

在最小的孩子降生之後，邁耶·阿姆謝爾開始介入到能夠被稱為銀行業的業務中。從某些方面來講，這種轉變是很自然的事。隨著買賣圈子越做越大，貨源和客戶日益增加的時候，一個古董商人就會很自然地時不時允許一部分人賒欠自己一些錢。我們發現，早在1790年，邁耶·阿姆謝爾就是一個叫約瑟夫·卡塞爾的人的債主之一，卡塞爾住在附近的城鎮多伊茨，欠款也只有365古爾登而已。與此類似的是，錢幣以及徽章生意不可避免地讓他與黑森鑄幣廠建立了聯絡，特別是胃口最大的客戶威廉王儲經常委託他打造新的徽章。例如，1794年，羅斯柴爾德被授意「以儘可能好的價格」向黑森戰時財政部出售一批銀幣。

## 第一章 家族生意（9）

不過，18世紀90年代邁耶·阿姆謝爾財富的增長速度使他的生意與之前相比，實現了真正的突破。在18世紀90年代初，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不再僅僅是一個富有的古董商人。到1797年的時候，他已是法蘭克福最富有的猶太人之一，他生意中的核心部分已經毫無疑問地轉為銀行業。他實現突破的證據也是非常清晰的。1795年，官方記錄的邁耶·阿姆謝爾的財產稅已經比以前翻了一番，達到了4000古爾登；一年後，他就跨入了納稅大戶的行列，繳稅額達到了15萬古爾登；在同一年，他以超過6萬古爾登的應納稅財產成為猶太街第十大富豪。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邁耶·阿姆謝爾的努力，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了1800年猶太街11大富豪家族的一員。差不多在同一時段，他在猶太街外租了一座有4個房間的倉庫。他還從賓根僱用了一個能幹的簿記師，這個名叫澤利希曼·蓋森海姆的簿記師懂多種語言。羅斯柴爾德家族財富增長的其他證據就是邁耶·阿姆謝爾送給孩子們的豐厚結婚禮物。1795年，大女兒嫁給貝內迪克特·摩西·沃爾姆時，她收到了5000古爾登的嫁妝，而且在父母過世後，她還能得到1萬古爾登的遺產。1796年，大兒子娶埃娃·哈瑙時，他得到的是家族生意的一份股權，價值3萬古爾登。



這樣一份股權意味著什麼，你可以從最近開放的莫斯科博物館檔案檔案中找到線索：那是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公司的一張資產負債表，它制於200多年前的1797年夏天。這張表上，當時羅斯柴爾德公司的總資產是471221帝國元或843485古爾登，總負債是734981古爾登，盈餘為108504古爾登（約合1萬英鎊），用邁耶·阿姆謝爾自己的話說：「我的資金實現了平衡，感謝上帝。」這份重要的檔案還提供了一個可以推敲的細節，它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邁耶·阿姆謝爾此時已遠不是一個此前人們認為的國際商業銀行家。資產負債表的「資產」一方並不包括邁耶·阿姆謝爾的個人財產，家族所擁有的房產並沒有出現在表裡：他所說的「我的資產」是指公司的資產。表裡所列的大部分資產要麼是各種型別的國家債券，要麼是個人貸款和各種公司的欠款。另一方面，邁耶·阿姆謝爾的「債主」同樣多種多樣，從各種機構到私人都有。

事業早期的階段，邁耶·阿姆謝爾的商業信用網路從地理層面上講已經比較廣闊了。資產負債表顯示，他不僅與緊挨著法蘭克福的公司（如卡塞爾和哈瑙的公司）有業務往來，還與更為遙遠的德國其他城市的公司做生意，從漢堡、不來梅到雷根斯堡、奧格斯堡、萊比錫、柏林和維也納，同時還包括阿姆斯特丹、巴黎和倫敦。此外，除了那些被認為必定會出現在借貸名單上的人物（如邁耶·阿姆謝爾的女婿沃爾姆以及後來的另一個女婿西歇爾），名單中還包括了一些傑出的異教徒公司，如貝特曼、德納夫維爾以及布倫塔諾（這家公司欠邁耶·阿姆謝爾很多錢）。著名的藝術品收藏家約翰內斯·弗里德里希·施塔德爾也在羅斯柴爾德那裡存了17600古爾登。最後，資產負債表提供了邁耶·阿姆謝爾與黑森-卡塞爾政府的新型關係，後者欠他24093古爾登。而且，兩名黑森官員——路易斯·哈尼爾以及卡爾·佈德魯斯——作為債務人出現在資產負債表中，自然也包含著重要的意義。

## 第一章 家族生意（10）

無論以哪種標準來說，這都標誌著經濟地位的飛速上升。實際上，邁耶·阿姆謝爾的成功來得如此迅速，如此巨大，以至於某種程度上超出了他自己的能力範圍。1797年，他赫然發現，手下一個資歷頗淺的員工——一個叫希爾舍·利布曼的青年——在他的鼻子底下，挪走了一筆非常可觀的資金。犯罪調查隨後進行，部分相關記錄也得以儲

存下來，也讓我們能夠較好地透視當時邁耶·阿姆謝爾的急速擴張帶來的混亂狀況。根據邁耶·阿姆謝爾的記錄，利布曼在公司裡待了大約3年時間，從他辦公室偷走了1500～2000金卡羅林（約合3萬古爾登）。偷竊得以進行是由於3個原因。第一，邁耶·阿姆謝爾允許利布曼用自己的賬戶來買賣貨物，以補貼他可憐的薪水——除去合租的房屋租金後，每個月只能餘下15古爾登。實際上，因為他租房子，羅斯柴爾德還借了一小筆錢給他。因此，利布曼看似在補貼自己的工資，實際卻在挪用公款，沒人覺得詫異。第二，公司沒有儲藏貴重錢物的保險櫃，甚至毫無安全可言：主要辦公室的櫥櫃在工作時間內經常敞開，員工與客戶隨意進出，因此沒人注意到硬幣、支票以及其他貴重物品從辦公室裡一一消失。第三，邁耶·阿姆謝爾簿記體系極為粗糙：當他對利布曼提起訴訟時，他竟然拿不出檔案來證明究竟損失了多少錢。利布曼偷竊行為開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公司的錢正被竊走。一個當地的交易商出現在辦公室裡，聲稱利布曼希望從他手裡買些種子，這才使邁耶·阿姆謝爾起了疑心。在施加少許壓力之後，這個交易商承認此舉只是利布曼用來掩人耳目而編造的一個託詞；實際上，交易商是前來購買一張價值1220古爾登的奧地利支票，利布曼此前答應賣給他。邁耶·阿姆謝爾這時才明白利布曼購買金錶和手製襯衣的錢來自何處。進一步的調查證實了他的懷疑：利布曼不僅自己大肆揮霍偷來的錢，還將其中一部分寄給了住在博肯海姆的父母，此前，他父母窮得叮噠響，但突然間，他們卻能夠承擔女兒價值500古爾登的嫁妝。利布曼被捕時，在他的個人物品中發現了8枚泰勒銀幣以及一張帝國財政部支票，此外還有一些銀質湯匙、一個金質鹽瓶、一個金盃以及7個徽章；這些物品的發現也讓他自稱無辜的辯解變得蒼白無力。進一步的犯罪證據則是利布曼不諳世故的父親提供的，他返還了兒子給他的1000古爾登，並稱如果羅斯柴爾德撤銷控訴，將再支付500古爾登。最終，在遭遇了冗長的問訊後，利布曼坦白了一切。

利布曼對盜竊案的陳述前後矛盾，他一會說自己是分多次，每次拿走小額錢財；一會說他是趁邁耶·阿姆謝爾的二兒子薩洛蒙與一些客戶商談事情時，從辦公室裡的櫥櫃裡偷走了兩袋硬幣。無論他以何種方式行竊，都可以證明最晚在1797年，生意帶來的鉅額現金已經超出

了羅斯柴爾德自我管理的範圍：就如他在法庭上所說的那樣，成袋的錢放在辦公室裡，一些在櫥櫃裡，一些乾脆就放在地上。他經常把大筆的現金放在家裡，他說，因為他的「生意太過紅火」。而隨後的10年間，羅斯柴爾德的生意比之前更為火爆。

## 雙重革命

弗里德里希·馮·根茨在自己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自傳註釋》一書中，有些讓人反感地頌揚了邁耶·阿姆謝爾的商業才能。「不過，」他也坦白地補充道，「最傑出的個人有時也許需要獨一無二的環境以及世界級的事件來獲得成功。」這毫無疑問是絕對正確的。

## 第一章 家族生意（11）

1789年，路易十六召集三級會議之後的劃時代事件逐漸影響到德國猶太人，如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及其家庭的生活。但是當法國革命最終到達法蘭克福時，它的影響變得十分複雜——實際上，影響是爆炸性的。法國革命的影響最早在1792年10月得以顯現，當時法國軍隊短暫地佔領了法蘭克福；神聖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弗蘭西斯二世在這之前10周剛剛加冕。當然，我們不應誇大這種象徵性政權變化的重要性。法蘭克福之前一直被法國軍隊佔領著（在七年戰爭期間），再次遭到法國入侵時，猶太社群與城裡的其他居民相比，似乎並沒有顯露出歡愉的色彩。實際上，除了法國國民議會1791年通過的解放法國猶太人法令可能帶來的益處外，法國人入侵帶來的實際效果都是負面的。1796年6月，隨著奧地利軍隊在洛迪的潰敗，法蘭克福遭到了法國軍隊狂轟濫炸，猶太街近半房屋毀於大火之中。

另一方面，劇烈的戰爭衝突也有它有益的一面。猶太街遭到破壞，迫使法蘭克福議會放鬆了對猶太人的居住限制，同意2000個左右無家可歸的人居住在猶太街以外的地方（儘管只給了6個月的時間）。可能正是由於這種管制的放鬆，使得邁耶·阿姆謝爾能夠在斯克諾爾街租用貨倉。後來的法國入侵給猶太人的法律地位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益處（或許比較短暫），法國佔領的萊茵蘭地區猶太人獲得瞭解放。

（其中一個受益者便是邁耶·阿姆謝爾的會計師蓋森海姆。）更具重要意義的是，戰爭給邁耶·阿姆謝爾提供了新的賺錢良機，他和兩個合夥人沃爾夫·勒貝·肖特及貝爾·內姆·林德斯科普夫獲得了一份合約，當

奧地利軍隊在萊茵—緬因地區開展行動時，邁耶·阿姆謝爾的公司為軍隊提供糧食和現金。

法國革命並不是改變阿姆謝爾生活以及生意的唯一革命。18世紀80年代處於早期階段的英國工業革命，也產生了同樣重要的影響。儘管到18世紀90年代末，邁耶·阿姆謝爾已經開始構築他的銀行生意體系，但這並不意味著必須要與之前的錢幣生意告別；也不意味著不涉足其他更有利可圖的業務。在18世紀晚期，沒有任何行業能比英國工業革命帶來的紡織業更能賺錢。尤其是在英國蘭開夏，棉花抽紗、紡織以及染色工藝的急速機械化標誌著經濟生活即將發生空前、徹底的革命性變革。儘管這種工業化是區域性的，而且侷限在某一個產業內——由於太過侷限，現代經濟史學家推算當時的國家收入時並沒有將它考慮在內——但是，它的影響甚至到達了非洲，那裡是棉花種植園奴隸的發源地；它的影響也到達了北美，棉花的生長地；同時也影響到了印度，本地的棉紡織業很快就將面臨蘭開夏以及拉納克郡棉紡廠致命的競爭。這些工廠也對德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8世紀90年代，德國對價廉物美的英國紡織品——圍巾、手帕、方格花布、薄紗、平紋細布、間棉、凸花條紋布、棉絨、薩藍波小彩格布以及薄棉布趨之若鶩。邁耶·阿姆謝爾只是嗅到這個獨一無二、利潤巨豐商機的德國商人之一。19世紀來臨之際，僅在法蘭克福，就有大約15家猶太公司從事進口英國紡織品生意，其中一些公司差不多於這個時期在英國設立了永久代理機構。1799～1803年期間，至少有8個德國商人出於這個目的在曼徹斯特定居。

## 第一章 家族生意（12）

因此，我們也必須在這種背景下看待派遣內森前往英國的決定，邁耶·阿姆謝爾的第三個兒子在19世紀初的某個時候抵達了英國。他從法蘭克福出發的日期以及前往英國的目的一直是歷史學家爭論的焦點。儘管有關內森抵達英國的時間分別有1797年、1798年和1800年三種說法，但大部分人認為是1798年。不過幾乎沒有任何證據來證實這一點。我們從上述討論的資產負債表中得知，邁耶·阿姆謝爾至少從1797年開始便與英國倫敦的公司有生意來往，但是業務規模相對較小。到1800年2月，他才開始擴充套件在英國的生意：他當月給英國銀行家哈曼寫去了第一封信，提出請求，希望通過哈曼進行結算方面的

合作。內森在英國出現的第一份文件證據也來自1800年。沃爾夫引用了內森寫於1800年5月29日的一封信，在其中，內森請求一個熟人為他以及他的業務經理「在一個體面的出租屋裡預訂一個有兩張床的房間」。我們還發現了邁耶·阿姆謝爾寫給哈曼的信，在這封寫於1800年6月15日的信中，他提到，內森「很快就會到你那裡」；此外還有一封內森從倫敦（康希爾37號）寄出的信，日期為1800年8月15日。通過這些，威廉得出結論稱，內森實際上是在1800年到達英國的，在倫敦度過了夏天，然後去了曼徹斯特。但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不僅僅是因為內森寫給哈曼的第一封信是從曼徹斯特寄出，我們還在隨後的一些信件中發現，內森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是在前一年，即1799年首先抵達曼徹斯特的。這似乎也能解釋為何內森沒有在1799年之前到達曼徹斯特，因為他和父親直到1800年才在英國開展大規模的業務。這就有了另一個可能性——儘管只是可能——即內森在1798年橫渡海峽抵達英國，在倫敦住了幾個月之後才去英國北部。

內森為何要去英國？由於缺乏最有力的證據，大多數歷史學家採用了內森自己提供的解釋——1834年他和下議院議員托馬斯·福韋爾·巴克斯頓聯絡時提及——他是這樣描述自己離開的原因的：

那裡（法蘭克福）沒有足夠的房間供我們所有人居住。我買賣英國貨物，一個大交易商就來自英國，他控制了大片的市場：他確實是個影響力巨大的人，只要他賣給我們貨物，就相當於幫了我們一個大忙。但不知怎麼，我冒犯了他，然後他拒絕給我看他的貨樣。在一個星期二，我對父親說：「我要去英國。」我除了德語，什麼語言都不會說。但星期四的時候，我踏上了去英國的旅程……

我們沒理由懷疑這個版本的解釋完全是虛構的。內森是一個事業心極強、極具競爭意識的人，在他的生意中受到冒犯或冒犯別人都是很容易的事，因此不難想象他處理供貨商不合作這件事是多麼的急切。但是，在許多方面，他這個解釋有一定的誤導性。他可能是想將自己白手起家的故事浪漫化；可能是遷就某位休感相關人士的利益（後者更契合內森的性格）。無論如何，他父親不太可能將一筆鉅款——內森跟巴克斯頓提到的2萬英鎊，相當於1797年資產負債表淨利潤的兩倍——僅僅因為一個年輕人的衝動就輕易託付給他。不論內森帶

了多少「啟動」資金，認為他只不過是執行父親指令的想法都是站不住腳的。

## 第一章 家族生意 (13)

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內森充當法蘭克福代理人的身份必須很快被隱瞞，這也使得許多歷史學家斷定，內森一抵達英國即獨立於父親和幾個兄弟之外，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業務網路。但是老邁耶的公司在這個時期留下的業績證據卻道出了不同的事實：一開始，內森接收從法蘭克福發來的指令——實際上，他的哥哥薩洛蒙在1801年受委派前往英國協助他——他也是逐漸地才以自己的賬戶開展交易。內森早期從倫敦和曼徹斯特寄出的一些信件都簽署「致父親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父子之間的通訊很明顯比較頻繁（儘管僅有極少數儲存了下來），而且內森也經常以父親的名義給薩洛蒙位於倫敦的公司寫信，即薩洛蒙與哈曼有限公司，這個公司負責法蘭克福公司在英國倫敦的保險以及銀行業務。這個時期的通訊通常以這樣的詞句開頭，「父親希望我寫信給你」或「根據我剛剛從父親那裡接到的指示」。

有一次，一家公司讓內森感到失望，結果被他警告說，如果他再遇到「類似的投訴……我肯定父親會命令我找另一個能勝任業務的人」。另一次，他告知薩洛蒙：「今天早上我收到家裡的來信，信中說父親對你的打包工作非常不滿，還要求我在你重視裝運之前不得再往倫敦傳送任何貨物。」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內森運往歐洲大陸的布料貨櫃上都印著「MAR」幾個字母，即「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首字母的組合；印著這3個字母的貨櫃數量也日益增加。內森還向父親隱瞞了自己在1802年夏季感染小病的情況，他不想讓父親覺得自己不能承擔——或其他什麼原因——處理公司業務的職責。在他痊癒後不久，在寫給一個執拗的法國客戶的信中，他給後人留下了對他父親性格最坦誠的描述，他是這樣寫的：「你認為我父親會在利潤沒有保證的前提下，承擔風險賣出貨物？你大錯特錯了，我父親的煙囪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絕不會冒煙。」10天后，他收到了父親的一封信，訓斥他沒有「定期」記賬。

內森在文件工作方面的粗枝大葉很明顯是諸多傳說的素材庫。3年後，還是在同一個話題上，邁耶?阿姆謝爾再次對內森提出了嚴重警告，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這對父子誰在掌權。這封罕見的信件

——邁耶·阿姆謝爾留存的極少數信件中的一封——值得我們引述足夠長的內容來領略一下羅斯柴爾德家族早期的家族通訊情況：

首先，我們所有的聯絡人都在抱怨你，親愛的內森，他們說你在傳送委託時毫無章法可言。有時你寫信說你已經傳送了寫著某個編號的貨櫃，但它到達時寫的卻是另外一個編號。你今天發出一個貨櫃，6個月後才將此事告知艾斯瑞爾·賴斯，賴斯的一個辦事員跟我說，你做事真的太混亂了。我親愛的朋友，如果你在發出貨櫃時不寫下它們所有的編號，如果直到接到對方收到貨物的感謝後才寫下它們的編號，如果你不注意，如果你在沒接到聯絡人任何通知的情況下，不去追問貨櫃去了什麼地方，如果你仍舊如此沒有章法或不找一個人或朋友跟著你，那麼你就会被欺騙。這有什麼好處呢？不論被誰逮到這個機會，他們都會成為百萬富翁。在法蘭克福的時候，我已經告誡過你有關開支過高和缺乏章法的問題，親愛的內森，我不喜歡看到這些。

### 第一章 家族生意（14）

這種喋喋不休、循循善誘的寫信方式使得信件內容在今天讀起來並不容易，但這種風格被邁耶·阿姆謝爾較為年長的兩個兒子阿姆謝爾和薩洛蒙所繼承，當然這樣的信給內森的感覺肯定也好不到哪裡去。但是，他父親決心以自己的方式培育兒子的做法，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視角來透視當時做生意的方法：

我見過赫克舍以及商人巴萊赫傳送、回收貨物時所採用的有條理的方法。他們設有專門的辦事員來辦理一切事務。他們說，沒有好的條理，一個百萬富翁生意做得越多越容易破產，因為整個世界是不誠實的，或不怎麼誠實的。當人們看到你傳送貨物時缺乏條理，他們跟你做生意就可能欺騙你……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為了欺騙你，就會與你爭吵，而且越發現你做事缺乏章法就越會與你爭吵。總而言之，他們會為了利用你缺乏條理性的缺點與你做生意。在法蘭克福，有一個叫埃盧澤·埃爾費爾特的人賺了很大一筆錢，但是全世界都從他身上撈錢，因為他做事毫無章法，最後他的結局非常悲慘。親愛的內森，不要生你父親的氣。在處理文件方面，你並無長處。找一個辦事員來管理貨物的傳送事宜，聽從我的建議，在傳送貨物方面，自己要做到條理清晰，否則我不會給你太多的生意機會。如果你缺乏章法，賣的貨物越多，收益越差。我親愛的兒子，不要出現像我寫的這種情況……

你必須小心謹慎，阿姆謝爾說，他給你匯款時你沒有做好相應的記錄。這是不對的.....你需要準確地記錄你發給我們以及我們發給你的每一樣東西，這是非常必要的；你必須合理有序地記賬。如果你因為糟糕的記賬而導致我們所有賬戶混亂不堪，寫信回家，我們或許能給你提供一個計劃.....如果你做事有章有法，各種記錄條理清晰，借出錢款時小心謹慎，我相信你會做得很好。

這封來自父親的信件還沒結束。邁耶·阿姆謝爾繼續呵斥內森，因為他未能計算出他的淨利潤；與林德斯科普夫做寶石生意（「但你不是一個珠寶商」）以及未能處理好壞賬：

我親愛的兒子，你必須保持平和心態，當一個熱愛所有孩子的父親詢問你實際財務狀況的時候，你不能發怒，因為如果你有許多壞賬，就是上帝所不能容忍的，必須把它們當做良好資產一樣記錄下來，這可以讓你看起來很富有.....我親愛的兒子，你工作很努力。努力做個好孩子，除此之外我沒要求你做什麼。我只想鼓勵你變得更有條理性.....你真的很聰明，但是沒有弄懂條理的重要性，我所認識的那些做事有章法的商人最後都變得非常富有，而那些做事混亂的人最後都破產了。因此，我親愛的兒子，當我寫信給你，跟你說我的觀點時，你不要有牴觸情緒。

這封信透露出一個比較確鑿的資訊就是，在邁耶·阿姆謝爾的眼裡，內森仍舊是由家長掌管的家族企業的五個組成部分之一。如果內森能夠改進他做生意的方法，他就有望「和兄弟們一樣得到生意的一部分」，只要他們的姐姐全部出嫁後，這就能實現。不過在這之前，邁耶·阿姆謝爾仍舊是發號施令的人。

內森離開法蘭克福的另一個可能性就是逃避猶太社群的宗教限制。當時的一個真實情況是，19世紀初期，猶太人在英國確實比在德國享有更多自由——儘管猶太人也是在1656年才再次被英國人所接納，在這之前是長達3個半世紀的排斥。這個時期，英國在經濟方面對猶太人的限制非常少，儘管他們（通常與天主教徒、非國教教徒以及無信仰人士一起）仍然不得進入議會、地方政府以及大學，而且由於英法戰事日趨緊張，新移民受到了越來越嚴厲的監管（在英國出生的猶太人自動獲得英國國籍）。在倫敦，自信、富有的猶太社群在18世紀得到了長足發展，包括西班牙系猶太人家族，如莫卡塔家族以及東



歐系猶太人家族，如商人萊維·巴倫特·科恩，他父親是阿姆斯特丹一個非常成功的亞麻布交易商。18世紀90年代晚期，本傑明以及亞伯拉罕·戈德斯米德已經開始充當動態金融角色，這也是內森後來取得成功的領域；戈德斯米德的角色也向巴林兄弟以及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的聯絡人霍普有限公司提出了挑戰——從而導致了某種敵對情緒的產生，這種在法蘭克福已經看到過的敵對情緒表面上是宗教層面上的，但實際上經濟因素是主因。我們知道內森是通過他父親的商業網路，並在薩洛蒙的協助下進入這個島國的。但是，很明顯他在倫敦只待了幾個月，就北上了，曼徹斯特的社會環境比起倫敦要差很多。當地小型而且仍處於萌芽狀態的猶太人社群絕大部分是由貧窮的店主組成——即那些買賣舊衣服、便宜珠寶、雨傘以及藥品的小商人。儘管內森在曼徹斯特受到的歧視比起法蘭克福要少了很多，但是依然很難認為曼徹斯特對他的吸引力除了生意外還有其他的東西。

### 第一章 家族生意（15）

內森在同時代人看不起「服裝業」裡有多成功？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非常成功，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靈敏的商業嗅覺：

……離英國越近，貨物越便宜。我一抵達曼徹斯特，就用上了所有的錢，東西太便宜了，我獲利頗豐。我很快發現其中有3個盈利點——（布料）原材料、染色以及製造。我對生產商說：「我給你提供原材料和染料，你給我提供製成品。」3方面的盈利我全得到了，而不僅僅是買賣製成品這一個盈利點，我也能夠以比其他任何人都便宜的價格賣貨物。在很短的時間裡，我的2萬英鎊就變成了6萬。我的成功全部歸功於一句箴言。我曾說過：我能夠做其他人能做的事，因此我是帶樣品來的那個人的有力競爭者，也是其他所有人的競爭者。另一個優勢是，我是一個當機立斷的人，我能夠立刻給出一個優惠價。

這是個頗為不錯的內森生意模式小結，但是它再一次將事實大規模地簡化了。內森帶著父親訂購英國紡織品的指令抵達蘭開夏，到達那裡之後，仍通過郵件接收父親的指令。斷定市場在確定布料質量和價格方面可行時，內森隨後把訂單下發給製造商——不僅包括曼徹斯特附近的生產商，還包括遠至諾丁漢、利茲、斯托克波特，甚至遠至格拉斯哥的生產商。布料隨之生產出來（通常由下一級分包商在作坊裡織造），然後由曼徹斯特或附近的染色、印花廠加工為「成品」。

為了降低自己所買貨物的價格，內森儘可能地以現金購買貨物，這意味著需要向倫敦的銀行家借得為期3個月的貸款。他在1802年12月曾經描述過這一點：

在每個星期二和星期四，離曼徹斯特20英里左右的紡織工會帶著他們的貨物聚集到這裡，有些人帶來了20或30匹布料，另外一些人要多些，還有一些人要少些；他們將布料賣給商人，貸款則在2個月、3個月或6個月後收取。但是通常會有一些人希望拿到現金，他們願意為此損失一些利潤，以現金購買貨物的人通常能得到15%～20%的優惠。

實際上，內森無須向大製造商支付現款，貸款只有在貨物到達歐洲大陸後才會支付。另一方面，從法蘭克福那裡得到貸款，通常需要等兩個月的時間。很顯然，這種生意的利潤一般是以一種簡單的方式獲取。但是，在那個紡織業利潤可以高達20%的年代，內森的開價算是比較合理的了：在他的倉庫用現金交易的貨物按成本價優惠5%，運往歐洲的貨物則優惠9%。這是吸引顧客、提升市場佔有率的精明策略：在一封寫給潛在買家的信中，內森一直強調自己的開價比他的競爭對手都要低。正如他在1802年9月給父親的信中寫道的：「在曼徹斯特，沒有一家商行買貨的價格比我們便宜，也沒有一家把如此多的困難變成自己的優勢。」「你不可能在曼徹斯特找到像我一樣賺如此微薄的利潤的商人了。」他對一個新客戶保證道，「我很樂意非常坦白地告訴你這句話的意思：只要你跟我做過一單生意，你可能就會相信，我傳送給你的貨物比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人給你的貨物都要便宜。」此外，當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時，便開始向他父親公司之外的公司出口貨物，內森不僅以低價開啟銷路，而且還提供合理的定期貸款，他對老買家說，他看待對方的錢時，覺得「在你手裡與在我的口袋裡一樣安全」。他在歐洲大陸的客戶通常希望以3個月後到期的票據來支付貸款——實際上，是在內森裝運貨物（並付款）後的5個月。內森能夠支付的現款或「即時票據」越多，他能夠支付給供貨商的錢就越少；他給客戶提供的貸款越多，被吸引來的客戶就越多。這似乎一直是他最基本的原則。

## 第一章 家族生意（16）

這種體系的實際運用，正如這個時期信件所顯示的那樣頗傷腦筋。剛開始，內森必須親自到各地奔走，建立供應商與客戶網路。早在1800年11月，他從曼徹斯特出發前往蘇格蘭，在那裡他似乎發現了更好的布料或更好的價格。隨後他分別又在1801年和1805年去了那裡。經常性的倫敦之行（如他在1800年或1801年夏天的那次旅行一樣）對於維繫與當地銀行家的關係也是必需的，他必須依賴他們的透支技術。儘管一些買家在曼徹斯特派駐了代理人，內森還是更喜歡與歐洲大陸的公司直接交易，他組織了至少兩次跨越英吉利海峽尋找新業務的「探險」活動。1802年春天，他出現在法國和荷蘭，與巴黎、南錫、里昂、列日、梅斯、布魯塞爾、馬斯特裡赫特、安特衛普以及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公司建立了聯絡。在回英國前，他也去了德國和瑞士，確認了漢堡、紐倫堡、海德堡、科隆、慕尼黑、梅明根、薩爾茨堡、萊比錫、柯尼希斯貝格爾以及巴塞爾等地公司的訂單。他的1803年的客戶名單中甚至包括了一個遠在莫斯科的公司。他在這些旅途中攜帶的一本目錄——每頁都粘滿了小塊布料——後來儲存了下來，這本樣品目錄顯示英國製造商當時能夠製造的布料圖案和質地種類是如此繁多。他不在英國的這些時間，反過來也意味著大量工作都託付給了他的手下完成，主要由約瑟夫·巴克完成，巴克是內森抵達曼徹斯特後不久便聘請的一位英國簿記師。

不過，再多的旅行也不能保證供貨商能夠準時地傳送貨物，或者說傳送符合訂單要求的貨物。因此，內森的大部分聯絡人當時所做的工作便是確保製造商按照訂單供貨。與此同時，內森的努力也不能保證客戶總是滿意他們收到的貨物，花在爭執當初下單時的價格與質量上的時間差不多與供貨商協調的時間一樣多。他曾經跟蓋森海姆訴苦說：「我發出貨物後，兩個月後才能得到一張在3個月後兌現的票據……我或許在五六個月後才能拿到我的錢……得到訂單很容易，但是得到貨款卻並不那麼容易。」內森也經常因為利息問題以及高額的保險費與倫敦的銀行家發生爭執。這三方面的壓力最終導致了內森經營的多樣化。大約在1801年，對供應商的不滿促使內森決定自己生產布料——因此他從博爾頓和瓦特公司購買了一臺紡織機。然後又在1805年，他與另一個來自法蘭克福的移民合夥，這個人名為內姆·貝爾·林德斯科普夫（邁耶·阿姆謝爾商業夥伴貝爾·內姆的兒子）；內森

讓林德斯科普夫負責賣貨事宜。林德斯科普夫很快將內森的生意進一步多樣化，他不僅以內森的名義訂購布料，而且還訂購靛青，後來還買賣珍珠、玳瑁以及象牙（即所謂的殖民地貨物，這些都是從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地進口到英國的貨物）。最終，內森開始集中精力，關注自己生意帶來的各種信用交易。他經常一家銀行一家銀行地跑，以選擇更好的貸款以及貼現率好的票據，他與眾多倫敦銀行家有生意上的往來，包括萊昂·德·西蒙，戈德斯米德和德·伊萊亞森以及丹尼爾·莫卡塔，同時與歐洲大陸的銀行家也有來往，最著名的包括帕裡什公司和施羅德兄弟。與他的父親一樣，他逐漸地從一個商人轉變成一個商人銀行家。

## 第一章 家族生意（17）

在那個什麼都沒有定型的年代裡，狂熱、喧囂的氣氛全部被內森捕捉到了自己的信件裡。市場中充斥著無數小企業，價格和利率波動激烈，而且幾乎沒有任何監管措施，要在這樣的市場中生存並發展，必須具備極高的熱情以及冷靜的計算力。內森·羅斯柴爾德這兩方面全都具備，他也做好了準備，最初的時候，他出於討好，還曾給薩洛蒙公司寄了一桶紅酒，希望獲得更好的保險價格。但是很快，傲慢甚至恐嚇的口吻變成了他的主調，這些對他來說似乎是最自然的。早在1800年12月，他信心滿滿地給蘇格蘭一個製造商（內森在他那裡下了訂單）寫信說：「如果你使出渾身解數取悅我，很快你就會放心，我會盡我所能定期給你提供訂單。」兩個星期後，他再次強調了這條資訊：「我每天都有望接到來自歐洲大陸的訂單。我肯定會給你優先權，但是希望在我交給你其他訂單前，你應該先完成之前給你的訂單。你要求再延長3周時間完成訂單，但是你為我提供服務的速度越快，花費的成本越低，我給你的訂單就會越多。」當對方未做任何反應時，內森變得憤怒不已：「我十分吃驚，在這之前我沒接到你的任何資訊。我在格拉斯哥的時候，你虔誠地向我許諾立刻處理我的訂單，現在已經過去了這麼久，我卻沒收到你的隻言片語。如果你能夠在短時間內處理完訂單，你就能夠確保得到大訂單；如果你不能在承諾的時間裡完成訂單，那麼給你訂單也沒有任何意義。」另一個蘇格蘭的公司因為延誤傳送內森訂購的貨物，而遭到了他更為尖刻的指責：

我認為你們是把貨物當做了籌碼，等到我匯給你們大筆錢之後才會放手。這是一種非常不敬的行為……我想你們認為我再不會去格拉斯哥或者佩斯利，但是我很榮幸地告訴你，我會在兩個月之內再次去那裡，而且我相信以我支付貨款的方式，我能夠得到大量的貨物。

一年之後，他又毫不猶豫地指責一名笨拙的法國買家為「騙子」。

有時，內森覺得自己與競爭對手簡直是在打仗。他曾經「極度震驚地得知，我的敵人在法蘭克福瘋狂散播許多最為醜陋和莫須有的報告」。他曾告訴他父親：「這個國家有許多人非常樂意通過破壞我的信用和個人形象來保持自己的信用和形象——但是感謝上帝，我的根基如此牢固，他們無法通過邪惡無力的伎倆實現他們的目標。」毫無疑問，他的競爭對手確實試圖從他那裡得到更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難以避免地得出結論，有時他是放縱了自己好鬥的脾氣。「你是一個大混蛋。」漢堡銀行家貝倫斯在一次小口角中告訴他。

我……忍不住表達自己對（你信件中的）語調和內容感到的驚愕；非常明顯，你希望讓我相信你認為自己與凱圖一樣高尚，與雷古魯斯一樣執拗於自己的詞句；但是，無論你這些方面的願望是否打動過我，我仍然有一個問題一直放在心裡，不過我沒有閒暇或興趣去調查……你經常是瘋狂的，這就是我的想法。你有沒有意識到，你因為你的錢而讓我感到恐懼？我的錢並不比你少，而我甚至沒有住在英國。

他的合夥人林德斯科普夫在他們合作的初期，有一次無意批評了內森。林德斯科普夫在這之後的一封信裡透露，內森對他的言論感到不滿：「我所說的話、我的思想對你都是開誠佈公的，因為我以我們真正的友誼為出發點。如果任何無心的言論看起來帶來了一時的不快，如果並非有心之失，那麼在我看來，任何事都能被淡忘；我希望你也能有同樣的想法，並想著是自己現在正在給我的老朋友林德斯科普夫寫信。」當一個英國商人指責內森只跟「欺詐企業」做生意時，他暴跳如雷：

## 第一章 家族生意（18）

我可以向你保證，先生，我與之有交易的企業的社會地位以及實力都不比你差；倫敦、漢堡以及歐洲大陸其他地方最富有、最偉大的企業不是騙子，而他們就是我的生意夥伴……我可以向任何人證明，我從沒有過任何一筆壞賬，或在任何一位朋友破產時不再還他們的錢；如果我與騙子做生意，這些情形應該不會出現……沒有人比我更厭惡和憎恨欺詐。

確實，在19世紀初期紡織業動盪的世界裡，維持自己作為誠實商人的名聲極其重要，因為在別人眼裡這是此人商譽的根基所在。所以，另一個聯絡人表現出的同情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他發現難以忍受內森極端好鬥的性格：

最大的不幸在於，你一聽到別人的回答，你旺盛的想象力就會讓你覺得，如果有人認為除了無休止地追逐各種虛假佔有之外，還有更好的事可以做，那麼這個人一定厭惡跟隨你在誤解或錯誤言論的迷宮中前行；為了應付這些言論，你極度活躍的思想一直讓你疲於奔命，而無暇顧及自己以及別人的不滿。

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好鬥的年輕人在生意上有多成功。許多證據表明，內森實際上做得非常好。到1804年的時候，即他獲得入籍證書的那年，他已在唐寧街的阿德維克擁有了一棟房子，房子所在地是城鎮中繁華的區域，而且他在布朗街還擁有一個倉庫。4年後，他在莫斯利街25號擁有了一個「巨大寬敞」的倉庫，緊挨著倉庫的是他「寬敞、現代且精心構築」的住宅，莫斯利街當時也是曼徹斯特「最繁華的一條街」。鑑於內森在1800～1811年（這年他關閉了位於曼徹斯特的分部）之間的生意額，此類數字比較容易得到，他11年間的生意額加深了人們對他經濟地位迅速提升的印象（見圖1 2）。實際上，如果我們設想一下他僅以最保守的方式，以5%的比例賺取利潤，那麼11年間，他的80萬英鎊的銷售額利潤可想而知；後來巴克斯頓說的經營紡織品生意賺了4萬英鎊的事，看起來並無虛假。另一方面，他做生意的經歷遠沒有他後來描述的那麼順利。正如圖1 2顯示的那樣，從1804年初到1805年秋天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他經歷了近兩年的業績低潮期。這種情形後來再次出現，儘管1808年以及1809年他的成交量飛速增長，但在1810年，這一過程卻未能繼續。

圖1 2內森·羅斯柴爾德紡織品出口銷售額，1801～1811年（英鎊）

資料來源：發票冊，第一卷/221/第19~26頁。

這種忽漲忽落的情形不應該讓我們覺得驚訝。內森所經營的業務完全是季節性的，業績隨著不同的時機迴圈起落；而且，內森還得應付斷斷續續的戰爭造成的影響，以及拿破崙時期英國與歐洲大陸貿易的各種限制。即使在1803年英法戰爭再次爆發前，他還一直收到警告稱，跨海峽貿易可能被禁止。生意環境在1805年就已經開始惡化，因此正式的貿易封鎖——柏林有一項法令禁止英國人從法國控制的區域進口貨物（1806年11月）——只是給一場災難性的生意銳減蓋上了封印。早在1805年11月，一個聯絡人就哀嘆道：「現在對歐洲大陸來說，是最為關鍵，也最為悲慘的時刻……任何種類的貿易都沒有了，市場被各種貨物擠得嚴嚴實實，沒有一張訂單進來。」至少3家與內森有生意來往的公司，包括漢堡的M·M·戴維公司，在1806年最初幾個月裡到在那年6月貿易禁令出臺前就已相繼倒閉。

## 第一章 家族生意（19）

在這之後，諸如內森的各公司的選擇只能在休業與突破貿易禁令之間搖擺，後者則包含了無盡的風險。1806年5月，英國海軍在赫爾沒收了5艘船，並扣押了價值2萬英鎊的違禁品，這些物品是3個曼徹斯特猶太商人訂購的。另外一個猶太人也在斯托克波特被捕，而他只是前往英國與內森結清賬目。與此同時，法國也採取了相同的行動，逮捕了內森在漢堡的新代理人帕裡什，他被迫以蒙受巨大損失的價格甩賣了自己的貨物，以避免被沒收充公。殘存的信件副本集顯示，這個時期對於內森來說是極為艱難的一段日子，他收到的支票也越來越讓林德斯科普夫難以給予折扣優惠。早在1806年4月，帕裡什就向邁耶·阿姆謝爾抱怨，內森已經從他的銀行裡超信用額度支取了2000英鎊。而到同年8月底，他似乎已經欠了林德斯科普夫2.8萬英鎊，這些錢他需要支付4.2%的年息。隨著拿破崙與沙皇簽訂了《提爾西特和約》，形勢有了轉變，1807年7月，內森從哥哥阿姆謝爾那裡聽到了相關訊息，但是跨越海峽的貿易仍然受到了嚴格限制。

在這種形勢下，內森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非法從事他的出口業務——換句話說，他變成了一個走私犯。1807年10月，他利用一艘在美國註冊的貨船以及偽造的德國檔案，經過阿姆斯特丹向瑞典運送了一宗訂單所需的咖啡。運送違禁品其他受歡迎的路線是經德國赫爾葛蘭港以及波羅的海沿岸港口。當然，這類海運都不受法律保護，因此風險自然非常高。但是，回報也是相當可觀的。到1808年的時候，由於超群的「管理、判斷、遠見和關係網」，內森已經贏得了「總能把貨物運到歐洲大陸的能人」的名聲，儘管「沒有人提及貨物是如何運送的」。但是，他的生意在1808年以及1809年所得到的恢復也是非常短暫的。1809年9月，運往裡加的一大批貨物被扣押，只能通過「賄賂——實際上是一筆沉重的稅收」來換回。另一艘貨船在柯尼斯堡也遇到了相同的命運。

最沉重的打擊出現在1810年10月，地點是法蘭克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這天到來時，當年8月5日通過的特里阿農法令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放鬆了對進口的限制，允許進口所謂的「殖民地物品」。但是，大多數法蘭克福公司繼續著走私行為，部分原因是為了逃避按照新法規徵收的沉重的進口稅，部分原因是可以繼續買賣英國貨。比如，邁耶·阿姆謝爾僅在1810年7月就收到了不少於7船的英國貨物，總價超過了45萬英鎊。10月14日，楓丹白露詔令公佈，下令沒收所有走私進入法國控制地區的英國以及殖民地貨物。當時法國兩支步兵部隊佔領著法蘭克福，根據一個名叫蒂亞爾的間諜的密報，法蘭克福234家公司遭到了突然搜捕。邁耶·阿姆謝爾被發現手頭擁有價值6萬古爾登的違禁品，其中一半是靛青，可能是內森運來的。於是，邁耶·阿姆謝爾不僅要補繳特里阿農法令要求徵收的賦稅（邁耶·阿姆謝爾花費近2萬法郎），而且所有被扣押的貨物——總價在10萬古爾登左右——全部被公開燒燬。正如一個觀察家報告的那樣：「形勢的混亂程度已經超出了語言所能描述的範圍。」儘管邁耶·阿姆謝爾相對容易地從這一事件中脫身——貝特曼家族支付的罰款超過36萬法郎——但是，這場危機仍舊是個分水嶺。在這之後，這類商品貿易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生意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對內森而言，這種轉變在1806年10月就已經開始，當時他娶了漢娜為妻，她父親是倫敦一個成功商人萊維·巴倫特·科恩。這樁婚姻不



僅增加了內森的資金——除了妻子的嫁妝3238英鎊，他從自己的父親那裡也得到了厚重的一筆資金；同時也讓他成為倫敦猶太社群中最傑出人物的一個合作伙伴。1807年，內森攜手科恩完成了大部分走私業務，與他之前的合作伙伴林德斯科普夫一樣，科恩也鼓勵女婿拓寬向歐洲大陸出口的貨物範疇，除了英國紡織品，也要出口印度和波羅的海國家的產品。但是，這僅僅是一塊邁向成功的基石，此時，內森已經下定決心成為全職銀行家。在曼徹斯特朋友的眼裡，內森早在1808年就已經在這方面有所成就，儘管當時他在倫敦還不太為人所知，那年夏天他才在倫敦住了下來（聖海倫斯街12號）。儘管內森在倫敦最早的賬本顯示，他最遲在1810年就開始做銀行業務，但是從曼徹斯特遷移業務的程序卻要晚得多，直到1811年7月初，他才正式宣佈：

之前以內森·邁耶·羅斯柴爾德以及「羅斯柴爾德兄弟公司」名義在曼徹斯特進行的業務，從今天開始將停止，任何與該公司有業務來往的人需將他們要求付款的指令傳送到倫敦聖斯威斯蘭大街紐考特2號，N·M·羅斯柴爾德會計部。

內森自離開猶太街後，在前行的路上已走了很遠的一段旅程，儘管離開侷促的住所以及以「猶太母豬」為標誌的歧視僅僅12年，但內森·羅斯柴爾德在一個再好不過的日子裡獲得了他在倫敦的新住址。

## 第二章 「宮廷猶太人」 (1)

那個老人家……給我們帶來了財富。

——卡爾·羅斯柴爾德

內森·羅斯柴爾德在工業革命早期的心臟地帶取得的成功，對他父親在法蘭克福的生意來說也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從這方面來講，羅斯柴爾德家族都是工業時代真正的孩子。但是，邁耶·阿姆謝爾「宮廷猶太人」角色的成功扮演被當時的人認為在其家族經濟地位的崛起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實際上，即使邁耶·阿姆謝爾自己的兒子，也傾向於把父親與威廉九世、世襲王子、伯爵以及1803年之後的黑森-卡塞爾選帝侯之間的關係看做是家族財富的基礎。因為選帝侯的財富在1826年才為公眾所知，因此這方面的傳說一直與許多添油加醋的描述聯絡在一起，而且從沒有受到認真的質疑。但是仔細推敲儲存下來的記錄，我們發現，選帝侯的地位已經山窮水盡——或者說，至少是被誤解的。

黑森-卡塞爾的威廉王子差不多與邁耶·阿姆謝爾一樣大，而且兩人不僅對古錢幣興趣甚濃，而且對各種各樣的金錢同樣痴迷。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兩個人則截然不同，尤其是兩人的信仰背景。威廉的父親，1760～1785年的黑森-卡塞爾伯爵之前因為自己的舉動讓所有新教徒親屬震驚不已——不僅他的父親感到震驚，他的岳父、英國的喬治二世同樣如此——當時還是青年的伯爵改信了天主教。後來，他被禁止照看年輕的威廉。在七年戰爭期間，威廉和弟弟卡爾被派往丹麥，在那裡，威廉受到了另一個新教徒國王的影響，即弗雷德里克五世（同樣通過婚姻與英國喬治二世建立了親戚關係）。威廉在1763年娶了弗雷德里克五世的女兒為妻。一直到父親去世之前，威廉一直獨立地統治著哈瑙-明岑貝格的格拉夫沙夫特，它與法蘭克福的西邊與北邊相鄰。儘管宗教信仰在他生命中有著無比重要的政治意義，但不能說威廉看待戒律時帶有瞧不起猶太人的思想。他至少與3名情婦生了12個孩子，包括一名黑森貴族女子卡羅琳·馮·施洛特海姆生的4個孩子以及一名瑞士女子羅莎莉·多羅特婭·裡特爾生的至少7個孩子。威廉並沒

有試圖掩蓋自己偷情的「果實」，他給所有孩子適當的頭銜和名字——馮·黑森施泰因、馮·黑姆羅德特和馮·海瑙。

不過，他更頻繁犯的「罪」則是貪婪——這一「罪行」他卻較少承認。

與18世紀歐洲大多數王國和公國不同的是，黑森-卡塞爾非常富有，威廉即位時可以動用的財富在3000萬～4000萬古爾登之間。統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理這些財富，而不用受任何政治上的約束，這與西歐的其他地方截然不同：黑森-卡塞爾的資產與王子個人財產已經無法分開。這些資金的飛速積累主要是通過向出價最高的買主——通常是英國——提供僱傭軍獲得的，這種生意在美國獨立戰爭時達到了頂點。威廉從父親手裡接過王位之前就已經涉足此類生意，他提供了一支約為2000人的僱傭軍，幫助喬治三世鎮壓殖民地叛亂。報酬是極其豐厚的：威廉按照每個人76古爾登（約合7英鎊）收取費用，如果受傷，再額外收取25古爾登，戰死則再收76古爾登。這些錢並不是以現金支付，而是以無息匯票的方式打到威廉在倫敦銀行的戶頭中去，他當時所用的戶名是馮·諾頓父子。當他希望在匯票到期前兌現時，他就將它們賣給德國的經紀人。儘管他揮霍了不少財富——比如他給自己蓋了一座宮殿：威廉高地宮——事實上，儘管邁耶·阿姆謝爾在威廉統治哈瑙的時候，已經在威廉的圈子裡佔據了一個位置，但是伯爵在父親1795年去世後移居到卡塞爾時，邁耶·阿姆謝爾從各方面來說，仍舊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

## 第二章 「宮廷猶太人」（2）

我們通過一些事實瞭解到，他在1783年申請了一個「星期天特別通行證」離開猶太街，從後來的通訊中可以看出，邁耶·阿姆謝爾此時已經開始涉及英國票據生意。但是一直到1789年，他才通過比當地已有公司多給回報的方式，擠進卡塞爾的主要市場。即便在這個時候，他獲得的銀行信用額度也僅僅為800英鎊，而當時卡塞爾著名經紀人費德爾·戴維的信用額度則為25萬英鎊；在隨後的那年，邁耶·阿姆謝爾申請提高自己的信用額度，儘管額度升到了2000英鎊，但是與他申請的1萬英鎊相比，仍舊微不足道。但是，在這個時候，邁耶·阿姆謝爾建立在雙贏基礎上的功利性友誼發揮了作用，在這方面，他的兒子和孫子同樣毫不遜色。當時，卡爾·弗里德里希·佈德魯斯通過給威廉

與多羅特婭·裡特爾的私生子當家庭教師，一步步開始了自己的仕途。1783年，他調到哈瑙政府的財政部門；1792年，在他33歲的時候，他北上到了卡塞爾，在位高權重的戰爭基金中供職，職位也一步步提升。

佈德魯斯與羅斯柴爾德第一次心照不宣的合作出現在1794年，前者明確地推薦邁耶·阿姆謝爾應該被允許加入到已有5家公司競標的一宗15萬英鎊的英國票據買賣中。很顯然，他的推薦並未得到重視，但是佈德魯斯在1796年再次推薦，這次他成功了。兩家異教徒合夥公司拉佩爾和哈尼爾公司以及普雷和喬迪斯公司向戰爭基金出售100萬古爾登法蘭克福債券，戰爭基金購買了其中的90萬。佈德魯斯隨後提示邁耶·阿姆謝爾應該提供剩餘的10萬古爾登的債券，當然價格比其他銀行提供的（票面價格的98%）要更為大方（97.5%）。這個價格幾乎難以贏利，因為法蘭克福證券市場的開價都是100%，但是邁耶·阿姆謝爾比其他人稍微多一點點的折扣，讓他得到了夢寐以求的立足之地。1789年，3.7萬英鎊的賣出票據被他、拉佩爾以及喬迪斯以現金購得。在隨後的幾年中，邁耶·阿姆謝爾也逐步、穩固地提升了自己在威廉投資生意中的份額。在1801~1806年之間，他至少參與了11筆大宗貸款交易，其中最重要的是借給丹麥、黑森-達姆施塔特、巴登以及聖約翰團體的貸款。他還代表威廉參與了房地產買賣，與此同時，他仍繼續向威廉提供他心愛的徽章。

圍繞丹麥貸款的談判十分有趣，因為它們給了我們透視邁耶·阿姆謝爾打壓競爭對手方法的角度。起初，在1800年以及1801年，他對於能夠獲得拉佩爾和哈尼爾公司以及貝特曼等公司組織的貸款專案的一個份額就心滿意足了。不久之後，他就被他們看做是對等的合作伙伴。最後，大約從1804年起，他已經能夠獨佔丹麥業務，這部分要歸功於他給威廉提供的「小費」以及比別人多那麼一點點的折扣，部分歸功於他與漢堡銀行家J·D·拉瓦茨的良好關係，後者扮演著卡塞爾與哥本哈根的中間人角色。在這段時間裡，邁耶·阿姆謝爾出售的威廉的丹麥債券總價值至少為450萬古爾登（約合45萬英鎊）；他向黑森-達姆施塔特伯爵貸出了總額達130萬古爾登的貸款，其中差不多一半的錢是威廉的；還向巴登貸了一筆高達140萬古爾登的貸款。這些都是一些讓人吃驚的數字，自然地，邁耶·阿姆謝爾的成功引起了競爭對手的嫉

妒和怨恨。1806年，拉佩爾和哈尼爾憤恨地（但也是徒勞地）抱怨「猶太商業對手」對他們的聲譽造成的傷害，這些猶太人認為「羅斯柴爾德的名字」在黑森-卡塞爾享有的信用甚至超過了丹麥政府。

## 第二章 「宮廷猶太人」（3）

這些想法不僅僅侷限於異教徒公司中。1802年，卡塞爾猶太社群對邁耶·阿姆謝爾也發出了抱怨，因為他雖然住在城裡（上述的大多數生意均在這裡完成），但卻沒有「受保護猶太人」的身份，也沒有盡納稅的義務。被迫支付180古爾登買斷相關義務之後，邁耶·阿姆謝爾決定確保長子阿姆謝爾的受保護身份。在他的申請中，邁耶·阿姆謝爾極為偽善地說，在卡塞爾出現一個羅斯柴爾德「不會給當地的商人帶來任何衝擊，那些從事票據買賣的人甚至還會從中贏利，因為這類交易通常都是在一種激烈的競爭中獲利」。由於當地猶太社群的反對以及邁耶·阿姆謝爾本人的猶豫——他在考慮當地居住權給自己還是給兒子——這件事直到1806年6月才真正提上議事日程。

儘管邁耶·阿姆謝爾1803年就獲得了資深「宮廷猶太人」的頭銜，但需要著重強調的是，在此時，他與威廉相比，後者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銀行家；羅斯柴爾德從許多方面來講，更像是一個股票經紀人，迎合自己客戶日益增長的對無記名債券，而不是個人貸款的偏好。最具典型意義的是，邁耶·阿姆謝爾為威廉購買債券時的手續費不超過1 75%或2%，因此他在這項生意中獲得的利潤可能不超過30萬古爾登。此外，邁耶·阿姆謝爾本人至少從威廉那裡借過兩次錢。與此同時，我們應該記住，儘管威廉是邁耶·阿姆謝爾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客戶，但並不能說他是唯一的客戶。在那個公國遍地的時代，邁耶·阿姆謝爾的目標就是與宮廷建立儘可能多的聯絡——他為黑森-卡塞爾進行的貸款業務讓這一目標變得相對簡單。1803年，他被任命為數名權貴的「代理人」，其中包括聖約翰團體（依靠一筆收益前景不佳但仍果斷貸出的貸款）、黑森-達姆施塔特伯爵、託恩和塔克西斯王子（Prince of Thurn und Taxis，神聖羅馬帝國的世襲郵政局長）以及比丁根的伯爵卡爾·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莫里茨。這些任命中，聲望最高的任命出現在1800年，他被奧地利皇帝任命為「帝國宮廷猶太人」，以表彰其當初提供戰爭物資的舉動，以及為國王從黑森-卡塞爾所借貸款

爭取到的合理利息。他唯一的失敗出現在1802年，巴伐利亞宮廷拒絕了他成為代理人的申請。

當然，這些頭銜的重要性不應該被誇大。比如，在1803年，黑森-達姆施塔特海關官員就拒絕承認邁耶·阿姆謝爾作為「宮廷猶太人」的特權身份。不管怎麼樣，18世紀讓這些頭銜能夠發揮作用的小公國以及相互重疊的管轄體制已經處在一個空前的、革命性的變革邊緣——這一變革將改變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其宮廷保護人的關係。直到1806年，他們一直依靠選帝侯及其親屬來開展自己的生意，獲得能夠贈與的特權。但在這之後，威廉發現，他自己逐漸開始依賴邁耶·阿姆謝爾和他的兒子們了。

### 選帝侯的財富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黑森-卡塞爾與法國的軍隊在18世紀90年代已經發生過一次大沖突，1796年，法軍炮擊法蘭克福是那次衝突的頂點，猶太街也在那次衝突中遭到破壞。衝突也強化了卡塞爾與倫敦的傳統聯絡：威廉已經不止一次地將自己的軍隊投到對抗法國的戰場上，以換取英國的金錢。確實，他後來接受了1801年簽署的《呂內維爾和平協議》，該協議將萊茵河左岸劃歸了法國。但是當1803年英法戰爭再次爆發之後，破壞條款的情況在所難免。威廉過於信賴英國，以至於他沒有追隨16個脫離神聖羅馬帝國的德國諸侯國，加入在1806年夏天組成的萊茵親法同盟。他對那些尋求他支援的各派勢力定的價碼也過於苛刻，最終危及了自己的地位。拿破崙為漢諾威人提供了領地。另一方面，選帝侯（威廉此時的頭銜）借錢給奧地利和普魯士，後者在1805年加入了反法聯盟。1806年秋天，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接連吃了敗仗之後，威廉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儘管他匆忙遣散了軍隊，儘管他提出了加入萊茵同盟的請求，儘管他甚至命令在邊界豎起了寫著「黑森選帝國：中立之國」的牌子，但都不能夠消除拿破崙的怒火，在他的眼裡，威廉就是「普魯士的陸軍元帥」。

「我的目標，」拿破崙直截了當地宣佈，「就是剷除黑森-卡塞爾王室，將它剔除出統治者的行列。」威廉別無選擇，只能逃亡，最初他逃往弟弟位於荷爾斯泰因（Holstein，那時是丹麥的領土）哥託普的莊園。當年11月2日，拉格朗日將軍佔領了威廉在卡塞爾的住所，並擔任

了總督；兩天後，他釋出了一項公告，正式沒收了威廉的所有財產，併發出警告稱，任何隱藏威廉財產的人都將被送上軍事法庭。

## 第二章「宮廷猶太人」(4)

根據民間的傳說，就是在這個緊要關頭，威廉向他忠實的「宮廷猶太人」羅斯柴爾德求助，把自己全部的「動產財富」託付給了後者：

就在羅斯柴爾德將王子的財產藏到自己小花園的一角時，法國軍隊已經進入了法蘭克福。他自己的財產——價值4萬古爾登左右的貨物與財產，他並沒有藏匿；他知道，如果也藏起自己的財產，法國人勢必會進行嚴格的搜查，那麼不僅自己的財產會被發現，王子的財產同樣難逃被劫掠的厄運。法國人與舊時的腓力斯人一樣，把羅斯柴爾德的財產洗劫一空，沒給他留下一個泰勒（thaler，德國舊銀幣）。實際上，他與所有猶太人以及其他市民一樣，回到了赤貧狀態，但是王子的財富得以保全……

根據這個登在1836年的一份英國報紙上的流行版本的故事，當邁耶·阿姆謝爾後來將財產還給威廉時，後者說道：「我既不會接受你慷慨給予的利息，也不會將錢從你手裡拿走。利息不足以彌補你為拯救我的財產而失去的東西；我的錢你還可以利用20年，而且利息不超過2%。」

我們在序言中已經討論過，這個故事出現在布羅克豪斯出版社1827年的《受教育階層的德意志百科全書》一書中，第一次流傳開來。儘管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這其實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自己編撰出來的故事，但後來這個故事流傳得如此廣泛，以至於呈現出了它自己的生命以及包含的各種重要意義。一開始，它是為了證明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存款託付人獨一無二的誠實：願意為保護客戶的財產以及利息承擔冒任何風險。這也是莫里茨·丹尼爾·奧本海姆1861年接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委託所畫的兩幅畫的主題。但是，到19世紀晚期時，開始出現了一個不同版本的故事：選帝侯的財富都是「血金」，因為他都是通過出售僱傭軍得來的，而邁耶·阿姆謝爾利用它賺了大筆的錢，而不只是保管它。正面以及負面版本的神話在美國和德國的兩部

電影中顯露無遺，這兩部電影的片名均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分別上映於1934年和1940年。

我們在很久之前就已瞭解，這個故事是虛構的——儘管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諸多神話一樣，它包含有一丁點兒的事實。實際上，威廉的動產在法國人佔領黑森-卡塞爾之前就已經四處轉移了，只有一些相對不那麼重要的物品託付給了邁耶·阿姆謝爾保管。威廉最值錢的財物——主要是債券（未付息票，它們被分開藏匿在另一個地方）——成功地由佈德魯斯偷運出了卡塞爾，他在1805年11月初冒險穿越法國防線去了一趟伊策霍。不過，大部分財物藏在威廉位於鄉村的宮殿裡。根據威廉親手繪製的一份清單，24箱財物——其中不僅有證券、息票，還有賬本、銀器和衣服——藏在威廉高地宮北翼的樓梯下，另24箱包括重要的戰爭基金檔案藏在宮殿裡的另一個地方。在附近的獅子城堡也藏有24箱，裡面包括威廉情婦的證券、官方檔案、瓷器和衣服。最後，在他位於沙巴堡的打獵時用的小屋裡，威廉還藏了其餘47箱的財物，其中大多數是銀器。不過，要不是與拉格朗日達成了一項交易，這些藏匿的財物最後大多會落到法國人的手裡——他們很快找到了選帝侯銀器的清單。拉格朗日接受了26萬法郎（當時的情況下要價適中）的賄賂後，同意威廉運走42箱財物，其餘的則被沒收充公。隨後，11月8日的晚上，選帝侯的一個官員用車隊將放行的42箱財物運到了霍夫-斯托爾津根，在那裡將它們再次分開藏匿。戰時內閣大臣倫內普將其中的一些重要檔案（包括選帝侯在倫敦的投資檔案）帶回了卡塞爾；10箱託付給位於托爾貝克的明登公司，這10箱中的兩箱運到了石勒蘇益格，其餘的運到了艾澤納赫；19箱偷運到了法蘭克福，交給了普賴和喬迪斯銀行保管。

## 第二章 「宮廷猶太人」（5）

但這時，拉格朗日發現自己向選帝侯的要價太低了。他又重新搜回了之前放行的一些箱子，並提出需要得到更多的錢。最終，雙方敲定了協議：為了得到比第一次多得多的報酬，拉格朗日承諾調低選帝侯的資產評估總額。後來，他列出的清單顯示，選帝侯的總資產為1980萬古爾登（大部分由借給其他德意志公國王公們的大額貸款構成），這也成為了法國「官方」的清單。與選帝侯其他資產有關的檔案——總值約為2700萬古爾登——都交給了佈德魯斯。其中一些檔案



送到了位於石勒蘇益格的選帝侯那裡，一些由佈德魯斯自己保管。其餘的大多是戰爭基金和國王的日常檔案，裝到了4個箱子裡，然後交給了邁耶·阿姆謝爾保管。此外，選帝侯在第二年夏天離開伊策霍前往奧地利時，將一些裝有徽章和債券的箱子也交由位於漢堡的邁耶·阿姆謝爾短暫保管。不過，他負責保管的也就是這些。

當然，這些枯燥的流水賬低估了羅斯柴爾德對於選帝侯的重要性。首先，威廉仍然需要熟練的股票經紀人和投資顧問。幾經周折，威廉仍然保住了價值2700萬古爾登的財產，他的投資收入仍然非常重要，儘管他此時需要為流亡生涯支付昂貴的額外代價。（根據伯格菲爾的統計數字，威廉每年的額外開支高達74萬古爾登。）邁耶·阿姆謝爾這段時期扮演的角色就是負責蒐集各個借貸的人應付的利息。此外，他還要開發新的放貸機會。例如，他安排借給哈瑙財政部10萬古爾登，還借給格拉夫·卡爾·馮·哈恩（Graf Karl von Hahn，揮霍無度的「劇院格拉夫」，他不久之後被其家人交由法庭監護）。我負責掌管選帝侯的活期存款賬戶，在這之前它一直由佈德魯斯掌管。其間，在佈德魯斯的建議下，他還向選帝侯借了一些錢。他還從選帝侯手裡買回了很大一部分收藏的錢幣；威廉的收藏在這一時期逐漸變賣流失，他存放在哈瑙地窖中的14箱酒也被盜竊一空。他同時負責處理資金的轉移事宜，這些錢是1813年威廉在軍事以及外交方面所要動用的：從法國人手裡贖回俘虜的費用；給維特根施泰因王子的報酬，因為他提供了外交服務，此外還有給俄羅斯與普魯士的費用。他借給選帝侯在柏林的兒子16萬古爾登；並負責照應選帝侯的情婦格雷芬·馮·施洛特海姆的財務。他甚至賣給選帝侯一枚鑽戒。

坦率地講，這些事務大多是瑣碎繁雜的，並且大量工作無利可圖。邁耶·阿姆謝爾在1809年和1810年還浪費了大量時間，這主要是因為一項陰謀的「流產」，當時安排他協助「一窮二白」的奧地利財政部將威廉的一些資產——名義上的價值超過了1000萬古爾登——轉移給奧地利國王。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為威廉提供的一項服務，使得這一切都很值得：管理他的英國投資。內森後來聲稱「黑森-卡塞爾國王……把他的錢給了我父親；我父親一刻都沒耽擱，隨即寄給了我。我意外地收到了60萬英鎊，而且很好地使用了它們，國王還把他所有的酒和亞麻織品當成禮物送給了我。」這似乎有些道理：法國人發動

的戰爭給金融領域帶來的重要影響便是大量資金從歐洲大陸流進了倫敦。但是，有關財富的故事，事實上要複雜得多。

開始流亡生涯時，威廉在英國已經有了大量的投資，主要是價值635400英鎊的國債投資，每年的利息收入為20426英鎊。此外，英國威爾士王儲和他的兄弟也欠他一筆數目不小的債務，大約為20萬英鎊（當然，他們通常欠著利息不還）。作為英國王室的一個盟友，他在1807～1810年之間還得到了總額為100150英鎊的補貼款。最關鍵的問題是，當這些利息和補貼款轉到他在範·諾滕銀行的現金帳戶後，他是如何處置它們的。早在1807年——換句話說，在內森從曼徹斯特移居到倫敦前——他接觸到了威廉在倫敦的特使洛倫茨，他向後者提供瞭如何動用那筆錢進行投資的建議，但是很快便遭到了威廉的拒絕。直到兩年後，在佈德魯斯的撮合下，邁耶·阿姆謝爾才被允許代為購買3%的統一公債（可贖回的國債，用現在的話來說便是優質證券），他以73.5%的價格購買了面值總額為15萬英鎊的債券。這是到1813年年底為止所進行的不下9起交易的第一起，這幾起交易涉及的資金總額為664850英鎊。這便是內森後來與巴克斯頓吹噓時提到的那筆錢。他的弟弟卡爾也提到過它，他在1814年發現「老人家」（威廉）「給我們帶來了財富，如果內森手裡沒有選帝侯的30萬英鎊（原文如此），那麼他將不會有任何成就」。

## 第二章 「宮廷猶太人」（6）

這些以別人的名義進行的統一公債買賣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何如此重要？答案就包含在這些投資如何實現的方式中。乍看起來，這種業務不可能賺到大量的利潤，因為邁耶·阿姆謝爾每筆買賣只收取0.125%的佣金。但仔細察看，就會發現其中另有奧妙。威廉實際上並不會為每次買賣立刻提供所有的現金，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積極地在購買公債，儘管是以他的名義進行的，但資金大部分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借來的。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就能夠以市價的一個比例先付一部分錢，等到「清算日」到來時再支付全部款項。這一過程中包含了雙重投機：對公債價格以及對古爾登-英鎊的兌換比率的投機。但邁耶·阿姆謝爾並不樂意這樣做。他更喜歡從威廉接受的價格、匯率與他兒子在倫敦實際支付時的價格、匯率之間的差異中尋求利益。前三起買賣中，價格之間的差異佔到了訂單總額的2%，這反映了在英國反對拿

破崙的動盪時期，統一公債的價格正在滑落。邁耶·阿姆謝爾也可能（儘管無法求證）從匯率差異中獲得了一些利潤。

選帝侯可能對正在發生的事起了疑心：當1811年統一公債的價格達到面值62.5%的低點時，他下令暫停新交易，並要求在次年5月前停止向倫敦匯錢結清之前的買賣。但是這可能剛好合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胃口。因為公債在威廉付清款項前一直是以內森的名義登記的，這意味著即便到了1813年3月，面值總額為121000英鎊的公債名義上都是內森的。當然，它們絕大部分是用借來的錢購買的，並且，從選帝侯的資金到位的那刻起，到債券正式過戶給他或他的代理人，羅斯柴爾德家族還需支付這段時間內的利息。另一方面，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困難，因為將所有權證書從倫敦送到身處布拉格的選帝侯那裡並不容易。無論內森從市價與匯率中賺取的利潤有多少，買賣價值超過60萬英鎊的公債，實際掌握著10多萬英鎊資金的事實，標誌著倫敦一股新興金融力量的崛起。從這個意義上講，正如卡爾後來提到的那樣，它給內森提供了一種「安全感」——因為人們認為他掌握的資金資源實際上超過了家族實際掌控的資金源。阿姆謝爾在1818年寫給弟弟們的信裡，道出了這一點的重要意義：「如果不是我們在布拉格為他爭取到了選帝侯股票中的一筆大交易，內森在戰爭期間不可能賺到13.2萬英鎊那麼多的錢……那時，內森甚至連股票是什麼樣的都不知道。」實際上，戰爭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將威廉的一部分金融實力變成他們自己的囊中之物。

另一方面，這種安全感的代價是歐洲大陸上極度的不安全。羅斯柴爾德家族替威廉工作的風險是實實在在存在的。法國當局急切地追尋著選帝侯財富的下落，他們也準備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比如，按照1808年的《柏林協定》，拿破崙放寬了有利於選帝侯債務人的一項條款，即如果他們與法國當局而不是與威廉達成協議，他們的債務就能獲得減免。更讓人擔憂的是，拉格朗日將軍帶著他收到的賄賂離任，邁耶·阿姆謝爾的辦公室隨後遭到法國警方的搜查，普賴和喬迪斯公司也是如此。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邁耶·阿姆謝爾保管的4個箱子被藏到了前面提到的祕密地窖裡。1808年8月，薩洛蒙遭到一名法國警官的質詢，另一家銀行的代表因被懷疑替威廉工作，也遭遇了薩洛蒙同樣的經歷；隨後的一個月裡，佈德魯斯和倫內普遭到短

暫羈押。這一情形在第二年夏天再次上演，當時發生了一起小規模反法暴動。駐威斯特伐利亞的警方特派員——一個叫做薩瓦奈的人——下令再次逮捕佈德魯斯和倫內普；然後，根據羅斯柴爾德家族一個競爭對手提供的情報，他隨同法蘭克福一名高階警官前往邁耶·阿姆謝爾的辦公室，隨後在那裡上演了一出非常怪異的訊問——法國人試圖讓邁耶·阿姆謝爾承認以威廉的名義向暴動發起人提供了資金。

## 第二章「宮廷猶太人」（7）

薩瓦奈毫無疑問掌握了大量的情報。他知道邁耶·阿姆謝爾曾於1807年去過漢堡和伊策霍——在這兩個地方，他「與（選帝侯）在他的辦公室裡度過了幾個小時，兩人在花園裡邊散步邊交談」。他還掌握了邁耶·阿姆謝爾與佈德魯斯的交易情況。邁耶·阿姆謝爾很快「認罪」：「因為他長年遭受一種病痛的折磨，所以患上了健忘症。」是的，他到過漢堡，但只是去處理一些貨物，它們被錯誤地當成違禁品扣押了。是的，他認識佈德魯斯和倫內普，但他「從不相信他們，兩人都不是他要好的朋友，只是偶爾相識」。是的，他曾是選帝侯的「御用代理人」，而且曾以威廉的名義提供過貸款給丹麥——丹麥還是埃姆登（Emden，德國地名，亦有大白鵝的意思）？他根本沒有轉交過錢給佈德魯斯，反而是他從佈德魯斯那裡拿了2萬古爾登，他用這筆錢付了很多賬單，但錢還給誰了就記不清了。第二天，薩瓦奈又盤問了薩洛蒙、15歲的雅各布、薩洛蒙的妻子、阿姆謝爾的妻子，甚至連邁耶·阿姆謝爾的妻子居特林都沒放過。當然，他沒得到任何有用的資訊。居特林更是成為了無辜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什麼都不知道，她一整年都待在家裡，從沒參與過任何與生意有關的事務。她從沒見過（佈德魯斯），只關心自己和家務。」最後，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遇到的大多數拿破崙屬下的官員一樣，薩瓦奈似乎只得承認失敗，以一筆小「貸款」作了了結。1810年，當法蘭克福變成了卡爾·特奧多爾·安東·馮·達爾貝格男爵直轄領地之後，形勢開始好轉；達爾貝格之前是美因茨的大主教，1806年之後是萊茵河同盟的大主教。

早在3年前，邁耶·阿姆謝爾就開始用貸款討好達爾貝格了。他此時又用一筆44萬古爾登（以折價後價值29萬古爾登的債券支付）的款項換取了法蘭克福猶太人的解放，並給達爾貝格本人8萬古爾登，以資助他前往巴黎為拿破崙的兒子洗禮。實際上，邁耶·阿姆謝爾很快便正

式成為了達爾貝格的「御用銀行家」，幫助他進行土地買賣方面的投機，買這些土地的錢則都是用法蘭克福猶太人「捐獻」出來的。這也是達爾貝格信任和尊敬邁耶·阿姆謝爾的標誌，他隨後任命邁耶·阿姆謝爾為哈瑙選舉團成員，與諸如西蒙·莫里茨·馮·貝特曼這樣的傑出的異教徒共事。至於達爾貝格是否知道邁耶·阿姆謝爾仍繼續為威廉服務，我們不得而知；而威廉最大的心願可是將達爾貝格以及他的法國老闆趕出黑森-卡塞爾。歷史在這方面有驚人的相似性，就在幾年前，邁耶·阿姆謝爾曾經從威廉手裡獲得一筆62萬古爾登的款項，支付給了奧地利，用以發放反法戰爭的軍餉和購買戰馬。邁耶·阿姆謝爾去世後不久，他的兒子阿姆謝爾就給了達爾貝格25 5萬古爾登，其中部分錢款則是用來為法國軍隊購買戰馬！

當然，邁耶·阿姆謝爾——如佈德魯斯一樣，他也接受了達爾貝格提供的一個官職——可能是認為威廉難以重返王位。但是，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就應該完全斷絕與威廉的聯絡。他實際上是兩邊都討好。這種策略具有顯而易見的吸引力，這也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此前幾十年開啟局面的一種策略。但是，雙重代理人的身份通常會面臨失信於兩邊主人的風險，無論誰贏，自己最終得到的都可能是失敗者的結局。出於這樣的原因，我們毫不驚訝地發現，在選帝侯流亡期間，邁耶·阿姆謝爾形成了保密的習慣——這也是他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之一。起初，他並沒意識到保密的重要性。在選帝侯流亡的最初幾個月裡，他和兒子卡爾曾數次前往伊策霍——實際上，他們為見威廉，在漢堡專門設立了一個永久性辦公室——並且定期公開地與威廉最資深的官員克納茨聯絡。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樣，這些都沒能躲過法國警察的眼睛，邁耶·阿姆謝爾很快意識到「當下行事要萬分小心才行」。到1808年中期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與選帝侯官員之間的通訊都由佈德魯斯和拉瓦茨轉交，而且信件都是用程式碼寫成。佈德魯斯在心中變成了「馮·瓦爾德施密特男爵」，克納茨變成了「約翰·韋伯」，邁耶·阿姆謝爾的程式碼則是「彼得·阿諾爾迪」或「阿諾德」，而威廉的名字有好多個，如「赫爾·馮·戈爾德施泰因」、「約翰內斯·阿德勒」或「校長」。選帝侯在英國的投資被稱為「魚乾」。為了進一步增加安全性——「你越小心謹慎越好」——所有的信件並不直接寄給邁耶·阿姆謝爾，而是寄給了尤達·西歇爾，他的兒子伯恩哈德1802年

娶了伊莎貝拉·羅斯柴爾德。當卡爾和阿姆謝爾前往布拉格看望選帝侯時，他們從丹麥南下的那一刻起，所有的通訊都以極為保密的方式進行。有時，羅斯柴爾德人甚至警惕到將德語字母換成希伯來字母寫一些信件。這些警惕是很有必要的；除了前文提到的搜查和訊問，法國警方在1811年至少成功地截獲了一封信件。

## 第二章 「宮廷猶太人」 (8)

在奧地利境內，羅斯柴爾德成員的行動同樣遭到了警方的監控。當然，不用過多地擔心奧地利當局，但是也不能確保威廉與奧地利國王的關係會一直保持友好狀態。實際上，自從法國在瓦格拉姆戰勝了奧地利之後，威廉再次被迫出走的可能性就已經非常大了。雙方在財政問題上的交涉失敗也讓他為維也納所冷落。由於這個原因，羅斯柴爾德家族繼續以祕密的方式進行自己的活動，即使在布拉格也不例外，這也讓警方對他們的政治角色產生了誇大的印象：

這個猶太人（阿姆謝爾）是支援選帝侯的一項重要宣傳計劃的領頭人物，這項計劃的分支遍佈黑森之前的領地……這些推測是建立在以下事實之上：無論何時我到選帝侯的住處，總能發現有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在那裡，而且通常由軍隊司令施明克和國防大臣克納茨陪同，他們之後會進到自己的房間裡，羅斯柴爾德成員通常攜帶著檔案。我們或許認為他們的目標不會有損於奧地利，因為選帝侯尤其急切地希望恢復昔日的權位，因此我們幾乎沒有討論過這樣的問題，即那些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可能把握主導方針的組織和協會，它們的全部目標就是是否能從奧地利撈取反對法國和德國的好處。由於擁有廣泛的商業觸角，他做這樣的事比任何人都要容易，也能夠把陰謀隱藏在生意的面紗下。

但儘管羅斯柴爾德家族擔負著重重風險，他們也並沒有獲得威廉的完全信任。羅斯柴爾德家族保全選帝侯財富的神話中，與現實最不符的一個部分就是威廉對邁耶·阿姆謝爾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恰恰相反，邁耶·阿姆謝爾不得不忍受選帝侯一次又一次偏執的猜疑。威廉第一次的疑慮是擔心邁耶·阿姆謝爾可能背叛他，投奔了法國。後來，他開始擔心邁耶·阿姆謝爾的代理人盜用他的資金。他指責邁耶·阿姆謝爾騙取他的英國股票的收益，指責他處心積慮地侵佔了他在漢堡託付給邁耶·阿姆謝爾照看的財物。這段時間裡，邁耶·阿姆謝爾只

能依靠佈德魯斯從中調解，重新贏得選帝侯的信任。佈德魯斯替他說了大量的好話。他對威廉說，他將如此多的生意託付給邁耶·阿姆謝爾，是因為：

他付錢最為準時，總是能算出當天一宗交易的官方匯率，從不向任何人透露陛下您的交易資訊，他極為謹慎地替您處理財產，法國官員曾盤問過他是否為您從英國轉移過資金，但是他們在面前擺著的賬本中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

不過，殘酷的事實是，佈德魯斯作出這些保證也並非純粹出於好意。選帝侯不知道的是，佈德魯斯與邁耶·阿姆謝爾達成了一項協議，將自己的一個情婦安排進了後者的公司。為了給自己投資的2萬古爾登（即邁耶·阿姆謝爾對薩瓦奈「坦白」的那2萬古爾登）尋求好的回報，佈德魯斯承諾「儘自己所能在各種商務中推薦該公司，尋找一切可行的機會為公司爭取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更不用說邁耶·阿姆謝爾與法國官方以及達爾貝格所做的交易，選帝侯的猜疑看起來不太偏執了。威廉逐漸意識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發展的各種新的商業關係讓他們逐漸脫離了對自己的依賴。1812年5月，他要求邁耶·阿姆謝爾的一個兒子前往布拉格擔任自己的「御用代理人」時，遭到了禮貌但卻斷然拒絕。

因此卡爾·羅斯柴爾德提到過的一個說法其實有些誇大了，即「老人家」給他們帶來了財富。1797年，邁耶·阿姆謝爾的資金是108504古爾登（約合1萬英鎊）。10年後，他的資產負債表表明總資金為514500古爾登（約合5萬英鎊）。所以這段時期他與威廉所做的生意似乎不可能為資金的增長作出與法蘭克福—倫敦之間的進出口業務同樣的貢獻。可以肯定的是，到1810年時，公司的資金上升到了80萬古爾登（約合8萬英鎊），增長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可能來自管理威廉在英國的投資。但是選帝侯財富真正的重要性，就如卡爾和阿姆謝爾都隱約承認的那樣，是幫助內森完成了從曼徹斯特商人到倫敦銀行家的轉變。這一點一旦實現，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老人家」的依賴就小了。

##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統治者

儘管羅斯柴爾德家族輕易地「背棄」了波旁，轉投奧爾良，從保守黨轉到了輝格黨，但他們熬過1830年革命的「法寶」並不完全是緊跟國內政治變化。因為國內的威脅——儘管這種威脅迫使詹姆斯把自己的債券埋到了花園裡——從許多方面來說，是當時革命帶來的威脅比較小。從金融的角度看，更為嚴重的威脅是革命可能間接地導致大國之間爆發戰爭。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1）

那些希望開戰的人無疑會找別的銀行家。

--弗里德里希·根茨，1830年

儘管羅斯柴爾德家族輕易地"背棄"了波旁，轉投奧爾良，從保守黨轉到了輝格黨，但他們熬過1830年革命的"法寶"並不完全是緊跟國內政治變化。因為國內的威脅--儘管這種威脅迫使詹姆斯把自己的債券埋到了花園裡--從許多方面來說，是當時革命帶來的威脅比較小。從金融的角度看，更為嚴重的威脅是革命可能間接地導致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這個時期的私人通訊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他們對戰爭的擔憂，而且原因顯而易見。一次革命--或即便是一次改革危機--影響的主要是國家債券。一場戰爭可能導致所有政府證券的價格暴跌。如果倫敦、法蘭克福、維也納和那不勒斯的經濟保持穩定，那麼在巴黎發生的國內危機，羅斯柴爾德或許能夠經受得住。但是，一場歐洲戰爭影響的將是5家分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通訊顯示，這種擔憂在1830～1832年達到了頂峰。"你不能想象，如果戰爭爆發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但願不會如此!"詹姆斯1830年10月寫道："如果不幸成為事實，所有的證券價格都會下跌，根本不可能賣出任何東西。"一個月後，他試圖量化風險：

我們手頭上有90萬公債（面值3000萬法郎），如果和平得以延續，它們能值75%；而戰爭爆發的話，它們將跌到45%.....我認為如果和平一直持續下去的話，公債價格將在3個月內至少上漲10%.....

這也解釋了為何當時有如此多的人相信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僅熱愛和平，而且還利用他們的金融槓桿維繫和平的原因。比如，路德維希·博恩就明確地認為，羅斯柴爾德1831年賣出奧地利債券限制了梅特涅的軍事外交空間，當時梅特涅急切地希望用武力防止革命擴散到義大利和比利時。同時他強烈地暗示羅斯柴爾德家族樂意看到法國對奧地利採取一種更為和平的政策："如果羅斯柴爾德家族坐在法國王座之上，那麼世界就不會經受法國與德國之間那麼多的戰爭折磨。"類似的言論也能從政治圈裡聽到，比如奧地利外交家普羅克施·馮·奧斯滕伯爵在1830年12月說："這只是方式方法的問題，不管羅斯柴爾德說了什

麼話都是決定性的，而且他不會給戰爭提供一分錢。"兩年後，奧地利財政大臣庫貝克將薩洛蒙與"和平"直接畫上了等號。不僅僅是奧地利發現必須屈從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壓力，梅特涅和奧地利駐法大使奧波尼聲稱法國政府比奧地利政府更依賴羅斯柴爾德家族。早在1828年，皮克勒王子便開始拿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發跡與拿破崙進行比較，"拿破崙悄無聲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卻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國王.....一隻小小歐椋鳥的利爪卻引起了一場巨大的雪崩，頃刻間吞沒了一個村莊；而羅斯柴爾德，儘管他的父親是賣綢緞的，但今天的歐洲如果沒有他，任何國家都無力發動戰爭"。普魯士外交家阿奇姆·馮·阿尼姆在19世紀40年代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他發現沒有受到"羅斯柴爾德家族黃金鎖鏈"束縛的政府非常之少。

這些論斷很快便成為羅斯柴爾德神話的一個組成部分。阿方斯·圖斯內爾在他的反猶小冊子《猶太人--新時代的國王》（1846年）中，簡潔明瞭地稱："猶太人投機和平，這種現象仍在上升，這也解釋了和平能在歐洲持續了15年的原因。"此後的作家則以更為誇張的筆法描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和平的關係。卡普費格和希拉剋據稱均援引一個羅斯柴爾德成員的話說："（歐洲）不會有戰爭爆發，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希望它發生。"莫頓的話則是，"羅斯柴爾德兄弟成為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和平主義者。"居特林·羅斯柴爾德經常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有戰爭的，（因為）我的兒子們不會提供金錢（資助）。"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2）

在公開場合，羅斯柴爾德兄弟喜歡鼓勵這類想法，因為這使得他們看起來既實力強勁又平易近人。"你知道誰是法國的總督，甚至國王嗎？"內塞爾羅德伯爵夫人1840年12月問她丈夫，"是羅斯柴爾德。在他最近舉辦的晚宴上，我與他進行了深入交談；我沒有向他說任何我自己的觀點，我讓他暢所欲言。他已經厭倦了（法國首相）梯也爾和他的大臣們"：

"我非常瞭解他們，"他說，"我每天都見到他們，只要一發覺他們所走的路線與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馳，我就'召來'國王--我什麼時候想見他都可以，我向他說明了我的想法。因為他知道我將蒙受大量損失，而且我想要的只是和平，因此他對我非常有信心，對我言聽計從，我對他說過的話，他極為重視。"

究竟這種餐桌上的話吹噓成分有多大--就如內森在19世紀20年代向皮克勒王子吹噓的那樣？兄弟幾個的私人通訊中，是否包含了外界流行的說法：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維繫了1829年之後的和平？

這裡有必要將羅斯柴爾德對於金融槓桿的使用--主要是拒絕向那些籌劃戰爭的政府提供貸款--與他們充當外交溝通渠道的角色區分開來，後者通常不易被人覺察。第二種功能，即外交渠道功能，在19世紀30年代，其重要性急速提升，儘管羅斯柴爾德的通訊系統是在此前10年已經成型。從根本上說，政客與外交人員開始使用羅斯柴爾德通訊系統是出於兩個原因：它比官方用以傳遞外交信件的信使系統要快；非約束性資訊能夠通過兄弟幾個彼此間的通訊，間接地從一個政府傳遞到另一個政府。羅斯柴爾德兄弟願意提供這樣的服務，其原因也不難發現：他們能夠藉此獲得比正規渠道知悉的外交政策更多的資訊，進而做出更好的投資決定。對於歷史學家，難處就在於兄弟幾個並不總是明確地區分自己的想法以及大臣們的觀點：也是從這個時期起，他們開始在信中使用"我們"這個詞，它所包含的並不僅僅是"我們羅斯柴爾德家族"這層含義，同時還代表了"我們的政府"，意指5兄弟此時生活的5個不同的國家。此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影響政策方向，還是政策影響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確實很難區分。

### 龐大的通訊網路

因此，羅斯柴爾德兄弟溝通網路的發展和特性對於理解19世紀30年代的金融外交至關重要。與平常一樣，一定數量的神話需要被剔除--人們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就如迪斯雷利小說人物西多尼亞一樣，是一種近乎超自然的情報部門的核心："任何一個大臣都沒有與祕密特工和政治間諜進行過如此的溝通.....通過這些資訊來源，他掌握的奇怪和隱藏的事情通常能嚇到那些聽他講故事的人.....世界歷史的祕密是他的消遣內容。"確實，截至19世紀40年代末，羅斯柴爾德兄弟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代理人和定期通訊網路，其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讓紐考特跟上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腳步。但是，在滑鐵盧戰役之後的20年裡（戰役結果的訊息是羅斯柴爾德通訊渠道的第一個成果），他們的系統初見雛形。與任何一個希望進行國際通訊的人一樣，他們的信件--有時甚至是他們的性命--完全依靠運氣。1817年，薩洛蒙和他的妻子乘馬車從巴黎前往鹿特丹，渡過一條河時遇上了大風暴，他們被認

為"99%"淹死了。整個行程持續了72小時，不過這只是一種意外情況：1814年，信件從巴黎寄到法蘭克福通常只需48小時；但是倫敦發出的信件需要一週才能到達法蘭克福；1817年，信件從巴黎到柏林要花費9天時間。由於兄弟幾個似乎都有"寫信強迫症"--即便等候見大臣們時，他們也會在前廳草草地寫一些信--所以他們一直想方設法加快郵遞速度。我們已經看到，從1815年或更早的時候開始，內森便依靠他在多佛和加來的代理人，通過向負責郵件遞送的船長支付額外費用的辦法，加快他的信件傳遞速度。他有時似乎還採用多個路線寄信件復件的辦法來避免延誤造成的風險。1814年，阿姆謝爾提出了一個在法蘭克福克服延誤問題的聰明辦法：如果匯率上升，他的弟弟們用藍色信封（給他寄信）；如果跌了，則用紅色信封，"屆時，在郵局裡的邁耶就能立刻讓我知道收到的是紅色信件還是藍色信件，這能節省半天時間。"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3）

但這並不能解決一個難題，即兄弟幾個通過德國各個郵局寄出的信件都控制在奧地利祕密警察的手裡，信件會被一一開啟，如果發現似乎含有政治敏感資訊或有用資訊，信件內容將被複制。同樣的保密性缺失也讓幾兄弟放棄了對外交"信袋"的使用，當時這種信袋由特定的信使從一個首都遞送到另一個首都。因此，羅斯柴爾德兄弟別無選擇，只能僱傭私人信使，他們最晚在1814年便開始了這樣的做法。問題是信使的開銷十分龐大，兄弟幾個也經常因為值不值得使用信使的問題發生爭執：如果信使使用過於頻繁，運營成本便會上漲；如果不使用他們，重要的訊息又會延誤。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信使抵達也相當於警告競爭對手可能有重大訊息出現，於是寫給第三方的信件有時會倒籤日期，信使也化裝出行，避免引起對手的注意。到了19世紀20年代中期，成本不再是一個問題，信使的使用進入正常化：僅1825年12月這一個月，巴黎分行派遣了18個信使到加來（然後再到倫敦），3個去了薩爾布呂肯，一個去了布魯塞爾，還有一個去了那不勒斯。對信使的使用似乎讓羅斯柴爾德兄弟上了癮：1827年，薩洛蒙因為無法找到一個願意在聖誕節當天下午10點從維也納前往斯特拉斯堡的信使而勃然大怒。

不幸的是，就如通訊領域的任何一種發明一樣，沒過多久，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也開始使用同樣多的信使。此外，沒有一個信使能足夠快地達到目的地：詹姆斯1833年抱怨，一個從倫敦來的信使"竟然晚了一個小時"，這也是資本家對於更快速的通訊持久渴求的一個經典描述。從1824年起，信鴿也投入使用，儘管很明顯，羅斯柴爾德兄弟一直到19世紀40年代，只用信鴿來定期傳遞密碼："信鴿傳出去的信中，AB意指買進股票，訊息利好。CD.....則意味著丟擲股票，訊息利空。"直到19世紀30年代中期之後，鐵路、電報和蒸汽船的發展開闢了通訊的新時代--這也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利用資訊優勢"竊取"交易變得更為困難。在詹姆斯第一次提及"電報通訊"的信件裡，他向內森抱怨說："這裡的人們資訊非常靈通，因此沒有任何機會做任何事。"到1840年時，卡爾建議巴黎不要再派信使前往那不勒斯，因為蒸汽輪船和信使一樣快，而且只會讓一些"小投機者"覺察到一些東西。另外重要的一點是，1830年之後，媒體的審查變得寬鬆了很多，無需再通過私人信件來傳遞如此詳細的政治訊息：到19世紀40年代，納特例行地讓他的兄弟留意法國報紙，而10年前，他的叔叔詹姆斯則要親自寫下剛剛發生的政治訊息。

因此，實際上只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裡--大約從1815~1835年間--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信使對其他的通訊方式有真正的優勢。在那些年裡，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為那些他們希望拉攏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非常出色的服務。他們不僅能為那些人提供私人銀行服務；也能夠比正常的郵遞途徑更快地投送信件。1822年，夏多布里昂在倫敦期間，收到了德?迪拉斯公爵夫人通過她"忠誠的羅斯柴爾德"寄來的"一封重要信件"。同年在維羅納以及1825年在普雷斯堡，梅特涅使用了薩洛蒙派往維也納和倫敦的信使，而且很明顯信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信使勝過他自己的信使。這種做法也隨即風行。到1823年，"從羅斯柴爾德那裡得到訊息"是內塞爾羅德伯爵夫人的日常事務之一。1826年，有訊息說：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4）

羅斯柴爾德的辦事員充當信使，每個月在那不勒斯與巴黎之間來回一到兩次，遞送法國、英國和西班牙駐那不勒斯、羅馬和佛羅倫薩等地各位大臣的信件。除了這些日常信件外，他們還負責傳遞那不勒

斯王室與羅馬以及與駐都靈、巴黎、倫敦、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公使館之間通訊；同時也負責重要的個人信件。

1826年，法國與奧地利之間的一個小危機爆發時，正是羅斯柴爾德的信使將維萊勒的勸慰信送給了梅特涅。1840年之後，羅斯柴爾德郵遞服務最傑出甚至最有權勢的忠誠"客戶"，是年輕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和她的丈夫阿爾貝特王子。可能是後者--他的叔叔利奧波德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朋友--將羅斯柴爾德的信使服務介紹給了維多利亞。阿爾貝特登陸英國伊始，他就（通過他的心腹顧問克里斯蒂安·馮·斯托克馬和他的英國祕書喬治·艾恩森）定期利用羅斯柴爾德的信使來處理他與歐洲大陸之間的通訊。不久，維多利亞也與他一樣開始利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信使，同時還託付羅斯柴爾德家族安排小型的銀行服務甚至是預訂旅館。1841年6月，她向利奧波德保證，她"一直"通過羅斯柴爾德將"任何可能引發某種後果"的信件送到德國，因為"它非常安全而且快捷"。

所有這些意味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當時所處的地位是：能夠給歐洲上層社會提供獨家的新聞服務。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及機密資訊可能趕在官方渠道之前，從一個城市傳遞到另一個城市。內森對於滑鐵盧戰役的結果先人一步獲悉，這只是許多類似成功的第一例。早在1817年，詹姆斯接到了一個"任務"，將法國外交信件的細節從巴黎傳遞至倫敦，因此這些內容到達法國大使手上之前先到了內森那裡。英國駐巴黎大使也開始依賴內森傳遞來自倫敦的訊息。1818年，一個準備前往亞琛會議的英國外交官，被內森描述的一個宴會的"正確資訊"震驚不已，"他對我們宴會的細節以及對出席嘉賓的瞭解非常準確，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我想連外交部都不知道。"1820年2月，貝里公爵被刺殺後，也正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將這個訊息傳到了法蘭克福和維也納。與此類似，卡羅琳女王在1821年去世後，仍舊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將這個訊息傳播到了巴黎。我們也已看到，坎寧不喜歡看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總是搶在英國大使館之前公佈了相關資訊，但是他也不能無視如土耳其人在阿克曼投降的訊息。到1830年時，正如塔列朗觀察到的那樣："英國內閣總是在斯圖爾特勳爵的信件到達之前的10個或12個小時，便從羅斯柴爾德那裡獲得了相關資訊，而且這點也沒有什麼好懷疑的，因為搭乘羅斯柴爾德信使的馬車沒有其他乘客，而且隨時出

發....."維萊勒也被迫留意羅斯柴爾德的資訊，即使他（與坎寧一樣）嚴重懷疑幾兄弟是利用訊息來影響股市。

這當然是羅斯柴爾德通訊系統的大致功能，甚至是它的主要目標，通過第一時間獲得政治訊息，趕在訊息影響整個市場前，買進或丟擲證券。但是這一策略並不是總能奏效。

法國1830年7月革命的訊息，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僅傳給了倫敦的英國外交大臣阿伯丁勳爵，同時（通過法蘭克福）傳給了當時在波希米亞的梅特涅；這一事實廣為人知。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報告一開始並未得到採信。而且，我們也已看到，革命的爆發也讓羅斯柴爾德家族自身感到非常吃驚，以至於讓法國分行陷入了經濟危機，只有通過非常艱難的拯救行動才得以存活。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5）

### 銀行家的外交

羅斯柴爾德的信件揭示了在1830年7月之後的動盪歲月裡，他們通訊系統的長處與不足。在巴黎，詹姆斯的政治影響力是獨一無二的。"（國王與大臣們）經常事無鉅細地諮詢我的意見。"詹姆斯在1831年告訴內森，這一點也一直沒改變過：就如他後來告訴內塞爾羅德伯爵夫人那樣，他幾乎每天都見到國王、大臣和主要的大使。內森似乎同樣能夠接觸到政府的高階別人物，有名的有外交家弗雷德里克·拉姆，此外還有主要的駐倫敦大使，如塔列朗、艾什泰哈齊和比洛，但毫無疑問的是，他的影響力要比保守黨當政時期要小。在維也納，薩洛蒙繼續享有與梅特涅直接接觸的特權；而且，只要其他兄弟的信裡含有重要的外交資訊，他就會將信件的內容抄送給梅特涅。形成對比的是，法蘭克福與那不勒斯分行某種程度上游離在權力圈之外。在其他主要首都--聖彼得堡、柏林、布魯塞爾和海牙的影響力歸結到代理人（比如，加塞爾在俄羅斯，裡希滕貝格在比利時）的活動能力或通過偶爾的個人訪問。

1830年，通過羅斯柴爾德通訊進行討論的第一個外交問題就是大國是真正承認路易·菲利普作為法國國王，還是採取干預行動，反對新政權。7月31日，詹姆斯寫信給內森說："我希望你的政府不要考慮干

預活動，因為他們一旦這樣做了，我們就將引發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列昂內爾兩週後總結了圍繞承認問題進行的爭辯：

只有一件事是非常迫切的，那就是國王應該立刻得到承認，如果這一點不能很快實現，我們就很難預測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只有國王得到承認，相鄰的省份才願意加入到這個政府.....法國只希望得到和平，不想從別的國家得到任何東西，也深知只有培育自己的資源才能成為最偉大的國家之一。目前，法國國民近衛軍有150萬人，全部武裝等待作戰，除此之外還有一整支部隊，其他考慮攻擊法國的國家能得到什麼好處呢？詹姆斯叔叔今天見了國王，他和眾人一起向國王表達了敬意；國王向他承諾一定會維持和平，國王也希望盡最大可能推進局勢順利發展。

路易·菲利普在那次會面透露給詹姆斯的資訊--"我最急切的期望便是歐洲的和平，我希望各國將恢復之前與法國的良好關係"--很自然地通過奧地利大使奧波尼傳給了梅特涅。

但是，正如列昂內爾所預期的那樣，路易·菲利普被承認，並不能阻止革命在其他地方爆發。8月25日，從"暴風驟雨式的革命"在布魯塞爾爆發的訊息抵達巴黎的那刻起，一個新的可能性浮現了：法國外圍不斷擴散的革命有可能讓法國與一個或更多的保守國家，如普魯士、俄羅斯、奧地利甚至英國爆發戰爭。相比起直接干預法國，這次的預期似乎頗受歡迎，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其他國家在比利時不僅有條約規定的義務（這要回溯到1814~1815年），同時也有自己的戰略利益。第二，從外部干預比利時或爆發的其他任何地方，可能會導致法國政權"左傾"，因為共和主義和國際主義之間存在著歷史性的聯絡。梅特涅也並不是唯一記得法國當年"陰謀"的人：18世紀90年代，法國利用國內的"無政府狀態"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擴張。

詹姆斯獲悉比利時爆發革命的第一反應就是舉行了一次會議，將法國外交大臣莫萊和普魯士大使拉到一起，希望兩國避免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他同時還敦促內森反對任何英國支援的、以荷蘭國王名義進行的干預行動，他（與漢娜以及列昂內爾一起）得出結論認為，比利時宣佈獨立實際上是（可能主要也是）自衛性的。與此同時，由於擔心革命的浪潮會擴散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就像在19世紀20年代一樣），詹姆斯將路易·菲利普的一個隱晦警告傳遞給了梅特涅，即"他



會按照君主立憲制給予他的許可權，反對各國爆發的革命.....但他的地位迫使他必須對於自由派的期望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那不勒斯國王"為了國家整體利益的考慮，以及趕上思潮的發展"的需要做出"讓步"。幾天後，莫萊告訴詹姆斯，如果法國被"數量龐大的（普魯士和奧地利）軍隊包圍的話"，法國可能會被迫備戰。對於"全面戰爭"的擔憂也在許多外交官那裡得到了迴應，包括拉姆，他認為英國也可能介入。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6）

不過，塔列朗與阿伯丁會談之後，各國的擔憂消除，比利時問題最終決定由大國在倫敦的代表仲裁解決。但是，在比利時與荷蘭的仲裁尚未達成之前，又傳來訊息稱華沙爆發反對俄國統治的革命。實際上，可能正是波蘭局勢的發展在最大限度上阻止了各國對於比利時的戰爭，因為華沙革命前，沙皇一直準備從波蘭派遣軍隊支援荷蘭。俄國軍隊從1831年2月直到同年10月才鎮壓了革命，這可能是全面戰爭未能爆發的主要原因。但與此同時，革命向東擴充套件的勢頭，似乎又增加了國際衝突的可能性。遲遲未決的比利時疆域、它的中立地位以及國王的人選問題，在1831年只是延續了之前的不確定性，羅斯柴爾德家族再次在巴黎和倫敦之間擔當了信使的角色，傳遞各種建議和反對意見。就在這時，傳來了義大利爆發叛亂的訊息：不是發生在之前預期的那不勒斯，而是在摩德納和帕爾馬公國（1831年2月）以及教皇之下的公國（3月）。

1831年3月～1832年3月之間，歐洲大陸出現了一系列的"革命火花"，而一個或多個大國捲入戰爭似乎一觸即發；每次，羅斯柴爾德家族都竭盡所能地消除各國之間的緊張狀況。最先爆發的一起危機不僅讓奧地利介入教皇公國成為可能，而法國則準備支援革命者。詹姆斯和薩洛蒙大量地介入巴黎和維也納之間爆發的口水戰。最終，奧地利採取了干預行動，不僅出兵摩德納（法國默許），同時還應教皇格雷戈裡十六世的請求進入博洛尼亞，這次行動或多或少地導致了法國政府面臨的戰爭威脅--這個資訊當然也是詹姆斯傳遞出來的。這可能是最接近於全面戰爭的時刻，毫無疑問，法國與英國的債券市場跌到了最低點。此時，羅斯柴爾德介入政府間通訊的證據尤為確鑿，當時詹姆斯親自參與起草了法國提交給奧地利的一份宣告，呼籲進行國際調

停（按照比利時模式）。到4月中，詹姆斯確信"義大利的危機已經結束了"，而且英法德團結起來避免了對比利時的戰爭。

第二次危機出現在1831年8月，仍舊在比利時。圍繞選擇薩克森-科堡的利奧波德擔任比利時國王的不確定性持續了數月之後（局勢還因波蘭持續的戰爭以及奧地利反報復義大利自由派的戰爭而惡化），荷蘭入侵比利時再次使全面戰爭成為可能。但再一次，各國採取了剋制態度。無論是普魯士還是俄羅斯均不支援荷蘭的舉動，英國在經過緊張的磋商後，支援法國派遣遠征軍前往比利時的決定，但同時要求，一旦打敗荷蘭，法國就必須撤軍。截至10月，比利時引發全面戰爭的危險逐漸消除；儘管比利時11月15日提出的"24條協議"遠沒有獲得預期的突破，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一直到1832年5月才正式予以承認，而荷蘭國王則仍然拒絕簽字。

第三次戰爭威脅出現在1832年2月，由教皇公國的一起暴亂引發。奧地利軍隊再一次被要求介入，而法國也再一次尋求插上一腳。實際上，這次法國確實派軍隊佔領了安科納港口，這在詹姆斯看來是一次"嚴重的失策"舉動。但是，這次與以往的危機相比還是要輕得多（市場對其毫無反應便是例證），巴黎與維也納之間也從未出現真正嚴重的裂痕。

最後一次戰爭威脅出現在1832年秋天，當時法國再次威脅以軍事幹預的方式迫使荷蘭接受"24條協議"。即便英國同意採取聯合行動反對荷蘭，這同樣也會再次引發普魯士或俄羅斯採取報復行動。1832年5月的《倫敦協定》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它讓比利時人留在了盧森堡（除去它的要塞）和林堡（除去馬斯特裡赫特），這違背了24條協議。但它足以維繫和平，一直到1839年出臺決定性的國際解決方案。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7）

在這些危機中，羅斯柴爾德的信件充當了溝通渠道，通過它們，國王、大臣和外交官的觀點和想法得到了快速的交換。它們也讓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僅能讓彼此瞭解各自的觀點，也使得自己的觀點可以送達政治人物那裡--他們將經過適當翻譯的信件提供給這些政治人物。羅斯柴爾德兄弟的評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們對於國家和國內政治潛在衝突的警醒。這點在巴黎尤為突出，在那裡，對於戰爭的擔憂和對於

法國國內政治激進傾向的擔憂一直密不可分。"法國王朝完全贊同維持和平，"詹姆斯1830年9月29日警告說，"但如果他們受到的威脅太大，那麼國王會說，他不再像是一家之主，人們也不願被當成小孩子受到恐嚇。"詹姆斯一直擔心，如果其他國家在鎮壓比利時或其他地方的革命過於極端，更為好鬥的政客就可能在法國登上政治舞臺。困難在於，即便他和列昂內爾給予支援的那些大臣們，有時也會屈從於公眾情緒，被迫用強硬的口吻發表言論，因此，詹姆斯一再重複地強調，這些言論只是出於國內需要，其他國家不應該按照其字面意思來解讀。當塞巴斯蒂亞尼被任命為拉斐特新政府（1830年11月組建）的大臣時，詹姆斯立即見了他。實際上，他能夠傳遞給倫敦和維也納的資訊與國王幾周前發出的資訊大致相同："如果他們正在尋找一個對我們開戰的藉口，那麼我們已經做好了迎戰的準備，但我們將盡一切可能阻止這樣的情形發生。"但是，他樂觀地得出結論說："和平幾乎可以肯定能延續下去。"由於俄羅斯並沒有以支援荷蘭的名義出兵干預，法國也將告知比利時人，"他們不得考慮推翻奧蘭治家族，如果他們愚蠢行事，那麼就得不到我們的支援"。但如詹姆斯承認的那樣，困難在於法國王朝高呼"我們一心為了和平"的同時，又"徵召8000人入伍.....軍隊已經出現了狂熱的氣氛和活動，似乎已經準備在14天內開戰了。我們的報紙現在高呼戰爭，昨天整個世界都認為戰爭即將爆發"。但是，他仍然堅持認為拉斐特是"支援和平的，他只是要求軍隊捍衛和平"。談論戰爭只是"讓公眾不再想其他的事情"。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詹姆斯敦促法蘭西銀行避免拉斐特在1831年初破產。他認為，如果法國王朝發生變化，將提高戰爭的威脅。整個1月份，他一再向他的哥哥們保證法國政府對於和平的願望，儘管當時巴黎狂躁的氣氛越來越濃。

但詹姆斯很快也被迫承認，即便在法國王朝內部，圍繞比利時事件的開戰呼聲也越來越高；而且在摩德納和帕爾馬爆發革命的訊息傳到巴黎之後，這種呼聲更為高漲。詹姆斯採取了適當的應對措施。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告訴路易·菲利普：

你被推進了戰爭的境地，儘管你對比利時的任何疆土都毫無興趣.....法國採取如此高傲的姿態明智嗎？現在你希望我們繼續向前，然後對外國人宣戰嗎？殿下，你被矇蔽了。你的大臣們對公眾失去了

信心。你應該任命佩裡埃（掌權），屆時所有的人，包括富有階層都會支援他，而且這也將證明你是認真的。

他告訴他的哥哥，拉斐特完全屈從於"徹底的混亂"：

今天早上，我去了拉斐特的家裡，他對我說："如果法國不對奧地利宣戰的話，那麼3周之內，國王將不再是國王，而且將被推上斷頭臺。"我對他說，他怎麼能給國王提供如此糟糕的建議？他回答說，國王已經不再諮詢他的意見了。簡而言之，拉斐特認為局勢已經失控.....明天，我會問問國王，可能我今天就會去見他。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8）

似乎詹姆斯"與國王的談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拉斐特一週之後便遞交了辭呈。

詹姆斯對於佩裡埃的支援與他的一個想法密不可分：即佩裡埃將尋求一種和平的政策。同樣地，詹姆斯知道只有其他國家做出一些妥協，佩裡埃的位置才能坐穩。這也正是詹姆斯用以實現法國穩定的策略。在一封明顯是寫給梅特涅看的信裡，詹姆斯敦促薩洛蒙，奧地利應該"支援"佩裡埃擔任法國總理，因為他是最不可能開戰的政治家：

現在，我親愛的薩洛蒙，你必須看到，如果我的朋友佩裡埃組成政府，他就應該得到支援，因為3200萬人發動的革命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威脅。"而且，"佩裡埃告訴我，"如果人們希望為國王做些事，他們應該將比利時的一塊土地劃給法國，那將真正地穩固國王的地位，但是他並不會以武力去奪取。"現在，我告訴你，佩裡埃何時能掌權取決於其他國家是否開戰.....我告訴所有人，各國只期望和平.....我們現在還不能判斷將來會發生什麼，但是我對佩裡埃很有信心，因為如果我們進入了戰爭，他的財產和工廠也將蒙受損失；出於這樣的原因，我對和平很有信心.....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國外和平將持續的話，國內的和平就一定能夠持續。

"佩裡埃，"他向內森保證說，"是上帝帶來的意外好運，因為他將維持和平，或至少我希望他能。"詹姆斯和列昂內爾甚至相信，"如果佩裡埃當政，他的一個條件就是允許奧地利介入義大利事務，而法國對此不會有任何異議。"當佩裡埃的任命獲得通過後，詹姆斯再次發出了尋求奧地利支援的呼籲：

我們現在有了一個期望和平的政府，他們想做的只是儘自己所能來捍衛和平。但是如果其他國家希望和平能夠延續，他們就應該鞏固"和平政府"的地位，使其能夠向（公眾）表明，其他國家無意攻擊法國。現在，如果俄羅斯和奧地利能夠發表宣告，表明自己願意停留在國界線那邊，不會攻擊法國，那麼這將會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援作用，這樣的舉動也會平復人民的情緒，因為現在人們堅定地認為，一旦俄國人解決了波蘭問題，他們就會轉而攻擊法國.....我去見了國王，並向他指出，我的財富和家人全部在法國，因此我不想使他在其他國家開戰，我誤導他或哄騙他相信它們是想維持和平；再說了，這樣的圖謀誰能獲益？如果他們選擇佩裡埃，他們的信譽將會提升，一切也會改善.....現在一切依賴於外國（的舉措），你必須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如果我們未能維持和平，那麼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維持它的信用度。

5天后，他"急切地懇求"薩洛蒙繼續讓梅特涅相信"鞏固這個政府以及維持和平的重要意義，歐洲急需和平，而王子（梅特涅）獨自一人就有能力維繫和平"。"所有的一切完全依賴於戰爭或和平的問題，"列昂內爾3月31日寫道，"這個政府支援和平，但必須得到其他大國的支援，必須能夠站到公眾情緒的對立面，否則就會給反對派更多的力量，進而使我們立即進入戰爭。"

但即便佩裡埃組成了政府，也沒能減輕詹姆斯對法國激進因素的整體憂慮，尤其是奧地利不顧巴黎政府已經更替的事實，仍計劃派兵進入教皇公國的訊息公佈後，詹姆斯更是焦躁不安。發生在義大利、比利時和波蘭的事件間歇性地刺激了巴黎的自由派思潮，最終使得政府除了開戰或倒臺外別無選擇。1831年夏天，採取更為激進的政策甚至有了經濟方面的緣由，列昂內爾曾評論說："法國太多的年輕人失業、缺錢，要除去他們，戰爭是必要的；如果不開戰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國王被趕下臺。"路易·菲利普似乎採納了這個觀點，詹姆斯惴惴不安地觀察著局勢的發展，當時佩裡埃的地位似乎危在旦夕。當佩裡埃8月初提出辭職後，詹姆斯預測如果一個"極端自由派"政府取而代之的話，"戰爭將在4天內爆發"。佩裡埃在其他國家的默許下，對荷蘭採取了有限的軍事行動，最終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此後，各國與法國政府之間的默契情形屢屢出現。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9）

相同的情形在1832年1月和2月或多或少地再次上演。詹姆斯先是警告如果比利時協議的最後條款未能滿足法國要求的話，佩裡埃將會辭職。之後，作為對奧地利軍隊再次進入教皇公國的迴應，佩裡埃派軍隊佔領了安科納港口。即便在佩裡埃死後，這一模式仍被沿用。蘇爾特在1832年10月再次匆忙地派兵對抗荷蘭時，詹姆斯尋求獲得英國的支援，他警告內森說："如果這裡的政府不能支撐下去，我們就會等來一個共和政府，屆時我預料一切都將十分黑暗，但願不要出現這樣的情形。這也是為何一切都有賴於比利時問題（的解決）的原因。如果英國決定不支援法國的話，我們將變得非常虛弱，因為整個世界都反對教條派。"

在英國，國內外政策同樣存在類似的聯絡。保守黨政府可能打破作壁上觀的傳統以及介入反對法國革命的可能性，儘管遙遠但卻一直沒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當輝格黨1830年上臺後，詹姆斯立刻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警告：如果英國新政府被證明是"激進"的話，那麼"我們的政府將不得不表現得更為自由，屆時比利時問題將更難解決，英國可能會與法國達成一項協議，最後我們會發現自己得與歐洲的其他國家開戰。""現在的一切全部取決於英國，"詹姆斯1831年1月寫信給內森，當時正在尋找合適的比利時國王，"其他國家沒有英國作為盟國的話，就不可能發動戰爭.....你看，親愛的內森，你一直保持警惕是多麼重要，因為我們是否進行戰爭，取決於英國是否願意在比利時問題上作出讓步。"但是內森的保守黨朋友並沒有採信詹姆斯的話，尤其是他支援佩裡埃之後更是如此。在英國改革議案開始辯論後不久，內森寫信給詹姆斯：

赫里斯說，皮爾肯定會被邀請入閣，威靈頓將成為外交大臣，而且除非法國願意讓步，否則他認為英國軍隊將前往德國.....你最好告訴你的國王，他必須保持克制，不能與英國玩火，因為她（女王）不是一個可以戲弄的物件.....英國對法國的大臣們沒有信心，他們只想著革命。你的國王和他的大臣們只能表示他們不想開戰：他們不得改變之前的腔調。去見國王，告訴他皮爾、巴麥尊和威靈頓即將上臺。

這種"鳴槍示警"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後來從保守黨向輝格黨的轉變（緣由）。輝格黨的立場如內森在3月18日傳達的那

樣，與詹姆斯的想法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如果法國不能保持冷靜，而是對其他三個國家採取行動的話，我們將站到三個國家那邊；但是如果其他三個國家攻擊法國的話，我們將站到法國那邊。"因此，詹姆斯對於改革議案可能遭遇失敗、保守黨重奪政權的擔憂，更多的是考慮國際形勢，而不是他個人對這一議案的支援，因為"威靈頓政府會毫不猶豫地與法國開戰"。列昂內爾1831年6月觀察到，英國政治的混亂將減少比利時解決問題的希望，因為"荷蘭國王一直期望（英國）政府有所改變"。詹姆斯4個月後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你們議案的通過正被緊密地注視著，因為人們認為政府將會辭職，我們將進入戰爭。"當俄羅斯對批准比利時的24條協議猶豫不決時，列昂內爾提出一個問題："俄羅斯人能做什麼？所有事情都取決於改革議案，如果它獲得通過並且現任政府留任的話，英國和法國就足夠強大，能夠找其他國家的麻煩。"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10）

這也說明了威靈頓在1832年5月出人意料地重新掌權時，內森決定不提供支援的原因。這不僅是因為內森害怕如果反對改革的政府掌權，將引發國內"暴亂"；還因為"外交大臣們"--他是指塔列朗、魏森布格爾和比洛--都"處於非常焦慮的狀態，防止荷蘭國王從新政府獲得支援，從而可能導致戰爭"。這種分析在6個月後得到了響應，當時輝格黨競選獲勝的訊息受到了詹姆斯、列昂內爾和安東尼的熱烈歡迎，他們認為它是"歐洲和平以及法國政府穩定的最好保證"。在比利時，危機即將平息，俄羅斯干預的可能性最後一次浮現時，內森在一封寫給詹姆斯的信裡道出了他政治立場改變的幅度和本質：

你必須寫信給我們的薩洛蒙，告訴梅特涅不要被俄羅斯扯進戰爭中，因為波佐（俄羅斯駐巴黎大使）和國王站在一起，不怎麼受人歡迎，他和列文（俄羅斯駐倫敦大使）正遊說奧地利和普魯士宣戰。但是，我已經通過可靠途徑（可能是比洛）獲悉，普魯士不會參戰，他們正在犯一個大錯誤，因為英國和法國聯手，能夠做很多事。只要我們保持和平，就不會有戰爭.....寫信告訴薩洛蒙，諾伊曼（奧地利大使）一直與波佐交往密切，而且認為我們的政府將變得虛弱。這個人十之####判斷錯誤，現在波佐已經不受歡迎。國王邀請他前往布賴頓，他坐在離國王6個座位以外的地方。國王問他將在這裡待多久，他回答

說，"6個星期"。現在我們知道俄羅斯想發動戰爭，梅特涅正被這些人欺騙著。波佐和那些人變得十分荒唐，他們並不瞭解英國，因此要讓薩洛蒙告訴梅特涅王子，不要讓自己被俄羅斯矇蔽。波佐來這裡只是為了刺探情報，我確信英國現在比威靈頓時期更加強大。現在，我親愛的弟弟，不要讓你自己被任何人矇蔽。如果英國和法國緊密地站在一起，那麼誰也無法撼動他們。把這一點寫信告訴薩洛蒙。

在維也納，儘管沒有革命威脅，但也存在著國內###，而且這種鬥爭帶有重要的國際含義：因為它是國外干預行動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鬥爭。當薩洛蒙1830年10月初回到維也納時，他是帶著命令"讓梅特涅王子知道現在維持和平是何等的重要，"因為"戰爭或和平完全依賴於他一個人"。這有點誇張，因為當時奧地利對於比利時問題的影響力有限；相反，如果維也納領頭的話，俄羅斯（可能還有普魯士）或許更富侵略性--這也是1830年8月達成的卡爾斯巴德協定的寓意所在，這一協定重申了神聖同盟反對革命的立場。在義大利問題上，梅特涅的態度則毫不含糊。他在1830年11月告訴薩洛蒙，他準備"派遣軍隊.....讓這個國家保持平靜"，我們看到，他也確實向摩德納和博洛尼亞派了軍隊。直到1831年4月，薩洛蒙除了將奧地利的計劃傳達給巴黎外，其他什麼都做不了（不過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為他的信到達詹姆斯手裡時，總要比奧地利駐巴黎大使奧波尼的官方檔案早到3天）。但是，當沙皇在波蘭問題上尋求幫助時，薩洛蒙就能夠發揮他的影響力了，他預先通報了梅特涅的競爭對手科洛弗拉特伯爵，後者"毫不遲疑地"介入，反對向沙皇提供這類支援。到7月時，他能夠自信地向他的兄弟們保證："我們內部對立嚴重，奧地利不可能參戰，也不希望看到戰爭爆發，正在盡一切可能避免戰事的到來.....我確信即便英國和法國對俄羅斯宣戰，對奧地利也沒有影響，我們將保持.....中立。"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11）

即便不在維也納，薩洛蒙也繼續對梅特涅施壓，使其避免陷入戰爭。1832年3月，他從巴黎給梅特涅寫了一封冗長而且飽含感情的信，敦促他不要對佩裡埃派兵佔領安科納的舉動反應過激。11月，當法國軍隊突然出現在安特衛普時，庫貝克抱怨說："梅特涅王子很像一個鐘



擺，在塔提切夫（俄羅斯駐維也納大使）的戰爭與薩洛蒙的和平之間擺來擺去。"

### 金融槓桿

如果不是憑藉他們的金融實力，我們很難評估羅斯柴爾德兄弟對於和平的持續遊說能夠獲得多大的成功。如上文所述，羅斯柴爾德家族有兩根"槓桿"可以使用：他們不僅從自己扮演的非正式外交溝通渠道的角色中施加影響力，同時還藉助了實實在在的財政壓力--如果一個政權準備開戰，向他們尋求貸款，他們就能予以拒絕；相反，他們能夠向一個有和平傾向的政權提供財政支援。這裡有必要再次強調羅斯柴爾德影響力的有限性，不僅在那些在1830～1833年間沒有大規模提升軍費開支的國家（英國和普魯士），就是在那些確實提升了軍費從而有貸款需求的國家（法國、俄羅斯和奧地利），他們的影響力也同樣有限。

羅斯柴爾德的金融槓桿在那些沒有合夥人的首都，其作用最為有限。在柏林，羅斯柴爾德兄弟被1830年爆發的革命撞個正著，當時他們正在進行一次債券轉換行動，目的是將他們此前借給普魯士的英鎊貸款對應的債券利率從5%轉換為4%。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樁被看好的交易。薩洛蒙、安塞爾姆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朋友"克里斯蒂安·羅特爾進行多番討價還價之後，終於在1830年2月達成協議，羅斯柴爾德家族將以98點的價格發行一批新的4%利率的債券，其收益用於贖回此前的5%利率債券。新發行的債券總額為380萬英鎊。此外，圍繞1822年發行的一批債券，類似的轉換行動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截至法國革命2月爆發時，仍有一半的4%利率債券沒有賣出去。隨著歐洲金融市場的暴跌，除了急劇打折外，再沒有其他的辦法來處理這些債券：2月，新債券的交易價為79.5點；新的拋售無疑進一步挫低了價格。但羅斯柴爾德兄弟仍需按照合約的規定，以98點的承銷價格向普魯士支付現金。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承受履行合約必然產生的損失（據羅特爾估計超過了36.7萬英鎊）嗎？可能，但由於此前在法國4%利率的債券上損失太多的錢，所以不難看出他們為何如此決斷地想從這次鉅虧交易裡抽身。

安塞爾姆自然地派回了柏林，進行一輪冗長而又格外艱難的談判，普魯士多名官員和大臣使出的計謀讓談判難上加難，這些官員和

大臣因反對取消轉換協議而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最終，卡爾也被派去柏林協助安塞爾姆，雙方才能夠達成妥協。實際上，支付了大約14萬英鎊的罰金後（實際支付時，經過各種扣除只付了5萬英鎊），羅斯柴爾德被允許延期轉換債券，直到歐洲金融市場恢復穩定。

從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次成功的行動，避免了遭受更多的損失，但是普魯士官方為什麼同意妥協？羅特爾對普魯士國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的進言是基於個人利益的。"如果內森·邁耶·馮·羅斯柴爾德的公司被迫嚴格執行合約規定，"他指出，"不顧當下不利的情況，那麼他們就可能在所有的市場裡以任何價格拋售全部的4%利率債券，進而給我們的公共信譽帶來嚴重打擊。我們以往的經歷告訴我們，馮·羅斯柴爾德公司涉及的金融交易中，如果它扮演的不是中間人，而是反對者的角色，那麼這些交易肯定會失敗....."換句話說，羅斯柴爾德的弱點同樣會給普魯士政府帶來負面衝擊，儘管迫使它履行合約，普魯士能夠在短期內獲益：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12）

最近的1830年1月的法國貸款以及轉換普魯士簽約於1818年的債券（後者聯合了多家其他銀行業公司），使得他們遭受了大量損失，羅斯柴爾德銀行在這類交易中已經完全喪失了信譽.....儘管他們的財富仍然十分可觀，但仍缺乏這類交易所需的現金，因為他們的財富大多由歐洲各國的債券組成，目前不能在任何一個交易所兌現。羅斯柴爾德銀行因此拒絕為了賺取佣金而直接接手任何大額的貸款業務，而且他們在賬目上的墊款還將增加，他們接下來就會尋求以極低的價格拋售新近發行的債券，這將損害相關的國家。

但這番話如果不是因為普魯士自身也需要新的基金來應付備戰所需的各項開支，也不會有任何作用。用詹姆斯的話說，普魯士儘管"在所有大國之中，最不希望開戰，最希望避免戰爭爆發"，但它仍然不能忽視1831～1832年間發生的重大戰爭威脅。羅特爾寫給國王的信顯示，他可能接受了阿姆謝爾的勸阻，取消了發行新債券的計劃。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了大量的短期現金墊付款，總額達到了500萬泰勒元，以國庫券作為抵押；他們還向一筆彩票貸款提供了支援。正是這些資金的提供，在延緩債券轉換的談判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雙方決定在1833年恢復債券轉換，而到這時，普魯士的4%債券價格已經恢復到

了92點，而且"目前的政治形勢不再是引起嚴重關注的因素"。換句話說，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柏林仍擁有一些財政支配能力；但是它只能確保在債券轉換問題上獲得普魯士方面的妥協。這個時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們試圖採取任何舉措影響普魯士的外交政策：羅斯柴爾德家族從弗雷德里克·威廉那裡得到的只是一些瓷器以及（納特的）私人商務政務員的頭銜。

如果說他們在柏林的力量有限的話，羅斯柴爾德家族在聖彼得堡的影響力幾乎是不存在的。確實，俄羅斯在對付波蘭人時比任何大國都需要金錢。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與俄羅斯財政大臣坎克林的關係一直不好，因此即便是俄羅斯人1831年初直接聯絡了他們的代理人加塞爾尋求一筆貸款時，詹姆斯仍然十分謹慎。"（俄羅斯財政）大臣一定非常缺錢，"他說，"這意味著他將不能履行（償還）義務，如果他不能支付利息的話，那我們屆時就很難辦了。"他認為任何貸款只以收取佣金的方式提供，而且以分期的方式一小筆一小筆地發放，他反對內森立刻提供40萬英鎊貸款的決定。"為了防止戰爭爆發，"他警告說，"無論是法國、俄羅斯還是普魯士都難以履行支付利息的義務，他們將利用一切圍繞戰爭的藉口來為自己無法支付利息開脫。"另一方面，如安塞爾姆認為的那樣，如果戰爭的危險消除--尤其是俄羅斯贏得了對波蘭的決定性勝利後--這些政府將不再需要他們的服務。只要危機持續，繼續用錢的政府會"接受任何條件"。實際上，詹姆斯真正的擔憂是政治上的：他並不反對提供俄羅斯政府多達500萬英鎊的貸款，只要這一事實不被巴黎方面知曉即可，因為法國極為同情波蘭。"可以預料的是，"他指出，

我們將遭到報紙的嚴厲批評，除此之外，在此基礎上提供貸款，我沒有任何異議.....如果波蘭人能夠獲得勝利的話，就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緩解許多事情的緊張程度，因為我們必須盡一切所能與自由派合作。有沒有可能聲稱（俄羅斯財政）大臣與加塞爾安排貸款並以加塞爾的名義提供？我建議我們應當非常謹慎地考慮，防止我們介入這件事的訊息為公眾所知。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13）

他一週後重申了自己的疑慮："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如果我們支援俄羅斯打擊波蘭的訊息傳出去，我不能確定自己會不會被亂棒打死，

因為這裡的公眾極為同情波蘭。"但是，他很顯然準備冒觸犯眾怒的風險提供貸款，只要相關條件足夠吸引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討論發生于波蘭在奧斯托卡徹底戰敗前。實際上，內森在這場戰役後的幾天中，成功地向俄羅斯政府兜售了一些槍支。詹姆斯對於收穫的利潤感到"異常開心"；再一次，他唯一擔憂的就是被公眾知悉已發生的交易：

以上帝的名義，我請求你不要提供你的名字，除非迫不得已，如果以"羅斯柴爾德"的名字登記賣了槍支，那麼請將這一資訊嚴格保密，否則我就可能被槍殺，因為人們會說是我賣出的槍屠殺了波蘭人。昨天，我的一個朋友來看我，他是一家報紙的記者，他給我看了一則報道，說我們正向盧森堡提供資金以幫助他們鎮壓比利時人。他並沒有寫這樣的文章，因為他相信我。親愛的內森，由於公眾的思想已經轉向自由主義，我們必須更加小心謹慎。這就是你為何要盡一切可能防止賣槍的資訊走漏給報紙的原因。

1832年年末，一筆100萬英鎊的貸款請求再次浮現。詹姆斯再一次感到憂心不已，他認為英國媒體"將把我們撕碎，會聲稱我們正向沙皇提供貸款，使得他能夠發動戰爭"。但他再一次準備冒險。畢竟，"似乎沒人能夠用100萬英鎊來征服世界。"而且為了確保安全，列昂內爾認為"為了防止戰爭爆發.....必須有條款規定.....戰爭爆發後我們不一定要繼續付款"（這一條款也用在這一時期以及之後的羅斯柴爾德貸款中，我們在之後的章節裡將看到）。但是，如詹姆斯預料的那樣，坎克林再次"欺騙"了內森，他只是把羅斯柴爾德的貸款意向當做了一個籌碼，來迫使俄羅斯政府的傳統銀行家霍普提供更好的條件。羅斯柴爾德家族競爭這筆貸款的傳聞讓那些法國流亡者--查理十世的支持者，他們為俄羅斯領頭的反對革命的行動提供銀行服務--感到吃驚不已，他們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革命的影響下，已經衰弱到令人吃驚的地步"，目前"在倫敦（內森）和塔列朗的領導下為革命運動"提供服務。畢竟，這是俄羅斯可能進行干預，從而讓荷蘭避免接受24條協議的最後機會。內森和詹姆斯可能本能地意識到，如果他們取代霍普處理這筆貸款，他們就能夠向俄羅斯施加壓力，迫使它不要採取干預行動。相反地，內森在成功取代霍普之後發出的俄羅斯將開戰的警告是

一個幌子。因為這讓人很容易得出結論，認為他準備對俄羅斯的軍事幹預行動視而不見，只要能夠贏回他在聖彼得堡的影響力就行。

詹姆斯則認為他哥哥獲得俄羅斯的業務過於艱難。"在我看來，俄羅斯可能會走向衰敗，沒有他們，我們能夠更高興地做生意，"1834年，他在另一筆貸款發放時寫道："在任何情況下，你都不應該親自寫信給彼得堡，因為你被拒絕過太多次了。不要給他們另一個讓你難堪的機會。""你認為我們會與俄羅斯達成友好的條件嗎？"他兩年後又問。他顯然認為不可能。這也再好不過地說明了羅斯柴爾德金融實力的侷限性。

即便是合夥人居住的地方，同樣有困難存在。在倫敦，保守黨權勢衰落--從天主教徒解放運動開始，1834~1835年的皮爾政府倒臺宣告其徹底失勢--毫無疑問削弱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於金融政策的影響力。1830年12月內森試圖討好格雷的財政大臣奧爾索普時，後者對他幾乎不屑一顧。"冗長的談話結果，"奧爾索普提及，"就是我滿意地看到，他一定認為我是這個世界上有史以來最蠢的一個傻瓜，否則他絕不會認為他能夠如此輕率地騙我按他的意願行事。"而且，不管內森對於格雷政府寄予了多大的同情，他從未得到過太多的政府內部資訊：實際上，格雷在1834年的辭職讓他大吃一驚。但是，內森政治影響力的下降與輝格黨"將他拒之門外"的關係不是很大，主要的原因是19世紀30年代，英國的財政政策讓他變得相當多餘。除了一個例外--1835年補償奴隸主的1500萬英鎊貸款--這個時期，英國政府再無其他大筆的借貸。政府開支逐漸下降，而收入則保持平穩，儘管間接稅繼續呈輕微下降趨勢。出於這樣的原因，內森在倫敦的影響力比詹姆斯在巴黎的影響力要小得多。儘管內森也願意充當政府間的資訊渠道，但是他很難影響資訊的內容。輝格黨政府希望避免比利時戰爭，更多是靠運氣，而不是羅斯柴爾德的精心設計。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14）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詹姆斯在巴黎很明顯地成功利用金融槓桿打壓了法國的激進政策，儘管他的實力不應該被誇大。革命讓巴黎分行處在了一個極度脆弱的狀態，揹負著大量不斷貶值的3%和5%利率的公債，以及為發行4%利率的波利尼亞克貸款而欠法國財政部的1000萬法郎。另一方面，新成立的法國政府被迫立刻開始借貸，發行大量的

國庫券。詹姆斯的第一反應帶有他的鮮明特性：早在1830年他就告訴內森，"這裡將有大買賣要做"，而且他打算參與其中。儘管他猛烈批評了拉菲特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在討論資助政府財政方面一點也不遲疑。他的原因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在1831年向他的哥哥們解釋說："我認為，與現任政府做生意，將推高公債的價格。"而且，"商人們全都同意提供貸款，我應該加入他們的行列中，因為我不想被排除在外"。

問題在於，其中的一些錢顯然是用於軍事用途的（這也被"軍隊收受我賄賂的一個上校"證實）。實際上，詹姆斯和內森在這一時期，向法國政府兜售了大約28萬支英國槍械和其他一些軍事裝備--一種值得注意的"對衝"舉動，這主要是他們口頭上一直宣揚和平主義。也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保證稱法國的軍備完全是用於防禦目的，更多的是因為戰爭的高昂費用難以承擔。詹姆斯對這樣一個想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即"戰爭的爆發對於（法國政府）非常危險"，他還說，"我可以向你保證，他們一筆又一筆地借貸，用新借來的錢償還之前的利息"。當塞巴斯蒂亞尼在1831年2月提到法國拒絕"聽人使喚"時，詹姆斯表示懷疑："他們基本上沒有任何資金儲備。他們拿什麼發動戰爭？因此，我認為我們不會爆發戰爭，不管別人怎麼說。"

這也解釋了為何詹姆斯會支援佩裡埃的原因，因為後者似乎認識到了財政對於法國政策的束縛：

佩裡埃告訴我：".....如果我們選擇戰爭，我們將難以承擔我們的債務，因此我不希望加入政府的第二天，財政部就陷入破產狀態....."簡而言之，除非得到維持和平的保證，否則他不會組建政府.....如果佩裡埃不加入政府，那麼我擔心面臨破產的財政部將被迫發行5%的債券。

這也解釋了詹姆斯給佩裡埃提供財政和道義支援的原因所在，它不僅僅是因為和平以及合適資助的貸款能夠帶來公債價格的上漲：

我將與佩裡埃溝通一下，可能接受委託發行一筆貸款。財政部需要資金.....我們必須提供資金協助政府，並確保銀行家參與其中，給這些人提供資金符合我的利益，因此.....我能夠從這些事中抽身.....我認為佩裡埃將推高你的股市.....我想告訴你，我們或許能夠與佩裡埃做生意。

但事實是，詹姆斯無力阻止通過發行債券籌得資金用於戰爭中。他只是缺少討價還價的籌碼來堅持內森建議的條款，"為防止戰爭爆發，這些協商好的款項支付.....不能是強制性的"。他能夠做的只是希望佩裡埃"（對奧地利入侵博洛尼亞）不要擺出過於好戰的姿態，因為我們必須牢記人們希望獲得貸款。"確實有一些證據顯示，這種財政上的考慮使得法國政府在教皇公國問題上避免了與奧地利開戰。市場對於貸款將穩定財政狀況的期望抵擋住了戰爭危險帶來的悲觀情緒。實際上，法國財政大臣路易利用4月市場的一次輕微上揚提出了對自己更為有利的貸款條件，這也被詹姆斯認為是政府期望和平的一個跡象。而潛在敵對國的大使，比如韋特（普魯士）和波佐（俄羅斯）個人也對參與貸款業務感興趣，也向列昂內爾暗示，和平將被維繫。但是，詹姆斯在1831年春天體會到的一種感覺十分重要。"我現在什麼都不是，"他向內森坦白說，"今非昔比，以前，這樣的貸款完全由我們自己包攬。"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15）

實際上，1831年的貸款數額並不足以解決法國政府的財政問題，詹姆斯從一開始便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此外，財政部同時進行的公眾訂購"國家貸款"的計劃以失敗收場：8000萬法郎的"國貨"只賣出去2500萬法郎，剩餘的最後只得賣給銀行財團。如果當政的是一個比佩裡埃更為激進的政府，那麼它肯定會效仿18世紀90年代的做法，通過印鈔票來追求一種更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但是，只要佩裡埃仍然在任，金融現實主義就一直佔據著上風。8月，隨著比利時危機逐漸緩和，詹姆斯很高興地聽到政府準備再籌集1億法郎的貸款來減少流動債務。兩個月後，他和列昂內爾再次確證，佩裡埃說他"將實現維萊勒沒能做到的事，他將發行5%利率的債券，然後再減少它們"，這是一個削減開支的明確訊號。此外，維持償債基金的決定也讓詹姆斯和列昂內爾感到十分高興。1832年，他們再次在法國金融市場上發力。5月，羅斯柴爾德為首的財團競得了4000萬法郎的巴黎市的貸款。這為獲得另一筆1.5億法郎的政府貸款鋪平了道路，同樣也是由財團共同運作。重要的是，詹姆斯堅持等到荷蘭放棄對於比利時的宗主權，然後再提供貸款。到這個時候，認為法國可以無須英國同意就能採取單邊軍事行動的想法並不被認同。詹姆斯在1833年初被要求考慮提供另一

筆貸款時，外界對於法國的侵略性擔憂已經消退，這一點可以從公債的價格走勢上看出來，2月，3%利率的公債價格短暫地達到了80點。實際上，法國政府選擇削減了軍隊規模，繼而控制國防預算，而且，很快就開始討論實行另一次債券轉換計劃，降低現存的債務成本。類似的事4年後仍在討論。

簡而言之，法國政府在財政上受限，但這種限制並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獨自施加給它的，而是由巴黎所有的大銀行聯手施加的。最重要的一點是，19世紀30年代，不存在羅斯柴爾德壟斷法國公共財政的現象了，因為這個時期的貸款都是由銀行團體公共運作的；與此同時，國庫券的售賣業務參與者更為眾多。詹姆斯拜訪佩裡埃和其他大臣，更多的是為了獲得敏感的財政訊息，而非發揮自己的金融槓桿作用。他在1832年1月談道："與薩洛蒙一起去拜訪佩裡埃，打探他是否有什麼訊息，進而根據他提供給我的資訊來決定我將來的行動，因為我們目前持有大量的公債，因此行事必須萬分謹慎。"

因此，或許可以這樣認為，如果普魯士、俄羅斯和法國在19世紀30年代決心在比利時或波蘭問題上開戰，那麼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本無力阻止。不過，這也低估了這一時期梅特涅的奧地利在中歐以及東歐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如果沒有奧地利的參與，實際上更是領頭，反對革命傳播的保守遠征是難以想象的。這點讓我們關注到薩洛蒙在維也納所扮演的角色，他有時被描繪成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人物，避免了1830年7月之後爆發戰爭。

早在1830年11月，薩洛蒙便暗示根茨，羅斯柴爾德兄弟遭受重大損失之後，已經無力資助發動一場戰爭。類似的是，當梅特涅派奧地利軍隊進軍博洛尼亞時，詹姆斯對佩裡埃進行干預，他提出了一個明確的財政疑問，在戰爭前夕，他問："奧地利如何能夠支付它的（債務）利息？最好不要拿自己的全部身家（去賭一場戰爭）。"與詹姆斯一樣，薩洛蒙在維也納也沒有佔據壟斷的地位。1830年春天，當奧地利政府發行3000萬古爾登的4%利率公債時，薩洛蒙只是承銷的4家銀行之一，而且他也未能從貝特曼手裡奪得5%利率債券的轉換業務。革命之後，他與他的兄弟一樣，無力去想政府貸款被他的競爭對手攫取這樣的事情。梅特涅1831年3月要求發行3600萬古爾登的5%公債，以資助在義大利的干預行動時，薩洛蒙和其他3家維也納的銀行共同接下



了這筆生意。此外，合約條款裡有這樣一條規定：如果爆發戰爭，貸款需要在3個月之內償還。但是，薩洛蒙對於梅特涅祕密的借貸沒有采取任何反對舉措，當時梅特涅從法蘭克福分行借了2000萬法郎，這些錢自1815年巴黎協定簽訂時便以日耳曼聯邦的名義存在法蘭克福分行。此外，他在1832年初，威脅梅特涅，如果他不批准比利時的24條協議，他將撤回財政支援，但此舉似乎沒有收到什麼效果：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16）

殿下應該知道我們承接了上筆5000萬法郎貸款的四分之一，而且還在交易所買進了證券以支撐公債的價格，而且我們也正在進行其他的重要金融活動，也在談判新的交易。而這些都會受到政治事件最直接的影響，我希望一身輕鬆地去看我的兄弟，我謙卑地懇求您，殿下，讓我的經理.....知道你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奧地利政府是否將承認比利時並批准宣告。

梅特涅急忙向他保證"由於他非常清楚俄國沙皇的基本態度和意願，他可以保證沙皇的態度與奧地利國王一樣傾向和平"。但是這只是在打太極；奧地利又過了3個月才批准了協議。

薩洛蒙明確利用金融槓桿的舉動出現在1832年6月，當時他在巴黎。他在一封特意寫給梅特涅的信中，以前所未有的強硬口吻寫道："我不能裝著漠不關心.....聽說奧地利政府將在1832年再發行一批公債，但願不會如此。"

你知道，我們在法蘭克福、巴黎、倫敦和維也納所持有的奧地利公債，數量總額達到了數百萬。現在，你不能腳踩兩條船；如果我們公司被迫拋售.....我們能期望得到什麼樣的價格呢？我們將被迫兌現我們的公債，不論我們是否願意這樣做。資本家以及商業世界對於一年內發行兩批公債會作何反應？而且第一批公債的款項支付直到今年12月才完成？這樣的舉動可能會導致公債價格的急劇下跌。政府就不可能以較低的利率來得到另一筆貸款，這樣的打擊繼而會傷害奧地利的財政，而政府也將難以實現既定的目標.....此外，公眾又會如何評價新的貸款？"一定要打仗了，一定要打仗了，因為奧地利又籌集另一筆貸款了。"即便我們不會被迫拋售，我們目前也是這樣做的，但價格仍然會驟然下挫，奧地利的信用將嚴重受損.....這就是我對於今年籌

集另一批貸款的看法，即便只透露出一點點風聲，後果都可能不堪設想。

乍看起來，這番話似乎並不像是要施加財政壓力，從而限制梅特涅採取激進的行動。但重要的是，這封信出現在國際形勢相對平緩的時刻：奧地利已經批准了24條協議，圍繞安科納的爭議也已經解決。仔細地分析，它更像是一個金融建議，以避免奧地利公債價格下跌，進而損害羅斯柴爾德維也納分行的收益。薩洛蒙並不反對籌集貸款：純粹出於技術原因，他堅持認為"如果確實需要錢，發行國庫券是一個更好的選擇，進而為銀行進賬1200萬銀幣.....這一過程幾乎不用政府付出任何代價，而得到的資金能夠使用6~8個月。"一年後，他和其他三家維也納銀行興高采烈地參與了另一批公債的發行，總額達4000萬弗羅林；1834年又向一筆價值為2500萬古爾登的彩票貸款提供了支援。如果這些是和平的鎖鏈，那麼他們綁得並不緊。

### 承銷和平

實際上，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於各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所使用的兩個途徑，其分量並不相等，拒絕提供貸款的情形與提供資金支援相比要少得多。最經典的例證就是他們對爆發革命的國家提出貸款請求的迴應方式。

羅斯柴爾德家族自1827年開始，便與位於比利時的興業銀行有生意往來。布魯塞爾爆發革命後的數天內，詹姆斯重新與興業銀行取得了聯絡，隨後在超過1個月的時間裡，提供了100多萬法郎幫它抵擋革命的風暴。與此同時，他和內森討論是否向荷蘭提供貸款，可能是作為勸說荷蘭國王接受比利時獨立的"胡蘿蔔"；薩洛蒙將這類貸款看做有助於"控制我們的戰爭販子"。但是內森同時也揮舞起一根大棒：當荷蘭在1831年8月侵入比利時的時候，他立刻向布魯塞爾政府出售了槍支。直到荷蘭撤兵並且似乎準備接受失去比利時的事實，他和詹姆斯才準備向荷蘭提供一筆利率為6%的貸款，"因為如果有了錢，他就不會再考慮任何類似於戰爭的行動"，當然不用說，"從荷蘭政府那裡能夠賺很多錢"。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17）

在比利時這邊，儘管詹姆斯認為"那裡有大筆錢可賺"，但兄弟幾個直到24條協定得到利奧波德簽署後才採取行動。1831年底，與比利時銀行家厄希合夥，他們提供了一批總額為275萬英鎊的貸款--是前一年提供給荷蘭的貸款數額的5倍。這或許被認為是一場"豪賭"，因為用外交途徑來解決兩方爭議被認為不切實際。有趣的是，當時一幅英國漫畫《協議--騷動的社會》顯示，各國代表齊聚唐寧街，畫面左方的內森抱怨說："你們的協議沒有任何用處；先生們，如果你們不替我爭取好處，我就不再借錢給你們。"（見圖1 1）同一時期的一幅版畫描寫內森正在猛拽一隻比利時鵝，嘴裡嘟囔著："你和你的比利時債券見鬼去吧！我拿不出一便士買它們；在我看來，它們沒有西班牙債券那麼值錢。"（見圖1 2）

安塞爾姆有一個擔憂，"我認為比利時在許多年裡都沒有能力支付紅利，這很讓人擔心"。另一方面，他又說："那裡確實有錢可賺.....我們必須裝著若無其事，然後從傻瓜身上賺取利潤。"由於債券發售給投資者時，荷蘭國王並沒有重新對比利時採取敵對行動，作為債券承銷商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賺了一些利潤；如果荷蘭再次入侵，按照"現有的一則條款，如果戰爭發生，我們無需再提供任何東西"。正如詹姆斯報告的那樣，經紀人和銀行家甚至在債券發售前"吞進（債券）就像是吃甜麥粗糧麵包一樣"，儘管債券發行時羅馬###及比利時協議推遲簽署的訊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購買需求，迫使詹姆斯不得不回購託市。

到1832年春天，由於荷蘭陷入了外交孤立狀態，羅斯柴爾德兄弟準備（在比利時）做更多的生意。外交解決方案使得布魯塞爾新政府背上了欠荷蘭的債務的名聲，這也浮現了一個明顯的可能性。"那裡有錢可賺，"詹姆斯寫信給內森說，"只要你給塔列朗一點好處，我親愛的內森，他將安排你擔任處理這些債務的代理人，就像巴林在1815年充當法國與其他大國的中間人一樣。"如果"我們將自己置於比利時和荷蘭之間，就能賺到錢"--當然前提是兩國之間不會再爆發戰爭。1832年8月，第二批190萬英鎊的貸款提上了議事日程，其中1/3的債券由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巴黎發行--儘管當時法國政府發出了警告，"我們此刻給比利時人錢簡直是瘋了，這相當於給他們提供了開戰的便利條件。"花花公子和日記作家托馬斯·雷克斯卻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

12日寫道："比利時問題已經馬上就要解決，局面就如12個月前一樣。"

委任統治毫無用處，荷蘭不會放棄一丁點兒要求。利奧波德希望屈服，但比利時人不願這樣做。他的國庫空空如也，如果不能限制比利時人再次開戰，羅斯柴爾德就不會提供貸款。但將會出現更多的投機行為，套利的行為必然盛行。歐洲所有的國家都需要錢，資金的縮減幅度超過了任何其他災難。

但是，當法國軍隊在第二年11月開進比利時，迫使荷蘭接受相關條約時，輪到詹姆斯有些遲疑了，當時比利時大臣希望他提供一筆1000萬法郎的短期貸款。"我們必須幫助這些人，"他有些焦慮地寫道，"否則，他們就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只會再次採取愚蠢的行動.....簡而言之，這些人.....沒有錢，而且.....也不會賺錢。"他滿腹牢騷地說，比利時是"一個差勁的國家"。直到形勢變得明朗--而且得到了路易·菲利普和梅特涅的雙重保證--荷蘭已處於外交孤立狀態，並且默許比利時繼續佔領盧森堡和林堡，羅斯柴爾德家族才答應了比利時的借款請求。與興業銀行的合夥當中，巴黎分行獲得了一半以上的新發行國庫券。從許多方面來說，借貸給新成立的國家是一場賭博，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無從得知外交對立能夠和平解決。但是這種"豪賭"收益頗豐，不僅僅是因為比利時被證明是歐洲工業化的發動機之一。

##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18）

但是，在波蘭則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情形。儘管羅斯柴爾德在華沙的商業聯絡與在布魯塞爾一樣，但他們對波蘭起義的勝利從沒有認真地考慮過。除了同情--"可憐的波蘭人，我憐惜他們。"夏洛特給她母親寫信說--他們沒有給起義者提供任何幫助；相反，正如我們看到的，他們希望借錢給俄羅斯，併成功地向聖彼得堡兜售了槍支。

在義大利，支援革命也不是問題。即便在政治形勢得到控制之前，羅斯柴爾德兄弟就與義大利銀行家託洛尼亞合夥，安排了一筆40萬英鎊的貸款提供給教皇。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在19世紀30年代的其他交易相比，這筆貸款更讓當時的人們感興趣，一個猶太銀行借貸給天主教廷的事實讓他們感到可笑或恐懼。比如，卡爾1832年1月聽教皇佈

教引來了如潮的評論。"現在世界終於進入上帝造世的時候所期望的秩序。"博恩譏諷道：

一個貧窮的基督徒吻了教皇的雙腳；一個富有的猶太人親了他的手。如果羅斯柴爾德以60點的價格獲得貸款，而不是65點，那麼就能夠給主教管家1萬通用金幣，那麼他就可能被允許親教皇的脖子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確實比他們的祖先猶大？伊斯卡里奧特高貴，他收了30枚小銀幣，就出賣了基督；如果他也拿來賣的話，羅斯柴爾德家族一定會把他買下來。

"與異教徒時期的羅馬一樣，基督徒的羅馬也被攻克了，甚至還要被迫高唱讚歌。"更有同情心的海涅調侃道，他腦海裡浮現的是一個胖胖的教皇特使，抵達羅斯柴爾德位於拉斐特街的辦公室裡，向"一個淺灰色頭髮的年輕人轉達羅馬的頌揚.....這個年輕人比他看起來要年老一些，冷靜堅定，他氣定神閒的表情讓人以為他的口袋裡裝著這個世界所有的錢。而實際上，他確實把全世界的錢裝到了他的口袋裡；他的名字叫詹姆斯？馮？羅斯柴爾德.....那麼，《猶太法典》進一步的要求是什麼？""猶太銀行家說：'上帝給了我對財富的忠誠以及對富有的理解，它是社會的權杖。'"阿爾弗雷德？德？維尼1837年寫道："現在，一個猶太人凌駕於教皇和基督徒之上。他為國王們提供'薪酬'，用錢購買國家。"

實際上，羅斯柴爾德家族自身對於接近教皇持有懷疑態度。起先，詹姆斯傾向於讓兩家英國銀行：威爾遜公司和賴特公司領頭，他是出於兩個原因：

第一，我們是猶太人，如果這個教皇是個邪惡的人，他將對自己說，可以拒絕付錢給猶太人以獲得一張通往天堂的門票；第二，我認為教皇的財政狀況是很糟糕的，與西班牙的情況類似，但如果他們決定不支付利息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會直接介入貸款行動。

同時，他和列昂內爾又擔心被英國銀行發現很容易就能賣掉他們的債券份額，因為"他們能夠讓他們的天主教朋友購買他們的份額"，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係網差異很大，而且不具備教皇朋友們的信心；要麼不接這筆貸款，要麼被迫投入我們自己的錢"。這也解釋了羅斯柴爾德家族提議分三期提供貸款的部分原因，而且第一批發出後，

他們保留撤回的權利。另一方面，穩定教皇國財政至少能夠提供短期的外交利益，因為（佩裡埃、波佐和奧波尼全都同意）"教皇，如果他需要錢而且得到了滿足，那麼他將能保證和平將持續下去"。此外，公眾對於貸款的需求遠遠超出了詹姆斯的預期，他連忙重新訂立了合作條件，置威爾遜公司以及賴特公司於不利境地，兩家公司發現自己相當於被趕出局。債券以70點的價格發行，很快升到79點，被認為是一次"最棒的小生意"，列昂內爾如釋重負地報告說。儘管1832年2月再次出現的###使得價格出現了輕微下挫，但到了夏季，價格衝到了83點；到1835年，只差一點點就達到了面值。

乍看起來，這其中包含了某種自相矛盾的東西，海涅也指出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於革命模稜兩可的態度：他們既給革命的國度，如比利時提供貸款；同時又給保守的教皇國提供資金。仔細分析，其基本原理是一樣：羅斯柴爾德家族向新國家提供資金，只要它們得到了5個大國的支援。正式或非正式的擔保讓貸款有了吸引力，無論它們是提供給獨立的比利時還是給膚淺變革的教皇國。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只是運用了19世紀20年代便實行的政策，當時的人們將他們錯誤地解讀為神聖同盟的銀行家。他們支援比利時也有先例，那便是提供給希臘的貸款。早在1830年2月，當時薩克森-科堡的利奧波德被當成了新王國（比利時）的國王人選，詹姆斯敦促內森：

拜訪一下你的科堡朋友，那裡有希臘的生意可做。英國已經同意，如果科堡準備好接受（王冠），那麼他們將擔保每個月向比利時提供等額貸款，就與法國以及俄羅斯一樣；他也正在與他們談判，爭取讓英國與法國、俄羅斯一起提供擔保。

這有點言之過早。直到1832年5月，幾國才簽訂一項條約，為一筆提供給新國王的貸款提供擔保，而且新國王來自巴伐利亞，而不是來自科堡（更不是路德維希·博恩所預測的荷蘭王子）。但是羅斯柴爾德仍然決定負責處理這筆貸款，並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贏得了對巴伐利亞銀行家戴希塔爾以及西班牙銀行家阿瓜多的競爭。希臘自身可能"沒有價值"，但法國、英國和俄羅斯提供擔保的6000萬法郎貸款看起來是板上釘釘的事。這種感覺也是相互的。奧波尼道出了所有外交官的心聲，他說："羅斯柴爾德先生，如果沒有你的參與，這筆各國都感興趣的鉅額貸款將無法籌集。"形成對比的是，對各國難以達成一致意見的

地方--比如葡萄牙，1830～1834年多姆?佩德羅從巴西迴歸並且成功地奪取了他兄弟多姆?米格爾的王位--羅斯柴爾德家族則敬而遠之。

在一個多極的世界裡，5個利益截然不同的大國尋求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國際危機；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確保和平方面所做的是，與他們兜售和平相比要少得多，因為他們的實力比人們認為的要有限得多。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1）

羅斯柴爾德家族是現代銀行業的奇蹟.....我們看到，經過2000年的迫害，猶太人的後代凌駕於國王之上，地位高過了帝王，他們將整個歐洲大陸攥在了自己的手裡。羅斯柴爾德家族統治了一個基督徒的世界。任何一個內閣提出議案時都少不了他們的建議。他們輕鬆地伸出手，從彼得堡到維也納，從維也納到巴黎，從巴黎到倫敦，從倫敦到華盛頓。羅斯柴爾德男爵，這個家族的領頭人，是真正的猶太人之王，是萬能之王，人們一直期待的救世主。他掌握著戰爭與和平、祝福與詛咒的鑰匙.....他們是歐洲國王以及美洲共和國首腦的經紀人和顧問。他們還想要些什麼？

——《奈爾斯每週紀事》，1835～1836年

1832年之後的歲月裡，隨著對於革命以及戰爭的擔憂漸漸消散，羅斯柴爾德家族似乎擴大了他們金融影響力的地理範圍。上面引用的美國報刊的評論只是這種擴張帶來的諸多評論中的一條。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托馬斯·雷克斯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羅斯柴爾德家族，他們從曼徹斯特的一家店鋪起步，成為歐洲的金錢帝王。通過位於巴黎、倫敦、維也納、法蘭克福、彼得堡和那不勒斯的分行，他們掌控了歐洲的匯率，此前任何人都沒有實現過這一點；現在他們似乎掌握著大量的國庫。當下，任何一個帝王如果少了他們的支援，都無法獲得貸款。」皮克勒王子用一個德語雙關詞「Glaubiger」（信奉者或債權人）做了解釋，「偉大的羅斯柴爾德可以與蘇丹媲美，因為後者是所有信眾的統治者，而前者則是所有統治者的債權人。」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對此表示贊同：羅斯柴爾德是「以色列的驕傲、大財主，是舊世界金銀幣以及金塊銀塊的主人，在他的錢箱前，國王和帝王們謙恭地低下了頭」——簡而言之，他是「萬王之王」。威廉·梅克比斯·薩克雷在早期並不怎麼出色的詩句裡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些詩1833年發表在曇花一現的《國旗報》上：

看，這是交易所的支柱！它是內森·羅斯柴爾德本人，  
他的名聲在天下所有的交易所裡迴盪；  
藉助錢財的榮耀，他成為第一個猶太人男爵，



他不是「猶太人之王」，而是「駕馭國王的猶太人」。  
 他是金錢和公債的偉大化身，  
 1/8，1/2和1/4，借據，選擇權和份額；  
 他將新國王玩弄於股掌之中，就如年輕的小姐戲弄寵物一般；  
 國王將是無可置疑的公牛和熊。

漫畫家響應甚至細化了這些評論。一幅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漫畫顯示，內森變成了「嗡嗡作響的貸款陀螺」，國王在他們面前謙恭地低著頭，他給他們分發著硬幣（見圖2 1）。

這類漫畫中，可能最有力（輕蔑）的一幅畫出自一個德國漫畫家之手，時間大概為1840年。《大水泵》把一個怪異的猶太人——很明顯是一個合成的羅斯柴爾德——描繪成了一個巨大的錢泵，作者借用了德語單詞「pumpen」的雙關含義，意指泵水或借貸（見圖2 2）。畫中人站在齊膝深的口袋裡，口袋裡裝滿了黃金；他膨脹的肚子是地球，一個路易金幣（寫著「地軸」）

代表北極或肚臍；頭上戴著紙做的王冠，上面寫著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羅斯柴爾德的主要貸款名稱（提供給普魯士、俄羅斯、那不勒斯、奧地利以及葡萄牙的貸款）。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2）

根據他外套上的口袋數量來看，他簡直是「世界所有王室的遺囑執行人」。兩隻手分別有兩個小人抓著手指，似乎正在操控水泵（儘管並不清楚他們實際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它的動作）。左邊一個代表的是土耳其，右邊其中一個是奧地利。下面全是羅斯柴爾德金錢的接受者，硬幣正源源不斷地流進他們的錢箱和帽子裡。埃及統治者穆罕默特·阿里和他的兒子易卜拉欣·帕夏在畫面左邊，正在用勺喂蘇丹；他們下面坐著一個戴眼鏡的人，跟前趴著一條大頭狗，可能是英國國庫大臣（儘管站在他身後的兩個人無法確定身份）。另一邊，毫無疑問是路易·菲利普和法國政治家阿道夫·梯也爾；他們右邊那個一眼很難看出來是誰的人，可能是西班牙將軍巴爾多梅羅·埃斯帕特羅。但儘管這些人物都是羅斯柴爾德金錢的接受者，他們都痛苦地被帶刺的藤蔓纏繞著，這些藤蔓根植於膨脹的錢袋。他們下面也有兩個小一點的

人物：站在已經關閉的海關的那個人，手裡舉著「禁止進口」的牌子，另一個從開放的海關通過的人手裡舉著「允許進口或新的收入」；士兵在萊茵河右岸集合；埃斯帕特羅下面的人則在哀求拿到他們「沒有發放的薪水」。這幅漫畫暗示，羅斯柴爾德不僅將金錢泵到全世界，而且還像一個巨大的心臟那樣把它們吸回來。

### 內森的主導地位

但是，這種壯麗的圖畫與內森·羅斯柴爾德以及他的兄弟們十分平凡的實際表現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真正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大水泵》中的人物沒有多少重合的地方。曾經有許多好奇的訪問者到過皇家交易所（倫敦股票交易所）看內森做生意，按照其中一個人的說法，他是「一個長相非常普通的人，面貌粗俗，鬆弛下垂的嘴脣以及突出的金魚眼。他的體型肥胖，顯得笨拙，穿一件翻領大衣」。我們現在有大量描繪內森這些特徵的畫像和漫畫。比較早的一幅由理查德·戴頓繪製，標題為《皇家交易所一覽》，1817年10月第一次出版（見圖2-3）。這是一個穿著黑色外套、戴著高帽男人的側影，挺著肚子，一隻手插在口袋裡，另一隻手拿著一張紙。這幅畫被證明是眾多插畫家喜歡的一幅：內森以類似的姿勢出現在喬治·克魯克香克的《皇家交易所》（1821年），以及他的《布賴頓美人》（1826年）之中。但是，每次再版時，都會有一些精細的微調。托馬斯·瓊斯在他的1829年版本的《交易所之

柱》中增加了一個細節，這幅畫將內森安排在了他最喜歡的交易所東南角的一根柱子前（見圖2-4）。

兩者編列起來有著特殊的含義：內森就如柱子一樣堅硬、固執，但同時也暗示了兩者之間的對比之處——柱子白色均勻，內森一身黑、肚子突出。

沒那麼「講究」的藝術家更進一步，誇張表現了內森突出的下脣和肚子，這種方式無疑帶有敵意。比如，法國藝術家讓-皮埃爾·當唐在1832年製作了一尊內森陶瓦小雕像，它是當時嘲笑羅斯柴爾德藝術品中最怪異的一例。內森的嘴脣突出，與帽簷一般長，並且鬆垮地垂著，就像是鱈魚的嘴；他的大肚子沉重地壓在兩條細腿之上。薩克雷在他的素描《N·M·羅斯柴爾德先生》，同時配了上文引用的詩句（見

圖2 5)，忽略了內森的肚子，但是最後一節詩文毫無疑問地顯示，作者發現內森的外形醜陋：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 (3)

啊！財神！你的魅力奇妙地給予了我們！

否則，我們肯定會認為你有失體面，

當人們的好感增加後，它會給你帶來上帝般歡樂，

混合了豬和猴子臉孔的臉上綻放出笑容。

就如他尖尖的腦袋那麼明顯，

親愛的讀者，我們詳詳細細地將他展現給了你們；

然後我們將把猶太人獨自留在他的榮耀中。

內森死後，大量他的黑色半身側面影——大多數使用「偉大人物的身影」字樣作為標題——包含了比較多的同情意味，它們其實也不是獻媚。即便羅斯柴爾德家族請人給內森畫了大量的肖像，實際上也不是試圖賦予其光輝的形象。在許多人眼裡，內森的偉大本來就存在於日常的工作與生活中。一些人看待工作中的內森時，覺得他周圍籠罩著一種英雄般的光環。這篇開頭引述的那個美國訪者宣稱：「他周圍的氣氛以及他的處事方式中，有一種統帥一切的感覺，那些接觸他的人主動表現出的恭敬，顯示出他並不是一個普通人。‘那是誰？’是自然而然的問題，‘猶太人之王’則是答案。」但是，儘管他的性情與拿破崙有諸多相似之處，但是金融界的帝王卻從沒有受到過英雄般的對待。當時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胖子在買賣一張張紙片：

人們擠在他的周圍，舉著各種匯票。他會掃一眼某張匯票，還給對方，然後肯定地點一下頭；接著轉向另一個尋求建議的人。兩個俊朗時髦的年輕人站在他身邊，做著記錄。他們的討價還價控制著當天整個歐洲大陸的匯率。

他的弟弟詹姆斯同樣易於接觸。1837年，一個巴黎的記者「要見馮·羅斯柴爾德先生本人……他是人人傳頌的人物，公債的大東方組織（歐洲最老的共濟會組織）以及歐洲安全的關鍵樞紐」。這個記者驚訝地發現，「國王」走進他的「首都」時是那麼的普通：

馮·羅斯柴爾德先生只露面一小會，從下午3時到3時25分，這就是說，收市前5或10分鐘.....他通常由一個侄子陪著來到交易所，他的出現引起的騷動不是一般的猛烈。人們急切地圍住他，尤其是那些糾纏不休的交易員，但這並沒有干擾他傾聽他們的聲音，然後用他慣常的幽默回答。他自己會向一些關係緊密的銀行家打招呼；他與別人的交談從不冗長，說話時也沒人交頭接耳；當鈴聲響起時，人們四下散去；人們走後，他也如別人一樣離去——沒有到來時的那種儀式。

薩洛蒙在維也納似乎更平易近人：「每天，從12點股市開盤到下午4點收市，他一直被交易員和投機者圍繞著，他們向他焦急地報告著市場的走勢，並急切地希望得到並執行他的交易委託。」

那些曾經進過羅斯柴爾德辦公室的人也被他出乎意料的謙虛所震驚——儘管對外面的人來說有些不可思議。1826年，皮克勒王子第一次見內森時，吃驚地發現「倫敦城的統治者.....實際上.....待在一個毫不起眼的地方.....在他賬房的小院子裡，我見了這個神聖同盟中神通廣大的人，狹小的院子裡還擺放著一輛裝著銀錠的貨車。」詳細描述內森時代紐考特內部情況的文件無一留存下來，但我們或許可以從迪斯雷利的小說《坦克雷德》中找到一些相近的描述（儘管作者可能有所修飾）。與皮克勒當年一樣，坦克雷德拜訪時，發現與羅斯柴爾德相像的西多尼亞已經與一個外國大使在小房間裡談事：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4）

坦克雷德進到斯金花園，巨大的臺階下停著一輛帶有外國王室花冠的兩輪馬車。一個又高又胖的門房接待了他，門房看到這個年輕人停下來不再往前走，於是懶洋洋地從一個帶有頂棚的椅子裡站了起來，問這個剛進來的年輕人有什麼事。

「我想見德·西多尼亞先生。」

「現在不能見，他正忙著。」

「我有一張便條要給他。」

「噢，給我吧，我會給你送進去。你可以坐在這裡。」門房開啟了一個接待室的門，但坦克雷德不願意進去。「我在這裡等就行了，謝謝你。」坦克雷德說，他環視著橡木做成的大廳，牆上掛著幾幅肖

像；一條樓梯蜿蜒而上，這種豪華的樓梯在現代的倫敦別墅中絕不會見到。

「（門房說）我現在不能打攪主人；西班牙大使正和他在一起，其他人還在等著。當大使離去時，一個祕書會把你的信以及其他信一起拿進去。」

此刻，坦克雷德仍在大廳裡逗留，進來了好幾個人，而且跟門房連招呼都沒打，直接向房間裡走去。

「那些人要去哪裡？」坦克雷德問。

門房帶著一絲不解和輕蔑的神情瞪了他一眼，然後有些自言自語地回答他說……「我想，一些人去賬房，一些人去銀行。」

這件事過後，年輕的造訪者又被晾了一會，直到一聲「駕」宣告西班牙大使終於離去：

「現在你的信將和其他信一起被送進去了。」（魁梧的門房）對坦克雷德說。

坦克雷德被帶進一間寬敞而且相當長的房間，房間全部用老橡木裝飾，散發著濃郁的奢華氣息……土耳其地毯，深紅色綢緞做成的窗簾，幾張巨大的桌子上鋪著紙，幾張休閒椅。牆邊有幾個鐵櫃子，這些就是房間裡的全部傢俱。房間的一角是一扇玻璃門，透過玻璃門可以看到用做賬房的房間，裡面擠滿了辦事員。平時門會用一塊厚羊毛毯遮著。

這段描述讓人感到懷疑的地方就是羅斯柴爾德其他分行的氛圍與此完全不同。比如，詹姆斯的辦公室通常能夠輕易地進入。梅特涅的兒子維克多19世紀20年代末拜訪詹姆斯時，他發現：

辦公室就像是一個電影放映機，各種各樣的人以及各種各樣的聲音不停地進來、出去。那天，這種來來往往尤為引人注目，因為在交易所交易的證券價格劇烈地波動。這個大銀行家本人也表現出了一絲焦慮，平時他總是保持著冷靜。我們的談話很快被一個向老闆報告股價的職員打斷。

根據當時人們極為稀少的描述，法蘭克福分行在其設計上也是「開放式的」：

他坐在辦公室裡的職員之間，就像一位君王；他下面是他的祕書們，四周能看到一群來來往往的交易員。他會跟每個人說一兩句話，他像是個商業天才，能夠立刻知道如何回答每個問題，能夠對任何放到他面前的生意做出決定……要跟他私下裡說一些生意上的事幾乎不可能；他在辦公室裡做的每件事都是公開的，就像是在法庭裡。

換句話說，羅斯柴爾德各個辦公室裡發生的事與各個交易所的情形沒有太大的差異：交易員來來去去，相互交換著各種紙張。

因此，那些期望去他們辦公室看到一些能夠彰顯他們權勢東西的人，無疑會感到失望，因為他們只要看一眼交易員的日常工作，就能知道羅斯柴爾德幾兄弟的工作情形了——不過這也是試圖探尋羅斯柴爾德成功的無形動力的一個誘惑：比如，希伯來護身符，或像巴爾扎克小說主人翁紐沁根那樣，靠精心編織的騙局發跡。當時的人們唯一能夠發現、可以用來證明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凡成功的線索，就是內森進行複雜金融計算的速度和輕鬆度，他將這歸功於他的記憶力。「即便沒有兒子協助，」另一個作家評價說，「據說他也能夠記住每一筆交易。」他的訃聞撰寫人後來在《泰晤士報》上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5）

他在計算利率方面，無論是提取還是存入，都不會有絲毫的障礙；他的記憶力如此之好，以致不管每天經手多少交易，他從來不用記筆記，回家後能夠絲毫不差地口述給辦事員。

內森死後，另一個作家寫道：「他的野心就是比別人更快、更有效地實現自己的目標，他會以自己全部的能量勇往直前。到達終點後，目標對他而言已經失去了所有的魅力，於是就會將自己永不知疲倦的頭腦轉向別的東西。」

對有些人來說，這種不知疲倦的才能甚至被認為有些詭異。一個看過內森工作的人發現：

他個性中的僵硬和緊繃會讓你好奇地覺得似乎有人正努力地要將他擠到身後去，而他也不害怕或羞於承認這一點。眼睛通常是解讀靈魂的視窗，但是在內森身上，你會得出結論：這扇窗開錯了，或透過它們你看不到任何靈魂。眼睛裡沒有絲毫的光線透射出來，即便偶爾

出現一點點閃爍，也是四下散射。給你的唯一感覺就是一張空空的皮囊，你會懷疑，裡面什麼都沒有，它是怎麼站立在那裡的？其他人一個接一個地走向它，它會向旁邊移兩步，瞬間固定的灰色眼睛裡閃出你從未見過的光芒，就好像一個人從劍鞘裡拔出一把劍一樣。進來的人，可能只是偶然經過，只停留一兩秒，但在這短暫的過程中，他臉上表情的變化（多種多樣），儘管你不能用語言形容，但你能感覺到一定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切過後，他的兩眼再次暗淡無光，他再次恢復了雕像一樣的姿勢。整個早上，大量的人來到這裡，所有人受到了同樣的接待，也以同樣的方式離開；最後，這個人自己也消失在空蕩蕩的交易所裡，留下你恍然若失地思索著。

儘管這番描述有些過頭，但它捕捉到了當時的人們評價內森時經常提到的一點：內森集冷靜與突發驚人行為於一身，兩者能在瞬間實現轉變。1821年，據說他接到有人要暗殺他的警告，當時他「帶著一絲微笑，感謝了提供情報的人。給人的感覺似乎是他沒有對任何一個人做過錯事，他不能接受有人會策劃如此殘忍的行為，因此他認為警告不值得關注」。但是，兩年後，當他發現一個陌生人佔據了自己在皇家交易所經常使用的位置後，他變得「如此激動，花了好些時間才恢復平靜，並開始交易」。《給銀行家的傳單》指出，內森「堅強並且不受拘束的意志」以及「新的地位帶給他的高傲，使得他對任何個人風險不屑一顧」。我們也提到，這種傲慢的品性經常滲透進他的信件裡。一個顯然目睹過內森發火的人回憶說：「羅斯柴爾德先生的憤怒蓋過辨別力時，他所使用的語言仍不會超越賺錢所允許的範圍……他的口述信件通篇滲透著賺錢的思想，即便他發現一張匯票出乎意料遭到拒收而讓他勃然大怒，但在信件到達收件人那裡時，其語言已經轉化成了商業詞句。」

但是，幾個兄弟之間都是親筆寫信，其他四兄弟就沒有商業夥伴那麼幸運了。我們也看到內森在寫給兄弟的信中是何等的粗暴；這一點並沒有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改觀。1828年，薩洛蒙的兒子安塞爾姆寫信給列昂內爾：「請告訴你的好父親，以後不要寫這麼暴躁的信給阿姆謝爾大伯了。我可以向你保證，它們傷害了他的健康。出於什麼原因？因為他寫信給你父親，說他希望拿一些錢，那是你們欠他的。考慮到大伯年紀已老，身體虛弱，如果你們不注意寫信的措辭，他就不

再收信了……」6年後，納特報告說，阿姆謝爾的「健康狀態讓他非常擔憂」並「非常強烈地」建議父親「在你的信裡哄他開心一些，不要斥責他，因為這對他的傷害超過你的想象」。內森與詹姆斯之間偶爾也會發生摩擦。比如，1832年，詹姆斯「非常強烈地反對」向希臘提供貸款，直到他接到紐考特寄來的信才最終同意，信裡是這樣說的：

「在任何情況下，你都不能讓這樁生意從你的手裡溜走。」當內森改變主意時，詹姆斯欣喜若狂，內森給他寄了第二封信：「有關希臘的事，不要採取任何行動。」兩人在1835年的葡萄牙貸款的問題上也有類似的碰撞。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6）

僅以內森的個性還不足以解釋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金融方面的成功，儘管他的個性相當重要。19世紀30年代兄弟間逐漸增多的爭吵並不是因為內森的主導地位。比如在1831年，列昂內爾轉達了一條資訊給他父親：「詹姆斯叔叔希望爸爸不要僅為自己的利益在倫敦做法國公債方面的生意，因為這將破壞巴黎分行與倫敦分行之間的生意，到最後其他人將乘虛而入。」兩年後，納特從法蘭克福寫信說，他的阿姆謝爾大伯「抱怨爸爸跟他做的生意太少了……我能肯定，親愛的爸爸，你會看到大伯想要什麼，他特別希望你能像以前那樣跟他做生意」。由於沒有收到紐考特方面的任何回饋，納特被迫再試一次：

他懇求爸爸你能夠儘可能多地跟他做生意，那樣會很好；他抱怨你給巴黎和維也納太多的優先權了。我必須說，他是非常優秀的人，如果可能的話，和他做一筆生意吧，讓他高興一些……但是，不理會爭執也是明智的。

除了爭執，阿姆謝爾的抱怨裡說出了一些事實。到19世紀30年代初，由於兄弟幾個相互見面的次數變少，倫敦分行與法蘭克福分行之間的金融聯絡似乎也鬆懈了不少。這也不是離心力起作用的唯一跡象。僅僅1年後，卡爾在那不勒斯向詹姆斯提出了非常類似的指責。這次，內森被迫充當兩個弟弟之間的調停人。「親愛的內森，關於我們的兄弟卡爾寫信跟你說我沒有定期給他寫信的事，」詹姆斯在一封信裡對卡爾的指責做了迴應。



為了維持良好的關係並遵照你和薩洛蒙的期望，我實際上已給他寫過5封信了，我也徹底忘記了他寫給我的那些愚蠢的信.....我當它們不存在。請讓那不勒斯將我的信轉寄給你，這樣你就會了解我確實寫信了，因為我想維持和睦的關係，不想發生任何爭吵。我做到了一個誠實的人為他的兄弟所能做的一切。他們可以抱怨我，但是我不會再給他們寫信，除非我收到他們的信，因為我仍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我對這一榮耀的堅持與我們的兄弟卡爾一樣。

當然，兄弟之間發生爭吵時都寫信給內森的事實，也表明內森的「司令」地位是何等的牢固——他是整個羅斯柴爾德大廈所依賴的支柱，就如皇家交易所的柱子一樣不可撼動。但是諸如這類的爭論也表明，維持這座大廈的穩固，其他的牆壁也是必要的。

### 羅斯柴爾德機制

如果羅斯柴爾德成功有一個「法寶」的話，那應該是他們5家分行之間的合作機制，這使得他們成為世界最大的銀行（以整體來看），同時將自己的金融影響力通過5個主要金融中心擴散到全歐洲。這種跨國機制由合夥人協議監管著，這份協議每幾年重新修改、簽訂一次，它實際上是一個金融聯邦的憲章。我們知道，最早的這類協議起草於1810年，但這並不是協議範本，因為當時邁耶·阿姆謝爾還處於掌控地位，而且當時的戰事也讓內森沒有簽約。1815年簽訂的五兄弟間3年協議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聯邦」協議。這階段最關鍵的事情是倫敦分行的龐大財富。根據協議的序言，五兄弟的「合夥財富為50萬英鎊左右」，但很顯然，大多數錢是內森的。協議尋求重新定義五兄弟的財產總額，除去一些專案（可能是房產），然後以5萬英鎊本票的形式將內森給其他四個兄弟的20萬英鎊分配到位。結果，33 6萬英鎊的份額是內森的，佔整體的27%；阿姆謝爾與薩洛蒙各自佔20%；卡爾與詹姆斯分別佔16%。此外，幾人同意所有的開支用倫敦分行的收入來支付，每年年終的時候幾方平均分配利潤。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7）

在協議有效的3年期間裡，兄弟5人的資本以指數級增長，從33 6萬英鎊升至177 2萬英鎊。如此大幅度的增長要歸功於內森在同一公

債方面的大量成功投機，儘管總體資金或多或少保持原狀，但他的兄弟們此時同意在分配利潤時偏向內森。正如卡爾所說的那樣：

內森應該獲得多於五分之一的利潤。他有一個大家庭，他需要更多的錢。無論你們怎麼安排，我都同意……你告訴我，你也認為內森應該給予一些特權。我們獲得的一切，確實都歸功於他。他拯救了我們。我們希望早一點拋售，但他阻止了我們。

此時，技術上已經有了「五個合夥人共同運作下的三家聯合商業組織」：倫敦的N&M?羅斯柴爾德公司、法蘭克福的M&A?馮?羅斯柴爾德兄弟公司以及詹姆斯在巴黎的新據點：馮?羅斯柴爾德兄弟銀行。因此，倫敦分行的一半利潤將歸內森所有，他的兄弟每人得到利潤的1/8；內森同時還會得到其他兩家分行1/4的利潤，其他兄弟每人分得3/16。1818年的協議同時還引入一個新的制度，即每個合夥人每年獲得自己資金份額的4%，用來支付各種費用（生意和家庭開支）；任何用於遺產、房產或地產上的大額費用將從個人的資金份額中扣除。此外，「為保持賬本和賬目的規整……需要作出規定，儘管三家分行組成共同利益集團，但自定匯率、經紀費、郵資和郵票價格，三家分行相互間的利率定為5%」。為了增強集體身份的感覺，協議特別要求每家分行每週向其他分行通告自己的交易情況。

儘管這份協議最初只打算使用3年，但實際上它一直延續到1825年。但是，如果認為這份協議是兄弟和諧的一個標杆，那就錯了。除了我們在前文敘述過的五兄弟在這段時期常見的爭吵外，歐洲大陸的四兄弟曾另外訂立一份協議，其內容反映了他們與內森之間嚴重的分歧。因此，1825年代協議恢復了1815年的機制：利潤將平均分配，這反映法蘭克福與巴黎分行的資金增長迅速，有望超過倫敦分行。另一方面，內森的個人份額仍然超過了聯合資金的1/4，此時的數額超過了400萬英鎊。此外，儘管薩洛蒙和卡爾或多或少地定居在維也納和那不勒斯，他們的分行並沒有獲得前三家的同等地位，繼續被當成法蘭克福的「分支機構」，1828年前沒有任何獨立的資金（這之後也只擁有相對較少的資金）。這可能阻止了上述的離心傾向。幾個合夥人此時確保「知會彼此所有的交易，不管其內容是什麼，過程和結果如何」，不過是每個月通知一次，不再是一週一次。

1825年的協議也第一次將第三代人吸納進了公司，在薩洛蒙的兒子安塞爾姆與內森女兒夏洛特結婚後，他成為了合夥人之一。羅斯柴爾德兄弟第一次增加了道德方面的內容：1825年的檔案包括了一項條款，允許安塞爾姆退出生意，如果「工作變得過於艱鉅」；並且尋求遺產問題可能出現爭執的解決辦法，即規定每個合夥人的後代無論繼承的資金份額是多少都必須接受，不能訴諸法律。協議特別宣告，如果一個合夥人的後代起訴其他尚在人世的合夥人，這個後代繼承的資金份額的1/3將被罰沒，然後分發給法蘭克福、倫敦和巴黎的窮人。

只描述他們所定的條件，很容易忽視這些協議所包含的祕密特性，保密做法也一直被流傳了下來。當兄弟幾個1828年8月在法蘭克福會面，總結相對讓人失望的3年時，內森的妻子漢娜和兒子們也一起去了那裡，但他們全部被排除在協商會議之外，8年後依然是這樣的情形。「爸爸和他的兄弟以及安塞爾姆幾乎一直忙著商量安排他們所關心的事，」漢娜說，「會議在（阿姆謝爾的）花園的塔樓裡祕密舉行。」她能夠說的就是「每件事似乎都一致通過」。這對她來說讓她放心了不少，1828年的協議顯示，儘管內森的個人資金份額維持不變，但倫敦分行的相對重要性繼續下降。它所佔總資金的比重只為27%多一點兒，而在1818年，這一數字是42%。這一份額在之後的8年裡只上升了非常小的幅度，而且還是因為1836年法蘭克福會議前的一件事發生才實現了這一改變——內森的意外去世。1828年的協議，由於倫敦主導地位相對降低，使得歐洲大陸的合夥人能夠確立利潤分配的有利方式：從那之後，內森可獲得倫敦分行60%的利潤，但只能獲得法蘭克福、那不勒斯和維也納分行10%的利潤，其餘四個兄弟每人獲得10%的倫敦分行利潤，22.5%歐洲大陸分行的利潤。這條法則——毫無疑問提高了倫敦分行的相對自主性——在內森死後也仍舊保留：他所有的權利全部轉移給了他的4個兒子。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8）

毋庸置疑，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金融上是成功的。實際上，1850年前，他們資金的增長速率以及規模在銀行業歷史上都是空前的。表2-1總結了19世紀上半世紀各個分行的總資金數額：

表2-1：羅斯柴爾德總資金（1797～1844年，單位：千英鎊）

179718071810181518181825182818361844

法蘭克福9 950 672 768 0680 01450 01534 32121 42750 0

巴黎55 0350 01249 01466 41774 22314 6

倫敦90 0742 0114201183 31793 42005 1

維也納68 025 0110 4250 0

那不勒斯55 0129 6268 3462 5

總額9 950 672 7336 01772 64082 04338 46007 777778 2

備註：1815年資本總額或許過低：關於資本總額是50萬英鎊還是33 6萬英鎊的協議並不明確。同時注意，1815年的數字是各個合夥人個人的份額，而不是分配給各個分行的份額。1807年的數字由古爾登轉為英鎊，當時1英鎊兌換10 16古爾登。1828年的數字也是由古爾登轉換而得，當時1英鎊兌換12古爾登。

資料來源：檔案檔案

羅斯柴爾德家族資源的龐大規模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就拿1825年來說，他們的資金總額是巴林兄弟資金總額的9倍，是詹姆斯在巴黎主要競爭對手拉斐特的11倍。他們的資金總額甚至超過了法蘭西銀行（此時大約為300萬英鎊）。記錄1830年以前的各個分行資金數額的資料殘缺不全。比如倫敦分行，1809年的總賬儲存了下來，但1828年之前的損益賬目全部沒有留存下來。圖2 6給出了截至1850年的「結果」資料：每年年初的上年度利潤佔資金總額的比例。這些數字中表明瞭幾點：第一，他們的業績存在巨大的波動，有非常成功的年份（1834年），當時的利潤接近資金總額的1/4；也有遭受嚴重挫折的年份（1847年），公司接近1/3的資金虧損了。平均下來，利潤實際上並不可觀，儘管這部分反映了計算淨利潤前扣除了各種開支的事實。利潤（或虧損）的數額只是簡單地加到前一年的資金總額裡（或從中扣除）；這一機制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最大的競爭對手巴林所採用的機制截然不同，巴林傾向於計算毛利潤，並且將毛利潤分配給各個合夥人。羅斯柴爾德家族與他們競爭對手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他們將利潤重新投入了生意中，因此他們的資金總體上出現的是增加趨勢，而巴林兄弟或多或少地保持資金穩定，尋求能夠保證自己生存的最大化利

潤。1829～1846年，N?M?羅斯柴爾德公司的資金總額增加了90%，而巴林兄弟只增長了50%。

圖2 6羅斯柴爾德父子公司年度利潤佔資金的百分比（1830～1849）

來源：附錄2，表格b。

其他幾家分行裡，分類賬目得以儲存下來的是相對較小的那不勒斯分行。考慮到它的規模，那不勒斯分行的利潤有些不可思議，尤其在它創立的頭10年裡。1825～1829年，它的平均年利潤超過了3萬英鎊，當時它的資金總額還不到13萬英鎊；整個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它的年平均利潤為2萬英鎊。與倫敦和巴黎分行不同的是，它似乎從沒有出現過虧損的情況，即便遭遇了1825年、1830年和1836年的3次危機。卡爾可能被當時的人認為是5兄弟中天賦最差的一個，他的信也反映出他處事有些遲鈍，但是毫無疑問，他在金融方面仍然十分精明。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9）

不幸的是，沒有這個時期的巴黎、法蘭克福和維也納分行利潤的完整資料。巴黎分行唯一殘存的是1824～1828年間的資料，它所告訴我們的，是1825年危機給詹姆斯造成的傷害程度（他的損失不少於35 6萬英鎊）以及他從挫折中恢復的速度（他的利潤在隨後兩年裡分別是4 4萬英鎊和12 4萬英鎊）。不過，我們可以從資金總額表上推斷出每個分行的年度利潤（見表2-2）。這些數字有些出人意料地顯示，倫敦分行的盈利能力實際上比其他三家主要的羅斯柴爾德分行要低：1818～1844年間，法蘭克福與巴黎分行的平均年利潤都高過倫敦分行。內森的兄弟們，尤其是阿姆謝爾經常要忍受與他們認為的「司令」相比較的痛苦；但即便在內森占主導地位的那段時期，法蘭克福也比倫敦更具盈利能力。維也納，考慮到它較小的資金規模，其盈利能力也是相當高的。

表2-2：5家羅斯柴爾德銀行年平均利潤（1814～1844年，單位：千英鎊）

1818～1825	1825～1828	1828～1836	1836～1864	1818～1844
法蘭克福	110	287	379	80

巴黎163-8386775

倫敦5714693449

維也納81117N/A

那不勒斯451724N/A

總計33085208221204

資料來源：檔案檔案

當然，問題是當5家分行仍被認為是不可分割的合夥人時，進行這樣的比較是否準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通訊表明，5個分行依靠一種集體策略獲得了各自利潤的一大部分，這種策略1836年之前的訂立者是內森。如果沒有這種有效獲益的策略，兄弟之間就無須如此頻繁地相互寫信，信的內容也無須如此詳細。如果各個合夥人不再覺得需要依靠別的合夥人，那麼利潤攤分的基本原則就不會持續如此之久。那不勒斯的資產負債表給出了很好的例證，說明了5家分行是如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1825～1850年間，它的資產中屬於其他分行的資金很少低於18%的比例，有時甚至多達30%。這種情形在其他分行似乎也是一樣。1828年，巴黎分行31%的資產是欠其他羅斯柴爾德分行的錢，主要是欠紐考特（倫敦分行）。

幾兄弟究竟是怎麼賺錢的？截至目前，我們主要關注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經營政府債券方面的生意，（從他們的信件內容來判斷）這也是他們在1836年之前最感興趣的活動；而且這一活動給當時的人留下的印象也最為深刻，因為它包含了明顯的政治寓意。表2-3提供的數字是倫敦與法蘭克福分行（其他分行的資料無法獲得）在這一時期發行的貸款（債券）面值總額。

表2-3：倫敦與法蘭克福分行發行的債券面值（1820～1859年，以每10年計，單位：英鎊）

NMRMAR

1820～1829587153364892947

1830～1839431941503599512

1840～1849351696112930801

1850～1859884859007373825

資料來源：《金融世紀》第16～81頁，艾爾著；《邁耶·阿姆謝爾》第29～42頁及第206～228頁，伯格菲爾著。

這些資料證實，羅斯柴爾德家族（尤其是倫敦分行）在這一時期是國際債券發行的主導力量。1815～1859年間，倫敦分行一共發行了50筆貸款，主要是提供給政府，面值總額約為2.5億英鎊，佔到了19世紀50年代英國海外資產的10%。形成對比的是，巴林兄弟在同一時期只發行了14筆，面值總額為6600萬英鎊。表2-4提供的是1818～1846年間，倫敦分行貸款的流向地域——包括少量的大筆私人貸款。這些資料顯示，當時人們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是「神聖同盟的銀行家」的說法有些誇大；倫敦分行最大的客戶是法國和英國，而普魯士、俄羅斯和奧地利遠遠地排在後面。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10）

表2-4：倫敦分行發出的貸款（1818～1846年，按照借貸者）

借貸者總額佔貸款總額百分比

英國	4493854729	2
法國	2770000018	0
神聖同盟*	2902956618	8
普魯士	[12300400]	[8 0]
俄羅斯	[6629166]	[4 2]
奧地利	[3100000]	[2 0]
那不勒斯	[7000000]	[4 5]
葡萄牙	55000003	6
巴西	44862002	9
比利時	116810647	6
其他**	58437503	8
私人部分	2490000016	2
總數	154079127100	0

\*普魯士、俄羅斯、奧地利與那不勒斯。 \*\*荷蘭、希臘與丹麥。

資料來源：《金融世紀》第14-42頁，艾爾著。

闡明政府債券在羅斯柴爾德各個分行資產負債表中的重要性相對容易。倫敦分行現存最早的資產負債表（1818年）顯示，它的資產中非常大的一部分——超過了1/4——投資在英國政府債券之中。如果算上它持有的丹麥政府債券，這一比例超過了37%。同年，法國分行35%的資產是3%利率的法國公債。「國家證券賬戶」在維也納分行的資產中佔據了同樣的比例，這也顯示了羅斯柴爾德大膽的策略：保持「最上等」的證券所佔資產比例為1/3左右。但是，計算這些債券發行所產生的利潤非常困難。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每一筆收取的佣金和其他費用都不相同；一些債券的發行實際上帶來了重大的損失（比如1830年的法國貸款）。不管怎樣，兄弟幾個在債券市場掙到的大部分錢並不是來自於發行新債券，而是來自於對現有債券的投機。這其中，要找出精確的資料也非常困難。從現存的記錄來判斷，各分行賬戶的構成主要基於對各種業務或交易回報的計算，並且確保各個分行之間不存在差異。與大多數19世紀公司的總賬一樣，倫敦分行並沒有按照種類來組合記錄交易：各種買賣行為按照實際發生的時間相繼記錄，年底時再合計。理論上，計算買賣政府債券獲得的利潤是有可能的，但是這無疑要花費大量精力，總賬也沒有試圖釐清這方面的資料。那不勒斯分行有一個「公債賬戶」，但是它也保持了其他政府證券，如那不勒斯、羅馬政府債券的獨立賬戶。由於它經常改變每半年的會計慣例，建立新的賬戶用於繼續進行的交易，因此要對它的活動得出讓人深刻印象的評價幾乎不可能。最多可以說它絕大多數利潤來自5~10個聯合賬戶，有些是與其他羅斯柴爾德分行的聯合賬戶，有些是與義大利銀行的聯合賬戶；利潤也來自於為第三方進行交易收取的佣金，來自於各種沒有列出明細的貸款利息。

當然，如果羅斯柴爾德只經營政府債券，那這就沒什麼問題，但他們在銀行業裡的活動實際上多種多樣，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趨勢更為明顯。政府金融是他們的最愛。如果按照生意的成交量而不是利潤來衡量，相對重要的是倫敦「商業銀行家」的經典業務：接收商業票據或匯票。按照1882年《票據法》的規定——它給已有300多年曆史的這種業務形式進行了精確的定義——匯票是「某個人（出票人）



填寫地址（並簽名）後提供給另一個人（付款人）的無條件支付命令……要求……付款人（當他簽署票據後變成了承兌人）在未來……確定的日期……支付給特定物件或持票人……確定數額的款項」。換句話說，某些貨物的賣家可以向買家開出匯票，以便向他提供一段特定時間（通常是三或四個月）的賒賬期，這樣就能夠讓他在貨物抵達並賣給製造商或零售者之後，再支付款項。商業銀行扮演的角色是雙重的：代表買家（收取一定的手續費）充當匯票的接受人或以一定的折扣（收取利息）從開票人手裡買入匯票。貼現也可以再次打折將匯票賣給中央銀行，在匯票上增加自己的簽名或背書。承兌匯票的銀行家是在有效地「兜售他的名聲」，這也就是說，他的名聲是有信貸價值的。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11）

這類商業票據的買賣是內森·羅斯柴爾德主要的活動之一。它的重要性也能夠從殘存的資產負債表中推斷出：1828年的「應收票據」佔了倫敦分行資產的1/4；「應付票據」佔了債務的5%。這類業務在歐洲大陸的羅斯柴爾德分行重要性要低一些，反映了19世紀大量國際貿易通過倫敦運作的事實。內森1832年在銀行委員會作證時闡明瞭這一點，「從整體的角度來看，這個國家是全世界的銀行……在印度、中國、德國以及全世界進行的交易，都受這裡的主導，並通過這個國家達成協議」。但是，內森也解釋說，其他羅斯柴爾德分行在他的業務運作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輔助作用：

我買入倫敦銀行家和商人手裡從利物浦、曼徹斯特、紐卡斯爾以及其他地方開出的匯票，每週我會購買6000或7000英鎊的匯票，有時會買1萬英鎊，然後將它們傳送給歐洲大陸的分行；歐洲大陸分行用它們購買本國用於購買酒、毛紡品和其他商品的匯票……如果這個國家的國外匯票數量不足的話，我們就要被迫從巴黎、漢堡和其他地方運來黃金。

這對於當時進行的業務是一個合理的總結。羅斯柴爾德家族並沒有試圖憑藉收取票據手續費來賺錢（實際上，內森收取的費用一直比其他公司低0.5%）；他們的目的是利用歐洲各個市場之間的匯率差異獲得利潤。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通訊經常提及此類套匯交易：「倫敦」（開給英國的匯票的簡稱）的價格高於巴黎或法蘭克福的幅度足

以讓內森向詹姆斯或阿姆謝爾傳送大量的匯票嗎？「現在，親愛的內森，」詹姆斯在1832年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中寫道：

我再次忙於匯票業務了，請你準確地評估一下你傳送給我們的（匯票）。我們在這裡購買倫敦匯票的價格是25 65法郎，加上3%的利息，相當於是25 845法郎；你送過來2 1萬英鎊的巴黎匯票價格是26 075法郎，加上4%的利息，相當於是25 79法郎，即便不計算手續費也有20%的虧損。我將這一點告知你，唯一的目的是我不想處理匯票生意時蒙受損失。

這其中涉及了複雜的計算，兄弟幾個試圖利用的是非常微小的匯率差異。作為跨國的合夥人企業，他們在這類生意上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票據市場中的地位並不像他們在債券市場中那麼有掌控力。沃爾特·巴杰特在名為《倫巴德街》（倫敦金融中心）的倫敦影響力調查中，稱他們為「最偉大的……外匯交易商」；但是這一讚美用在巴林兄弟頭上更合適。1825年，內森承兌的總金額為30萬英鎊，巴林兄弟則為52萬英鎊。25年後，紐考特的承兌額上升到54萬英鎊，但是巴林兄弟的數額則是190萬英鎊；而且19世紀下半葉，隨著諸如克萊沃特這樣的新來者加入競爭，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巴林兄弟之間的差距仍在拉大。除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將政府金融放在第一位的因素外，這主要反映了一個事實：票據生意很大一部分是由跨洋貿易帶來的，而不是英國與歐洲大陸之間的交易帶來的，後者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有優勢。上文也提到，羅斯柴爾德也試圖提高在美國市場的份額，但他們只剛剛站住腳；整個19世紀上半葉，巴林兄弟在那裡一直佔據上風。

票據交易很自然將大量活動聯絡到了一起。從非常早的時期開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交易便是國際金銀市場。正如內森1832年作證時說的那樣，對應英國進口的匯票與出口的匯票總額之間存在著差距；按照當時經典經濟學的觀點，貿易赤字或盈餘自動地會帶來金屬貨幣流進或流出倫敦，只要這些貨幣的數量足夠大，足以涵蓋裝運和保險費用，以及必要時的融化和重鑄費用。當匯率達到所謂的「黃金點」時，就需花錢進口或出口黃金（在一些國家是白銀）。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將黃金從英國運往歐洲大陸是1815年前直接參與英國

戰時金融活動的重要途徑，兄弟幾個也從沒有失去對金銀生意的興趣，他們與英格蘭銀行以及法蘭西銀行進行了大量這方面的生意。這也是內森寫信給一個漢堡銀行並用傲慢的口吻提及的一點：「我的生意.....完全由政府交易和銀行業務組成。」這方面的業務也涉及了複雜的計算，尤其是硬幣被融化成金條（銀條），然後在另一個市場重鑄時更是如此。「現在，親愛的內森，」詹姆斯在另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中寫道，「以1谷令（0 0648克）黃金的價格買入銀幣，其餘的可以作為利潤，很大一部分取決於分析，因為0 5谷令等於1法郎的0 875%。因此，59 125谷令等於25 82法郎，這其中，我們就有機會賺取利潤。因此，我強烈地建議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擋住皮克勒王子前往紐考特去路的「裝滿銀塊的貨車」並不是罕見的場景：從兄弟幾個的信件來看，價值數以萬計英鎊的金銀塊定期在巴黎和倫敦之間運來送去。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12）

另一個相關的活動領域是直接參與商品貿易。當然，買賣貨物與買賣證券相比，一直是邁耶·阿姆謝爾生意的一部分，內森自己的職業生涯也是從紡織品商人起步，後來又參與了「殖民地貨物」的貿易業務。但是，從幾個人的通訊來看，羅斯柴爾德家族對這類生意的興趣在19世紀20年代似乎有所減弱，直到1830年後，才慢慢轉回來。與巴林兄弟買賣多種貨物不同的是，

羅斯柴爾德家族更喜歡專門化，希望在一些經過挑選的領域中確立主導地位。引起他們興趣的主要商品是棉花、菸草、糖（主要來自與美國和加勒比海）、銅（來自俄羅斯）以及最為重要的水銀（來自西班牙）。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們將予以更詳細的闡述。他們偶爾也會接觸一些其他的貨物：比如鐵、毛紡品和酒。懷有敵意的漫畫家刻畫了一個沿途叫賣的「布勞斯柴爾德」，他賣「各種東西」，但這其實是錯誤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從沒有大包大攬地做貿易生意（見圖2 7）。舉一個例子，儘管他們的親戚沃姆斯兄弟在錫蘭建立了一個茶葉種植園——這個種植園甚至以「羅斯柴爾德」命名——但是他們從沒有真正地涉足茶葉生意。

羅斯柴爾德涉足的最後一個生意領域是保險業，這也是他們貿易活動帶來的一個結果。19世紀上半葉，保險業開始繁榮，大量保險公

司在倫敦和其他地方成立。內森參與了1824年聯合保險公司的創立——他唯一感興趣的合資公司——其原因多種多樣，但沒有一個能讓人感到滿意。根據該公司的歷史記載，這是他與連襟摩西·蒙蒂菲奧裡一次偶然碰面的結果；還有人認為他的主要目標是幫助他們的親戚本傑明·岡珀茨獲得公司精算師的職位。第三個假設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認為當時已有的保險公司歧視猶太商業人群。實際上，羅斯柴爾德家族對保險業的興趣已持續多年，因為1815年前為了確保運往歐洲的貨物與金銀塊的安全，他們不得不提前支付高昂的保險費用。1823年，更進一步的推動力來自薩克遜-科堡公爵的幫助請求，他提出的一項新壽險條件遭到了兩家倫敦保險公司的拒絕，包括當時新成立的衛士公司。最重要的是，內森似乎希望打破勞埃德在皇家交易所的位置剛好在內森的頭上）的聯合企業，倫敦保險公司和皇家交易所壟斷了倫敦的海上保險業務。「英國與國外人身安全與火災聯合保險公司」以500萬英鎊的資金成立後幾天，新公司的稽核員之一的托馬斯·福韋爾·巴克斯頓議員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項議案，尋求打破海上保險業務的壟斷狀態。與此同時，內森也希望得到老朋友赫里斯（此時是財政部的金融祕書）的支援。「這個公司的目標，」他用當時流行的炫耀口吻寫道：

就是通過確保資金平穩流動，進而促進各種國家產業的發展，並通過向航運以及任何可能遭遇風險的財產提供保險，來保護商人以及商業社群。該公司還有其他有益的經營方向，將促進製造業的發展，同時吸引以及留住國外商業機構。

這是此刻整個歐洲大陸的政策：每一個地方，每一次努力都是要引進商業的精神，讓貿易凋零的地方重新煥發生機，併發掘新的渠道……我請求你將這一主題提交給利物浦首相考慮，他毫無疑問會認為這些事實對於他的政府一直所堅持的自由原則是額外的支援，因為它們清除了開放、自由以及沒有約束的貿易之路上的一切障礙。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13）

這是提交給推行經濟自由政府的一個判斷正確的提議，但隨後事情的關鍵時刻出現了。按照內森的說法，現存的海上保險公司缺乏：

活力以及那些必要的自由觀點；在當下，為了保持優勢，他們只能依靠繼續壟斷。我可以斷定，如果保險業繼續墨守成規，歐洲大陸任何一個角落的類似企業興盛起來，並最終從它們手上奪去它們目前獨家經營的業務。

顯然，英國政府被說服了，因為議案6月在上院獲得通過。但是，新公司的一個股東（同時也是勞埃德公司的一個保險商）成功地拿到了一個指令，限制聯合公司參與海上保險業務，理由就是這超出了它最初確定的業務範圍。結果，第二家公司被迫成立，即「

海上保險聯合公司」，投資資金同樣是500萬英鎊。

羅斯柴爾德家族擔當保險人的新角色一開始就受到了公眾的一些質疑。當時的一幅漫畫（由名為「一個業務愛好者」的人所畫的《紐考特的防火牆》）中，一輛驛站馬車裝載著一群鄉下的投資者和他們裝著錢的袋子，停在寫有「虛偽同盟防火與人生安全辦公室」字樣的建築物前（見圖2-8）。辦公室有3個入口：一個寫著「德國門房的小屋」，一個寫著「英國門房的小屋」，中間的那個，門前站著3個人（羅斯柴爾德、蒙蒂菲奧裡和岡珀茨）用法語交談著。內森說：「這次，我們從這裡進去吧。」蒙蒂菲奧裡回答說：「繼父，你這樣做太對了。」岡珀茨則嘟囔著說：「吃一塹長一智啊。」一個標誌寫道：「除了大熱天和11月的第五天外都不休息。」另一個標誌則寫明辦公時間為：「從太陽升起到月亮放光。」中間那扇門上方是一則啟示：「禁止進入，除了那些頭腦空空腰包鼓鼓的人。」英國門房對新來的投資者說：「不！我們全部要。」但是德國門房喊道：「不！不！你開門準備足夠的地方招待我的貴族朋友。」

但是這種憤世嫉俗的評價是沒有來由的。與當時諸多投機公司不同，聯合保險公司不再是一個欺詐幼稚投資者的工具，而是一個踏實創立的企業，它有著長久、繁榮的前景。兩年後，它搬到了巴賽洛繆巷，就在紐考特街4號，緊挨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公司。這也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涉足保險業的唯一事例。1839年，他們參與了（儘管不是直接參與）迅速發展的萊茵蘭市場，向奧本海姆與其他人共同創立的科洛尼亞火險公司提供了支援。這種聯絡即便經歷了19世紀40年代的動盪事件（尤其是1842年代漢堡大火，它差一點耗幹了公司的全部資

源) 仍然維持了下來；此外，1852年，倫敦、法蘭克福和巴黎分行共同成為了科隆再保險協會的股東。

### 羅斯柴爾德網路

不斷上升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業務量，金融活動的多樣化以及生意利益在地域的擴充套件，不可避免地超出了五兄弟的能力範圍。之前，談判大筆政府貸款時，其中一個合夥人前往布魯塞爾、布拉格、柏林或馬德里通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他們希望在這些首都城市定期運作正常的生意，就需要做出其他的安排。同樣地，如果在關鍵市場中沒有可靠、有效的事物存在，買賣諸如棉花、菸草、糖、銅以及水銀這些交易是不可能進行的，這些關鍵市場是指紐約、新奧爾良、哈瓦那、聖彼得堡和馬德里。整個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不僅需要吸納更多的新一代家族成員成為合夥人，加入5個分行的管理之中，而且也需要增加5個分行中辦事員的數量，並建立一個經過挑選的付酬代理人團隊，用以照顧5家銀行在這些新市場中的利益。從倫敦、巴黎、法蘭克福、維也納和那不勒斯往外輻射，與這些代理人的通訊路線形成了一個複雜的新網路，大大提供了通訊的數量，同時也提高了以羅斯柴爾德的名義進行的生意數量。這個網路並不具備牽動全域性的影響力；相對重要的是與其他銀行、股票經紀商、中央銀行和金融報紙形成的更為全面但更為鬆散的聯絡網路。如果每個人或公司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存在正常的通訊聯絡，就將其視為他們網路的一部分，那麼這個網路無比龐大。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 (14)

合夥人的擴充包括了薩洛蒙、內森和卡爾的兒子們，詹姆斯最終也稍加抗爭，為自己的兒子爭取到了資格。下一代中年紀最大的成員——安塞爾姆和列昂內爾——似乎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他們世襲的職業，毫無抱怨地度過了一系列羅斯柴爾德學徒階段：在父親的銀行工作，然後去叔叔的銀行工作一段或幾段時間，最後獨自接受一項國外任務。安塞爾姆在1826年正式成為一名合夥人，但是一直到1830年，五兄弟才足夠放心地讓他參與柏林的敏感談判，而且即便到了這個時候，他事先仍要接受他父親的仔細指導，薩洛蒙給了兒子最經典的羅斯柴爾德建議「多聽少說」：

你現在是所有兄弟中享有全權的人了.....所有兄弟將以相同的方式來證明自己，從根本上來說，做生意必須承受一定的風險，因此要多寫信.....努力工作，忙碌起來，將所有這些託付於萬能的主，他能給你帶來運氣和祝福。

實際上，沒過多久，安塞爾姆就具備了足夠的自信來表現出一個合夥人應有的權威。不到一年，他就很自信地批評起叔叔們在七月革命之後的投資策略，詹姆斯很快就要求他前往巴黎協助他做事，因為「他真的很個性」。這是一種先見之明：在下次更為嚴重的革命危機橫掃歐洲時，安塞爾姆在減少5家銀行遭受的損失方面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即便這是以他父親的感情為代價的。

內森最大的兒子列昂內爾也順利通過了學徒生涯。1828年，他正式「加入生意」，當時內森帶著列昂內爾前往法蘭克福與其他幾個兄弟見了面，列昂內爾被任命為「中將」。「現在你是指揮自己的將軍了。」詹姆斯在信裡給予了鼓勵，「你毫無疑問能夠非常好地參與生意。」「像一個男人一樣，做幾筆好的生意。」詹姆斯在幾天後又說，「證明你是一個聰明的好商人。」3年後，當詹姆斯苦於應對1830年革命帶來的衝擊時，他已經完全沒有了之前似乎高高在上的語氣：

親愛的內森，你能否暫時讓（列昂內爾）離開一段時間，你知道，如果你能夠讓他來這裡幫我，那將是讓人何等高興的一件事。兩人一起努力總要好過一人獨自支撐。儘管我們這裡很不幸，生意很少，但兩個人共同運作還是大有裨益。如果讓他來這裡不是很方便的話，我將被迫請求你派另一個兒子過來，我一直把他們當做我自己的兒子看待。我希望列昂內爾對我不會抱怨什麼，願意回到我這裡。

當列昂內爾被派往布魯塞爾時，詹姆斯對「只留下我一個人」在巴黎感到了一絲不安。到1833年，列昂內爾在他姐姐眼裡似乎成為了「一個徹底的生意人」：「他在早上過來問候，然後晚上7點吃晚餐時我們才能再次見到他。」他在1835年的馬德里之旅被認為是成功的；他在1836年繼承父親擔當大任顯然也沒有任何困難。

與此對比的是，列昂內爾的弟弟們對銀行業則有些牴觸。安東尼因為一段感情而被迫縮短了在法蘭克福的第一段學徒生涯，而且他的父親並不同意他所選擇的姑娘，他由此對那個「讓人討厭的地方」產

生了深深的厭惡感（另外兩個弟弟也有同感）。與巴黎以及倫敦相比，法蘭克福並不提供奢侈的生活；更糟糕的是，他們的大伯阿姆謝爾比侄子們工作的時間還要長，這是常事，他從早上8點一直工作到下午7點，每週工作6天（內森並沒有像要求自己那樣鞭策自己的兒子）。即便在生活條件差不多的巴黎，安東尼仍然感到有所欠缺。詹姆斯曾機敏地解釋道，儘管他「努力工作」，但他仍然不能「確保生意一直保留在將來的後代手裡」。他的叔叔們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詹姆斯鼓勵他參與談判一宗大合約時，注意「觀察所有的細節」；薩洛蒙尋求「灌輸給他一定程度的堅定意識，但一方面不要動不動就吵架，另一方面脾氣不要過於火暴」。但是安東尼一直沒有抹去自己不可靠的名聲：一直到1840年，他的哥哥納特感到被迫要在心裡用「非常粗俗的語言」來向他提出抗議。「我不喜歡他給我寫信的方式，我就像他的僕人一樣。」他向列昂內爾抱怨說。「我想我不是一個容易發怒的人，但是總是有那種容易冒犯人的說話方式，而我們的好兄弟比利（安東尼的暱稱）有時就習慣用這種方式。」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15）

總體上，納特的脾氣比安東尼要平和得多，但他似乎也對學徒生涯的約束感到苦惱不已。「你必須知道，」他向姐姐夏洛特坦白說，「我在倫敦待了差不多一個月，通常與爸爸一起待在賬房裡，並儘可能地多努力，爭取成為一個合格的商人，但我發現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當他被派往那不勒斯的時候，他更不樂意，他向哥哥列昂內爾抱怨說：

我現在要觸及一個不成熟的主題，這就是我自己。我一直寫信跟你說我對那不勒斯是如何厭惡，我可以向你保證，這種厭惡與日俱增；我也可以向你保證，無論我多麼試圖不要在意那些感覺，但是我害怕在這裡做不好事，如果我留在倫敦做事的話，我肯定學習做生意的時間會是這裡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要比這裡好20倍……讓最敬愛的拉比給爸爸寫信，告訴他讓我們回家。

最終，詹姆斯再次接管了這件事，讓納特接受了一整年的訓練，「就像其他任何一個學徒一樣，確保他學到如何做好賬目的本領。」詹姆斯向內森保證說，納特是「一個非常好的小夥子……這點我可以擔保，如果他能夠聽進去，他會成為所有兄弟中技術最好的一個」。



實際上，納特似乎成為了詹姆斯最喜歡的侄子：他很快就談論「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教給這個好樣的年輕人」。到1833年，詹姆斯感到這個「被保護人」做好了承擔國外任務的準備，儘管目的地——君士坦丁堡，在希臘貸款問題的爭吵期間——的選擇可能並不明智。最終，納特註定要在詹姆斯的陰影下生活以及工作大半生，他失落的心情也一直沒有停息過，在巴黎，他就像是一個被流放的英國紳士，經常被法國的政治####弄得沮喪不已，以及經常要在「讓人噁心的賬房」裡埋頭待呆上數小時。

為何內森和他的兄弟們有如此多的兒子——一共有12個，他們卻沒有按照父親的做法，至少讓其中的一些孩子在新的金融中心開闢天地？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在他們的兒子還年輕時，五兄弟似乎考慮過在馬德里或聖彼得堡設立新的分行。後來，他們斷斷續續地還提到了派一個年輕的成員前往美國。但是在大西洋彼岸開設「第六分行」的計劃最多隻是一個想法而已。對於這點，最好的解釋就是他們認為其中的5個年輕人——安塞爾姆、列昂內爾、邁耶·卡爾、阿道夫和阿方斯——作為他們的繼承人，足夠讓五家分行繼續繁榮下去，但其餘的幾個的能力還不足以承擔設立新分行的重大職責。因為，如果安東尼和納特被叔叔們認為缺乏對金融的熱情以及奉獻精神，但他們相對於內森希望當鄉紳的小兒子邁耶以及痴迷正統猶太教的威廉·卡爾來說，至少還有一點優勢。另一個阻礙似乎是內森的####漢娜，她堅決反對將年輕的兒子派到國外。

於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只能依靠少數付薪的代理人。當然，自猶太街時期起，他們就僱用了家庭成員以外的人擔任辦事員。我們對這些影像朦朧的信件書寫員以及簿記員知之甚少，這是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傾向於將他們排除在執行活動之外：他們被看做工蜂，辛勤地工作，得到良好的待遇——但也被牢牢地監控著。一些人的地位只比僕人好一點，就如雅各布，他的馬車在1814年運送黃金前往華沙的途中遭遇事故，他受了傷但仍然十分高興（「弄傷腿比損失黃金要好」，他開玩笑地說）。其他一些人是技術性的語言學家和會計師。1818年，法蘭克福分行至少有9個辦事員：拉迪烏斯和克雷姆，負責記賬；貝倫茨，負責管理通訊和法蘭克福所有交易的總賬；蓋格爾，同時處理法蘭克福與息票有關的業務；蓋格爾的父親，負責現金賬；漢堡，

負責處理有頭銜顧客的通訊；漢堡的兄弟處理外國信件；海斯勒，處理匯票；還有凱澤，負責處理國內事務。此外，在會計室還有一個辦公室人員以及一個信件備份學徒。在卡爾那裡，辦事員「全部是年輕人」，當他計算辦公室運營成本時（每年15萬古爾登，約合14萬英鎊），他懷疑他們「欺詐」——毫無疑問，他想起了父親在希爾舍·利布曼偷錢一事中的經歷。巴黎分行的辦公室規模更小（費用也更少）：差不多同一時期，詹姆斯估計每年支付給8個辦事員，一個門房，一個信使，兩個僕人以及一個車伕的所有費用為34萬法郎（1700英鎊）。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16）

通常，辦事員都是從類似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分支中招募。在維也納，一個關鍵的角色就由戈爾德施密特家族擔當，這包括薩洛蒙的首席祕書莫里茨·戈爾德施密特，他在1803年與薩洛蒙一起從法蘭克福搬到了維也納；他的兒子尤利烏斯、雅各布和亞歷山大分別在維也納、法蘭克福和巴黎工作。戈爾德施密特家族的親屬也被認為是值得信任的人選：莫里茨的一個侄子在阿姆斯特丹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工作，可惜早逝。另一個侄子（莫里茨）在倫敦分行工作了18年，另一個侄子（伊格納茨·鮑爾）被派往西班牙協助威斯維勒。

不可避免地，為了跟上業務量的步伐，職員的數量必須增加，因此截至19世紀30年代，僅紐考特一個地方就僱用了30~40人，每年的薪酬從50~500英鎊不等。但是合夥人「家長式」的態度流傳了下來。

「但願讓辦事員們享用一頓好的晚餐，」列昂內爾在1836年的婚禮期間寫道，「不醉不歸，或者，如果他們喜歡的話……我想他們可以去格林尼治（內森的鄉下別墅）舉辦一個舞會；如果他們中的一些人覺得不夠盡興的話，讓他們辦兩次，讓他們帶上自己的另一半。」最接近鼓勵的一個做法是「我們即將成為英國和國外兩筆貸款的簽約者，這使得辦事員們能夠享受到一些好處，這些應在近幾年我們一直給他們的聖誕節賞錢之外另給。」當納特和安東尼很明顯將離開倫敦和巴黎前往法蘭克福，照應臨終前的父親時，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慌浮出水面：第一次需要讓兩家分行的資深辦事員擔當起負責人的角色，這一職責之前一直由家族內部的人把持著。在倫敦，對於選擇誰來臨時接管產生了一些疑問，這反映了辦公室裡缺少一個正式的接班人。這個

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內森在執行決策方面的壟斷地位，讓他的僱員產生了惰性，他們無須作出艱難的抉擇，獲得幾乎是確定的收入。

這也解釋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經歷的一個難題的原因所在，他們難以將遙遠的城市，比如馬德里、聖彼得堡的商業利益交給那些從辦事員起步的人料理。因為，這些代理人不能僅僅被當成辦公室職員對待，只聽從合夥人每天發來的命令，不用承擔任何真正的責任。不管紐考特寄去多少封信，代理人肯定更瞭解當地的情況。有時，他們需要快速地作出決定，因此諮詢倫敦或巴黎只會延誤時機。此外，無論他們如何頻繁地強調自己只是偉大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代理人，也很自然地會在當地獲得有利於他們的地位。所有這一切，羅斯柴爾德家族發現都難以忍受。他們總是懷疑最有價值的代理人對自己不忠誠——首當其衝的，就是他們用自己的戶頭進行交易——並一再抱怨代理人的無禮、獨立和不能勝任工作。「我注意到加塞爾（聖彼得堡代理人）對我們的生意毫無興趣。」詹姆斯在1829年寫信給內森，談到了加塞爾對一大批白銀要運往俄羅斯的反應：

換成另外一個人，意識到如此多的白銀將要到達，肯定會說：「我會給你匯款。」但是沒有，他什麼都沒說。他寫信給我，詢問我是否願意與他建立一個為期3個月的聯合賬戶，這樣讓他有更多的勇氣運作生意。如此一來，我們將被迫要從這裡派一個人過去，一個對我們公司非常忠誠的人。感謝上帝，你的兒子們很快就成人了。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17）

加塞爾不斷地成為這類批評的靶子。1838年，詹姆斯威脅停止支付他的薪酬（每年14萬盧比），他認為這一薪酬過高，而用另一種方式支付薪酬：「無論我們與他做了什麼生意」，給加塞爾1/4的利潤提成。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加塞爾最頻繁的指責是他將自己的利益置於公司利益之前。「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哪怕你只寫一個字給加塞爾，」暴怒的詹姆斯一年後寫道，「那條呆板的狗，為你帶來的傷害也肯定會多於好處。他只樂意把我們的錢據為己有，自己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即便拉扎爾——1832年被任命為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一個全職代理人——有時也被貶為「混蛋」，他竭力地討好詹姆斯，詹姆斯的指示到達之前他就已經犯下了錯誤。

可能19世紀30年代最重要的羅斯柴爾德代理人應該是丹尼爾·威斯維勒了。威斯維勒當時是馬德里的代理人，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考慮人選中是1834年。當時，威斯維勒顯然已經在法蘭克福分行贏得了作為一名「商人」的名聲，但沒過多久，他也被懷疑忽視了主人的利益。到1843年的時候，甚至出現了考慮替換他的想法：「那個年輕人，按照（安塞爾姆）的說法，一年比一年自負了」：

我真認為這個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今天我會寫信給父親，讓他做好前往馬德里的準備……最好的辦法是我們當中的一個人能夠或願意前往馬德里……但你可以信任我，我不會在信裡提到邁耶，我知道你母親希望他留在英國。我認為蘭多在馬德里熟悉環境之後會做得很好，他非常乾淨……而且出身於一個值得尊敬的家族，他絕不會表現出如此荒謬的自傲。威斯維勒不僅現在自傲，今後仍將如此。

這些威脅毫無作用。威斯維勒可能表現出「無比的虛榮」，但是他已經讓自己變得不可或缺。羅斯柴爾德家族派邁耶前去馬德里待幾個月，只是因為威斯維勒要到國外結婚，對此，納特曾說，「威斯維勒的離開迫使託普（邁耶的暱稱）施展自己的能耐，能夠立刻讓他把自己變成那裡的主人，但只要威斯維勒回來了，邁耶就會立刻感到難以找到合適的位置。」當安東尼試圖推倒威斯維勒時，他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他一如既往地抱怨，仍舊如冰一樣冷，直到我明確地告訴他，只要他在馬德里為我們做的生意讓我們滿意，我們就不會有任何改變，但是如果他繼續抱怨我們的給予不足的話，那麼他就不可能繼續待在馬德里，我們當中的一個人將被迫去那裡取代他……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代理人，要取代他十分困難，但是我很少或從沒有見到比他更冷淡、更精於算計的代理人。他虛榮過了頭。

相反，另一個派往美國的代理人哈瑙在那裡立刻因為過於草率的交易引發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不滿——儘管有人懷疑，如果他花更多的時間來學習有關事項，他可能又會被批評為懶惰。也只有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從一個「將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傾注到為我們尋找生意的過程中」的代理人身上找到缺點。

為糾正一個長久以來的錯誤理解，將諸如威斯維勒的付薪代理人與那些跟羅斯柴爾德家族有定期往來以及優先生意關係的夥伴銀行區別開來非常重要。要將這些銀行全部列出來將會十分枯燥：到19世紀40年代末，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與世界多個地方的銀行建立了夥伴關係，我們只列一些比較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巴爾的摩、柏林、科隆、君士坦丁堡、佛羅倫薩、漢堡、米蘭、奧代薩、羅馬和的裡雅斯特。德國銀行業中兩個著名的名字在早期經常被錯誤地認為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代理人：瓦爾堡和布雷克勞德。實際上，它們只是夥伴銀行中的兩家銀行而已。1848年前，它們在銀行網路中扮演的角色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是，這兩家銀行引起了人們的興趣，是因為它們證明了小銀行（尤其是德國的銀行）通過與羅斯柴爾德建立某種聯絡為整個網路增加的價值，儘管它們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聯絡只有那麼一點點。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18）

瓦爾堡家族早在1814年就開始遊說代理羅斯柴爾德在漢堡的生意，但一直到19世紀30年代，定期業務關係才真正建立；之後，這一偏好轉給了卡爾·海涅（詩人海因裡希·海涅的叔叔），一直到19世紀60年代。差不多以同樣的方式，薩穆埃爾·布雷克勞德試圖排擠掉門德爾鬆銀行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柏林的首選銀行家；再一次，儘管極盡諂媚，一直到19世紀60年代，他的兒子格爾鬆才獲得了一定的特殊身份，而且主要還是因為他與俾斯麥走得很近，以及他所提供的高質量的政治訊息。即便到了這個時候，他仍受到蔑視：「布雷克勞德？」有人曾聽到詹姆斯對赫伯特·俾斯麥大聲說道，「什麼布雷克勞德？布雷克勞德得到的都是我給他的，而且只佔（全部利潤）的1%。」許多其他銀行在羅斯柴爾德注意的運作中扮演著相同的角色，他們參與了大額債券發行，對大量金銀塊的輸送提供了援手，有時還參與匯率套利交易：科隆的奧本海姆銀行、倫敦的施羅德銀行以及法國的波爾多銀行，當然還有更多，我們只列3個出來。它們在這個階段，都還是很小的玩家。

形成對比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那些大銀行身上花費了大量時間，他們主要視這些銀行為競爭對手，但是在進行一些非常大的業務時，他們也會尋求合作，這些大銀行有：倫敦的巴林兄弟，托馬斯·威

爾遜和戈爾德施密特；巴黎的拉菲特，奧廷格和馬萊；維也納的蓋米勒、希瑙和埃斯克爾，以及法蘭克福的貝特曼和貢塔德。1814年之後的10年裡，這些大銀行之間爆發了你死我活的競爭，但羅斯柴爾德不希望這些競爭者出現不良的狀況，他們越來越將這些對手看做自己生存的補充成分，當然，前提是自己的行業領袖地位不可撼動。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在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我們都能看到辛迪加組織以及銀行間鬆散聯合情形的出現。同時，通過擴充套件自己的規模，羅斯柴爾德家族認為自己承擔著一定程度的職責來維護銀行系統的總體穩定。這也解釋了他們不希望競爭對手倒臺的原因。在19世紀20年代，他們以一種近乎麻木的無情眼神看著帕裡什破產。截然不同的是，在隨後的數十年裡，他們為了維持金融穩定，偶爾願意拯救競爭對手，比如1831年以及1838年幫助拉斐特的舉動。薩洛蒙在1841年幫助蓋米勒的建議也說明：

我們作壁上觀，看著一個65歲的人破產，他的銀行存在了那麼長的時間，也是這裡第一流的銀行——不能提供幫助……是不可能的……如果施泰納和蓋米勒確實停止支付款項，這將呈現何等的景象，這將給海外、法蘭克福和其他德國市場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因為數百萬——多達三四百萬古爾登的承兌款和匯票將從這兩家銀行流失。

在這件事上，薩洛蒙提供幫助的建議最終被他的兄弟和侄子們否決。但是，他對於金融總體穩定的觀點也影響了列昂內爾對英國貨幣政策爭執的態度。1839年，他向叔叔報告說，「將制定為法令的舉措應該考慮合股銀行的利益」（羅斯柴爾德新一代從19世紀20年代起將合股銀行發揚光大）以及它們「可能對我們內部資金的影響」。他解釋說：「問題是如何讓這些先生們在有足夠的油水撈的同時讓他們以及整個國家接受約束，避免流通出現阻滯。」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19）

綜上所述，羅斯柴爾德家族思考問題的方式從本質上來說越來越像中央銀行的銀行家們。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在19世紀上半葉，英國和法國的央行仍舊是私營機構的一部分，儘管逐漸承擔了法令監管的公共職責。從它們的資源方面來講，它們也是唯一能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抗衡的銀行，儘管它們是國家性的，而羅斯柴爾德銀行則是跨國

性質的，而且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各央行對於通貨發行的壟斷權毫無興趣。因此，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歐洲各央行之間的關係一直緊密，有時甚至是共生關係。我們已經看到內森如何在19世紀20年代利用英格蘭銀行短期貸款的，以及作為回報，他是如何在1825年拯救英格蘭銀行的及英格蘭銀行如何在1830年提供了拯救詹姆斯所需的黃金。內森1832年向銀行委員會提供的證詞如此正面也不足為奇：「我感覺到它（英格蘭銀行）的管理挺好。」1830～1832年危機過後，詹姆斯似乎與法蘭西銀行也建立了類似的關係，而薩洛蒙與奧地利國立銀行的關係更為密切。

### 交易商的主人

1836年，詹姆斯給他的侄子們提供了一些如何在巴黎股票交易所賣證券的建議：

當你買進或賣出公債時，不要想著賺取利潤，你的目標應該是讓那些交易商習慣於一個想法：即他們需要跟隨你……這就需要在剛開始的時候做出一點犧牲，這樣一來人們才會逐漸形成需要跟隨你的觀點，我親愛的侄子們，這就像捕鳥一樣，需要先撒些食物出去。

歷史學家很容易忽視被羅斯柴爾德家族「食物」吸引的大量交易商，最簡單的原因就是他們進行的大多數交易都是口頭達成的，而非通過信件。但是交易商是19世紀金融行業不可或缺的工蟻。與羅斯柴爾德有生意來往的銀行中，有一些他們最喜歡的銀行：比如倫敦的梅內特和卡齊諾夫銀行，它僅在1834年一年就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賣出了200萬英鎊的外國股票，在隨後的一年裡賣出了140萬英鎊；此外，約翰·赫爾伯特·伊斯雷爾與他侄子約翰·瓦格建立的合夥人銀行。但是，即便這些銀行也只是被當成偶爾僱用的「打獵夥伴」：艾爾弗雷德·瓦格回憶說：「每兩週一次的結算日期間，我祖父或父親就會拿著流動情況表前往紐考特，列昂內爾男爵會給500英鎊或1000英鎊的費用作為我們的固定報酬，數額則是以他的心情來定。」無論如何，與許多交易商的交易帶有一種戰術色彩，這主要是因為一些業務需要偷偷地進行。

當時的人們稱內森是「交易商的主人」，他們並沒有過分誇大他的地位：到19世紀20年代末，他所取得的地位被其他交易員密切地關

注著，他們信任他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擁有超越常人的資訊以及直覺。這意味著公開的羅斯柴爾德買賣行為將可能引發對某一隻股票的拋售或搶購潮，這是羅斯柴爾德幾兄弟不願看到的連鎖反應。有關內森隱藏技術的故事時有耳聞。「如果他得到訊息稱基金將會上漲，他就會委託交易商以他的名義先賣出50萬。」「這個大投機家慣用的一個操作手法就是讓一幫代理人賣出，另一幫人買進同樣的股票，這樣一來，他的真實動向就難以判斷。」在維也納，薩洛蒙將大多數股市業務託付給了一個投機者，他給這個「支付12萬古爾登的固定薪水，此外還有大量的佣金」：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20）

這個人通常每天一早就恭候著羅斯柴爾德，兩人碰到一起時會討論當天業務的計劃。投機者不僅在交易所有他的代理人和客戶，在「蓬杜爾小店」（非正式的交易所，位於一個咖啡館裡，交易所正常交易時間之外的交易能夠在這裡繼續）同樣存在，薩洛蒙與他推斷出他的買賣數量。他僱用了許多傳遞訊息的人，他們唯一的職責就是在投機者與羅斯柴爾德之間來回傳遞價格波動的報告。

這個時期，作為金融資訊（以及錯誤資訊）越來越重要的一個非獨家來源當然是媒體。可能有人會認為，19世紀報紙的發展侵蝕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利用自己的通訊網路獲得的優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確是事實。另一方面，報紙金融版面的存在也提供了一個影響市場的新機會，羅斯柴爾德家族也迅速地抓住了這一點。這在剛開始的時候並不容易實現：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19世紀20年代，羅斯柴爾德家族經常是媒體攻擊的靶子，而不是它們的操控者，而且一直存在著激進、反動的報紙對他們充滿了敵意。但是，逐漸地，羅斯柴爾德銀行對一些報紙至少能夠施加一些影響力。我們之前也看到薩洛蒙如何通過根茨對德國《彙報》施加壓力的；19世紀30年代，啟用海因裡希·海涅作為一名記者也保證了對詹姆斯活動報道的正面性（當然有時也會有些挖苦）。詹姆斯本人似乎也逐漸提升了對諸如《世界箴言報》以及《辯論日報》等報紙的影響力。「昨天，有一份報紙登了不利於我們的文章，」詹姆斯1832年寫信給內森說，「如果這篇文章出現在一份大報上，我們就要在報紙上做出迴應。」5年後，他在西班牙進行了敏感談判之後，對侄子們說：「我正安排在報紙上發表幾篇文章，



這可以給馬德里和倫敦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你們英國報紙經常跟隨我們法國報紙的腳步。能夠操控公共輿論真的很好。」1839年，他能夠很自信地向侄子們保證說，如果法國政府貿然地反對他的鐵路計劃，那麼「所有的報紙將群起攻之」。「如果一個人無法讓自己受人愛戴，那麼他只能讓人敬畏。」他宣稱，重申了他最欣賞的一句邁耶·阿姆謝爾箴言，「報紙能夠帶來強勁的衝擊」。

內森應對早期媒體攻擊的策略也是與當時最有影響力的英國報紙《泰晤士報》建立持久的友好關係。在19世紀20年代，他遭到了《晨報》大量的攻擊：比如，該報在1829年聲稱它的對手《信使報》利用外交辦公室有關法國政府更迭的內部資訊作為基礎，與內森一起進行了一次股市投機。《晨報》編輯聲稱「《信使報》（將訊息）告訴了蒙蒂菲奧裡，蒙蒂菲奧裡又告訴了羅斯柴爾德，一個精密的投機陰謀以閃電般的速度形成了」。實際上，其實是內森經常向報紙提供訊息——尤其是他的兄弟從維也納與巴黎傳遞過來的政治資訊。事實上，正是雙方對於高速通訊的共同興趣讓《泰晤士報》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走到了一起：到19世紀30年代末，他們有效地分享了布洛涅與倫敦之間的信鴿郵遞服務。可能更為重要的是，內森與托馬斯·馬薩·艾爾薩格確立了友誼，後者1817年加入了《泰晤士報》，也是該報直至1846年的頂尖金融作者之一。儘管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泰晤士報》之間的緊密程度不應被誇大（艾爾薩格有時會對英國資金輸出的規模表示憂慮，而內森比任何人都鼓勵資金輸出），但是激進派和民權運動人士指責《泰晤士報》是「猶太人的豎琴」並不完全是憑空捏造的理由。1842年，安塞爾姆寫信給他的堂兄弟，提及了「普魯士政府將頒佈的針對猶太人的新法令」：

##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21）

普魯士國王非常虛榮，很容易受到《辯論日報》或不認同他的政府的英國報紙影響。因此，非常需要這些報紙不時刊登有利於猶太人的文章。由於你十分熟悉《泰晤士報》的主導人物，你能夠很容易讓他們插入這些文章，我會發一些德語文章給你，你可以讓人翻譯一下。

當然，對媒體的這類控制與今天的模式大致相同，而且很難指責羅斯柴爾德家族尋求對那些敵意媒體施加影響力的做法。現代讀者很

難判斷的一點就是當時的金融運作，因為那時幾乎沒有正式的監管措施，金融革新的快速步伐也讓這方面的立法出現了滯後情況。毫無疑問，羅斯柴爾德完全利用了金融環境的流動性，但是如果將他們的行為上升為「內部交易」或任何現代形式的欺詐，那就是一個時代性的錯誤了。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中的紐沁根——以詹姆斯為原型的德國猶太銀行家——通過一系列偽造的破產行為累積起了自己的財富。他把這些行動非常詳盡有趣地描寫了出來，但是它們在經濟學上根本說不通，他們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實際運作也絲毫沒有重合之處。實際上，似乎只有幾起針對內森錯誤運作行為的法律指控，而且只有一起指控最終成立。比如，1823年，一個購買1822年那不勒斯債券的人聲稱內森試圖扣留他的1255英鎊的存款：這個案子未被受理，而且似乎實際上是原告、一個名叫亨寧斯的倫敦玉米商人自己背信棄義（當法國入侵西班牙導致債券價格下跌時，他拒絕付款；在價格恢復後，他又試圖補交款項）。

針對內森被立案的指控出現在1829年，原告是一個叫做布魯克曼的人，他聲稱羅斯柴爾德家族存心給他提供一個糟糕的投資建議，然後收取買賣股票的費用，而事實上這些買賣根本沒有發生。布魯克曼聲稱，1818年，內森建議他賣出2萬法郎的法國公債，投資由倫敦分行發行的普魯士債券。這不僅是一個糟糕的建議——法國公債價格上漲了10%，而普魯士債券則下跌了7%——這其中還包含了欺詐的因素，內森並沒有將布魯克曼的法國公債賣給第三方，而是自己保留了下來。隨後，內森又採取了與布魯克曼指令相反的行動，賣出普魯士債券，重新買進了11 5法郎的法國公債。「與之前的情形一樣，原告一買進某隻股票，價格就會立刻下跌；然後原告被建議丟擲……而原告的公債賣出後，市場則再次上揚。」布魯克曼接著被要求將錢重新投進法國公債，但沒過多久就再次接到丟擲的建議。根據巴黎分行的賬戶記錄，每筆交易都會從布魯克曼的賬戶里扣除「交易、利息、中介費和佣金」等各種費用，但實際上，圍繞法國公債並沒有發生任何交易，它們一直停留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手裡。內森的律師試圖證明布魯克曼只是一個「老練的投機者」，受質疑的賬戶10年前就已經設立，其中的記錄是偽造的，但法庭並未採信。

根據法院的嚴厲判決，內森「不合理宣告」的罪名成立，他被勒令向布魯克曼支付「損失的或應該得到的錢」，再加上5%的利息和各種支出費用。可以預料到的是，這起案件激發了另一幅漫畫《知道如何討價還價的人》的浮現，它描繪的內森穿著舊衣服，拿著一個寫著「法國債2萬公債」的袋子（見圖2-9）。

但是，這種類似於紐沁根的行為得到重視，只是因為它似乎是獨一無二的。實際上，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這段時間內，更多的是扮演了欺詐受害人的身份，更不用說那些堂而皇之的盜竊了。1824年，一個叫多洛雷的法國人——他也在那不勒斯債券問題上提出了針對內森的指控，但並不成功——從倫敦分行以欺詐手段獲得了9670英鎊的匯票，然後在巴黎分行兌現。一年後，詹姆斯的一個辦事員盜取了大量紙幣（可能多達150萬法郎），他將那些錢藏在一條特製的腰帶裡帶出了辦公室。類似的盜竊案於1838年在紐考特也發生過，一個名叫薩穆埃爾·格林的18歲辦事員帶著一張2900英鎊的支票逃之夭夭。1839年，巴黎分行再次遭遇這樣的情形。6年後，馬德里遭遇了更為嚴重的一次盜竊案，價值4萬英鎊的黃金和證券被盜。1845年，一個價值5600英鎊的裝著西班牙金幣的箱子在倫敦運往巴黎的途中被盜。而且，欺詐和盜竊並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必須面對的所有威脅。1863年，一個在交易所損失慘重的年輕人試圖用威脅信敲詐詹姆斯10萬法郎。這些罪行可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為自己的知名度必然付出的代價。因為在19世紀，還有比世界級銀行家更有誘惑性的目標嗎？

他無疑是熊和牛（指股市）的君王！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1）

西多尼亞已經預見到……歐洲經過了25年戰爭的折磨後，必定需要資金維繫和平。他的遠見收到了應有的回報。歐洲確實需要錢，而西多尼亞也做好了借錢給歐洲的準備。法國希望能得到一些資金；奧地利希望得到更多；普魯士需要一點兒；俄羅斯需要幾百萬。西多尼亞都能夠滿足它們的全部要求……我們不難看出，經過10年的拼搏，西多尼亞已經成為歐洲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他在大多數主要城市派駐了一個兄弟或可以信賴的親戚。他是世界貨幣市場的主人，當然也幾乎是一切事物的主宰。他毫不誇張地將南義大利的收入作為提供貸款的抵押；所有國家的帝王和大臣們都期望得到他的建議，並且在他的建議引導下行事。他仍然精力十足，而且不僅僅是一部賺錢的機器。他擁有與他的地位相稱的睿智，如果能從自己巨大的企業中得到一些休息的機會，他希望將精力投入到公益事業中去。但是在他的財富達到巔峰時，他卻溘然長逝。

——迪斯雷利《科寧斯比》

#### 婚禮與葬禮

1836年6月15日，一場婚禮在法蘭克福舉行。新娘是卡爾的女兒夏洛特。她在兩天前剛滿17歲，她的美貌得到了大家的公認。夏洛特未來的婆婆——一位苛求的「法官」——發現她「真的如其他成員說的那麼漂亮，而且彬彬有禮」，「單純而且親切」，這不僅僅是家人對她的評價。當本傑明·迪斯雷利在次年第一次碰到夏洛特時，他被她「高挑，優雅，清澈」的外形深深打動：她看起來「像是穆律羅（西班牙著名畫家）的畫中人」，受到「全世界的景仰」。他小說中的兩個人物便是以夏洛特為原型——《坦克雷德》中的埃娃·貝索以及《恩迪米恩》中的那沙泰爾夫人——兩個人物都十分迷人，帶著異國的美麗，尤其是前者：

她的臉帶有東方美人的完美特徵；這樣的美人只有伊甸園裡才有，只有在人們最嚮往的地方、最喜愛的種族中才能偶爾發現……橢圓形的臉蛋，小巧玲瓏。膚色既不淺也不深，它擁有北方的明亮，卻少了它的乾枯，擁有初升太陽般的光暈，卻少了它的溼氣。她的臉上

滿是柔和與寧靜，面板如此白皙，你偶爾能夠看到脈絡隱約顯現的美妙景象，猶如漂亮水果表面美麗的光影一般。她的雙眼和它們圓圓的弧度訴說著所有的東方之美……

她的新郎——也是她的堂兄——內森的長子列昂內爾，此時27歲，已經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商人，最近在父親接手的西班牙複雜交易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從他的信件內容判斷，他是一個比較嚴肅認真的年輕人，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作為長子所承擔的巨大責任——維持他父親所取得的偉大的金融成就，同時也提高了對猶太人解放事業的認知，不僅僅要在他出生以及成長的英國推進猶太解放運動，而且要擴充套件到全歐洲。他外形俊朗，毫不多情。

數週以來，家族的女性一直在法蘭克福準備著這件大事：居特林，一對新人的祖母，此時已經82歲；他大兒子阿姆謝爾的妻子埃娃；新娘的媽媽阿德爾海德；還有列昂內爾的姐姐夏洛特——她在10年前嫁給了堂兄安塞爾姆，已經生育了3個孩子，另一個也即將出生。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法蘭克福的房子被「洗刷一新」，以招待出席婚禮的家族成員，房子主要有：位於法蘭克福北郊的阿姆謝爾的房子，當然還有他心愛的花園，並且有位於蔡爾的奢華城中住宅；安塞爾姆新近在新美茵茨街獲得的「宮殿」；此外還有卡爾在法蘭克福期間住過的房子，它與安塞爾姆的新家在一條街上。位於猶太街的家族老房子——居特林仍然堅持住在那裡，儘管她的兒子們富甲一方——似乎沒有被考慮用做盛會的場所。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2）

在倫敦的羅斯柴爾德成員中，列昂內爾是第一批到達的人；他最小的弟弟邁耶當時已經在那裡，當時他即將完成在德國的學習。他們的父親6月初從倫敦啟程趕往法蘭克福，同行的還有漢娜以及兩個未婚的女兒：活潑好動的漢娜·邁耶和喜愛音樂的露易絲。留在倫敦照看紐考特辦公室的是內森的第三個兒子納特。另一個兒子安東尼當時在巴黎，他在那裡也將扮演與納特類似的角色，因為他的叔叔詹姆斯也將前往法蘭克福。詹姆斯6月4日動身前往德國，他的妻子貝蒂以及4個孩子（11歲的夏洛特、阿方斯、居斯塔夫和還是嬰兒的薩洛蒙·詹姆斯）先他一步啟程。他們8天后抵達法蘭克福。詹姆斯的哥哥薩洛蒙與他的兒子安塞爾姆先他們一步從維也納趕到了法蘭克福。薩洛蒙他們自然

地住進了新美茵茨街的房子裡，安塞爾姆的妻子夏洛特已經在那裡等候他們了，不經常去法蘭克福的訪者被安排住在賓館裡：倫敦的羅斯柴爾德成員被安排在羅密斯徹?凱瑟爾酒店，巴黎的羅斯柴爾德成員住在魯斯切霍夫酒店。在一切準備就緒的時候，總共有36個家族成員聚集到了法蘭克福。或許這並不讓人感到驚奇，宴會幾乎沒有邀請其他賓客：現存通訊中提到的唯一「外人」是邁耶的導師施萊默博士以及詹姆斯和列昂內爾共同的朋友、作曲家焦阿基諾?羅西尼，其角色僅僅是「活躍我們宴會的氣氛」。

安東尼第一次被獨自留下掌管巴黎分行，他感到侷促不安，儘管這更多是由於無聊，而不是職責負擔所致。「我精神很不好，」他向同樣獨自一人留在倫敦的納特抱怨說，「沒有什麼比獨自一人待在這裡更讓人討厭的了。一切都那麼單調.....你自己一個人如何取樂？你比我在這裡還要好一些，他們全部走了，關了家門，我每天只能在一家餐館吃飯。」巴黎市場處於傳統的「夏季憂鬱期」，他的叔叔詹姆斯從布魯塞爾——詹姆斯和內森在那裡短暫停留處理生意——發來的指示並不鼓勵他拓展新業務：

在我看來，你應該試著把一切事務放到一邊，直到你父親回來；如果有人向你提出建議，你應該回復說，需要首先諮詢你父親的意見。這樣做你會得到一些時間和一些平靜。聽從我的建議，抓緊你的錢，不要亂花。

與他形成對比的是，納特壓力重重，因為內森更希望他離開的時候可以讓兒子忙起來。他剛抵達法蘭克福就發回了一封讓人焦慮不安的信件，不僅敦促納特買賣證券，同時還間接地向巴黎的安東尼施加壓力：

你必須要讓安東尼注意賣出，因為他屬於「牛派」，不喜歡賣出。當價位較低時，你可以買進一些，並且要鼓勵比利（安東尼）做生意，同時寫信給他。你對他的匯款以及所做的一切都感到滿意和高興。我已經寫信告訴他，讓他每天不管價格如何都要做些事情，你也可以這樣寫信告訴他。

幾天後——在詹姆斯抵達法蘭克福前——內森直接寫信給安東尼，要他「維持生意運轉」並「讓自己忙起來」。無論是安東尼還是

納特，接到父親和叔叔截然不同的指示都讓他們感到很不舒服。

列昂內爾也有些不高興。他等不及想要結婚。儘管這次結合只是一次包辦婚姻，主要目的就是加強倫敦與那不勒斯家族分支之間的聯絡，以便阻止家族寶貴的財富流到外人名下；但他實際上已經愛上了他未來的妻子，或至少已經說服自己相信了這一點。他同時也急於離開法蘭克福。他在寫給安東尼的信裡說，他「越早離開美麗的法蘭克福，越讓人高興」；與所有在英國長大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年輕成員一樣，他發現父親的出生地不僅地理位置偏僻，而且社會環境也讓人覺得不舒服。在法蘭克福，即便他和他的家族某些程度上已經擁有地位和權勢，但猶太人整體仍然要屈從於法規歧視，這種情況在巴黎或倫敦已經比較少見。他的不安情緒隨著父親從布魯塞爾到達法蘭克福更加強烈，後來一系列的延誤情況更是如此。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3）

除了婚禮本身，這次大規模的家族聚集有兩個祕密的動機；這次聚會是19世紀羅斯柴爾德最大型祕密會議的其中之一，毫無疑問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列昂內爾與夏洛特的婚姻並不是家族歷史上的第一樁聯姻：我們也已看到，他們的叔叔詹姆斯在1824年娶了他們的堂姐貝蒂（也是詹姆斯的親侄女）；兩年後，安塞爾姆娶了他的堂妹夏洛特。這種家族內部通婚後來不止一次出現。唯一的問題，正如列昂內爾所說的那樣，便是「家族裡更為年輕的分支如何同意（聯姻）」；或更準確一些說，誰將被與誰撮合成一對。這也是眾多年輕的家庭成員出現在法蘭克福的真正原因：為他們尋覓潛在的結婚物件。因此卡爾的兒子邁耶·卡爾被試驗性地確認為列昂內爾最小的妹妹路易絲的合適物件；路易莎·蒙蒂菲奧裡被列為安東尼可能的妻子；約瑟夫·蒙蒂菲奧裡遭到了漢娜·邁耶和路易絲的「雙重打擊」；他們的哥哥邁耶被排除出詹姆斯女兒夏洛特未來夫婿的考慮人選。婚姻市場顯然為母親們提供了更多的消遣，但女兒們則不是這樣：漢娜·邁耶抱怨「每天可怕、單調的聚餐」，中間還穿插著德語和刺繡課。心裡慌亂的路易絲寫信給倫敦的哥哥納特說：「唯一解悶的事就是坐在祖母和埃娃嬸嬸中間，然後被塞得飽飽的，以至於難以呼吸。」單調和枯燥的環境只在每天跟隨羅西尼學習音樂時才得以緩解。

家族團聚的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生意。儘管他們習慣用定期通訊的方式確定大多數生意的決策，但有時羅斯柴爾德五兄弟也發現面對面探討是必不可少的。在1836年之前，詹姆斯跨越海峽與內森碰面，內森有時也會到巴黎去；薩洛蒙是五兄弟中最經常走動的一個，他經常前往巴黎，同時定期在法蘭克福與維也納之間遊走；而卡爾則把他的時間分成了兩半，一半是在做生意的那不勒斯，一半在法蘭克福，因為他將孩子放在那裡接受教育。不過這種定期走訪隨著兄弟幾個年歲漸大而逐漸減少，他們的生意以及家庭認同感越來越趨向於各自居住的地區。五兄弟最後一次聚首還是在1828年。

他們在1836年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事項便是他們將來彼此間的關係。我們也看到，自1810年以來，羅斯柴爾德公司一直是一個合夥人公司，主要建立在一個詳細、有法律約束力的合約以及不同合夥人的意願之上，後者決定了公司裡各個份額如何傳遞給下一代繼承人。每五年修訂一次合夥協議已經成為一個傳統：因此1815年、1818年和1825年出現了新的協議；1825年薩洛蒙的兒子安塞爾姆成為合夥人後備人選，1828年再次簽訂新協議時，他正式成為合夥人。從那時起，內森三個比較年長的兒子都進入公司開始他們的學徒生涯。到1836年，內森覺得他最大的兒子已經做好了準備，可以跟隨安塞爾姆的步伐成為一名合夥人，兄弟幾個這次會面的主要目的，就是討論批准列昂內爾成為合夥人的事情。

除了新合夥人協議，兄弟幾個還需討論其他一些事情。1836年是他們在西班牙業務史上關鍵的一年，那裡一場血腥的「內戰」正在上演；與此同時，還有準備與希臘、那不勒斯以及比利時進行的交易，幾個兄弟在這三個國家都有切身利益。此外，三個兄弟已開始參與一個全新的生意裡：資助鐵路建設。尤其是詹姆斯，他深深地捲入到爭奪快速發展的法國鐵路網的控制戰當中——這項生意某些程度上依賴於他通過內森聯絡上龐大的英國資本市場。但是，內森自己是否同意公司業務的新方向還很不明朗。英國鐵路第一次「狂熱」在1836年達到高峰，至少29家新的鐵路公司掛牌營業；但是內森並沒有參與其中。他的首選是將倫敦分行的觸角伸到美國去，繼續主營政府貸款和貿易金融業務，而不是投資在工業領域。但是，這其中也存在需要討論的事項，不僅僅是因為大西洋彼岸也正醞釀著金融危機，還因為在



幾兄弟會面前夕，美國金融危機的跡象已經開始顯現（倫敦出現了貨幣緊縮現象）。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4）

幾個合夥人之間的協商繼續以嚴格的祕密方式進行：所有其他家庭成員一律不得參加。「他們現在全部聚齊了，」列昂內爾向他的兄弟報告說，「這是說，四個人單獨聚在爸爸的房間裡，我們則被關在了外面。我認為爸爸說了一些關於我們要獲得倫敦利潤份額的事（意即增加一個合夥人）。他們似乎同意了他的提法。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會與他好好說話，解決所有事情。」「家族事件安排進行得非常平和，」他的母親漢娜認為，「不存在分歧。」到6月12日，似乎內森已經達到目的，而且沒有遇到他兒子擔憂的「憤怒的話」：

爸爸提議，我們應該獲得倫敦分行一半的利潤，他也只需獲得其他分行一半的利潤。所有的事情立刻得到了同意，沒有任何異議。我並沒有在房間裡，但今天早上卻聽說了這件事.....我肯定你知道這件事也會很高興，他們彼此也很高興，一直沒發生爭執.....他們對各個現金賬戶的狀況感到非常滿意，他們沒有想到幾個分行會如此繁榮。

「所有各方」似乎都「願意保持和平」。這種兄弟間的和睦顯然有些不尋常。「直到現在，感謝上帝，他們兄弟之間沒有出現一句氣話。」列昂內爾在信中顯然也感到十分驚訝，「他們在爸爸的房間以及賬房裡度過了大部分時間，然後一起在家裡用晚餐。」非常罕見地，五兄弟達到了他們所信奉的三句箴言中的第一個標準——「和睦」。法蘭克福藝術家莫萊·丹尼爾·奧本海姆捕捉到了這種和睦的氛圍，充分體現在了他的畫作中。

只有一個陰影一直懸在五兄弟協議以及婚禮之上，那就是內森·羅斯柴爾德面臨死亡的事實。說得準確一些，他病了；沒人能夠想到，這個自他們父親於1812年去世之後就一直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領頭人，會在他的權勢達到巔峰狀態的時候突然死去。在布魯塞爾時，內森就出現了舊病復發的跡象，可能是坐骨直腸窩膿腫。正如他妻子所說的那樣：「一個最不受歡迎的訪客再次拜訪了他，一個最不方便的地方生了令人難以忍受的毒瘡，這讓他非常氣惱，尤其是坐下來的時候。」他的兒子說得更為直白：「爸爸的屁股上長了一個可怕的毒

瘡，他受盡了折磨。現在只能臥在床上，經受了難以忍受的苦楚。坐馬車的旅程加重了病情，因此他現在需要大量休息。」

內森·羅斯柴爾德最後的病情以及死亡是一個研究19世紀醫藥匱乏的案例。可能並不是德國醫生的干預治療「殺死」了他們的病人，這種治療的目標就是放出膿血，這並非沒有道理；但是這會給內森帶來難以忍受的劇痛，因為當時沒有任何麻醉劑。在內森抵達法蘭克福後不久，醫生就實施了穿刺手術，但另一個膿胞很快出現，「與第一個（膿包）一樣給他帶來了疼痛，並限制了他的行動。」「親愛的安東尼，」焦慮不已的漢娜寫信說，「這讓人非常擔憂，因為這些（病痛）太痛苦了……但是醫生向我們保證不會有危險。你知道爸爸如果生病，他根本受不了。」列昂內爾在6月13日報告說：「大開孔的情況很好，不會有其他手術。切利亞斯教授今天早上抵達這裡，發現兩個傷口的好轉情況超過了他的預期；實際上，他十分滿意它們的好轉趨勢，並向我們保證，爸爸恢復健康只是時間問題。」他的母親也同樣得到「這位來自海德堡著名教授」的保證，「不會再有其他膿包形成，開孔狀況良好」。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5）

毋庸諱言，內森的病情影響了婚禮的喜慶氣氛。儘管新娘的父母決定繼續舉行原定於6月13日的舞會，但新娘自己覺得太過「焦慮」而不能出席。但是內森不同意因為他的緣故而推遲婚禮的意見。實際上，他堅持自己也會出席婚禮。婚禮那天，如他的妻子記錄的那樣，「他鼓起勇氣早上6點起床，走到夏洛特住的地方，這一切他尚能支撐，後來又穿上禮服，去到查爾斯（卡爾）的家裡，準備出席慶祝儀式。」「一切進行得非常順利。」如釋重負的新郎下午能夠向當天未到場的兄弟們報告說。「爸爸身體恢復得很好，能夠來參加婚禮了……就如他抱怨的那樣，他是唯一感受痛楚的人，做到這些需要一點毅力，你們知道爸爸最不缺的就是毅力了。不過儀式只持續了半小時，而且很肅穆……它進行得異乎尋常的順利，因為爸爸到場，我們的家族完美無缺。」實際上，內森似乎特地淡化了他的病情，試圖「開各種玩笑……縮短令人尊敬的拉比的演講，讓到場的人忍俊不禁。」這其實是在掩飾。儀式一結束，「他就被極度的疼痛擊倒，與往日一樣，這種病痛大約在下午2點出現，持續6個小時。」他並沒有

回到旅館，而是被抬到他女兒家裡的床上。一對新人則出發去威斯巴登度過為期24小時的蜜月，越來越煩躁的內森再次接受了醫生的手術。儘管他忍受了「所有手術，嘴裡微微地哼著歌」，但他此時已經十分擔憂，堅持讓在紐考特的醫生兼鄰居本傑明·特拉弗斯趕到法蘭克福。

整整6個星期，整個家族只能默默地等待內森康復。到6月底，他已經好了很多，可以繼續通過列昂內爾向納特發去口述指令，但是合夥人協議的最後談判被推遲了——主要是因為詹姆斯，他抱怨眼睛疼痛，需要泡溫泉。列昂內爾也顯得難以忍耐。「爸爸恢復得很好，但是很慢。」他對兄弟們說，「每天，全家人都在一起用晚餐，冗長而且單調。他們一整天只是從這個房子跑到另一個房子，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說。」但是醫生們繼續進行治療並排出傷口裡的膿血，傷口並沒有出現真正好轉的跡象。內森在「蘇打水、熏衣草、橙子和水果」中尋找緩解痛苦的一絲安慰，這些東西全部是信使從倫敦運送過來的。「第二個（傷口）今天早上進行治療了，」列昂內爾7月9日報告說，此時距內森抵達法蘭克福已經有一個月，「爸爸以最大的勇氣接受了手術，一直在開著玩笑。傷口比第一個要大，因為膿包非常深，那一定非常疼。」病情一直沒見好轉，越來越明顯的金融危機可怕地對映了內森的病情。

最終，在7月24日，內森陷入了「持續」高燒，情況「十分危急」——可能是敗血病引起的症狀。第二天，在一種焦躁、近乎昏迷的狀態下，他把兒子叫到身邊。焦慮不已的列昂內爾寫信給納特說：

他立刻讓我寫信，希望你繼續賣出英國證券和國庫券以及2萬英鎊的印度股票。你同時還要寄一份手頭持有各種股票數量的賬目過來。我不知道我是否錯誤地領會了他的意思，但是我不想他再解釋。（他還）要你賣出.....葡萄牙政府用做還賬的證券，不要在意一個或兩個百分點（的損失）。

對列昂內爾來說，所有這些拋售——而且不在意多達2%的損失——似乎與父親的性格並不相符，以至於有些難以理解。突然，他意識到父親可能感覺自己快死了，納特和安東尼隨即準備前往法蘭克福。7月28日，在他們趕到之前，內森的兄弟、妻子和兩個兒子守在他跟前，他此時已經奄奄一息。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6）

這是羅斯柴爾德公司歷史上決定性也是最痛苦的一刻：在新的合夥人協議簽署之前，家族的領頭人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薩洛蒙在弟弟去世後的兩個星期內寫給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信中說：「我們已經確定了今後3年的協議，敲定了每個細節，只等著簽署了，因為我們仍然相信，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的兄弟能夠康復。但是，事未遂人願。」不過內森還是有足夠的能量進行最後一次的全權指揮。薩洛蒙描述道：「去世前3天，他告訴了我有關遺囑的所有想法和願望，然後草擬了出來，我隨後按照他的意思全部寫了出來。」內森此時的意識已經不那麼連貫，兄弟們評價說，他一會提出「更有決定性的要求」，一會「他的話又被疼痛打斷、湮沒」。但是他留給整個家族的資訊十分明瞭。最重要的，他們要維持「和睦，長久的相愛和緊密的團結」——與他父親的遺願如出一轍。這些話在實際中意味著什麼，他也給出了詳細的說明。

第一，內森要求他的兒子「繼續保持以我的名義創立的倫敦分行和睦」。第二，他強調兒子們做這些事的時候，必須諮詢他們的母親：「我親愛的妻子漢娜.....在所有重要的事務上將與我的兒子們合作，在所有諮詢事項上有發言權。我衷心地希望，他們進行任何重要的交易前，都應該先諮詢他們母親的建議.....」第三，他急切地希望：

目前由我的4個兒子打理倫敦公司，與我4個兄弟主導的其他分行之間能夠維持聯絡，也繼續把合夥人團結在一起.....因此，我建議我的兒子們在生意中，能夠一直遵循我兄弟們的建議和推薦.....

最後，正如他的兄弟們回憶的那樣，內森對新合夥人協議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

臨終前，內森讓我更改合約，改為與他的兒子們籤，裡面的條款5年內不得失效.....這樣一來，N?M?羅斯柴爾德公司（即倫敦分行）就不會有什麼變化，他的4個兒子以一個整體出現，在合夥關係裡只享有一個投票權。其他4個兄弟以及N?M?羅斯柴爾德公司的全部資金今後5年內不得染指，任何人不能撤出運作資金，同時我們把從其他4個分行獲取利潤的份額降到3%，如此一來，合夥人關係在上帝的幫助下，在

今後5年裡會有進一步的提升，因為能夠被動用的基金比例減少了，年輕人也就不必要捲入投機冒險中去。

這些願望也全部適當地收錄進了匆忙起草的補充協議裡。未來的實際操作條款也被確定，內森提供了一些建議：

他要求他的長子和其他沒有趕到的兒子要盡一切努力保持生意的完整性，不要從事任何高風險的投資。他給了他們很多中肯的建議，要求他們躲開一切邪惡，堅守美德、正直以及對信仰的忠誠。我故去的兄弟告訴他們，現在整個世界都試圖從我們身上賺錢，因此要更為小心。而且他評價說，每個兒子是否得到5萬英鎊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意義。重要的是，他們能夠緊緊地團結在一起。

薩洛蒙寫道：「在掌握了一切權力的時候，他死了；去世前10分鐘，按照我們的習俗給他臨終禱告時，他說：‘沒有必要為我祈禱這麼多，因為，相信我，以我的良知來說，我沒有罪。’然後他又轉向我的女兒貝蒂，她向他告別時，他用非常英國的方式說：‘永遠晚安了’。」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7）

5天后，一隻信鴿從布洛涅將訊息紙條傳到了倫敦，上面只有簡單的3個字：「他走了。」

#### 遺產和傳奇

整個19世紀，只有少數幾個人的去世帶來的經濟影響能夠趕得上內森·羅斯柴爾德去世所帶來的衝擊。一年前，奧地利國王弗蘭西斯去世時，維也納股票交易所發生了小規模的恐慌，奧地利政府債券價格急速下跌；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干預再次抬升了市場。當時，內森的病逝就如市場最大的支柱倒了一般。在他去世的訊息正式公佈前一週，金融媒體就一直焦慮地報道著他的健康狀況。7月27日，《泰晤士報》（錯誤地）報道說，內森的病情「一點也不危險」。8月2日，它又斷然否認了其他報紙報道的內森已經去世的訊息。但是，正如「貨幣市場與城市情報」專欄承認的那樣，倫敦城的看法不那麼樂觀：

根據法蘭克福的訊息，羅斯柴爾德先生的狀況仍然非常危險；今天，這再次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證券帶來了影響，它們的價格又下跌了15%.....似乎人們普遍認為，公司可能會召回羅斯柴爾德先生之

前放出的貸款，因此焦急的借款人將丟擲他們的股票，以便還款。今天出現了大量拋售的情形，但是由於市場本來就已虛弱不堪，因此成交的數量可能不大……股票市場今天幾乎沒有生意可做。統一公債的價格從星期六的衰退中恢復了一點，表現得非常堅定，因為法蘭克福傳來的訊息使整體市場利好。

當內森去世的訊息最終在第二天得到證實後，市場反常地只出現了輕微的震盪，說明市場持久的關注已經降低了這件事的衝擊力：

所有型別政府證券，尤其是那些外國市場裡的政府證券因預計這件事即將發生，其價格一週以來一直處於下跌狀態，但是訊息得到證實後，它卻帶來了相反的效果，可能是人們認為他的生意在他兒子的管理下，將一如既往地運作。

但是，這只是暫時的現象。因為內森的死恰好遇上或可能加劇了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這場危機在他生病期間一直髮展著。

1834年5月～1836年7月間，國際金融處於一個總體平穩的狀態。統一公債的價格只有幾周的時間低於90點，價格高於91點的時間持續了6個月。但是從8月第一個星期起——內森去世的訊息公佈——直到年末，公債價格一路向下，在11月達到了最低點87（見表3-1）。就在幾天前的7月21日，銀行利率（實際上是英格蘭銀行的基準貸款利率）9年裡第一次從4%上升到4.5%。9月1日，它再次上調0.5%。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損益表顯示，1836年倫敦分行遭遇了1830年革命後的第一次虧損——總額超過了全部資金的4%。這些虧損情況有可能發生在下半年。

表3-1：1836年3%利率統一公債周收盤價

來源：《投機者》。

內森在《泰晤士報》的訃聞記者——可能是他的朋友托馬斯·馬薩·阿爾薩格——稱內森的死是「倫敦甚至全歐洲最重大的事件，它已經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他並沒有誇大其詞：因為他的「金融交易肯定已經遍佈了整個歐洲大陸，也可以說，過去的歲月裡，他對所有的貨幣生意都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力。」亞歷山大·巴林評價說：

「所有股票的異動以及它們價格的劇烈波動似乎大多由內森的死引起。最終，貨幣市場的解放將是一件好事，但是一種專橫法則的突然

消失很容易造成這些動盪的現象。」幾個月後，戴維·薩洛蒙斯論述貨幣事務的小冊子裡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形容內森的死是「重要的事，能夠引起國家的流通混亂」：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8）

眾所周知，那個著名的人是如何靈活地管理匯率；他如何自豪地利用龐大的資源，因此他的任何一項行動都不需要從英格蘭銀行提取並長期持有黃金（或白銀）；儘管這迫使他需要將匯率維持在一個人為的狀態中，並最終會帶來壞的結果，當這種人為的支撐在一個不適當的時機突然撤回，必然惡化已經顯露出破壞力的市場狀況。自他死後，我們所經歷的困難告訴我，在平衡匯率方面，沒有誰的能力能夠超過他（內森）；我將後來大多數窘境歸結於積極性、熱情以及事業心的匱乏，而這些正是他在金融艱難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儘管他的銀行的所有業務活動將繼續下去，但是絕不可能有人能立刻取代他的精神影響力，那個公司的領頭人的良好判斷已經得到了大家的公認，他的這一聲譽不僅傳遍了英國，而且響徹整個商業世界。

因此，金融世界對他給予了高於一般人的尊敬是可以理解的。如《泰晤士報》描述的那樣，8月8日早上給內森送葬的佇列：

由4人一排的警察方隊帶領，後面是一名騎著馬的巡視員；再後面是另外一些官員，他們身後跟著的便是靈柩了。他的兒子和直系親屬坐在送殯車裡跟在靈柩後面；所有車輛達40輛，上面坐著的是戈德斯米德、科恩、薩穆埃爾和伊斯雷爾等家族各個分支的成員。送殯車後面是亡者與兩個兒子的馬車，他們後面是市長謝里夫·薩洛蒙的馬車以及一長溜兒外國大使以及貴族們的馬車，這些車輛的數量為35輛。因此整個隊伍由75輛馬車組成；整個隊伍穿過康希爾用時超過了15分鐘。由於前來圍觀的人為數眾多，許多店鋪不得不關上店門以防窗戶被人群擠破，而且沿路沒有一個窗戶前不是擠滿了圍觀的人。

整個場景近似於紀念。隨後出現的石版畫《偉人的身影》刻畫了已經眾所周知的內森側面剪影，他還是站在皇家交易所的柱子前，手裡握著4把鑰匙，象徵著繼承他事業的4個兒子（見圖3 1）。這一影像也被幾位不同的藝術家複製，包括內森的一名辦事員（見圖3 2）。

就在葬禮後兩天，蹺腳詩人威廉·赫塞爾廷出版了他的《N·M·羅斯柴爾德先生墓前的沉思》，詩文以陳詞濫調的文筆頌揚了「這片土地上的大富豪」，不過也反映了一點現實：

.....時光倒流，歐洲的國王  
尋求並發現了你的援助。  
在許多血腥的勝利，  
以及大量的恐慌裡，  
你的黃金比他們的劍收穫得更多.....  
在你人生奮鬥的旅途上  
既有引路的明燈，也有灰暗的陰霾，  
從艱辛、懸疑和爭吵  
到最終的勝利！  
從那時起，與自私、狡猾、善於奉承之徒  
一直不斷的衝突中，  
你灌輸了自己的精神。  
這是何等的奇蹟，儘管沾了一點兒瑕疵，  
但包容了你內在的價值。  
儘管在一個陌生人看來有些冷漠，  
但你的心慷慨無比，  
你也不像巴斯樹（有毒的樹），  
令周邊的灌木枯萎；  
你身邊的朋友，得到了庇護，  
隨著你的成功而昌盛  
安全而又富足：  
就猶如來自埃及的救星，  
一切以以色列的名義傳頌。



市面上出現了紀念內森的戒指和胸針，還有一種鑄有內森頭像的徽章。甚至還有一種印著圖案的紀念圍巾，上面仍然是站在柱子前的內森，同時還有簡潔的頌詞（以四種語言呈現）——「傑出的商業才能和事業心，偉大的善舉和樂善好施的行為」——還有他最著名的貸款和總資產的表格。這些紀念物（就如圍巾上用多國語言寫就的頌詞所表明的那樣）也受到了國際範圍內的關注。圍巾在維也納也進行了銷售；赫塞爾廷的詩句也激發了類似的德國頌歌；訃聞不僅出現在英國媒體上，同時也出現在法國的《辯論日報》和德國的《彙報》（薩洛蒙從中策劃）之中。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9）

毋庸諱言，不僅僅是金融領域對內森的死感到哀傷。就如《泰晤士報》報道所描述的，外交和政治圈的要人也出席了葬禮：弔唁者當中有普魯士、俄羅斯、奧地利和那不勒斯的大使，以及斯圖爾特勳爵，有人說馬爾伯勒公爵也在其中。當時，猶太社群居民也成群結隊地出現在葬禮現場。「大量猶太人……葬禮開始前的幾個小時就聚集到了那裡」，此外還有猶太人自由學校的孩子組成的特別隊伍負責抬靈柩。在公爵廣場的猶太大教堂，首席拉比所羅門·希舍爾做了佈道；內森的遺體最後安葬在懷特查珀爾路猶太墓園的西北角。猶太大教堂的7名成員每天前往紐考特，以滿足進行祈禱所需要的男性成員人數，按照猶太教傳統，為亡者祈禱需要至少10名13歲以上的男子。

我們如何解釋公眾對於一個德國出生的猶太銀行家的死如此超乎尋常的興趣？最明顯的答案是，內森·羅斯柴爾德是英國最富有的人，鑑於英國當時的經濟領導地位，他幾乎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與四個兄弟共同運作的五家銀行的資金中，到他去世為止，他的份額為1478541英鎊（佔總資金的1/4）。他在去世前還給了孩子大約80萬英鎊，他在遺囑中能夠留給兒子和其他家庭成員另外的1192500英鎊。這意味著內森的全部財富——不包括他在皮卡迪利以及岡納斯伯裡花園的資產，但包括訂立遺囑前給孩子們的錢——大約為350萬英鎊。

這筆財富遠遠超出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倫敦財產最接近他們的競爭對手——巴林兄弟，後者的資金在內森去世那年只有776650英鎊。他也輕易地超過了同時代工業家所積聚的財富，以及繼承祖業的英國最富有貴族地主的財富。在魯賓斯坦羅列的英國百萬富翁的名單中，

並沒有具體指明1858年前財富超過100萬英鎊的人；但是名單中出現的1810～1856間的11位人物，留給繼承人的財產能夠比得上內森的，最接近的是銀行家威廉·J·丹尼森，他在1849年留下的遺產為230萬英鎊，其中包括價值60萬英鎊的房產。直到1857年，才有留給後代的遺產多過內森的人——紡織品倉庫老闆、英裔美國銀行家詹姆斯·莫里森，他留給後代400萬～600萬英鎊的遺產。內森死時不僅比鋼鐵大亨理查德·克勞謝和棉花紡織商羅伯特·皮爾和理查德·阿克賴特要富有，同時也將昆斯伯裡公爵、薩瑟蘭公爵和克利夫蘭公爵遠遠地拋在身後。

當然，要比較內森以金融資產形式為主的資產與大地主的財富孰多孰少實非易事。但是，不同形式的資產帶來的收入是可以比較的。目前能夠找到的資料顯示，少數幾個貴族擁有相對豐厚的收入：諾森伯蘭公爵，格羅夫納伯爵，斯塔福德侯爵以及布里奇沃特伯爵在1819年，「除去所有（開支）」，另外還有10萬英鎊的收入；距離他們不遠的是貝德福德、里士滿、薩瑟蘭、巴克盧公爵、威斯敏斯特、位元侯爵，以及德比、朗斯代爾、達德利和萊斯特伯爵。舉一個例子，第六位德文希爾公爵在內森去世的那個10年裡，收入在8～10萬英鎊間。與此對比，內森在去世前5年（以倫敦分行的平均收入作為近似數額）每年平均收入為87623英鎊。

但是，這些數字忽視了內森相對於同時代貴族擁有的金融優勢的一個重要因素。他有債務人，後者則欠債。截至19世紀30年代，德文希爾公爵奢華的生活方式已經使得債務成為他的一個沉重負擔，欠債總額從59.3萬英鎊上升到了70萬英鎊；這些債務的利息消耗了他一半的收入，每年還有3.6萬英鎊的收入要支付查茨沃思的家庭開支。實際上，就在內森去世的時候，大量的地主遇到了財務危機。到1844年，德文希爾公爵的債務離100萬英鎊只差一點點兒，他不得不賣出更多的土地以便於週轉。1848年的時候，白金漢公爵實際上已宣告破產，當時他的債務超過了150萬英鎊。內森·羅斯柴爾德死後「留下5000萬英鎊財產」的傳言自然引起了公眾的好奇甚至驚訝，因此它也出現在了紀念圍巾的正中間。這個數字可能有少許的誇大，但是這完全可以理解。從淨資產的數額來講，內森確實是無人觸及。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10）

更值得注意的是，內森·羅斯柴爾德去世時的身家比他剛到英國時多了多少。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抵達英國時只有2萬英鎊。此外，他一路打拼，從紡織行業起步，闖進了倫敦；他在英國最初的經商生涯是曼徹斯特的一名布料商人。與19世紀大多數富有的猶太人不同的是，他真的是「白手」起家，最終成了富豪。因為這一點，他完美地闡釋了19世紀正在形成中的自力更生理念。當然，他也不是唯一富有的羅斯柴爾德人。米爾施泰因的資料顯示，詹姆斯可能已經是法國最富有的人。在不那麼繁榮的歐洲大陸，阿姆謝爾、薩洛蒙和卡爾領先對手的距離甚至更大。幾個兄弟加在一起，羅斯柴爾德家族無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

尤其對較為貧困的猶太人來說，內森超乎尋常的致富故事有著近乎神祕的重要意義——因此出現了「希伯來護身符」的傳說，內森好運的來源將他與猶太傳說聯絡到了一起。這個不尋常的故事——其中的一個版本由一個匿名作者發表，那時內森去世僅過了4天——也是所謂的「羅斯柴爾德神話」早期最為怪異的一個事例。儘管故事的作者很明顯是個猶太人，但是它實際上是一個反猶作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為它的語調具有明顯的挑釁性。實際上，故事引用了19世紀40年代公開反對羅斯柴爾德的小冊子的作者荒謬的論斷。

故事由一個神祕的幽靈講述，他自稱「厭惡……基督的追隨者，是一種最神聖、最炙熱的厭惡」，並且「因為一個基督徒的報復」而使得他「經受了多年的痛苦」。他是一個護身符的保管人，這個護身符能給持有它的人以魔力。「我不能駕馭黃金？我不是有護身符嗎？我說錯了什麼？不能買下整個邪惡的種族，從他們錯誤的先知到最低階別的魔僕？我不能用午夜的咒語驅使他們幹活？看！看到太陽升起，不足以讓我的族人感到高興嗎？」他的目標是將護身符送給一個「極為憎惡基督徒的人——這個人非常希望他們墮落腐化……他是猶太人為自己所受錯誤對待而採取報復行動的擁護者。」

這個幽靈在拿破崙佔領期間抵達了法蘭克福，他目睹了法國軍隊的劫掠場面。法蘭克福猶太人更是成為系統掠奪的目標。在猶太社群的一個遭到劫掠的辦公室裡，他遇到了一個年輕人，「他的眼睛紅紅的，含著眼淚，臉色蒼白而且憔悴，他哀嘆著，還有失眠帶來的困頓」。就在這時，一個法國士兵衝進了辦公室，要求得到更多的錢。

「‘亞伯拉罕、伊薩克和雅各布！’年輕人喊著，他跪了下去，顫抖的雙手伸向東方，‘（還要）多久，上帝！還要多久？……異教徒的勝利，你的人民淪為上帝的玩笑還要持續多久？」法國人不為所動，拿走了他僅有的一點值錢的東西：家族的神龕。法國士兵走後，年輕人「詛咒基督徒，以憤怒的語氣祈禱，希望自己能擁有打垮他們的力量，並以常人忌諱說的耶和華的名字發誓，他如果有機會一定拿走他們所有的財產，並踐踏、踩碎他們黑色而且不虔誠的心臟」。「現在，」幽靈說，「有了一個偉大主人的奴僕——有了一個適合偉大事業的擁護者。他的過錯……將使他成為仇視基督徒最忠誠、最熱心的信徒，無論那些基督徒在哪個國家。最終，這個人將建造起神廟，讓世界各個角落的猶太人感到敬畏並順從。」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11）

幽靈講述者於是現身（「穿著飄動的遠東長裙」，「加上灰白的頭髮和鬍鬚……慘白得像一具屍體」，「大大的黑眼睛，向前噴射著可怕的火光，任何凡人都不敢正視，在我面前無不戰慄」）。「我念著咒語，護身符再次託付給我受壓迫族人中的一個成員。」這次護身符是「一個戒指」。「我給了那戒指魔力，它可能擁有了偉大的所羅門封印的力量。做完這些之後，我命令那個年輕人說出三個願望，它們立刻可以實現；按照我的指示，他把戒指戴到食指上，接著聽從其他的步驟。」一個人走了進來（後來被證明是一個王子），卸下了他扛來的一袋金子，並把金子交給了年輕人。毋庸諱言，口袋裡裝著的金子「正是他第一次施展護身符魔力時大聲喊出的數量」。

「他是受詛咒和被劫掠種族的成員！」幽靈宣稱，最終揭示了他所選擇的人選的身份：

年輕的猶太人，我將護身符託付給了他，他將會見識它浩瀚的力量，那個人就是內森·邁耶·羅斯柴爾德。他的財富迅速增加，比任何人都要富有，他的財富震驚了異教徒。他們說的話非常有理，即如此讓人吃驚的財富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積聚起來，絕非人力所為——他們是正確的，它是護身符的力量。

隨後是內森從法蘭克福遭劫掠後的廢墟中成名以及致富的故事，篇幅雖短但帶著經典的神話色彩。「他遵照我指引的方向，進入了提

供貸款和投機的天堂裡，成為歐洲貨幣市場的主宰……變成了異教徒國王的貸款提供人、批發商和債主。」當拿破崙（受幽靈蠱惑）入侵俄羅斯，「羅斯柴爾德立刻決定了他走向毀滅的結局——而且無法回頭」。當拿破崙從厄爾巴返回時，「誰讓他的希望破滅？就是擁有護身符的內森·邁耶·羅斯柴爾德」。英國政府需要金錢支付威靈頓在滑鐵盧的軍事開支，同時賄賂「法國的將軍和議員」，使其背棄拿破崙。「只有一個人能夠也願意提供數百萬英鎊的金幣，這些錢是英國大臣所急需的。那個人是羅斯柴爾德。在我的指示下，他讓大臣得到了黃金……」

它暗示，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目的：內森借錢只為了「一個目的……猶太王國的重建——重建塔樓，哦！耶路撒冷！」

歷史肯定會說，最精心編制的拙劣玩笑就是猶太人羅斯柴爾德借錢給老基督徒利物浦勳爵，錢的數量足夠打敗拿破崙·波拿巴，他這樣做的動機是為了牟取25%的利息。如果這樣寫，寫歷史的人與平常一樣，是在撒謊……羅斯柴爾德被命令提供金錢……是為了換取猶太人重歸古老的民族；英國擔保猶太王國獲得獨立……12小時內，英國大臣得到了數百萬的金錢，羅斯柴爾德獲得了一項祕密協議，上面蓋有皇室的印章，英國承諾將拿破崙徹底趕出法國的21年後，將重建猶太國。

故事隨後發生了轉折：

到了今年（1836年）我的任務應該完成了；但是他，羅斯柴爾德……在第12個小時的時候被證明犯了錯……他長久以來的成功讓他越來越散發著銅臭氣……因此他親口說他已經卑賤地將猶太復國的協議賣了，用來換取一個小規模的英國猶太人解放法案，以及他自己的一個貴族頭銜；我聽到後並沒感到驚訝，更多的是傷心。這個令人欣喜的工作、這種高尚的交易應該接下來的一年中實現，屆時，散發著銅臭氣的高傲以及傲慢的背叛有望獲取500萬英鎊的價值。他已經有了4倍以上的錢了。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12）

當時，由於他背叛了導師，這些虛榮的夢想只能破滅。「他的護身符消失了，我讓他知道，它永遠地消失了。他再沒去交易所冒險，

或者說他的遺囑起草人將能夠節省很多麻煩和時間。」

我給他護身符，從而使他能夠讓他的家族擠入貴族階層？或者用財富的重壓矇蔽了他的良知？沒有一個猶太人能承擔得起這項偉大的事業，回望過去，好好生活。

在這個怪誕的故事裡，內森的死是因為未能履行將巴勒斯坦交給猶太人的承諾而受到的懲罰；幽靈繼續搜尋「上天任命的擁護者」來接受護身符。就如猶太版本的尼伯龍根傳奇魔戒被賦予魔力時，它就會使人道德敗壞；「希伯來護身符」的故事鮮活地刻畫了1840年便開始圍繞內森·羅斯柴爾德與他兄弟的神祕色彩。

這類傳說廣泛傳播便是很好的證明，內森去世後不久，美國一份報紙——很明顯不是猶太人的報紙——報道說：

「葬禮結束後，一些看守人將長時間守在墓園，以阻止任何可能發生的褻瀆亡者的事情發生。」有傳言說，有人出高價買他的眼睛——據說一隻「猶太人的眼睛」值很大一筆錢。

內森死後，一個神話誕生，它將被證明與19世紀的任何一個神話一樣，具有持久的活力和危險性。

### 繼承

現實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司令」去世後，這個家族的領導權「護身符」傳給了誰？傳統的假設一直是，五兄弟中最小的詹姆斯立刻繼承了內森的衣鉢。這也是他朋友海涅的觀點。海涅在內森去世後不久寫道，「自從他傑出的哥哥去世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所有政治影響力」全部集中到了詹姆斯手裡。「這個家族的首領，或更像是家族的大腦，是詹姆斯男爵，一個傑出的人……」海涅為何這樣說的原因也不難看出。在1841年3月寫的一篇文章裡，他將詹姆斯近乎描述成了一個金融帝王，在拉斐特街道「宮殿迷宮，財富營壘」的中心運籌帷幄。實際上，他注意到詹姆斯——效仿他哥哥內森——開始用「那些從他手裡貸過款的歐洲國王的半身像」裝飾辦公室。與內森一樣，詹姆斯的本性也咄咄逼人。「人們必須尊敬這個人，」海涅寫道，「只是因為他讓別人產生了這種敬畏之感」：

我最喜歡造訪他銀行的辦公室，在那裡我可以帶著思考去觀察人們——不僅是特定的人群，還有其他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卑躬屈

膝。你所看到的脊骨扭曲、彎折的情形，即便最高超的雜技演員做起來都有些難度。我曾看到，人們一接近偉大的男爵便會出現痙攣似的舉動，如同觸電一樣。即便走近他私人辦公室的門口，許多人都會產生一種敬畏感，就如摩西在他的門口，覺得自己好像站在何烈山上一樣，意識到自己站在一塊聖地之上。摩西於是脫去了鞋子，眾多敢進入詹姆斯辦公室的交易員或委託代理人都自願脫去了鞋子，當然前提是不必擔心自己腳上的氣味會冒犯到別人。

「內室實際上是一個非凡的地方，」海涅繼續說道，「它激發了巨集偉的思想和感覺，就如看到浩瀚的海洋或星光閃耀的宇宙一樣。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人的渺小以及神的偉大。」

當然，海涅也充分發揮了他的戲劇想象力，他描述了「一個股票投機家」在詹姆斯的「巨大」夜壺前，摘下帽子以示敬意；或者一個身份不明的朋友「願意不惜一切代價」來換取與詹姆斯共進午餐的榮耀。但是交易所一個小人物埃內斯特·費多的回憶生動地證明了詹姆斯在巴黎近乎帝王的地位，一個嘈雜宮廷裡的暴君，從早上9點開市到下午4點收市，他被一群阿諛奉承的交易員、投機商和食客隨從包圍著。費多回憶（他在19世紀50年代經常造訪拉斐特街）說，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13）

詹姆斯被迫接受所有這些沉悶、忙碌的人們的奉承，有時這些讓人厭惡。幾乎所有的人都奴顏婢膝，他們的懇求無趣遲鈍，他們的奉承奴顏屈從。詹姆斯靠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接過這些無趣的人遞給他的報價單，他很少看上一眼，有時會故意地把報價單扔進廢紙簍裡，不過通常情況下只是把它直接遞還，然後再轉向下一個人。

儘管費多日復一日地見到這些令人沮喪的場面，不過他從未停止過對詹姆斯的驚奇，「男爵在地獄般喧囂、令人困惑的混亂中，運作最為龐大的金融活動；每天都是如此，沒有片刻休息。」他的辦公室：

充滿著震耳欲聾、無休無止的聲音，關門以及拿著派遣單或尋求籤字的員工來來去去製造了無盡的喧鬧紛亂。尋求交易指令的交易商辦事員以及投機者為喧囂又增加了不少嘈雜，從而使得「男爵先生」的辦公室很像是巴別塔。在這裡，能聽到世界上所有的語言，包括希

伯來語。一群囊括了三種性別的人——男人、女人和乞丐——整天一個接一個地來到辦公室裡，詢問有關訊息。珠寶商會來到男爵的跟前，開啟他們的盒子，展示寶石；瓷器和藝術品交易商前來推銷他們的精品。漂亮的女人到處走來走去，憑藉自己的魅力蒐羅資訊或別的東西。在這個無盡折磨的過程中，百萬富翁的大腦在資料和計算不斷累積的情形下近乎爆炸，但他最小的兒子——個頭高，胖乎乎的一個小男孩，我至今還記得他的樣子——不時地衝進來嬉鬧，把父親的手杖當做馬來騎，還吹著他的小喇叭，就像是約薩法特山谷（《聖經》中的聖谷）的天使。

可憐的男爵沒有一句怨言，即便皺眉都很少見。

他「甚至沒有安安靜靜吃飯和睡覺的權利。無論冬夏，從早上5點開始，遞送以及等待訊息的人就圍滿在他的門前……如果生意需要，他就會和所有家人在辦公室旁邊的一個小房間用餐，用股票交易行情表作為佐料，而交易商仍然不斷地走到他的餐桌旁，無情地打斷他用餐」。實際上，對費多來說，詹姆斯有時並不像一個掌握宮廷的帝王，更像是一個被自己的職業道德監禁的囚犯。除了強迫性的習慣和值得讚美的職業野心，還有其他的原因來解釋為何一個如此富有的人仍然願意在如此繁重累人的條件下工作嗎？

但是，最終，由於詹姆斯對於其他人——包括費多所實施的「暴政」，人們對他的怨恨多過了同情：

他有一個惡毒的習慣……就是一句話不說，甚至看都不看來訪者，將他晾在那裡，一臉的尷尬；來者手裡拿著帽子，一條腿站著，將他的報價表依次遞給他（詹姆斯）的家人，後者也幾乎是看都不看一眼。一天，他對我耍這個卑鄙伎倆時，我表露出了一絲不悅，他感到必須對我施以恩惠，以便讓我平靜下來。那是在1月，桌上的盤子裡盛著大草莓。他用叉子挑出了一顆最美味的草莓，然後遞給我，就好像喂一隻鸚鵡一樣，並且說：

「你想吃一個嗎？」

費多自然被這種丟臉的對待弄得難堪不已，尤其是在詹姆斯的妻子和女兒都在場的情況下。但是，他勇敢地面對了這一切：

「您真是太客氣了，」我回答說，向後退了一步，



「但是我更想得到一個交易指令。」

男爵沒有感到不安。他的話讓我驚呆在原地：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14）

「現金買5股北方（公司）的股票。」

5股北方股份的價格大約為50法郎，我從這樣一個具有吸引力的交易中只能夠賺12法郎50生丁。

這種冷酷對待下屬的做法，按照費多的說法，司空見慣（這一說法也得到了亞歷山大·赫爾岑的印證，他在1849年造訪了拉斐特街）：

「你讓我非常生氣！那不是真的！讓我安靜一會！」這些便是他展示給我的禮貌……只要我對一個交易指令發表自己的看法，這樣的情形便會上演。需要牢記的是，由於他所用的怪誕語言以及他的口音，經常很難聽懂他說的是什麼。

一天，提及一隻股票的價格時，他暴跳如雷，把我的報價單撕成兩半，然後強迫我再次粘起來，並稱我是「該詛咒的白痴！」

其他人，甚至他的猶太同胞同樣得不到他的好臉色：「‘啊！你敢這樣，你這個該死的德國猶太佬！’有一天他罵一個去他辦公室的猶太同胞……那個不幸的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裡，灰心喪氣，啞口無言，臉色灰白。」一個名叫曼努埃爾的交易員敢於向詹姆斯說出自己的想法成為交易所神話的一部分。「早上好，男爵，」他進到詹姆斯的辦公室裡，然後說，「您今天怎麼樣？」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詹姆斯沒好氣地迴應說。

「您說得很對，」曼努埃爾大聲說道，「我站在這裡的時候，您或許會暴斃；而我才不在乎一條狗的死活。」

當時如此多的巴黎人認定詹姆斯是內森的繼承人，一點也不奇怪。

但是詹姆斯在羅斯柴爾德家族內部是否也有他哥哥那樣的權威，遠沒有那麼清楚。在內森死後，毫無疑問他立刻試圖將自己的權威施加到侄子們的頭上。他在1836年新的利潤分配時寫給列昂內爾以及他的弟弟們的信，以非常肯定的口吻說：

我請求你們，我親愛的侄子們，能夠耐心地讀我的信，因為我今天十分坦白，因為我非常希望按照我與你們過世的父親合作的方式，繼續與倫敦合作。不要（讓我）被迫寫言辭激烈的信，因為要管理好企業，只有在小生意上花費的注意力趕得上大生意上花費的精力才行。

信的後半部分內容指出了倫敦分行犯下的3個「罪過」。這些衝突在之後的10年裡不時地出現，詹姆斯經常掛在嘴邊的批評就是他的侄子們光顧著讀信，而很少回他的信。特別暗示內森在世時做事的方式，也並不是詹姆斯一個人這麼做，其餘3個兄弟同樣如此。「你們現在應該明白我當時是何等的正確，」薩洛蒙要人領情式地在1837年寫道：

我就生意問題曾寫信給你們，你們現在必須承認，我親愛的侄子們，我們必須推進生意。這是你們父親過去一直說的一句話。無論他什麼時候看到別人試圖將我們排擠出交易，他就會在信裡說：「我親愛的兄弟，我們必須渡過難關。」現在也是一樣，無論我們遭遇虧損或收穫利潤，無論我們賺到什麼或失去什麼，我們都不能讓別人騎到我們頭上，或將我們擠到一邊。我希望你們聽從我的建議，我親愛的侄子們，不管我們是收穫利潤還是遭遇虧損，我們都要推進生意。

不久之後，詹姆斯寫信給倫敦指出：「你們爸爸在世的時候，他通常會以2-5%的利率給我們提供貼現票據，但現在優質票據在倫敦也已按照3%的利率貼現，其他銀行在這方面會取得優勢……因此你們如果希望能夠與他們競爭並做生意的話，你們必須給我們提供同樣的條件。」阿姆謝爾也經常在這個問題上嘮叨。他和詹姆斯在1839年感慨道：「失去我們的兄弟內森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我們不能期望年輕一輩會表現出與上一輩同樣的尊敬、恐懼和信任。」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15）

就如詹姆斯抱怨貼現利率一樣，歐洲大陸的羅斯柴爾德分行抱怨最多的就是倫敦分行忽視他們的利益；這與內森生前出現過的指責一模一樣。實際上，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證明內森的兒子們成功地捍衛了他們相對自治的地位，從而使得內森去世一年後仍然會出現類似的指責。這種指責在這之後也一再出現。比如，1839年9月，詹姆斯指

責倫敦分行獲取了西班牙生意一半的利潤，但卻讓巴黎分行承擔了所有的風險。他抱怨說：「我認為唯一正確且合理的方式是，我們下一次的行動中，巴黎分行應該與倫敦分行承擔同等的風險，兩家銀行的地位平等，不能有一家凌駕於另一家之上。因為只要一家發現這類（不平等的）行為，就會引發不信任的感覺，那麼所有事情都會搞砸。這是絕對不能發生的事。」一週後，他再次訴說了他的「冤屈」。「只要我活著，」他對納特說，「我絕不會支援我們當中的一家銀行試圖尋求對另一家的優勢地位，或對另一家做不公正的事情。」但是「當你們（指倫敦分行）看到一宗交易進展順利時，你們就會說，‘我們把它留在這裡’，而如果它進展得不順利，你們就會把一個份額給巴黎分行。我親愛的納特，這種態度只會帶來障礙，只會導致相互間在信裡彼此指責。」圍繞集體賬戶的利益引發的小爭端變得非常頻繁。1840～1841年間也發生了摩擦，詹姆斯和阿姆謝爾同時指責他們的侄子們將匯票給了他們在巴黎和法蘭克福的競爭對手。

對於內森的四個兒子來說，他們經常感到被幾個叔叔弄得火冒三丈。「我可以向你保證，要安排那些對錢如此敏感的人將是一個大麻煩。」安東尼向列昂內爾抱怨說，當時他們的4個叔叔似乎對他的婚姻計劃過於關注。「我可以保證，儘管查爾斯叔叔（卡爾）是你的岳父，但是與這位先生越少接觸越好。」阿姆謝爾經常通過修改他的遺囑來對他的侄子們施加某種控制力，則是另一個引起不滿的根源。

從資產方面來講，倫敦、巴黎和法蘭克福此時的地位已經相當平衡，因此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無法像內森當年一樣取得「一家獨大」的地位。「我親愛的侄子們，」詹姆斯在1838年3月的一次爭執後，不得不向他們道歉，「我為你們感到高興，我急切地請求你們不要按照字面意思看待我說過的話，當一個人必須忍受這類痛苦時，他有時會變得非常極端和不高興。我很容易生氣。」在與幾個兄弟的關係中，詹姆斯也無法佔據主導地位。阿姆謝爾經常威脅退出生意，當他以健康為由威脅退出時，詹姆斯連忙趕到法蘭克福勸慰。不過薩洛蒙、他的兒子安塞爾姆以及卡爾的大兒子邁耶·卡爾承擔起了家族的職責，這也反映了法蘭克福、維也納和那不勒斯之間的緊密商業聯絡。當詹姆斯自己在1838～1839年的冬季患上重病時，任何扮演「司令」角色的想法都被迫放到一邊。實際上，1848年之前，他很少，甚至沒有反對

過三個哥哥的意願。正如納特所評論的那樣，當薩洛蒙要求獲得更大份額的鐵路和政府生意時，「我們這裡總是習慣給法蘭克福讓路」。

與之前一樣，老一輩的羅斯柴爾德成員試圖阻止公司的離心傾向，他們所用的方法仍是呼籲空洞的兄弟「和諧」原則：「直到現在，我們的力量存在於哪裡？」詹姆斯1839年責備道，當時他與侄子們再次發生了口角，「只存在於這樣的想法裡，即一個地方的人將給另一個地方的人提供支援……你們都十分了解，在我的心裡，我們家族的繁榮比其他任何東西都要重要。」1841年，阿姆謝爾對相互間的摩擦感到非常擔憂，他給所有的兄弟和侄子們發出了熱切的呼籲，希望保持家族團結，這也讓人想起當年邁耶·阿姆謝爾的做法。詹姆斯在隨後一年也呼籲：「讓我們再次平和、和睦地做生意，彼此間不要再爭吵。如果我們能保持和平，這隻會給我們帶來財富和祝福，你們和我們都不應該缺少平和。」

### 第三章 領頭人的去世（1836年）（16）

可能非常明智的是，幾個合夥人於1841年在巴黎碰面時，決定維持1836年的協議不變，用漢娜的話來說：「老一輩的幾兄弟似乎對目前的情況很滿意，要求不作任何改變。」但是，她又強調說：「每家分行的賬房有自己的資金，它們應該各自獨立；而且他們必須監控每家的收入，以便讓有關各方獲得平等的利益；老一輩成員的資金如此龐大，他們有更多的話語權。」這也是她幾個兒子的想法。兩年後，列昂內爾按照這個方向準確地修改了合夥協議。列昂內爾和弟弟們正式從合夥資金的個人份額中取出了340250英鎊，從而將他們的比例下調到與他們叔父相等的水平，終結了內森一直是最大「股東」的情形。

這樣做，人們會認為列昂內爾主動放棄了一個籌碼。實際上，他放棄的比這個還要多，因為他並沒有修改1836年協議確定的利潤分配方案，協議明確規定歐洲大陸分行只有10%的利潤歸倫敦分行所有。

「我十分肯定，提及修改利潤分配必然會帶來更多不開心的紛爭或討論，」列昂內爾向他的弟弟們報告說：「我也很肯定，我們肯定不會從中得到任何東西，因此我才不會提利潤分配更大份額的事；為我們已經擁有的而感謝上帝，希望下一次我們碰面時能夠分到同樣多的錢。」但是，列昂內爾的目標主要是保持倫敦分行相對自治的地位。

他真實的勝利是要擊敗詹姆斯的提議——早在30年前便提出的一個建議：五家分行的合夥協議應該公開：

詹姆斯叔叔擬訂不提及我們資金內容的合夥協議，以便他在巴黎遇到誰是家族合夥人的問題時能夠出示——現在，就如我們在倫敦經常說的那樣，我們的銀行與其他銀行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希望避免任何人出示合夥協議的情形，涉及所有資金事務的協議不可能擬訂出來，但（詹姆斯叔叔）的這個建議可能很容易導致合夥協議被公眾獲悉，因此不能擬訂，他們立刻同意了我的觀點。

多虧了列昂內爾，五家分行聯絡的準確情況一直隱藏在神祕之中，合夥人和他們的律師才瞭解其中的祕密。這種保密做法是羅斯柴爾德的一個傳統；但似乎很容易合理地推斷，列昂內爾傾向於不再與其他四家分行保持過於緊密的聯絡。

「為我們已經有的感謝上帝吧」：這是內森的儿子們最典型的想法。納特和安東尼在幾個月前都用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句子：「我們必須要為我們已經得到的感謝上帝並努力保住它。」實際上，很容易將對於事業的態度方面的「代溝」作為他們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不和的一個解釋。毫無疑問，此時的紐考特已經比內森時代的紐考特在財政上更為穩定：比如，減少了債券市場的投機，更多地從事匯票承兌業務。「我們喜歡利潤微薄的大量交易，持有非常大數量的股票，等待非常高的價格。」納特從巴黎寫給兄弟們的信裡說，這是他寫到紙上的眾多經商箴言的其中之一。由於被「流放」到海峽的對岸，他傾向於用國家特性的因素來解釋紐考特與拉斐特街之間的差異。「我看得越多，」他的弟弟1846年到訪巴黎時說道，「我越相信，這裡沒一個地方像我的老紐考特。如果我們沒有給它們提供支援的話，法國的股票會是何等的垃圾？我想我們應該給自己一些自信，做一個和其他人一樣的偉人。」很難想象內森能夠說出這樣的話。儘管列昂內爾與他的叔叔之間只相差了16歲，但他們對於生意的態度相差頗多。對詹姆斯和他的兄弟來說，仍然保持著法蘭克福猶太聚居區帶給他們的焦慮和不安全感。「無論什麼時候我寫信給你們，別人都會更留心發生了什麼事，然後會去做更多的生意，但你們卻立刻認為我們是要和你們吵架。」詹姆斯在1845年寫給侄子們的信中有些感傷地說，「但是，我可以保證，我親愛的侄子們，我絲毫沒有那樣的想

看到每個人都在竭力把我們擠出所有的交易時，我的心都碎了。即便牆上的石頭都心懷妒忌，也成為我們的敵人。」這種認為所有競爭都是威脅的傾向自然不是下一代能夠繼承的東西。

但是，即便沒有態度上的差異，五個分行之間的摩擦可能也會越來越多，因為這是成功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價。到19世紀30年代中期，每家羅斯柴爾德分行都已經成為所在國家金融領域的主導力量。各個大國在1830～1833年的革命危機後，都傾向於縮減借貸的，這是公認的。除了1835年提供給西印度奴隸主的貸款，英國、法國和奧地利一直到1839～1841年才開始大量地借貸。但是，19世紀30年代所經歷的革命危機拉近了三家羅斯柴爾德分行以及它們所在國的關係。對於列昂內爾和他的弟弟們來說，他們顯然對英國有了某種程度上的認同感。薩洛蒙也是一樣，受他與梅特涅緊密關係的影響，也日益傾向於優先考慮奧地利帝國的利益。即便是詹姆斯，儘管他極為蔑視路易·菲利普的大臣們，但也不能完全迴避法國優先的考慮。如果歐洲的和平得以維持，這些國家認同感不會帶來多大的影響。但是當大國之間的利益發生衝突時，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就越來越難以保持中立了。

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於各個大國資金需求減少的自然反應就是到別的地方尋找生意。但是，世界上幾乎不存在歐洲列強沒有踏足的地方，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列強們的利益能夠完美地協調一致。在四個地區——伊比利亞（古西班牙）、美洲、低地國家（指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個國家）和近東——要達成一項符合羅斯柴爾德家族集體利益的政策是一項挑戰，因為當時這幾個「當地」政府的國家利益正處在衝突的狀態中。即便內森仍然在世，這也是項十分困難的任務；沒有了他，則變成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如果我們把1789～1848年間看成是「大革命時代」的話，那麼，羅斯柴爾德家族毫無疑問是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而1848～1849年間發生的政治劇變，則讓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當時的政治鉅變有點像1830年的情形，但規模遠比1830年的要大，革命使得受到影響的那些政府所發行的債券的價值成自由落體式下跌。

## 序 (1)

如果我們把1789～1848年間看成是「大革命時代」的話，那麼，羅斯柴爾德家族毫無疑問是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而1848～1849年間發生的政治劇變，則讓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當時的政治鉅變有點像1830年的情形，但規模遠比1830年的要大，革命使得受到影響的那些政府所發行的債券的價值成自由落體式下跌。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在他們所擁有的鉅額財富里，這種債券佔了很大的比例，發生這種情況也就意味著巨大的資本損失。雪上加霜的是，大革命將他們設在維也納和巴黎的銀行帶向了破產的邊緣，迫使他們其他地方的銀行——比如設在倫敦、法蘭克福和那不勒斯的銀行——進行救援。羅斯柴爾德家族總是大難不死，併成功地挺過了1815～1914年間所有重大的金融危機以及其間所爆發的革命。事實上，如果他們沒能挺過來，那真是一個讓人感覺奇怪的嘲諷：因為要是沒有發生革命，他們也就不會有什麼可以損失的東西。

最初發端於1796年的法國大革命真正地拆除了法蘭克福猶太人聚居區的藩籬，使羅斯柴爾德家族得以開始他們那非凡的、史無前例的，而且空前絕後的經濟起飛。在1789年之前，梅耶·A·羅斯柴爾德以及整個家族的生活受到了種族歧視法律的重重限制。猶太人被禁止從事農耕以及武器、香料、酒類和糧食的交易。他們被禁止在猶太聚居區以外的地方居住，而且在夜晚、星期天以及基督徒的節慶日不得離開聚居區。此外，他們還受到了稅收歧視。無論梅耶怎樣努力工作，他起初作為金銀幣經銷商之後又成為紙幣經紀人和商業銀行家所能取得的成就，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當法國向德國南部輸出革命的時候，所有這一切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有了猶太人街，對法蘭克福猶太人的法律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這主要得益於梅耶對拿破崙在萊茵地區的追隨者卡爾-馮-達爾伯格的經濟影響力。在法國人及其支持者被驅逐之後，無論法蘭克福的非猶太人怎樣努力，過去種族隔離式的居住和社會限制體系不再可能被完全恢復。

另外，這些革命戰爭把連做夢都想象不到的機會呈現在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面前。由於法國與歐洲其他地區出現衝突的規模以及軍費



開支呈節節上升的趨勢，交戰各國的借款需求也隨之上升。同時，戰爭對過去建立起來的貿易及銀行格局的破壞也給野心勃勃的冒險家們提供了很多發揮空間。就這樣，拿破崙驅逐赫思-凱瑟威廉王子家族的決定，使梅耶（自1769年起出任威廉王子指定代理人）成為了威廉王子的資金管理人，負責替他收取那些瞞過了法國人的資產所賺取的收益，並用這些錢進行再投資。這可是一個風險很大的工作：法國警察對梅耶的活動保持著相當的警惕，曾多次審問他和他的家人，但是他最終也沒有遭到起訴。利潤和風險是對等的，而且羅斯柴爾德家族很快就掌握了保守祕密的藝術。

同時，革命和戰爭也給了梅耶專橫跋扈的兒子內森嶄露頭角的機會，他整天忙於從曼切斯特出口英國紡織品到為英國的戰爭準備提供資金的倫敦金融城。要是在平常的情況下，內森無疑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布匹商人：他通過壓低價格來擴大銷量的策略無疑是正確的；他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旺盛精力、遠大志向以及極強的能力無一不是驚人的。（「我不看書，」他在1816年告訴他的兄弟們，「我不玩牌，我也不去戲院，我唯一的興趣是我的生意。」）英國與法國之間發生的戰爭所帶來的環境，特別有利於那些勇敢而富有創新精神的新生力量。拿破崙在1806年對英國對歐洲大陸的出口所進行的封鎖，在增加了貿易風險的同時，也為像內森這樣願意去突破禁運的人，提供了潛在的高額回報的可能。法國當局允許英國金條通過英吉利海峽的天真想法給予了內森更多有利可圖的生意機會。在1808年，他從曼徹斯特搬到了倫敦，因為在阿姆斯特丹被拿破崙佔領後，當時的倫敦已經確立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 序（2）

讓內森能跨越式地躋身於商業銀行家第一集團軍的「妙招」，是使用威廉王子在英國的投資來支撐他自己的生意。在1809年，內森獲得了授權，可以用威廉王子現有資產組合所獲取的收益購買新的英國債券。在此後的4年中，他所購買的債券總值超過60萬英鎊。要是在正常的時期，這可能已經使內森變成有名的基金經理人。在戰時的動盪時期，內森可以將威廉王子的債券當成是自己的資本。不知不覺間，這位被放逐的威廉王子成為了一家新銀行——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匿名股東。（而他的大臣佈德魯斯則是法蘭克福銀行的自願投資

人)。因此，在1813年的時候，內森有能力在英國政府傾囊相助威靈頓抵抗拿破崙的倒數第二次戰役時，向英國政府提供服務。這就是卡爾在後面說到的「這位老人」——指的是威廉王子——「給我們帶來了富貴」的真實含義。

實際上，他們或許更應該感激這個行業以及他們自己「老人」的聰明才智。是梅耶·羅斯柴爾德在1810年設計的合夥制，將家族的男性譜系結合在了一起，長達4代，同時又嚴格地將女性及其配偶排除在外，使家族企業保持了幾近一個世紀的活力。這個制度雖然在執行過程中幾經修改，但其精神實質得到了保留。還是梅耶·羅斯柴爾德教會了他的兒子們這些精明實用的生意信條，例如，「最好的生意夥伴是陷入困境中的政府，而不是被幸運眷顧著的政府」；「如果你不能夠被人愛戴，就要讓人畏懼」；「如果一個高層人士與猶太人成為（金融）夥伴，他就屬於猶太人」。最後這條來自於幾兄弟長期以來通過送禮、貸款、投資紅利及毫不掩飾的賄賂與政治實權人物保持交往的實踐。最為關鍵的是，梅耶教會了他的兒子們團結的價值：

「阿姆斯特洛」，他在1812年臨終前告訴守在床邊的長子，「只要你能讓你的兄弟們不分開，你們就會成為德國最富有的人。」30年後，他的兒子們仍然在重複著這句箴言，而此時，他們已經是世界上最有的人，事實上，是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家族。

發生在1814年和1815年的那些軍事行動，把我們帶入了金融史和政治史的新時代，而在這期間，內森和他的兄弟們不僅為威靈頓，同時還為英國的大陸盟友們籌措了數額巨大的金條。羅斯柴爾德家族把他們的信用用到了極致，有時候甚至完全忽視了他們的資產和負債的關係，為了獲取政府的佣金、利息收入，為了從匯率和公債紅利的波動中獲取投機收益，而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搭了上去。僅在1815年，內森與英國政府的來往賬目就接近1000萬英鎊，這在當時可是一個天文數字。當利物浦勳爵（Lord Liverpool）稱內森為「一個非常有用的朋友」時，他採用的是一種史詩般的低調陳述修辭手法。正如其他同時代的人所評述的，這是一種拿破崙式的金融手段，如果沒有這些手段，拿破崙的軍事統治就不會被推翻。路德維希·伯爾內（Ludwig Borne）很客觀地把這幾兄弟稱為「理財能手」；而內森被所羅門（Salomon）稱為幾兄弟的「總司令」。儘管當法國人在滑鐵盧遭

到慘敗時——戰爭結束得遠比內森當初預見的要快很多——他們已經瀕臨破產，但在1815年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了貨真價實的百萬富翁。幾乎是與此同時，內森開始著手一項也許算得上是他職業生涯中最成功的交易：大量投資於英國政府債券指永續公債，一種由英國政府發行的無到期日的永續年金式債券。——譯者注。由此，他搭上了政府戰後穩定經濟政策所帶來的高速增長快車，而且恰好在市場見頂之前收穫了自己的利潤。這是內森的超級商業傑作，這樣一買一賣之間就獲利超過25萬英鎊。

### 序 (3)

19世紀20年代是美國政治和經濟雙重複闢的時期。在整個歐洲大陸，被廢黜的王室幾乎全部返回重掌王權。在梅特涅王子（Prince Metternich）的領導下，歐洲大陸的幾大勢力聯合起來鎮壓任何可能出現的革命萌芽。毫無疑問，羅斯柴爾德家族為復辟提供了經濟支援。他們的資助使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這些神聖同盟的成員國，也包括在法國復辟的波旁王朝，可以以先前只有英國和荷蘭可以享受的利率水平發行債券。有了這些基礎，梅特涅王子「維護歐洲治安」就變得更加容易——最有名的要數奧地利和法國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恢復波旁王朝統治遇阻的事件，有人曾開玩笑說羅斯柴爾德家族是「神聖同盟最主要的盟友」，事實確實也是如此。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貸款還支援了那個時期很多上層人士的私人財務，包括梅特涅本人、喬治王四世及其女婿薩克森-科堡領主利奧波德（Leopold of Saxe-Coburg），他後來成為了比利時國王。正如路德維希·伯爾內所抱怨的，「羅斯柴爾德」是「這樣一個人，他賦予了貴族們踐踏自由並剝奪人們抵禦暴力的勇氣和力量……是恐懼的大祭師……在他的神壇上，自由、愛國、榮耀及所有其他的人類美德都成為祭品」。

然而，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於復辟的態度，一直存在兩種截然不同而且自相矛盾的情況。他們基本上不願意看到權力重新回到那些試圖把猶太人變為二等公民的保守派精英手中——最明顯的當然是德國。另一方面，內森不是那種僅因為意識形態問題就放棄千載難逢的商業機會的人。神聖同盟在西班牙和義大利對革命運動的干預對生意來說不見得是好事，最主要的原因是戰爭對各國國家預算的破壞性影響。

在西班牙、巴西和希臘等國出現的新政權也是潛在的新客戶。過去的經營似乎表明，君主立憲制與集權制相比，前者是更好的債務人。頗令人玩味的是，費爾南德七世復辟成為集權體制後，羅斯柴爾德家族更傾向於借錢給西班牙解放者，而拒絕繼續資助費爾南德七世。正如拜倫在《唐璜》(Don Juan)中所描繪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在「保皇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搖擺不定。海恩裡希·海涅走得更遠，他稱羅斯柴爾德在革命和羅伯斯庇爾之間是半斤對八兩的關係，因為：

羅斯柴爾德.....使土地喪失了固有的優勢，把國家債券體系的作用提高到了極致，因此讓資產和收入能夠流動起來，與此同時，還把以前土地所擁有的特權賦予了貨幣。

同時，還是海恩裡希歷史性地斷言：「貨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而羅斯柴爾德是神的先知。」毫無疑問，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經濟史上最重要的貢獻是建立起了一個真正國際化的債券市場。當然，以前也存在資本的跨境流動：18世紀時，荷蘭曾經投資於英國政府債券，與此同時，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貝斯曼家族也大量買賣奧地利債券。但以前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債券能同時在數個市場按照（以1818年的普魯士債券為例）以標準銀計價、在發行地付息而且還是償債基金這樣一些頗具吸引力的條件來發行。

債券發行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唯一的業務。他們也做商業票據的貼現、貴金屬的經紀業務、國際匯兌業務、直接參與商品貿易、涉足保險業務，甚至還為個人精英客戶提供私人銀行服務。他們在貴金屬市場上的作用舉足輕重：羅斯柴爾德家族起到了「最終貸款人對最終借款人」的作用，從而幫助英格蘭銀行在1852年的時候避免了可能被迫暫停交易的危機。但他們最先進入的還是債券市場。另外，在不同的二級市場間買賣債券幾乎是與發行債券同等重要的利潤來源：這種方式是幾兄弟樂此不疲的主要的投機手段。羅斯柴爾德家族明顯區別於其他競爭者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業務的跨國特點。當內森的長兄阿姆斯洛在法蘭克福繼續家族原有業務的同時，他最小的兄弟詹姆斯自己在巴黎開始創業。在稍後的19世紀20年代，薩洛蒙和卡爾在維也納和那不勒斯建立了法蘭克福銀行的分行。這五家機構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合夥體制，聯手進行大宗交易，分享利潤並分攤成本。經常性的事無鉅細的通訊聯絡克服了地理分割的障礙。合夥人之間只有在環境變化

需要對他們之間的合夥條約進行修改時，大家才會聚首，而這種情況也是很多年才會出現一次。

#### 序 (4)

這種跨國的結構給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了幾方面特別重要的優勢。首先，這種結構使他們可以進行套利操作，充分利用市場間——比如說倫敦市場和巴黎市場的價格差異。其次，他們相互間可以在某一機構出現資金困難及償付壓力時進行相互救助。金融危機從來就沒有以同等的嚴重性在歐洲各地同時出現過，就連1848年的時候也沒有。當英國在1825年遭受嚴重危機時，詹姆斯可以援助內森。而1830年巴黎市場出現暴跌時，內森有了報答的機會。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是，如果維也納的銀行是一個獨立實體的話，它在1848年的時候就已經破產。只有在其他銀行願意勾銷掉鉅額欠債的情況下，薩洛蒙的兒子安瑟爾姆才有可能重建它。

通過快速的資本積累——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分配利潤，只是以他們各自的合夥股份為基數收取很低的利息——他們很快就有能力操作那些規模空前的業務，並理所當然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到1825年的時候，他們的銀行規模已經10倍於與他們差距最小的競爭對手——巴林兄弟的銀行。反過來，這又使他們開始修正他們的經營戰略。在經過早年的高風險高收益的經營後，他們現在可以在不危及他們的市場支配地位的情況下，從事利潤攤薄的業務。事實上，這個從追求利潤最大化上退下來的轉變，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羅斯柴爾德合夥製作為企業能做到基業常青的原因。在他們的發展道路上曾經反反覆覆遭遇過很多對手——雅克·拉斐特是在復辟時期的一個經典例子，他在市場上漲時通過高風險交易已經超過了他們，但在跌落週期出現時，他只是保全了自身。

貴隨富來。在同時代人的眼裡，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新金融的化身：他們出生於猶太家庭，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他們很粗俗——但只是數年的時間，他們積蓄的賬面財富已經遠遠多於大多數貴族的資產。從表面上看，這些暴發戶都渴求那些原有精英們的接納。似乎是為了抹去那些過去（像卡爾所說的）「我們都擠在一個小小的閣樓間裡睡覺」的記憶，他們購買了繁華大街上雅緻的聯排別墅，比如皮卡迪利大街、拉斐特大道，不久之後，他們在加奈斯貝里、弗裡耶爾和

希勒斯多夫等地購買了第一批鄉村別墅。他們用17世紀的荷蘭油畫和18世紀的法國傢俱裝飾這些房子。他們舉辦奢華的宴會和珠光寶氣的舞會。他們追尋名銜和其他榮譽：平民雅各布·羅斯柴爾德搖身一變，成為了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男爵閣下、奧地利駐巴黎總領事、榮譽軍團騎士。他們把自己的兒子作為紳士來培養，為他們提供在猶太聚居區聞所未聞的休閒活動：騎馬、打獵和藝術欣賞。他們的女兒上肖邦的鋼琴課。那些知名的人物——最有影響的，比如迪斯雷利、海涅、巴爾扎克都從這些新的「美第奇家族」尋求贊助，對這些新貴的譏諷，只會偶爾出現在他們的作品裡。

然而，羅斯柴爾德家族私底下對自己社會地位的急劇上升卻常常自嘲。頭銜和榮譽稱號只是「社交的一部分」，可以為這幾兄弟進入權勢的中心提供幫助。做東並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結果卻都是大同小異：大多數情況都是工作應酬，這與我們今天的說法幾乎一模一樣。他們對下一代的紳士化教育也很膚淺：他們的兒子真正的教育課堂還是在「賬房」。

## 序 (5)

羅斯柴爾德家族最重要的社會認同傳統是宗教。他們不像很多其他富裕的歐洲猶太人那樣在19世紀20年代改為信奉基督教，而是一直堅定不移地信奉著他們祖宗的信仰。儘管他們每個人對信仰的虔誠度不一——阿姆斯特洛嚴格遵守各種教規，而詹姆斯卻相對懈怠，但幾兄弟卻都認同這個觀點，即他們能取得這種世界性的成功與他們的猶太信仰密不可分。正像詹姆斯所說，宗教就是「一切，我們的好運和我們的祝福都依賴於它」。當內森的女兒漢娜·梅耶為了能與亨利·菲茨羅伊結婚而在1839年改信奉基督教時，她所有的親戚，包括她自己的母親，幾乎都與她斷絕了關係。

羅斯柴爾德家族堅信他們對猶太教忠貞不渝的信仰與他們取得的全球性成功密不可分所產生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他們對那些「窮困的同教兄弟姐妹」命運的關注。他們把自己對更廣大的猶太社群所肩負的這項使命的範圍，從傳統的慈善捐助擴充套件到了為猶太人的完全解放進行系統的政治遊說。由梅耶·A·羅斯柴爾德在拿破崙時代所採取的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金錢保衛猶太人的公民及政治權利的做法，幾乎通行無阻地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當1840年猶太人在大馬士

革被錯誤地指控「宗教謀殺」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指揮了一場非常成功的運動，結束了對他們的指控，這只是眾多成功案例中的一個。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給天主教大主教的貸款也被用來作為改善那些天主教國家中猶太人地位的手段。但很有意思的是，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家門口的努力卻很不成功。內森和他的妻子漢娜早在1829年時就開始參與了結束國會排斥猶太人的運動。但一直到內森死了7年之後，事情仍然毫無起色。這就留給他的兒子列昂內爾一個領導盎格魯——猶太人爭取解放的機會：這就是本集開篇的事件。

然而，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更廣大的猶太社群的認同感並不是絕對的。這不僅是由於他們的富有，也因他們的家族譜系把他們與其他歐洲猶太人割裂了。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推崇同族通婚——婚配不僅限於他們的共同信仰，甚至只限於自己最近的血親家庭。當時的情況似乎是隻有羅斯柴爾德家的人可以娶羅斯柴爾德家的人：在1824～1877年間，梅耶·A·羅斯柴爾德的後代有21樁婚事，其中不少於15樁出現在他的直系後人中。最典型的要數內森的兒子列昂內爾和卡爾的女兒夏洛特在1836年的婚姻，這是一樁包辦的並不太幸福的婚姻。這種做法背後最主要的考慮是加強經濟合夥制的凝聚力。儘管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那一階段的家族樹看起來充滿了遺傳風險，但他們的這個目的還是達到了。堂表親間的婚姻確保了家族的資本不會被分散。與被奉為聖典的不準女兒和女婿參與合夥的嚴格規定，以及梅耶·A·羅斯柴爾德要求兄弟間保持團結的不厭其煩的交代一樣，血緣婚姻也是防止羅斯柴爾德家族重蹈托馬斯·曼所描寫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覆轍的一項重要策略。當然，其他的王朝家族也採用類似的做法。堂表親婚姻在猶太商業家族裡相對比較常見。其實這種情況也不僅限於猶太人：英國的貴格會教友之間也有類似的習俗。事實上，甚至歐洲的皇室家庭也都採用堂表親婚姻來加強他們之間的政治關係。然而，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血親婚姻推崇的程度，連薩克森-科堡美國王室（1901～1910）。——譯者注皇族都難望其項背。正是這個原因使海恩裡希·海涅把他們稱為「異乎尋常的家族」。確實，其他的猶太人基本上都把羅斯柴爾德家族看成是某種型別的希伯來皇族：既是「猶太人的王者」，同時也是「王者的猶太人」。

序（6）

1830年的革命揭示了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並沒有跟神聖同盟狼狽為奸，而是完全願意對解放者甚至是革命政權提供他們的金融服務。要是說有什麼不一樣的話，就是在被革命的第一聲春雷嚇得魂飛魄散之後回過神來，詹姆斯發現與路易·菲利浦這樣的「資產階級領主」做生意要更容易。與這種情況完全一致的還有新的比利時政府，特別是當它（像希臘一樣）接受了一位「聽話的」日耳曼王子作為他們的領主（這位新領主早已經是羅斯柴爾德的客戶）並屈從於這些大國制定的共同國際準則時。第二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於這些大國達成這種局面持樂觀的態度，並且深信在這種局面下，金融的槓桿作用可以得到盡情發揮。

革命的爆發一度引發了法國的長期公債暴跌（法國的永續債券就相當於英國的永續公債）。這場災難幾乎讓詹姆斯在驚恐中陷入了滅頂之災，他的賬面出現了鉅額的赤字。但是，造成歐洲金融市場在19世紀30年代出現如此鉅額縮水的原因——甚至還推延了長期公債在相對穩定的君主立憲體制確立後的恢復——是擔心像18世紀90年代那樣，由法國革命引發歐洲大陸的戰爭。正是這種擔心與那些引發當時金融市場惡化的所有其他原因一起推高了公債的利息，連那些沒有受到革命波及的國家也未能倖免。

在19世紀30年代，比利時、波蘭和義大利多次面臨戰爭一觸即發的險境。這期間，每一次危機出現時，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很好地聯合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他們獨特的高速通訊網路——主要依靠私人信使帶著信件穿梭往返——直到現在都還被歐洲大陸的主要政治人物用來作為特快郵件服務。這給了這個家族另外一種權勢：知識。詹姆斯面見路易·菲利浦，聆聽他的意見，之後把他的這些意見寫在他給薩洛蒙的信裡；薩洛蒙去拜會梅特涅，把這些意見傳過去。這個過程然後又反向重複，當梅特涅的回覆抵達路易·菲利浦時至少經過了兩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我們這裡不需要點明，信使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很巧妙地改變信函的內容；或者，在信函被送達之前，相關的訊息已經在股票交易中發揮了作用。

同時，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國家債券市場的控制又賦予了他們另外一種權勢。因為任何一個圖謀發動戰爭的國家都需要借錢來做軍備，一旦羅斯柴爾德家族洞悉了這種可能性，他們可以行使否決權：不和



平，不借錢。或者是像奧地利外交官普魯克西·馮·奧斯登在1830年12月時所說的：「這完全是一個方法和手段的問題，而且羅斯柴爾德的意見是決定性的，他不會為戰爭提供一分錢。」

事情並不是如此單純。儘管他們同時期的人都被這種觀點所迷惑，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只要通過威脅調整貸款就可以保持歐洲的和平，但實際的情況是，在19世紀30年代，之所以沒有爆發戰爭還有其他的原因。在某些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可以通過經濟手段來操縱政治勢力。在薩洛蒙於1832年明確地拒絕提供新的貸款後，梅特涅的好戰即使不能說是被阻止，起碼也是被壓制了。而希臘和比利時建立新的國家確實是得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金融支援的書面承諾，以一種由幾個大國提供擔保，羅斯柴爾德家族發放貸款的方式才得以確立。

## 序 (7)

到內森在1836年令人遺憾而且在巨大的痛苦中去世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建立起了讓人歎為觀止的巨大商業帝國，控制了無人可敵的鉅額資源，橫跨廣大的地理區域。通過代理和建立分行的方式，覆蓋的地區還可以進一步延展到歐洲其他的市場，甚至整個世界——從馬德里的威斯威勒爾到聖彼得堡的蓋塞爾，再到紐約的貝爾蒙特。他們的權勢之所以讓同時代的人如此著迷，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的發家來得如此迅猛，而起點又是如此之低。一位美國的觀察家是這樣描繪這五兄弟的：「他們傲視群王，居於眾王之上，將整個大陸掌控於他們的掌股之間」。「羅斯柴爾德家族統治了基督徒的世界……沒有他們的同意，沒有一個內閣敢越雷池一步……羅斯柴爾德男爵手裡掌握著選擇戰爭還是和平的鑰匙。」這種說法雖然有點誇張，但卻並非無根無據。這個龐大而且強大的組織一直保持著家族企業的核心。它一直以私營——事實上是特別神祕的合夥制方式運營，主要的業務是經營家族的自有資本。

當第三代加入到這個合夥制中的時候，依然保持了創業者的精神，儘管五個機構之間出現了稍許的聯盟傾向。在某種程度上，詹姆斯繼承了內森的遺志，擔負起了「盟主」的責任。他也是一個專橫跋扈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中，既沉迷於那些票據經紀和套利的吃飯生意，也不放過那些利潤豐厚的大額債券發行業務。他的長壽使法

蘭克福猶太聚居區的民族特質一直到了19世紀60年代都還保持得相當完好。然而，詹姆斯不再可能像內森一樣去操控其他的四家機構。儘管內森的兒子之一納特成為了他在巴黎的傳聲筒，但其他人卻從沒有受制於他。特別是列昂內爾證明了自己在商業上的輝煌足以與其父比肩，但他的性格和行事風格卻不像內森那樣火暴，反而是相當低調。薩洛蒙的兒子安瑟爾姆也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詹姆斯也無法真正控制他的兄長們：特別是薩洛蒙，他明顯更多地關注與奧地利政府和其他維也納銀行，而他的其他合夥人卻並不喜歡這種做法。

從某些方面看，家族中出現的這種從獨裁向寡頭壟斷的轉變是有益的：這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應對世紀中葉出現的新的金融機會時可以脫離內森以前的那種嚴密控制，從而變得更加靈活。舉個例子說，薩洛蒙、詹姆斯和阿姆斯洛可以在奧地利、法國和德國的鐵路融資活動中起主導作用，而他們在英格蘭的兄弟卻很顯然忽略了這件事情。

內森把19世紀20年代的習慣延續到了19世紀30年代。由於主要歐洲國家的金融狀況很穩定，他便把眼光投向了更遠的地方去尋找新的客戶：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國。但是，成為比利時的「金融之主」是一回事，在伊比利亞和美國複製這種方式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由於政治的動盪使羅斯柴爾德家族發行的債券出現了令人尷尬的失敗。在美國，所遇到的問題是財政和貨幣體制的權力下放。羅斯柴爾德家族希望聯邦政府能成為一個優良的業務源泉，但聯邦政府則傾向於把對外國舉債的權利留給各州。同樣，他們希望美國銀行能發展成為一家英格蘭美洲銀行。但情況恰恰相反，由於政治上的阻撓，加上金融上的經營失誤，這家銀行在1839年倒閉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美國建立穩固基地計劃的失敗——他們對自己委派的在華爾街的代理沒有信心——成為了他們家族歷史上犯下的最大的戰略性決策錯誤。

## 序 (8)

在熟悉的政府金融市場方面的這些挫折使多元化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因此，收購控制歐洲水銀市場的決策就是應對政府拖欠風險的部分嘗試。通過擁有像艾爾梅登礦山——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礦山——這樣的有形資產，羅斯柴爾德家族就可以通過水銀寄售預支現金的方

式，以最小的風險為西班牙提供金融支援。參與水銀開採獲得了雙重的收益，因為水銀被用於白銀的精煉生產。由於1815年前就參與了貴金屬的經紀業務，羅斯柴爾德家族也順理成章地進入了鑄幣領域。

鐵路融資是最有意思的新的業務線。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政府在鐵路建設中或多或少都起著一定作用，有的是直接融資建設（比如俄國和比利時），有的是進行補貼（比如在法國和一些日耳曼小國）。這就意味著為鐵路公司發行股票或者債券與發行政府債券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除了鐵路股票的波動區間要比政府債券大很多。起初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只想扮演單純的融資角色。但從鐵路公司成立到鐵路線真正運營需要漫長的時間，不可避免地使他們深陷其中，更不用說股票紅利的支付。到19世紀40年代，列昂內爾的兄弟安東尼和納特將他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料理他們的叔叔詹姆斯在法國鐵路的投資上。這是第三代不喜歡風險的一個明顯的證據，納特嚴厲批評了詹姆斯對像北方和隆巴德這樣的鐵路線的「摯愛」，當事故不斷髮生（比如1846年在凡勃發生的事故）時，納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擔心的事情終於降臨了。但是詹姆斯的做法仍然可以說是對的：在整個19世紀期間，對大陸鐵路的投資收益是法國羅斯柴爾德銀行發展速度超過英國銀行的主要原因。到了19世紀中葉，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著手準備修建高盈利的泛歐洲大陸鐵路網了。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納特的憂慮是有道理的。與國債的經營管理不同，鐵路的營運對普通人的生活有著直接而且切實的影響。因此，由於參與到鐵路的建設管理事務中，羅斯柴爾德家族將自己徹底暴露在公眾面前，並受到了空前的批評。那些激進的（首次出現的）社會主義作家開始用一種全新而且聳人聽聞的筆觸來描繪他們：人民大眾的剝削者，通過增進納稅人和普通乘客的負擔來獲取資本收益和利潤。羅斯柴爾德家族之前也曾經受到過口誅筆伐，但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時候，他們所受到的批評主要是支援###和（被商業對手批評為）過激的商業行為。在19世紀40年代，對富人的仇視與對猶太人的仇視被攪和在一起：反資本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互相支援。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了這種思潮運動完美的靶子。

伴隨著這些具有煽動性的辯論，19世紀40年代中期蕭條的經濟情況預示著政治動盪即將來臨。與1830年不同，1848年的革命在爆發之

前很早就可以看到革命的腳步正在逼近。對這些情況，羅斯柴爾德家族並非視而不見，然而他們低估了危機的程度。現實的問題是經濟蕭條減少了政府的稅收收入，增加了政府的赤字。這種情況從短期看，意味著羅斯柴爾德家族新的商業機會，他們無法抵禦這種機會的誘惑。薩洛蒙和詹姆斯兩人在起義爆發前的前夜都承銷了大量的貸款。隨著革命從巴黎向東一直延伸，薩洛蒙的工業和鐵路債券以及股票已經不可能再銷售，他對奧地利政府的合同業務因此也不可能再履行。詹姆斯也只能通過與這些新的在財政方面還比較稚嫩的政府進行談判，對最新簽訂的貸款合同的主要條款進行修改來熬過這場風暴。

### 序 (9)

藉助於其跨越多國的結構、手中掌控的大量資源以及完善的政治合同，羅斯柴爾德家族得以在1848～1849年的鉅變中獨善其身。在遭受了接近天文數字的損失後，他們相應的地位卻比之前稍稍得到了加強。然而，歐洲經濟的復甦（絕非巧合）和政治重新歸於穩定又帶來了新的挑戰。

首先，革命所帶來的一個並不太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弱化了政府官僚主義對成立合股和有限責任企業這種觀點的阻礙。一旦成立公司變得容易，進入金融領域的新競爭者的數量就會增加。佩雷爾兄弟開始時以鐵路狂熱分子的面目示人，他們有很好的技術構想，但苦於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實現——因而在19世紀30年代投靠到羅斯柴爾德家族門下。在19世紀50年代，他們開始獨立出來，將無數的小投資者結合起來籌集到了「地產信貸銀行」（Credit Mobilier）的資本金。與這個以佩雷爾家族為標誌的挑戰相關的是政府財政與債券市場之間關係出現的變化。19世紀50年代出現了第一次通過公眾認購方式銷售債券的嘗試，這種方式不再使用銀行作為中介，或者說是銀行不再全部包銷，而只是以認購人的方式出現。最起碼來說，政府開始利用私營及合股銀行間不斷增加的競爭來壓低手續費。儘管羅斯柴爾德家族還在債券市場佔有支配地位，但他們的壟斷地位已經大不如前。電報的普及進一步削弱了他們的掌控，終結了他們的信使能帶給他們在競爭中領先別人一步的市場敏感資訊的時代。

但是，對羅斯柴爾德家族金融霸權的最大威脅或許還是來自政治方面。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在法國的勝利給歐洲外交帶來了新的不確

定因素。一直到1870年，他效仿他叔父的可能性從來就沒有完全消失。與此同時，國際遊戲規則也由於各地不斷湧現的政治家——比較著名的有帕默斯頓、凱沃爾和俾斯麥——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們把國家利益看得高於國際利益，而且對大炮的信任與對國際會議的信任幾乎是一樣的。與1815年開始到1848年結束的相對平靜的35年相比，接下來的35年的基本特點就是歐洲大陸延綿不斷的戰爭（先不說美洲）：對於這些戰事，羅斯柴爾德家族無奈地發現，雖然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們已經無力阻止。

在1848年5月，夏洛特·德·羅斯柴爾德聲稱，她確信「歐洲和羅斯柴爾德家族將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信心在法國大革命出現衰落的時候得到了驗證。在19世紀下半葉，威脅帝王政治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危險確實在減少。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光明未來取決於家族所具備的迎接新挑戰的能力。當然，民族主義以及那個時代風行的社會主義思想將會成為必須面對的最大挑戰——特別是在二者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1)

(1849~1858年)

我5點睡著，但6點就醒來了。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巨大的吸血鬼正在貪婪地吮吸我的鮮血……很顯然，當投票的結果公佈出來的時候，震耳欲聾的瘋狂歡呼聲迴盪在整個上議院的上空……我們沒有道理遭受到如此大的憎恨。

——夏洛特·德·羅斯柴爾德，1849年5月

儘管他們設法控制住了金融領域的風暴，但1848年還是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命運的轉折點——不過原因與經濟和政治都沒有關係。在大革命剛剛結束後的那些年裡，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公司的結構出現了很多問題。在翻閱他們的往來信函時，人們很容易會忽視掉老梅耶當時仍然健在的4個兒子其實都已經進入垂暮之年的事實。在1850年的時候，阿姆斯特洛77歲，薩洛蒙76歲，卡爾62歲，而且身體狀況都不好。只有詹姆斯還處於精力充沛的56歲年齡段。

從另一個方面說，長壽是這個家族的特點：儘管他們的父親在68歲時去世，但他們出生於1753年的母親，親身經歷了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在她的家鄉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並給一位普魯士國王加冕，使他成為一位統治整個德國的新國王的歷史時刻。事實上，古特爾·羅斯柴爾德在19世紀40年代時成為很多幽默的代名詞，比如《時代》的一篇報道中描述的：

德高望重的羅斯柴爾德夫人來自法蘭克福，現在很快就要成為一位百歲老人，在她上週身體略感不適接受過治療後，她非常友善地向她的醫生指出給她開的藥沒有什麼效果。「夫人，我還能怎麼做呢？」醫生說，「很遺憾我不能讓您返老還童。」「你錯了，醫生，」這位詼諧的女士反駁道，「我並沒有要求您讓我返老還童，我所希望的是長命百歲。」

關於這個故事的漫畫很多，其中一幅名為《老奶奶的99歲生日》，畫面上是詹姆斯對來祝壽的眾人說：「先生們，等她的身體恢復了，我將給國家捐贈10萬基爾德荷蘭貨幣單位。——譯者注，一點

小錢，聊表心意。」畫的背景處是古特爾（見圖1 1）。同樣的笑話還有另外一個版本：一名醫生保證她「活到一百歲」。「你在說什麼呢？」她很堅決地打斷他的話，「如果上帝讓我活過了81歲，他就不會在100歲的時候叫我去！」

圖1 1佚名，《老奶奶的99歲大壽》，（大約1848年）

資料來源：富西斯，《猶太人諷刺畫》，第146頁

她拒絕搬離位於過去猶太老街的那所「綠色盾牌」老宅的固執，也引發了與她同時代人的很多遐想，它總是讓人不自覺地將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凡的經濟成就與某些猶太戒律聯絡在一起。路德維希·伯爾內早在1827年就為此替她譜寫了頌歌：「看，這就是她的居所，一所如此狹小的舊屋……她無慾無求，儘管廣大的帝國由她的兒孫們掌管，留給她的也只是祖先留在猶太老街的這所小屋。」當查爾斯·格雷威爾16年後到訪法蘭克福時，他驚奇地看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太太」出現在「昏暗、破舊的樓裡……（這座樓）一點都不比」這條「猶太街道」上「其他的房子好」：在這條狹窄、昏暗的街上，在這所破舊的老房子前面，站著一位身披綠色絲巾的精幹的老太太，一名身著藍色制服的男僕守在門邊。現在，門是開啟的，只見這位老太太正從昏暗、狹窄的樓梯上走下來，攙扶她的是她的孫女查爾斯·羅斯柴爾德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的馬車正等在街頭。兩名男僕和一些女僕負責幫助老太太坐進馬車，很多住在同一條街道的人聚集在對面看著她坐進去的這一幕。我以前從未見過如此讓人迷惑和震驚的反差：這些女士，無論是老的還是少的，她們身上的服裝以及車上的配飾，甚至包括僕人的制服，是如此的光彩奪目，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位老人堅持不願搬離的這條街道是如此破敗。按照格雷威爾的說法，古特爾經常有這樣的出行，而且「長期堅持不懈地去看歌劇或者其他演出」。很顯然，他並不像伯爾內和其他人所認為的那樣清心寡慾。

## 第一章 重新崛起（2）

1849年的5月7日，古特爾在她還健在的兒子們的守護之下，最終還是去世了，享年96歲。

這只是這個家族的辭世大潮中的一件。在此一年之前，阿姆斯特洛的妻子埃娃辭世。在1850年，內森的寡妻漢娜走了，與此同時，她的

孫子——納特的二兒子——梅耶·阿爾伯特也走了，這件事讓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深受打擊。卡爾的妻子阿德爾海德卒於1853年，一年後，薩洛蒙的妻子卡羅琳也相繼去世。這些事件對第二代那些年邁的家族成員所造成的影響是很容易預見的。梅耶·卡爾注意到他母親的去世怎樣「深深地影響了」阿姆斯特洛。「這件事對他來說是一件重大的損失……我無法告訴你我們後來熬過了多少悲慘的時光……阿姆斯特洛叔叔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不過在真的令人非常恐懼的第一波悲慟過後，感覺上好了很多。」事實上，當全家人集中到法蘭克福為古特爾舉行葬禮的時候，阿姆斯特洛也僅只是略微鎮定了一點點。他和他的兄弟薩洛蒙在他們的風燭殘年中忍受了很多孤獨淒涼，他們花在賬房的時間越來越少，而花在花園裡的時間越來越多。

在剛剛恢復日耳曼聯邦議會新普魯士代表身份，名叫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年，德國政治家，德意志帝國第一任首相。——譯者注的奸雄式、超級保守的容客意為地主之子，原為普魯士的貴族地主階級，19世紀後開始資本主義化，成為半封建型的貴族地主。這裡泛指年輕的德國貴族。——譯者注眼裡，阿姆斯特洛是一位可憐的老人。在到達法蘭克福不久後，俾斯麥在給他妻子的信中說道，「在貨幣領域」羅斯柴爾德在法蘭克福的社會中理所當然地是「最傑出」的人。但「如果把錢和薪金從他們身上拿開，你就會看到」他和其他的法蘭克福人一樣，其實是「多麼平凡無奇。」當阿姆斯特洛提前10天（主要是為了確定他能接受邀請）邀請俾斯麥參加晚宴時，他這個新面孔令人討厭的性格特徵表現得一覽無餘——他回答說他應該會到場，「如果屆時他還活著」。這個回覆「使他大為震驚，以至於他對所有人都重複這句話‘天哪，他怎麼會提到死活這樣的問題呢？這個人是這樣年輕、這樣強壯’。」以俾斯麥的有限的收入和微薄的薪水來說，他肯定會對阿姆斯特洛宴會上呈現在他面前的銀質餐具、金質刀叉和湯匙、新鮮的蜜桃和葡萄以及瓊漿美酒的盛況印象深刻並心生厭惡。當這位老人在餐後驕傲地對俾斯麥炫耀他最心愛的花園的時候，俾斯麥再也掩飾不住他內心的蔑視：

我喜歡他，是因為他是一位真正不擇手段的老猶太人，而且他並不試圖掩飾自己的出身；他嚴格遵守他們的教規，吃飯時除了教規中認為清潔的食物外不碰任何其他東西。「約翰，帶點面薄（包）給小



鹿。」當他帶我去觀賞他養有鹿的花園的時候，他這樣對他的傭人說。「蘭（男）爵先生，這棵樹花了我兩欠（千）基爾德，老實說，是兩欠（千）基爾德閒（現）金。您要的話，一欠（千）塊拿去；乾脆，您要喜歡的話，我就黨（當）禮物送給您，他會給您鬆（送）到家裡。尚（上）帝知道我是多麼得尊敬您，蘭（男）爵，您真的是一表任（人）才，一位優秀的人。」他個子不高，很瘦小，頭髮已經花白。他是他們那一輩人裡的老大，但在他的宮殿裡他卻是一個可憐的人，一個絕後的鰥夫。很多事情他都被他的僕人矇在鼓裡，而且還被他的那些法國化或者英國化的侄子侄女們所鄙視，這些人在等著繼承他的財富的同時，對他卻沒有任何的愛戴和感激。隨後，阿姆斯特洛提出將他在黑森州的房子租給俾斯麥，但俾斯麥拒絕了，因為他感覺這是企圖討好他的一個試探。按照其他的主要敵視者漢挪威國王的說法，「每當外國王子或者部長，也或者是其他的大人物來到法蘭克福的時候」，阿姆斯特洛都要做諸如此類的事情。在他的晚宴上總是「通過炫耀金銀餐具和奢侈品來顯示其無比的華貴和奢華，他總是通過告訴來賓他去哪買來的魚和肉，以及他為這次聚會所耗費的巨資來給大家取樂……每時每刻都盡顯暴發戶的本色以及高利貸者和票據交易貼現商人的狹隘心理」。

### 第一章 重新崛起（3）

正像俾斯麥的精明預言一樣，最後的問題來了——財富由誰來繼承——這些財富佔據了老羅斯柴爾德家族財富的絕大部分，他們因此花費了很長時間對他們的遺囑進行了左修右補。在多年以前的1814年，阿姆斯特洛曾經開玩笑說，一個富裕的德國猶太人和一個富裕的波蘭猶太人之間的差別是後者會「在他剛開始失敗的時候死去，而富裕的德國猶太人只會在擁有了鉅額財富後才死去」。40年後，阿姆斯特洛成為了他自己說法的典型例子，他在家族企業所擁有的股份價值近200萬英鎊。但是誰將繼承這些財富？在長期以來祈求生個兒子的願望沒能實現之後，阿姆斯特洛開始認真考慮他12個侄子中每個人的優劣，特別是那幾個定居在法蘭克福的侄子（首當其衝的是卡爾的兒子梅耶?卡爾和威廉?卡爾。最後，他將自己在家族生意中的股份按下面這種形式進行分配：詹姆斯得到了1/4，安瑟爾姆1/4，內森的四個兒子均分1/4，卡爾的三個兒子均分最後的1/4。

薩洛蒙有一個繼承人，而且在巴黎還有一個女兒。但或許是因為和安瑟爾姆在維也納時，對於革命危機可能出現的高潮的認識話不投機，而且說過重話，所羅門力圖不把安瑟爾姆列為唯一的繼承人。他設計了一種非常複雜的方案，把自己名下的絕大部分財富直接轉給了自己的孫輩。起初，他似乎考慮把幾乎全部的財產（175萬英鎊）留給他女兒貝蒂的孩子（男孩每人42.5萬英鎊，而夏洛特只有5萬英鎊，但在她與納特結婚的時候已經給過她5萬英鎊），只把他的三所房子留給了安瑟爾姆和他的兒子，而留給他們已經出嫁的姐妹漢娜·瑪蒂爾德的只有8000英鎊。他告訴安瑟爾姆說，至於他的巴黎飯店將留給「你和你的兒子們……我重複一遍，是給你和你的兒子們。我已經認真考慮過，增加了一個條款（來確保它可以一直作為他們的財產）百年不變——女婿或者是女兒都沒有任何權利來主張這份財產」。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一種在身後發揮最大影響力的策略，與他父親梅耶·羅斯柴爾德在1812年時的所作所為頗為類似；事實上，把女性從家族產業中排除是他從父親身上繼承下來的觀念。但與他父親不同的是，薩洛蒙決定他的孫子中最終只有一人可以從安瑟爾姆處繼承他在家族生意中的股份——這是在幾乎一直平均對待所有男性繼承人的家族中是一個新出現的情況。在薩洛蒙於1853年最後確定的遺囑附件中，他廢除了將繼承人的選擇權留給安瑟爾姆的條款，指定了（但最終沒有實現）他的長孫納撒尼爾。但最終，薩洛蒙的所有計劃全部泡湯，最後的實際情況是繼承他財產的是安瑟爾姆，同時也由安瑟爾姆來決定誰做其繼承人。另外，俾斯麥也說對了，年青一代的羅斯柴爾德們都嘲笑他們的老叔叔。拜訪總是「一臉苦相而且總是鬱鬱寡歡」的卡爾叔叔，是一件特別令人痛苦的事情。如果1855年註定要有一件悲痛事件發生的話，那麼，不會有什麼事能比薩洛蒙、卡爾和阿姆斯洛在僅僅9個月之內就相繼撒手人寰更令人欷歔了。

這次死神的突襲發生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金融業務出現劇烈震盪的時期。正如我們已經講到的，不得已被銷賬的在維也納機構發生的鉅額虧損很難以讓人釋懷，特別是倫敦的合夥人，他們對叔輩們那種魯莽的業務方式可能出現的最壞可能性的擔心，看起來已經被證實了。遺憾的是，公司的結構意味著由薩洛蒙造成的損失必須由大家來共同承擔；而且他的個人股份在公司總股本中所佔的比例也不會相應

減少。這種情況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在緊接著革命結束後的那段時間，由梅耶·A·羅斯柴爾德在差不多40年前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把兒子和孫子融合在一起的這種血緣聯絡，會面臨如此巨大的分離壓力。具體來說，倫敦方面尋求能把他們自己從對四個大陸銀行的承諾義務中「解放」出來，因為這四個銀行由於歐洲大陸發生革命而遭遇了慘重的損失。正如納特在1848年7月時所說，他和他的兄弟們希望能夠「做某種安排，以便每家銀行都可以有相對獨立的位置」。當「商業和金融大會」的想法首次在1848年8月提出來的時候，對這個會議前景的憂慮籠罩著夏洛特：「阿姆斯特叔叔正遭受著喪妻之痛，這使他看上去很虛弱，也很痛苦；薩洛蒙叔叔正遭受著失財之痛；詹姆斯叔叔正為法國局勢的不確定而頭痛；我的父親（卡爾）也很焦慮，儘管我的丈夫狀態非常不錯，但是也一旦得理，決不讓人。」

#### 第一章 重新崛起（4）

當詹姆斯在1849年出發前往法蘭克福去探望他的兄弟和侄子們的時候，貝蒂滿心希望大會能「改變我們各家銀行之間的基礎，跟隨倫敦銀行，讓大家都能從目前這種不能適應政治發展狀況的限制中脫離出來」。在同一年中稍晚的時候，巴黎和倫敦之間的緊張關係升級成為爭吵，因為詹姆斯聽說梅耶·卡爾已經「命令」戴維森兄弟「不要再給巴黎傳送任何黃金」——這可是英國方面最高層領導的指令——這讓詹姆斯覺得再也無法忍受。而在巴黎銀行自身內部，納特和詹姆斯的摩擦也是由來已久。前者由於比他的叔叔表現得更謹慎，因而生意一直都比较順手，但正如我們前面看到的，革命幾乎摧毀了他作為商人的神經。「我建議你們在正常的商業交往中一定要加倍小心。」他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所寫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這樣勸告他的兄弟們。

對於我來說，我現在對生意是如此厭惡，不想再接手任何型別、任何性質的業務.....整個世界局勢的現狀是革命每時每刻都在蔓延，我認為，如果一個人躍入齊頸的燙水中只是為了尋求賺一點小錢的機會，那簡直就是完完全全地瘋了。我們的好叔叔們是如此可笑地著迷於為生意而生意，而且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只是不想讓別人做任何他們發現別人想做而又不能放任讓別人去做的事情。從我的角度說，我十分確信巴林銀行再怎麼努力進軍西班牙水銀市場對我們也沒有任何

威脅，如果他們選擇這樣做，就讓他們去做，我們自己應該知足常樂，並以平常心對待。

貝蒂也看到了這種情況。她曾經評論道：「我們的好叔叔（阿姆斯特洛）無法接受我們的財富縮水的現實，他急切地希望將它恢復到以前的水平，為此，他會毫不猶豫地將我們重新拋回危險業務的折磨中。」但是，詹姆斯對納特的這種怯懦越來越不耐煩。夏洛特猜想詹姆斯應該肯定會歡迎他的侄子從生意中撤出，因為這使得他年齡稍長的兩個兒子阿爾方索和古斯塔夫（他們的第一次露面出現在1846年的函件中）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業務中。正如貝蒂所指出的，這種長期以來的「兄弟團結的老傳統」似乎「已經接近分崩離析的邊緣」。

這些還不是家庭失和的唯一原因。甚至早在1848年革命爆發之前，法蘭克福銀行就對倫敦方面的態度有很多怨言。安瑟爾姆抱怨道：「做最卑微的僕人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在執行您的指令時甚至都無法通過西班牙的信使瞭解事情的進展情況。準確地說，是我們根本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很久以來，我們就一直在這個由不同的公司所組成的群體中被歸類為二等公民。」正如這段話所暗示的，安瑟爾姆認為，作為下一輩人中的長子，他應該成為阿姆斯特洛在法蘭克福的繼承人。然而，維也納分部所受到的打擊改變了所有這一切，因為這個變故促使他繼承了他父親在奧地利的地位。也是基於同樣的想法，卡爾希望他的長子梅耶·卡爾到義大利繼承他的事業。然而，沒有子嗣的阿姆斯特洛更堅決地認為梅耶·卡爾應該在法蘭克福接替他，讓他能力稍遜的弟弟阿道夫去那不勒斯。就像詹姆斯所看到的，這樣的爭論不僅發生在這幾個年邁的兄弟之間，也同時發生在他們的兒子和侄子之間，原因很明顯，他們都覬覦著法蘭克福銀行，因為它仍然主宰著維也納和那不勒斯分部的業務：「安瑟爾姆在和梅耶·卡爾較勁。梅耶·卡爾在和阿道夫較勁。」儘管夏洛特很明顯與她的哥哥一個鼻孔出氣，但她在日記裡還是詳細描繪了這種競爭所產生的那種不和諧氣氛：

## 第一章 重新崛起（5）

梅耶·卡爾很成熟，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傑出的人士，一個國際公民。他正值盛年，處於無可置疑的權力巔峰。他通過他迷人的舉止、

活潑的天性以及睿智的談吐為他自己贏得了比安瑟爾姆要多得多的支援率。事實上，他在法蘭克福是一位廣受歡迎而且深受喜愛的人物，他受歡迎的程度使我的姐夫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望塵莫及。我深信他所掌握的知識的廣度和深度絕不亞於安瑟爾姆，我無法評價他是否是一名經驗豐富的生意人，他對重要事件的判斷能力是否正確，他是否是一名出色的作家或者是演講家……安瑟爾姆總是在我哥哥面前表現優越感，這種情況是非常沒有道理的，因為要想找我哥哥這麼一位有才華的人，您可能得搜遍整個帝國。或許他的天資達不到追求人文思想的科學機構所要求的全面的研究能力和長期的學習能力。然而，作為一個銀行家和世界傑出人士，作為一位歐洲社會中舉止優雅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成員（因為他在所有國家及階層中都能遊刃有餘），在我看來他沒有任何對手。安瑟爾姆用這種輕侮的態度對待我哥哥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有些卑鄙。

最後，我們應該牢記的很重要的一點是，在1848年的大動盪後，倫敦和巴黎對維也納銀行的憤怒和不滿。曾經有很多次，詹姆斯的言辭中都表露出連他都很想切斷與維也納的聯絡。「我對維也納沒有興趣。」他在1849年給紐科特寫的信中這樣說，「當其他人都在那兒對政府進行投機的時候，我們在維也納的人卻一點兒都不聰明，而且很遺憾，他們都是一群差勁的生意人。他們只會一根筋地認為他們做生意的目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合夥制度在1852年的時候終於進行了更新，對1844年確立的體系進行了一些調整，並在隨後的20多年中取得了不亞於之前體系的輝煌成績。原因是什麼？羅斯柴爾德家族公司作為跨國合夥制企業能存活至今的最好解釋，在於詹姆斯在化解代溝，並把家族中分歧日益增大的各個分支機構再次重新綁在一起的整個過程中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夏洛特1849年在法蘭克福看她的叔叔時說的一樣，詹姆斯從1848年的危機中重新崛起，而且他對生活和生意的慾望絲毫沒有減弱：

我以前很少能見到如此精明能幹的人，如此具有國際意識又如此謹慎，無論是思維還是身體都是如此積極主動，不知疲倦。當我想到他成長於法蘭克福的猶太街，在他的孩提和青年時代從來沒有享受過高雅文化的薰陶時，我就更加驚奇，對他的仰慕根本無法用言語表

達。無論是任何事情，他都能從中找到樂趣並且自得其樂。他每天寫兩到三封信，口述至少六封，閱讀所有的法文、德文和英文的報紙，沖澡，睡一小時的回籠覺，玩三到四個小時的撲克牌。

這就是詹姆斯離開巴黎後每天的日程安排。年輕的股票經紀人費多在拉斐特大街上遇到的詹姆斯仍然具有海涅在詩篇中所描繪的他在青春全盛時期所洋溢的自然魅力，如果要說有什麼變化的話，只能說年齡只是增加了詹姆斯的威嚴。

儘管詹姆斯年輕時精力充沛，但他當時深深地浸潤在他父親那個時代所形成的家族特質裡。在1848年以前，他一直憂心忡忡地關注著5家公司相互間發生爭執的各種跡象。他在1847年4月警告列昂內爾，有關賬目的紛爭將會引發「這樣的事態，最終結果是每個人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這樣會產生大量的不愉快」。「深藏在我心中的只有家族的聲譽、幸福和團結的。」在回覆父親梅耶老生常談般的警告時，他這樣寫道：「作為商業交往的一個成果，我們保持著團結。如果大家每天都分享並且能接收到同樣的賬目，那麼所有的一切都將按照上帝的願望繼續保持著團結。」正是秉承著這樣的理念，詹姆斯在1850年的夏天回來了，隨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滿腔的熱情和急迫的心情——下面所抄錄的是一封充分說明這種重要意義的函件：

## 第一章 重新崛起（6）

打破一樣東西要比將它再次聚合起來更容易。我們已經有足夠多的子嗣將我們的生意延續百年，因此，我們不應該相互為敵……我們不應該自欺欺人：當（單獨的）公司不再存在——那時我們已經沒有了團結，也沒有了業務合作，然而所有這些在世人眼裡是我們真正的力量之所在——那一天，就是我們的生存面臨危機，而且每個人都得自尋出路之時。善良的老阿姆斯特洛會說：「在家族的生意裡我有200英鎊，但是現在我打算取出來。」我們有什麼辦法來阻止他？一旦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方式，他可以娶戈爾德施密特（Goldschmidt），而且說：「我可以按照我的意願把我的錢投到任何行業。」那時，我們的餘生將會在永遠無法擺脫的自責中度過。親愛的列昂內爾，我相信我們是能在法蘭克福發揮影響力的僅有的兩個人，我們必須將我們的目標確定為在所有合夥人之間恢復和平……如果我們不留神，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高達300萬英鎊的資本可能會落入外人之手，而不是傳給

我們的孩子。我想問你，難道我們發瘋了嗎？你可能會說我老了，而且我的目的是想提高我的資本的權益。但首先感謝上帝，我們所有人的資本儲備都要遠勝於我們上一次簽署合夥合同時的情況；其次，就像我剛到這裡的那天跟你說的，你將會在我的身上看到一個全心全意的叔叔，他會以他所有的能力來達成必要的妥協。因此，我認為我們必須理清楚這些爭論的思路，並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讓兩方都做出一些犧牲來保持團結，感謝上帝的恩惠，團結保護我們度過了最近發生的所有這些災難，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努力去看看自己能做些什麼，來為實現這個目標做出自己的貢獻。

這些就是詹姆斯在1850～1851年間經常重複的理念。「我向你保證」他告訴列昂內爾的妻子夏洛特（他把她當成了自己的同盟者），「家族就是一切：它是在上帝的仁慈幫助下，我們所擁有的幸福的唯一源泉，它維繫著我們（相互間）的依戀，它是我們團結的紐帶。」

由於詹姆斯為維繫團結所付出的努力，1852年的合夥合同因此也是順理成章的——不是弱化各公司間的聯絡，而是通過妥協保留這種聯絡。妥協的主要內容是英國合夥人放棄他們完全獨立的主張，作為交換，他們得到了較高的資本回報率。早在1850年，詹姆斯就提出了這種妥協的框架：用納特的話說，建議「對於我們的資本回報率應該提高」，前提是英國銀行總能比其他銀行獲得更多的盈利。這是我們上面抄錄的他給列昂內爾的那封信中的主要要點，同時也是大家最終在1852年所同意的新的體系的基礎。英國合夥人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好處：他們的退股部分不僅可以得到26 025萬英鎊補償，他們股份（此時佔總股份的20%）的利息也增加到3 5%，而詹姆斯的是3%，卡爾的是2 625%，阿姆斯特洛和薩洛蒙則是2 5%。另外，業務管理聯合行動的規定也有所鬆動：從今往後，合夥人不再需要因為多數人要求就必須得進行商務旅行，在對地產投資時也不需要再使用集體基金進行融資。為了迴應這些讓步，英國合夥人接受新的合作體系。協議第12條中說，「為保證一種公開的、兄弟般的合作，並發展大家共同互惠的商業利益」，應該向其他所有合夥人通報任何超過1000萬基爾德（約合83萬英鎊）的交易，並在互惠的基礎上提供最高10%的參與機會給其他合夥人。老協議中的那些沒有被新協議條款修訂過的所有條款仍然保持效力，比如共同賬目的操作程式。這些措施毫無疑問代表

了一種分權的做法。但考慮到另一種選擇（在隨後的一年中進行了嚴肅認真的討論）是對家族集體企業的全面清算，因此對詹姆斯來說，這個成果的取得代表了一場新的勝利。

## 第一章 重新崛起（7）

1852年協議中沒有解決的是決定法蘭克福的繼承人（除了排除了阿道夫的備選資格外）：從此之後，安瑟爾姆、梅耶·卡爾、威廉·卡爾都在競爭法蘭克福銀行的這個職位。（同時，也給阿爾方索和古斯塔夫提供了競爭巴黎公司位置的機會。）當詹姆斯的幾個兄弟在1855年辭世後，新的公司結構才最終塵埃落定（參見表1-1）。儘管薩洛蒙在遺囑中做了明確的規定，但是他在集體資本中的所有股份還是轉給了安瑟爾姆（這是詹姆斯在代表他的妻子提出異議的時候顯得不是很堅決所產生的結果，而對於詹姆斯為什麼這樣做的原因不詳）。卡爾的股份在減掉給女兒夏洛特的1/7後，在他的兒子間平分。最後的決定是，阿姆斯特洛的股份按下面這種方案進行了分配：詹姆斯和安瑟爾姆每人得到1/4，內森的幾個兒子和卡爾的幾個兒子也各得1/4。所有這些變故的最後結果就是，安瑟爾姆、詹姆斯與英國出生的合夥人之間的實力基本均衡，而卡爾幾個兒子的影響力大大削弱。在決定將阿道夫派去負責那不勒斯公司的業務，而將法蘭克福留給梅耶·卡爾和他那對宗教十分虔誠的兄弟威廉後，他們的影響力被進一步削弱了。

這就是在現實中所達成的妥協。在1852年之後，詹姆斯準備提出一項與他的侄子們的想法相差更大的史無前例的改革，但新的董事會不再聽候詹姆斯的指令——這可以很容易地從他給倫敦的信在1848年後篇幅大幅縮水的情況中推斷出來。他在給納特的信件中出現「又及」內容的情況越來越多，而且在他對業務的建議中，最後常以這樣的話語結尾——就好像是在提醒自己和他們之間不再有主次之分：

「親愛的侄子，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吧。」這毫無疑問極大地滿足了列昂內爾的虛榮心。1852年的妥協意味著1848年以前那種業已存在於5個公司之間的合作體系得以恢復，只是做了適度的分權。巴黎和倫敦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表明相互間的依存度確實比19世紀20年代的時候要小一些，但總體來說還是非常大。例如，巴黎公司在1851年12月資產中的17.4%是其他的羅斯柴爾德公司欠它的錢，而其中主要又是倫敦所欠。



表1-1合併後羅斯柴爾德資本中的個人佔股情況，1852年和1855年

1852年

英鎊

英鎊

百分比 (%)

1855年

英鎊

英鎊

百分比 (%)

列昂內爾

安東尼

納特

梅耶

464770 75

464770 75

464770 75

464770 75

1859083 00

20 05

列昂內爾

安東尼

納特

梅耶

685536 86

685536 86

685536 86

685536 86  
2742147 44  
25 8  
阿姆斯特  
薩洛蒙  
詹姆斯  
卡爾  
1859083 00  
1859083 00  
1847083 00  
1847083 00  
20 05  
20 05  
19 92  
19 92  
安瑟爾姆  
詹姆斯  
梅耶?卡爾  
阿道夫  
威廉?卡爾  
805540 66  
805540 66  
805540 66  
2742147 44  
2727987 43  
2416621 99

25 8

25 67

22 74

合計

9271415 00

100

10628904 28

100

說明：1855年的資料根據那不勒斯和倫敦的資料（沒有法蘭克福、維也納和巴黎公司的文字資料）進行估算。在1852和1855年間，那不勒斯公司的資本增長了13.5%，倫敦公司增長了22.8%。我在表中採用了這兩個資料的均值18%。

## 第一章 重新崛起（8）

資料來源：由阿姆斯特洛、薩洛蒙、卡爾、詹姆斯、列昂內爾、安東尼、納特、梅耶於1852年10月31日共同簽署的Societats Ubereinkunft, CPHDCM, 637/1/7/115~120；1855年12月重新分配阿姆斯特洛和卡爾股份未標明日期的檔案，N, 132AQ3/1

另外，倫敦的合夥人認為他們的公司比其他公司盈利水平高，最終被證明是過分自信了。儘管那不勒斯和法蘭克福公司出現了蕭條的跡象（主要的原因都超出了阿道夫和梅耶·卡爾所能控制的範圍），但詹姆斯承擔起了1852年後的大多數業務，他的大陸鐵路業務擴充套件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到他生命的暮年，巴黎銀行的資本已經遠遠超出了其他合夥公司。安瑟爾姆在重建千瘡百孔的維也納公司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商業天才，也讓大家大感意外。在讓倫敦合夥人來分享大陸的這些勝利果實方面，沒有任何人表現出任何的不情願。因此，新的體系開創了一個倫敦和巴黎銀行間平等狀態的新時代，而在法蘭克福和那不勒斯銀行的影響力走下坡路的時候，維也納又重新崛起了。

與過去的情況一樣，羅斯柴爾德家族並不只是靠合夥協議和遺囑來維護家族企業的團結。同族婚配繼續發揮著關鍵的作用。在1848~1877年的這段時間內，我們可以看到羅斯柴爾德家族內部不少於9樁婚

事顯而易見的目的就是為了加強不同支系之間的聯絡。在1849年，卡爾的三兒子威廉·卡爾娶了他的堂兄安瑟爾姆的二女兒漢娜·瑪蒂爾德；一年後，他的兄弟阿道夫娶了她的妹妹朱莉；在1857年，詹姆斯的長子阿爾方索在加奈斯貝里娶了他的堂兄列昂內爾的女兒莉奧諾拉。在這裡把這些例子——列舉出來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在1826年詹姆斯的兒子薩洛蒙娶了梅耶·卡爾的女兒阿德蕾。1865年，安瑟爾姆的兒子費迪南德娶了列昂內爾的女兒艾福林娜。1867年，列昂內爾的兒子納桑尼爾娶了梅耶·卡爾的女兒愛瑪。1871年，納特的兒子詹姆斯艾德華娶了梅耶·卡爾的女兒勞拉·德赫瑟。1876年，安瑟爾姆的小兒子薩洛蒙·阿爾伯特娶了阿爾方索的女兒貝迪娜。最後。在1877年，詹姆斯的小兒子艾德蒙娶了威廉·卡爾的女兒阿德蕾德。在1873年之前僅有一個例外，但就是這些沒有在羅斯柴爾德家族內部通婚的，也沒有脫離猶太人「表親關係」的傳統太遠。例外是安瑟爾姆的女兒薩拉·露易絲，她在1858年嫁給了托斯卡納貴族拜倫·萊蒙多·富蘭奇迪。1850年，梅耶娶了朱利安娜·科恩——擊敗了競爭對手約塞夫·蒙蒂菲奧裡——而他的侄子古斯塔夫在1859年娶了塞西爾·安斯波。要是威廉·卡爾沒有娶到姓羅斯柴爾德的妻子，他可能會娶施納佩爾——他的祖母古特爾家族的成員。

在將近兩代人的時間裡，為這些聯姻牽線搭橋一直是家族女性成員的主要工作。夏洛特對這一點沒有任何的懷疑。當她聽到她的兄弟威廉·卡爾與漢娜·瑪蒂爾德訂婚的訊息時，表現得非常熱情：「我敬愛的雙親當然會非常高興，因為他終於沒有選擇一個外人。對我們猶太人來說，特別是對我們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最好不要與其他的家族有什麼瓜葛，因為這種事情總是會帶來不愉快、而且還要耗費很多金錢。」在這種情況下，什麼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全都變成了一派胡言。夏洛特的表姐貝蒂用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這種婚姻，她告訴她的兒子說，「可憐的瑪蒂爾德只能帶著無法釋懷的遺憾嫁給威廉」，現在她正「用真正天使般的順從來說服自己奉獻出她年輕心靈裡的那些爛漫憧憬。我們不得不說，做威廉的終身伴侶對生長在她這種家庭又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孩子來說，根本不具有任何吸引力」。現在仍然懸而未決的問題是，貝蒂的兒子阿爾方索和古斯塔夫應該娶誰。當時的情況似乎是漢娜·瑪蒂爾德對後者比較傾心，而她的姐姐朱

莉則希望嫁給阿爾方索。但在就這件事情對她的兒子做了一番調侃之後，貝蒂這樣寫道：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9)

爸爸是如此直率而實在……他提起這件事情的時候，根本沒做任何考慮。他把他所有的悔恨一股腦地告訴了這個可憐的母親……他使她從幻想中醒悟過來，認識到對成功的渴望最終可能會適得其反，他要求她按自己的想法，但同時也要考慮到女兒的幸福，做決定的時候一定要慎重，三思而後行。

這對夏洛特來說是個好訊息，她也正謀劃著在貝蒂的兩兒子和她的女兒莉奧諾拉和埃維莉娜之間的一舉兩得的類似的婚姻安排。在她的日記中，她客觀地對她的這兩名想象中的女婿各自的優點進行了分析：

古斯塔夫是一名優秀的青年。他有一顆最善良也最熱誠的心，並且全身心地奉獻給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親人。他具有強烈的責任感，他的任勞任怨可以作為他那一代人的榜樣。但無論他是否是天才，我其實都無法做出完全公正的評價。他享有良好教育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和優勢，但他卻聲稱自己很笨，很容易緊張，而且在有陌生人的場合甚至都不能把十個單詞說連貫。他們說他在數學方面具備很高的技能，但我對這門學科一無所知，因此也無法做出判斷。

他的哥哥阿爾方索則將我們叔叔詹姆斯超凡的精力和活力與貝蒂的語言天賦完美結合在一起。他是一個很好的讀者、聽者和觀察者，他能記住他所接觸過的所有事情。他可以用一種很簡單的方式談論任何熱點話題，不故弄玄虛，並總是以一種直接、深刻而且輕鬆的氛圍，以最舒服的方式處理各種問題。不過，要是需要什麼建議的話，對他可別有什麼指望，因為他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建議，或者他根本就沒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但聽他談話總是一件樂事，因為他說話不帶任何感情色彩，而且總是以一種迷人的、生動的語調來講。

迪斯雷利太太說古斯塔夫英俊，我不知道我是否同意她的說法。他是雅各賓一系中唯一能以其炯炯有神的、柔和的、湛藍色的大眼睛來誇這個口的人。在他幼年的時候，他的眼睛長得並不特別漂亮，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中其他人的眼睛沒有什麼不同，而現在他的眼睛已經

看不到兒時的任何痕跡，除了一種人們或許可能會叫做憂鬱的氣質外。他的眉毛長得很精緻，眉形很好，淡淡的很清爽；他有一頭深棕色的緞子般的頭髮；他的鼻子不是鷹鉤鼻；他的嘴巴很大，然而並不能以能言善辯來讚譽它，最多隻能說它溫和敦厚，而且它既不暴露對感情的理解，也不顯示感情的深度。古斯塔夫人顯得精瘦，他風度翩翩，舉手投足間透著高貴的氣息。我希望能在神龕上看到他的畫像暗指結婚。——譯者注。

她的願望只實現了一半：9年後，她看到立在神龕上的是阿爾方索的畫像，擺在了她女兒莉奧諾拉畫像的旁邊。在那個時候，她早已經改變了她對新郎的看法。現在的阿爾方索似乎是「一個10～15年來操縱著世界運轉的男子漢，他已經完全厭倦了那種花天酒地般的生活，他不尊重，也不會愛他的妻子，而是要求妻子全身心地服侍他，像奴僕一樣地去服侍他」。然而，她的結論是，這樣可能「更好——一個已經沒有了激情的男人，感覺上已經沒有任何好奇，也沒有任何深沉，應該更會是一位安全的丈夫，而妻子更有可能在履行她做妻子責任的過程中感受到幸福。她醒悟到這一點的時候會很痛苦，但這種痛苦不會持久」。無論如何，她的女兒「攀上了世界上的某個重要的位置，應該不會想要從自己夢寐以求的羅氏朝廷走下來，而去當一個卑微的普通人的妻子」。她的這種擔心從這對小夫妻草草了事的蜜月得到了證明，這個事情還引起了媒體的負面評論。這番感慨毫無疑問基於夏洛特自己的經歷，它向我們揭示了這樣婚姻安排的根本特質。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10)

以「父母之命」作為決定性因素這樣一種原則當然還是不應該太過分。夏洛特沒有能為她的另一個女兒留住阿爾方索的兄弟一事表明，父母在孩子們的配偶選擇方面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安瑟爾姆的女兒朱莉也拒絕了她的堂兄威廉·卡爾的求婚，以及那些親緣關係更遠一點的親戚，比如納撒尼爾·蒙蒂菲奧裡的求婚。另一方面，她最終「選擇」的阿道夫又完全是由他的父親以及未來岳父所主導，他們花費了數月來起草這份婚姻契約；儘管這其中的談判主要涉及單列給新娘的資產數目，以便給她某種方式的財務獨立，但這不應該被錯誤地看成是某種形式的女權至上傾向。因此，納特和他的妻子希望在安瑟

爾姆的女兒漢娜·瑪蒂爾德與威廉·卡爾結婚的時候，為漢娜·瑪蒂爾德購買1萬英鎊的公債。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自己女兒的這種折磨也不是沒有節制，當老阿姆斯洛在妻子去世後不久即宣佈他想與自己的孫侄女、人見人愛的朱莉（當時還不到20歲）再婚時，這種情況就顯而易見了。家族裡的其他人在醫生們的支援下團結一致，反對他的這個圖謀。不過我們現在無法弄清楚的是，他們的這種反對態度到底有多少是由於擔心他的健康，又有多少是考慮到這件事中這位年輕女士的幸福，比如詹姆斯所擔心的就是，如果對阿姆斯洛所提要求的拒絕太生硬，他有可能會從公司裡退出他的資金，並娶一個外人。

### 守舊與改良

正如夏洛特所強調的，近親婚配仍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猶太生活方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家族的政策仍然是兒子和女兒不得和信仰不同的人通婚（儘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已經遠遠高於他們的教友，但還是不能與家族以外的人通婚）。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此期間對其教會所做奉獻的程度不應該被低估：無論從哪方面說，它都遠勝於19世紀20年代和19世紀30年代時的情況，這也是1848年後那段時間內家族和睦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詹姆斯仍然是最不遵守清規戒律的人。「我衷心希望你們都能度過一個沒有一絲遺憾的安息日。」他在1847年給他的侄子和兒子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希望你們過得愉快，而且打獵能夠滿載而歸。你們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嗎？這可是深愛著你們的叔叔和我的殷切希望。」這樣一封信的存在本身就證明，他根本不認為在安息日坐到他的辦公桌前有什麼不妥。他和卡爾在出席猶太聚會時總是會有一些惹人側目的古怪舉止（而他們的妻子則都能中規中矩）。

然而，詹姆斯一直不遺餘力地堅守著家族的猶太傳統，與他在漢娜·梅耶叛教那些日子裡的表現別無二致。儘管他幾乎忘掉了1850年的逾越節那天，他非常不情願地取消了到倫敦的商務旅行，以便研讀《哈加達》載有故事《出埃及記》和逾越節家宴儀式的書，在逾越節家宴時閱讀。——譯者注。1860年，他收到法蘭克福拉比利奧波德·斯坦的新作時很是高興（儘管他捐助的規模沒有記錄下來）。他的妻子貝蒂與丈夫一樣以一種世俗的心態待人接物，但她同時有一個很強烈的意識，認為遵守教規就算不是一種道義責任，也是一種社會行為規

範準則。當她聽說她的兒子阿爾方索參加了紐約的猶太聚會後，她宣稱自己「（高興得）好像跳到了月亮上面」，並繼續寫道：

### 第一章 重新崛起（11）

這是一件大好事，我的好兒子，不僅是出於宗教的情感，也是一種民族情感。以我們所處的社會地位，你的舉動對那些可能淡忘掉這些傳統的人來說是一個提醒，對那些一直堅守這個傳統的人來說是一個鼓勵。通過這種方式，你讓那些試圖責備我們的人能夠與我們重歸於好，你一定要高度尊重那些具有不同信仰的人。

這說明阿爾方索按自己的意願去參加猶太人聚會明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威廉·卡爾在此期間仍然是年青一代中難得一見的正統猶太教徒。他繼承了他的叔叔阿姆斯特洛反對法蘭克福猶太人社群的改良運動，他支援為正統的猶太教徒建立以色列宗教社群，並把基金中的大部分捐出來，在舒澤大街新建了一座猶太教堂。但他反對由新的社群拉比薩姆森·拉斐爾·赫西所提倡的公然的分裂，他要求他的跟隨者全部撤出法蘭克福的主流社群。作為正統的猶太教徒，威廉·卡爾秉承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原則，認為實踐過程中的多樣化不應該威脅到猶太教社群的團結。

他的英國堂兄弟們也把自己當成是「以色列好人」，一直遵守神聖日子的要求，避免在安息日工作。詹姆斯有一次在訪問巴黎時揶揄安東尼，說他總是在看祈禱書，這個代表著虔誠的印象來自於他的侄子在1849年的贖罪日一絲不苟地齋戒，儘管大家都擔心當時正在席捲巴黎的霍亂傳染會使齋戒從醫學的角度考慮，成為一種非常不明智的舉動。如果逾越節期間納特在巴黎，安東尼和列昂內爾就會給他提供逾越節薄餅。就算是在英國度假期間，列昂內爾和他的家庭也都過贖罪日，齋戒並做贖罪日禱告。但這四個出生在倫敦的兄弟並不像威廉·卡爾那樣守舊。1851年，迪斯雷利很無心地給夏洛特和列昂內爾送來了一大塊波蘭公爵送給他的鹿肉：

我不知道怎麼處置它，這違反了我們的規矩，我認為我找到了一個解決的好辦法，將它送給羅斯柴爾德夫人（因為我們在那吃飯的時候實在太多了，但是一直沒有見到過這道菜），我根本沒有想到過這



是不潔的肉，不過我擔心它是。不過，由於我提到了贈送人也熱愛上帝，我想他們會吃掉它。鹿肉可能是允許食用的，但如果是在打獵時射殺的則不行，而送來的這塊肉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獵殺的。

他似乎做對了，儘管這並不是愛戴貴族的反映。實際的情況是列昂內爾的家庭與詹姆斯家的一樣，並不嚴格遵守飲食戒律。事實上，梅耶對鹿肉是如此著迷，他於1866年在福克斯通的政治演講中竭力為牡鹿狩獵活動進行了辯護！1859年馬考雷在列昂內爾家用過餐後寫道：「無論是什麼形式的豬肉，一律沒有；蕎麥肉餡……配約漢尼斯堡上等葡萄酒，真是一種怎麼形容都不過分的美味」。

對於更大範圍的宗教問題，這幾個英國兄弟比較傾向於支援改革運動，這與整個英國的大氣候有關。當（1853年）傾向改革的西倫敦教會的代表與總拉比發生了矛盾，從而有人試圖將他們從教區代表理事會中驅逐出去的時候，列昂內爾公開宣告反對這種他稱之為「教皇獨裁」的做法。「他擁有所有方面的神職權利，但他不應該像天主教牧師一樣被他們牽著鼻子走。他們可能是，而且毫無疑問應該是一些知識淵博的人，但他們沒有權利來質問他過節是過了一天還是過了兩天」——這是守舊派和改革派在實際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區別。這樣的說法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法蘭克福的改革派教區在上一年與主流的守舊派進行鬥爭的時候會向列昂內爾尋求幫助。

## 第一章 重新崛起（12）

朝向改革的這種趨勢在與他們的妻子有關的事情上就更加明顯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傳統猶太教的宗教活動一直是以男性為主導的：我們有一些證據表明羅斯柴爾德家的女人幾乎沒有什麼希伯來語知識。以安東尼的妻子路易莎為例，她參與了改革運動的程序，使猶太教的禮拜形式更加現代，而且更加精確，而之前的禮拜堂儀式與教堂儀式比起來顯得比較落伍。「如果一個人無法到教堂去聆聽一場優秀的佈道是多麼遺憾的事情。」她在1847年大聲疾呼，由於不懂希伯來語使她非常沮喪、但這並不意味著她有任何背叛的企圖。她決心要讓她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指導，而且可以加入到兄弟們公共禮拜的隊伍中」。因此，她的女兒康斯坦絲和安妮的成長過程混合了猶太教義與聖公會的形式。安息日在家裡進行簡短的家庭禮拜後，路易莎給她的女兒們上《聖經》課，當天餘下的時間裡閱讀猶太教和非

猶太教的宗教文學，他們涉及的課程包括《以色列歷史與文學》。贖罪日的戒律被很嚴格地遵守著，康斯坦絲在她1861年的日記中做了記錄。她的母親路易莎在1857年發表的安息日演講，比如有關誠實、家庭和睦、和慈善等內容，很多都包括在當代的聖公會佈道書裡：

主啊，您讓我感到如此幸福，您在您的成千上萬的生靈中如此寵愛於我，賜予了我如此多的祝福，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足以表達我對您的感激之情。我只能祈求您使我樂善好施，對那些遭受痛苦的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充滿憐憫之心，使我遠離自私自利，使我不會只考慮自己的好惡。主啊，請您讓我永遠不要忘記，給飢餓的人以食物、衣不蔽體的人以衣物、痛苦的人以慰藉，只要我還有能力和辦法去這樣做，否則我將不配享受您對我如此慷慨大方的仁慈，不值得您對我如此的厚愛和呵護。榮耀歸於我的上帝，阿門。

由於在這樣的一種宗教氛圍中成長，因此路易莎的女兒們像她們的母親一樣喜歡去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做禮拜也就不足為奇了。更加不同尋常的是，夏洛特成長於法蘭克福那種非常守舊的氛圍中，居然也有類似的傾向。在她給兒子利奧的信裡顯示，她經常參加非猶太人的宗教儀式和活動。作為地主，她認為她沒有理由不參與到自己地區聖公會教堂的事務裡。她在1866年聆聽了牛津主教在艾克頓教堂（靠近加奈斯貝）裡典禮上的佈道，她坦承她被他的彌撒給迷住了，但倫敦主教在伊令的一座教堂裡所做的同樣的事情就沒有給她留下太深的印象。在這方面，她並沒有顯得太獨特：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在捐贈蒙特莫爾地產時對牧師的任免進行了直接的干預，促使一名牧師離職。「我希望」夏洛特說道，「差異可以得以解決，因為在宗教活動活躍的時候，基督教牧師與猶太人捐助者間的爭吵總是讓人感到不快。」夏洛特被英國天主教的時尚世界所吸引，鑑證了（時間跨度正好一年的時間）一場天主教義賣活動，由曼寧大主教主持拿撒勒教堂典禮，在肯辛頓的加爾默羅修道會禮拜堂以及在慈善修女會教堂舉行兩儀式。在每次活動中，她都要回請這些天主教朋友，比如洛西恩夫人和林德赫斯特夫人。

夏洛特總是把她在這些場合中的所見所聞與猶太人聚會禮拜的情況做比較，比較後得出的結論並不總是有利於她自己的信仰，因而她

會出現比較強烈的批評傾向。在出席猶太免費學校的頒獎儀式時，她覺得：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13)

我被那些參加典禮的各色人等之間的反差所深深地刺痛，這些人有猶太學生、主教、資助人、朋友和來賓，他們也參加過（天主教）慈善會的類似活動……艾德雷博士（可能是總拉比的兒子赫爾曼，貝斯瓦特猶太教堂的首席牧師）簡單講了幾句話後就匆匆離去，就好像房間裡面有什麼瘟疫在流行似的，而格林先生（中央猶太教堂的A?L?格林拉比，他同時還是替她頒獎的人）從側門逃也似的離開，沒對任何人說半句話。沒有一個來賓，一個很大的空間裡擺滿了空椅子。我一個人就霸佔瞭如此大的地方，讓我感覺無地自容，我寧願退到唱詩班附近的一個角落裡。天主教的跪拜及表現的禮儀、絢麗的儀式，他們的各種做法、各種優秀的做法是那麼高貴和莊重，而我們，則根本沒有人來費這番心思。

按照這個說法，一切都變得十分明瞭了，因為它清楚地表明瞭基督教組織曾經向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申請過經濟資助。這些申請中有些是成功的，比如1871年，一位天主教牧師就說服夏洛特為他在布羅涅特福德的學校捐出了50英鎊。

這同時也表明羅斯柴爾德家族主要還是通過慈善工作來保持他們對宗教事務的影響力，男性為主的慈善形式一直以非常明顯的方式長期存在著。在維也納，安瑟爾姆在每個工作日的上午9點30分從瀏覽那些申請資助函開始每天的工作，他自己決定給每個申請人的資助金額；甚至在他每天到香布路恩動物園散步的時候，都有一名銀行的職員跟隨，給那些他遇到的乞丐分發硬幣。在法蘭克福，雅各布?羅森海姆是威廉?卡爾的「乞丐事務祕書」，但威廉?卡爾仍然自己對資助事宜做決定。他的兒子這樣寫道：

每天晚上，通常是20點或是21點，我父親都會到位於法爾伽斯的辦公大樓去面見男爵，有時候是去格魯內博格，親自將一份由我母親認真起草的，平均20～30人的申請資助人名單交給男爵。這些申請來自整個猶太人圈子，由每個國家最受尊重的拉比，以及來自東西方的福利組織推薦。根據每個人的具體情況，由男爵親自決定他認為合適

的金額。偶爾，他還會很愜意地閱讀收到的每一封感謝信。在提交給男爵之前，對每份申請的所有資訊都必須通過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某一位男爵信得過的拉比進行調查，每條資訊都要進行登記，並逐字逐句地抄錄到一本書裡。

對每份申請都如此謹小慎微確實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當申請資助的量大到用這種傳統方式根本無法管理的時候，特別是當從東歐移民過來的窮困猶太人的數量大量增加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對像列昂內爾這種處理幾百萬業務的人，期望他親自去處理那些像他在1850年給「為貧困的外國人建立救濟所基金」捐贈幾百英鎊，或者兩年後他的叔叔阿姆斯特洛讓他捐給法蘭克福猶太人女子學校的類似金額這樣的事情，就顯得有點荒唐了。因此，大量的這類工作開始被委託出去。在倫敦，阿希爾——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博士，1866年後當選為大猶太教會的祕書長——按照當時某媒體的說法，成為了列昂內爾的義務「私人慈善代表」，虛擬的「紐科特‘慈善部’經理」。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巴黎，費多回憶起了「一間特別的辦公室，有幾名僱員在那裡專門記錄資助申請，對申請進行研究，收集這些申請資助人的真實情況」。慈善變成了很難從更單調乏味的銀行事務中分離出來的一堆繁雜事務。1859年之後，這項工作的某些部分轉交給了新成立的「貧困猶太人救濟理事會」，或者說至少是由「貧困猶太人救濟理事會」進行協調。比如說在1868年，有一位名叫易曼紐爾·斯貝林的人——他是4個孩子的父親，「一位高度令人尊敬而且很值得推薦」的人，「非常渴望開一家小店，併為此目的自己籌措了很小的一筆錢」；索菲·本德海姆是戴維森家族一位遠親的女兒，她需要錢為她的女兒準備嫁妝。然而，這些事情從來也沒有取代過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公司中的慈善活動。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14)

羅斯柴爾德家族中的女人所處的位置使她們更加積極地參與到這類活動中，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慈善變成了她們的工作，她們對待這項工作與她們的丈夫在銀行工作一樣的勤勉。猶太人免費學校從內森的時代起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行善的一個重點；在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間，他們所投入的不僅是金錢，還包括夏洛特和路易莎（她的丈夫安東尼在1847年成為了該校管理委員會的總裁）對其事務性工

作的參與。當路易莎在1848年首次到校參觀的時候，她認為它是「一個優秀的機構」，為「大約900名從最底層家庭選拔出來的貧困兒童」提供「免費的教育」，但它的教育水準很低。她的小姑子夏洛特卻對這些「在貝爾街的小學生」很失望，她向她的兒子描述他們「無法形容的邋遢和骯髒——而且粗俗」。「永久地致力於改善這些高加索夏洛特經常用「高加索」我個詞來形容猶太人是她的信件裡很不尋常的一個特點。這個詞在這種用法是由18世紀的解剖學家約翰·弗雷德里希·布魯門巴赫生造出來用以描述五個人種型別其中的一種，這五個種類是他通過測量頭骨形狀區分出來的。另外的四種是蒙古人、衣索比亞人、美洲人和馬來西亞人，很顯然他是想為包括所有歐洲人和中東人在內的人種進行分類。人是一件很讓人沮喪的事。」她在1865年時宣稱，「一直沒有能夠在他們身上看到任何真正的進步。」她每週一次的貝爾街之行「根本談不上愉快」，因為「在我們社會裡的這些卑微階層非常骯髒，天氣不好時就裹在破毯子裡」。另外，她發現「要是不對他們的進步和總體的提高非常感興趣的話，根本就不可能走進這些貧窮、骯髒的小孩子中間」。到了19世紀70年代，通過她的努力——其中包括安排了一次馬修·阿諾德英國詩人、文藝評論家，曾任英國督學。——譯者注的視察——以及她的小叔子安東尼的努力，使局面有所好轉，學生人數增加了3倍，年度預算增加了20倍，教師數量增加了25倍。

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女人蔘與過的其他教育機構還包括建立於1855年的猶太學院，宗教知識傳播協會的安息日學校，以及由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於1867年在南倫敦創立的博拉猶太人學校。與以前一樣，還有救助病人的善舉。在成為猶太婦女慈善貸款會和婦女慈善協會成員的同時，路易莎還建立了一個猶太人康復之家，供應由夏洛特資助的位於阿替雷利街的特別廚房烹調出來的食物。此外，夏洛特建立了一個老年人臨終關懷之家，重組了倫敦慈善產房，出任婦女慈善貸款會以及東區母親之家縫紉協會的總裁。另外還有由羅斯柴爾德家族創立的位於懷特齊普爾的猶太嬰兒白天看護所，以及位於諾丁西爾地區沃爾枚路的猶太聾啞人之家。最後，夏洛特還積極參與了新改選後的救濟理事會（Board of Guardians）的各種活動。例如，在1861年的時候，她幫助格林拉比向理事會提供了10臺縫紉機，這些機器用於出租或者

出售給那些希望通過做針線活掙錢的貧困的移民婦女。之後，她每年捐助100～200英鎊給由格林建立的「女孩車間」。

在1884年對夏洛特的追思彌撒上，赫爾曼·阿德雷回憶說，夏洛特出版《禱告與默唸》和《致孩童》（最初是為女孩免費學校而作）的最主要的主題是「那些正遭受苦難、處於困境中的人，應該靠近我們和我們的憐憫之心……富人應該接濟窮人，‘給他們的不僅是金錢，還要包括時間，因為這意味著生命’」。她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他告訴與會者，夏洛特的臨終遺言是「心懷窮人」——這裡所指的窮人中，排在首位的是猶太窮人。然而，阿德雷沒有談到夏洛特整個人生在慈善「給予」和具體的宗教特徵的捐助之間存在著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在1864年，她曾經與格林拉比有過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

### 第一章 重新崛起（15）

當時他為他的教區向我申請一套新的法律叢書。他說，以前確實有一些信仰虔誠的慷慨大方之人，而那些迷信之人，儘管並不很富有，也並不慷慨，可還是會出於敬畏和恐懼的心理給寺廟捐獻；但是，現在的情況是迷信被文明消滅了，信仰虔誠的猶太人也不再慷慨了，而慷慨的以色列人又讓他們的善舉流入了世俗的渠道。我敢說他是對的——毫無疑問，我寧願把20英鎊給一個學校，也不願給一個虛幻的理念……

換句話說，對猶太人社群物質需要的真切關注一定程度上在於將猶太教作為一個有組織宗教的關鍵性的立場。同時值得關注的還有在猶太人精英內部開始出現了對東歐移民比例上升的憂慮。1856年，夏洛特組織了一場「支援猶太人移民貸款協會資助基金業餘音樂會」，由她的孩子埃維莉娜和艾爾福雷德表演，而路易莎是協會理事會的成員。這個組織的宗旨可以很容易推測出來。正如我們將在後面看到的，越多貧窮猶太人從東歐和中歐移居到英國，就會有越多的猶太人精英分子希望看到到處都湧現移民潮。

或許，羅斯柴爾德家族中這個時期對於慈善的態度改變得最明顯的，要算是詹姆斯了。這或許是對19世紀40年代發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反映，它表明了兩件事：一件是整個法國社會的反猶太人情緒，另一件是他自己在巴黎窮人中間的口碑不太好。在1848年以前，詹姆斯儘

量不讓梅耶·A·羅斯柴爾德的5個兒子參與到猶太人的社會生活中。儘管他在1840年與梯也爾的戰爭中竭盡全力捍衛了大馬士革猶太人的利益，但對巴黎的猶太人來說，他相應的貢獻就顯得太少了。革命發生後，事情發生了變化。在1850年，詹姆斯通知巴黎宗教法院，他決定在匹克布斯大街76號新建一所醫院，代替那座建於1841年的、已經難以為繼的「巴黎以色列貧民救治中心大樓」。兩年後的1852年12月20日，醫院——一座由讓·亞歷山大·蒂埃裡設計的巨集偉的新建築——在被《環球以色列人報》描述為「猶太人前所未有的一次巨集大的慶典」中正式起用了，出席慶典的有公共事務部部長、宗教局局長和塞納河地區的行政長官。在同一時期，詹姆斯還為由蒂埃裡為拿撒勒聖母大街的宗教法院新修建的羅曼諾·拜占庭禮拜堂捐出了巨資。同時還為在羅斯耶大街和蘭布拉第大街建立的兩座孤兒院做了鉅額捐贈（後者以薩洛蒙和卡羅琳命名）。

這些捐贈恰巧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更多地參與法國猶太人組織活動中的情況同步。1850年，阿爾方索成為了中區教會的委員；兩年後，古斯塔夫被選入巴黎教區委員會並在1856年成為了教區的總裁。1858年後，教區將它的資金存放在羅斯柴爾德兄弟銀行。這更像是詹姆斯在拿破崙三世政權下有意識地將自己定位在「政治局外人」的策略給了他擔當起猶太人社群領導者角色的信心，而這個角色，他的兄弟和侄子在其他地方早已經駕輕就熟了。然而，他對沒有考慮宗教戒律，花錢在黑武裡大街建立起幾乎是永久性的救濟站這樣的事情，表現得還是很謹慎。

或許，再沒有其他任何的辦法比用他們家族捐巨資在耶路撒冷新建醫院這件事情更能說明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他們貧窮的猶太兄弟所做的努力了，這家醫院在19世紀50年代由阿爾伯特·科恩主持建成。至少不下11位姓羅斯柴爾德的人出現在當時對醫院及其相關設施的捐助者名單上：夏洛特在那裡建立了「一家產業培訓學院」，並且每年都派人去視察；安瑟爾姆在那裡設立了一家小型銀行；貝蒂為孕婦提供衣物，而阿爾方索和古斯塔夫為40個年輕人提供了手工技術培訓。這個家族還支付了總共122850皮阿斯特埃及等國的貨幣名稱。——譯者注的「自願捐款」。幾乎家族所有支系的成員都出现在了行善名單上這個事實向我們說明，儘管他們的慈善活動一般以全國性——而且主要

是在城市的形式出現，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覺得他們對更廣泛的「世界性的」猶太人群體負有責任。這些努力並沒有獲得世界性的認可。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16)

### 爭取政治權利

如果不提列昂內爾為確保猶太人在國會下院中的席位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的話，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歷史是不可能完整的。同時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能把這個具體的問題與英國憲政程序中的「輝格黨人」歷史截然割離開來。猶太人被選舉為下院國會議員的憲法障礙——就職誓詞裡包含有這樣的句子「按照一個基督徒的誠摯信念」——只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19世紀40年代和19世紀50年代所面對的幾個重大挑戰之一。1707年通過的一個法案要求投票人也發同樣的誓言，但這不是嚴格強制執行的。對於他們具有類似重要意義的另一個障礙，是牛津大學的入學和劍橋大學的畢業。

另外，還有一些社會機構，儘管之前並沒有正式排擠猶太人，但從來就沒有允許過猶太人介入。能夠進入到這些機構，其重要性與正式推翻這些法律歧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按照英國19世紀時的法律，下院席位本身的價值有限；地區性的政治勢力基本上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有些方面甚至是能夠進入國會陳述的先決條件。另外，以城市選民為基礎的地方勢力與植根於鄉村選民的地方勢力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社會差異。因為很多關鍵性的政治決策並不是在於威斯特敏斯特，而在於「鄉村」——那些貴族的鄉村別墅所形成的複雜圈子，這些貴族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都會在這些地方度過。就算是在城裡，國會也不是主要的政治論壇：那些沒有成為一個或多個分佈在匹克迪利大街和帕瑪街的倫敦俱樂部會員的國會議員，政治生涯不會長久。當然，獲得進入下院的資格並不會為猶太人自動開啟進入上院的大門。

為什麼羅斯柴爾德家族想要推進他們進入這些英國政府機構的步伐？那種認為他們希望藉以增加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以便使他們對政府的槓桿作用最大化的功能性解釋根本說不通。可以肯定的是，很多非猶太人城市平民家族在這一時期出現在了下院（比較知名的有巴



林)。到19世紀40年代，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了城市裡最優秀的私人銀行；儘管在內森死後，他們與英格蘭銀行的關係出現了劍拔弩張的局面，但人們沒有理由懷疑，當出現英國政府需要借錢的這種難得一遇的情況時，它會很自然地想到紐科特。另外，就在他們得到了進入下院的機會以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幾乎沒有使用過它所帶來的便利——最多也只是把下院作為辯解的場所。我們認為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由於受到了母親的影響，列昂內爾希望贏得的是一種猶太人被剝奪了的根本性的權利。他在歐洲大陸上的親屬一直沒有停止為他確保進入國會所做的努力加油打氣：對詹姆斯來說，他的侄子是在代表所有的猶太人打一場具有象徵意義的戰爭，一場繼續了梅耶·A·羅斯柴爾德40年前在法蘭克福所進行的戰爭。也就是說，列昂內爾在追求自由的現實意義，儘管當時大多數政治家（包括約翰·羅素爵士）更傾向於給他貼上輝格黨人的標籤。促使他和他的兄弟們遠離托利黨人的原因不只是「猶太人問題」，還包括出現在19世紀40年代的更重要的原因——自由貿易，在託利黨1846年反抗皮爾的鬥爭中逐漸發現了自由黨的這個企圖。

在1848年還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矛盾：羅斯柴爾德家族正被歐洲大陸的自由主義者罵成是反動派的支持者的時候，他們正在英國領導著一場典型的爭取法律平等的自由戰爭。總的來說，猶太人的解放是法蘭克福議會的一項成果，儘管隨後在1852年，又在法蘭克福被廢除。就連貝蒂這種堅定的反對革命的奧爾良派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我們猶太人不應該……抱怨這個偉大的運動以及對利益的重新分配。每一個地方的解放都打碎了中世紀的枷鎖，把人權和平等的權利還給了那些盲從、浮躁的流氓無產者。我們應該對此為自己舉杯慶賀……」

## 第一章 重新崛起（17）

然而，對此我們也還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首先，在革命運動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反猶太人的元素；事實上，針對猶太人的暴力現象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對1848～1849年革命最反感的。第二，在某些方面看，實際的情況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地位被限制在了英國猶太人社群裡。與其他猶太人精英家族——比較有名的是戴維·薩洛蒙——之間的競爭毫無疑問是一個很強的動力。事實上，對於大多數生活在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情況可能更嚴重）的貧窮猶太人來說，能在國會

露臉就與能夠到劍橋上學一樣稀罕。在這些為猶太人權利所做的集體抗爭的所有說法中，羅斯柴爾德家族從某種程度上看一直堅持著他們作為一個家族的利益——具體來說，就是他們希望成為猶太人「皇族」。

根據隨後所發生的事件，特別要提到的是在1839年《猶太人綜合日報》發起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無情抨擊，指責他們破壞了猶太人解放的程序：

我們很傷心地看到德國出現的排斥猶太人的態度，這種情況在自由戰爭期間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了，但是現在卻隨著羅斯柴爾德家族企業的發展而不斷惡化；而且後者的鉅額財富以及他們的合夥企業已經對猶太人的奮鬥目標產生了負面的影響，以至於前者的增長導致了後者更為嚴重的惡化……我們必須將猶太人的奮鬥目標與羅斯柴爾德的家族企業及其合作伙伴徹徹底底地劃清界限。

當時的確出現了這個家族對更廣泛意義上的歐洲猶太人利益關注不夠的情況。例如，最先為猶太人在英國的政治權利贏得勝利的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而是他們的競爭對手——倫敦與威斯特敏斯特銀行的戴維·薩洛蒙，他在1835年當選為倫敦金融城行政長官，為英國的猶太人在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中取得了早期的勝利。在選舉的過程中，他和他的輝格黨支持者共同努力，最終使他們提出的廢除要求當選行政長官簽署有「以一個真正基督徒信念」等字句的宣告條款的提案獲得了通過。不是羅斯柴爾德而是費朗西斯·亨利·戈爾德施密特，成為了第一個被律師行業接受的猶太人。同樣，不是羅斯柴爾德而是他們的一位名叫摩西·蒙蒂菲奧裡的女婿，被授予了騎士稱號並被封為男爵，因此，正如詹姆斯所說，「提升了猶太人在英國地位」的不是羅斯柴爾德，而是伊薩克·萊恩·戈爾德施密特領導的猶太人爭取公民權利及基本人權協會。

然而在1840年的大馬士革事件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有關猶太人解放的問題上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首開在整個19世紀40年代應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影響力，改善歐洲大陸那些對猶太人不很寬容的國家的猶太人地位的先河。在1842年，詹姆斯去拜見基佐時「對波蘭猶太人的情況表示關切」，而安瑟爾姆正在協調各種媒體反對當時普魯士提出的新的反猶太人規定。在1844年，由尼古拉一世提出的進一步減少

猶太人聚居區的「令人作嘔」的措施，以及將俄國的猶太人學校和社群直接置於政府控制的計劃，促使列昂內爾在沙皇到訪倫敦前頻繁拜訪阿伯丁爵士和皮爾。當蒙蒂菲奧裡準備到俄羅斯去抗議政府對猶太人的不公平對待時，列昂內爾再次去拜見皮爾，請求為他去見內斯爾羅德伯爵寫封介紹信。按照同樣的脈絡，我們看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怎樣利用1848～1849年的羅馬政治危機，迫使教皇對梵蒂岡城裡的猶太人做出了讓步。

## 第一章 重新崛起（18）

就是在英國這樣一個以宗教刻板聞名的國家裡，羅斯柴爾德家族進行了為爭取猶太人權利而進行的最為著名的鬥爭，並且最終取得了勝利。這期間英國猶太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看都是不平常的，按中歐的標準看，這說明那裡的猶太人社群規模非常小。生活在不列顛群島的猶太人總人數在1828年的時候是27000人；32年後（經過幾十年空前的全國性的人口高速增長後），猶太人的總數也只是40000人——大約佔總人口的0.2%，其中半數生活在倫敦。在歐洲大陸，當時對待天主教的態度（特別是愛爾蘭的天主教）已有所改變，而對猶太人的敵視已經聽不到了。但是在法律上，儘管大多已經形同虛設，但仍然存在各種權利方面的限制，包括禁止猶太人擁有地產和捐贈學校。最重要的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很多的公共機構裡——其中最關鍵的是國會——都要求按基督教徒的方式起誓。廢除這個誓言成為了羅斯柴爾德在此期間政治活動的最主要目標。

在妻子漢娜的影響下，內森在1829～1830年《天主教解放法案》成功通過後，提出了猶太人的政治權利問題。羅斯柴爾德對托利黨的徹底失望可以上溯到這個時期，因為很明顯的是輝格黨人更有可能支援猶太人獲得相應的權利。這種政治調整在內森死後也一直在繼續，其直接表現形式為羅伯特·格蘭特在下院面對托利黨人的強烈反對，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放法案。迄今為止一直沒有引起眾多研究者重視的記錄顯示，納特在1841年為那些當選為地區性政府議員的猶太人爭取採用薩洛蒙當選倫敦金融城行政長官時使用的經過修改的誓詞的運動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只可惜運動沒有取得成功。托利黨人在參議院對這個議案的反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此非常在意——對改善與這一方的關係沒有任何作用。在保守黨贏得1841年選舉後的第一

時間，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朋友赫里斯就警告新上任的內政大臣亨利·古爾本，他可能得面對金融城裡「猶太人和經紀人」的反對：

你應該時刻牢記，所謂的貴族對你的態度不會像過去那麼友善。瓊斯·勞埃德、薩姆·格尼和羅斯柴爾德家族這些人在金融城選舉中的傾向，表明他們對保守黨沒有好感。但他們不會太感情用事，去為自己的利益設定障礙，儘管他們永遠不會原諒否決了為猶太人當選下院議員掃清障礙的提案。那些資本市場的巨鱷比其他領域的任何人對財政手段的支援或是阻礙都更有力量，就算那些人的資本比他們的還大也無濟於事。

一封來自於一名當時的積極分子的信證實了梅耶確實參與到了金融城裡的選戰，他組織人為自由黨投票。很重要的一點是梅耶在1841年的時候被選為了布魯克斯俱樂部的理事。一直到了1852年，他的弟弟安東尼也成為了一名理事。兄弟倆同時還是另外一家公開的政治改革俱樂部成員。同樣的，在1852年的時候，阿爾方索成為了一家高階賽馬俱樂部的會員，同時還是團結之家（Cercle de l'Union）的成員。

當皮爾要求威靈頓為支援他的政府擂鼓助威的時候，這位公爵也表現出了同樣的悲觀。他警告皮爾：「羅斯柴爾德家族並不是沒有自己的政治目標，特別是老夫人（漢娜）和列昂內爾先生。他們一直都渴望著得到對猶太人政治權利訴求的支援。」儘管他「現在比在倫敦的時候更像是一個托利黨人」，納特強調說他對皮爾的支援是在嚴格的條件基礎上的：「我相信他對我們可憐的猶太人是有同情傾向的，如果他能還給我們相應的權利，他就會得到我的支援。」對於納特來說，使羅斯柴爾德家族疏遠了保守主義的原因，僅僅只是出於猶太人利益的考慮。就像他在1842年的時候，用半真半假的口吻寫道：

## 第一章 重新崛起（19）

你們應該知道，儘管我在英格蘭是一名堅定的輝格黨人，在這裡又是狂熱的保守主義者，但我認為如果那不是從身體的某個部位移除一小部分，而且也不是比利（安東尼）一直認為的最具重要性的那一部分，如果它使我們不能行使那些根本不瞭解我們艱難處境的那些人同樣的政治權利和基本人權的話，我想你們應該也得採用後面的那種思維方式。

儘管外表看起來總體上更像是自由黨人，但安東尼很樂意看到皮爾與他的黨派在下院遭遇到麻煩，他認為——看起來似乎是正確的——這可能會使他「向自由理念的方向上轉變一點，如果羅伯特爵士能為可憐的猶太人做點什麼的話，我就信任他」。至於列昂內爾，他在1843年10月的城市補選中毫不猶疑地支援自由黨候選人詹姆斯·帕蒂森，為了投票，他竟然號召猶太人選民們打破安息日的規矩。這些選票對選舉的最終結果是決定性的，因為帕蒂森僅以非常微弱的優勢擊敗了他的托利黨人對手——也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對手托馬斯·巴林。

然而，列昂內爾對學戴維·薩洛蒙的樣子直接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一直表現得遲疑不決。對他的這種遲疑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純粹行為上的問題：政治可能佔用掉一個像N·M·羅斯柴爾德公司這樣如此規模巨集大的高階銀行的合夥人的寶貴時間。或許列昂內爾同意詹姆斯的觀點——這個觀點早在1816年的時就提出來了——「一旦一個商人參與了太多的公共事務，他很難再繼續他的銀行業務」。另一方面，來自家庭成員的壓力——包括詹姆斯——要求他做些工作來提高家族成員在英國的地位，也是相當大的。詹姆斯對政治活動的概念還停留在19世紀20年代那些已經過時的經驗裡，當時，他和他的哥哥們通過迎合與他們有業務往來的各個地區的封建領主而精神抖擻地去領受各種各樣的頭銜和勳章。

他試圖在1838年鼓勵他在英國的侄子去做同樣的努力，他告誡列昂內爾說：

我已經與比利時國王進行了長談，他向我們承諾同意給英格蘭女皇寫封信，他還安排他的妻子寫信給他們，要求你應該應邀參加所有的舞會……國王給四兄弟下了一道諭旨……如果你，我親愛的侄子，喜歡這些綬帶，那麼我保證下次你就是受勳的人，只要條件允許，儘管在英國並不佩戴這些東西。

不太過時的是安瑟爾姆「在一兩年之內能夠來為你們中的一個人慶賀坐上了國會的席位，並聆聽你們的精彩演講」的期望。當伊薩克·萊恩·戈爾德施密特在1841年成為第一位猶太人準男爵時，安東尼從巴黎寫來的信上說：「我已經喜歡上了列昂內爾·德·羅斯柴爾德爵士，

他是可靠的。」類似的，當薩洛蒙在1843年被授予維也納「榮譽市民」時，安東尼明確地希望這件事能「在古老的英格蘭產生反響」。

壓力在1845年時急劇加大，因為戴維·薩洛蒙又得到了很重要的一分。在贏得了泊特蘇肯市參議院的城市選舉後，薩洛蒙面臨著「以一個真正基督徒的信念」的誓詞問題。在他拒絕起這個誓後，阿爾德門法庭宣佈他的當選無效。薩洛蒙向皮爾抱怨，與安東尼所預測的一樣，皮爾對猶太人給予了更多的同情，他通知官林德赫斯特起草一個法案，廢除了所有遺留下來的影響猶太人權利的地方性歧視性規定。該法案於1845年7月31日生效。同年，禁止猶太人擁有不動產的老法律也取消了。列昂內爾事實上在確保這份議案的通過方面也很盡力，他作為由仲裁委員會派出的5人小組的成員，為這件事去遊說皮爾。但薩洛蒙獲得的榮譽卻引發了列昂內爾那些充滿競爭精神的親戚們的不滿。「我本來應該很高興看到您成為倫敦的勳爵，而且是代表金融城的國會議員。」列昂內爾的兄弟納特寫道，「你應該去遊說東印度公司，我親愛的列昂內爾。」一年後，納特還是在不斷地重複著同樣的內容：「我們的法國老頑固.....全都在說你不久就會進入下院，而且你現在正在做著準備。」當薩洛蒙在獲勝後不久訪問巴黎時，漢娜很冷淡。她在給夏洛特信中說：「我們應該允許他去享受（這種出於良好動機的）成功所帶來的滿足感，我們自己應該全心全意地參加，滿懷著美好的意願，這是我們真心希望和相信會對我們所屬的群體帶來益處的意願，從這個角度看，我不懷疑個人的榮譽和影響將會受到適當的重視。」薩洛蒙再次當選為市議員，時間是1847年12月。在1855年的時候，他繼任倫敦市長勳爵。摩西·蒙蒂菲奧裡在1846年獲得的準男爵爵位使安東尼滿心希望「當輝格黨人來到的時候.....他們會想到應該給你一些什麼榮譽」。皮爾的政府一倒臺，納特立刻就敦促他的兄弟「旗幟鮮明地站出來，或者明確地宣告你代表金融城」，建議他「約一些聰明的朋友過來，在晚上的聚會一個小時左右，一起讀一些東西，對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問題能更多些把握」。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20)

敦促列昂內爾在政治上更積極一些的不只是他自己的家族。1841年，愛爾蘭領導人丹尼爾·奧康奈爾的一個政治協會邀請他「作為貴民族最有影響力的一位代表」，出席一個公共（在安客客棧），他提

議討論「猶太人的政治地位」。兩年後，基於他自己希望參與倫敦市大選的假設，有人主動提出為他助選。

列昂內爾仍然很勉強。當其他人——其中包括他的弟弟梅耶，他在2月份時當上了白金漢郡的高階行政長官他馬上在懷特?哈特酒店在擺了一個星期的盛宴，由法國廚師按照以他的鄉下鄰居的飯量計算的需求臨時製作菜品。當地的報紙抄錄了菜譜，以崇敬的口吻稱讚「所上菜品的味道已經到了極致」。——爭先恐後地湧入薩洛蒙開啟的這個缺口的時候，列昂內爾卻一事無成。甚至在新任的首相約翰?羅素勳爵授予他準男爵榮譽的時候，他還很固執地拒絕接受，這讓他的親戚非常意外。他是羅素提交給女王的三人名單中的一位：按照女王的日記，另外的人是弗格森上校，還有一人，「他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說明維多利亞對這個事情並不是很在心。實際上，這個人是弗雷德里克?居里，孟加拉政府的祕書。列昂內爾可能覺得不值得為皇室的這種小恩小惠太多的精神。列昂內爾為他這樣做所給出的理由充分證明了他具有意氣用事的性格特點：他不情願接受已經授予過另外兩個猶太人的榮譽，如果不能獲得貴族的身份，任何稱號都不會讓他滿意。阿爾伯特王子在報告中說他這樣問：「沒有更高點的榮譽授予我嗎？」這種率直比較符合他父親的口味，但是他的母親漢娜生氣了：

我認為拒絕對你來說沒有什麼好處，正如你那位從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據推測應該是羅素）所說的，她還能授予你什麼更好的？目前還不可能不宣誓就直接給你封爵，而宣這個誓恐怕你也不會願意。從王室得到的個人榮耀應該珍惜，它可能帶來其他的利益，如果拒絕它則可能讓人惱怒——而且你接受它也並不意味著你放棄了你本來的地位。這可能會光耀你的門庭。之前對其他兩位紳士的封賞我想跟你這次沒有什麼關係——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這並不會使授予你的榮耀失去任何光芒——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請原諒我的直率。

他兄弟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會接受這個封賞，面對現在的局面他們全都大惑不解。納特用輕鬆的筆觸寫道：「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接受英國的準男爵爵位，這比做德國的男爵好多了——老比利認為安東尼爵士聽起來非常悅耳，就算你自己不想要，你也應該為了他而接受它——我們所有人都得到了非常漂亮的字，門特摩爾的梅耶爵士這個稱號甚至閃耀在一場羅曼史裡。」詹姆斯也加入進來了：

我祝福你，我親愛的列昂內爾，你是如此幸運，尊貴的女王竟然這樣眷顧你，真是謝天謝地。你一定得小心，你的阿爾伯特王子說不定會嫉妒你。因此，我要敦促你接受它，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應該拒絕這樣的榮耀，而且任何人也不應該坐失這樣的機會。以前我應該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然而現在已經沒有可能了。

但列昂內爾依然不為所動。最後，打破這個僵局的唯一辦法是由安東尼來接受了這個封號。不同尋常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規定，如果安東尼沒有男性子嗣，則這個封號將傳給列昂內爾的長子。甚至他的最終讓步——他終於同意以自由黨候選人的身份參加1847年的大選——也都是在「猶猶豫豫」中做出的。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21)

列昂內爾參加國會競選的決定——他在1847年6月29日被自由黨倫敦註冊委員會接受為候選人——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歷史上是一個分水嶺。他這個決定所導致的結果是，羅斯柴爾德這個名字從此與爭取猶太人政治權利的運動緊緊地聯絡在一起；在接下來的10年中，他把大部分時間投入到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選戰和國會論戰中。為什麼這個公眾人物中最勉強的一位在完全可以輕易地將這個戰場留給薩洛蒙——或者也可以讓給梅耶（他不遵從他長兄的意願正在為海斯做同樣的事）時，會這樣投入？顯而易見的答案是來自家庭的壓力最終使他無法抗拒。第二種可能性是說服他參選的不是他的親屬，而是約翰·羅素爵士，他自己是在任的金融城下院議員，他希望確保自己來自猶太人的選票。第三種可能性是列昂內爾並不希望能勝出，只是以一個「著名的新聞事件」的形式收場，做出一個象徵性的姿態。至少有一名與他同時代的人認為他會失敗，而且他只是被輝格黨人設計，拖進來為「他們承擔他們所有的開銷」。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猶太人候選人無一例外地落選了：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角逐，要是托利黨人不分裂，那麼輝格黨和改革派就只會在下院取得簡單多數。

維多利亞時期，倫敦市複雜的政治選情使人們對勝利喪失了信心。向東遠至哈姆雷特塔的選區是比較大的一個（1847年投出了接近50000張選票），有4個下院議員席位。這一次，總共有9位候選人——自由黨人4名，皮爾派保守黨人1名，保守黨人3名，自由候選人1名，競爭非常激烈，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就舉行了大約12場公眾聚會。列昂



內爾的參選綱領給人的第一印象並沒有什麼特別：除了顯而易見的「信仰自由」的宗教綱領外，他宣佈他支援自由貿易。很明顯，他並沒有遵從納特的建議「走得比約翰爵士稍遠一點」並「儘量地朝自由的方向走」。仔細研究就會發現，他所採取的立場甚至有可能傷害到他自己：他提倡降低菸草和茶葉的進口稅，推行財產稅，這種立場廣受沒有投票權的窮人歡迎，但很難想象能在有錢人的選舉中勝出。儘管得到了一位名叫勞齊的富有遠見的天主教牧師的明確支援——而且看起來列昂內爾接受了他的支援——但列昂內爾宣佈他本人反對增加給梅努斯天主教學院的捐款（儘管他迴避了政府對教會學校資助這個更為廣泛的原則問題）。猶太人的選票也並不像想象中的那麼重要：當時還沒有太多的猶太人獲得投票的資格，而且去登記投票的人也不多。列昂內爾得到了至少一個猶太人保守團體的支援而且得到了他母親的保證，「猶太人.....將會組織起來，身著盛裝去為你投票，」皮爾派保守黨馬斯特曼儘管宣稱反對猶太人的解放，但他也在設法保證選舉的順利進行。

從另一方面看，列昂內爾具有兩種優勢。在倫敦，報紙所起的作用要比在這個國家其他地方大很多，而他與新聞界人士的聯絡很快就建立起來了。可以肯定，當時猶太人出版事業尚在襁褓之中。1841年，他與其他人一起投資了雅各布·富蘭克林的《雅各布之聲》，之後不久改版為《猶太新聞》（Jewish Chronicle）。但列昂內爾對《時報》29歲的編輯約翰·薩杜·德蘭來說是一位非常有影響的贊助人，而約翰·薩杜·德蘭則成功地為他起草了他的競選演講。站在德蘭的角度，他相信是他保證了列昂內爾的勝利：他發現結果公佈後，夏洛特「處於一種欣喜若狂的興奮及滿心感激的狀態之中」，而他被納特和安東尼鋪天蓋地的感謝所淹沒。《經濟學人》也給予了很大的支援。另一方面，對猶太人的解放持反對態度的人，只是通過站在他們立場上的記者進行辯論。歷史學家J·A·弗勞德回憶當他們站在匹克迪利148號前時，托馬斯·卡萊爾的感慨：

## 第一章 重新崛起（22）

我並不是說我希望約翰王再回來，但是如果你要問我用哪種方式對待這些人更接近全能的上帝的意願的話——是為他們建立像這樣的宮殿，還是帶給他們鉗子——我選擇鉗子.....「閣下，現在政府需要

你與你的金融機構所聚斂的數百萬英鎊中的一部分，你不給？很好」——說話的人用他的手腕緊一下旋鈕——「現在給了嗎？」——再緊一下，一直到拿光這幾百萬元。

有些不可思議的是，卡萊爾聲稱，如果他寫一本支援廢除限制人身權利的小冊子的話，列昂內爾就會給他一筆很慷慨的潤筆費。卡萊爾大概是這樣回覆他的：「這不大可能……我也發現我無法想象為什麼他和他的朋友們應該正在等待著希洛，到來的時候，還要尋求在外邦人的立法機構中的席位。」他在給下院議員蒙克頓·米爾尼斯的信中表達了相同的觀點：「猶太人很壞，而一個假猶太人、一個騙子猶太人又怎麼樣？而且，不管他所有的思想、行動和努力的方向如何，一個真正的猶太人又怎麼可能企圖成為一名參議員，尤其是作為破落的巴勒斯坦之外的其他國家的公民？」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卡萊爾正處於與亞歷山大·巴林的妻子哈蕾·阿西布坦夫人的三角戀中。不過，卡萊爾沒有把對列昂內爾的抵制公開化，並沒有像《先驅晨報》那樣稱列昂內爾為「外國人」，也沒有像一位託利黨候選人那樣說列昂內爾的最適合的地方是「作為猶太的王子之一，在猶太的王國」。卡萊爾的態度明顯地站到了薩凱雷的對立面，薩凱雷在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交往之後，經歷了對這個問題的一個轉變過程。具體來說，他表現出了對安東尼的妻子路易莎的好感，他為在1848年時對她的攻擊做了道歉。他在1850年2月參加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宴會（發現這家的女人「都很不錯」），在1856～1857年間，與路易莎偶爾有友好的書信來往。她出現在《潘登尼斯》上的表象是「一位猶太女士……腿上坐著一個孩子，她面對孩子的臉上閃耀著甜美的天使般的光芒，似乎是一種聖潔的光輝環繞著兩人。我承認，我應該會跪倒在她的面前」。

對卡萊爾說法的一種迴應，通過列昂內爾所擁有的第二種也許也是最重要的優勢財力表現出來。根據輝格黨戰爭部部長格雷爵士的說法，他「毫不掩飾他做出的使用金錢來幫助選舉的決定」。納特在隨後從巴黎給他寫來的信中，說明他的哥哥確實「付出了……很大的金額」。最後，這些付出改變了選舉的天平。列昂內爾在投票中獲得了6792票，位列第三；其他幾位分別是羅素7137票，帕蒂森7030票，馬斯特曼6772票。他以3票之差擊敗了另一位自由黨候選人拉朋特。他的天主教代理人勞齊相信，是他在那一天拯救了列昂內爾，而他支援列

昂內爾的動機則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圖。勞齊的信很值得一讀，它散發著那段時期特有的政治氣息：「坦率地說」——我完全同意大家都在講的，也就是，您，尊敬的男爵，得到了天主教徒的報答，他們對您正義理想的認同決定了您的勝利.....對您來講，這是什麼樣的遠見卓識啊，兩個月前，您派人找到我，不顧自己的尊嚴，謙恭地請求我在即將到來的選戰中給予您幫助！我做到了——儘管你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為我的都會組織提供幫助，我還是誠心誠意而且熱誠地幫助您——讓您看到了我作為天主教牧師的素質.....從一開始，我的偉大計劃就是決定讓天主教選民以團體的形式為您投票——您根本無法想象，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經受了什麼樣的痛苦和磨難，我總是通過不同的機構對他們做工作，幾乎不能使用這個影響，這主要是為了防止他們被什麼偏見控制。正當我們開始陷入絕望的時候——因為我們面臨著巨大的阻力，無法克服或者是繞過——我們成功了.....而在做所有這一切的時候，我時時刻刻面臨著因為債務被逮捕或者是眼睜睜看著教會組織的財產執行的危險：同樣，我在此函中所寫下的每一個字是完全的而且神聖的事實.....現在我對您說的所有這一切只是想強調：您沒有欠我什麼，我不想從您那兒要求什麼，天主教各教會不想從您那兒要求什麼，我自己會承擔所有的開銷.....而且以名譽發誓，無論是現在還是以後任何時候，我什麼要求都不會向您提，但是從現在算起，一年以前我向您提出的關照，當時我們倆誰到沒想到會有一場選戰——我為您盡了我的努力.....我的心裡沒有半分鐘的懷疑，您會對我盡您的責任。」列昂內爾似乎沒有完全滿足勞齊的願望——儘管地安排他與被放逐的梅特涅進行過接觸。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23)

對於家族中的其他人來說，這是他們長期以來所期待的政治勝利。納特寫道，「這是家族中一個最大的勝利，同時也是對身處德國以及全世界可憐的猶太人最大的喜訊。」他的妻子稱「擁有像你這樣最傑出的戰士，是猶太民族新紀元的曙光」。「缺口已經開啟，」貝蒂歡呼道，「誹謗、偏見與狹隘的障礙顯然正在消除。」甚至梅特涅（他似乎沒有想到自由黨人的一場勝利會在一年之後使他被放逐）都發來了賀信。然而，所有這些令人愉快的祝賀都忽視了一個事實，如果列昂內爾想要坐到下院議員的位置上，他還必須宣誓「以一個真正

基督徒的信念」——當然，除非政府能通過那項11年前已經證明不可能被通過的議案，也就是廢除這個誓詞的法案。羅素早就已經提出過一個類似的提案。事實上，列昂內爾的勝利只有當這種提案在國會的兩院投票中都獲得多數支援時才有可能最終得以實現。

### 盟友的支援

列昂內爾的選舉所引發的問題隨著對這個可預見的結果是感興趣還是敬而遠之，把英國的政治精英們分成兩派。出乎人們預料的情況是，羅素廢除國會剝奪人權的提案所受到的支援不僅來自議院裡他的盟友，還得到了來自兩派分裂了的托利黨人的支援。當他在1847年正式提出這份法案的時候，主流皮爾派保守黨成員格萊德斯東和保守黨領導人喬治·本丁克爵士和迪斯雷利都表示了支援。當然，迪斯雷利是對此最感興趣的人，儘管他的動機和行動非常複雜——複雜的程度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到那時為止，迪斯雷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相識已經接近10年了。他與這個家族有記錄的最早交往是在1838年，此時，他們已經非常熟悉，足以保證當他在1842年訪問巴黎時可以享受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友好接待。到了1844～1845年，他和他妻子瑪麗·安娜常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一起吃飯：1844年5月、1845年6月兩次，那年夏季的晚些時候在布萊頓還有一次。1846年的時候，列昂內爾幫助迪斯雷利在法國鐵路上進行投機，稍晚，又幫助迪斯雷利處理他的債務糾紛（當時的金額超過了5000英鎊）。這份友誼超出了迪斯雷利對他們金錢的欣賞，而他們也很欣賞迪斯雷利的智慧。這是迪斯雷利作為小說家最為高產的時期：1844年有《科寧斯比》和《年青一代》，1845年有《女巫》和《兩個國家》，1847年有《唐克雷德》與《新十字軍》。羅斯柴爾德家族對這些著作所提供的幫助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但這種認同的程度還遠遠不夠。

大概是由於他曾經受過洗，而退教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他的父親依薩克與其猶太教會鬧翻，同時他總是把自己想象成鄉紳的原因，迪斯雷利一生都對猶太教充滿了興趣。他的政敵試圖用他的血統來攻擊他，但迪斯雷利勇敢地把別人看成是弱點的東西變成了自己的力量。特別是在19世紀40年代的小說中，他把自己的猶太人「種族」與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相調和，有力地說明他享受著這兩個世界中最好的

東西。毫無疑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交往對他的猶太主義特徵有很大的影響。列昂內爾和夏洛特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對，列昂內爾富有而又有影響力，夏洛特聰明而又美麗；但他們身上最吸引迪斯雷利的——實際上還包括他的妻子——是他們渾身上下的猶太氣息。另外，對沒有子嗣的迪斯雷利夫婦更具吸引力的是他們的5個子女。迪斯雷利寫道（1845年6月邀請他們到格羅夫納門觀看海德公園裡的遊行），他們是「美妙的精靈」。

## 第一章 重新崛起（24）

3個月後，這個家庭接待了歇斯底里的瑪麗·安娜的一次奇異造訪，她讓自己倒在了夏洛特的懷裡。在發作過後，她和迪斯雷利都進入了精疲力竭的狀態（「我一直忙於校清樣，出版商是那麼討厭……可憐的迪斯一直坐在那兒寫了一整夜」），因此他們準備動身前往巴黎，瑪麗·安娜做出的舉動讓夏洛特嚇了一跳，瑪麗·安娜宣佈她希望把夏洛特6歲大的女兒埃維莉娜指定為她遺囑裡的唯一受益人：

迪斯雷利太太深深地嘆了口氣，說道：「我這是來告別的，我也許再也見不到你們了——生命是這麼無常……迪斯和我可能會在火車或者輪船上喪命，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愛我的人，除了我尊敬的丈夫，這個星球上也再沒有我關心的人，但是我喜歡你們這個家庭……」

「……我使出渾身解數安撫我的客人。」夏洛特寫道，「她在對我細數完她的細軟和財產後，從她的口袋裡取出一張紙，‘這是我的遺囑，您一定得看看，把這個事告訴尊敬的男爵，而且您要替我保管好它’。」

當夏洛特輕聲告訴瑪麗·安娜，她「無法承受如此重大的責任」時，瑪麗·安娜翻開那張紙，大聲地讀道：「‘萬一我心愛的丈夫先我昇天，我將我個人的所有財產全部留給並贈予埃維莉娜·德·羅斯柴爾德。’我愛猶太人，’她繼續道，‘我已經把自己與您的孩子們聯絡在了一起，她是我的最愛，她應該也必須戴上蝴蝶（瑪麗·安娜一件珠寶的名稱）。’」

這份遺囑在迪斯雷利和他妻子之間發生了「一個事件，一個非常令人不快的事件」之後，在第二天早上被退了回來。然而，這對夫妻

對家庭生活的興趣卻絲毫沒有任何減退的跡象。當利奧在1845年出生的時候，迪斯雷利（在寫自巴黎的一封信裡）表達了他的期望：「他將證明自己無愧於自己純正和神聖的民族，也不遜於他那些漂亮的兄弟姐妹。」「我的天啊，」瑪麗·安娜在見到這個孩子時驚呼道，「這個漂亮的孩子可能會是我們正在等待的未來的彌賽亞——天曉得！而你將會是最幸福的女人。」

在迪斯雷利與夏洛特的關係中，總是存在著一種失落的仰慕情愫，同時又夾雜著對他妻子瑪麗·安娜難以掩藏的嫉妒。對於這種仰慕，迪斯雷利沒有否認。「在我一生的奮鬥過程中，」他在1867年3月對她坦白，「來自於那些我們所愛的人的關懷是一種慰藉，我對您的愛無人可敵。」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個說法並非僅僅是迪斯雷利式的修辭手法。有一次，當夏洛特造訪迪斯雷利家時，很顯然有某件事情牽涉到了瑪麗·安娜，迪斯雷利趕忙道歉：

我認為……我對給您造成的麻煩深感內疚，總體說來，昨天您要是沒碰上是最好的，因為錯過了睡覺的時間以及其他原因，她處於一種高度興奮狀態，因此我現在再也不在晚上見她。

她……希望將她對您的愛帶給您，我也將把我的愛帶給您，而且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經把我的愛給您了。

所有這一切中最奇怪的是瑪麗·安娜對夏洛特有確鑿證據的深厚的友情——或許是對她可能感覺到的那些嫉妒的補償。當迪斯雷利夫人在1860年病倒的時候，「她有氣無力地讓我寫信給您」，迪斯雷利信手在一張便條上寫給夏洛特。作為迴應，羅斯柴爾德家族從匹克迪利的餐廳送病號飯。（瑪麗·安娜病逝後，輪到夏洛特來嫉妒了，因為迪斯雷利「跪倒在布萊德福德夫人腳下的時間越來越多」。她做出的迴應是給他送去了6大筐英國草莓、200把巨型的巴黎聖水刷，以及人們所能見到的最大最好的斯特拉斯堡肥肝。這只是一個聰明的提醒，讓他不要忘記她的資源總是要遠勝那些「有錢的老婦人」）。

## 第一章 重新崛起（25）

或許他們之間的關係中最獨特的方面在於信仰模糊。按照夏洛特的回憶，迪斯雷利對待自己猶太人的根總是很矛盾。「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她在1866年寫道，「當我斗膽宣稱，蒙蒂菲奧裡家族、莫卡

塔家族和林多家族的親緣關係，路易莎·德·羅斯柴爾德夫人非常榮幸地成為他的表親時，他居然被驚嚇得茫然失措；但是連老天都搞不明白的是，不知道迪斯雷利想的是什麼，儘管倫敦到處都是他的親戚，但他對他們的存在根本毫不在意。」但當他們討論宗教問題時，兩人發現了太多的共同點。在1863年，他送給了她一本歐內斯特·勒南 Ernest Renan，1823～1892年，法國文獻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寫有系列著作基督教起源史。——譯者注最新出版的，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議的《耶穌生平》（Life of Jesus）。她覺得勒南在剔除基督神話色彩方面的嘗試「很精彩」，但她對他的猶太背景的描繪持保留態度：

讀起來就像是由一位熱情洋溢的詩人寫出來的美麗詩篇，詩人受到鼓舞去揭示真理，用滿腔的柔情、無限的敬仰以及熾熱的情懷來揭示它。對於那些有知識的猶太人來說，我相信他們不會對書中主要人物——這個創造了統治世界長達1800年的基督教的偉大宗教締造者——的處理覺得有任何新意；但很多我們的教友對於被勒南描寫成這種刻板、令人厭惡的形象深感痛心。當偏見最終開始消散的時候，看到一個長期遭受迫害的民族正在忍受著那些冷靜的讀者和誠實的思想者將我們嘲笑為不可救藥的骯髒、冷漠、狡詐，甚至是頑固、鐵石心腸又小肚雞腸的時候，更是讓我們無法釋懷。一個偉大的作家表現得如此公平和公正，特別是在表達他的見解方面——他的判斷是如此準確、他的感情似乎是如此純粹和高貴，不應該通過介紹如此極端的陰暗面來拔高他的偉大形象——就好像是他覺得需要通過誹謗猶太人來彌補宗教世界中從全人類利益的全部主體中最偉大、最至高無上的部分所拿掉的那部分特權。

10年以後，迪斯雷利非常感謝她送給了他一本她寫的《致辭》。

「我讀了您寫的書，感同身受而且充滿了敬佩。」他寫道，「瀰漫在全書中的那種柔情，以及那些虔誠和令人振作的情感，肯定能觸動所有信徒的心靈。昨天晚上（在安息日的聖潔氣氛中）我有幸朗讀了一篇，它表現出來的虔誠及深遠意境深深地打動了我的聽眾……」

迪斯雷利所有的小說都應該按照這種方式來理解。在《科寧斯比》中，希東尼亞的性格特點按照布萊克爵士的說法，是列昂內爾和迪斯雷利本人的交融。說得更準確點，他具備了列昂內爾的背景、專

業技能、宗教、性情，甚至也許是外貌（「面色蒼白，眉毛濃密，深邃的眼眸裡寫滿了睿智」），但他的政治理念和哲學觀點則是迪斯雷利的。因此，他告訴我們，他的父親在半島戰爭中發了財，然後「決定移民到英格蘭，經過幾年的努力，形成了很多商業網路。他在巴黎和會後到達這裡，隨身帶來的是他的鉅額資本。他把所有的資產押在了滑鐵盧貸款上，這個舉動使他變成了歐洲最大的資本家」。戰爭結束後，他和他的兄弟們將他們的錢借給了歐洲國家——「法國想要一些，奧地利更多一些，普魯士要一小點，俄羅斯要幾百萬」——他「成為了世界金融市場的主宰和領袖」。年輕時候的希東尼亞具備了一個銀行家的所有技能：他是一位非常有造詣的數學家，而且「完全掌握了主要的歐洲語言」，這些技能通過到德國、巴黎和那不勒斯的旅行而得以磨鍊。他冷靜得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對這種品質的描寫花了很大的篇幅（例如「他對感性的東西總是縮手縮腳，而且常常用一些尖刻的話語來搪塞」）。我們甚至讀到了「他對室外體育運動的熱愛……是他的精力的安全閥」。還有一段細節的描寫，而這些細節只可能出現在巴黎的某一家羅斯柴爾德酒店。很有意思的是，希東尼亞也是小說主人公的情敵：主人公錯誤地懷疑他深愛的艾迪絲是希東尼亞追求的目標，儘管最後披露出來的結局是冷血的希東尼亞自己本身是另外的人所暗戀的目標。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26)

在這樣的情況下，在《科寧斯比》中最令人玩味的段落是那些有關希東尼亞信仰的內容。關於這個問題，前面所說的是他信奉「使徒們在跟隨他們的主人之前所傳揚的信仰」，而在後面所說的是他「對偉大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典表現出了的忠貞，與號聲一直響徹西奈半島的時候別無二致」。他「為自己的血統感到驕傲，對自己族人的未來充滿信心」。在一個重要的方面，希東尼亞與迪斯雷利的相像程度遠甚於列昂內爾，因為他說他出生於西班牙的馬拉諾——西班牙系的猶太人，他們表面上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來的宗教——而且迪斯雷利喜歡幻想自己的家族是西班牙系的猶太人。但餘下的絕大部分很顯然來自羅斯柴爾德的啟發。因此，年輕時候的希東尼亞被「關在了大學和學校的大門之外，這些大學和學校對於學習以及先人的事業來說缺乏古代哲學的最初知識」。另外，「他的信仰使他不可能追



求成為一個公民的理想」。然而，「在地球上沒有任何一種想法可以誘使他傷害自己種族的純潔，因為他一直為此而備感自豪」而去與外族通婚。只有當希東尼亞闡述對自己種族的看法時，迪斯雷利才接替了列昂內爾：

希伯來人是一個沒有被混雜的種族.....組織沒有被混雜的種族是大自然的貴族.....在廣泛的旅行中，希東尼亞拜訪而且檢視了整個世界上的希伯來人社群。他發現，總體上看，較下等的階層情況比較差，而上層人士沉浸在對骯髒事物的追求中；但他發現知識的發展沒有受到破壞，這給了他希望。他被說服相信組織能經受住迫害的考驗。當他反省他們所經受的那些磨難的時候，發現種族居然能夠倖存下來，這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不管過了多少個世紀，遭受了多少個世紀的謫貶，猶太人的思想對歐洲事務仍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不用提他們的法律，這些法律你們還在遵守；不說他們的文學，這些文學滋潤著你們的思想；我只說說活生生的希伯來人的才智。

然而，就算在這裡，羅斯柴爾德的影響也是清晰可見的。當迪斯雷利想辦法說明他關於猶太人影響力程度的觀點時，他非同一般地直接取材於羅斯柴爾德家族最近的歷史，他通過希東尼亞的口說：

我剛才告訴你說我明天準備去金融城裡，因為我一直遵守這樣的規矩，當國家事務還在考慮的過程當中時，我會積極介入。否則的話，我從不干預。我在報紙上看到了很多戰爭與和平，但是我從來不會驚慌失措，除非有人通知我，統治者想要更多的財富.....

返回到幾年以前，俄國向我們提出過要求。現在聖彼得堡朝廷和我們家族之間已經沒有友誼可言。他們有荷蘭的關係，這些關係基本上可以為他們提供這些服務。我們對波蘭希伯來人這個人口眾多，但遭受的苦難和屈辱也是所有部族中最多的民族的支援舉動，對於沙皇來說不是什麼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與羅曼諾夫家族的關係出現了好的轉機。我因此決定親自去一趟聖彼得堡。抵達後，我與俄羅斯財政部長康克林伯爵舉行了一次會談；我見到的是一位立陶宛猶太人的兒子。我們所討論的貸款與西班牙的事務有關，我決定從俄羅斯到西班牙去著手解決。我與西班牙部長塞諾爾·門迪薩伯爾（Senor Mendizable）原文如此。一到就馬上有了一名聽眾，我見到的是一位像我一樣屬於新教教徒的阿拉貢猶太人的兒子。在馬德里做完

這一切之後，我直奔巴黎，拜會法國國會的議長，我見到的是一位法國猶太人的兒子（據推測是蘇爾特）。

## 第一章 重新崛起（27）

.....因此，您看，我親愛的科寧斯比，真正主宰這個世界的那些人士與那些不瞭解實際幕後真相的人所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夥人。

撇開迪斯雷利認為所有這些顯赫人物都是像他們一樣的猶太人的臆想不談，一個確鑿無誤的事實是這段描寫的靈感來自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事蹟。

他還明確提及猶太人在政治上被「當成平等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而列入了同樣的階層，隨時準備支援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和財產的政策，而不是馴服地在一個試圖降低他的人格的制度下苟延殘喘。托利黨人在關鍵的時刻失去了一場重要的選舉，出來投票反對他們的正是猶太人.....然而猶太人科寧斯比從本質上說是托利黨人。託利主義事實上只是抄襲了那些把歐洲塑造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強大的勢力」。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漢娜喜歡這本書。正像她在寫給夏洛特的信中說的：

「經過對希東尼亞身上所具有的民族高尚品質的認真研究，經過使用很多支援他們解放的論述，他很聰明地描寫了眾多我們似曾相識的事件，人物的刻畫也很到位.....我已經給他寫了張便條，表達我們對他的精神產品的讚賞。」

如果《科寧斯比》暗藏著對列昂內爾的歌頌，那麼《唐克雷德》（Tancred）就是在歌頌他的妻子。對倫敦景物的描寫再一次充滿著對羅斯柴爾德的隱喻。我們參觀了一次「西昆大院」，還去了希東尼亞豪華裝修的房子。另外，還有一個明確的影射是希東尼亞為獲得一條被稱為「偉大北方」的法國鐵路所做的努力。再一次，希東尼亞成了迪斯雷利理論的代言人——這個理論現在被用來重新定義基督教本質上是猶太教的一個分支，或者說是猶太教的發展：

我相信（希東尼亞宣稱）上帝在何烈山對摩西說過，而且你們相信他以耶穌的身軀在卡瓦利山上被釘在了十字架上。至少在世俗的觀念上看，兩者都是以色列的子孫，他們用希伯來話對希伯來人講。先知只有希伯來人，使徒也只有希伯來人。亞洲現在已經消失的眾多教堂由一位土生土長的希伯來人建立；羅馬的據說要與世長存，而且現

在改為信奉摩西和基督的教義的教堂.....也是由一位土生土長的希伯來人建立起來的。

然而，是埃娃這個人物按照這些線索發表了最勇敢的宣言。作為一位敘利亞猶太人的公主，表面上看她的身上很難找到夏洛特的影子；然而，對她的外貌的描述顯示她給迪斯雷利提供了某些模型。同樣，儘管夏洛特的觀點似乎不大可能帶有埃娃的影子，但我們也無法排除這一點。比如，她具有羅斯柴爾德式的對異族通婚和變更信仰的深深的厭惡。「希伯來人從來沒有與他的征服者融合，」她大聲地說道，「不，我永遠也不會成為基督徒！」相似的，迪斯雷利所喜愛的主題——猶太教和基督教共同本原——也在她的書信中有所表達。

「你是那些崇拜猶太女人的法蘭克人中的一員嗎？」埃娃第一次（在聖地的一片綠洲中）碰到唐克雷德時問道，「或者是那些辱罵她的人中的一員.....？」她提醒他，耶穌「是一位偉大的人，但他是一名猶太人，而你崇拜他。」因此「基督教界一半的人崇拜一位猶太女人，另一半崇拜一位猶太人」。埃娃用另一個羅斯柴爾德式的句子詢問唐克雷德：

### 第一章 重新崛起（28）

「歐洲最偉大的城市是哪一座？」

「毫無疑問，我的祖國的首都倫敦。」

「那裡最有名望的人是多麼富有，告訴我，他是基督徒嗎？」

「我相信他是一位跟您有著共同種族和信仰的人。」

「那麼，巴黎呢？誰是巴黎最富有的人？」

「我想是倫敦最富有的人的兄弟。」

「我對維也納非常熟悉，」這位女士說，臉上帶著微笑，「愷撒給我們的同胞封了帝國的爵位，因為，公正地說，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援，帝國用不了一個星期就會分崩離析。」

迪斯雷利沒有考慮夏洛特的地方是他設計好的（對於他同時代的人來說顯得很過分）辯論，說在「基督受難時提供犧牲和祭禮」方面，猶太人「完成了上帝仁慈的意願」，而且「拯救了全人類」。她

也沒有接受他的說法（通過女巫的口）：「基督教是完善後的猶太教，或者什麼也不是……要是沒有基督教，猶太教也就不完整。」

在迪斯雷利的小說中提出的這些爭論，表明了迪斯雷利對羅素的限制權利法案的態度。他在第一次辯論前兩週，告訴列昂內爾、安東尼以及他們的妻子，他準備好了要支援這個法案，但是對託利派的條款，「我們必須主張我們的權利，不是為了什麼特權，而是為了良心的解放」。這使得圍坐桌前的自由派人士不知所措：路易莎描寫迪斯雷利用「他那奇特的唐克雷德似的條理」侃侃而談，而且「懷疑他是否有勇氣以同樣的方式對議會這樣說」。他確實說了。夏洛特起初對此相當熱心。「沒有誰可以，」她在1848年3月告訴德萊恩，「在用偉大的機智……權利、智慧或創造性來表達自己的方面超過我們的朋友迪斯雷利。」

### 批判「風暴」

迪斯雷利面臨的問題是小說的銷售情況相當糟糕，幾乎是個災難，而現實的政治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就在差不多一年以前，他和保守黨領導人本庭克分道揚鑣，並取代皮爾成為了託利黨的領導人；然而在支援羅素法案的過程中，他們又面臨前後排議席分裂的危險英國議會中的慣例：前排議席為反對黨領導人的專座，而後排議席為普通議員席。——譯者注。開始時他們似乎誰也沒有預料到他們陷入的麻煩程度會有多大。本庭克特別漫不經心，他在1847年9月告訴克羅克爾：

我相信我在投票時一直都站在猶太人一邊。我說我相信，是因為我自己從來都不會費心去關心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種沒有價值的事，而且很少關心我是怎樣投的。我並沒有把這個問題看得與羅馬天主教的問題有多大不同，這些問題我從來沒有當成是國家應該關心的大事……我把猶太人事務看成是個人的事務，就像是鉅額的個人財產或者是離婚法案……像影響羅馬天主教的問題，對於保守黨來說，這個問題仍然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我可能會投棄權票，保持我自己一貫的支援猶太人的立場，但又不得罪黨內的大多數人，我猜想這些人將會站在對立面。迪斯雷利當然將會熱誠地支援猶太人，首先是由於以前先入為主的支援他們的印象，其次是因為他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偉大的盟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所有人在個人特點方面都很高調，

而且倫敦市已經選舉列昂內爾·羅斯柴爾德作為它的代表之一，在公眾聲音方面是這樣一種情況，因此我認為黨作為一個黨派繼續與猶太人作對，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29)

至於說迪斯雷利，他在11月16日信心滿滿地向本庭克和約翰·曼奈斯保證：「風險不是很大，而且在明年之前也不會交鋒。」

兩人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事實上，只有另外兩名保守黨人在提案投票時加入了他們的行列（米爾尼斯·加斯科爾和——很可能是一名轉變了信仰的人——托馬斯·巴林）。以那些頑固的守舊分子為首，比如羅伯特·英格里斯爵士，投反對票的不少於138人，使該黨又陷入了新的混亂之中。「當迪斯雷利宣稱那些用十字架釘死耶穌的人和耶穌被釘死前跪在他面前的人之間沒有差異的時候，我是否應該為他歡呼？」奧加斯塔·斯戴福特要求進行澄清。本庭克辭職，把他現在稱之為「沒有羅馬天主教、沒有猶太人黨」的領導職位留給了史丹利爵士。這就很好地理解了為什麼迪斯雷利隨後在下院辯論時調整了自己的態度的原因：最重要的事情是，當時受到如此廣泛關注的一位人物從此以後好像「良心被狗吃了」，並沒有悄悄地放棄他對恢復猶太人人權的全部支援。對於他的行為最常見的那些批評——特別是來自於夏洛特和路易莎的那些批評——是不公平的，因為迪斯雷利繼續投票並偶爾還會站在他1847年時候的立場上發表講話。一個無法寬恕的情況當然是他那段時間對列昂內爾的經濟依賴避免了出現180度轉變的情況，這是夏洛特一直都心存疑慮的。1848年5月還出現了另外一次她與瑪麗·安娜之間的尷尬情況，因為瑪麗·安娜譴責列昂內爾不回覆迪斯雷利的信函。這些情況暴露了「她的丈夫還深陷在債務之中，正被放債人拼命追討，哀求我的丈夫給予幫助和支援」。在兩位女人再一次交鋒之後，列昂內爾決定另外再借給迪斯雷利1000英鎊。

皮爾派保守黨陣營也出現了分裂。當羅素在1847年12月提出他的提案時，另一位表示支援的是皮爾派的一位刻板的高教會派被保護人格萊德斯通，他以前曾經是恢復猶太人人生權利的反對者。儘管他發現這個決定「很痛苦」（並且在他的日記中提到了這個事件可能迫使他離開國會的想法），格萊德斯通的邏輯還是相當嚴謹：下院已經接受了天主教、貴格教會、摩拉維亞人、獨立派、一神教，地方政府已

經接受了猶太人，因此，繼續對猶太教國會議員進行限制就顯得自相矛盾了。皮爾後來在1848年2月的辯論中也表示支援，在「表決」時，其他的9位支持者也加入了進來。但是，他們的同僚古爾本——以前做過皮爾的祕書——發言表示反對，因為他把選舉一名沒有資格的候選人看成是對國會一次革命性的挑戰，得到了另外40名皮爾派議員的附議。在二讀的時候，皮爾派再次分化，29人贊成，43人反對。然而，托利黨人和皮爾派的反對票沒有達到阻止羅素提案的目的：在一讀前就以67票的多數獲得了預審通過；二讀又以73票的多數得以確保；三讀得到61票。

但真正的挑戰是在上院。在進行了比較緩和的勸說後，一部分輝格黨人表示支援。然而，與考茨這樣的銀行不一樣，相對來說，羅斯柴爾德家族擁有的貴族債務人很少——愛利絲貝瑞夫人是一個少見的例外，因此，他們在這個領域裡能夠採用的手段受到了限制。像德萬希爾公爵和藍斯丹尼侯爵這樣的輝格黨顯貴可以算上，而倫敦德瑞侯爵在1848年初的時候也被爭取了過來，但奧爾福德伯爵已經在於貝德福德公爵家裡見到漢娜時，告訴過她自己反對這個提案（儘管他向她保證列昂內爾最後會「贏得」勝利）。阿希利勳爵——未來的薩夫茲伯裡伯爵——在當時主要負責那些最重要的社會立法工作——是另一位反對者。在那些主教中，完全可以預見到會有強大的阻力。當羅素的提案在1848年5月進行辯論的時候，遭到了牛津主教威爾貝福斯的強烈反對，而且他獲得了坎特貝雷和阿瑪格大主教以及16位主教的支援。只有約克大主教和四位輝格黨人主教投了贊成票。列昂內爾、安東尼、梅耶、漢娜和她的妹妹蒙蒂菲奧裡在走廊上眼睜睜地看著提案被35票的多數否決。

### 第一章 重新崛起（30）

夏洛特的日記生動地記錄了辯論所產生的影響以及給家族帶來的後果。她和路易莎在凌晨3時30分，還在翹首等待他們的丈夫從威斯特敏斯特歸來：

男人們走進屋子，列昂內爾面帶微笑——他一直都能如此堅強和自控——安東尼和梅耶的臉漲得通紅……他們說那些發言全是造謠中傷，建議我一個字都不要去讀它。我5點鐘上的床，6點又再次醒來；我夢到一個巨大的吸血鬼正貪婪地吮吸著我的血……很顯然，當投票

的結果宣佈時，震耳欲聾的狂熱歡呼聲在迴盪……充斥著整個議會。可以肯定地說，我們不應該遭到如此強烈的憎恨。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因為過度激動而哽咽和哭泣。

這些世俗的達觀貴人反對恢復人權的一些論據的真實想法，可以從皇后的叔叔康柏蘭德公爵——現在的漢諾威國王——有關這件事的信函中找到。從某種程度上看，他同意教會方面的觀點，「接納那些否認我們的救世主存在的人」是「可怕的想法」。但他的有些擔憂從本質上說是出於社會方面的考慮，他預言「這個國家的全部財富將會逐漸地流入猶太人、工廠主和生產印花布的那些人的手中」，並引用阿姆斯特洛在法蘭克福對他的一次款待來說明猶太人的驕傲自大。他非常清楚自己幾年前在漢娜家裡吃飯時曾經說過些什麼。這個兩面派的勢利小人的看法和那個時期與這個事件有關的拙劣漫畫表達的一樣。

《猶太人解放的受益者之一》講述的是一個老棉布經銷商帶一隻乳豬回家給他的妻子，並且興高采烈地說：「我的小親親，看看我給你麥（買）了桑（什）麼！真得剛（感）謝羅（羅）斯柴爾德囊（男）爵和皮二（爾）。」（參看圖1 2）

因此，列昂內爾似乎下定決心，採用老一輩羅斯柴爾德人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屢試不爽的一種手段（出於一種並不十分光彩的目的）。1846年12月23日，納特給他哥哥寫了一封信，所談的內容明白無誤：

知道你覺得有必要採用某種方式來保證參議院的某些選票，我覺得很遺憾，這樣做並不是十分得體，我得說，要不是因為我們剛在這裡目睹了一場腐敗醜聞，有人正試圖擺脫與此類事情為伍而羞愧難當的尷尬，我當然會很贊同你那麼做。然而，我們還是回到正題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傑出的叔叔和您謙卑的僕人都同意這種說法，我們沒有必要太過於謹慎，如果有必要確保這種方式能成功，我們就不應該顧慮犧牲——我們無法鎖定金額，你肯定比我們更清楚需要多少，我希望按你說的所需金額的一半就足夠了，我們的好叔叔已經授權給我，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將自己承擔一切，來滿足家族的所有需要，無論你做什麼都是為了得到最好的結果，因此，你可以把這筆開支記到公司的名下——當然，在上院通過這個法案之前你不要付清，也不必跟他們討價還價，也不必關心是誰收了——關鍵是按照你的想法，

你對處置那些對提案通過可能存在問題的個人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對此你也很難再瞭解更多——我不會出錢支援那些與我們沒有很密切的關係的提案，也不會為其他任何目的破費——我們所需要做的，是在目的達到後把錢付給相應的運作人——我認為你對處理這件事不是很有經驗，因此，我想不出來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向你的朋友提出你捐贈的想法——以什麼樣的藉口？你認為他們會怎麼回報？如果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太不值了，如果從另一方面講，他們要付錢又沒有提具體的要求，我當然會要他們的錢，就當是他們已經像我們一樣得到了利益。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31)

簡單來說，就是列昂內爾建議在上院出錢買選票。令人覺得有點匪夷所思的是，有人披露他居然試圖採用類似的方式尋求阿爾伯特王子的支援（他在上院的影響舉足輕重）。當然，阿爾伯特可能已經有了惻隱之心。列昂內爾從1847年步入政壇一開始就與他有聯絡，到1848年，納特能夠記錄下他的「高興……埃爾伯特王子是如此關照你，而且他將支援我們的提案」。

但他同時又告誡列昂內爾「要時不時地去拜訪一下他，想辦法逗他開心」。「你現在應該去做一下議會黨團的工作，」他在2月14日寫道，「讓你的朋友阿爾伯特王子應用他的影響力，那麼或許（提案）就能通過。」實際上，這段話暗藏著的是整個關於猶太人解放的故事裡最有意思，但迄今為止一直被忽略掉的那一段。

至此，羅斯柴爾德家族與阿爾伯特王子早期的聯絡——用他們的能力作為他與歐洲精英人士聯絡的紐帶——已經發展成為了更加正式的金融交往。舉例來說，1842年，詹姆斯替阿爾伯特的顧問斯托克瑪男爵在北方股份上投資了10萬法郎。3年後，當阿爾伯特計劃與他的兄弟討論金融問題時，斯托克瑪轉達了列昂內爾「希望羅斯柴爾德的銀行能有幸為殿下此行可能在德國境內用得著的所有金融需求提供服務」的請求。1847年，羅斯柴爾德給阿爾伯特一文不名的巴伐利亞親戚路德維西·馮·歐廷根·華萊斯登王子提供了3000英鎊的貸款，由阿爾伯特作為擔保；當歐廷根王子在一年後破產，只留下一堆賣不掉的藝術品收藏作為抵押品時，阿爾伯特就成為了債務人。這就解釋了納特與他的叔叔為什麼在巴黎爆發革命後非常強烈地反對——從金融的角



度——支付任何的款項，而是希望他的兄弟「付清」，以便確保阿爾伯特的支援。5月，阿爾伯特把安東尼招進宮裡去「為他的兄弟科布蘭茲（應該是科伯）公爵要求貸款，（給他自己）貸款金額13000或者是12000（英鎊）」。（後來增加到15000英鎊。）納特明白無誤地表明瞭自己的反對態度：

你問我關於給阿爾伯特王子貸款15000英鎊的意見，我認為找不到絲毫理由同意這個要求，你會發現你與他之間的情形與我們與路易·菲利普的情形完全一樣——要是我沒猜錯的話，我親愛的兄弟，他已經欠你5000英鎊了，這筆錢是我們這邊付給巴伐利亞大臣（歐廷根王子）的，考慮到目前的局勢，我真的不認為你可以放出這麼大數目的款項，我的意見是你應該這樣告訴他——我們沒有絲毫理由去為他破費，而且我已經看到，無論你是否給他這筆錢，猶太提案的命運都不會有不同——我只能重複我反對付這筆款，而且在目前的形式下，你並沒有得到對於這筆借款的任何授權。

現在不清楚列昂內爾是否違背了他兄弟的意見。我們知道阿爾伯特在納特寫了這封信10天之後，以20000英鎊買下了巴爾莫羅城堡及其10000英畝的土地，不過我們在皇家檔案中沒有發現羅斯柴爾德捲入這次交易的任何跡象。另一方面，列昂內爾確實在1849年1月到溫莎拜會了阿爾伯特和斯托克瑪。可以讓人產生聯想的是在1850年7月——列昂內爾為獲取席位用修改後的誓言起誓的有名的努力之前11天——他捐出了50000英鎊用於補貼阿爾伯特的最愛，一個資金長期處於匱乏狀態的「萬國工業博覽會」專案。3年後，很明顯受到來自於「宮廷」的壓力——也就是阿爾伯特和斯托克瑪——導致阿伯丁爵士放棄了對解放猶太人的反對立場，形成了皮爾派和輝格黨人的聯合。相關的證據非常豐富，但似乎並沒有理由去推斷列昂內爾確實做了些什麼事情去「讓阿爾伯特使用了他的影響力」。

## 第一章 重新崛起（32）

然而，無論列昂內爾在這個方面做了多少努力，結果證明還是遠遠不夠的：想象一下，上院議員的反對可以通過給「宮中人物」意思一下後就得以化解，是一點都不現實的想法。正如羅素十分無奈地說：「你有一個如此令人討厭的習慣，把任何事情都賦予一個貨幣價值，你好像認為甚至原則都可以買到。現在全國上下反對你的提案的

是以高教會派（HighChurchParty）和低教會派（LowChurchParty）中的大多數人對一個人的方式。現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讓他們中的一個機構來為你出戰，因為他們的反對是最有原則性的。」羅素認為，說服而不是行賄才是唯一可以推進整個事件的辦法。儘管羅素在1849年夏天又提出了另一個提案，並在下院獲得通過，但同樣（跟他事前預計的一模一樣）在上院以95票對25票被否決。

這激勵列昂內爾最終「接受奇爾特恩英皇直屬領地總管的職務」——強行在金融城裡進行一次遞補選舉——這是他發表在《時報》上宣告中宣佈的「致倫敦市的選舉人」行動：「現在是一場在上院議員與你們之間的戰爭。他們試圖維護最後殘留的宗教歧視，而你們希望推翻它……我相信你們已經準備好了發動一場擺在你們面前的維護《憲法》的鬥爭。」實際上，他的那些更為激進朋友——比較著名的有下院議員J·阿貝爾·史密斯和約翰·路巴克——在一年前羅素的提案第一次被否決後就要求他進行一次強制補選，因此，這次運動本身並不令人意外。是列昂內爾講話中的那些火暴語言挑起了夏洛特描述的那些批判「風暴」。

要想弄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在心裡牢記當時在更廣大的歐洲範圍內的歷史背景，所有這些事件都是在那樣的環境狀況下產生的。1848年1月1日，阿爾方索給列昂內爾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在新年的時候見證「超越迷信和偏見原則的宗教平等的勝利」的期待。毋庸諱言，最後他所見證的遠遠超過了這個期待。然而，雖然1848年的革命確實在某些歐洲國家給予了猶太人政治平等（儘管只是暫時性的），但是這場革命對於解放運動在英國的淨效應基本上是負的。正如來自巴黎、法蘭克福和維也納的信中所表達的，突如其來的革命對大規模反猶太人暴力行動產生了隔離作用，而且也發出了可能爆發這種問題的警告，例如在德國的農村地區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區。然而，與此同時，很多自認為是革命領袖的更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自己本身就是猶太人——就像梅耶·卡爾所認為的「猶太人自己挑起了反猶浪潮」。猶太人的解放思潮與歐洲大陸的革命膠合在一起，因此也就具有雙倍的破壞性。列昂內爾的講話向很多支援他的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表明，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在加入到他們的激進主義陣營——

甚至憲章運動——而當時這些激進分子正在譴責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鎮壓匈牙利革命提供金融支援。

不論列昂內爾在他的支持者中喚醒了什麼樣的意識，他的策略只是選舉的開局。他戰勝了他的託利黨對手約翰·瑪耐斯，最後得票是6017票對2814票。由於把自己放到了激進分子陣營中，列昂內爾現在別無選擇，只能聽從他們的下一步戰術安排：現身下院去主張自己的席位。這基本上是在學天主教的歐·科奈爾和貴格教友會的皮斯，然而也代表著列昂內爾走出了最咄咄逼人的一步；皮爾很直率地提醒過列昂內爾不要接受。列昂內爾略顯躊躇，花了整整一年時間試圖說服羅素提出另一個提案。但是在1850年7月在倫敦客棧舉行的一次狂躁喧鬧的金融城自由黨人聚會上，他公開攻擊政府「沒有拿出什麼改革和發展的措施」，也沒有提出「進一步推進社會和宗教自由程序」的辦法。第二天的12點20，根據會上一致通過的決議，他出現在喧鬧的下院會議桌旁，而且在回答工作人員關於他是希望選擇新教還是天主教的誓詞時，他回答道：「我要憑著《舊約》宣誓。」由於托利黨人中的頑固分子羅伯特·英吉利斯爵士站起來反對，會議主席命令列昂內爾退出，隨後發生了一場爭論，這場爭論一開始關注的焦點是程式。過了一個週末後，大家決定直接去問列昂內爾為什麼他希望憑著《舊約》宣誓，對於這個問題，列昂內爾的回答是：「因為那是一種對我的道德最有約束力的起誓方式。」他再一次被要求退出，然後，在激烈的辯論之後，最終（113票對59票）列昂內爾被允許按照他的要求宣誓。第二天（7月30日），列昂內爾再次出現在議會，有人適時交給他一本《舊約》。誓詞中的效忠和至高無上的內容已經進行了處理。但當工作人員讀到「以一個真正基督徒的信仰」的字句時：

### 第一章 重新崛起（33）

男爵停了下來，過了一兩秒後說：「我省略這些詞句，因為這些對我的道德沒有約束力。」然後他把帽子戴到頭上，親吻了《舊約》，加上了「請幫助我吧，上帝」。這個舉動獲得了議院內自由黨人的喝彩。他取出了鋼筆，在反對聲中——我們猜想——準備在國會的測試卷上籤上自己的名字；但弗雷德里克·特西格爵士迅速站起來，激動的情緒開始在所有的黨派中蔓延，其中夾雜著會議主席呼籲他放

棄。（有人大喊「反對，反對」；有人大喊「坐下」；還有人喊「主持人」，「秩序」。）男爵（列昂內爾）最終放棄了。

儘管與當時的氣氛不相稱，但這也許是一個聰明的決定。僵持下去，結果只會導致失敗。當8月5日辯論重新恢復的時候，會議通過了一個行政決定，如果列昂內爾不完整地宣誓誓詞，就不能取得他的席位，而政府如果要通過一個能達到要求的經過修改的誓詞提案，為時需一年左右。當戴維·薩洛蒙贏得格林尼治補選的勝利後，曾經試圖加快這個程序，但並沒取得更多的進展，只是留下了一個更有失身份的形象。薩洛蒙沒有完整地起完那三段誓言就坐到了他的席位上，被會議主席命令退出，但他予以拒絕；當要求他退出的動議通過後，他還是拒絕，並且又是發言，又是投票，反對這個動議；當主席要求議會警衛驅逐他後，他最終還是離開了下院。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經過新一輪的投票確認，無論是他還是列昂內爾，在起完誓言之前都不能獲得自己的席位。薩洛蒙唯一的成果是1852年6月的一次舉動廢除了一個古老的刑罰，從理論上說，由於議會成功通過了針對他的議案，而他做出了不合法的反應，他應該接受這個刑罰。選區對他的這些做法進行了判決，他在1852年的大選中被徹底打敗；相反，列昂內爾再次贏得了勝利。守株待兔的遊戲重新開始，因為沒過多久事情就變得明朗起來，跟以前一樣，猶太人解放運動在下院仍是爭執不下，而在上院則明顯不受歡迎。事實上，列昂內爾就像是沒有席位的議員，國會有與猶太人有關的事項時（比如1851～1852年政府資助猶太人學校和1857年免除民事離婚法院對按猶太法典離婚的司法管轄權），他在室外對議員進行遊說。但從法理上看，這還是一個僵局。然而，又一個提案在上院遭到了否決；在1855年，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對手托馬斯·鄧庫姆（Thomas Duncombe）甚至非常有創意地試圖促成另一次金融城補選，理由是由於為政府的克里米亞戰爭提供金融服務，列昂內爾已經「獲得了提供公共服務的合同」。

### 進入國會

1857年大選（列昂內爾再次當選為代表金融城的議員，這次的得票甚至領先於羅素，因為後者與自由黨的核心小組吵翻了）之後，國會裡的戰火重燃。由於身後有多數人支援，帕默斯頓覺得由於「倫敦金融城選舉了列昂內爾·德·羅斯柴爾德，在本屆國會一開始的時候就

給國會一個再次考慮接受猶太人的機會，而且這樣一個提案由政府來提，獲得通過的機會是最大的」。於是，一份提案不失時機地在5月15日推出，在三讀的時候獲得了絕對的大多數支援，得票123票。為了取悅支持者，為數不少的託利黨高層發出了改變立場的訊號，例如著名的約翰·帕金敦爵士、菲茨羅伊·凱利爵士，以及最重要的人物德比伯爵的兒子，領袖史丹利勳爵。在上院，新當選的倫敦主教表示了支援，總共有139位上院議員投了贊成票。再一次——讓列昂內爾大失所望——他們只是少數。當政府從用單邊決議否決上院的立場上退縮，而不是提出新的《誓詞有效性法案修正案》的時候，列昂內爾決定再一次放棄自己的席位，並就此事宜進行了一次補選。選舉中他沒有遭遇到任何對手，順利地重新當選，並展開了一次強烈反擊，針對「那些去了，但是很少出現在人民中，根本不瞭解人民願望的人（這些人事實上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對其他的事情漠不關心）」。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34)

並不是這次針對貴族問題對人民重新發出的呼籲最終打破了僵局，而是——說起來很荒謬——少數派保守黨政府的出現。因為此時，迪斯雷利作為財政大臣和下院的政黨領袖，至少有能力對羅斯柴爾德家族還債了，他可以說服德比，而那些上院的議員也不得不做出妥協。他通過在下院給反對黨完全的權利達到了這個目的。1858年4月27日，羅素的《誓詞修正提案》在委員會上遭到了上院議員的痛斥，關鍵的第5條被否定。兩週後，由羅素提出的「不同意」上院議員的動議以113票的多數獲得通過。更令人吃驚的是，議會還通過了（以55票）由怪僻的鄧庫姆提出的動議，列昂內爾被任命為下院為解釋它不同意的「理由」而設立的專門委員會的成員。然後，羅素正式提出議案，所有的理由通過與上院共同舉行的大會進行解釋。取得上院的認同是決定性的轉折點。5月31日，路肯伯爵提出了決議案的內容：下院可以以決議的方式修改自己的入職誓言，條件是必須先得到國會法案的同意。這使得上院可以清楚說明為什麼自己不同意下院和德比——儘管「滿臉不高興而且很勉強」，但還是在7月1日宣佈支援這個提案。23日，妥協方案最終以兩個法案的形式成為法律，一個是將效忠、至尊和歸順三段誓言合併成一段，並適用於所有需要起誓的機構；另一個是允許猶太人省略「以一個基督徒的真正信仰」等詞句，

但是要取得他們將要進入的團體的同意。7月26日星期一，列昂內爾再次出現在下院。這是最後一次，他再次很不情願地退出，因為議會在辯論讓他能夠用縮減後的誓言起誓的兩個決議案時他必須迴避——原則上說，這是像塞繆爾·華倫和史賓塞·瓦爾坡爾這樣的頑固分子表達他們反對「褻瀆上帝者的入侵」的最後機會。關鍵的決議以32票勝出，列昂內爾最後通過使用新的誓詞以及《舊約》宣誓後成為了議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儘管這種手段他以前使用過，但他成為議員後即刻參與表決的第一份法規卻是《防範腐敗法案延期提案》。

列昂內爾進入國會，正像詹姆斯所寫下的：「對整個家族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勝利。」在第二年所舉行的大選中，他的兄弟梅耶·卡爾與他一起進入了下院（另外還有戴維·薩洛蒙）；在1865年，他的兒子納蒂也被選入。正如夏洛特滿心歡喜地指出的，在剛結束的投票中（好像是在1864年7月），帕默斯頓的政府被「猶太人拯救」，列昂內爾的選舉同時也在整個廣大的猶太社群引發了共鳴：代理人理事會（Board of Deputies）公佈的決議表達了他們「最誠摯的心願……尊敬和感激」，而且從今以後，每年列昂內爾進入下院的日期就是猶太人免費學校的頒獎日——而列昂內爾直截了當地強調他對宗教的義務，捐贈給倫敦城市學校「其最有價值的（開放式）的獎學金以紀念他取得他的席位」。

但這場勝利的政治意義一直沒有得到恰當的認識。列昂內爾以自由黨人的身份獲勝，而長期的運動已經讓他與自由黨的一個很小但很有影響力的小組結成了政治和社會的緊密聯絡。根據他的日記上的記錄，在1856～1864年之間，格萊德斯通跟他或者他的兄弟梅耶一起吃過四次飯，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其他成員的通訊或者是會面起碼有四次。其他出現在夏洛特19世紀60年代信函中的皮卡迪利大街148號的自由黨人經常性訪客中，包括代表武烏維漢普頓的國會議員查爾斯·維利耶，他是1859～1866年間濟貧法律理事會的總裁；羅伯特·羅，格萊德斯通第一屆政府的財政大臣。列昂內爾在簽署了自己的名字並與會議主席握過手後第一個與迪斯雷利握手這一舉動並非沒有意義，迪斯雷利在戰爭最後階段的貢獻應該是決定性的。迪斯雷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係從19世紀50年代初以來一直穩定發展，列昂內爾事實上在1858年決定性的那幾個星期裡一直與迪斯雷利保持著緊密的聯絡。1月

份，他們在加奈斯貝里吃飯（同行的有外斯曼紅衣主教和被流放的奧爾良派成員的接待人）。5月份，在政府有驚無險地通過了其印度政策後，迪斯雷利這樣說道：「男爵對這件事是怎麼說的？他知道大多數的情況！」兩個月後的7月15日，列昂內爾去迪斯雷利辦公室拜見他，「自從我們的提案到了下院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列昂內爾發現：

### 第一章 重新崛起（35）

他精神狀態非常好，說是所有的事情都順利得不能再順利了……我告訴他我希望我們的提案能在下週一通過，希望他們儘可能馬上取得女王的同意。我無法讓他按他說的去……①主要取決於其他人，如果他們不等到……所有提案都走完程式，或者他們能安排一個委員會，使我能夠在議院通過之前就得到我的席位。我敢說我能夠做到……迪齊今天又說，我們有很大的機會通過，我們已經……②原件看不清楚。他們在我們的提案二讀時不再反對我們，而是支援我們，他已經近了他的全力——他是這樣說的。

列昂內爾對這個說法的反應是，詢問迪斯雷利「他是否可以跟約翰尼（羅素）和柯吃飯」，但是：

他很明智地拒絕了，說他以部長的身份出席會破壞聚會的氣氛。我很高興我問過他，他怎麼也不能說我們輕待了他。我告訴他，我們非常渴望能及時讓皇室批准我們的提案，以便我能夠在今年內獲得我的席位，但是你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騙子。他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沒有承諾任何具體的事情……迪齊太太在梅耶家吃飯，又重複了一遍老掉牙的故事，說迪齊為我們做了多少事，而且因為我們不相信他說的這些，他有一次發了很大的火。

列昂內爾敘說這些遭遇時所持懷疑態度的弦外之音，不應該被看成是指迪斯雷利在1858年的時候沒有盡全力。恰恰相反，必須考慮德比開出的苛刻條件。在列昂內爾進入國會後，他們兩個人表現出的親密關係證明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再有任何理由懷疑迪斯雷利的真誠。儘管他不得不在如此恐怖的政治限制下工作，但他並沒有放棄他的「種族」。

### 劍橋的教育

把這一時期發生的允許猶太人進入國會的正面交鋒與允許他們進入劍橋學習的事實上的欺瞞進行比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這個問題也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起到了先鋒作用。事實上，他們在劍橋化解那些宗教限制的計謀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解釋他們遇到上院的強硬態度時為什麼會如此小心翼翼。對他們在這兩個案例中所採取的計謀進行比較，確實很有啟發性。

應該強調，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本不需要去劍橋，更用不著去牛津，這種需要遠小於他們對下院席位的需要。在19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羅斯柴爾德孩子的教育問題一直是一件比古代英國公立學校和大學可以提供的內容更繁複龐雜的事情。因此，羅斯柴爾德家族依靠私人教師和將孩子送到海外去完成他們絕大部分的學業，以優先確保他們能夠保持家族的多語言傳統。至於說銀行業務的學習，所能採取的就是到一家銀行學習。如果說劍橋還能提供點什麼的話，就是從佔據優先位置的家族生意中讓他們稍微分點心。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羅斯柴爾德家族更加關注的是女兒的教育——不像公立學校和大學，一直到20世紀末主要關注的都是男孩的教育。安東尼的女兒康斯坦絲和列昂內爾的兒子納蒂花費幾乎同樣的精力把德語灌輸進自己的腦子。特別是夏洛特，她在女兒和侄女們的正規學習上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倡導者。然而梅耶進入劍橋這件事開了一個先例，讓夏洛特決定她所有的兒子都應該效仿。問題是猶太人的地位在劍橋仍然是一個灰色地帶：從規定上看，在1856年之前都不可能被授予學位，他們因此也不能成為學校的正式成員——除非他們願意履行由各個學院對本科生安排的參加禮拜活動的義務。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36)

奇怪的是——不像歸順誓言——雖然這從本質上看是基督徒的責任，但對於這些責任，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準備從原則上去執行，而他們的出席是最低限度的、被動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梅耶在19世紀30年代基於以上觀點參加了三一聖堂的禮拜；而且當阿瑟·科恩屬於梅耶母親那邊的表親，在1849年秋季——正好在列昂內爾在補選中取得了對曼納斯的勝利——進入到劍橋念數學時，他認為類似這樣的安排是可行的。通過J·阿伯爾·史密斯——一位最活躍的列昂內爾的政治支持者，他們試圖去說服基督教科學派的主事詹姆斯·卡特梅爾為阿



瑟·科恩對禮拜堂的規則做些調整，理由是（像卡特梅爾說的）：「如果我接受科恩先生，除了我之外，沒有人需要知道他的宗教信條是什麼。」梅耶也告訴卡特梅爾：「科恩先生準備好了在學校禮拜堂參加禮拜活動。」然而，主事卻沒有被說服。他認為，掩藏科恩的信仰，「會破壞社會的善良誠信」，而「科恩先生祈禱時僅外在的形式符合要求，而他對根本的精神實質卻懷疑和拒絕，這讓我的感情無法接受，並且與我的是非觀相左」。

對於梅耶來說，這將會「直截了當地將一個信仰族群排除在享受劍橋大學教育的大門之外」。因此，他和摩西·蒙蒂菲奧裡直接找到了阿爾伯特王子——時任大學校長，要求他將科恩的事交給瑪格達萊尼主事處理，他同時也是溫莎的主任。來自皇室的壓力終於在羅斯柴爾德的壓力在19世紀30年代未能奏效的地方取得了突破，當時，梅耶曾經由於參加禮拜的問題被強迫離開學校。科恩正好相機入學，與主任達成的條件是，正如科恩所報告的「通知我星期三和星期五禮拜只持續10分鐘，（並且）通知我在這幾天去，不要在其他日子去，同時還要跟我講不要求我參加週日聖禮」。

當羅斯柴爾德家的男孩子逐漸長大以後，類似的安排在三一學院不得不再次進行談判，首先從1859年由納蒂開始。此時，1854年和1856年通過的法案意味著猶太人能夠獲得學位（除了在神學領域）。但是宗教義務的問題仍然存在於學院的層面上。儘管納蒂的導師約瑟夫·萊特福特「承諾過盡其所能在禮拜方面做些工作」，但威廉·休厄爾仍然是「改革道路上的絆腳石」。1862年，納蒂向他的父母彙報：「三一學院的神父們……因威脅說要把那些拒絕在禮拜堂裡參加聖禮的所有人留校懲戒，而遭到了廣大同學的憎惡，這條新規所引發的後果是，有很多同學缺席了今天的禮拜，因而面臨因為違反一條重要的院規而引起的麻煩。」納蒂清楚地感覺到19世紀50年代的改革所取得的實效相當有限。「要使這裡的改革產生一點影響」他抱怨道：

但只要大學看上去還像是英格蘭教堂的神學院，或者是它自己建立起來的教堂的一部分，我們就得再等待些時日，我們根本不可能有更多的作為……理所當然應當廢除的，是7年之後或者是完全退教後才能取得學位的規定……對於一個心智健全的人來說，被剝奪了教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為他不會宣稱自己成為英格蘭國教的信徒。

我一直想不通為什麼像這樣一個全國性的機構，一個在法律和政治進步——同時也包括宗教進步方面起著基石作用的機構，為什麼要由牧師們來統治，就好像是耶穌會的神學院或者塔木德學校Talmud，猶太法典。——譯者注.....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37)

他們在劍橋不得不做出的讓步不僅僅只是參加禮拜。第二年的考試通稱為「小考」，要求要對威廉姆·帕勒的《基督教神蹟》一書有非常詳細的瞭解。一封夏洛特給利奧的滿腔怒火的信表明了這給他們造成了多大的困難，但也表明她覺得他應該可以克服它：

你考試時出現的這些莫名其妙的錯誤讓我非常地惱怒——當然，你沒有，也不能夠故意去對那些神職主考官無禮，也沒有人提醒過，你可能會覺得你能夠應付對於神學感覺的徹底的缺失，而且完全缺乏對於信念的尊重，儘管這個信念不是你自己的，而且事實上你對此一無所知，但也應該給予尊重，就像是萬能的主所受到的千千萬萬人的頂禮膜拜一樣。但是，這個錯誤仍然必須受到批評，而且事實上也是非常不可饒恕的。無論從任何角度說，除了給別人一個壞印象，它什麼作用也起不了。一個經常在參議院出現的年輕人，而且無法拒絕基督教的神蹟方面的考試，就應該讓自己熟悉這個科目。要是我不知道你被神學老師所包圍，我應該會給你些建議，但我真的認為你應該已經具有了請教你的導師的良好的、自然的習慣，就算不去完整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歷史，也應該瞭解一個梗概、一個綱要。你將會被看成是最無知、最輕率也最淺薄的一個人。對此我很傷心，我很遺憾地說，你怎麼解釋都沒有用。

在這時，利奧受到了「神學的神性以及.....各種教義」的困擾：當某晚與一群好爭辯的老師吃飯時，他感覺「如此疑惑，以至於不敢張嘴」。（一位同行的朋友擔心「他們好像忘掉了我的存在，對猶太人進行了攻擊」。）甚至在辯論室這樣年輕人更多一些的環境裡，羅斯柴爾德們也都覺得非常不自在。納蒂回憶起某天晚上在學生會他是怎樣「怒火中燒」，當時，一個發言的學生「引用下院通過猶太提案過程中太強大的勢力作為例項。我希望那一天因為所有這些差異而能早點結束，而且如果我當時立即發言的話，我會激發宗教狂熱，而想要平息它遠沒有激起它那麼容易」。

將羅斯柴爾德在進入劍橋上所取得的成功與列昂內爾希望在下院所達到的目的相比較，前者的勝利看來是緩和的。（事實上，一直到1871年，宗教考試才最後在舊式的大學裡廢除。）列昂內爾的兄弟和兒子參加學校禮拜活動和學習，與他拒絕包含有基督教信念的誓詞之間存在著明顯而且不容易解釋清楚的反差。我們推測，如果要求學生參加聖禮，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 博覽會與水晶宮

軍事勝利的紀念碑一般不會在戰爭勝利前就建設。然而，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列昂內爾最終能夠取得他在威斯特敏斯特的席位之前幾年，就開始為他們的政治優勢地位建造紀念碑了。這至少是解釋在1850～1860年間特別頻繁的建築活動的一種理由，這段時期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他們自己建造了至少4座鄉村豪宅，又翻修了一座，它們分別位於：門特摩爾、艾斯頓、克林頓、費裡耶爾、普雷尼和博勒尼。

當然，內森及其兄弟從他們繁榮的最初就開始購買鄉村住宅，這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了。到了1848年革命的時候，他們在費裡耶爾、蘇雷尼、博勒尼、加奈斯貝里、西勒多夫和格魯尼博格的房子和地產已經在家族的名下很多年了。當他們在1848年之後購買位於白金漢郡的新土地——最著名的是位於艾斯頓、克林頓的農場的時候，倫敦的合夥人在經濟上仍然是非常理性的，因為他們的父親和叔叔在為他們把關：除非農業用地在購買價格中佔到3-5%，否則他們不會有興趣。

「如果你認為艾斯頓、克林頓值26000英鎊，」列昂內爾在1849年寫給梅耶的信中這樣說，「我不反對你對它的報價，但我想我們應當保證所有的費用中能有部分是清清楚楚的，這並不是空中樓閣，你必須把它當成一個完整的投資。」當他在1849年到達西勒多夫的時候，他評價它是「非常棒的財產，儘管（薩洛蒙叔叔）買貴了一點點，但只要經營得好，它會給他帶來不錯的收益」。

### 第一章 重新崛起（38）

在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土地的時候——剛開始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嚴重的農業危機中復甦——他們抄到了市場的底。在1848年，白金漢公爵最終宣佈破產，一年之後，梅耶收到了地產經紀人從愛爾蘭發來的報告，通知他們那裡所存在的大好機會。「種土豆的完全失敗，

自由貿易毀了所有的人。」當時流行著這樣的說法，「愛爾蘭完全毀了，現在是購買地產的天賜良機，至少是非常接近最好的時候了。當取得國會頒發的產權後，可以肯定能獲得在購買和轉售中間巨大的升水。」實際上，梅耶和他的兄弟對這種倒買倒賣的方式並不感興趣：他們對地產的興趣，正像他們母親所說的，是針對1849年12月時國債的收益已經降到了3.1%的情況。當時是購買土地「最恰當的時間」，「當基金處於目前這種很高的位置的時候，儘管對於所投資的資產的利息也會降低，但土地總是一種等價資產」。這樣的投資不應該被看成是企業家精神衰落的表現。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釀酒資產的舉動也是同樣的情況：納特在1853年購買布瑞恩-木桐酒莊（Chateau Brane Mouton，他給它改名為木桐-羅斯柴爾德）以及詹姆斯對爭奪拉斐酒莊（Chateau Lafite）的控制權所進行的持久戰，都是由於得到了一份對高質量的紅葡萄酒需求的精明的評估報告。當詹姆斯最終在1868年確保了拉斐酒莊控制權（支出了177600英鎊）的時候，他已經是一位年邁的老人了，而幾乎是在完成這次收購的同時，他又開始對一座新的酒莊競標。

然而，花26000英鎊在農莊上和花費相似金額在豪華的新房子上有著天壤之別。在19世紀，極少數英國地主怎樣為自己建蓋「富麗堂皇的新房子」這樣的事情並不會引起大家的興趣：100多年前有多大支付能力與現在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另外，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錢根本就不是問題。當倫敦的合夥人在1852年從公司的共有資金中抽走了260250英鎊的時候——開始是為了資助他們的建築專案——這筆錢還不到其資產總額的3%。而門特摩爾新房子的報價才15427英鎊。對於建築師喬治·梅耶在1853～1873年間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所做的巨大工作，他總共也只獲得了350000英鎊。

事實上他們可以買得起，然而他們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決定將錢花在這些沒有回報的大房子投資上。比較平庸的解釋——而且這種解釋好像也足夠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喜歡在鄉村的生活，而鐵路的出現意味著他們可以在不影響其城裡的工作的前提下實現這個理想。倫敦和西北線使列昂內爾和他的兄弟們很容易地在門特摩爾和厄優斯頓之間來回通行：列昂內爾可以在鄉間「騎馬狂奔」，又可以按時出現在傍晚的下院辯論會上。1849年5月開通的斯特拉斯堡到里尼的鐵路

線，也為詹姆斯和他在費裡耶爾的兒子們提供了同樣的便利。然而，還有一個補充性的而且也許是必要的解釋。新的房子代表著一種他們對貴族身份的主張。早在1846年，列昂內爾就明確表示，他認為一個準男爵的身份配不上他，而且在他很清楚地知道貴族的身份不會再青睞他之後，他才踏上了他自己發動的進入下院的運動。但這不是「封建制度」的徵兆——那些腐朽的資產階級向過時的上層階級的價值觀投降；因為我們不應該忘記，門特摩爾修建的時間正好是列昂內爾公開挑戰上院立法地位的時候。羅斯柴爾德爭取英國的貴族地位是堅定不移的，而對這種決心的表達，沒有任何事情能比這個家族為自己建造這些豪宅更具說服力。他們的房子不只是模仿了18世紀的鄉間別墅，它們展示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實力。他們為有影響力的客人準備五星級的賓館、私人藝術館，作為公司業務接待的中心。

## 第一章 重新崛起 (39)

他們對建築的具體選擇也頗費心機。約瑟夫·帕克斯頓與這個家族的交情始於19世紀30年代，並於40年代為路易莎的崗特堡別墅提供了諮詢服務；而他為博覽會設計的水晶宮似乎才讓這個家族相信了他的能力，放心讓他做些比修修補補更為重要的工作。工程於1851年8月，也就是展覽會的那一年，在門特摩爾動工，作品充滿了伊麗莎白時代的靈感——帕克斯頓在心裡把武拉頓和哈德威克的別墅作為了樣板——對於當時的標準來說這是創新型的建築，帶有巨型玻璃頂的大廳、流動的熱水和中央供熱。對於梅耶本人、他的妻子、他的女兒來說，很難把它理解成家庭的住房。光底層就有很誇張的26間房子，這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家賓館，這裡可以接待無數的賓客，並提供食宿。據信，這些來賓會時刻想到他們的東道主所具有的國際影響力：事實上，那些歐洲國家的領導人（比如由義大利雕刻家拉斐爾·蒙提所給出的例子），逐漸變成了羅斯柴爾德的商標一樣的東西。門特摩爾同時也是一座藝術館，打算把現代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實力與歷史上很多非常脆弱的前代藝術品聯絡起來——因此，本來是為威尼斯總督建造的三隻巨型的燈籠、各種哥白林掛毯以及大批16世紀義大利和18世紀法國的傢俱等被收藏了進來。

通過建造門特摩爾，梅耶為家族的其他人設定了標準。艾斯頓·克林頓在1854～1855年間由帕克斯頓的女婿喬治·亨利·斯托克為列昂內

爾改建，這個工程相比較而言就只是修修補補的工作了。由於試圖擴大已有的房子，斯托克沒有辦法讓路易莎的「夢」實現，因為她希望的是「隨著時光的流逝，我會慢慢地融入到這個小地方，我初次到這個地方時，認為這裡是地球上最醜陋的地方」。相反，詹姆斯下定了決心要在費裡耶爾超過門特摩爾。由於對法國建築的專業水平不放心，更不用提當地的石匠水平，他找來了帕克斯頓和邁爾斯。接下這個工程讓他們後悔不已，而詹姆斯卻沒有為在從法國建築師安東尼·朱利安·赫納德處找到了第二種意見而拒絕帕克斯頓的第一個方案感到有什麼不妥；同時，英國工人和法國工人在工地上對工資差異所造成的摩擦引發了罷工，並最終爆發暴力衝突。最後的結果——工程一直到1860年才竣工——是一個法國、義大利和英國風格折中的混合物。整個建築搞得如此複雜，龔古爾曾經如此厭惡地評價它：「種樹木和建水景就花了數百萬，圍一個城堡花了1800萬，一次白痴般的可笑的無度揮霍，一份各種風味混合的布丁，一份愚蠢野心的果實，硬把各種有名的建築風格都放到了一個建築裡。」俾斯麥認為它看上去像「底朝上的衣櫃」。詩人和外交家維爾福瑞德·斯卡文·布蘭特稱它是「一個以最怪誕的路易·菲利浦的喜好裝飾的怪異的帕瑪俱樂部」；而一貫持反猶態度的愛德華·杜魯蒙把它看做是「一個難以形容的古玩商店」。

然而，這還是一個代表著技術發展水平的事件：詹姆斯很有創意地把廚房移到了離房子有100碼遠的地方，以便不讓客人聞到廚房工作的時候傳過來的味道，並在餐廳下面修建了一條小型的地下鐵路將其與地下層連線起來。而且像門特摩爾一樣，它部分是彰顯家族的實力（用查爾斯·亨利·科第爾的女像柱來象徵羅斯柴爾德控制了地球的四面），部分是賓館（住房超過了80間），還有一部分是藝術館（大廳作為詹姆斯藏品越來越多而顯得凌亂的「個人博物館」）。所有的一切都大得讓人難以想象（就像伊芙林娜說的那樣，「這個地方太巨集偉，沒有辦法不設立崗哨」），然而在內部卻具有一種異域的戲劇性的氛圍，這部分由舞臺設計師尤金·拉米負責，他在吸菸室裡畫上了模糊的比較通俗的威尼斯壁畫。普雷尼城堡由斯托克在1858年時為阿道夫建造，比較起來屬於比較適度的。這座可以眺望日內瓦湖的路易十六風格的建築起初準備建成阿道夫藏品的展覽館，他的藏品包括油畫

和藝術品——奇異的岩石晶體、寶石和木雕。這個位於布羅涅的建房工程由阿曼德·奧加斯特·約瑟夫·貝特林在1855年動工，工作的情況類似，儘管貝特林的靈感來自於路易十六的凡爾賽宮。

## 第一章 重新崛起（40）

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還可以看到羅斯柴爾德別墅的花園出現了非常壯觀的轉型情況。在費裡耶爾，在帕克斯頓的指導下，出現了新的池塘，上面架有裝飾性的小橋，還有精緻的溫室和溫室花園。儘管夏洛特的女兒伊芙林娜更喜歡加奈斯貝里和門特摩爾的土地，但夏洛特在這個時期對費裡耶爾的描寫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她主要關注：

灌木、樹木、花草、暖房及溫室，還有……溫室內那些令人目不暇給的奇花異草。費裡耶爾在我的眼中就是仙境，這裡什麼也不缺，滿眼都是如畫的風景……詹姆斯叔叔從世界各地收集了野鴨、天鵝、雉雞……全部都彙集在一起——這裡有橘子園、室內花園、水晶宮、農場、珍稀動物園——有野生的也有馴化的……費裡耶爾是無可比擬的……它就像是阿拉丁的宮殿，有仙境般的公園、奇異的禽鳥館、壯觀的魚群和滿是甘美水果和鮮豔花朵的水晶宮。

在布羅涅，景觀花園設計師波伊修建了一座精緻的水景園，有瀑布和假山，而詹姆斯在他的奇異動物收藏中加入了「帶捲毛的鵝」、白鴨子、埃及驢和會說話的鸚鵡。在普雷尼，阿道夫也有一座動物園，裡面養著巴塔哥尼亞野兔、袋鼠和羚羊。甚至是那些更老的房子也重新設計了花園。儘管安瑟爾姆很少去，他還把西勒多夫的園子換成了攝政王公園的西勒仙版。他也增建了一個湖泊來吸引野鴨，還建造了大量的英國式小屋——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鄉村的家長式管理的早期例子，就像是各種動物和鳥類收藏表明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動物學開始表現出熱情一樣。

這個家族在歐洲大城市裡的住宅也沒有被遺忘。列昂內爾從國會議員菲茨羅伊·凱利手裡買下了皮卡迪利大街148號隔壁的房子，請尼爾森與英尼斯公司重新在兩座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一座新的更大的房子。在施工進行期間，他們搬到了奈茲布里奇的金斯敦別墅暫住。要想對最後完成後的建築留下點印象（這幢房子在公園道為緩解交通壓力進行擴路時被拆掉），你只需要走進任何一家顯赫的倫敦俱樂部：

地下室是留給男僕的居室和酒窖，底層是巨集偉的大廳，大理石鋪就的樓梯把你引向一樓的接待室，二樓是私密的包房，閣樓是女僕的房間。廚房移到了花園裡的平臺下面。位於巴黎的幾家飯店也是類似的規模，並且都是同樣的基本結構。

當然，用合適的傢俱和飾物來填充這些房子的工作一直都沒有能完成。夏洛特一次非典型的在巴黎的購物之行提供了一份購物清單，包括一組大理石物品，價值2000英鎊；四個小的雕像；一個水晶吊燈；四座羅馬皇帝的半身像；「兩隻精緻的法國紅花瓶，雕刻得美妙絕倫，內容表現的是海神尼普頓被幾位特賴登海神和海仙女所圍繞」，花費了5000幾尼；一張桌子，150英鎊。一年後，倫敦的藝術品商人給夏洛特看了一批東西，其中有一幅魯本斯的畫；「一幅伊尼哥·瓊斯所作的漂亮的壁爐畫；一幅同樣精美的喬舒亞·雷諾茲爵士的肖像畫，畫的是一位美麗的婦人……最後，當然也不是最不重要的，是羅素先生很早前就答應過的日本或者中國的藏品」。像（龔古爾）這種假內行，喜歡嘲笑羅斯柴爾德家族老是依賴藝術品商人的做法，他們最惡毒的故事之一是描寫安瑟爾姆給了眼鏡商人36000法郎，要求他發明「一架長柄眼鏡，能給他那種用有品位的人的眼光來看作品的的能力」；另一個是想象詹姆斯為了確保一幅韋羅內塞的畫作能得到一個好價格，特為商人的女兒舉辦了一次盛裝舞會。真實的情況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現在已經身處藝術品收藏界的精英階層，甚至可以說已經成了領軍人物。「一幅很平常的小幅拉斐爾出價15萬法郎——庫伊普的作品92000法郎。」納特1869年時從巴黎的一次拍賣會上向他的兄弟報告，「要想買畫作的人，現在必須要很有錢才行。」或者像他的堂兄古斯塔夫說的：「瞬間花錢。」但是，如果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誰會有這種錢？

除此以外，19世紀60年代早期在紐科特對銀行大樓的重建似乎是一個後來想起來的事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夏洛特認為新的建築「相當絕妙，是為那些大生意所準備的」。它一直矗立在那裡，見證著之後，政治（還不說藝術和建築）在多大程度上把羅斯柴爾德家族年青一代的注意力從這個目標的追求上吸引走。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

（1849～1858年）

我很高興給那些我們大家都討厭的猶太人點顏色。

——凱沃爾

19世紀50年代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是一個困難的時期，至少按照傳統的觀點來看是這樣的。首先，路易·拿破崙·波拿巴——詹姆斯對他一直心存疑慮——推翻了《共和憲法》，並且以他叔叔直系繼承人的身份宣稱自己是皇帝。其次，詹姆斯的金融對手阿希爾·福爾德——海涅稱為「高茲河鐵路總拉比」的本諾特的弟弟當上了財政部長。根據經常被引用的德·威拉-卡斯特爾伯爵的說法，福爾德告訴拿破崙說：「陛下，您絕對有必要把自己從羅斯柴爾德的控制下解放出來，他們根本沒有考慮您的利益。」第三，新形式的「通用型」銀行，比如像工業信貸銀行——由詹姆斯以前的助手佩雷爾兄弟創立——嚴重威脅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統治地位，這種威脅不只是出現在法國，而且出現在了整個歐洲大陸。最後，19世紀50年代國際局勢出現了劇烈的動盪：從1815年開始就困擾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強大勢力之間的大戰噩夢成為了現實，首先是克里米亞戰爭（英國和法國抗擊俄羅斯和土耳其），然後是義大利戰爭（法國抗擊奧地利和義大利）。

然而，這個說法其實在兩方面存在著誤導，主要原因是歷史學家過分依賴於那些明顯帶有偏見的資訊來源，比如於布內伯爵——出任奧地利大使的阿波尼的繼承人——的日記，他們過分強調了詹姆斯在拿破崙政權下所經歷的困難。另外，他們也過分關注於法國方面，而詹姆斯所經歷的這些困難其實不應該被孤立起來看，因為就在同一時候，其他的羅斯柴爾德銀行都非常繁榮。

兩個皇帝

於布內把貝蒂與康嘉尼爾將軍的關係描繪成一段羅曼史完全是一種惡意的中傷。事實上，最近重新發現的內蒂在阿爾方索去美國的那段時間寫給阿爾方索的信表明，她對康嘉尼爾的第一印象並不好。這

位將軍給她的印象是一位「中等身材、消瘦、醜陋的男人，除了鬍子以外看不到任何英武的東西，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很蒼老，而且已經風燭殘年」。當他在1849年與他們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儘可能地表現得善解人意，而且非常渴望去取悅人」，但「在這方面，他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沒有在他身上發現我以前聽別人讚揚他時所經常提到的坦誠與忠誠；相反，他給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位雙面人」。漢娜告訴迪斯雷利說，康嘉尼爾是一位十分拘謹的人，當他被邀請到羅斯柴爾德家與一位著名的歌劇演員一起吃飯的時候，他拒絕了，而且「為邀請了一位公眾歌手吃飯而對貝蒂進行了一番說教」。在這段時間，貝蒂也沒有能迴避出現路易·拿破崙的一些安排。她在4月份告訴她的兒子，元首「幹得不錯，每天他都能為他的法令和法律權威的原則找出一定的依據」。同樣重拾信心的還有她自己，她「最終打破了堅冰，出現在元首的沙龍聚會裡。再不出來對這種政治困局施加點影響，自己都自身難保了」。

另一方面，毫無疑問康嘉尼爾提到了能讓一個在整個家族裡反對革命的態度最堅決的女人重獲信心的正確的事。她滿心讚許地寫道：「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反動分子……有一天，他談到了關於我們旗子上的第三種德行的標誌，他對我說，‘我對兄弟情義是如此仇恨，要是我有一個兄弟的話，我會叫他表弟。’」不久，她又向阿爾方索保證，「我的朋友康嘉尼爾會制止那個瘋子的」，還說家族「會得到難能可貴的康嘉尼爾的保護」。「在我們尊敬的康嘉尼爾身上，」她在6月份時宣稱，「我們看到了一位值得信賴的朋友，他能非常嫻熟地處理各種突發事件，而不讓我們當時就知道他所面臨的困難。我沒有辦法告訴你這個人有多麼崇高，他有多麼高貴的心靈以及忠誠的靈魂，他是多麼坦蕩，這位過去的英雄，渾身充斥著能給他帶來意志力的俠義，他想做的事情從不落空。」如果她是在公眾場合說的這些話，那麼於布內在發現政治問題的同時又探聽到大量的這種逸事就不會讓人感到奇怪。她的孀婦漢娜很小心地評論康嘉尼爾「對家族非常盡心，很認可貝蒂的才能和能力，欣賞家族在革命期間的勇氣和行事方式，並對他們的繁榮昌盛表示了強烈的興趣」。對於這一點，詹姆斯滿懷羨慕和困惑——儘管康嘉尼爾願意給他提供敏感的政治情報（比如關於法國對唐·帕西菲科事件的政策），但他從來沒有用這些訊息來進行投機

——評論道：「迄今為止，康嘉尼爾從來沒有迷失（在投機裡），他也從來沒有對我說他想要投機。事實上，我很肯定，如果我想要對他或者他的助手建議這類事情，他可能就不再會見我或者接受我的邀請。他是我見過的最不平常的人物！」相反，波拿巴就對於投機卻樂此不疲——但不是與詹姆斯聯手。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2）

整個的1850年間，詹姆斯都在努力去調整他與拿破崙兩人之間的關係，但是越來越顯而易見的是，拿破崙掌握著主動，而這可能會給詹姆斯帶來麻煩。「元首大概認為我有什麼方面對不住他。」詹姆斯在1850年1月的時候說道，「因此，似乎我在他那方面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特別是在福爾德不幫助我的情況下。感謝上帝，我並不需要他。」按照這個說法，他信不過福爾德的傳聞是真的（這和他與一個異教徒結婚並沒有多大關係）。還有就是，他們之間的競爭本質不應該被曲解——他們經常來往，而且人們發現了很不應該的一面：一個兄弟做銀行家，而另一個兄弟做財政部部長，用詹姆斯的話說，這不是什麼公平的戰術。詹姆斯明顯感受到了自己在生意和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很遺憾，」他滿腹牢騷地說，「我很不樂意看到我們的生意被搶走，我們跟從前比好像已完全不同。」但是如果認為發生在1850年的那件使他未能保住年金業務的事情就代表著他的金融影響力在降低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詹姆斯當時已經準備好了一份標書，但沒有去參加競標，原因是納特4歲大的兒子梅耶·阿爾伯特去世了，而葬禮恰好就在財政部部長定下開標的日子。儘管在參加葬禮，他也無法掩飾自己的竊喜，因為他的缺席造成了福爾德招標活動的「慘淡收場」：「現在他看到了，沒有人能把羅斯柴爾德拋在一邊，福爾德不可能為所欲為。」

真實的情況是，詹姆斯當時真正最為關切的是外交而不是金融。他擔心元首變幻無常的對外政策會在法國與其他大國之間導致摩擦，甚至是導致戰爭，對手有可能是英國（針對唐·帕西菲科事件）或者是普魯士（針對日耳曼問題）。希拉剋關於詹姆斯在一次與拿破崙和康嘉尼爾在1850年末的會議中試圖緩和法國政策的故事證實了這個說法。「好吧，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次伊（與）德國的爭吵是關於深木（什麼）問題？」詹姆斯以辯解的口吻說，「讓我們來做一些按

（安）排，看在賞（上）帝的分上，讓我們來做一些按（安）排。」按照這個故事的說法，拿破崙的反應只是把自己的後背轉向了他。詹姆斯確實於1850～1851年間在很多場合多次見到過拿破崙，但詹姆斯在影響他的政策方面的嘗試從來沒有成功過。相反，詹姆斯抱怨元首「最喜歡玩的遊戲就是戲弄小兵」，他是「一頭驢……最終會使整個世界都變成他的敵人」。具體來說，法國插手1850年下半年間發生在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的爭端的可能性讓他有了不祥的預感。儘管他一直擔心死於「紅魔之手」，如果路易·拿破崙由於對外政策的重大失敗「像路易·菲利浦一樣被迫得走投無路」，詹姆斯認為他不會覺得太意外。

所有這一切都解釋了為什麼隨著波拿巴分子政變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詹姆斯也變得越來越焦慮起來的原因。早在1850年10月，他就開始向倫敦分行轉移黃金，他對侄子的解釋是「當一個像他（拿破崙）那樣的人有可能會因為我是康嘉尼爾的朋友就沒收我的錢財的時候，我情願把我的黃金放到這兒去掙3%的存款利息，也不願意放到國債上或是將它束之高閣。我並不是害怕，但我寧願小心行事。從政治上看，這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同時，詹姆斯由於一直保持著跟康嘉尼爾的來往（甚至在康嘉尼爾被他的軍隊解職，離開國民衛隊司令部後，兩人也來往不斷）而大大增加了他的政治曝光度。1851年10月，詹姆斯告訴他的侄子說，「我們的將軍」胸懷「遠大的理想」。

「我懷疑在這些理想實現之前，」他又很不安地說，「巴黎可能浸泡在血泊中。我已經賣出了我所有的公債。」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懷疑詹姆斯擔心在12月1～2日的叛亂發生的夜晚，他會與康嘉尼爾以及其他共和黨領導人一起被捕。很有象徵意義的是，在「盧比孔行動」

（暴動的代號）前一週，他從樓梯上跌倒，弄傷了腳踝，因此，當波拿巴分子展開攻擊的時候，他十分順理成章地放棄了抵抗。但是有點讓人不解的是，他在暴動發生的當時發給倫敦的信上，對於政治問題居然隻字未提，對此，詹姆斯的解釋是，他有理由擔心這些信件會被檢查。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非常幸運的是，貝蒂在遇到阿波尼（Apponyi）的時候並沒有表現得很矜持，因此讓我們知道了她的很多激烈反應：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3）

她相信元首隻是成功地解救了那些激進分子，而且他會被迫採取搖擺政策，最終他只會以成為他們的一種煽動手段收場。「為了能繼續沿著元首選擇的道路走下去，他不得不以煽動（意思是極左）來威脅我們，因此他不能完全把它摧毀；而我擔心他不僅根本就能力挽狂瀾，相反，他可能會為了達到他個人統治的目的而推波助瀾。」

然而，詹姆斯從來就不是一個會把他的政治喜好與他的生意混為一談的人。除了他個人對康嘉尼爾的喜歡之外，他並沒有要對共和黨人效忠的想法，並且以「極大的妥協」接受了新的局面。費裡耶爾把局勢穩定的訊息帶到了一個臨時發起的在拉斐特大街舉行的銀行家聚會上。

與會人士誰都沒有明確譴責路易·拿破崙對1852年以前《憲法》的肆意妄為的決定，這種事情大家認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家所擔心的只是這將成為一場危險的賭博。報道中說逮捕了幾名將軍，大家害怕這可能會導致軍隊內部的分裂，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則意味著法國末日的到來，在這種情況下，最終誰是勝利者已經無關緊要了。費裡耶爾先生遭到了各種問題的輪番轟炸。他描述了他所見到的一切：軍官們恰如其分的幽默，士兵們良好的精神狀態，軍事力量的大規模擴張，那些看公告的人的麻木不仁，巴黎的寧靜，儘管晨曦這裡已經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這些大財閥聽到這些確切的訊息後，緊鎖的眉頭都鬆開了。

另外，局勢很快就明朗起來，拿破崙通過粉碎共和黨左派，併發出支援擴張性的信貸政策的訊號，製造了樂觀的金融氛圍。國債價格的波動就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在暴動的前夜，（票面利率）3%的國債報價是56，而（票面利率）5%的國債報價是90 5。之後，價格分別上漲到了64和102 5。到了1852年年底——當時拿破崙在暴動一週年時宣佈自己為皇帝，3%的國債達到了83，從共和制到帝制的資本收益率接近50%（見圖2 1）。鐵路投資總額的資料情況也都大同小異：在1848～1851年期間出現過停滯之後，投資總額到1856年增長了5倍。詹姆斯逐漸意識到經濟和政治事件並不是同步的：甚至戰爭恐慌和暴動發生前那段時間的國內緊張局勢都沒有造成他所預期的動盪局面。

「聽那些政治家的說法，」他在1850年時評論說，「你會以為全完蛋了；而聽那些金融家們說的，他們告訴你的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到

了12月2日，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又開始重新攜手，政府通過證券交易所的執行有意識地重新返回到健康發展的道路。

圖2 1法國3%和5%利率國債的周收盤價，1835年～1857年

資料來源：《觀察家》

因此，拿破崙政權對詹姆斯來說根本不是一個理想的結果，他可能更希望康嘉尼爾為奧爾良派的復辟鋪平道路。但是一旦拿破崙很明確地表示不打算對他進行人身處罰後，他也可以很勉強地接受這個現實。他已經在1850年10月很有預見性地總結了自己的處境：「最後我們將迎來一位皇帝，然後就是戰爭結束，要不是我如此害怕戰爭，那麼我可能就是一名保皇黨人。」暴動之後，他很快意識到，如果他被認為與被推翻的共和黨人走得太近的話，他的競爭對手就會搶先他一步。貝蒂在拿破崙退位並被放逐到費裡耶爾時表達了她認為拿破崙「道德淪喪」的看法，與此同時，她的丈夫不得不對時局做出分析。

「我認為拿破崙正在積蓄力量，」他在暴動三週後給倫敦的報告中說，「儘管事實上那些大人物和善良的人不大會接受他的邀請。你們認為我們應該完全置身事外嗎？」這只是一個修辭方面的問題，並不期待對方的回答。連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女人們都做不到堅定不移地保持她們的社交抵制。事實上，她們的態度在12月底之前就開始軟化了。「在羅斯柴爾德的家裡，」阿波尼在見過了納特的妻子夏洛特以及貝蒂後，充滿惡意地看到：「這種神態自若的態度來自於他們所擁有的鉅額財富，這些財富來自於他們資產組合中的那些債券和股票在當時的市場上出現的飛漲。」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4）

這次至少是詹姆斯定居巴黎以來的第五次政權更替，因此很顯然很難再讓他嚴肅地看待這類事件了。「我親愛的侄子們，你們怎麼可能喜歡一部為兩個沒用的東西制定的法國《憲法》？他們正在這裡的大街小巷為了那個目的而叫賣呢。」一個極權的政府「不太好，但在這裡你可以做你喜歡的事，而且所有的一切都過去了」。早在1852年的10月，詹姆斯就很輕鬆地報告說他「與皇帝的關係非常好，與其他入也是如此」，這是在拿破崙正式宣佈自己做皇帝之前兩個月的時候，也是在拿破崙著名的波爾多講話前幾天。拿破崙在這次講話中宣

稱：「帝制意味著和平。」這似乎排除了那種輕率地廢除比利時的中立政策，或者是挑戰普魯士對萊因地區的統治的可能性，而這些在早兩年是大家最為關切的事件；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其他列強把拿破崙這個皇帝只是看成一個象徵性的符號。

當然，事情本身遠沒有那麼簡單：1853年1月，詹姆斯仍然很難拜見到這位新皇帝。但是他有兩條路子進入這個新朝廷。第一條路子是他仍然是奧地利的總領事，而且煞有介事地穿上了他的紫色制服，以提醒那些忘了他外交官身份的人的注意。1852年8月，他可以給拿破崙傳遞來自奧地利新皇帝弗蘭茲·約瑟夫陛下的禮節性問候。儘管於布內處心積慮地破壞詹姆斯在巴黎代表維也納的權力，但是隻要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是奧地利的銀行家，他就沒有機會驅逐他。詹姆斯找到的迎合拿破崙的第二條路子，是支援半西班牙半蘇格蘭血統的女冒險家尤金妮·德·蒙蒂霍的計劃，許多勢利的巴黎人認為她只不過是拿破崙眾多情人中的一位。拿破崙在1850年經人介紹認識了她，到1852年年底就無可救藥地陷入了對她的瘋狂追求之中。當他打算與胡亨羅赫的阿得雷德公主（Princess Adelaide of Hohenlohe，維多利亞女王的一位侄女）的外交通婚計劃落空後，他衝動地決定娶尤金妮，這使得他的大臣們驚慌失措。

到1月12日，這個決定仍然屬於祕密，當時尤金妮正挽著詹姆斯的胳膊出現在忒勒蕊的舞會上。於布內注意到詹姆斯很久以來「都被這位年輕的安達盧西亞人所迷惑，但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嚴重，因為他相信會有一場婚禮」。他的一個兒子——據推測應該是阿爾方索——陪伴著她的母親。當一行人進入到瑪赫廓大廳，準備為女士們找個坐處時，外交部部長德律安·德呂的太太傲慢地對尤金妮說，她們想坐的這些位子是为部長們的夫人預留的。拿破崙無意中聽到了這句話，便走到了這兩位女士面前，請她們坐到了皇帝的位子旁。兩個小時後，皇帝和尤金妮消失在皇宮的內室裡，稍後出來的時候，兩人手挽著手。3天之後，皇帝向她求婚，到22號的時候公開訂婚，然後在一週後舉行了婚禮。「我更欣賞那種不僅能使我愛她，而且更能使我尊重她的女人。」拿破崙宣稱。「一個男人可以愛一個自己不尊重的女人，」安瑟爾姆的妻子夏洛特在這不久之後評論道：「一個男人只會與他敬重和尊敬的女人結婚。」這句恭維話——考慮到羅斯柴爾德家

族獨特的區分浪漫愛情和婚姻的傳統，這應該是一個很言不由衷的說法——很適時地傳到這對皇室夫婦的耳朵裡。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 (5)

可以很肯定地說，這件事的重要意義怎麼說都不會過分；從另一方面說，對於我們現代的讀者來說，大家很容易忘掉當時的人是多麼嚴肅地看待19世紀繁複的宮廷生活的禮儀——特別是，我們可以說，在這樣一個讓人無法想象的暴發戶的宮廷裡（他的宮廷來自於一場政變，而且還得時刻小心面對公眾對其合法性的質疑。）

### 工業信貸銀行

當然，真正決定詹姆斯在拿破崙第二王朝中命運的地方不是忒勒忒或是貢比涅拿破崙打獵的地方），而是證券交易所和鐵路公司的董事會。在這些地方，第二王朝鑑證了19世紀最大的企業戰爭的壯觀場景：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工業信貸銀行之間一決雌雄的戰鬥。

由於工業信貸銀行成立的時間（1852年11月20日）與第二王朝正式宣佈皇帝即位的時間（12月2日）的巧合，新銀行常常被賦予了顯然是錯誤的重要性。例如，很多作者把它描繪成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主導法國公共財政的第一個政治挑戰——拿破崙三世針對福爾德對他說的，讓他從羅斯柴爾德束縛下「解放自己」的諫言所做出的反應。第二個錯誤概念是工業信貸銀行代表了革命性的新型銀行，完全與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代表的「老式的」私人銀行相對立。

事實上，這種以公眾募股作為資本金基礎建立銀行的想法從根本上說並沒有什麼新意。從1826年開始，股份合作型別的銀行就已經合法地出現在了英國，比如像國民地區銀行和倫敦威斯特敏斯特銀行——兩家都成立於1833年——早已經在佩雷爾兄弟投身銀行業之前很久就證明了這種方式的可行性。在工業信貸銀行成立的時候，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分佈著大約有近百家股份合作性質的銀行，數量上大概是倫敦私人銀行的兩倍。說英國的股份合作銀行不向工業企業發放貸款也不確切（儘管它們更傾向於不做長期投資，通常把到期的票據和貼現票據按遠期到期日的方式展期）。其實，工業信貸銀行的那種做法也不是真正的長期工業投資，儘管我很尊重經濟歷史學家，比如亞歷山大·吉森克隆和蘭多·卡麥隆的判斷，認為它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整



個歐洲大陸促進了工業化。在佩雷爾家族所處的法國，他們也面對著比他們出現得早得多的對手，最早的（如果人們可以忽略約翰·羅的國民銀行）是拉斐特的國民工商銀行。而且也並不像蘭德斯所認為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其他已經存在的巴黎銀行，特別是那些老式的銀行在應對著工業信貸銀行的挑戰：他們也看到了這種股份合作的形式對長期投資所具有的合理性。儘管他們的資本金與佩雷爾家族的不同，完全屬於他們自己，但在法國和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在資本金使用方面，與工業信貸銀行使用其債券持有人和儲戶的錢的方式其實一模一樣——而且從遠期看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顯然更為成功。這裡指出一個簡單但通常被忽略的問題：工業信貸銀行的規模沒有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大。它的初始資本金是2000萬（後來到6000萬）法郎，而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的資本金在1852年的時候超過了8800萬法郎，如果合併羅斯柴爾德銀行，全部資本金則不少於23000萬法郎。而在工業信貸銀行的初始資本金裡，佩雷爾家族自己只佔有大約29%。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6）

現實中，他們真正所做的並沒有讓當時的人以及後來的歷史學家相信他們做到的那麼多，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與工業信貸銀行的差異也並沒有他們所聲稱的那麼巨大。（只有那些對巴黎不很熟悉的人才會像俾斯麥那樣把羅斯柴爾德、福爾德和佩雷爾混在一起。）佩雷爾家族一直在用聖-西門式的花言巧語來解釋工業投資的共同收益，而他們自己則做起了公債和鐵路股票的投機，並且把所得利潤悉數收入自己的私囊中。相反，羅斯柴爾德家族卻並不諱言他們的投機和收益，他們把對自己所屬的更為廣泛的群族的貢獻當成是慈善，並把這些做法與他們的生意完全分離開來。當1850年卡斯特蘭第一次碰到安東尼的時候，他被後者的抱怨所震驚，安東尼說：「在倫敦，你做什麼都可以賺錢，做棉花或者是公債，你想怎麼做都行，但是在這裡（巴黎），除了公債你根本沒有投機的機會。」聖-西門主義者不會用這種方式講話：對於他們來說，是調動全法國的儲蓄去追逐由蒸汽所驅動的烏托邦。這種風格上的差異，被股票經紀人費多鮮活地寫進了他的文章裡。與佩雷爾兄弟不同，他認為詹姆斯只能算是「一個可靠、聰明而狡詐的‘資本商人’」：

使他龐大的財富收益最大化這項唯一的工作構成了他一整天的工作內容。月末的每一次清算都是一場戰鬥，他必須為保衛他的銀行、他的名字所代表的榮耀，並且為證明他的實力而戰。他不放過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任何訊息，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訊息——無論是政治的、金融的、商業的還是工業的，他都要竭盡所能從中獲利，這更多的是靠他的本能。他絕不放過任何盈利的機會，不管這個機會多麼微小。

正如我們所見，像費多這樣的小人物，與詹姆斯這樣的人做生意是一件多麼費力不討好的事。但人們只需要到工業信貸銀行的辦公室，就能看到與羅斯柴爾德銀行間可能會出現的最大的反差。

在佩雷爾兄弟這裡，不用擔心有什麼過分的話語，也不用害怕會發生什麼突然的情緒失控。這些迂腐的謙謙君子，過度的仇恨使他們渾身都散發出腐爛的味道，他們總是那麼聚精會神，像鐵棍一樣僵硬緊張，非常固執於自己的想法，並且對自己充滿了自戀。他們總是身陷大批朋友的包圍之中，這些人都豎起了耳朵，以便能跟蹤到他們客戶談論的關於他們正在操縱的股票的話題，瞭解他們是要買入還是賣出。工業信貸銀行的僱員肅立在樓梯上，等著詢問你是否要下單。每個人都充滿著暴富的幻想，不惜任何代價；每個人都試圖能與他的莊家的方向保持一致。

詹姆斯顯然對這個反差感到很欣慰。有一次，他頗帶譏諷幽默——這種幽默成了他在第二王朝時期的招牌——地指令費多代表他去進行一次投機，具體的做法是購買1000股工業信貸銀行的股票。這種事他幹了不少於5次，讓他的經紀人吃驚的是，在清算的時候他真的會全額付清這些款項。當費多表示出他的不解時，詹姆斯假裝很吃驚：

你的意思是桑（什）麼，我年輕的朋友？我根本沒有嘲笑你的意思。聽好了：我對佩雷爾先生的菜（才）能擁幽（有）最大的新（信）心。他們是這個地球上最偉大的金融家。我是家族裡的一分子，我很高興能把我微薄的財富透（投）一部分在他們的事業上。我遺憾的只有一件事，這就是我不能夠把我所有的資本都委託給如此聰明（明）的人。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7）

與他們身處同時代的人——例如比較有名的金融家尤里斯·伊薩克·米勒——有時候會把這種風格上的差異歸因為這兩個家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他認為，「北方的猶太人」由於來自於日耳曼人粗獷和拘謹的氛圍，他們在對財富的自私自利的追求中顯得「冷淡」而「有條理」，對國家的利益顯得很麻木；而「來自米迪的猶太人」不僅「更有貴族氣息」的「拉丁」氣質，而且得益於法國更為寬容的猶太人政策，因而以一種更加利他的、以公眾利益為重的方式來考慮生意。另外有些人則把這種差異更多地歸因於政治因素：羅斯柴爾德代表「金融貴族」和「金融封建主義」，而其對手代表「金融民主和一種‘1789’經濟現象」。

在現實工作中，這兩家銀行的競爭主要集中在乏味的鐵路特許權領域。最起碼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在共和時期，那些鐵路狂熱分子曾經被潑過冷水。鐵路的投資和建設由於政治家們在關於特許權應該授予誰的遙遙無期的辯論中而中斷，利率過高、股市交易萎縮而且勞工運動導致了勞力不足。當時只有一條主幹線還在建設（從凡爾賽到雷恩的工程）。拿破崙的政變最立竿見影的後果之一就是結束了所有這一切。大權在握的當天，他就批准了從里昂到地中海沿線的特許權，兩天之後，巴黎到里昂的也確定了下來，而且都授予了一個財團，而財團的成員包括了巴黎和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北方公司的特許權也在重新談判之中，所有條件都變得異乎尋常地有利於該公司。王朝的建立對於鐵路大亨們來說是一件千載難逢的幸事：在1852～1857年間批准的特許權總數不少於25件，之後到1870年間又另外批准了30件。

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拿破崙同母異父的私生子弟默尼公爵扮演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角色，在他的眼裡，這個新政權最主要的作用是為了自己聚斂財富提供機會，因此他強烈支援將很多小的鐵路公司合併成幾條大的線路。詹姆斯早在1852年初的時候就搭上了默尼這條線，並且很喜歡他所聽到的一切。很有意思的是，法國分行這個時期的資產負債表表明，詹姆斯持有很多鐵路公司的股票，價值超過2000萬法郎（佔巴黎分行總資產的大約15%）。這些股票的市值這個時候更是高歌猛進，因為投資人對新政權的鼓勵政策做出了反應：阿波尼估計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僅僅一個星期裡就賺進了150萬法郎，而且

還「不用付出一分錢」。考慮到巴黎分行在19世紀50年代實現的資本金的巨大增長，這個數字似乎也不是沒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最大的六條法國鐵路線中，羅斯柴爾德家庭控制的北線是使用率最高的，也是盈利最好的：儘管從里程上看，它只佔了整個法國鐵路網的9%，但卻佔了全部貨運量的14%以及全部客運的12%。票價和運價與成本的比率是2 7 1這是在19世紀50年代時候的情況，而在19世紀60年代，運量比19世紀50年代增加了一倍還多。

然而，詹姆斯和佩雷爾家族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化。第一次爭執出現在1849年，當時後者正為他們擬議中的巴黎到里昂再到阿維尼翁的專案進行融資，而之前他們並沒有知會過羅斯柴爾德家族。在1852年，專案推進得很快，儘管此時離可以確定真正的矛盾激化何時出現還為時尚早。朝激化邁出的很重要的一步出現在詹姆斯決定參與到巴黎到里昂線的辛迪加中的時候，他拿走了這個專案股份的大約12%（其他的股東包括巴賽隆尼、霍廷格爾和巴林，而且，儘管沒有以受讓人的名義出現，塔拉伯特也似乎在其間起到了帶頭的作用）。這明確無誤地表明瞭羅斯柴爾德家族對佩雷爾家族競爭的回擊。在一系列說明性質的信函中，詹姆斯向他的侄子們解釋了他這樣做的理由：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8）

關於里昂鐵路，如果不去認真考慮，而又有兩家其他的公司參與修建，就會對北線鐵路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因此我對霍廷格爾說，我們要持有與其他銀行一樣多的股份，而且如果巴林要安排在倫敦進行認購的話，他應該跟你一起行動。總結起來說，我不想看到在新政府下面竟然會出現沒有我們名字在上面的大專案。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就有人會說：「我們不再需要羅斯柴爾德。」只要我們能得到我們希望的份額，我們最好保留住這部分兄弟情誼……相關的這些人物跟部長們都混得很熟。

信函中還無意間將佩雷爾兩兄弟中的一個稱為是「一個混蛋」，這說明他們與詹姆斯之間的關係正在迅速惡化。

但雙方之間的夥伴關係並未就此結束。事實上，伊薩克·佩雷爾還接受委託，作為詹姆斯的代表出席了新巴黎—里昂公司的董事會。另外，他的兄弟伊邁爾也以北線董事會主席的身份起著領導作用，並參

與了北線特許權的重新談判——其他的主幹鐵路線合同在1852年1月敲定。公司通過發行不記名債券籌資4000萬法郎，並使用這些錢購買了勃羅尼—阿緬鐵路，修建了新的支線（比如到毛勃格的支線）；作為回報，其特許權延長到了99年，但是國家獲得了可以選擇在1876年購買這個公司的選擇權。一直到當年的晚些時候，分歧才顯現出來，這時候詹姆斯再次對塔拉伯特給予了支援。

塔拉伯特現在的目標是將新的巴黎—里昂公司與他的通向南方的鐵路——阿維尼翁—馬賽、馬賽—土倫及其他在伽德和赫霍的規模較小的鐵路線合併成一個大的環地中海公司，所經過的路線與佩雷爾家族起初所想的非常類似。詹姆斯決定在這個巨集偉的計劃中認購2000股，而資金緊張的現實使佩雷爾家族被晾在了外面。（默尼是另一位股東的事實，使我們對那種簡單化地認為佩雷爾家族有新的政權做靠山來對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說法不得不產生懷疑。）當詹姆斯拒絕為佩雷爾家族的米迪公司提供類似的金融支援時，佩雷爾家族受到了致命一擊：儘管詹姆斯認購了330萬法郎的事實使認為他不重視這件事的說法站不住腳，但阿爾方索從董事會辭職卻是投出了不信任的一票。因此，佩雷爾家族創辦了工業信貸銀行，作為對看起來似乎被逐出了以墨尼為代表的政府作為後盾的新的塔拉伯特-羅斯柴爾德軸心所做出的迴應。

佩雷爾家族有現成的鐵路融資的模式為他們提供另外的融資源泉：在工業信貸銀行誕生之前，已經出現了兩家成功的半公眾銀行。第一家是福爾德的地產信貸銀行，成立於1852年3月，是由政府支援的抵押銀行，通過向存款人出售抵押債券——一種在19世紀特別流行的投資方式——為土地所有人提供長期貸款。到1853年底，其資本金增長到6000萬法郎，放貸總額2700萬法郎。需要指出的是，詹姆斯對地產信貸銀行與對工業信貸銀行一樣地充滿了敵意，他在1853年時認為，地產信貸銀行貸出款項的利息過高，而它所承擔的義務與它所設定要在農村地區實現的目標存在太多的疑點。它根本沒有達到支援農業經營者的目的，而是被用來資助城市資產的開發，投機的性質很大：

從一開始，我們就已經清楚地看到了這些問題，也就是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拒絕參與到這個事情中，儘管他們一再地向我們提出邀

請.....地產信貸銀行.....使自己捲入了危險的業務中，而且直到現在，它還是靠這些業務牟利.....這並不是一個建立在穩固基礎上的企業。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 (9)

另一家新的銀行是股份聯合銀行，一家由時任《鐵路日報》編輯的米勒在1850年用500萬法郎創辦起來的信託投資機構。儘管米勒一直到1853年才把這家銀行轉型成更加野心勃勃的鐵路通用銀行，他後來聲稱它給本略特·福爾德建立一個更大的企業提供了想法：

我對我自己說，如果米勒先生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建立這樣一個機構，一個由更有影響力的人員組成的組織就可能成為一個很有實力的金融組織，可以同時引領重大的金融活動和工業企業。我（從巴登）回來後，就開始尋找合適的人選加入到這個計劃中，我發現沒有再比MM E 和佩雷爾更合適的人選.....而這正是工業信貸銀行誕生的途徑。

另一個版本的說法是內務部部長佩西尼因為固執地反對阿希爾·福爾德，而或多或少地推動了成立工業信貸銀行的想法——儘管這可能是福爾德兄弟在工業信貸銀行失敗後推卸責任的託詞。事實上，福爾德兄弟和佩雷爾家族是平等的合作方，他們掌握了大部分的股份。

工業信貸銀行的新意在哪裡？不管佩雷爾家族原本的想法是什麼，法蘭西銀行沒有遂它的願，批准它稱自己為銀行。本質上，它只是一個信託投資機構，由佩雷爾領導的一個團隊投資了2000萬（後來是6000萬）法郎成立，基本的功能是吸引小規模投資人的存款進入鐵路領域。在19世紀40年代的時候，很多投資人都被燙到了手，當時無數的鐵路公司發行了大量的高浮動利率的股票。工業信貸銀行把這些事情簡單化了：他們為投資人提供標準化的不同期限的債券，並用他們的錢去投資董事們認為合適的各種股權和股票。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居於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中間的中介機構，一家發行債券來代替不可轉讓的存款憑證的儲蓄銀行。當年11月20日公佈的最終銀行章程是謹慎的政府部長與佩雷爾家族相互妥協的結果：流動資金賬戶以及從銷售短期債券中募集的資金不超過銀行實收資本金的兩倍，也就是兩

倍於財政部要求的標準；從長期債券中募集的資金不超過6億法郎，十倍於其資本金。

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工業信貸銀行直接挑戰羅斯柴爾德家庭銀行實力的情況。確實，在它們之間很快就發生了激烈的商業競爭。詹姆斯也非常惱火於他昔日的下屬那些社會虛榮的表現——特別是當他們在緊鄰費裡耶爾的阿盟維利耶購買了8200英畝的地產，還購買了緊鄰木桐酒莊的帕爾默葡萄園，甚至在納特位於法勃一聖一歐內赫大街的房子隔壁購買了住房的時候。他沒有把自己對這個新銀行的保留看法深藏在心底。在11月15日一封給拿破崙的私人信件裡他這樣寫道：這個銀行會馬上發展得特別大，而且特別容易受到危機的傷害。這種說法比佩西尼後來所說的那些更加符合實際情況。

詹姆斯提出的第一個反對理由，是傳統的保守派對股份合作制公司通常的反對理由。這種觀點認為，董事可能會是「無名小卒」而且「不負責任」，還會通過使用別人的錢來濫用自己的權利。但詹姆斯之後提出了更為可怕的預言，他認為新銀行可能會建立起一種「對商業和工業的可怕的控制」的基礎。「通過他們投資的巨大數額」，他警告道，這個公司的董事可能「為市場制定規則，而且這個規則將不受控制且壓制競爭.....將國民財富的絕大部分集中在他們自己的手上.....這可能是一個災難.....當這個銀行完全活躍起來以後，可能比政府本身更強大」。與此同時，它的所有可怕的力量可能置於沙粒堆成的基礎之上，這就是出現災難的可能性為什麼會變得如此接近實際的原因。因為銀行提供給投資人的債券是固定利率，而它自己在股票上的投資是「多樣的、有疑問的、不確定的」。當出現危機的時候，這個銀行會將經濟帶入到「深淵的邊沿」。考慮到這個新銀行所得到的許可，它可能會出現準備金不足的情況。詹姆斯預言如果它陷入困境，政府將不得不在「常規的破產」，還是暫停黃金和白銀贖回中進行選擇。這些顯然是有些誇張的擔心，似乎是精心設計出來嚇路易·拿破崙的；但這些並非是憑空捏造，下面我們將會看到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0）

不過，詹姆斯反對工業信貸銀行這個事實不應該被看成它意味著他們之間的對抗一定不可避免。可能的情况是佩雷爾家族在向詹姆斯

提供他們的新企業的股份方面確實很真誠，而他的拒絕並不能證明他們對他帶有敵對情緒。也不應該太過分地曲解這個事實：銀行的章程公佈在《世界導報》上的時候正是詹姆斯離開巴黎期間。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義大利和德國的很多最親近的下屬——陀羅尼亞、奧本海姆和海涅——都出現在股東名單裡這個事實，也弱化了反羅斯柴爾德的說法：這些人如果惹怒了詹姆斯，他們的損失會非常慘重。

真實的情況是，工業信貸銀行公開聲稱自己是代表大眾利益的金融「中心」，它更多的挑戰是針對法蘭西銀行。佩雷爾在1854年宣稱，這個新機構的建立，是「為了滿足引入新的流通機構、新的信託貨幣——這種貨幣帶有其自身所擁有的常規利益——的需求」，這種說法暗示，他認為這些債券起著準貨幣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正如更精明的同時代的評論家所能看出來的，它所做的是對法蘭西銀行在1848年革命之後所奉行的從緊的貨幣政策一種反應：在1852年之前，法蘭西銀行拒絕以鐵路股票做擔保放貸，而用國債擔保的貸款採用的是相對較高的6%的利息。由於國債收益在1852年11月時降到了3.6%，工業信貸銀行的出現就更加順理成章了。這也是詹姆斯持反對態度的理由：在1852年，羅斯柴爾德兄弟持有的法蘭西銀行的股票價值為1131078法郎，由於工業信貸銀行的出現使這部分股票出現了貶值。我們在這裡看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法蘭西銀行聯手的開始，而當阿爾方索在1855年成為法蘭西銀行的董事時，這種關係臻於完善。

工業信貸銀行一炮打響。它每股價值500法郎的股票以1100法郎開盤，4天后達到了每股1600法郎。在其1856年3月的頂峰時，它的交易價格達到了1982法郎。這些是對原始股股東來說巨大的資本收益，很難相信詹姆斯能夠做到不對此眼紅。紅利看上去也不錯，從1853年的13%漲到了兩年後的40%（意味著4%和10%的投資收益）。這樣的結果似乎在宣佈詹姆斯的災難預言不可信。另外，這並不是造假賬的成果。因為那些年正好是法國鐵路建設最輝煌的時代：在1851～1856年間，總投資增加了5倍；19世紀50年代鋪設的鐵路是19世紀40年代的兩倍還多。另外，票價和運費費率與營運成本的比率也處於空前的高峰期。工業信貸銀行存在的理由是為了使佩雷爾家族能夠分享這個市場的繁榮，從這個意義上看，它的目的達到了。



然而，它的成功也不應該被過分誇大。確實，通過使用工業信貸銀行所募集的資金，佩雷爾家族能夠通過控股的方式建立起龐大的鐵路公司網路——波爾多—塞特、巴黎—里昂經波奔奈斯線以及西線（合併了巴黎—盧恩、盧恩—哈夫、迪普—費康，以及凡爾賽—雷恩的鐵路線）。但羅斯柴爾德家族繼續控制著北線，而且是巴黎—里昂鐵路最大的單一股東，這條鐵路後來在1857年與大中部線連在一起，形成了巴黎—里昂—地中海鐵路網；在米迪和阿德內斯—埃特—歐伊斯也擁有部分不太起眼的股份。在他們中間，佩雷爾家族在法國的各種鐵路公司的董事會中擁有8個席位，羅斯柴爾德家族則有14個。此外，還有很多其他新的參與者，最著名的當屬墨尼——他在1853年成立大中線公司，這說明並不是所有這些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佩雷爾的同盟軍。但是爭奪線路的戰爭遠沒有通常所宣稱的那樣明顯：查爾斯·拉斐特在西線是佩雷爾家族的合作伙伴，同時也是北線的大股東。加里亞公爵是工業信貸銀行的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是北線董事會的成員。佩雷爾家族可能是最終連線成東線的各條鐵路中最重要的人物，但卻是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公司在1854年時為東線公司在倫敦銷售了價值250萬英鎊的債券。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1）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米勒後來聲稱，詹姆斯面對來自「新銀行」的競爭，到1855年時已經放棄了抵抗，然而，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工業信貸銀行自己冒險把戰線拉得太長。詹姆斯曾經說過，它的資本金「微不足道」，當然這種說法有點誇張。但是我們有理由說，與佩雷爾家族兄弟的野心比起來，工業信貸銀行存在著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問題。早在1853年，工業信貸銀行就曾經試圖發行價值1.2億法郎的債券，以提高可以供其使用的資金額度，但是政府行使了它的否決權。當佩雷爾家族於1855年再次嘗試著提出來的時候，他們又遭到了政府的拒絕。最後的結果是，工業信貸銀行發現自己只能越來越多地依靠那些主要來自於相關業務——例如鐵路公司的6000萬～1億法郎——的更為傳統的存款。這些限制可以為我們解釋在創辦人當初公開聲稱的目標與其投資戰略的現實之間存在著明顯差距的原因。事實上，它的資產組合有著相對較高的營業收入，其總資產從1854年僅有的5000萬法郎，一年之後就劇升到2.66億法郎。

如果佩雷爾家族把他們的業務活動限定在法國境內，那麼發生在他們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之間的那場著名「戰爭」或許就只能算是一場衝突。但他們沒有這樣做。使得工業信貸銀行似乎真正對詹姆斯構成威脅的，是它向法國以外進行的擴張，並且進而變成一種泛歐洲大陸現象的潛在力量。1853年4月2日，克羅尼的銀行家亞伯拉罕·奧本海姆和來自夏弗霍森切·邦克弗雷恩的古斯塔夫·梅韋森獲得了赫斯-達姆斯達特大公的授權，成立了一家貼現和發鈔的銀行。他們把新銀行叫做達姆斯達特貿易與工業銀行，計劃資本金設定為2500萬基爾得（約合5400萬法郎），而且設定了它的佩雷爾式的章程，這很顯然是瞄準了成為德國的工業信貸銀行的目標。這是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家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發起的切實的挑戰：達姆斯達特位於法蘭克福以南不超過20英里的地方，奧本海姆和梅韋森選擇在那裡成立自己的新銀行的唯一理由，是法蘭克福和克羅尼兩地的當局都拒絕發給他們執照。在9個董事中，4個來自法蘭克福，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對手莫瑞茲·貝特曼。

更令人擔憂的是佩雷爾家族和福爾德兄弟直接插手了新的銀行。正如我們所見，亞伯拉罕·奧本海姆是工業信貸銀行的一名原始股東（他持有500股），他還派出了他的兄弟西蒙到巴黎去招攬法國的業務。他所提供的協議是很慷慨的：在最初的40000股中，創始董事保留4000股；4000股由貝特曼在法蘭克福發行，10000股按面值賣給工業信貸銀行股東，餘下的股份由奧本海姆、梅韋森、福爾德和工業信貸銀行共同持有。但事實證明，能確保新公司成功的路只有唯一的一條。如果股票在5月公開上市時，法國人不購買這些股票的話，股票價格就非常有可能跌破面值（這是那些通常把這種情況歸罪於羅斯柴爾德的詭計的人無法自圓其說的一個弱點）。這些購買所產生的結果是給了工業信貸銀行一個獲得控股地位的機會。就在不久之前，他們還曾經討論過在其他國家設立類似的衛星銀行的計劃。早在1853年的7月，詹姆斯覺得自己有義務警告皮埃蒙特區的銀行家波爾米達，告訴他應該反對在土倫成立工業信貸銀行，警告他這類銀行「令人討厭的各種可能性」會超出「正面的好處」。佩雷爾家族首次嘗試設立一家西班牙工業信貸銀行的時間也發生在1853年，當時關於比利時工業信貸銀行的想法很快也被提了出來。到1854年，甚至奧地利似乎都未能倖免

佩雷爾的滲透。這些行動提高了警報的等級，預示著工業信貸銀行可能會具備跨國的性質，挑戰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金融界迄今無人能敵的獨特地位。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2）

然而，結果再次告訴我們事情並不能如此簡單化。在19世紀50年代意識到股份合作制銀行可能性的人不只是佩雷爾家族。在倫敦出現了很多模仿者（比如地產信貸和英格蘭工業、國際土地公司和國際金融協會），儘管其前景並不都很明朗。在1855年和1856年，德國各邦就成立了13家類似的銀行，包括戴維·漢瑟曼的貼現公司、柏林貿易公司、銀行聯盟和德意志北方銀行（後面兩家都位於漢堡）等。我們也不能忽視那些同樣重要的新進入者，他們採用更為傳統的私人和商業銀行結構，這些特點在很多方面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領先優勢造成了更為持久的威脅。在倫敦，巴林兄弟公司和N·M·羅斯柴爾德公司（特別是在承兌市場上）正在面臨著現有銀行高速成長的挑戰，比如像斯羅德與富臨高盛以及新冒頭的那些公司，比較著名的有C·J·漢布羅父子公司、歐沃倫·格尼公司和克朗威特與科恩公司。在法蘭克福，M·A·羅斯柴爾德公司遇到的新的競爭來自厄蘭格爾父子公司，該銀行由脫教的猶太人羅布·摩西·厄蘭格爾創辦，競爭同時還來自雅各布·S·H·史丹、拉扎德·斯佩爾·艾利森、莫里茲·B·戈爾德施密特和格布魯德·蘇茲巴赫。在巴黎，新生的力量是拉扎德兄弟公司，創辦於1854年。

除了19世紀50年代早期提供的那些促進繁榮的條件，促使新的銀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電報的出現所引發的通訊領域的革命。儘管電報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而其成功應用則是在19世紀30年代，而一直到1848年之後，電報才開始對國際金融真正地產生影響。到1850年，電報線路已經在美國、英國、普魯士、法國和比利時投入了商用，而真正的分水嶺的出現是在1851年多佛-加萊海底電纜鋪通之後。甚至在電纜鋪設之前，朱利·路透就寫信告訴紐科特：「如果貴公司能賞光使用我們的服務為您傳送柏林和威尼斯的匯率，我們保證不再為倫敦其他家銀行提供這項服務，而且對於任何沒有在確定的時間內送達的電報，我們保證退回您的錢。」然而，任何類似的壟斷安排在歐洲大陸已經消失了多年，在倫敦自然也不可能太持久。

這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詹姆斯對他應該期待去擁抱的一項創新為什麼會表現出令人意外的敵視的原因。在整個19世紀50年代，他不斷抱怨「電報在破壞我們的生意」。事實是，電報讓羅斯柴爾德家族過去一直在努力完善的自己的獨創方式，比如在遠距離的兩家分行之間從事金融業務的方法變得相當簡單。這個時候，他們很多的競爭對手都在通過「電報」的幫助試圖模仿他們的做法：到19世紀60年代，法蘭克福的很多家族，比如斯佩爾、史丹和厄蘭格爾全部都在倫敦和巴黎開設了分行，而且，像斯佩爾家族甚至還開到了紐約。「現在出現的情況是，」詹姆斯在1851年4月抱怨道，「昨天有一大批德國流氓通過電報在倫敦售出了（法國）鐵路股票……由於電報現在已經很方便，人們的工作效率更高了。每天12點的時候，他們發出一個急電，甚至是無足輕重的小生意也這樣，在當天交易所關門之前，他們就賺到了（自己的利潤）。」過去，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通過他們無與倫比的通訊系統以及信鴿的幫助對他們的對手進行偷襲，但是現在「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訊息」。詹姆斯能看到的除了「跟著大家做」之外別無他法，這使他大受打擊，因為「已經建立起來的電報是他的奇恥大辱」。這意味著甚至在假期人已經上船了的時候，也無法停止工作：「在洗澡的時候你都還有很多的事情去考慮，這不是件好事情。」類似的抱怨一直到了19世紀70年代，在詹姆斯兒子的時代都還能夠聽到：儘管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得不採用這項新的技術，但他們一直都不喜歡這種對金融訊息幾乎是廣而告之的方式，而仍然繼續使用他們自己熟悉的方式相互間採用信件聯絡，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3）

### 黃金熱

然而，對於這種不太適應情況的影響也不應該被過分強調。現實的情況是，儘管在歐洲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競爭，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保持著自己以真正的全球業務為特徵的聯盟組織。事實上，他們在19世紀50年代搶在電報影響到達各個大陸之前就取得了他們最大的成績。在1866年之前，歐洲和北美之間還沒有電報服務相連，歐洲與拉丁美洲的聯絡則出現在1869年之後，與澳洲的聯絡出現在1873年之後。在這些地區，羅斯柴爾德家族傳統的那種經常保持通訊，但不是

每天都保持接觸的半自動管理體系仍然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羅斯柴爾德歐洲的機構當然繼續著他們的工作：威斯威萊和鮑爾在馬德里；塞繆爾·蘭伯特繼承了他岳父裡奇騰伯格的位置駐在布魯塞爾；新錄用的霍拉茲·蘭道先是供職於君士坦丁堡，然後又轉到了義大利。但他們此時所承擔的情報收集工作的作用與以前相比已經大不如前，當然那些機密的政治資訊仍然非常珍貴，只有在與某個機構保持足夠多的交情的前提下才可能獲得。在這期間，越是冷僻的代理人，其戰略重要性也就越大。

1848年的危機暴露了跨越大西洋進行交易所面臨的困難程度，特別是當一個單獨的代理人處於在紐約擁有獨立決斷權的情況下。出於以一個完全的羅斯柴爾德合夥人替換貝爾蒙特的想法，詹姆斯在那一年的10月把阿爾方索派到了那兒。貝蒂在給兒子的信中透露了這個考慮當時有多麼嚴肅。她建議阿爾方索應該很有耐心：

只有等到具備了處理美國事務的足夠經驗，才可以用大人物的語氣講話。首先要很尊敬對方，但是如果禮貌不起作用，你就用符合你地位和權力的精力和人格，把這個人擺回到他自己應有的位置上。如果這樣做了，這位先生還是想指手畫腳，讓你這樣那樣，那麼，你完全可以戴上你的手套，告訴這位先生門在哪兒.....

問題終於在1849年公開爆發了。「與貝爾蒙特的這種局面再也無法繼續維持。」她在3月24日寫道：

他對別人留給他的信任一點都不感恩，甚至是在別人為了顧全他的利益和他的面子而不去撕破臉皮的時候.....現在要考慮的問題是：這對我們家族以後在紐約設立以我們名字命名的銀行是不是有很大幫助.....美國的未來對於那些選擇參與到這個大潮中的人來說，看上去是如此的恢巨集，一想到這樣的願景，我就禁不住自豪，我承認，你我的兒子，將會是那家給我們這個名字增光添彩的銀行的奠基人.....你的事業會飛黃騰達.....你離最偉大銀行的巔峰僅一步之遙。

她在5月時告訴阿爾方索，她的計劃是「看到你在美國的所有方面都能立起來.....從代理人的貪婪和愚蠢中釋放出這個偉大的未來.....所以，我重複說：留在新世界——如果今後我們的境遇雪上加霜，如

果舊世界註定要衰落，雖然上帝不可能會允許這樣的情況出現——它就會成為我們的新家園」。

這個想法在1849年她兒子回到歐洲後（一般認為只是臨時的）一直都還在討論之中。「阿爾方索.....已經決意要回去」。列昂內爾在外德柏德見過他的侄子後這樣記錄道，「我們說到了有關美國業務的總體原則，但也就是到此為止。詹姆斯叔叔和阿爾方索兩人都認為在美國我們能賺到大錢，因此希望繼續那邊的業務，而他無論如何都應該回到那邊去。」阿爾方索自己說當他回到美國後，要「將那邊的事務放到一個更便利的立足點上」，而卡斯特蘭毫不遲疑地認為，他不久將再次離開巴黎「到紐約去找處房子。」而在紐約，也是「到處都在傳說阿爾方索男爵正動身往美國來」。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4）

然而，這件事情卻根本沒有發生，這很有可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犯下的單個最大的戰略性錯誤。很難說清楚為什麼會這樣。一種由貝蒂的信所透露出的很大的可能性是阿爾方索不能說服自己放棄舒適的巴黎生活，而去過紐約那種還略顯粗陋的生活方式。做母親的不得不說服她的兒子，她試圖把這個想法說得對他更有吸引力，她建議說，在兩年的開始期之後，已經安排好計劃的新銀行的日常運營可以委託給「一個臨時的代理負責打理，一直到家族中有人，或者之後你的兄弟可能會想要過去待幾個月.....一旦銀行建立起來，你就可以很快回到我們這裡來，我親愛的兒子，而與此同時，我們可以考察那位準備遠赴他鄉去替換你的人」。倫敦的合夥人不是很熱情，儘管他們也一直懷疑貝爾蒙特「在用我們的錢進行投機」。按照貝蒂的說法，列昂內爾和他的兄弟都「看淡這個計劃的前景」。他「擔心巴黎會被擺脫掉，因此更傾向在那裡使用一個代理。但這個代理只能是戴維森，他很會為他們的利益著想」。

或許，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是貝爾蒙特最終成功說服了詹姆斯，讓後者相信他不可以被替換。一直到這個時候，他都是在美國被公認的一個人物，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幾乎與他的財富增長得同樣快。在1849年，他終於能夠與美國海軍司令馬修·加爾佈雷斯·佩裡的女兒卡羅琳·佩裡訂婚，而新娘正像貝爾蒙特所強調的是「我們最有名望的家族」的成員。4年後，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角色轉變——貝爾蒙特駕臨歐

洲——以美國駐海牙大使的身份。這些世界性的成功標誌（對於一位年輕的、接受法國教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需要很多時間才能夠與其比肩）可能最終說服詹姆斯放了貝爾蒙特一馬。甚至貝蒂都認識到貝爾蒙特已經「為他自己建立了強大而獨立的位置，他了解這個國家裡裡外外的資源，他手裡握著破解商業世界中所有爾虞我詐的祕密的鑰匙」。「我傾向於這種看法，」她的丈夫在1858年下了這樣的結論：

我們應該將美國業務的管理完全放到貝爾蒙特的手裡，我們可以完全信任他，他對那裡的業務也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如果我們這樣做了，我們也就不會再一直忍受那些無休止的抱怨和疑問，比如我們是否應該接受這家或者那家銀行的票據。

僅7年前，他還在強烈地抱怨貝爾蒙特不讓他「看賬簿」瞭解美國代理處的情況。

當然，貝爾蒙特只負責東海岸的業務，也就是主要由建立起來的東北部那些州，比如紐約、賓夕法尼亞和俄亥俄州，以及主要的鐵路像伊利諾伊中部鐵路，所發行的債券業務。19世紀50年代期間吸引力越來越大的地方是西海岸，本傑明·戴維森懷揣著4萬英鎊的銀行存票，緊隨著加利福尼亞已經發現了黃金的新聞被派遣從墨西哥進入。再一次，羅斯柴爾德家族又錯誤地在一個如此偏僻的市場上將自己的利益託付給了一個單獨的個人。「那裡的文明程度還很低，所有事務的處理都伴隨著個人風險」，因此，羅斯柴爾德家族決定從法蘭克福銀行派一位叫梅的職員到舊金山去加入戴維森的工作。詹姆斯對梅很滿意：這是一個不錯的小夥子……很聰明，而且是法蘭克福的猶太人。我總是對這類人擁有極大的信心。但他不久開始醒悟過來。僅僅一年以後，梅和戴維森就為一所新房子是支付2.6萬還是5萬的情況爆發了一場爭吵。戴維森的兄弟馬上跳出來辯解，指出加利福尼亞分行在短短兩年時間裡就獲得盈利37762英鎊；考慮到舊金山較高的生活成本，它的運營成本是合理的；而且，在購買這所新房子之前，他一直住在「保險庫上面的棚屋裡，活像是一頭生活在豬圈裡的豬——他很害怕離開這裡，連吃飯都處於驚恐之中，害怕有人喊起火了就得馬上跑出去，而一旦起火，他就只能葬身火海」。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5）

在眾多類似的與代理人之間的爭吵中，這次似乎已經煙消雲散，戴維森和梅兩人仍然留在了那裡。10年之後，他們仍然待在那裡，但到這個時候，梅要求能夠被批准回家——在一封信裡，他透露了羅斯柴爾德家族與他們美國代理的關係：

每天我都變得更蒼老。現在我36歲了，是時候讓我下定決心，決定是繼續過這種孤獨的生活，在遠離家鄉的這個地方了此餘生，還是回家去定居了。這個國家不是讓一個人，特別是歐洲人可以待很多年的地方。儘管對文明和社交做了最起碼的安排，當你還年輕的時候，所有這一切都還不錯，但越來越大的年紀會帶來其他的想法。你不需要推測……我已經在這個國家積累了很多財富，這使得我決定從這個圈子裡退出……我承認您如此慷慨地提供給我這樣的位置——您的恩情我永遠無法忘懷，我整個一生都對您心懷感激——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優勢，但……您的利益從來沒有受到過絲毫的傷害，而且……您的生意總是被擺在最優先的位置，我們給予了無與倫比的關注。

19世紀50年代末，羅斯柴爾德決定派另一位戴維森——內森奈爾？戴維森去墨西哥替換本傑明，因為這個地方政治局勢不穩，因此還有很多重要的業務機會：不僅可以貸款給長期以來處於破產邊緣的州政府，還可以投資水銀礦、煤礦和鑄鐵廠。在墨西哥保持自己存在的重要性在1860～1861年間變得越來越明顯，這時的墨西哥成為了法蘭西帝國的野心所關注的目標。薩芬伯格在此期間留在古巴，這個行動馬上顯示出了其政治價值，當時美國政府試圖從西班牙手裡買下它——這個計劃有貝爾蒙特的參與，但由於在美國國內遭到反對而未能實現。

最後，還應該提到羅斯柴爾德在美洲的另一個一直覬覦的地區：巴西。這裡曾經是19世紀20年代時內森很注意的一個地方，但20多年來，倫敦與里約之間的業務一直都是不死不活，部分原因是繼任的政府沒有繼續藉助於倫敦的資本市場。但是當1851年與阿根廷和烏拉圭之間的戰爭爆發後，所有這一切都改變了，戰爭的開銷迫使巴西在第二年通過N？M？羅斯柴爾德公司發行了104萬英鎊的債券。國家鐵路網的快速增長也出現了新的金融需求。1851年借款後馬上又有了為巴西亞和舊金山鐵路公司所發行的180萬英鎊，另外還有一筆150萬英鎊給



政府的貸款也是用於鐵路建設（兩筆都發生在1858年），一筆200萬英鎊給聖保羅鐵路公司（1859年），以及一筆不超過140萬英鎊的政府貸款。1860年的貨幣危機以及巴西債券價格的下滑使得進行一段時間的調整成為了必要，因此巴西政府在1863年新發了一筆380萬的債券，主要是為了轉換髮行於19世紀20年代和19世紀40年代的早期債券。然而，1865年爆發的與巴拉圭的戰爭使巴西的金融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在與巴西部長莫瑞拉進行了多次冗長的談判後，列昂內爾同意提供一筆不超過700萬英鎊的新貸款。在戰爭於1869～1870年接近尾聲的時候，又開始談到了另一筆貸款。這還只是一系列很特別的在巴西政府與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之間如婚姻般的金融關係的開始；在1952～1914年間，這種關係所產生出來的債券發行不少於1 42億英鎊。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6）

巴西和美國數十年來一直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活動的主要區域，相對來說，亞洲或多或少尚處於「有待認識地區」。但在這個地區，19世紀50年代同樣也是一個擴張的時代。在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挑起這場戰爭的藉口是中國禁止從英國控制下的印度進口鴉片）之後，中國香港被英國吞併，而且還有另外5個「通商口岸」對歐洲商人開放。這加速了中國的茶葉和絲綢與西方的白銀和印度鴉片的交易，併為英國商業開創了新的有吸引力的機會（同時，開始侵蝕中國商人的勢力，比如像吳平清，曾經有歷史學家稱此人為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到1853年，倫敦銀行已經開始與位於上海的商業公司，比如科蘭普敦、漢布瑞公司等，開始了常規的通訊聯絡，並從墨西哥和歐洲定期向那裡發運白銀。白銀很顯然是最受關注的業務，當然銀行同時也對印度的鴉片感興趣，他們發運了一些到西邊的君士坦丁堡。到19世紀50年代末，已經與一家名叫雄內基爾本公司的加爾各答公司建立了定期聯絡。周邊的危機，比如印度1857年發生的兵變，在紐科特也引起了反響，而這種情況在之前亞洲出現鉅變時並沒有發生。羅斯柴爾德銀行首次捲入到了大英帝國的商務活動中，而這個領域以前一直是留給其他人的。因此，一個有鼻子有眼的誇張說法是「整個寰宇都在向羅斯柴爾德家族納貢，其辦公室設在了中國，設在了印度，甚至設在了最不開化的國家」。這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與一直以歐洲為中心的佩雷爾家族最大的不同。

大量的白銀流向東方這種19世紀中葉世界經濟所具備的特點，幫助我們解釋了為什麼19世紀40年代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發現黃金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這些發現所產生的影響力無論怎麼評價都不過分。在1846年，世界黃金產量大約是140萬盎司，其中超過半數來自俄羅斯。到1855年，總產量提高到了640萬盎司，增加部分大約有一半來自北美，另一半來自澳大利亞。我們已經看到羅斯柴爾德家族是怎樣通過派遣本傑明·戴維森從墨西哥北上，使他們參與到加利福尼亞的黃金狂潮中的。他們對澳大利亞這個領域也同樣充滿了興趣。在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於1851年發現黃金後不久，羅斯柴爾德家族就被急迫地要求「將貴銀行的分號委派到這裡，在最開始的時候提供足夠的硬幣供應將會形成在兩半球最為廣泛和最為賺錢的業務的基礎」。這個建議並沒有被很好地採納：在上海和加爾各答的情況中，一開始想到的是完全可以依靠一家獨立的公司（比如墨爾本的代理行）來經營，儘管這一次公司由雅各布·蒙蒂菲奧裡和他的兒子萊斯利共同管理。然而，這種家族關係卻無法提供能力方面的保障。似乎是為了要證實梅耶·A·羅斯柴爾德對那些親家的蔑視所具有的一言九鼎的神聖性，蒙蒂菲奧裡公司在1855年破產，破產時欠下了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的鉅額債務，而一位徹頭徹尾的羅斯柴爾德代理人傑弗裡·庫蘭不得不趕到那兒去當救火隊員。

庫蘭家族自滑鐵盧時代就在為N·M·羅斯柴爾德公司工作，因此，庫蘭對老闆想要什麼非常瞭解：甚至在他結束蒙蒂菲奧裡的混亂狀態之前，他已經在急切地要求發運水銀和其他在殖民地需求很旺的商品（最好的是酒類，不管是啤酒、威士忌還是波爾多葡萄酒）。「如果您能發這些貨給我，」他這樣寫道，無意中模仿了內森作為一個年輕的紡織品貿易商時信件中的那種語氣，「您可以完全放心，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做這個生意，並以讓您滿意的方式去幹。」到9月份，他又提出要求「每一批貨給予5000～10000英鎊的賒賬」，而且，為了使他能夠親自去淘金場看看，提供「一個優秀金融家的幫助，因為在整個殖民地沒有人這麼做過，連那些政府的領導們都是這樣對他們的生意不管不顧，只有一次我受財政部的委派，去解釋一些雞毛蒜皮的貨幣事務」。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7）

如果庫蘭身處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新近的黃金和白銀帝國的外圍，那麼，它的中心就是這個家族在這段時間內購買的多處精煉廠和鑄幣廠。早在1827年，詹姆斯就在巴黎擁有了自己的精煉廠，在1838年搬遷到位於瓦勒米碼頭的新廠房，並根據米歇爾·本略特·坡塞特的指示，成立了一個合夥制企業。與此同時，詹姆斯又在1843年與巴黎鑄幣廠的老闆迪埃裡克斯合夥，這一關係一直維持到了1860年。新金礦的發現導致精煉和鑄造業務大幅增長。用詹姆斯的話說，這是「貨幣市場的一場革命」。因此，當列昂內爾在1849年決定倫敦公司直接參與到黃金精煉業務時，他完全是唯他叔叔馬首是瞻。

在內森的時代，倫敦有四傢俬人精煉廠——布朗與溫格羅武、約翰遜與斯托克、帕西瓦爾·諾頓·約翰遜和考克斯與梅勒，還有一家就是皇家鑄幣廠自己的精煉車間。在這些企業中，布朗與溫格羅武把持了英格蘭銀行精煉業務的絕大部分份額。然而，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極大地增加了進入銀行中的黃金規模：在1852年，黃金的購買量達到了頂峰時期的1530萬英鎊，其中超過2/3的部分以錠的形式——這遠遠超出了布朗與溫格羅武的處理能力。為了彌補這個差額，列昂內爾提議租用皇家鑄幣廠的精煉車間，該車間自1829年開始就在廠長馬體森的領導下採用了硫酸分離系統。從1849年9月，他告訴他的政治盟友J·阿伯爾·史密斯和約翰·羅素勳爵，「不厭其煩地」說「對鑄造的體系進行改革」是必要的。專門成立來監督這些活動的皇家委員會適時地採納了這項建議。「我希望」列昂內爾告訴他的兄弟說，「大臣們能有足夠的勇氣來進行變革，我們應該能夠得到這個結果——這應該是一項極好的生意。」正如納特所說：「隨著這麼多種規格（黃金）從加利福尼亞和墨西哥紛至沓來，這種變革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急迫。」

馬體森很有預見性地試圖抵制這場「私有化」，但沒有什麼效果；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他們很幸運，帕西瓦爾·諾頓·約翰遜沒有聽從他的新合夥人喬治·馬特的意見，沒按他的要求參與投標。因此，在1852年1月，安東尼獲得了精煉車間的租約，到了12月，列昂內爾可以名正言順地正式要求銀行總裁托馬斯·韓克（另一位政治盟友）允許「由我負責精煉和澆鑄的金錠和銀錠可以直接交給英格蘭銀行」。在頭一年的生產中，精煉廠加工了超過30萬盎司的澳大利亞黃

金和45萬盎司的加利福尼亞黃金。1862年，格萊德斯通這位最堅定的金銀本位主義者在「考察」英格蘭銀行後，直接去參觀了工廠。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於它發出了一個訊號。正如弗蘭德羅所描繪的，他們在渠道的兩端控制了精煉和鑄幣的產能，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操縱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套利「系統」，由倫敦公司用法國公司的戶頭購買美國或者澳大利亞的黃金，通過倫敦的貴金屬經紀人再轉到巴黎。巴黎公司在此期間為紐科特買進白銀，再通過倫敦或者南安普頓轉運到東方。這樣做不僅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到了19世紀50年代末期，它逐漸變成一個雙金屬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 公共財政與克里米亞戰爭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8）

數十年來，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認為歐洲大戰對他們的金融地位是最大威脅——其程度甚至超過了一場革命。在1854年3月，戰爭來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克里米亞戰爭居然是源於天主教與東正教教士之間關於一個耶路撒冷聖地所發生的爭執。其真實的背景情況是，這是對俄羅斯對沒落中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特別是多瑙河地區的公國像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以及黑海地區可以擁有多大權力這樣一個老問題的再現。這一次，與1840年時候的情況相反，法國和英國站在了一起，前者是為了瓦解神聖同盟，而後者除了想給沙皇點教訓外沒有其他原因，那些標榜自由的人覺得，由於沙皇在1849年鎮壓了匈牙利革命，他應該受到懲罰。5年前還作為中歐裁判者耀武揚威的沙皇，此時卻發現他被神聖同盟的其他成員所孤立了：奧地利正與西方勢力搞得火熱，根本不會參戰，普魯士則繼續奉行其休養生息的政策。皮埃蒙特區由於信奉這樣的理念，認為任何戰爭都會削弱奧地利對義大利的統治，而加入到了當時的普遍奉行的反俄陣營。

如果考慮到俄羅斯提出這個合併要求是多麼迅速，那麼這場戰爭就顯得異乎尋常的漫長。第一場真正的軍事行動發生在1853年夏天，當時沙皇命令部隊進入多瑙河的那些公國，而英國和法國的海軍靠近達達尼爾海峽。到10月份俄羅斯與土耳其發生正面衝突時，俄羅斯已經有效地放棄了他們曾經提出的作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中基督徒唯一保護人的要求；因此，法國和英國不得不越過這些公國和黑海地區進行作戰。但是到1854年6月，沙皇答應奧地利人他可以從這些公國撤

出，戰爭就只剩下在黑海地區進行。因此，為了對1841年的《海峽條約》「按歐洲勢力均衡的原則」進行修改，法國和英國的軍隊在克里米亞登陸，行動的直接目標是佔領塞瓦斯托波爾。早在1854年11月，俄羅斯政府就同意了這一點（還是擔心奧地利參戰），但因為法國和英國仍然無法決定這一條款的真實含義，戰爭就一直沒完沒了地拖著。在尼古拉一世於1855年3月去世後曾經希望找到一個談判基礎的嘗試再次不了了之。相反，俄羅斯魯莽地決定拒絕任何對他們在黑海的海軍軍事力量進行限制的舉動，這刺激了西方列強徹底結束戰爭的信心。塞瓦斯托波爾在9月8日被攻陷；法國提出了一些新的戰爭目標；最後在巴黎的國民大會上（1856年2～4月），危機終於畫上了句號。黑海獲得了中立；俄羅斯失去了比薩拉比亞（現代的摩爾多瓦）的大片地區，法國和英國同意保證保護土耳其以後的獨立。現實中，這些條款的效力可以保持到俄羅斯從戰敗中再次崛起——最後大約是持續了20年，這是沙皇行政體制缺陷的一次傷痕累累而且損失慘重的大暴露。勝利一方最值得誇耀的成就是通過合併多瑙河地區的公國創立了羅馬尼亞，這個目標實現於1859年——但有些目標是當初宣戰的時候並沒有想到的。

克里米亞戰爭真正的原因及其意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並沒有很大關係。為什麼是這樣呢？對於羅馬和希臘的教士之間關於基督教遺址的爭吵，耶路撒冷猶太醫院的建設者並不感興趣。他們在多瑙河公國也沒有鐵路利益。對於黑海的國際地位，羅斯柴爾德倫敦公司早已經做了明智的決定，不參與僅基於經濟原因的敖德薩糧食出口業務。在列強間發生的一場戰爭——其實是任何的戰爭——註定會對國際金融市場產生破壞性影響，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實際的後果，如表2-1所示。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9）

表2-1克里米亞戰爭的金融影響

最高價

日期

最低價

日期

變動率 (%)

英國3%公債

101 38

1852 12

85 75

1854 4-

15

法國4 5%長期公債

105 25

1853 2

89 75

1854 3-

15

奧地利5%金屬債券

84 62

1852 12

64 25

1854 12-

24

普魯士3 5%債券

94 5

1852 12

84 25

1854 12-

11

說明：英國和法國的資料為倫敦市場的周收盤價，奧地利和普魯士資料為法蘭克福市場年終價

資料來源：《投機家》海恩，《私人銀行與工業化》，第358～372頁

在那些外交觀察員的眼裡，羅斯柴爾德家族看上去很憂慮，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在聖彼得堡的通訊員向他們保證1853年6月戰爭就會平息，而且他們相信了。當英國外交大臣克拉倫登在9月27日——在英國政府給海軍上將鄧達斯下達通過海峽的命令洩露後不久——看到列昂內爾時，他對他說在金融城裡「他永遠也記不住這樣的一個日子」。1854年1月，當西方的海軍最終進入黑海，於布內發現詹姆斯「非常沮喪」，阿姆斯特洛也是同樣的神情。當俾斯麥聽到國於1854年2月從巴黎召回大使的訊息，他「在想我可以用這個訊息去嚇誰是最有效果的。我的目光落在了（阿姆斯特洛）羅斯柴爾德身上。當我把這份訊息給他看的時候，他的臉變得像粉筆一樣白。他的第一個反應是，‘要是我今天早上知道就好了’；第二個反應是，‘您明天能跟我做一筆小生意嗎？’我友好地拒絕了這個提議，謝過他後，就把他一個人留在了那種激動的情緒裡」。約翰·布賴特是倫敦「聲音最大」的反戰人士，他聽到列昂內爾在3月31日很消沉地評論：「一個負債高達8億英鎊的國家應該在捲入到另一場戰爭前更加認真地考慮。」

然而，克里米亞戰爭根本沒有削弱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地位，反而是產生了與擔心完全相反的影響，它再次很令人側目地確認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公共財政領域所具有的無人能及的地位。事實上，它表明這麼多年來，羅斯柴爾德家族過分誇大了戰爭對金融危險的影響。真實的情況是戰爭——特別是發生在1854～1871年間那種以短期戰爭為特點的戰爭——反而創造了金融機會，而且這些機會特別適合羅斯柴爾德這種獨特的跨國組織結構去利用。對於那些沒有直接參與戰事的大國，克里米亞戰爭也使他們的軍費開支大幅增加，超過了來自於稅收的財政收入水平（參見表2-2），因此，將所有相關的國家——包括一貫節儉的英國——逼到了債券市場上。儘管他們的對手，包括工業信貸銀行都竭盡了全力，但沒有誰可以挑戰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這個傳統的市場上無與倫比的地位。

老對手——巴林家族——很不幸地成為了失敗方的銀行，當然使得情況非常簡單明瞭。在1850年，俄羅斯政府給巴林授權一個550萬英鎊的新貸款，這份合同後來看起來就好像是設了一個陷阱。由於過度超買，以升水2%開盤，給喬舒亞·貝茨和托馬斯·巴林帶來了10 5萬英鎊的佣金。但是兩年後，由於外交關係惡化，巴林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完全沒有保障的位置，帕默斯頓在下議院抨擊他是沙皇的「代理人」，而且大家都相信（儘管是錯誤的）他參與了1854年俄羅斯的戰爭貸款。

表2-2公共支出的增長，1852～1855年（百萬元國家貨幣）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20）

奧地利（基爾德）

英國（英鎊）

法國（法郎）

俄羅斯（盧布）

1852

310

55

1513

280

1853

321

56

1548

313

1854

407

83

1988



384

1855

441

93

2309

526

增加百分比 (%)

42

69

53

88

資料來源：米切爾，《歐洲歷史統計資料》，第734f頁

這種情況幫助我們解釋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英國的戰時財政擁有幾乎壟斷地位的原因。當戰爭爆發的時候，作為財政部部長的格萊德斯通以高昂的鬥志，信誓旦旦地反對「通過貸款為戰爭籌措所需款項的體制」，理由是它「對民眾實施了全面的系統性欺騙」。英國仍然陷於拿破崙戰爭期間所產生的鉅額債務的重壓之下：正如列昂內爾曾經說過的，戰爭前夜的國家債務大約在7 82億英鎊左右，儘管與國民生產總值相比，債務負擔在穩步下降（從1820年的250%降到1845年的大約115%），但是當時的政治家們大多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格萊德斯通因此建議通過增加所得稅——從每鎊抽7~10 5便士，最後到14便士——以及一些消費稅來為戰爭籌款。然而，這還是不能滿足需要，到他離開這個職位（由喬治·路易斯替代）的時候，政府為1854年背上了620萬英鎊的赤字（通過銷售短期國庫券來彌補），此外，還面臨著次年將近四倍於此的頭寸短缺。路易斯又增加了另外550萬英鎊的新稅額，但1855年的赤字仍然高達2270萬英鎊。政府已經別無選擇，只得轉回到金融城（由於巴林身上的汙點，這裡的金融城就變成了專指紐科特）。

在1855年，羅斯柴爾德倫敦公司獲得了總價值1600萬英鎊貸款的全部。在次年的2月份——這個時候戰爭已經結束了——它又提交了另一份500萬英鎊貸款的報盤；到5月份，它簽下了500萬英鎊額度的最終貸款合同。在1855年的兩次貸款中，列昂內爾開始時報出的價格略少於財政部部長設定的最低控制線，但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政府的條件。很難講這次討價還價的意義有多麼意味深長：所達成的條款只比當時債券的市場收益略高一點點，因此，不會出現銀行賺取不正當利潤的質疑。列昂內爾能夠在賺取利潤的同時也做足愛國的姿態，增加他自己進入國會的籌碼。從另一方面說，1856年的貸款都出現了超額認購（2月份超出了6個百分點，而5月份超出了8個百分點）。帕默斯頓把這看成是金融城對政府充滿信心的表現，它同時還是說明財政部部長在分配勝利果實的時候過分慷慨的很好的證據。

在法國，羅斯柴爾德對公共財政影響力的恢復確實加快了戰爭爆發的步伐。1852年3月14日，拿破崙宣佈了一個鉅額的債券轉換行動，意圖是通過將全國債務主要部分的利息從5%調到4.5%來降低債務成本。投資人有20天的時間來選擇是接受4.5%的新利息，還是贖回5%利息債券的現金。這次安排由政府在大眾觀經濟層面進行調整，作為降低利率促進商業活動繁榮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由於出現了5%債券價格的突然暴跌（僅僅10天的時間，從103跌到了99），而且擔心會意外地出現大量的債券持有人可能會要求贖回他們的債券而不是轉換，新任財政部部長讓·巴蒂斯特·賈諾不得不向銀行家們求援。在隨後的支援行動中，霍廷格爾和德·羅斯柴爾德兄弟承擔了大頭，而佩雷爾家族則不見了蹤影。這些銀行大量買入5%債券，將價格推高到票面之上，而法蘭西銀行通過延長債券的貼現規定來支援他們的購買。這次操縱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絕大部分債券持有人都接受了新的債券。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21）

兩年後，當法國和英國向俄羅斯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它從多瑙河地區公國撤出軍隊的時候，詹姆斯很自然地期待著能被法國財政部再次召喚。1854年3月4日，他告訴阿爾伯特王子的兄弟歐內斯特二世：「對於與俄羅斯的這場戰爭，要多少錢都可以；他可以馬上就拿到‘他想要的那幾百萬’。」然而，此時工業信貸銀行參與到了備選名單裡，當政府在3天之後宣佈將借入25000萬法郎的時候，這兩人的廝

殺似乎已經無法避免。米勒隨即主張勸說賓諾和拿破崙通過讓公眾直接認購的方式來發售債券，或許他做到了。然而，當他宣稱這次發售加上後面1855年的5億法郎的戰爭貸款「讓法國政府從一種與誕生於###的王朝性質完全相左的獨裁中解放了出來」的時候，這話就誇張了。因為到1855年4月，還需要另外的75000萬法郎，新任的財政部部長皮爾·馬尼不得不向拿破崙報告，國內市場已經達到了飽和點。結果1855年貸款的主要份額在倫敦發行，而且拿破崙選擇轉到法國政府在那裡傳統上一直在使用的銀行裡。儘管工業信貸銀行佔了此次發行的大頭，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再一次領銜：在巴黎公司處理了6000萬法郎的同時，倫敦公司收到了總額為20850萬法郎的認購。

在協助法蘭西銀行處理戰後的貨幣危機——部分原因是政府在戰爭期間從銀行借出的短期借款——的組織構成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作用顯示出了詹姆斯所起到的支配地位。在寫於1856年4月的一封信中，詹姆斯在談到政權所面臨的困難時，實在難掩心中的興奮：「皇帝非常惱怒，因為他看到王子的誕生以及和平的到來並沒有對公共信貸產生好的影響，而且，也許應該說他是由於太想要錢了才被迫講和的。」事實上，貨幣市場的氣氛是如此緊張，如果此時詹姆斯因公務要去趟布魯塞爾，人們就會說他要把他所有的資本帶到那兒去。詹姆斯再一次狡黠地利用這個政權對他的依賴來嘲弄他們，而且這並不是最後一次。

羅斯柴爾德家族貸給款項的另一個交戰國是土耳其。這個領域也存在著競爭，這一點很好理解，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未與土耳其政權（除了希臘的賠款）建立起正式的金融關係。做第一筆1854年的土耳其戰爭貸款的是戈爾德施密特和Bischoffsheim，這是一次失敗的貸款。由於被傳說中的土耳其銅礦所吸引，而且有點像當初內森考慮西班牙時的情況一樣，詹姆斯決定接下來。對於霍拉茲·蘭道在克里米亞戰爭一觸即發之際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作為羅斯柴爾德的代理這件事來說，他們選擇了一位能幹的談判高手。當土耳其在1855年發現他們需要更多的資金時，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準備停當，而且已經恭候著了。

1855年2月，在戰爭的短暫休戰期間，蘭道很有技巧地開始編織他與蘇丹的大臣福阿德·帕夏以及西方外交家之間的關係，提出新的貸款

建議，這一次由法國和英國做擔保，而與此同時，預先向政府提供一些小額的無擔保貸款——這是經典的羅斯柴爾德戰術。到8月份，羅斯柴爾德倫敦公司通知蘭道，那500萬給土耳其的貸款已經由英國和法國的保函進行了擔保，因此，允許提供更多的慷慨大方的條件給對方，這些條件好過了人們的想象。不久，戰爭宣告結束，阿爾方索立即受命動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探討在那裡設立一家新銀行的可能性，然而又受到了來自於一家名不見經傳的英格蘭小銀行（這一次是拉雅茲）的競爭。不過，1857年經濟危機的爆發——同時又意識到土耳其金融所潛伏的危機比當初所預計的要大很多——導致了次年其從君士坦丁堡的撤退。儘管蘭道同意繼續提供一些小額的無擔保貸款，但這種「土耳其的國家銀行可能會變成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分行」的觀點（這是《時報》1857年時的說法）純粹是無稽之談。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22）

奧地利在克里米亞戰爭之中未發一槍。然而，由於與俄羅斯因多瑙河公國所造成的緊張氣氛，奧地利仍然必須做大量的備戰工作，而且由於其金融和貨幣體系在1848～1849年十分脆弱，造成的影響與其全面參戰對法國經濟的影響相當（就算是不大於的話）。如表2-1和2-2所示，奧地利債券事實上受戰爭影響所造成的破壞程度比法國要高；而奧地利出現的支出上漲只是一點點，儘管它執行的是不干涉的政策。這只是一場金融衰退悲劇的第一幕，它在很多方面為1857年後幾十年間降落到奧地利的各種災難埋下了隱患。過去和現在的軍費開支佔據了奧地利預算的大部分，以至於防務費用和償債花去了預算總額的60%～80%。儘管對改善經濟狀況做了很多嘗試，但現實的軍事危機使所有這一切都無疾而終。稅收水平抬高，國家資產變賣，但奧地利政府還是得靠借貸來維持它的開銷。當它從國家銀行借出短期貸款，貨幣——1848年與白銀脫鉤——又出現貶值：在1853年和1854年中，基爾德匯率從低於面值9%貶值到了低於面值36%。當政府從一個已經很脆弱的債券市場借入長期貸款時，其結果是擠出了私人投資。在1848～1856年間，奧地利政府總共欠下的公共債務從11億基爾德上漲到25億基爾德，年平均增長約8000億，但是存在異常的波峰，比如19世紀50年代中期的情況。長期的財政大出血和貨幣政策因此攪和在

一起，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導致了稅基的萎縮，使這種螺旋形下降的迴圈一直持續著。

有什麼辦法來彌補嗎？1851年11月，奧地利財政部部長克勞斯給詹姆斯寫了一封信，在信裡說了很多傷感的話，請求得到詹姆斯的忠告，要求他為現實的狀況提點建議。而在一封公開的信裡，阿波尼敦促詹姆斯「不僅僅是點撥一二，而是高擎火炬引領我們前進，盡你一切所能，讓我們擺脫這些貨幣廢紙所帶來的所有困擾」。詹姆斯和他的合夥人們盡了自己的努力。儘管羅斯柴爾德家族有足夠的理由在1848年後就關閉維也納公司，但他們不僅沒有這樣做，安瑟爾姆反而開始重建其父親過去所建立起來的一切，而根本沒有理會那種失敗的可能性。這是一項出力不討好的工作，由於安瑟爾姆的妻子堅決不願意到一個她不喜歡的城市居住，使得這個問題更加難辦。安瑟爾姆顯得十分孤獨，他在這個計劃最開始的時候，跟隨著他父親的腳步：前去探望已經返鄉的梅特涅，根據皇帝的喜好進行公共捐贈，甚至以一種遮遮掩掩的態度支援奧地利的對外政策。但是安瑟爾姆總是無法從他父親失敗的噩夢這一記憶中走出來，對他拯救奧地利金融的所有努力，人們不難想象，全都充滿著註定要失敗的悲壯。當安瑟爾姆在1853年12月拜訪梅特涅的時候，他臉色凝重：

安瑟爾姆說奧地利的金融狀況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機之中，除非我們走運，正好使用了避開它的正確方式……他宣稱他們曾經期待赫爾·鮑姆伽特納，繼克勞斯之後出任奧地利財政部部長能有一些高明的決策，但鮑姆伽特納對現實情況沒有正確的認識，並不勝任他的工作……這次談話被努恩希歐的來訪所打斷。安瑟爾姆起身告辭，當我送他到門口的時候，他對我說：「你記著我的話，我們處在危機的前夜；如果沒做什麼努力來改變它的話，新年到來之前我們將面臨危機！」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23）

然而，也有一些成功的事例使羅斯柴爾德在維也納的影響力得以維持，雖然這些影響以一種更為模糊的形式出現。在1852年，倫敦和法蘭克福銀行聯合為奧地利政府發行了價值350萬英鎊利率5%的債券。1854年4月，面臨著貨幣遭拋售的危險，奧地利政府再次找到了安

瑟爾姆，安瑟爾姆盡力說服了其他地區的銀行參與到提供另外的3400萬基爾德信貸的行動中，儘管其中幾乎半數來自於福爾德。

簡而言之，直接或間接因為克里米亞戰爭引起的債券發行大部分由羅斯柴爾德家族處理。表2-3（只給出了倫敦銀行的資料）提供了一個總體的情況。

表2-3 1850～1859年間由N?M?羅斯柴爾德公司發行的主要債券

年份

國家

發行面值（英鎊）

利息（%）

單價（基爾德）

1852

奧地利

3500000

5

90

1855

英國

16000000

3

100

法國

30000000

4 5或3

89 46或63 23

土耳其

5000800

4

102 62

1856

英國

8890000

3

90

英國

5400000

3

93

1859

奧地利

6000000

5

80

資料來源：艾耶爾，《金融世紀》，第42～49頁

在所有這些大國中，普魯士在克里米亞危機中所起的作用是最小的，因此我們看到英國代表團在巴黎大會期間要求將它排除在和平談判之外。然而，普魯士在此期間的開銷事實上也出現了非常劇烈的上升：它在1857年的總支出比10年之前增加了大約45%。儘管與奧地利相比，普魯士擁有更加強盛的收入源泉，但它還是需要借貸。在這裡，羅斯柴爾德家族也能夠建立起他們的金融影響力。早在1851年的時候，詹姆斯親自到柏林與普魯士財政部部長保德史威瀛就新發行4%面息的債券舉行過會談。

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柏林的關係在19世紀50年代早期因為由俾斯麥引發了關於日耳曼聯邦的長期存款（「貨幣堡壘」）與法蘭克福銀行的一場愚蠢的口舌，而遭到了某種程度的破壞。作為普魯士在聯邦裡

的代表，俾斯麥把儘可能搞亂他的奧地利同事圖恩伯爵的生活當成了自己的任務。圖恩建議聯邦應該向阿姆斯特洛借款26萬基爾德，以保障貨幣堡壘的安全，作為日漸沒落的海軍軍費，這給了阿姆斯特洛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所涉及的款項金額微乎其微，而真正的問題是重新建立的聯邦可以按照過去由奧地利主導的方式來執行。但還沒等到作為會議主持人的圖恩取得（在1851年1月）支取首期預付款的允許，俾斯麥就馬上宣佈普魯士認為這是違法使用聯邦資金（儘管事實上擬議中的資金並沒有真的從貨幣堡壘中提取）。讓阿姆斯特洛感到害怕的是他發現自己身不由己地深陷於來自奧地利和普魯士代表舌戰的焦點之中。

圖恩威脅要把聯邦的業務轉給另一家銀行，俾斯麥說他要將普魯士代表團的賬戶轉到貝斯曼。儘管阿姆斯特洛為取悅俾斯麥已經做了很大的努力，儘管通過俾斯麥的副手威澤爾發出了明確的不支付這筆錢的指示，阿姆斯特洛還是感到自己幾乎沒有迴旋的餘地，只能接受圖恩指示，因為是正式的指令。雙方在這場爭執中所爆發出來的濃濃的火藥味可以從圖恩1月12日給希瓦普伯格的信中看出來，在這封信裡，他譴責普魯士採取了向猶太人乞憐這種令人不齒的卑劣手段來對抗議會。

我覺得他們的行動已經使局勢非常危急，任何諒解和講和都不再可能。議會自然不能接受這樣的局面，如果羅斯柴爾德仍然不同意支付這筆錢，我不可能讓這件事再擺上24小時，就算戰爭成為無法避免的結果也在所不惜。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24）

「我承認，」圖恩在寫給俾斯麥的信中這樣說：「只要我活著一天，想到它我就會臉紅。當威澤爾給我看你們（發給羅斯柴爾德）的抗議信時，我為我們共同的祖國所遭受的恥辱而像孩子一樣號啕大哭。」俾斯麥的迴應同樣精彩：

如果真的如你所說，議會由於與猶太人的爭吵而被拖進了泥沼，那麼這根本不是我們的錯；有錯的是利用議會的業務通過指令與猶太人聯絡，而且是一種違憲的方式，將猶太人手裡的錢從他們本來已經確定好的用途上改變過來。



對於阿姆斯特洛，俾斯麥在他給普魯士首相馮·曼圖菲爾伯爵的報告中是這樣描述的：非常「希望取悅奧地利政府，無所不用其極……收到奧地利代表團的每筆匯款，他都會馬上通知普魯士駐議會代表團」：

在某個場合，圖恩伯爵確實告訴過我，在我接到對那個決定的正式通知前，羅斯柴爾德的銀行已經得到付款的指令。羅斯柴爾德銀行對我們這個抗議的所作所為，使我不再理睬住在這裡的羅斯柴爾德先生的任何邀請，總體上希望他了解他的做法使普魯士政府相當失望……我不得不這樣認為，現在迫切需要中斷普魯士駐議會代表團與羅斯柴爾德銀行迄今建立起來的關係，相關的業務應該轉到此地的其他銀行。

圖恩和俾斯麥事實上都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能力。圖恩因為草率地開除了一名供職於聯邦財政部的普魯士官員——他也反對向羅斯柴爾德借款的提議——而遭到了希瓦曾伯格的訓斥；而在柏林，保德史威瀛和海外貿易銀行的總裁都明確指出，貝特曼不可能替代羅斯柴爾德家族，後者不僅持有海外貿易銀行大量存款，而且還持有1850年普魯士貸款的巨大份額。

這些理由俾斯麥應該清楚，儘管他是如此喜歡刺激圖恩。俾斯麥總是能抓住政治中經濟利己主義的關鍵。在解決海軍爭端（大家同意把軍艦全賣了）的那幾個月裡，他完全改變了自己的腔調，此時他完全是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立場講話，反對由奧地利支援的法蘭克福天主教徒提出的一項抗議（他們反對1848年和1849年通過關於授予居住在該城市裡的猶太人完全的公民權利的法律）。當羅斯柴爾德法蘭克福銀行申請成為普魯士朝廷的「御用銀行」頭銜時——曼圖菲爾傾向於同意，因為「羅斯柴爾德會因此而在某種程度上從為改善維也納的貨幣局勢的熱情中轉變過來，而且會比較傾向於支援他們正在打算籌集的鐵路貸款」——俾斯麥表示支援，以他特有的冷嘲熱諷的口吻把關於海軍貸款的爭吵拋在了一邊：

羅斯柴爾德家族從來沒有犯過反對普魯士的錯誤，過去所發生的只是在我們與奧地利之間發生爭執時……他們對奧地利方面的擔心甚於對我們的擔心。現在，由於我們不可能期望羅斯柴爾德家族恰當地表現出像「堅強的人和正義的願望」這樣的勇氣，來抵禦像圖恩伯爵

在這種情況下所造成的「錯誤從眾」決定，而且，由於這個家族的其他成員已經對阿姆斯特洛的態度道了歉——他們說他是老糊塗了——我認為，考慮到這個金融巨人所能提供的服務，他們這次所犯下的錯誤可以被赦免。

事實上，不只如此，他建議授予梅耶·卡爾普魯士榮譽——三級紅鷹勳章——目的是想爭取羅斯柴爾德家族脫離奧地利。這引發了典型的中歐官僚辯論中的爛漫思維：如果這個榮譽授予的再晚一點，羅斯柴爾德所表現出的善意是否會更多一些？如果對勳章進行重新設計，以便能把傳統的十字圖案換成另外的圖案，是否會更適合於猶太人？所有這一切的底線是普魯士需要羅斯柴爾德家族：曼圖菲爾否決了保德史威瀛的意見，授予了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御用銀行的頭銜，這讓貝特曼很惱火，他仍然只是普魯士的領事。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 (25)

這個做法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梅耶·卡爾隨後馬上暗示俾斯麥：「如果他能有機會按3-5%的利率來安排他的錢的話，他將會感到萬分榮幸。」1854年春，當有跡象表明普魯士也可能會被拖入戰爭的時候，曼圖菲爾派他的顧問尼布赫去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就1500萬塔勒thaler，德國15~19世紀的銀幣。——譯者注的貸款進行了談判。這項交易未能達成，儘管雙方在海德堡（詹姆斯和納特也趕來與梅耶·卡爾一起跟尼布赫談判）進行了漫長的商談，6月又在漢諾威再次舉行了會談。保德史威瀛成功阻擊了把所有主要的普魯士貸款的利息通過羅斯柴爾德法蘭克福銀行支付的提議。然而，梅耶·卡爾在1856年再次捲土重來，放出了700萬塔勒的普魯士新貸款。更重要的是，俾斯麥認可了一種現實的態度來委託普魯士利息支付的想法：「我們當然可以認為銀行有自己的理由來提出這個建議，因為這個建議本身並不會在處理相關事務時把普魯士的利益放在腦後。它的利益與我們的利益一致的這個事實，並代表我們忽視了自己的利益。」這個申請最終在1860年獲得了批准，當時保德史威瀛已經離開他的職位。在其他方面，俾斯麥也維護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利益。當對梅耶·卡爾獲得紅鷹勳章——這是第三次而且為二級，但是用橢圓設計替換了通常的十字架——的程式進行了特殊處理時，俾斯麥馬上否決了對他過去曾擅自佩戴基督徒版的勳章的指責。1861年，詹姆斯也獲得了普魯士勳章。

到19世紀50年代末時，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確立了他們作為歐洲地區最卓越的政府貸款人的位置。英國、法國、土耳其、奧地利和普魯士都通過一家或者多家羅斯柴爾德銀行發行過債券。列在他們名單上的國家還遠不止這些。那段時期的其他重要客戶還包括比利時（儘管這裡的業務與過去相比，必須更多地與新的國家銀行分享），在這個領域，羅斯柴爾德家族很早前就有了考慮，希望通過資助教皇重返皇城而使羅馬的猶太人得到承認。然而，談判的艱難程度遠比當初所預計的要艱難得多，因為梵蒂岡竭盡全力反對為貸款設定的條件基於正式的，哪怕是對猶太人最低限度的解放，儘管教皇確實單獨向詹姆斯保證過，猶太隔離區政策將會取消。金融條款本身也很難達成一致。當卡爾準備在教皇返回羅馬前只支付1000萬法郎的時候，教皇想要的卻更多。甚至卡爾希望這筆貸款用教會的土地進行抵押擔保的要求也被拒絕了。

最後的條件——由詹姆斯自己處心積慮提出——出乎意料地慷慨，特別是在教皇有著破產記錄和地位仍然十分不穩定的情況下。總體來看，在教皇返回之前（1850年4月），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購買了利率為5%的面值5000萬法郎的債券，隨後又分兩期各購買了2800萬法郎。其他的貸款在1853年（以95的價格購買了2600萬法郎8%利率的債券）和1857年8月，當時的想法是把教皇的債務進行合併，並穩定羅馬的貨幣。新的5%利率的債券在巴黎市場上市，總值1420萬法郎——大約相當於教皇總債務（大約35000萬法郎）的40%。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教廷關係之間的矛盾之處是，只要聖座不改革它的金融體制，羅斯柴爾德家族就可以獲取鉅額的利潤；但是，如果它不改革金融體制，似乎也就不會改變對猶太人的態度。在選擇抵制梵蒂岡——因此失去他們對教皇對外借款的壟斷——還是接受在猶太問題上的失敗的兩難之間，羅斯柴爾德家族選擇了後者。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26）

羅斯柴爾德家族傳統的金融控制無法達到的地方，除了俄羅斯——它有很明顯的不被包括的理由——還有另外兩個例外。一個是西班牙，它在1856年通過米勒發行了貸款，儘管人們一直都無法確定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否有重新進入西班牙債券市場的打算，他們很早之前

就從這個曾經偏好水銀預付款的市場體系退出了。另一個更為重要的例外——儘管只算是部分例外——是皮埃蒙特-撒丁尼亞王國。

在1849年，詹姆斯曾經控制了對皮埃蒙特的鉅額貸款，所採用的手法讓野心勃勃的年輕金融家和政治家凱沃爾也甘拜下風。通過兩次將奧地利人趕出義大利的失敗的計劃，使自己國家的負債增加了三倍的皮埃蒙特，自然成了羅斯柴爾德金融滲透的目標。當詹姆斯在1850年回來與皮埃蒙特財政部部長康斯坦丁諾·尼格拉談判新的貸款時，凱沃爾只能以厭惡的心情乾瞪眼。對於凱沃爾對尼格拉「很可悲地」依賴詹姆斯的批評，我們應該謹慎地解讀：當時的情況是皮埃蒙特的信用水平是非常不理想的，因此並不是詹姆斯有意要打壓其債券的價格。從另一方面看，詹姆斯看待皮埃蒙特時，毫無疑問與農夫看待一頭瘦弱的奶牛是一樣的，他要把它催肥，然後才可能擠奶。關於1850年的貸款，詹姆斯在給他的侄子們的信中很高興地說道，那是「我迄今為止做得最漂亮的一樁生意」。除了2.5%的佣金，它本質上是一項未來的投資：對於新發行的總額為12000萬里拉的5%利率的債券，詹姆斯以85的價格買斷了2000萬，同時同意代表該政府在巴黎出售6000萬，餘下的留在尼格拉的手裡。事實上，詹姆斯很快就把頭2000萬中的一半多轉給了都靈當地的銀行家，剩下的打算留在手裡等待皮埃蒙特的信用水平的恢復，他對此非常有信心。

凱沃爾的機會很快就降臨了。1850年10月，他當上了農業、貿易與船務部部長，並在兩個月之後對已經形成了的羅斯柴爾德壟斷進行首次挑戰，當時他聽到風聲說要發行新的債券（去償還都靈中央銀行墊付的對奧地利的賠款）。凱沃爾很急迫地希望為新發的債在法蘭克福和維也納找到買主，催促他的朋友德·拉·路去找戈爾德施密特和辛納。「這會讓我很高興，」他宣稱，「與那個卡我們脖子的猶太人玩點手腕。」隨著凱沃爾在1851年4月被任命為財政部部長，他迎來了一個與羅斯柴爾德完全決裂的機會。當時凱沃爾所面臨的政府的金融狀況非常可怕：除了欠詹姆斯2500萬里拉——這些錢是詹姆斯給尼格拉「輸血的」各種短期預付款，他還面臨差不多2000萬里拉的赤字，以及總額6800萬的其他債務。在都靈貨幣市場籌得1800萬里拉來應急後，凱沃爾命令他在倫敦的領事尋找一家新的願意為皮埃蒙特籌措鉅額新債的銀行。「我們必須不惜代價，將我們從目前由羅斯柴爾德銀

行為我們設定的這種悲慘地位中解放出來。」凱沃爾堅稱，「在英格蘭達成貸款協議是我們可以重新贏回自由的唯一方式……如果我們不抓緊取得倫敦貸款的勝利，我們將會發現自己又將被逼迫著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鼠夾裡受氣。」為了協助大使的工作，凱沃爾派出了他的老對手瑞維爾伯爵。瑞維爾發現巴林對於做這件事太勉強，而比較新一點的漢布羅銀行願意做這筆生意，以85的價格發行360萬英鎊的皮埃蒙特債券。

##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 (27)

毫無懸念的是，詹姆斯一發現這種新的企圖，就竭盡全力來阻止新的貸款。凱沃爾很堅定地相信，詹姆斯是《時報》上一篇關於皮埃蒙特金融情況負面報道的幕後主使；詹姆斯毫不猶豫，竭盡所能地拋售皮埃蒙特債券。事實上，這正是那句十分殘酷（但對當時的人來說具有某種程度的破壞性）的話所說的情況，而且這句話在第二王朝時期一度成為了詹姆斯的標誌：「貸款已經開始，但是沒人認購。」詹姆斯離勝利已經不遠了：這批債券在巴黎出現了很高的折扣，凱沃爾一度十分焦慮。然而，結果情況超出了詹姆斯的控制，在市場上出現了很堅定的反彈，特別是在詹姆斯曾經負責推廣皮埃蒙特債券的那些初始市場。「我們可以做我們想做的任何事，」詹姆斯告訴他的侄子們，「但我們無法阻止皮埃蒙特債券上漲，因為是我們自己在85價位上發行的債券。」詹姆斯不會在經濟問題上如此不冷靜，不會在「整個世界」都在幫它上漲的時候繼續拋售。到1851年底，他自己所持有的皮埃蒙特債券變化不大，大約為100萬法郎。凱沃爾聲稱詹姆斯「已經大部分出手」，其實他錯了。

然而，凱沃爾從來也沒有想過「馬上打破與羅斯柴爾德的聯絡，而只是告訴他，沒有他也能做」。從這個意義上說，詹姆斯應該很佩服凱沃爾；在他很難得一見的對一個政治家的讚揚中，他說，這個人有「個性」。當阿爾方索在1852年受命到都靈報出願意以92的價格接下尼格拉留下的1850年債券（大約4000萬里拉）時，凱沃爾再次強調了這一點。一得到皮埃蒙特議會按照他不需要這筆錢的暗示做出的否決決定，他立即很客氣地請阿爾方索走路。但他滿心希望能在不遠的將來再次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合作，他所希望能達到的是提高他討價還價的實力。因此，當詹姆斯在1853年1月再次重新報出上年的報盤的時

候，凱沃爾——此時已經是首相——將這4000萬從開始的88的報價談到94 5。當凱沃爾考慮另一份新貸款的時候，他同時向漢布羅、巴黎的福爾德以及詹姆斯發出了詢盤。詹姆斯再次派出阿爾方索到都靈。對於凱沃爾來說，這場競爭是無價的：逐步升級的克里米亞危機造成了所有債券價格的大幅下挫，這當然也包括皮埃蒙特債券在內。漢布羅為新的3%債券報出的價格是不超過65；福爾德稍高；而阿爾方索決定重新贏回其父親最喜歡的客戶，報出了70加上2%佣金的價格。正如凱沃爾所說的，「福爾德的競爭價值幾百萬」，而詹姆斯後來抱怨他出現了「鉅額損失」。同時，在克里米亞危機的初始階段，凱沃爾需要詹姆斯幫助支付漢布羅貸款的利息，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皮埃蒙特參戰反對俄羅斯獲得英國政府補貼時，他才得以鬆了一口氣。

「為羅斯柴爾德說句公道話，」凱沃爾在1855年1月的一份非常精彩而又小心翼翼的評論中這樣說道，「我們必須說，他從來沒有對錢斤斤計較過。這是他比較好的一面。」凱沃爾要表明的是，政府通過對19世紀50年代競爭更為激烈的金融市場的多方比較，看到的更多是那比較好的一面。當詹姆斯在佩雷爾家族的一敗塗地中成為新的皮埃蒙特投資銀行的主要外國股東時，表明詹姆斯在都靈將再次受到歡迎。「佩雷爾簡直是暴跳如雷，」凱沃爾在1856年2月時寫道，「而羅斯柴爾德似乎是興高采烈。他說他之所以想搞個義大利信託，‘因為，您看，您不能沒有義大利。趕快，如果和平到來（在俄羅斯與西方列強之間），你必須有個平臺讓你馬上行動’。」他和凱沃爾同意，新的銀行應該是「義大利的大事，而不只是皮埃蒙特的事情」。詹姆斯以驚人的洞察力開始準備資助下一場歐洲戰爭——他預見到奧地利與皮埃蒙特之間的戰爭。這已經是第二次，他暗示凱沃爾在這樣的一場衝突中，他會得到他的支援。

##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因此，羅斯柴爾德仍然保持著值得信賴的猶太傳統；事實上，通過這些通婚，他們變得不再拒猶太人社群於千里之外。確實，曾經出現過宗教信仰方面不夠堅定的事情，而且還不只是在康斯坦絲的例子裡。阿爾方索和莉奧諾拉剛出生的兒子勒內由於割禮後發生（丹毒）感染而慘死的悲劇，使夏洛特的靈魂深處受到了強烈的震動。

## 第一章 猶太問題 (1)

(1874~1885年)

先生們，如果你們不支援我們，我們將不得不放逐你們.....如果你們支援我們，我們將讓你們比你們家族那位老成持重的創始人更加偉大，或者事實上成為他最引以為傲的子孫，這是他做夢都想不到的.....我們將會使你們變得高貴，因為我們將從你們的家族產生第一位選舉出來的王子。

——西奧多·黑澤爾，《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委員會的講話》，1895年

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更為廣泛的歐洲猶太人社群的關係，在進入到第四代的時候，總體來說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對於前面提到的貴族通婚，我們必須強調那是屬於特例事件。大多數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仍然還是與其他猶太人通婚。事實上，這一時期真正顯著的變化是，婚姻另外一方的那些猶太人不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在第三代，這樣的婚姻只有三例，其中的兩例事實上還是與女性一脈的表親。第一例真正的外面的猶太人加入到家族裡來的是義大利實業家拉爾蒙多·弗蘭凱蒂男爵，他在1858年娶了安瑟爾姆的女兒莎拉·路易絲；第二年，賽西莉·安斯帕希嫁給了古斯塔夫。貝蒂和她的兒媳婦阿德勒對賽西莉所懷有的憎惡，讓我們瞭解了一個這樣的外來者要贏得家族的承認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在1877年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與其他猶太社會精英的婚姻迅速成為了一種常見的事情。在1878年，威爾海姆·卡爾的女兒米娜嫁給了馬克斯·戈爾德施密特，她的姐妹是莫里斯·德·赫希的妻子。同族通婚仍然持續不斷的一個例子，是米娜的兒子阿爾伯特在1910年娶了埃德蒙的女兒米瑞婭姆——這個時候，他的父親已經啟用了馮·戈爾德施密特·羅斯柴爾德的名字，而且已經貴族化了。在這一時期與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了姻親關係的另一個家族是阿爾芳：在1905年，阿爾方索的兒子愛德華娶了吉曼·阿爾芳，而在1909年，埃德蒙的兒子莫里斯又娶了她的妹妹諾艾米。

這種王朝式的聯盟的最好例子出現在羅斯柴爾德家族與薩遜家族之間，這個家族在印度和遠東地區發家，其中的部分人在這一時期定



居到了英格蘭。1881年，在一個有威爾士王子出席的儀式上——這個活動受到了報紙的廣泛關注——里奧娶了瑪麗·佩盧賈，她是特瑞斯特商人阿奇爾·佩魯賈的女兒，而他的另一個女兒嫁給了阿瑟·薩遜。另一個與薩遜家族的聯絡出現在1887年，當時古斯塔夫的女兒艾琳嫁給了愛德華·薩遜爵士，他是阿爾伯特·薩遜的兒子和繼承人。然後在1907年，古斯塔夫的兒子羅伯特娶了奈麗·彼爾，新娘子的家族也是通過婚姻與薩遜家族搭上了關係。在這一代人中，所有其他人的婚姻都是與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富裕的猶太人之間發生的。這些標誌著19世紀中葉的排外婚姻徹底結束，並且把羅斯柴爾德家族——儘管仍然起著帶頭作用——更廣泛地融入到了與富裕的猶太人家族建立姑表親關係的體系內。

因此，羅斯柴爾德仍然保持著值得信賴的猶太傳統；事實上，通過這些通婚，他們變得不再拒猶太人社群於千里之外。確實，曾經出現過宗教信仰方面不夠堅定的事情，而且還不只是在康斯坦絲的例子裡。阿爾方索和莉奧諾拉剛出生的兒子勒內由於割禮後發生（丹毒）感染而慘死的悲劇，使夏洛特的靈魂深處受到了強烈的震動。她也吃驚於威爾海姆·卡爾及其家庭遵守飲食戒律的嚴格。「像他們那樣的吃法……」她評論道，「臉色慘白而虛弱，好像根本就什麼都沒有吃，比那些苦修的人還要糟糕。」當他們長期分離後在法蘭克福相遇時，納蒂認為他的叔叔威爾海姆·卡爾「看起來很像高加索人，就是化妝也達不到這樣的效果。他的步態和表情以及說話的方式完全是猶太人的方式，沒有任何他自己的特徵」。然而，納蒂自己對祖先宗教的忠誠也是不容置疑的。作為一名大學生，他非常反感帕雷的《基督的聖蹟》那門課，認為是「我所看到過的最晦澀的文字的堆砌，因此根本不存在很多人所預言的我會被改變的事情」。里奧也被迫花了很多的時間去上帕雷的課，但是他自己所描述的與他的叔叔安東尼和堂弟阿爾伯特在1869年參加維也納猶太聚會時所表現出來的熱情不會有假。當1877年在貝斯沃特的聖彼得堡區建立新的猶太會堂的時候，奠基的人就是里奧，這與他父親在7年前修建中央會堂時幾乎如出一轍。

## 第一章 猶太問題（2）

和他們之前的祖父與父親一樣，納蒂與他的兄弟們並不非常關注那些理論細節或者宗教儀式。例如，在1912年，有報告說納蒂「不認

為討論猶太浴室的形狀和大小是一個正統猶太人所必需的」。對於他們來說，宗教的意義在於猶太人社群的組織和功能；而作為羅斯柴爾德，他們認為自己應該清楚自己在英格蘭猶太人社群的世俗領袖地位。19世紀末期，他們在這個位置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納蒂從1879年起任聯合公會總裁至他1915年去世（儘管他很少過問那些日常的事務）。在1868～1941年間，理事會財政負責人一直就是由羅斯柴爾德擔任，從未間斷過：第一任是費迪南德（1868～1874年），然後是納蒂（至1879年），再就是里奧（至1917年），最後是列昂內爾。納蒂同時還是公會聯合會的名譽總裁、猶太人免費學校的總裁、英國猶太人協會的副總裁和貧民救濟會衛生與法務委員會理事。里奧繼任了免費學校的總裁，同時也是猶太窮人臨時庇護所的副總裁。羅斯柴爾德同時還影響著《猶太新聞報》，當時由埃希爾·邁爾斯所擁有（後來被猶太復國主義者利奧波德·格林伯格在1907年收購後，羅斯柴爾德的影響力就不復存在了）。在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修建了幾座新的猶太會堂，包括位於維克多大街的一座（1877年）以及其他由埃德蒙在1907～1913年間提供資助的三座。相比較而言，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較少與他們的猶太同胞交往。

可以肯定的是，羅斯柴爾德首要關注的並不僅侷限於一個單獨的社群，而不關注另外一個或者幾個具有相對獨特性的社群（除了聯合公會，這個組織裡也包括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猶太人、改良派，以及由東歐移民建立的數量不斷增長的東正教組織）。對於挑戰納蒂地位的情況，一個最經常被引用的例子是1887年成立的公會聯合會，這個組織由貴金屬商人兼政治家塞繆爾·蒙太古提出，目的是為那些東正教組織提供庇護。納蒂曾一度對他所見到的東倫敦的「精神匱乏」而憂慮，而且在聯合會成立的時候，他被選為總裁。但是在1888年12月，在聯合公會委員會上就是否接受聯合會進入倫敦宰牲理事會（監管屠宰的機構）的問題上產生對抗後，他被迫把這個職位讓給了蒙太古。看起來他所希望實現的似乎是把聯合公會的權利置於這些新成立的組織之上——因此，他原本在懷特契佩爾路上建立一個大猶太會堂的計劃就與建一個「猶太人湯恩比大廳」聯絡在了一起。

然而，對於這件事意義的重要性也不應該過分誇大。事實上，納蒂還保留了名譽總裁的頭銜，而且甚至還主持了聯合會1892年在新路

上的第一個猶太會堂的開幕儀式。確實，他對團結各個不同的猶太組織所報以的期望，在聯合公會中的所有理事中，最受蒙塔古的歡迎。在已經在位了很長時間的大拉比內森·馬卡斯·阿德勒於1890年去世之後，儘管遭到了阿德勒的兒子和繼任者赫爾曼的反對，納蒂終於還是召集了各個公會的代表大會，他的理由是「時機已經成熟，就算是社群中最底層的人們……當然也是最正統的教徒，應該邀請社群的其他分支來加入我們，並把我們所有人都團結起來。我不敢說團結到某一個領導人之下，但是應該團結到一個精神領袖之下」。然而，事實證明根本無法把這些正在竭力競爭對不同社群的影響力的各種勢力調和起來；1910年的一次類似的嘗試再一次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告失敗。不過納蒂還是有足夠的勢力確保對約瑟夫·赫爾曼·赫茲在1912年繼承阿德勒作為大拉比的任命能夠順利通過，這主要得益於（有這麼一種說法）米爾納勳爵的大力推薦，儘管更為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赫茲更能得到聯合會和聯合公會對於倫敦東區東正教和同化情況比較嚴重的倫敦西區的兩部分勢力的共同認可。

### 第一章 猶太問題（3）

如果納蒂的影響力在一個基本的宗教問題上都能有如此大的施展空間的話，那麼對於與猶太社群有關的那些更偏重於政治方面的問題，納蒂採用準君王的方式來處理就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了。作為所有猶太家族中最富有的家族的繼承人，一位在金融界響噹噹的人物，又是議會議員，而且後來又成為了貴族，而且還是一位可以直接見到當時最高層的政治家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對手。或許要讓不同的猶太人組織認同一個單獨的精神「領袖」不大可能，但是很少有人懷疑納蒂是他們事實上的世俗領袖。

要全面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有必要先全面認清影響深遠——而且令人震驚——的這一時期猶太人在歐洲的地位所引發的問題。當納蒂成為貴族的時候，阿爾方索的反應是意味深長的。「這個訊息將會在奧地利和德國引起極大的反響，」他寫道，「那些地方的反猶太人氣焰仍然相當囂張。」19世紀末期出現了很多變化，先前曾經不是連續的而且只是政治上的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現在逐步變成了一種看上去更有組織的政治運動。「反猶太主義」這個詞形成於這個時期並不是巧合：種族理論研究提出的假說對於猶太人反社會行為的解

釋，更多是基於他們的基因，而不是他們的宗教。由於隨著大眾教育的發展和公民權利的更加廣泛，政治生活變得更加民主，1877年以後的時間裡出現了大量的反猶太人書刊、演講和政策（在某些國家，比如俄國）。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從東歐和中歐西進的猶太人之間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任何相似之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屬於富裕的社會精英，而且已經跨越了那些存在於西歐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裡的社會障礙。然而，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羅斯柴爾德家族就一直是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政治攻擊目標，而且無法避免地一再成為「猶太人問題」的人格化代表。這是作為「猶太人之王」的不好的地方。

### 反猶太主義

20世紀中葉出現的事件經常會誘使我們誇大19世紀晚期出現的反猶太人浪潮的重要性。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記憶也總是把我們的注意力最先引向德國去尋找反猶太人主義的種種證據。當然，那些地方確實存在一些這種型別的問題（奧地利要比德國更嚴重，在那裡，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金融影響力日漸衰落）；英國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跡象，而俄國則是唯一從制度上歧視猶太人的大國。法國雖然是比所有地方都更能讓猶太人享有平等權利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出版反猶太人書刊最多的國家。

一個並非不重要的事實是，把反猶太人主義這個特別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詞介紹給德國政治家的威爾海爾姆·馬爾，年輕的時候曾經為威特姆斯坦家族工作過，而這個家族與維也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係非常密切。根據一份未公開的備忘錄的說法，馬爾回憶了他是怎樣在1841年被解僱的，儘管他在公司工作得比大多數猶太僱員更努力。他非常痛苦地說道：「應該承擔經濟危機後果的是猶太鬼。」這種看法似乎得到了很多在1873年經濟崩潰後面臨經濟困難的德國人的共鳴。由馬爾這樣的作家煽動起來的反羅斯柴爾德聲浪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法蘭克福猶太人與對人民福利的掠奪》，該書於1880年由「日耳曼尼克斯」出版，書名就很說明問題。作者從大家已經非常熟悉的選帝侯的財富故事斷章取義的版本入手，書中將德國在大繁榮時期及之後的經濟困難與深受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他們豢養的金融與傳媒界的走狗鼓勵的資本輸出（特別是輸出到俄國）聯絡在一起。在人們還沒有

來得及消化這些指控的時候，黑森-德意志帝國議會代表奧托·波克爾在1890年又提出了一項指控，他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用石油把世界市場逼上了絕路——這項指控5年後又在柏林被社會民主黨的刊物再次引用（說明這套說辭隨時都可以被左派隨意使用）。弗雷德里克·馮·謝爾布1893年的《羅斯柴爾德商號歷史》一書進一步把這個觀點進行了細化，說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巧取豪奪又有了一個新的目標：控制國家貸款，然後是鐵路建設，現在他們開始尋求建立全球原材料的壟斷。

## 第一章 猶太問題（4）

到1911年，當維爾納·桑巴特發表帶有很強烈的傾向性但很有影響的《猶太人與經濟生活》一書的時候，這樣的聲討得到了來自知識界的一定程度的認同。對於桑巴特來說，「羅斯柴爾德的名字」所代表的「遠遠大於使用這個名字的那些公司」；也就是說，意思是指「所有那些活躍在交易所裡的猶太人」：

因為只有在他們的幫助下，羅斯柴爾德家族才能夠取得這種超級權勢的地位——事實上，人們可以公正地說他們是債券市場上唯一的掌控人——這種地位我們已經看著他們擁有了半個世紀。過去有人說，一個財政部長如果疏遠了這家世界性的企業，而且拒絕跟它合作的話，那麼他就得考慮走人了，其實這種說法一點都不誇張……無論是從數量上考慮還是從質量上考慮，現代的交易所是羅斯柴爾德式的，而且因此也是猶太人式的。

但是也沒有必要就此把反猶太人主義的根源確立在這類偽社會學的基礎上，猶太人與日耳曼人的人種差異可以很容易地說明問題。馬克斯·鮑爾的小冊子《俾斯麥與羅斯柴爾德》（1891年）將俾斯麥這位日耳曼人的代表、擁有著農民美德的人與羅斯柴爾德這個俾斯麥的世界性對立面進行了對比：

他生存的原則不是建設性力量的穩定增長，而是大量被分割的資金急速而令人擔憂的聚集……但是（俾斯麥認為）就讓猶太人去滿足他們貪得無厭的快樂；一旦50億馬克完全付清，那麼就該輪到德國人用自己的方式讓自己高興了……俾斯麥的物質和精神的形式所有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實實在在……但是這個世界對於羅斯柴爾德的物

質看法是什麼樣的呢？他們從來都是隱形的，就像條蟲一樣永遠附在你的身體裡，但又無影無蹤。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銀行」是沒有結構的、像寄生蟲似的，形式上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的，從法蘭克福和巴黎再到倫敦，遍佈整個地球，就像一團纏在一起的電話線。它既沒有結構也沒有生命，是一種不在地球上生長的东西，一種不會朝向上帝的東西。俾斯麥的精神像一座歌德似的建築……這是在我們現在的政治文化中兩種完全相互敵對的力量：貪得無厭的猶太人，他們摧毀生命；親和的德國精神，它創造生命。

在奧地利也有類似的出版物，但是在那裡，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是主要的經濟力量，因此，與德國的情況不完全一樣，反猶太人主義更多的是以政治影響的方式出現。在1873年維也納股票市場崩潰後，卡爾·魯伊格策劃了「基督徒社會」運動，來反對猶太人的金融勢力。這次運動出現的一個轉折點是魯伊格在1884年呼籲對羅斯柴爾德擁有的凱薩·費迪南德·北方公司進行國有化，而當時政府正好提出重新延續1836年授予薩羅曼的特許權。魯伊格提出的要政府「傾聽一次人民的聲音，而不要只聽羅斯柴爾德家族一面之詞」的要求，得到了喬治·施尼勒領導的日耳曼人全國理事會的積極響應，而當阿爾伯特由於在奧地利—匈牙利貨幣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於1893年被授予鐵十字勳章時，更像是往他們的怒火上又澆了一盆油。然而，當魯伊格在1897年坐上了維也納市長的寶座時，他馬上發現想要拋開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多麼困難。到19世紀90年代末，保守派批評家像卡爾·克勞斯（他自己本來是猶太人出身）以及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勞動新聞報》，都譴責魯伊格「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交好」，甚至「與猶太人羅斯柴爾德攜手工作」。與此同時，通過採用傳統的哈斯堡方式，《猶太人雜誌》又批評羅斯柴爾德家族僱用反猶太人主義人士多於僱用猶太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勢力依舊，甚至在那些沒有把握政治之斧的人中也有足夠的影響力。例如，泰羅爾詩人、地質學教授阿道爾夫·皮奇勒在1882年的評論中，說起「羅斯柴爾德」怎樣使「奧地利政府債券的奧林匹亞山搖搖欲墜」。他嘲諷地補充道，這完全是「一次莊嚴的投機」。

## 第一章 猶太問題（5）

但是法國才是反猶太人主義最為明確而且最廣為氾濫的地區。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如潮水般湧現的反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出版物的那

種壯觀景象，恐怕在整個19世紀的歷史上很難再找出什麼可以與之類比，甚至1846年北方鐵路事故後出現的大規模的書籍大戰所導致的巨大傷害也無法與之比肩。這一次，導致災難的「事故」是有教會背景的大眾聯合銀行（Union Générale Bank）在1882年的倒閉。大眾聯合銀行剛宣佈清盤，它的創始人保羅·尤金·本圖克斯就開始指責「猶太金融」及其「狼狽為奸的政府同盟」。這篇指責性的文章由報紙進行了連載，《里昂觀察報》宣稱是「由來自德國的猶太銀行家集體主導的一次陰謀」，是一場「德國猶太人的陰謀」。

說起來也許有些矛盾，參考後來在德雷弗斯守衛者事件中的作用，沒有任何一名作家比小說家埃米爾·左拉更適合讓這種觀點流傳於世了。儘管身處第二帝國，他的小說《金錢》——他的鴻篇鉅著《盧貢·馬卡爾家族》系列的組成部分——很明顯受到了大眾聯合銀行倒閉的啟發（有部分情節暗指地產信貸銀行）。儘管主角甘德爾曼並不是以阿爾方索為原型，但毫無疑問的是，無論他以誰為原型，有很多方面均取材於阿爾方索已故的父親詹姆斯。這個直白復原的角色有一種怪誕的性格，他缺乏巴爾扎克筆下紐沁根救贖的仁慈（紐沁根是以詹姆斯為原型創作的又一個偉大的文學人物）。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找到的最好的解釋是左拉對詹姆斯的瞭解不如巴爾扎克；在他去世後10年，他的創作仍然在為其他人提供靈感，而事實上，《金錢》的有些段落摘自於費多。書中對早期的甘德爾曼是這樣介紹的：

銀行之王，交易所的主宰，也是世界的主宰……這個人知道所有的祕密，他可以隨心所欲讓這個市場上漲或是下跌，就像上帝那樣翻雲覆雨……黃金之王……甘德爾曼是真正的主宰，全能之王，整個巴黎、整個世界都敬畏他、服從他……人們已經看到甘德爾曼在巴黎的統治更加穩固，而且他的朝廷受到的尊重遠甚於皇帝。

他是一位冷峻、精於算計、整天陰沉著臉（一個編造的特徵）、生活嚴謹的工作狂。相反，薩卡德是一位衝動的一心想躋身金融界的年輕人，他像神職人員一樣虔誠，夢想著能夠接到巴爾幹地區和中東地區的金融大單，讓他賺到大錢後能夠把耶路撒冷買下來，並在那裡重建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為了取得甘德爾曼的支援，他滿懷希望地去甘德爾曼「恢弘的公館裡」去拜見他，而這座公館是他工作並與一大家子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跟他一起住在裡面的有5個女兒、4個兒子

和14個孫子。我們再一次進入了拉斐特大街上那王宮般的房子裡，在裡面一隊隊的經紀人依次走到冷漠的銀行工作人員面前，銀行人員對待他們的態度相當麻木，或者——如果他們膽敢來打攪——滿臉不耐煩；在某處，那些藝術品商人使出渾身解數，想把他的注意力從那些外國大使身上引開。在另外一個地方有一個五六歲的男孩突然闖入，騎著掃帚柄、吹著喇叭。這個古怪大堂在薩卡德的眼裡活脫脫就是一個甘德爾曼的「世界朝廷」。

薩卡德希望得到甘德爾曼的支援——事實上是渴望能像他一樣在交易所裡賺到錢。然而，由於他一直認為「猶太人」本應該是「誠實的人，靠自己的汗水生活」，因而他被「無法壓抑的仇恨」所擊倒：

### 第一章 猶太問題（6）

這個不再有自己的祖國，不再有自己的王子的民族，寄生在別人的國家，假裝服從當地的法律，但是事實上他們只服從自己那位偷盜、嗜血、仇恨，而且使每個角落都瀰漫著殘暴的征服和廝殺的上帝……（他）在那裡坐等掠奪，吸乾所有人的血，犧牲別人的生命養肥自己。

在薩卡德看來，猶太人在金融方面的能力天生就比基督徒優越，而且他預見到——甚至在他進入到甘德爾曼辦公室的時候——「猶太人將會征服全人類」。

當甘德爾曼沒有任何懸念地回絕了他的計劃的時候，薩卡德的憎惡變得非常強烈：「啊，骯髒的猶太人！一定會有人很高興地用牙啃噬你，就像狗啃骨頭，儘管這肯定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也非常難以下嚥。」「帝國已經被賣給了猶太人，骯髒的猶太人。」他狂喊道：

我們所有的錢註定要落入他們醜陋的手掌。在他們的魔力面前，世界銀行除了分崩離析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作為……他發洩著他那與生俱來的仇恨，反覆譴責那些商人和高利貸者。他們在整個世紀都在與其他民族作對，而且從他們的身上吮血……對整個世界的某種方式的征服，這一天註定要到來，他們將用所向披靡的金錢的力量達成……啊！那個甘德爾曼！一個徹頭徹尾的普魯士人……他不敢在某天晚上的沙龍上說，如果普魯士和法國之間爆發戰爭，那麼法國註定是失敗的！



最後，當然是甘德爾曼勝利了：世界銀行倒閉了，而薩卡德在監獄裡了此餘生，一覺醒來之後，給他留下的只是一顆破碎的心和一隻空空如也的荷包。

沒有人會責怪左拉沒有做足他的功課——不僅是沒有按照實際認真描寫詹姆斯的辦公室，而且對大眾聯合銀行的興衰說得也不準確——狂卷教會和貴族的存款、哄抬自己的股價，直至最終導致崩盤。但是左拉從文字上為下面的兩種說法增加了可信度：一是大眾聯合銀行是被羅斯柴爾德搞垮的，二是法國羅斯柴爾德是親德國的。這些說法在第三共和國的法國人中引起的共鳴是很表面化的。蓋伊·德·卡奈斯的《吸血男爵》是一本影響力與《金錢》一樣壞的書，它所傳遞的資訊也沒有太多的不同。書裡的人物若布·希穆爾與甘德爾曼一樣，也是一個德國籍猶太人，具備天生的金融操控天賦。他是一隻「掠食的大鳥」，大發戰爭橫財，然後搖身一變，成了拉孔尼茲男爵，並通過給那些身無分文的男爵夫人提供諮詢來換取他們的社會承認。這些老套的故事在本圖克斯於1888年發表了自己的自傳後流傳得更為廣泛。儘管本圖克斯沒有提羅斯柴爾德的名字，但是當他提到「猶太人銀行」時，幾乎所有人對他指的是誰心知肚明，他說這家銀行「不滿足於50年來已經流入它的金庫的幾十億元……不滿足於對至少9成的歐洲金融事務的壟斷」，因而謀劃著毀滅大眾聯合銀行。

然而，對法國反猶太人思潮做出最大的個人貢獻的，或許是另一位鬱郁不得志的人——愛德華·杜魯蒙特。愛德華·杜魯蒙特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地產信貸銀行工作，並且花了很多年研究並撰寫了大量冗雜的長篇大論，目的都在於全面完整地描寫猶太人對法國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統治地位。這本書在1886年首發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後來先後再版了200次，法國猶太人的稱謂成為了一個有種族意義的，而且具有反法籍猶太人特點的概念，並逐漸發展成為了一套偽思想體系。因此「羅斯柴爾德家族儘管腰纏萬貫，但看上去總像是賣二手衣服的舊貨商人。他們的妻子儘管掛滿了來自高爾康德的鑽石，但看上去總像是他們家裡清掃廁所的女工」。當話題轉到珠寶上的時候，甚至連非常老辣的男爵夫人貝蒂都無法掩飾她作為「法蘭克福猶太人」的本性。從有些方面看，杜魯蒙特只是在19世紀40年代那些小冊子的基礎上進行了補充（當時戴恩維勒是主要的煽動者），因此第一卷的主要內容

集中反映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過分的政治權力的觀點：對滑鐵盧戰役結果的投機、他們在北方鐵路特許權上獲取的鉅額利潤、他們對更具有公關精神的彼埃爾家族的仇恨。古德紹——一名猶太人——在1848年的時候把他們從破產的邊緣上拉了回來，而且在1871年的縱火案中，是在公社裡的猶太人保住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產。共和後的政治家們只是這個故事的延續：甘貝塔與猶太人和共濟會有染，萊昂·塞——「猶太王的忠臣」——起到了類似的作用，而喀尹這位最高委員會主席只是北方公司這部猶太人—共濟會巨型機器的一個很小的環節。甚至朱利斯·費瑞的衰落都可以歸咎於羅斯柴爾德的邪惡影響。最為嚴重的是，杜魯蒙特認為大眾聯合銀行事實上是一個精心策劃的猶太陷阱，它的目的就是為了掠奪那些牧師們的積蓄。

## 第一章 猶太問題（7）

杜魯蒙特後來發表的《一位反猶太分子的證言》（1894年）進一步發展了這些惡毒的觀點，部分原因是為了解釋這場反猶太人運動所產生的有限的政治成果。在這篇文章裡，他採用了一種更為偽經驗主義的風格，計算出他假定的羅斯柴爾德家族30億法郎的財富可以換算成多少標準銀子，需要多少人才搬動它，並且比較了羅斯柴爾德家族所擁有的土地的數量與基督徒所擁有的數量；認為如果布朗熱分子迴避了反猶太主義，我們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原因只是因為「羅斯柴爾德為他們的市政選舉提供了20萬法郎，要求的條件是候選人不得採取反猶太人的行動」，而且因為布朗熱分子領導人拉蓋爾個人得到了5萬法郎；如果法國經濟出現蕭條，原因只可能是因為「萊昂·塞……把法蘭西銀行拱手交給了德國猶太人」，允許羅斯柴爾德家族將它的黃金借給了英格蘭銀行；如果法國被國際社會孤立，只可能是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將埃及讓給了英國，並用法國的資金為義大利的軍備提供了資助。最後這項缺乏愛國情操的指控在幾年之後的《反對法國的猶太人》（1899年）一書中被再次提起。杜魯蒙特這樣總結道：「羅斯柴爾德神是法國真正的主人——既不是皇帝、不是沙皇、不是國王、不是蘇丹，也不是共和國總統……他沒有任何權力及優勢，他為了自己的私利，廢除了所有這些政府勢力，廢棄了法國的所有資源。」

杜魯蒙特只是當時那些把火直接引向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反猶太寫手中最為多產的一個。另一個類似的也是造謠中傷的寫手是奧古斯特·

希拉剋（AugusteChirac），他的《共和群王譜》（1883年）把那些老掉牙的陳腐故事，比如選帝侯的財富和滑鐵盧等與新的關於北方鐵路和羅斯柴爾德家族與1848年以及1870～1871年的幾次革命的關係攪和在一起；再一次在爭論中引入了

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維度——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僅是猶太人，同時還是德國人，因此他們急迫地想通過為1815年和1871年的戰爭賠款進行融資，進而搞垮法國。希拉剋後來的另一本書《1870～1884年間的投機》（1887年）是一本較為成熟的著作，它試圖通過大眾聯合銀行發生危機前後出現的債券價格波動的分析，來解釋羅斯柴爾德家族那一段時間的利潤情況，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大眾聯合銀行本身就不是一個理性的企業，但是他再一次妥協了，又採用肆無忌憚而且毫無根據的理由，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萊昂·塞進行了指責。雖然是膚淺的經驗主義之談，但這事實上是又一次誹謗，他聲稱這是「金融封建主義的勝利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而且是由「名叫羅斯柴爾德的國王與一位名叫猶太金融的妓女或者是女僕」聯手對共和國進行的控制。這本書裡所提出的主要指責內容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了英國的利益參與了破壞法國在埃及的影響力，作為他們通過經濟手段「絞殺法國」的歷史使命的一部分。表面上看起來毫不起眼的阿爾方索事實上是「摩羅克·巴爾，也就是所謂的黃金之神，他配合著對歐洲的征服——而且可能是世界的征服，躲在各種皇室的名字和政治外衣的後面，但是擁有真正的權力，一句話，就是他拿走了所有的利潤，又逃避了全部的責任」。

## 第一章 猶太問題（8）

可以想見，這樣的誹謗一定伴隨著大量充滿仇恨的漫畫，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林德雷的《上帝保護以色列》。在這幅漫畫裡，阿爾方索被描繪成一個虛弱的半睡半醒的巨人，他那爪子一樣的手裡抓著地球，而且在他的禿頭上戴著一頂金牛頭一樣的皇冠（見圖1-1）。

具有類似思想的是勒普納沃的《百萬富翁內森·梅耶》，這本書勾勒了一個滿臉鬍子、身體像狼一樣爬在滑鐵盧戰場上堆滿屍骨和硬幣的床上的羅斯柴爾德形象（見圖1-2）。更為粗俗的是另一幅卡通（可能出自政治左派之手），把「羅斯柴爾德」描繪成一頭巨大肥碩

的豬，放在一個車架上，由一群衣裳襤褸的工人用手拉著，並有一個標題——《多肥碩的一頭豬啊，他長肥了，而我們卻累瘦了》。

從根本上說，像杜魯蒙特和希拉剋這樣的陰謀理論家和作家非常關注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法國文化和社會的高度滲透。在《法國猶太人》的第二卷中，杜魯蒙特花了大量筆墨在費裡耶爾的酒莊和庭院上。他承認，它們的藝術水準和裝潢非同凡響，而讓人覺得可悲的就是如此眾多的作為法國文化遺產的瑰寶居然被猶太人所搜刮，而他們只會把它們當成「瓦礫一樣胡亂堆放」。羅斯柴爾德家族可以購買的也不只是法國的文化遺產。「這個酒莊沒有歷史，」他評述道，「不會讓人回憶過去那些偉大領主的生活方式。」然而，今天的參觀者指南上包括了「法國貴族最傑出人物名單」。一位名叫德·久因維爾的王子——「身上流淌著路易十四血液的男子」，在一名卑微的「放貸者」面前降下了身段。在羅斯柴爾德的婚禮上，貴族來賓的名單是完整的：「（所有古老的）法國貴族族徽都彙集到一起對金牛頂禮膜拜，並且在整個歐洲面前宣佈金錢是現在僅存的唯一王權。」同樣的一幕也發生在1885年由德·薩根公主舉辦的化裝舞會上，「這個可怕的貴族」恬不知恥地與蘭博特·羅斯柴爾德夫人、艾夫魯茜夫人以及其他「猶太人」摩肩接踵。這位內心深處是浪漫的正統主義者的杜魯蒙特認為波旁和奧爾良貴族是對他們高盧人種的背叛。這是他在自己的《證言》一書中重點論述的一個主題，他沮喪地注意到夏洛特購買了「一座由西蒙·德·蒙特福德建立的修道院」，愛德華被選進了皇傢俱樂部，很多如雷貫耳的名字出现在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花園聚會上。希拉剋也酸澀地評論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法博格·聖·吉爾曼精英之間的關係，他們曾經對詹姆斯和貝蒂非常蔑視，但是現在則作為平等的社會人接受了其後代。

在第三共和國時期，一個有關猶太人經歷的奇怪現象，是很高程度的社會同化現象恰巧與非常公開的反猶太主義的言論出現巧合。這不只是局外人比如像杜魯蒙特在皇戚貴族們放棄歧視時的吹毛求疵，大多數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有社會接觸的人通常也都贊同杜魯蒙特和希拉剋提出的觀點。在對待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態度上出現的那種幾近於精神分裂的特質，可以通過兩份在當時發表的重要的原始資料來說明：龔古爾兄弟的報刊和普勞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龔古爾兄弟

不僅同意杜魯蒙特的觀點，他們對他還非常瞭解。在他們1870～1896年這段時間的期刊上，充滿了關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猶太」特質的別有用心的奇聞逸事——他們的享樂主義、他們的庸俗，諸如此類。然而龔古爾兄弟自己也非常樂意接受羅斯柴爾德的盛情招待：1874年和1887年與埃德蒙討論法國雕刻，1885年與奈特的###吃飯，1888年與莉奧諾拉吃飯，1889年與埃德蒙吃飯。這段時期的另一個特點是，在他們對羅斯柴爾德的飯菜大加讚賞的那一年之後，龔古爾兄弟以讚許的態度引用杜魯蒙特相關觀點的情況開始大為減少。在1887年3月與杜魯蒙特進餐，很高興地聽他把「羅斯柴爾德推到牆上」去的高談闊論後，又在那年的12月與埃德蒙討論雕刻；在1889年6月與埃德蒙進過餐後，又在1890年3月與杜魯蒙特交流反猶太人過程中出現的奇聞逸事，而這距他在5月1日放棄呼籲軍隊介入反猶太運動僅隔一個月。

### 第一章 猶太問題 (9)

在巴黎的沙龍中，猶太人和反猶太人分子通常都混在一起，但是1894年，當一位供職於法國總參謀部的名叫艾爾弗雷德·德瑞夫斯的猶太軍官被指控為德國間諜後，這些沙龍出現了急劇的兩極分化，而他因為偽造檔案在軍事法庭上被控有罪，並被判處在魔鬼島上終身監禁。阿爾方索對於對德瑞夫斯指控的反應一開始覺得非常震驚，擔心一旦德瑞夫斯被判有罪，會對反猶太人情緒火上澆油；之後他變得非常憤怒，因為所有的證據都表明德瑞夫斯是被陷害的。按照一位辦事員的筆記看，阿爾方索「由於對德瑞夫斯的誣告以及法國貴族的麻木不仁而感到非常憤怒」。然而，家族裡的其他成員都不太願意被公開當成是「德瑞夫斯分子」，因而更願意把這種分歧控制在他們自己的上層社會圈子裡。

普勞斯特為這種氛圍增加了談資，德瑞夫斯的同情者所表達出來的同情被德·傑爾曼特斯公爵夫人周圍那個非主流圈子裡的成員有意識地掩蓋了起來。對於普羅克這樣一位出生相對低微的猶太人來說，羅斯柴爾德的名字足以讓他肅然起敬。當他意識到他曾經在公爵夫人那裡照顧過的那位英國老婦人是「阿爾方索·德·羅斯柴爾德男爵夫人」時，他簡直驚呆了：

那一刻，普羅克的血管裡忽然流淌出太多關於財富和威望的想法……他的感覺就像遭到了猛烈的一擊，腦子裡頓時一片空白，他不

知不覺地在這位慈祥的老太太面前叫出聲來：「要是我早知道是這樣！」——這樣愚蠢的失聲讓他連續8個晚上都睡不著覺。

相反，德·傑爾曼特斯王子甚至一眼都不願看到羅斯柴爾德——事實上，他寧願讓自己的酒莊被大火燒掉半邊，也不會向緊鄰的羅斯柴爾德家借水泵。實際的情況是他試圖掩蓋自己德瑞夫斯分子傾向的祕密；而他之所以要把這些掩蓋起來，是因為如果被當成德瑞夫斯分子，他要付出不小的社會代價。德·傑爾曼特斯公爵就付出了這種代價，當他參與賽馬俱樂部的總裁競選時遭遇了失敗，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是德瑞夫斯分子……接待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而且……有時候……會表示對那些有一半德國血統的國際大資本家的支援，而德·傑爾曼特斯公爵本身就是這樣的資本家的一個代表」。這讓公爵感到很無奈：

阿爾方索·羅斯柴爾德這些人儘管從來不談這件令人討厭的事情，但從他們內心深處來看，與所有的猶太人一樣都是德瑞夫斯分子……如果一個法國人去偷盜或者謀殺，我不會僅僅因為他是法國人，就覺得有義務去為他洗脫罪名。但是猶太人從來不承認他們的一位同胞是一名賣國賊，儘管他們對此其實心知肚明，但他們對這種可怕的後果漠不關心（公爵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這次可惡的選舉）。

德瑞夫斯事件也暴露了政治左派的類似態度。當一位名叫伯納德·拉扎雷的猶太記者出版了一本支援德瑞夫斯的小冊子時，他立即遭到了亞歷山大·澤夫斯在《共和先鋒》上的反擊，說他是「羅斯柴爾德陛下的一名忠實的仰慕者」。

這樣的情況在英國也存在。1900年6月，戴維·林德賽在他的日記裡記錄了他參加「由艾爾弗雷德·羅斯柴爾德和羅斯伯裡共同為迎接威爾士王子而在赫特福德莊園舉行的盛大聚會」。林德賽宣稱：

### 第一章 猶太問題（10）

在這座宮殿裡的猶太人，數量多得令人難以置信。我曾經認真研究過反猶太人的問題，一直希望制止那種不光彩的運動：但是當遭遇一大堆的伊科海默爾、帕鵬伯格、拉斐爾、薩遜以及這個民族中的其他人的時候，我的感情變得更加理智而且感覺不公，同時我覺得，順便提一句，我對魯格爾和杜魯蒙特——約翰·伯恩斯（工人領袖及未來

的自由黨內閣部長）所說的猶太人就是附在我們文明中的條蟲這樣的說法深表同情。

然而，林德賽繼續接受去瓦德斯頓和特靈的邀請。金融界的非猶太銀行家偶爾也會發出類似的感慨，儘管他們沒有辦法不與猶太人進行交易。在維多利亞晚期的小說裡，有大量有關猶太金融惡棍的生動描寫：特羅魯普的小說《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裡粗俗的梅爾摩特不是以羅斯柴爾德為原型寫的，但是格拉姆塔爾男爵肯定是不會錯的——「偉大的法蘭克福百萬富翁」略帶「一點點外國口音」；在查爾斯·勒維爾的《達文坡特·鄧恩》裡面的那家在政治上無所不能的「公司」也確定無疑。

英國和法國在反猶太人主義上的差異在於，英國似乎更多地給左派提供了政治上的發洩空間，而給右派的相對較少。當杜魯蒙特還是一個屢遭挫折的正統宗教衛道士的時候，那些明確抨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英國作家大多是像約翰·伯因斯那樣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似的新自由主義者。對這部分內容做了最好說明的是約翰·裡夫斯的書《羅斯柴爾德家族：世界的金融統治者》（1887年），該書給出了一個典型的結論：「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屬於哪一個固定的國家，他們是世界的……他們不屬於哪一個黨派，他們時刻準備著獲取財富，不管是以朋友還是以敵人為代價。」4年之後，《工人領袖》宣稱：

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一群吸血的人，他們是在這個世紀以來歐洲所發生的數不勝數的麻煩和災難的根本原因，而且主要是通過在那些從無過節的國家之間挑動戰爭來為自己積累大量的財富。無論在歐洲的什麼地方出現麻煩，那裡馬上就會有戰爭的謠言四處流傳，人們的心理就會因為對劇變和災難的擔心而發狂，這個時候，你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長著鷹鉤鼻的羅斯柴爾德就會在離騷亂不遠的某個地方操縱他的把戲。

或許，這些事情中最吸引人的例子是偏左派的自由黨人J·A·霍布森，他是經典著作《帝國主義：一項研究》（1902年）的作者。像那個時期很多的激進作家一樣，霍布森認為波爾戰爭是由「一小撮國際金融炒家所引發，他們主要是德國籍的猶太人」，他們「隨時都對全球的熱點虎視眈眈……他們的收益不是來自於真實的產業成果，甚至也不是來自於其他的產業，而是來自於對相關公司的創立、推廣和金

融操縱。而且毫無疑問的是，他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是這一小撮人的核心」。確實，在後來的日子裡，霍布森的立場脫離了這種在論戰中支援更為正統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反猶太人主義陣線。但是，他這種巧言令色的風格成為了愛德華式的激進主義政治語言。我們將會看到，是羅伊德·喬治這位最激進好戰的財政部長在為他1909年預算的辯論中，把納蒂作為目標進行了一場人身攻擊，儘管喬治本人在瑪爾科尼事件中由於捲入了猶太金融家（伊薩克斯兄弟）的旋渦而遭到了右派的譴責。

## 第一章 猶太問題（11）

在美洲也存在反羅斯柴爾德主義的現象。自從19世紀30年代以來，羅斯柴爾德家族儘管在美國的經濟影響力有限，但一直是政治上的攻擊目標。不過與他們在19世紀90年代人民黨全盛時期所受到的攻擊比起來，他們在內戰時期的遭遇簡直就不值一提。人民黨人從根本上反對美國進入金本位體系，以19世紀80年代的低谷物價格為藉口煽動中西部地區農民的不滿情緒。然而，他們對「歐洲和美洲的黃金賭徒」以及「國際黃金圈」的批評，不僅有很強烈的反猶太色彩，同時也有反英國的成分，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銀行在協助美國向金本位轉型的貸款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戈登·克拉克的著作《夏洛克：銀行家、債券持有人、賄賂者、陰謀家》聲稱，在林肯和約翰遜時期的財政部長休·麥卡洛克和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之間達成了一個交易：「在羅斯柴爾德和美國財政部之間的這項交易中最可怕的部分，不是金錢的損失（儘管金額高達數億），而是這個國家把自己的命運交付在英國手上，而英國其實早就已經被英國的猶太人所掌控。」在《科因的金融學校》（1894年）一書中，哈維所描繪的世界被一條巨大的「英國章魚」所纏繞，章魚上面所寫的名字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見圖1-3）。在同一作者的小說《兩個國家的故事》中，英國人策劃的通過停止白銀的貨幣流通功能來「摧毀美國」的主謀，是一位名叫「羅斯男爵」的銀行家。當人民黨的運動被民主黨所接受的時候，這些指控成為了一堆燙手的山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廉姆·詹寧斯·布萊恩不得不對猶太民主黨人解釋說，在攻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時候，他和人民黨領導人並沒有攻擊一個民



族，「我們要攻擊的是那些貪得無厭的人，而與他的民族和信仰無關」。

圖1 3「科因」?哈維，《英國章魚：它只吃黃金！》（1894年）

資料來源：哈維，《科因的金融學院》，第215頁

有人可能會問，這種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攻擊到底能有多大的傷害，因為他們在那富麗堂皇的宮殿裡其實毫髮無傷。不過，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一個猶太資本主義體系的締造者身份展開的陰謀，無可避免地激發了直接針對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的暴力行動。其中程度最輕的，要算是對納蒂的兒子沃爾特的野蠻攻擊，他在特靈附近打獵的時候被幾個失業的工匠從馬上拽了下來，而這種類似的「獵猶行動」，他的兄弟查爾斯隨後也親歷了一回。嚴重一些的是當時的兩次暗殺未遂事件。在1895年8月，一個郵件炸彈被送到了阿爾方索在弗羅倫廷大街的寓所裡；由於他不在家，又被轉到拉斐特大街，並在那裡發生了爆炸，把他的辦公室主任炸成了重傷。《時報》這樣評論道：

「對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的一次無政府主義的暴行並沒有引起人們太大的驚訝。在法國與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樣，他們是如此富有，地位又是如此顯赫，因而很自然地會成為無政府主義者選擇的襲擊目標，而且當我們更加深入地考慮到在法國蔓延的那種強烈的反猶太人情緒時，我們感到驚奇的應該是他們怎麼居然能倖免了這麼長時間。」暗殺的威脅不僅存在於法國。1912年在倫敦，一個名叫威廉姆?特彼特的男子在里奧驅車離開紐科特的時候，用左輪手槍朝他連開了5槍，在他的車子上打了很多洞，並致使一名正在門口執勤的警察重傷。特彼特好像患有精神疾病（里奧顯然對他也是手下留情了），不過這次事件也暴露了這個家族當時面對這種襲擊時的無助與脆弱，因為新出現的手槍和手雷使暗殺變得比以前簡單很多。

## 第一章 猶太問題（12）

### 家族的迴應

因為他們獨特的社會地位——處於猶太人社群的相對頂層，而且與歐洲貴族的聯絡越來越緊密——羅斯柴爾德家族有時在譴責反猶太主義的時候並不只是譴責那些反猶太人的人，同時也譴責其他的猶太人。1875年，梅耶?卡爾告訴俾斯麥：「至於說反猶太人主義的思潮，

猶太人自己也應該負有責任，對於現在這種混亂局面，完全歸咎於他們的傲慢、虛榮和難以言說的無理。」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這似乎是很讓人吃驚的說法，它表達了一種對更為廣泛意義上的猶太人社群的不忠誠，而這種情況初看起來似乎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猶太社群的世俗領袖的目標有著不小的衝突。而那名試圖暗殺里奧的人（用納蒂的話說）是「信仰跟我們一樣的人」的這個事實，是非常關鍵的：在這個時期，猶太人內部之間的關係也非常緊張。

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給予了很大關注的兩大集團是「新富階層」（那些在羅斯柴爾德家族之後新富起來的猶太人銀行家和商人）以及——可能更為重要的——「東方猶太人」（人數更為眾多的東歐猶太人（主要但不完全是來自於俄國），其中的250萬人是在1881年刺殺亞歷山大二世所引發的屠猶運動以及次年頒佈新的歧視法律後西遷的。按照過去的標準，格爾森·佈雷希羅德被認為特別討厭，儘管我們有理由認為梅耶·卡爾對佈雷希羅德的不滿起碼有部分根源是由於他們在業務上不和。

在1880年11月轉發的一封有關德國反猶太人主義的來自佈雷希羅德的信函的時候，納蒂告訴迪斯雷利：

毫無疑問，佈雷希羅德本身就是引發猶太人迫害的原因之一，他那麼頻繁地為德國政府效力，以至於變得那麼不知天高地厚，忘了自己其實只是「一顆被用來探路的石子」。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那些處於飢餓狀態的波蘭籍俄國和羅馬尼亞猶太人的湧入。

猶太人同時還擁有半數的報紙，特別是那些反俄國立場的報紙……我還聽說馮·佈雷希羅德夫人也相當令人討厭，而且表現得很傲慢。

按照這些評論的意思，這些新的窮人在引發麻煩方面與那些「新貴」不分伯仲。

羅斯柴爾德對反猶太人主義的迴應不只是（像杜魯蒙特所指責的那樣）要求警方提高戒備水平，並對他們的各處宅院設防，儘管發生了上面所說的暗殺企圖之後，他們這樣的做法也無可厚非。對於怎樣

才是轉移或者減少反猶太人情緒的最佳辦法，家族內部長期以來一直存在一種觀點。

早在梅耶·卡爾在世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就已經開始了慈善捐款，不僅是捐給他們所屬的猶太人社群，還捐給非猶太人的「善心組織」，作為贏得社會承認的一種有意識的安排。有些證據表明，第三代的有些成員在他們生命中的最後幾十年間有忽略這種傳統的傾向。然而，年青一代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有意識地開始恢復這種做法，儘管在英國對公共服務和金融捐助並重；而且在所有的情況下，在傳統的關注健康和教育之外，出現了新的為窮人提供住房的計劃。

我們已經看到了費迪南德是怎樣在他的妻子伊夫琳娜去世後以她的名義建立了一所醫院。他的小舅子納蒂也是身兼至少3家醫院的總裁，愛德華國王七世醫療基金的財務部長和英國紅十字會委員會的主席，同時還管理著在他的特靈土地上的，被他稱為「兩級健康服務」的計劃。在法蘭克福，梅耶·卡爾和路易絲在他們的長女科勒門汀去世後建立了科勒門汀共濟女童醫院，同時也為城裡的公共浴室捐款。最終，他們未出嫁的女兒漢娜·路易絲管理了大量的公共基金，包括梅耶·卡爾·馮·羅斯柴爾德卡羅琳娜姆公共基金，一家專門的護牙醫療基金。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在這些領域做了大量的慈善捐贈：建造了一所綜合醫院、一座孤兒院、一所盲人學校以及一所聾啞人學校。內森尼爾留下了鉅額的財富，在都柏林和羅森胡格爾為神經衰弱的病患者建立了療養院，而且他在雷城瑙的宅院變身成為了一家醫院。而在法國，阿道夫在一名日內瓦的外科醫生成功地從一名患者的眼部取出了一塊被射進去的金屬片後，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眼科醫院，而與此同時，亨利在馬卡德特大街199號建立了一家診所。教育也是捐助的重點之一（與在法蘭克福為博愛所做的沒有什麼兩樣）。除了卡羅琳娜姆基金外，漢娜·路易絲還建立了卡爾·馮·羅斯柴爾德公共圖書館（這家圖書館後來佔據了位於烏汶特門凱的羅斯柴爾德宅院）以及以宣傳藝術為目的的安瑟爾姆·薩羅曼·馮·羅斯柴爾德基金。她的姐妹漢娜·馬蒂爾德也是建立於1910年的新法蘭克福大學的主要捐贈人。

## 第一章 猶太問題（13）

另外，當時的另一個特點是，提供廉價住房變成了羅斯柴爾德博愛的另一個目標。在19世紀後期，出現了城市化程序提速的情況，其中整個歐洲大陸幾百萬人離開鄉村湧入城市找工作。倫敦、巴黎、維也納和法蘭克福都面臨這樣的困境，雖然程度略有差異。儘管私人在住房上面的投資很大，但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無法不注意到那些遍佈歐洲「東區」的「貧民窟」的那種駭人的條件：房主人們都有把儘可能多的人塞進自己房子裡的想法，但是幾乎沒有人會想到為他們提供良好的衛生條件（這最起碼需要找到讓建築商和地產擁有人共同行動的方法）。羅斯柴爾德對此做出的一個反應，是通過他們自己作為地主的模範作用來建立一個樣板。納蒂、里奧和費迪南德也有意把他們在白金漢郡的地產變成現代家庭式社群的樣板，為住戶們提供改善後的居所、自來水、會所以及其他設施。但是這些私人福利方面的試驗（與同時期那些很大的德國工業康采恩所採用的方法比較類似）在那些羅斯柴爾德家族沒有土地的貧民區沒有真正的可推廣性。

解決城市問題的第一步由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在1874年邁出，當時成立了一家名為租房基金（後來的羅斯柴爾德救濟基金）的機構，每年撥出10萬法郎給巴黎各區的區長，用以幫助那些無力支付房租的貧困家庭。30年後，另一個更大的「致力於改善工人物質生存條件」的基金以1000萬法郎的資本在第11區、第12區和第19區建設工薪階層能夠支付得起的居住區。這樣的做法事實上是效法英國羅斯柴爾德的4%工業居住公司的模式，這個模式建立於19世紀80年代。

所有這一切都應該放到家族在猶太社群內以贊助人身份出現的開始做慈善事業的大背景下來看，儘管其間存在的差異並不總是很容易區分，這一點我們會在後面看到。在歐洲大陸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仍在繼續建立專門的猶太慈善機構。例如1870年，詹姆斯·愛德華建立了伯克海濱醫院，主要治療骨科疾病。與此同時，埃德蒙重新改造了位於皮克帕斯大街的老猶太醫院；除此之外，他和古斯塔夫各建立了一所新的猶太學校。在奧地利，安瑟爾姆於1870年在沃爾琳建立了一所猶太人醫院。在法蘭克福，不屈不撓的慈善家漢娜·馬蒂爾德建立了一座猶太兒童之家，為患病的外國猶太人服務的喬金·薩拉·馮·羅斯柴爾德基金會，為猶太婦女服務的老年人之家（位於在熱爾地區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宅），在巴德·諾海姆的猶太婦女之家，同時還有一座為猶

太窮人服務的位於巴德索登的療養院，這是她在科尼格斯坦的夏宮附近的一個水療城。在倫敦，猶太免費學校依然是最受關注的機構，猶太學院也是（只是受關注的程度稍低）。

然而，東歐猶太人的湧入帶來了新的問題，而對於這些問題，那些老機構顯得束手無策。不像大多數的非國教教徒，英國猶太人對於對非宗教教育的政府支援的覆蓋沒有太急迫的要求，原因是他們可以保持自己對宗教教育的公共控制。與此同時，納蒂以及他的親屬抓住了對課外組織的需求。舉個例子說，納蒂的妻子艾瑪為布雷迪街道青少年活動中心提供了年度經費的60%，而這個組織於1896年在懷特契佩爾建立，目的是讓那些年輕的猶太男孩子不要去幹壞事。她的兒子沃爾特為建立於1901年的海耶斯工讀學校捐了5000英鎊，該校是為年輕的猶太罪犯所建，這筆錢差不多佔了支出總額的1/3。兩年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蒙特費奧家族聯合建了一所類似的女子學校，並明確目標為改善處於工人階級的女孩所受的宗教教育。這些努力所包含的精神實質可以從列昂內爾1905年6月28日在哈奇森工人子弟活動中心開幕儀式上的講話看出來：

### 第一章 猶太問題（14）

我們希望能照看隔壁鄰居的年輕人，而且幫助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健康成長，幫助他們避開那些在大街上所受到的誘惑、那些來自於音樂廳和酒吧的誘惑。我們想慢慢滲透到這些孩子們的野心中，讓他們為自己身為猶太人而自豪，而且也為自己身為英國人而自豪。（歡呼聲）我們想要教會他們那種堅韌的如運動員一般的精神。

很難為文化的融合想出一個更加理直氣壯的理由。正如納蒂在1891年對聯合公會委員會發表的講話中所宣稱的，「發展猶太社群的第一要務」是「使生活在倫敦東區為數眾多的那些外國同胞英國化」。馬克斯·彼爾波姆的漫畫《泰特藝術館的一個靜謐早晨》暗示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理解「他們的外國同胞方面所遇到的困難」。畫中的館長「正在向一位委託人解釋」一幅內容是關於身處一座猶太會堂內的一群東正教拉比的畫所蘊含的「美好精神嚮往」。那名正在提問的委託人蓄著精心修剪的小鬍子，頭戴著高帽，手提文明棍，顯然是艾爾弗雷德，他看上去似乎並沒有被說服（見圖1 4）。

住房問題也期待著新的資助方式。在1884年5月，納蒂應邀加入了貧民救濟衛生委員會的理事會，專門致力於尋求為人口不斷增長的居住在倫敦東區的貧窮猶太人佃戶提供改善住房條件的方法，而倫敦東區，像斯位元菲爾茲、懷特契佩爾和古德曼斯菲爾茲這些地方，早在出現1888年碎屍者傑克的案件之前，就是臭名昭著的犯罪和賣淫之地。那一年為移民解決住房問題所邁出的第一步是建立了貧困猶太人臨時庇護所，這裡可以為單身男人提供最長14天的食宿，同時幫助家庭尋找住處。而由納蒂領導的一家新的東區調查委員會也提出了建造更多永久性住房的建議——「租金在窮人能夠負擔得起的範圍內的設施完備的住房」——主要通過建立以此為目的的住房公司，而這類公司在19世紀60年代得到了大力發展，甚至還得到了理查德·克羅斯1875年提出的《技工和勞工住房改善法案》的支援。納蒂顯然是受到了他垂危的母親對這個事情的鼓勵，他曾試圖動員其他有錢的猶太人——包括列昂內爾·科恩、貴金屬經紀人F·D·莫卡塔、克勞德·蒙特費奧和塞繆爾·蒙塔古——的共同參與，但是到最後，成立於1885年3月的百分之四產業住房公司的4萬英鎊股本金中的1/4，還是不得不依靠羅斯柴爾德家族（另外一個主要的贊助者是由羅斯柴爾德支援的猶太人免費學校，這個學校在兩年後借了8000英鎊給這個公司）。

百分之四產業住房公司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慈善組織：其公開宣稱的目標是「用相當於每年所收資本4%的淨紅利的最少租金，提供儘可能多的住所」，而這種方式推出的公寓所表現出來的「駭人的功利主義」遭到了現代社會歷史學家的譴責。然而，這種固定收益與那些純商業性操作、以地主獲取更高額回報為目的的做法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而且也可以看成是某種型別的補貼：這些公寓相對於它們所取代的那些貧民區毫無疑問是一種改善。在首批認購的訊息公佈後兩個月，納蒂在弗勞爾和丁街（位於斯位元菲爾中心區的商業街附近）以7000英鎊的價格從都市工廠委員會買了一塊地。這座7層樓的簡樸建築由猶太建築師N·S·約瑟夫設計，1887年4月正式建成投入使用，並且以夏洛特的名字命名。建築內部的戶型非常緊湊，可以提供給228個家庭使用（住房477間）。公司繼續在布雷迪街建了一座類似的建築，而且在弗勞爾和丁街又購入了第二塊地，在1891～1892年間建起了「內森尼爾公寓」。

## 第一章 猶太問題 (15)

當然，如果把所有這一切都單單看成是對於日益高漲的反猶太人主義情緒所做出的反應，那就大錯特錯了：作為猶太人，羅斯柴爾德家族將慈善工作看成是一種宗教義務，而且這種動力又由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風氣而得到了進一步加強。我們僅舉安東尼的女兒康斯坦絲的例子來說，她是全國女工聯合會的總裁、女士行為規範組織全英婦女戒酒協會的行政管理人員、制止虐待兒童協會的活躍的理事，以及內務辦公室委任的監獄監督員；這些活動是所有的自由黨國會議員的妻子都會很樂意參與的。無論如何，像她的孀孀夏洛特一樣，她對這一類的工作也是樂此不疲。她對於猶太人組織的參與也同樣積極，甚至更為積極，例如猶太婦女聯合會、窮人救濟會女士聯合訪查委員會，以及猶太婦女防範及拯救工作協會（後更名為猶太人保護女童及婦女協會，這個組織的宗旨是拯救「失足婦女」，比如未婚媽媽和半公開的妓女，並防止其他工人階級的猶太女孩走上同樣的道路）。這是夏洛特在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已經建立起來的一種活動模式，而且這種活動顯然給她和康斯坦絲帶來了一種與他們的男性親人從「賬房」中或者政治上所獲得的成就幾乎一樣的滿足感。艾瑪也是一位「身不由己」的慈善家：在1879年，她有記錄的個人慈善捐贈就不下400次，而且還在特靈地區辦了177件「好事」，包括參與教會女童聯合會、青年女子基督教協會以及特靈少年禁酒聯合會。

當然，毫無疑問，這些工作存在某種「防禦性」的考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表明可以依靠富有的銀行家的自願捐助來解決某些正在滋生蔓延的社會問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越來越多的在政治上左傾的政治家認為，政府應該對收入和財富的分配進行直接干預；儘管新自由黨人在世紀之交的提議比較溫和，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與那時期的富人一樣，普遍對任何直接稅收的增加都表現出強烈的不滿——特別是那些動機是針對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而提出的稅收。羅斯柴爾德的論據是「資本」必須免除稅收，以便能夠得到積累；只有這樣，經濟才能增長，也才能期待更多的就業和更高的薪水。作為回報，可以依靠富人在自願的基礎上

對保護窮人的切實需要進行捐贈。我們覺得值得在此稍作停頓，來對這個捐贈到底有多大作用進行一個大致的評估。阿爾方索的遺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因為他做了一個很大金額的慈善遺贈，總值大約為63.5萬法郎，然而，這隻相當於他免稅留給他的兒子愛德華的羅斯柴爾德合夥股份（1.35億法郎）的不到0.5%。當然，這沒有考慮阿爾方索生前捐給慈善事業的鉅額捐款，因此對於他的收入在這方面的支出所佔比例的確定，還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無論如何，這總是反對高稅收的保守派的論據中一個明顯的弱點，這種說法認為，總體來說，私人慈善捐款在世紀之交的時候達不到傳統的10%的水平。

具體到猶太人慈善事業的情況，當然還存在更進一步的動機：他們意識到應該加速對新近到達的東歐猶太人的「英國化」步伐。當然，不會再有像羅斯柴爾德家族及他們的那些表親們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所能得到的那種快速融入當地社會的那些機會。不管怎麼說，他們到達英國的時候本身已經相對富裕，而且也受到過良好的教育；而在19世紀到來的東歐猶太人中，絕大多數都是貧窮的工匠。在這個背景下特別令人心驚膽戰的時刻是1888年的東區裁縫大罷工。對於納蒂這樣強烈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這種在猶太人社群內部爆發的嚴重的行業紛爭讓他感覺非常不舒服。他和塞繆爾·蒙塔古兩人都急急忙忙站出來進行調停，希望能夠在兩邊彌合分歧；儘管我們很難想象納蒂對東區工人內部之間的關係能有多少了解。他們的干預反映了猶太精英們對扼殺任何在東區內部冒頭的激進思想的迫切要求：在他們的面前已經擺著俄國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在那裡對猶太人的任何迫害通常都在革命運動中假借著無數被誇大的事實。

## 第一章 猶太問題（16）

批評家們有時候提出來的一種對羅斯柴爾德的善舉的批評是，百分之四產業居住公司根本沒有促進融合，反而是在鼓勵建立新的猶太人隔離區。因此，有人指出在夏洛特·德·羅斯柴爾德大樓裡95%的租戶是猶太人，但這其實是一種誤導。在1890年2月18日的董事會議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公司的布雷迪街住宅中，「力爭達到基督徒租戶對猶太人租戶的比例實現33%~40%」。1899年，在公司的東漢姆專案中，預留了建造非猶太人禮拜場所的位置。「以使這個專案不再成為



猶太聚居區」。根據1904年的資料統計，儘管夏洛特·德·羅斯柴爾德大樓居住的主要是猶太人家庭，但是位於斯托克紐溫頓樓群中的那瓦林諾大廈1/3的租戶卻都是非猶太人。在1911年，公司的坎貝威爾專案（伊夫琳大廈）則根本就沒有猶太人。

當然，解決移民引發的問題的另一個辦法是停止移民。然而，當限制移民的這種想法首次在19世紀80年代浮出水面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他們的圈子立即就顯得有些手足無措了。用羅斯柴爾德的建築師N·S·約瑟夫的說法，「那些提出不接收的說法與那些主張驅逐的說法其實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當反移民動的倡導者阿諾德·懷特在1891年寫信給納蒂的時候，他對遭到立法院拒決（儘管不是沒有資格）是這樣說的：「我同意你的意見，外國人大量湧入，很有可能因為他們缺乏相應的能力和精神上的疾病的原因，使他們成為社會的負擔，因此這種情況應該是最不受歡迎的，而且應該避免。我沒有理由認為這些人大量來到這裡就能夠證明法律的公正。」無論如何，在世紀之交，保守黨國會議員中認為需要對移民進行控制的人數越來越多，這種情況把納蒂——已經是一位堅定的黨員——置於了一個很艱難的境地。在1900年的選舉中，納蒂在他東區的機構支援兩位候選人（代表斯特普尼的威廉姆·艾登·伊萬斯·戈登爵士和代表懷特契佩爾的戴維·霍普·基德）的時候，就遭遇了很大的尷尬，因為這兩人是限制移民理論的支持者。當肆無忌憚的攻擊性競選言論出現在《猶太新聞》上之後，他覺得有必要去東區的聖喬治地區打壓一下聯合黨候選人托馬斯·德沃爾。

在伊萬斯·戈登的煽動下，移民問題被提到了皇室的一個委員會上，而納蒂從來沒有掩藏自己反對「拒收」的立場。作為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當然是首當其衝被要求去作證的人。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包括阿諾德·懷特）特別提到說正是羅斯柴爾德的慈善行為像「磁石」一樣吸引了移民，因此，他覺得自己有必要做出迴應。納蒂與委員會裡的大多數人意見相左，他的報告提倡的是禁止「不受歡迎」的移民入境或者是將其驅逐，他對「不受歡迎」的移民的定義是：罪犯、心智殘疾、傳染病患者以及「臭名昭著的壞蛋」。在這份僅有少數人支援的報告中，納蒂強烈地抗議說，這樣的立法「會影響那些確實需要移民而且工作勤懇的人，他們剛到來時的貧窮的處境不應該作

為他們沒有能力獲得自立的評判標準」。對於他來說，最理想的狀況就是「在猶太人免費學校接受了初步教育的猶太小孩」在1908年成為了劍橋的數學優等生的案例的情況。「這位年輕的數學家的父親早年從敖德薩逃了出來。我相信他過去通常都只能在很小的猶太人會堂裡祈禱。他現在是一家小型裁縫店的領班，在那裡他獲得了較高的薪水，並且在一家小型的猶太人兒童學校任教。這樣的一個孩子，」他評論道，「應該有可能為俄國做貢獻，我希望他在這裡也能做得很好。」

## 第一章 猶太問題 (17)

他的兒子沃爾特迴應了這種觀點。他認為：「大不列顛應該成為那些在其他國家受到壓迫和不公正對待的人的庇護所，只要這些人仍然是正派的，而且勤奮工作。」但是，納蒂對1904年提出的議案的反對，以及他對自由黨在1905年的補選中對邁爾·恩德議案的批評傾注全力的支援，仍然無法阻止法案在那年的年末表決通過。他宣稱，這個法案建立了「一個警察干預和監視的討厭的體系，以及護照管理和專橫的武力體系」。然而，他又不同意代表委員會裡其他成員所希望的對廢除這個法案所進行的訴求，他認為，重新開啟的辯論可能會起反作用，因此，他寄希望於政府在實施的時候能夠採取比較溫和的手段。否則的話，阿諾德·懷特就不會針對《1905外國僑民法案》說「首相及英國內閣……看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臉色更改了他們的政策」。

想讓人傾向於接受移民問題還有兩種其他的途徑。一個是說服俄國政府停止他們對生活在俄國的猶太人所採取的歧視政策。這是大多數俄國猶太人所希望的，他們相信羅斯柴爾德家族憑藉其金融槓桿，可以迫使沙皇政府修改他們的做法。事實上，從猶太人難民區裡傳出來的各種故事，比如像《沙皇在羅斯柴爾德的城堡》，使羅斯柴爾德在人們眼裡有了超自然的能力，而且人們在文學作品裡夢想著他能夠教訓一下沙皇。由於擁有「所羅門王的御璽戒指」，羅斯柴爾德變成了「一位可以控制各國國家命運的人」，他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宮殿裡，「那裡有數不清的黃金，由巨人戰士守衛著」。如果沙皇接受邀請在羅斯柴爾德的城堡中過一夜，他將會看到猶太人的光輝歷史。在這樣的一個故事裡，有著希伯來法寶神話的痕跡。然而，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能就這個問題在聖彼得堡發揮槓桿作用的更多是金錢而不

是魔法，但外交因素使得羅斯柴爾德很難做得比爭取取消排猶政策更進一步。

另一個可能的做法是讓儘可能多的新到達的人繼續往前走。這實際上是猶太人社群很多年以來一直在實踐的一個做法。在1867年，窮人救濟委員會代表「海姆?科恩?哈海梅克」給紐科特寫了一封信，說「這位非常值得幫助的」希臘商人遺失了8000英鎊，而且他希望回到希臘，羅斯柴爾德家族給了他100英鎊。幾乎與此同時，艾爾弗雷德建立了東區移民與救濟基金。僅僅在1881~1885年間，大約有2301個家庭在這個計劃的資助下返回了東歐。在此期間，納蒂資助了200個希望離開英國前往加拿大的家庭。1891年，他成了莫里斯?德?赫希在法國建立的猶太人殖民協會的8個創始股東之一，這個協會是一家幫助猶太人從俄國向阿根廷移民的機構；而且他個人提供「4萬英鎊前往南非的交通費，在那裡選擇適合進行農耕的土地，而且有優良的出海口。受資助人是在俄國猶太人中精心挑選出來的，家庭數量為400~500個，而且是那些能證明他們在農業生產方面有成功經驗並能吃苦耐勞的家庭」。「移民」轉口的問題在1905年再度出現，當時來自俄國的移民家庭數量急劇上升。納蒂在上一年對皇室調查委員會所做的評論指出，他將會支援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下「轉口」移民。

但是，猶太人能否回到在《聖經》中提到的他們起源的地方去呢？羅斯柴爾德家族可能利用他們的財富在聖地上重建耶路撒冷猶太王國的想法早在19世紀30年代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隔離區內也有這種想法：「羅斯柴爾德是否是一位合適的親王.....去重新召集四處散落的以色列人回到上帝對他們允諾過的土地上，繼承大衛王的王庭？」然而，儘管這個家族自從大馬士革事件後就開始關心中東地區的猶太人，並且持續不斷地為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的教育和其他機構捐款，但是在很久之後，羅斯柴爾德才開始嚴肅認真地考慮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殖民地的可能性。詹姆斯最小的兒子埃德蒙1882年在世界以色列人同盟中央委員會的扎多克?卡恩和邁克爾?艾蘭格爾的影響下，也開始對這個想法表示出興趣。這兩個人把他介紹給了塞繆爾?莫希勒維爾，這位是一位流浪拉比（當時在俄國），他想把一隊猶太農民從白俄國移民到巴勒斯坦去；而且侯賽夫?費恩伯格需要金錢資助已經建立起來的位於迦法以南的「錫安先鋒」殖民地（現在的特拉維

夫)。當埃德蒙給了費恩伯格25000法郎在錫安先鋒鑽井找水的時候，在這個地區的其他居住者也受到了鼓勵，都開始向他提出申請，包括居住在卡梅爾山附近的薩馬琳（後來的熱克然·亞阿科夫）的一隊羅馬尼亞猶太人，他們表示他們希望的不僅是來自著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金錢，還包括領導。

## 第一章 猶太問題 (18)

埃德蒙熱情地做了回覆。按照他告訴塞繆爾·赫希這位「密可維以色列」農業學院院長的，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未來定居點的樣板，有點像是一個居住點的核心區，圍繞著它，可以逐步建立起其他的定居點」。所有新加入錫安先鋒的新定居者必須簽署一份申明，宣佈「自己完全服從管理當局認為有必要以男爵先生的名義釋出的有關土地開發及服務的所有命令，如果要對我採取任何行動，我自己均無權反對」。在這個顯而易見的獨裁基礎上，埃德蒙命令莫希勒維爾的定居者在艾克然（後來重新命名為瑪茲克雷特·貝蒂亞，用以紀念他的母親貝蒂）進行葡萄種植。另外還有在羅西·品納進行的絲綢生產試驗，以及香水和玻璃生產，另外還有大量的猶太會堂、學校和醫院——所有這一切都由男爵的「官員們」進行監管。儘管他始終堅持他所做的這一切不是慈善，而是建立一個在經濟上可以自我持續發展的定居點。愛德蒙特高度家長式的做法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現在所說的「依賴文化」。到1889年，儘管投資總額達到了160萬英鎊，還是出現了很多經濟失靈的跡象。儘管他在1900年把管理權移交給了猶太人殖民協會，預設了需要在更大範圍進行的地方自治，但他仍然繼續在猶太人殖民協會巴勒斯坦委員會主席的職權範圍內以他們的銀行家的身份發揮影響。到1903年，28個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定居點中的19個都部分或者全部地接受他的補貼。完全算起來，他在定居點上總共花了有560萬英鎊。

埃德蒙的殖民冒險不應該等同於那種目標是建立猶太國家的具有猶太民族主義色彩的錫安主義，也不應該認為英國羅斯柴爾德在猶太殖民過程中有什麼樣的私人利益。在1890年，納蒂（與倫敦社群其他的知名人士，比如塞繆爾和科恩一起）出席了英格蘭科維維錫安協會的開幕大會，這個協會團結了在1883年針對俄國排猶浪潮在當地所形成的各家錫安信徒組織。里奧對以色列—贊格威爾的猶太疆界組織提

供了支援，該組織試圖在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和庫爾德斯坦）建立猶太殖民點。但是這一代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中沒有誰會真正支援在中東建立猶太國家的想法；事實上，埃德蒙

明白無誤地告誡定居者，應該尋求土耳其的國籍。阿爾伯特更是表現得毫無興趣，他在1895年接到了一份申請，毫無疑問來自一個異常囉嗦的笨蛋，提出的要求更是讓人啼笑皆非——10億法郎，而且還不能少。

到了1895年，維也納的劇作家和記者希奧多·赫澤爾確信「猶太人問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離開歐洲尋找他們自己的「猶太人樂土」，遵循希臘人、義大利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民族在19世紀時所走過的道路，建立自己獨立的民族國家。找到赫希這位同情的聽眾後，他進行了一系列的嘗試，試圖贏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援，因為他相信他們會考慮將他們那沒有外人知道的鉅額資產「變現」，作為對他們所遭遇的反猶太人思潮攻擊的應對，而他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歷史性的使命」供他們去投資。但是，儘管經過了維也納總拉比伽德曼恩的居中協調，赫澤爾致「羅斯柴爾德家族委員會」的信還是一直沒能發出。他甚至沒有從阿爾伯特那裡得到對他第一次嘗試的任何答覆，因此苦澀地總結說，他的信「不應該擺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面前，因為他們是粗鄙、傲慢而且自私自利的人」。相反，他應該通過動員猶太群眾，發動「一場反對那些有權有勢的猶太人的戰鬥」。

## 第一章 猶太問題（19）

這種從討好到挑釁的轉變，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那些商務聯絡人中普遍存在的典型特點。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二世國王在羅斯柴爾德家族拒絕了他為他那瘋狂的童話城堡申請的貸款後的反應也是如此：他告訴他的僕從去搶劫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銀行。然而，赫澤爾從來沒有放棄獲得羅斯柴爾德支援的希望。在1896年的5月份，他想方設法試圖通過巴黎的總拉比扎多克·卡恩以獲得一次給埃德蒙陳述的機會，甚至提出如果埃德蒙能夠同意出任領導，他將放棄他自己所創立的運動的領導權。但是當埃德蒙說他認為赫澤爾在土耳其領土上建立國家的想法對他自己的殖民計劃是個威脅的時候，赫澤爾轉變成了敵對的態度。一年之後，他宣稱他們「對於猶太人來說是一大不幸」。他在1896年8月試圖獲得一次與埃德蒙會談的機會，然而結果只能是面臨一

次更大的失望。到1898年，他得出結論說，埃德蒙弱智，因此他應該去請求更有財力的阿爾方索——這個說法通過他在10月份對錫安信徒的訪問得到了證實。

開始，他在倫敦沒有獲得任何進展。1901年時，納蒂甚至都不願意見他（儘管有他的表妹巴特錫夫人的求情），而且當赫澤爾在1902年就有關外僑移民的事宜在皇室調查委員會上作證時還發生了衝突。在那一次交鋒之後，納蒂清楚地說明他會「對建立簡單純粹的猶太殖民地的觀點感到恐懼」。他宣稱：「我弄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巴勒斯坦之夢是一個神話，而且虛無縹緲。」里奧也反對赫澤爾式的錫安主義。只是在赫澤爾改變了他的戰略，認為在西奈的任何猶太人殖民地都可以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的時候，納蒂才開始表現出了興趣，把他介紹給了約瑟夫·張伯倫。他的支援在赫澤爾生命晚年時出現了顯著的增長，儘管他們的英國猶太人在西奈的殖民計劃由於外交障礙，最終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為什麼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赫澤爾提出的「猶太國家」的概念開始如此不當回事？部分原因是，儘管他信誓旦旦地說他們會從對他的支援中獲得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好處——他甚至提出新國家的首任民選「王子」為一位羅斯柴爾德人——但赫澤爾的有烏托邦特徵的銀行體系很難對他們有什麼吸引力。事實上，赫澤爾曾經有一種狠毒的傾向，如果他們反對他，他打算把對利他主義的宣告與「清算羅斯柴爾德家族」或者「發動一場殘酷的運動」結合起來。當然，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反對理由，而且赫澤爾自己公開地承認，如果要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勢必鼓勵那些反猶太人的組織對現有的已經歸化了的猶太人的國家身份認同問題提出質疑。納蒂是一名英國猶太人，正如阿爾方索是一名法國猶太人，而阿爾伯特是一名奧地利猶太人一樣。他們並不贊同赫澤爾的悲觀和預言式的觀點——受《新自由雜誌》對德瑞夫斯事件的評論的啟發——這樣的公民權利可能會在某一天被反猶太人的政府取消。他們不僅沒有把錫安主義看成是「對解決猶太人問題的一個答案」，反而把它看成了對他們地位的威脅。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描述他們的漫畫似乎更能說明問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作為離開德國的王廷的一部分，他們深受困擾，就算他們已經到達他們自己私人輪船的船塢邊（見圖1 5和圖1 6）。

圖1 5 克里斯丁·肖勒，《猶太人在世界各地尋找合適的地方建立共和國》

資料來源：赫丁，《漫畫中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插圖26

這樣一種大規模移民的景象，無論是朝向聖地或者（按照反猶太人的漫畫中所幸災樂禍地描繪的）朝向海底，所代表的不可能比否定他們家族自內森起在一個世紀以前以一名外國移民的身份進入英國以來所獲得的社會地位更讓人無法接受——那種在很多猶太人眼裡看起來的王權、在大多數異教徒眼裡看起來的貴族身份，但最根本的還是他們出生的國家所賦予他們的公民權利。就後來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赫澤爾是一個預言家。在他死後不到半個世紀，德國、奧地利和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全部都成為了他所預見到的反猶太人大屠殺的犧牲品。但是同樣也很容易看出他的觀點在當時看起來古怪而且危險的原因。

圖1 6 《猶太人滾出德意志！》《政治宣傳畫》第17卷（1895年）

資料來源：赫丁，《漫畫中的羅思柴爾德家族》，插圖27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 (1874~1885年) (1)

如果投資者的特殊利益無法與公眾利益調和，就會引發破壞性的政策，然而更加危險的是金融家們的那些特殊利益.....這些重大的生意--銀行、經紀、票據貼現、貸款的浮動利率、公司創辦--形成了國際資本主義的核心部分。經營這些生意的機構坐落在每個國家的商業中心，通過最強大的組織聯絡緊密團結在一起，只要他們還對歐洲有興趣，就總是能夠通過最近的距離和最快的速度保持著相互之間的聯絡。這些業務主要通過一個人和一個奇特的家族進行操控，而他所代表的是幾個世紀積累起來的金融經驗，他們居於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對國家的政策進行操縱.....是否有人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如果未經羅斯柴爾德的銀行及其關聯的企業的同意，有哪個歐洲國家有能力發動一場大戰，或者是進行一份鉅額的國家貸款認購？

每一個大的政治行動都牽涉著新的資本流動，或者引起現有投資的價值出現波動，因此必須取得這一小部分金融之王的批准和實際的支援.....作為投機者或者金融交易商，他們控制帝國主義經濟體系中最關鍵的那些單個因素.....他們那些很大的生意中的每一個條件.....都把他們拋向帝國主義一邊.....沒有哪一場戰爭、哪一次革命，甚至哪一次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活動或任何其他公共恐慌，沒有讓這些人賺得盆滿鉢滿；他們貪婪而殘酷，從每一次突然的公共信用的騷亂中充分地榨取他們的收益.....這些銀行的財富、他們的業務規模以及他們世界性的組織，使他們成為了經濟政策最主要的制定者。他們在帝國主義世界裡的生意擁有最大、最明確的賭注，把他們的意願強加到國家政策之中的最合適的方式.....金融是.....帝國主義引擎的調節器，它引導著動力的方向，決定著工作.....

--J·A·霍布森，《帝國主義：一項研究》，1902年

衰退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與1880年前在國際金融資本市場上的統治地位比起來，羅斯柴爾德家族無疑在此之後出現了衰退。與那些競爭的銀行相比，他們的利潤相對較低而且發展不夠快。然而，如表2-1所示，羅斯柴爾德家族就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也是絕對的一支強大的金融力量。N·M·羅斯柴爾德公司從資本金方面看仍然是倫敦金融城裡無可匹敵的最大的私人銀行。如果人們能記得羅斯柴爾德家



族倫敦銀行只是四家羅斯柴爾德銀行之一的話，那麼對這種統治地位所留下的印象就應該更加深刻了。圖2-1顯示了羅斯柴爾德銀行按照後續的合夥合同計算出的合併資本金。1874~1887年間，合併資本金從3440萬英鎊上漲到了3800萬英鎊，而在1899年則達到了最高峰時期的4150萬英鎊。在1904年，合併資料取消的前一年，這個數字仍然高達3710萬英鎊。如果資本金沒有在1898年後被提走，總資本應該已經超過了4500萬英鎊。這使得N·M·羅斯柴爾德公司不僅是倫敦最大的私人銀行，而且也是世界上各類銀行中的翹楚。在1881年，有71家不同的信託企業在巴黎交易所報價，總的實繳資本金為14.9億法郎；合併的羅斯柴爾德銀行自己擁有的資本金差不多有10億法郎，而且羅斯柴爾德家族巴黎銀行--5.9億法郎的資本金--仍然是法國最大的銀行之一。在1913年，5家德國最大金融機構（達姆斯塔德、貼現公司、德意志銀行、德雷斯德納爾銀行以及柏林亨德爾銀行）的總資本為8700萬馬克（4300萬英鎊）--並不比10年前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合併資本金多多少。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2）

當然，羅斯柴爾德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值遠遠小於那些大型的股份合作制銀行的報表。最大的英國清算銀行米德蘭銀行擁有的存款總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為1.25億英鎊，而羅斯柴爾德銀行的相應資料（資產減去資本）只是1400萬英鎊。對於德意志銀行--1914年時德國最大的銀行來說，這個數字是7400萬英鎊。但是這個數字其實比較缺乏可比性。羅斯柴爾德家族從來沒有對吸收存款表現過興趣，他們主要關注的是以他們的資本為基礎承接大型的債券發行，以吸引外面的資金直接進入新的證券領域，而不是吸引存款。

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其他競爭對手的另一個不太引人關注的差異，是他們的盈利水平相對來說顯得較低。表2-2給出了金融城裡5家主要銀行資料的比較。結果表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銀行的平均盈利水平從19世紀70年代的9.8%下降到了1900~1909年的3.9%。羅斯柴爾德家族看上去經營得非常穩健：憑藉他們從上一輩人手裡繼承下來的鉅額資本積累，納蒂和他的兄弟們顯然沒有感到有什麼壓力要去獲取像巴林銀行或者施羅德那樣的高額利潤，更不用說是像米德蘭銀行那樣的股份合作制銀行。1890~1914年之間承兌業務的資料也表明羅斯

柴爾德家族倫敦銀行落在了克林威茲、施羅德銀行和摩根·格倫菲爾後面，而且，在1910年之後，甚至被布羅涅德茲和哈姆布羅斯趕超。1890～1914之間，N·M·羅斯柴爾德公司的平均年承兌金額為270萬英鎊，而巴林銀行是560萬英鎊，施羅德是720萬英鎊，克林威茲是市場的領導者--900萬英鎊。資產方面，目前可以找到的資產負債表的資料表明，巴林銀行和施羅德在1914年前的10年間快速趕超了N·M·羅斯柴爾德公司。在1903年，紐科特的資產總額是2500萬英鎊，而施羅德是1030萬英鎊，巴林銀行是990萬英鎊。10年之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總資產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而施羅德的資產負債表上增加到了1910萬英鎊，巴林銀行的資料也上升到了1580萬英鎊。

圖2-1特選年份羅斯柴爾德合併資本數（單位：千英鎊）

表2-1N·M·羅斯柴爾德公司與其他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及承兌金額，1870～1914年

（單位：百萬英鎊）

資本金

資本金

資本金

承兌金額

承兌金額

承兌金額

N·M·羅斯柴爾德公司

5 90

7 07

6 37

0 91

3 44

1 31

巴林兄弟公司

1 63

1 02

1 02

6 70

3 89

3 72

WmBrandt父子公司

0 18

1 00

0 10

0 70

0 72

布朗與席普利公司

1 20

0 78

4 50

5 10

A Gibbs父子公司

1 22

0 88

1 17

C·J·哈穆布羅

0 63

0 04

1 00

0 98

0 84

1 34

Fr Huth公司

0 50

0 60

0 75

3 30

克林威茲父子公司

0 84

1 19

4 42

2 10

5 40

8 50

拉扎德兄弟公司

0 60\*

1 20

1 00

J·H·施羅德公司

1 69

1 24

3 54

3 22

4 00

5 82

J·S·摩根公司+

1 80\*

1 00

4 20

Seligman兄弟公司

1 35

3 00

\*估計數值

+1910年來自Morgan,Grenfell&Co.

資 料 來 源 : RAL ,  
RFamFD/13F;Gassis,City,p 33;idem,Citybankers,pp 31f;Kynaston,City,v  
ol I ,pp 312f;vol II ,p 9;Chapman,Mercbantbanking,pp 44,55,121f  
,200f ,208f ;Roberts,Scbroders,pp 44,57,527-  
35;Ziegler,sixtbgreatpower,pp 372-8;Wake,kleinwortBenson,pp 472f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 (1874~1885年) (3)

說明出現相對衰落的另一個指標是這樣一些事實：從個人財富的角度說，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不再是特例。納蒂在他那一輩的英國羅斯柴爾德成員中是最富有的（在他於1915年去世後留下了250萬英鎊），但是在1890~1915年，至少有13名英國百萬富翁留下的財富跟他一樣多，甚至比他的還要多。在大洋的彼岸，小摩根在1890年去世的時候留下的財富已經達到了那個數字；當他的兒子皮爾龐特在1913年去世的時候，其資產的淨值估計已經達到6830萬美元（1400萬英鎊），這些還不包括他的藝術藏品，如果把這部分包括進去，其財富應該接近2400萬英鎊。可以想象，在1901年的時候，摩根的合夥人克林頓·道金斯感覺有點不可想象：

老皮爾龐特·摩根及其公司在美國所處的位置遠比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的位置更為突出.....合併起來看，摩根在美國和倫敦的資本總和大概不會比羅斯柴爾德家族差太多，但是比後者更有擴張性，也更活躍，而且融入了這個世界的偉大發展程序之中。老摩根已經是60歲的高齡.....他的後面有.....年輕的摩根--還不到40歲，正在做著成為偉大人物的準備；還有我自己。羅斯柴爾德家族除了經驗和老納蒂的

聲望外，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因此，如果我們能繼續保持並能有一到兩名優秀的人才來幫助我們，在隨後的20年間就有可能看到羅斯柴爾德家族陷入衰退，而摩根集團則鶴立雞群。

然而，上面這種情況的出現需要有一些條件。首先，如果考慮1830～1869年間的資料，N·M·羅斯柴爾德公司1879年後的表現事實上並沒有明顯比之前的時期差。19世紀70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時期，這個時期之前和之後的那段期間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通過跟過去的情況比較來說衰退就存在誤導的嫌疑。第二，通過繼續採用穩健的手段，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常安全，而這段時間巴林的做法代表了完全不同的風格。表2-2的資料也反映了這個時期內由於1890年的危機導致的競爭對手的收縮情況。巴林的高利潤部分原因是由於它那種高風險、相對狹窄的投資策略。

表2-26家主要倫敦銀行的資本利潤率，1830～1909年（10年平均數，%）

羅斯柴爾德

巴林

施羅德

克林威茲

摩根

米德蘭

1830～1839

5 9

15 5

1840～1849

1 8

13 3

〔7〕

16 3

1850～1859

4 9

21 3

〔7〕

17 9

1860～1869

7 0

27 6

10 6

〔7〕

22 2

1870～1879

9 8

11 9

11 6

15 1

21 9

續表2-2

羅斯柴爾德

巴林

施羅德

克林威茲

摩根

米德蘭

1880～1889

7 5

13 6

6 3

4 0

5 2

19 8

1890~1899

4 6

13 6

7 5

4 1

7 8

24 3

1900~1909

3 9

27 1

10 5

3 6

4 7

22 8

注：不同公司對資本和利潤的定義有所不同

資料來源：RAL,RFamFD/13F;Roberts,Schroders,pp 44,57,99,527-535;Ziegler,Sixthgreatpower,pp 372-378;Wake,KleinwortBenson,pp 472f ;Burk,MorganGrenfeu,pp 260-270,278-281;HolmesandGreen,Midland,pp 331-333

羅斯柴爾德合併後相對較低的利潤率和它的經久不衰，讓人不由得想到弗雷德里希·根茲早在1827年就給出的解釋，他認為羅斯柴爾德經營理念中的兩個根本原則是：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4）

他們從不追求過分的利潤，在所有業務中他們都限定了明確的範圍，無論人們多麼聰明和謹慎，他們從不心存僥倖。這其中深藏著他們力量的一個主要祕密。毫無疑問的是，在那些他們說了算的情況下，他們完全可以在這個或那個專案上獲取遠高於他們所獲得的收益。而且，就算這樣做不至於影響到他們業務的安全，他們也會通過把他們的資源分散到大量能持續進行的交易中使他們最後的所得減少，但是這些分散出去的交易無論在什麼（經濟）條件下都能夠不斷地重複。

另外，羅斯柴爾德在承兌市場上落後於施羅德和克林威茲這樣的事情也不能說成是衰敗的跡象：就算這些資料準確無誤，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從來沒有像其他的倫敦商業銀行那樣對承兌業務產生出的利潤如此依賴。與過去的情況一樣，他們把自己的資源主要集中於債券市場，而在這個領域他們依然無人可敵。最後，不應該孤立地看待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銀行的利潤，因為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要在各家合夥人之間分享。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合併利潤並不容易計算，因為當某一個合夥人死後，會有巨大的金額被提走，但是圖2-2給出了一個合理的修正資料。我們再次說明，總的來說羅斯柴爾德銀行並不是衰落：雖然1874～1879年中那些蕭條的年份每年平均年利潤都下滑--幅度大概達到一半（比1852～1874年多出了100萬英鎊），但是1879～1882年間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歷史上利潤最為豐盈的時期（平均年利潤達到了400萬英鎊），儘管這似乎不能持續，但是在1888年和1904年間的總體趨勢是向上的（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的每年78-5萬英鎊到1898～1904年間的160萬英鎊）。

圖2-2羅斯柴爾德家族平均年利潤（合併分行報表），選擇性時段（單位：千英鎊）

這在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與英國的整體經濟之間引出了一個有意義的類比。很多年以來，經濟歷史學家一直在爭論，大約在1870年以後，英國的經濟遭遇了相對的衰退，主要的表現是這期間美國或者德國的經濟出現了更快速的增長，而英國作為重要的產品出口國的統治地位在下降。當一部分人認為這個相對下降是因為"企業家的失敗"，或者甚至是由文化決定的"產業精神的衰落"的時候，另一部分人則認

為倫敦金融界是一個集體罪人，他們在19世紀末期通過鼓勵過度水平的資本輸出阻礙了英國產業的現代化程序。在整個19世紀，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在鼓勵這種資本輸出的過程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而且一直到1914年都還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因此，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納蒂不僅應該為他自己的公司的衰落承擔責任，還應該為英國的整體經濟的衰落承擔責任。

現實的情況是，英國經濟的衰落，與1914年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衰落一樣，被誇大了。如果能夠證明出現了資本短缺造成英國公司無法對其生產設施進行現代化改造的話，資本輸出的本身也僅只是使英國的工業投入出現缺口的一個原因；而實際上，幾乎找不到這樣的證據來支援這樣的說法。事實上，英國的高水平資本輸出，是英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使然，英國是工業產品的出口者，食品和其他初級產品的進口者，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最終債主，技藝嫺熟的殖民者輸出國，適用於絕大部分海域及陸地（在1860年為950萬平方英里，1909年為1270萬平方英里）的法律和法令的帝國捍衛者。如果太狹隘地來測算這個體系的成本和收益--只看那些仍然生活在英國本土的英國人的利益，就會看不到問題的根本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大約有4.44億人生活在某種形式的英國統治之下：與那些反殖民統治時期的民族主義者的宣傳相反，英國的政治家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不可能也不會只考慮那10%正好生活在聯合王國裡的人。當海外擴張的利潤毋庸置疑地流入了相對較少的投資精英的口袋裡時，英國投資的乘數效應和貿易就讓人感覺不只是英國自己了。統治和保衛帝國的成本也不應該被誇大，由英國所導致的稅收和債務的負擔相對於英國統治的巨大範圍和由穩定的、基本上能保證自由貿易、資本自由流動和自由移民的強勢英國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來說，事實上很小。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5）

到19世紀50年代，英國海外投資總計已經達到了2億英鎊，而在19世紀的下半葉，出現了資本輸出的三波浪潮。在1861～1872年間，對外投資的淨額從佔GNP的1.4%上升到7.7%，而1877年又下降到0.8%。之後，在1890年的時候穩固上升到了7.3%，但是1901年又再次降回到了一個百分點以下。在第三波升浪中，於1913年達到了最高峰的9.1%--這個水平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被突破。按照絕對的條件

看，這導致了鉅額的海外資產累積，從1860年的3.7億英鎊上漲到了1913年的39億英鎊--大約是英國股票總市值的1/3，上漲了10倍還多。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外國投資能接近這個水平：最接近的法國，擁有的海外資產價值總額不到英國總額的一半，德國只是1/4強。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佔了全部外國投資的差不多44%的份額。儘管在對外投資和國內固定投資之間存在負相關的情況，然而，這個高水平的資本輸出不應該按簡單的概念被理解為是把資本從英國經濟中"抽掉"。把資本輸出看成是某種"引發"英國貿易赤字擴大的原因也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這些投資中所賺取的收入遠高於新增的資本輸出，也就是（算上來自"隱形"收入的總收入）它總是高於貿易赤字。在19世紀90年代，國外投資淨值達到了GNP的3.3%，而海外淨資產收入達到了5.6%。在隨後的10年中，這兩組資料分別是5.1%和5.9%。

為什麼英國的經濟會有這種表現方式？海外投資從性質上來看，是"組合"而不是"直接投資"，換句話說，它是通過出售代表外國政府和公司發行債券和股份的方式進行的股票交易。按照艾德爾斯坦對外國證券的"拉動"作用的解釋，儘管外國證券也許涉及更高程度的風險，但其收益比國內債券的收益更高（大約高1.5個百分點），這個結論來自對1870～1913年的資料進行平均後的結果。然而，這個平均的過程隱藏了巨大的波動。在對482家公司的報表進行分析後，戴維斯和哈藤拜克證明了美國國內債券的回報率有時候高於國外的--以19世紀90年代為代表。他們的工作也從定量分析的角度證明了帝國主義投資人眼裡所看到的重要意義，因為在帝國內部投資的回報率與在英國有實際的政治控制以外的國外投資的回報率有明顯的差異：在1884年之前的那段時期高於67%，但是之後低於40%。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因此說英國的海外投資是帝國主義經濟方面的不理性產品--一個資本緊跟旗手，而不是利潤最大化的案例？很多現代的史學家傾向於強調大英帝國快速擴張的非經濟動機。從另一方面看，戴維斯和哈藤拜克證明，從英國投資的總體情況來看，帝國控制的領地並不是主要的目的地：因為在1865～1914年，只有大約25%的投資投向了帝國內部，而投向英國本土經濟的佔了30%，另外的45%投向了外國經濟體。他們的努力方向是讓已有的對帝國有著實際利益的投資精英成為穩定整個

國際資本市場的中堅。19世紀晚期的帝國主義是伴隨著一種類似20世紀末期的"全球化"經濟程序的政治附庸。

作為帝國投資者精英俱樂部的領導成員，羅斯柴爾德家族在英國帝國主義中的作用非常重要。1865～1914年在倫敦公開發行的外國債券總額為40 82億英鎊。N·M·羅斯柴爾德公司以獨家或者是合作的方式負責了總額的1/4還多（10 85億英鎊）。沒有任何其他的銀行可以與之比肩，儘管巴林銀行在1860～1890年期間做過嘗試，而且皮爾龐特·摩根之後也逼近過這個目標。在世紀之交的時候，塞利曼兄弟和厄內斯特·卡塞爾齊頭並進，形成了非常強有力的競爭態勢。表9-3給出了1852年之後那段時間羅斯柴爾德所發行的貸款的型別以及地理分佈情況。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6）

表2-3由N·M·羅斯柴爾德公司所發行的貸款，1852～1914年

總額（英鎊）

百分比

其中公共部分

總計百分比

英國

11941582

8 7

96266582

86 0

歐洲

90034413

45 6

54929413

94 1

中東

78677640

6 1

78677640

100 0

拉丁美洲

189003610

14 6

175898990

93 1

北美洲

291700448

22 5

284900448

97 7

澳大拉西亞

5000000

0 4

5000000

100 0

亞洲

20200000

1 6

11500000

56 9

非洲

7200000

0 5

3700000

51 4

其中帝國內部

77547580

6 0

65347580

84 3

總計

1293757693

100 0

1210873072

93 6

資料來源：阿耶爾，《金融的世紀》

用戴維斯和哈滕拜克的資料（見表2-4）與羅斯柴爾德的資料進行比較後，我們會發現，N·M·羅斯柴爾德公司對政府財政的興趣遠勝於對私營部門事務的興趣。1865～1914年，在所有的"募集"資本中只有大約36%為政府所用，而在同期由倫敦羅斯柴爾德銀行提供的貸款（同樣的資料，大約數）超過了90%為政府所用（餘下部分幾乎全部被外國鐵路公司所佔有）。羅斯柴爾德在政府債券發行中的支配地位是相當驚人的。對於整個倫敦市場來說，1865～1914年所發行的外國公共部門債券總額為14·8億英鎊，其中接近3/4主要由羅斯柴爾德銀行單獨或者以合夥的方式負責。與倫敦的總體市場比起來，紐科特仍然是對歐洲非常感興趣，而在非洲、亞洲和澳大利亞的債券發行方面沒有能夠充分表現。或許，所有情況之中的最大不同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相對來說基本沒有涉及英國以外的帝國債券發行，這一塊只佔他們總體業務的6%，而在整體的英國資本市場佔到了26%。考慮到納蒂和艾爾弗雷德在帝國主義政治中的作用，這個發現讓人高度驚奇，它說明他們在自己的私人金融活動中沒有把英國以外的帝國放到一個相

對重要的領域的位置。更準確一點說，他們對那些通過英國金融控制的國家（比如巴西）擔保的國家（比如埃及）所發行的債券並不是很感興趣，因為那些擔保國家在政治上仍然是獨立的。因此，像厄內斯特·卡塞爾說艾爾弗雷德的，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幾乎不會從事沒有英國政府擔保的任何業務"是十分錯誤的。

表2-4英國資本募集的地理分佈，1865～1914年

千英鎊

百分比

英國

1487519

31 8

歐洲

349974

7 5

北美

1059797

22 7

南美和加勒比

631235

13 5

非洲

310198

6 6

亞洲

442518

9 5

澳大利亞和太平洋

374404

8 0

不詳

22800

0 4

總計

4678445

100 0

資料來源：DavisandHuttenback,Mammon,p 46

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銀行在兩方面"代表著整個"金融界。北美和南美的債券發行在其為整個市場所做的業務中佔有幾乎完全相同的比例。而且，羅斯柴爾德也同其他同仁一樣對國內私營部門的金融相對來說缺乏興趣，這部分只佔所有羅斯柴爾德發行債券的1%多一點的份額（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有對國內產業缺乏熱情的名聲）。當愛德華·基尼斯爵士試圖於1886年在股票市場發行他的愛爾蘭釀酒公司股票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銀行拒絕處理這項600萬英鎊的業務，後被巴林銀行接了過去。這些股份和債券最終大受歡迎（認購數額超出了將近20倍），而巴林銀行在這次發行中賺了大約50萬英鎊。然而，當納蒂被一名記者問到他是否後悔回絕了這筆生意時，納蒂回答說："我並不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每天早上我去銀行，當我對每一個提交給我的專案方案和計劃說'不'後，我晚上回到家裡都非常輕鬆和滿足。但是當我同意了任何建議之後，我馬上就會陷入焦慮之中。說'是'就像是把自己的手指放到了一臺機器上，飛轉的輪子可能會捲住你的手指，然後把你整個人都拽進去。"這通常被看成是第四代羅斯柴爾德小心謹慎的典型例子。因此，當其他人在為倫敦地鐵網路的建設提供融資服務而大賺其錢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對此是敬而遠之。甚至連海峽隧道的想法，由於可能提高北方鐵路的通達能力而深受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青睞，也沒有能讓納蒂動心。"你完全可以不用有什麼顧慮，放心地從我這裡拿走它。"他在1906年告訴他的堂兄弟們，"這個意見



（海峽隧道提案）在上院將會遭到絕大多數的反對，因而，你根本不值得在這方面浪費你的時間和金錢。”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7）

得承認，這種節制的規則也有一些例外。或許是有意與巴林銀行和基尼斯的成功合作一比高下，納蒂在1886～1891年間，先後四次為曼徹斯特輪船航道公司發行了股票和債券，總值達1300萬英鎊。但是正如愛德華·漢密爾頓評論的，這種發行的首次失利導致金融城內出現了“羅斯柴爾德的水”與“巴林的啤酒”這樣的“惡意對比”。甚至在有巴林銀行的合作支援之下，也未能讓第二次發行獲得成功。類似的情況還有，由於成為了19世紀早期發展迅速的通訊行業的先鋒，羅斯柴爾德家族本應在抓住重要的創新方面（比如電話的推廣等）有所作為。事實上，他們自己早在1891年就開始試驗使用電話作為巴黎和倫敦之間的一種聯絡手段。但是在次年為新電話公司發行價值488萬英鎊的股票的工作在他們眼裡卻變成了一樁可有可無的小事，而且很讓人詫異的是倫敦和巴黎合夥人之間的相互聯絡繼續採用他們的父輩、祖父輩以及曾祖父輩那樣的手寫書信方式。

所有這一切都解釋了為什麼歷史學家通常都認為這一代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對金融的認知相當“保守”的原因（明顯的反面是法國羅斯柴爾德銀行仍然是像北方鐵路這樣的鐵路公司的大股東）。不過，這些批評家仍然停留在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運作模式以及他們在19世紀末期全球化程序的作用方面的錯誤理解上。舉例來說，有一個國內的行業，羅斯柴爾德家族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功--或許，大家可能會猜到這是一個與政府聯絡非常緊密的行業--國防。與參與到國內產業和運輸業方面比較起來，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國外的礦業、國際金屬和寶石市場的興趣佔有更重要的位置（這將在下一章中詳細討論）。

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帝國主義經濟和政治中的作用不應該被歪曲成含義更為廣泛的衰敗論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帝國主義並不代表與他們過去的輝煌成就一刀兩斷。外國公共部門的投資仍然是他們的首選，而“自家”政府的借貸位居其次，因為法國、奧地利-匈牙利和情況稍好的英國都不得不靠繼續發行新的債券來資助自己不斷攀升的保衛自己的帝國所需的費用。從這方面說，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國際債券市場上即使不能說沒有對手，起碼也是少有對手。他們在外國私營領域

的融資（特別是鐵路方面）是比較適度的，在承兌業務方面的策略也差不多。而他們在國際礦業領域的興趣，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相當的不同凡響。

與過去一樣，羅斯柴爾德家族繼續致力於推動全球經濟體系的持續擴張，使資本、貨物和人員事實上能夠以儘可能自由和安全的方式進行流動。如果可以不通過政治干預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會非常滿意。因此，羅斯柴爾德家族參與到巴西事務中的長期歷史表明，他們並沒有把帝國對目標國的正式控制看成是以盈利為目的的資本輸出的前提條件。只有在重要的債券面臨由於貸款國政治不穩定導致的危險時，羅斯柴爾德家族才會支援直接的政治干預。他們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礦業方面的興趣不需要外國干預，儘管這些國家時常面臨政治不穩定的情況；反之，很難想象他們在緬甸紅寶石礦或者新蘇格蘭鎳礦完全沒有歐洲直接控制的情況下進行投資。南非的情況說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對以塞西爾·羅德斯為代表的帝國主義的態度充滿著矛盾：儘管黃金和鑽石礦對他們充滿了吸引力，但是他們還是不相信羅德斯更為廣泛的將英國的政治影響力擴充套件到開普殖民地北部地區的計劃。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對這些帝國領地上的鐵路有什麼興趣。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8）

一般說來，羅斯柴爾德家族只會在他們覺得這種做法肯定不會引發與歐洲其他大國的衝突，或者是（但不很常見）他們覺得如果英國不作為，另一個競爭對手會建立一個經濟上限制更為嚴格的殖民地統治（人們通常認為法國和德國的政權比英國的更加趨於保護主義模式，儘管事實上法國和德國的關稅並沒有很明顯地高過英國）的時候，才會支援英國的帝國建設。這種對避免國際爭端的追求解釋了羅斯柴爾德偏向於被稱為多國帝國主義的體系的原因，在這種體系下，經濟方面的利益受到了一個以上的歐洲大國的保護。典型的例子是埃及的情況，在這裡，羅斯柴爾德家族試圖通過兩個國家的債券持有人分享利益的方式來協調英國和法國的政治利益衝突（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希臘和土耳其基本沒有什麼利益，但是類似的多國金融保護的模式也在這些地方採用）。在中國，他們也支援在歐洲各個大國之間進行合作。

應該強調的是，對於所有這一切來說，有某種程度的本能在裡面，而當批評家（像霍布森）提出帝國主義理論的時候，帝國主義者自己卻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納蒂在1906年5月寫給巴黎的信中說，"如果他們生活在歐洲，這些投資人和資本家怎麼具體考慮他們本國的股票？"他有一種模糊的概念，認為投資者被較高的收益所"迷惑"，因此，這說明海外投資風險較高，而他自己對具體地區和領域的偏好看起來也是基於大部分都無法言明的假設之上。然而，他對帝國主義的政治假設遠不是用無法言明就可以解釋的：在此之前以及自此之後，沒有家族成員在政治上這麼活躍過。在這裡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變化。過去，羅斯柴爾德家族傾向於透過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來看待政治：詹姆斯對外交事務的所有干預幾乎都是基於他的商業方面的算計。而這種說法無法適用於第四代成員。自身的經濟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有時候納蒂和艾爾弗雷德的立場是基於"純粹"意識形態或者是政黨政治的原因，與N·M·羅斯柴爾德公司的業務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就如在他們擁有私人利益的某些地區根本沒有認真考慮過帝國控制力的可能性一樣。具體來說，納蒂認為他自己"戴著不同的帽子"：一頂是為紐科特戴的，一頂是為威斯特敏斯特戴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一頂是為東區戴的，一頂是為西區戴的。那些職業政治家也傾向於以同樣的方式思考，儘管無論在哪種情況下私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界限都能夠進行完滿的劃分。

事實上，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對於經濟的優先考慮通常還要勝過羅斯柴爾德家族自己所意識到的。儘管他們從高水平的資本輸出獲得利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在具體的專案中，第四代通常都會讓國家的政治考慮優先於羅斯柴爾德各銀行之間集體的經濟利益。事實是，英國金融重點不再放在歐洲的重新定位，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連線倫敦、巴黎、法蘭克福和維也納的網路在某種程度上被荒廢了。同時，法國和英國之間出現的殖民地利益紛爭使羅斯柴爾德家族面臨兩難的選擇。正是在此期間，各家銀行更加獨立地各自為政。這些英-法之間的不和，以及奧地利對歐洲以外的世界所表現出來的麻木，都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9）

### 帝國的金融政治：埃及

羅斯柴爾德家族捲入英國的帝國事業中最為人所知的是埃及的例子。眾所周知，是倫敦羅斯柴爾德銀行在1875年給迪斯雷利政府提供了400萬英鎊的無抵押貸款，使英國皇室得以收購了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大量股票。撇開圍繞著這場交易的那些羅曼蒂克的光輝，這件事通常被看做是1882年後邁向英國對這個國家的軍事佔領和經濟控制的第一步，而整個過程中，羅斯柴爾德家族也都提供了便利。然而，走向蘇伊士股票購買的道路並不是平坦的；在很多方面，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埃及的作用都說明了在像"帝國主義"這樣的歷史概念後面所隱藏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

為了能理解1875年那些狂熱事件的重要意義，我們有必要對中東地區的金融情況做個大致的瞭解。在克里米亞戰爭所引發的災難性後果中，在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和在開羅的總督都開始欠下了鉅額的而且可以肯定是不可持續的國內和國外債務。1855～1875年，土耳其債務從大約900萬土耳其里拉上升到了大約2 51億。考慮到土耳其政府的金融資源，這些債務是完全不可持續的：以現金收入來計算，債務負擔從130%上升到了1500%；以支出計算，利息和到期本金從1860年的15%上升到了1875年最高時的50%。埃及的情況也類似：在1862年借了第一批外國貸款之後，到1976年，總體的公共債務從330萬埃及鎊上升到7600萬，大概10倍於稅收總收入；此外，伊斯邁爾總督的私人戶頭上還欠了大約1100萬鎊。1876年的預算表明債務費用佔了所有全部支出的一半還多（55 5%）。

很值得把這些資料進行某種程度的比較分析，我們只需要對那些在19世紀構成的可持續借款確定一個大概的概念。在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到1873年），英國的國家債務一直都10倍於總的公共稅收；與此同時，債務費用從1818年到1855年大約為總支出的50%。而從19世紀40年代起一直到1914年，英國債務總的趨勢在持續不斷地下降，以至於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總債務只是總收入的3倍多一點，而債務支出只佔總費用的10%。另外，英國經濟以史無前例、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在增長。在土耳其和埃及，債務連續20年膨脹，到1875年幾乎接近政府的預算，然而經濟活動卻幾乎停滯了。與其他幾個也在國際市場借錢的主要國家（比如巴西和俄國）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土耳其和埃及完全失控了。巴西和俄國的債務從來沒有超出過總

稅收的3倍，而債務支出基本上也都在總費用支出的15%以下。與這個中東教訓最接近的例子是西班牙，這個國家也在19世紀70年代面臨破產（見表2-5和表2-6）。在1873年困擾所有歐洲市場的全面經濟危機這個大背景下，中東債務危機已經不可避免。

表2-5選擇性年份及一些國家的債務情況，1869～1913年

英國

法國

土耳其

埃及

西班牙

巴西

俄國

1869年

1060 7

587 1

608 1

1033 4

205 2

1879年

905 5

1758 5

1074 5

1628 2

167 4

1889年

693 2

871 3

976 5

784 4

177 3

1899年

501 5

1044 7

883 2

398 7

1909年

438 5

1015 8

599 5

282 9

1913年

331 0

650 8

532 1

258 3

資 料 來 源 : Mitchell,Britishhistoricalstatisticspp 396-9,402f ;Crouchley,Economicdevedlpment,pp 274ff ;Shaw,"Ottomanexp  
endituresandbudgets,"pp 374ff ;Issawi,EconomichistoryoftheMiddleEast,  
pp 100f ,104ff ;Levy,"Brazilianpublicdebt,"pp 248-  
52;Mitchell,Europeanhisoricalstatistics,pp 370-  
85,789;Martin,Rothschild;Carreras,IndustrializacionEspanola,pp 185-  
7;Gatrell,Rovernment,industryandreamament,pp 140,150;Apostol,Bernat  
zkyandMichelson,Russianpublicfinances,pp 234,239;Hobson,"WaryTitan,  
"pp 505f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 (1874~1885年) (10)

表2-6選擇性年份及國家的債務費用百分比，1860～1910年

英國

土耳其

埃及

西班牙

巴西

俄國

1860年

41 2

15 2

60 1

9 3

1865年

39 3

48 4

6 7

1870年

40 4

29 0

8 0

1875年

37 1

55 5

31 3

9 9

1880年

34 5

28 8

50 7

10 2

1885年

32 8

72 4

10 7

1890年

27 0

11 9

77 6

6 2

1895年

23 1

19 7

37 5

12 2

1900年

16 1

19 3

38 9

15 8

14 2

1905年

16 6



40 5

17 9

9 6

1910年

13 3

33 4

56 2

21 8

15 7資料來源：同表2-5

從戰略高度考慮，英國準備讓負債這個球滾動起來。為了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支援土耳其的軍事地位，英國在1854年和1855年給坡特提供了首批英國貸款（這些貸款的第二批通過倫敦羅斯柴爾德銀行來運作），而土耳其銀行（土耳其帝國銀行）在1856年設立。這兩批貸款以土耳其政府從埃及獲得的全部稅收作為正式擔保。然而，1860年以後歐洲貸給中東地區的款項主要考慮的是經濟利益。在土耳其的這種局勢下，歐洲的鐵路推廣者（由赫希率領）提出了一個奧地利鐵路網的擴張計劃，希望通過巴爾幹連線到博斯普魯斯，並因此為新型的歐洲商業開啟土耳其市場。而當法國具有遠見卓識的企業家費迪南德·德·勒塞普斯看到，如果實現連通地中海和紅海的古老夢想，可以為國際貿易開闢出一條重要的交通生命線，使倫敦到孟買的海上運輸距離縮短將近40%。美國內戰對埃及棉花出口的人為刺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管蘇伊士運河對英國與印度貿易具有特殊重要意義，英國支援土耳其帝國也具有傳統性的外交意義，然而，為土耳其和埃及的赤字提供資助的，在一開始的時候卻並不是英國投資人。在土耳其，1875年以前的主要資助銀行由法國人擔當（著名的有國民銀行）；在埃及，主要是法蘭克福的金融家赫爾曼和亨利·歐彭海姆，以及法國兄弟愛都爾德和安德雷·德維沃。從短期來看，這項業務對發行的銀行來說應該是利潤不菲的業務。到1877年，土耳其的債務達到了2 51億里拉，其中，扣除佣金和折扣後，位於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財政部僅拿到了1 35億。然而，這不僅未能推動中東的經濟發展，那些倒黴的債

券持有人還只得年復一年地為這個揮霍無度的政府不斷提供資金。阿普杜拉·阿齊茲蘇丹在他1867年的歐洲之行中就揮霍了數百萬；而他的繼任者阿普杜拉·馬吉德花得還更多，建造了新的朵爾瑪巴赫宮，這是一座處於皇宮與一座維多利亞風格的火車站之間的宮殿。而那些私人業務，比如赫希的鐵路和勒塞普斯的運河，最終也沒有達到先前所預計的那麼好的效果。事實上，在授予赫希和勒塞普斯特許權的問題上，兩個政府所付出的成本遠遠高於他們所獲得的收益。

因此，羅斯柴爾德家族在1855～1875年在參與中東地區事務中所表現出來的節制，看起來是一種謹慎的亡羊補牢行為。比如說我們已經知道，勒塞普斯早在1854年6月，也就是在從總督處獲得必要的特許權之前6個月，曾經找到詹姆斯尋求對運河專案的支援，但是被婉言謝絕。羅斯柴爾德在都靈的代理人朗道有一個兄弟在亞利桑德利亞，他與歐鵬海姆銀行一唱一和，試圖引誘羅斯柴爾德家族參與19世紀60年代中期給埃及政府籌款的活動，但是最終也沒有得逞。儘管年邁的詹姆斯有些動心，但這次他的侄子奈特的風險意識取得了很少見的成功——而且，理由也很充分。儘管列昂內爾在1867年直接接見了一名帶著禮物的埃及代表，他也很禮貌地回絕了。到1869年，甚至就在運河已經正式開通後，阿爾方索還在預言蘇伊士運河公司將會倒閉，而且倫敦的推論是埃及政府將會緊隨其後。倫敦和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都不看好土耳其的金融前景：安瑟爾姆想通過巴爾幹擴充套件南線鐵路的想法顯然沒有得到他的堂兄弟們的同意。當埃及財政部長伊斯邁爾·薩達克·帕薩在1874年尋求羅斯柴爾德財政支援的時候，他的請求被斬釘截鐵地回絕了。他們能同意做的最多隻是保證威爾第1871年在開羅歌劇院執導他的《阿依達》全球首演式的時候能夠拿到他的報酬。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11）

到1975年年初，仍然沒有明顯的理由讓羅斯柴爾德改變他們的看法。勒塞普斯已經瀕臨破產，因此自1871年開始一直在想著把這條運河賣給一個或者多個歐洲大國，但是土耳其政府一直都在阻撓把任何有關的計劃拿出來討論。格萊德斯通政府也沒有表示出任何興趣，因此，運河的未來變得撲朔迷離，因為關於它的通行費的收取涉及了複雜的法律爭議。迪斯雷利在1874年2月回到權利中心是把羅斯柴爾德家族送上舞臺的第一個關鍵的變化。由於迪斯雷利總是對東方的一切事

物懷有羅曼蒂克的想法--但是又很現實地洞悉了新的"東方危機"的臨近，以及埃及在未來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列昂內爾重提英國購買運河的問題，而且納蒂也因此目的被派往巴黎。對於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常敏銳，他們看到了在埃及運河上覆制他們早先為歐洲鐵路所開創的模式--也就是為大型資產的出售進行融資--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古斯塔夫所報告的，法國政治上對英國購買想法的反對似乎成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當迪斯雷利建議通過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總督在運河上的股份而避開直接購買的問題的時候，金融領域也表現出反對，這反映的是地產信貸銀行、國民銀行和英國-埃及銀行之間的緊密聯絡。

由土耳其首相邁哈邁德·那蒂姆·帕薩在10月7日宣佈了土耳其破產公告，通過削弱總督和他的法國銀行家們的地位使局面出現了轉機。隨著土耳其的破產，埃及很難再借到什麼錢，然而伊斯邁爾需要（他自己也是這樣的）300萬～400萬鎊來支付11月底到期的債務。法國銀行和德維沃提出通過用總督的運河股份做擔保給他提供短期貸款，但是他們不久就陷入了僵局，這給迪斯雷利提供了機會。11月10日，英國財政部請求幫助"重組並控制"埃及金融的說法，發出了總督已經準備轉向英國進行最後一搏的訊號。4天之後，《帕瑪公告》的編輯雷德里奇·格林伍德從亨利·歐鵬海姆處（他那時恰好身處倫敦）打聽到了有關英國-埃及銀行和德維沃進行談判的訊息，並且告訴外交部長德比爵士（不是十分準確）蘇伊士運河股份將要轉到法國人的手上。事實上，地產信貸銀行當時確實建議以5000萬法郎（200萬英鎊）購買那些股份，並且確實已經獲得了這樣做的選擇權。但是法國外交部長德·德卡澤斯公爵的決定是在沒有得到德比的同意之前不做決定，因此就直截了當地否決了。總督因此基本上沒有了其他的任何選擇，只能賣給英國，在11月23日，他提出要400萬英鎊換取他的股份，用購買價款的5%作為抵押，直到被抵押的息券交還並且重新開始分紅。德比和財政部長斯泰福德·諾斯科特爵士不同意這個報價，認為這個運河可以由一個國際委員會進行控制；而當這個議案在11月18日到24日的5次內閣會議上進行討論之後，迪斯雷利最終如願以償了。

在1875年的時候，400萬英鎊是一個很大的數目，相當於整個英國預算債務費用淨值的8 3%。另外，正如迪斯雷利在他11月18日給女

皇的信中所寫的，根本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因為總督要求在"這個月的30日"拿到錢。最大的問題是議會在休會期，因此不是很確定沒有議會的授權，政府是否可以從英格蘭銀行裡籌到這筆錢。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11月24日（或者可能是前一天），迪斯雷利一得到內閣對購買股份的批准，就派他的首席私人祕書蒙塔古·科瑞去見列昂內爾的原因。科瑞後來在回憶中對他的主人生動描寫道：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12）

迪斯雷利安排他在內閣外面值班，當他的領導伸出頭來說"行了"的時候，他應該馬上採取行動。在收到這個訊號後，他馬上跑到紐科特，並且祕密告訴羅斯柴爾德"明天"首相要400萬英鎊。羅斯柴爾德拿起一粒葡萄，吃下，吐出了皮，經過深思熟慮後說："你們用什麼擔保？""英國政府。""你們可以來拿。"

這個說法有部分的臆想成分。總的看起來，首相私下裡應該已經與列昂內爾討論過這個問題，因此，這個決定並不是在一瞬間做出的（迪斯雷利後來告訴威爾士王子，羅斯柴爾德銀行花了"4～20個小時來下這個決心"）。達成的條件是，款項付給英國政府，由埃及政府支配（12月1日付100萬英鎊，餘下的在來年1月份支付），作為回報，他們收取2.5%的佣金；政府另外在還回款項前，支付5%的年利息（儘管這筆費用全部轉嫁給了總督，由他支付5%的年息，直到所購股份可以再次分發紅利為止）。11月25日，合同由英國總領事斯丹頓將軍與埃及財政部長共同簽署；4天之後，列昂內爾電告埃及政府他手頭已備好了200萬英鎊，自12月1日起，埃及政府就可以調配使用（這個金額比起初計劃的多了一倍），12月15日開始可以安排另外100萬英鎊，而最後的100萬英鎊從1876年1月1日起可以使用。到1月5日，N·M·羅斯柴爾德公司付清了全部的應付款額（3976582.26英鎊），其中的大部分直接付給了埃及政府的債主。國會在2月21日投票同意支付408萬英鎊（這筆錢通過發行3.5%的財政債券籌集），而借款在3月份的時候從債券發行募集的款項中進行了賠付，同時還支付了99414英鎊的佣金，應付利息52485英鎊最終在6月2日支付。

對於這個非常出人意料的交易有兩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是迪斯雷利的說法，散見於他寫給當時駐在波爾莫羅的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中。他告訴她，擁有這些股份"會給持有人帶來巨大的--如果不是絕對

的--對運河管理的影響力。在這樣關鍵的時刻，這對陛下您的權威和勢力都是至關重要的"。收購大獲成功之後，他大喜過望，並且十分高興地將這個榮耀與列昂內爾分享。在給女王的信中，他說道：

事情剛剛辦妥，您做到了，夫人。法國政府被我們戰勝了。他們做了很多的努力，提供了高利率的貸款，而且還附帶有條件，實質上是要把埃及政府的權力拿過來。

總督在既絕望又厭惡的情況下，提出讓陛下您的政府購買他的全部股份--以前他對這樣的建議聽都不愛聽。

400萬英鎊！而且是馬上就拿出來。也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得到--羅斯柴爾德。他們的做法很令人敬佩，並且以一個很低的利息借出了這筆錢（好像有"5%"的字樣被劃掉）。總督所有的利益都是您的了，夫人。

昨天，內閣對這個問題討論了4個多小時，而且迪斯雷利今天沒有得到一刻的休息；因此，此次彙報得請求您原諒，因為他的腦袋實在已經不聽使喚了。他將在明天給您講述這整個奇妙故事。

當陛下您今天的第二個電話打來的時候，他在內閣，他為當時他給您做的太過簡單而且愚蠢的回答表示道歉--但是當時的情況確實很緊急。

政府和羅斯柴爾德同意保守祕密，但是我們擔心明天會從開羅走漏風聲。

他給布萊德福德夫人的報告就顯得更加口無遮攔了：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13）

我們已經掌握了全世界所有那些組織起來反對我們、掠奪我們的賭徒、資本家、金融家的情況，那些遍佈世界各地的密探，已經使他們深受困擾，而且從來沒有被懷疑。前天，勒塞普斯提出了一個誘人的報價，他公司擁有餘下的那部分運河股票，而且得到了法國政府的支援，他本人實際上就是法國政府的代理人。如果他成功了，整個蘇伊士運河就會歸法國所有，而他們或許就會關閉這條運河.....女神（維多利亞女王）對運河非常著迷.....

讓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這場外交勝利讓法國所付出的代價。迪斯雷利後來告訴威爾士王子，列昂內爾不能"向他最強大的援軍--他們在巴黎的家族求援，因為阿爾方索是非常法國化的人，他有可能馬上就出賣整個計劃"。按照約翰·曼耐斯爵士的說法，迪斯雷利對他的妙招"相當得意"，而且"期待著英國的海外影響力能因此獲得偉大的復興"。這也讓俾斯麥得以描繪對法國的聲望給予一擊後可能出現的局面；而迪斯雷利用羅斯柴爾德的支援騙過法國政府的這種說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後來由法國反猶太人士，比如希拉剋等人所炒作出來的。

另外的相反說法--準確地說，是反對的說法--很讓人疑惑，這種說法認為迪斯雷利最起碼是欺騙了自由黨人。格萊德斯通馬上嚴陣以待。他給格蘭威爾寫信時說："我找不到任何藉口來為他開脫，除了有必要防止運河的關閉之外。而.....關閉倫敦和西北（鐵路）之間的可能性也存在。"甚至購買已經"在與其他大國協調一致的基礎上"完成之後，也還被說成是"荒唐的舉動，將來還會遭遇數不清的尷尬"。他所預見到的是"嚴重的後果"。按照格萊德斯通的看法，合理的行動過程必須經過議會的質詢以及英格蘭銀行的參與。但是格蘭威爾在11月28日給格萊德斯通的信中提到的只是一系列不很成熟的問題。"至於說我的第一印象，"他寫道，"我懷疑，這看起來非常愚蠢。"但是他也不確定原因是什麼。這個"沒有先例.....讓政府成為一個私人企業的股東之一，而按通常的方式看，他們又沒有辦法控制這個企業"的做法能行嗎？

採用政治手段去引導並調整其他國家採取預防措施還不夠有效嗎？

不可能是勒塞普斯和羅斯柴爾德家族以法國資本家可能購買相威脅，來欺騙政府去做推高蘇伊士運河價值的事嗎？

政府是否打算在公開市場上以已經被推高的價格購買另外的10萬股股份，以便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他們這樣做，那些股東是否還會給他們惹來無盡的麻煩？

這是否將會引起各種國際麻煩和問題？

運河是否仍然受屬於蘇丹的那種自由意志所支配，而我們也是一直追求這個目的？

沒有徵得議會的同意，能否承擔如此巨大的責任？

"我認為，"他在提出這些清楚明瞭的問題後這樣總結道，"我們現在能讓蘇伊士運河越平靜，對我們就越有利。"這種觀點得到了哈亭頓爵士的附和，在格萊德斯通辭職後，他是自由黨正式的領袖，而且他也意識到了迪斯雷利這招棋的深厚的群眾基礎。

因此，輪到前財政部長羅伯特·羅爵士來對格萊德斯通這種本能的反對尋找支援。在迪斯雷利嘲諷地預言"一場反對一個股票經紀政府的謾罵中"，羅認為羅斯柴爾德的總收入--15萬英鎊，對於一項三個月期的400萬英鎊的貸款來說，年息達到了15%，這個數字應該更適合給埃及政府，而不是英國政府（這種觀點明顯得到了部分財政部官員的認同，包括財政部長W·H·史密斯）。自由黨批評家也拿出了格蘭威爾的說法，對這些股票的購買行動引發了"對股票交易進行的賭博"--也就是那些知道內幕的人對埃及債券的投機，這些人具體說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之後迪斯雷利的律師菲利浦·羅斯的說法證實了這一點，他深信羅斯柴爾德家族"獲利非常豐厚"，他們"購買了大量的埃及股票"。迪斯雷利自己也聽到謠傳，說他們"至少賺了25萬"，儘管蒙塔古·科瑞聽到另外的說法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一點都沒有利用這個情報，因為他們把自己放在了與政府站在一起的位置上"。另一個持反對態度的說法是一個老生常談，他們認為，作為一個國會議員，納蒂被禁止從政府的貸款裡盈利；對這個說法的駁斥更容易，論據就是納蒂並不是銀行的完全合夥人，而列昂內爾在1874年就沒有在議會裡任職了。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14）

真相其實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從政治上說，認為英國就此確保了控制權，而且阻止了法國的前進的這種說法其實並不十分準確。按照沃爾夫的說法，法國政府反對任何法國人購買，因此他們對英國出手干預埃及危機是樂見其成的。持有運河公司44%的原始股份也沒有讓英國就能控制整條運河（特別是這些股份一直到1895年之前都沒有投票權，而且之後也只有10票的表決權）。另一方面說，總督保證支付運河股份5%的紅利讓英國政府在埃及財政中擁有了新的直接的利

益。迪斯雷利認為運河公司可能會對英國商船關閉大門的看法是錯誤的，從法律上說，情況根本就不會是這樣。然而另一方面法律並不能保證運河一定對所有船隻開放，而且法律規定也不可能隨時都被遵守。正如迪斯雷利準確地說過的，擁有這些股份能讓英國擁有額外的"槓桿"--對報復行為有更強的調節能力--如對其交通出現威脅的話。這個觀點得到了《時報》以及其他銀行家（包括歐維爾斯通爵士）的認同，而且以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這似乎也是正確的。如果法國政府對購買行為完全滿意，那麼羅斯柴爾德家族似乎也就沒有必要在11月23～25日之間如此嚴守祕密。古斯塔夫在12月31日的信中指出，最初想到英國可能接管埃及的時候，在巴黎引起了"恐慌"。兩週之後，他的哥哥轉達了來自法國政府非公開的警告："如果英國政府現在通過另外方式的金融行動來拯救總督，進而控制這個國家的主要稅收，以這樣的方式來進一步加強對埃及事務的影響力的話，法官政府的地位將受到威脅....."

從經濟上看，自由黨人的批評家是站不住腳的。正如迪斯雷利在下院對格萊德斯通和羅一次不留情面的反駁中所指出的，羅的說法低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籌措如此鉅額的資金所花費的機會成本，儘管這筆錢的使用時間或許只有3個月，特別是法國或者俄國政府採取外交行動的可能性還不可能完全排除（羅斯柴爾德從巴黎和法蘭克福發出的信完全證實了這種外交行動的可能）。當聽到股票經紀人阿瑟·瓦格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應該免費提供這筆錢的時候，列昂內爾只能苦笑。"阿瑟·瓦格，"他反駁道，"你太年輕了，以後你會明白的。從這項交易中我賺了10萬英鎊，我的希望是能賺20萬英鎊。"正如他在2月19日向科瑞指出的，這筆交易確確實實有風險：總督有可能堅持要用黃金支付；"不可預見的事件"有可能讓市場上的資金面很緊張；另外，政府"之前很習慣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做生意，有可能會要求公司做一筆涉及大量備用付款的交易，如果發現羅斯柴爾德的公司無法達到要求，他們就可能考慮把業務轉到他人之手"。而且，如果沒有預先的接觸，沒人敢保證英格蘭銀行能夠提供這筆錢。正如科瑞在他面見列昂內爾之後告訴迪斯雷利的：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只有通過全體董事會議來決定，但這又明顯達不到效率和保密的要求.....羅斯柴爾德男爵想象，政府很有



可能壓著銀行去找那400萬（並且會要求付很低的佣金）。這必將是一件很激烈的事，在這件事情實施之前，他們必定得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去向各家公司籌錢。他也明確宣佈，英格蘭銀行不把整個資金市場鬧得人仰馬翻，就不可能籌到所需的這個數目。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15）

列昂內爾最後說道，"完全避開了這種對市場的干擾"這個理由對"所提出來的佣金是最好的解釋"。

這些說法不能簡單地看成是狡辯。羅斯柴爾德的損益表也駁斥了格蘭威爾和羅所提出的那種大規模投機埃及債券市場的說法：1875年的報表證明羅斯柴爾德出售了價值12682英鎊的1873年埃及債券，這些債券以55元的成本買進，而在11月26日以76元賣出，總利潤只有3505英鎊。這次交易的財務意義應該是給了像地產信貸銀行這樣的法國銀行以喘息之機，這些銀行持有非常大量的埃及債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運河股份的購買根本就不能算是打擊了法國的利益。最後，這些股份的購買最終證明是對英國納稅人非常有利的一個安排，這種有利的情況遠遠超出了批評家的預期。到1876年1月，股票價格就已經從22 104鎊上漲到了34 126鎊，差不多50%的漲幅。在1898年政府持有股票的市值是2400萬英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是4000萬英鎊，而到1935年是9300萬英鎊（大約每股合528英鎊）。在1875～1895年間，政府每年從開羅獲得了20萬英鎊；這之後，按正常分紅，分紅的金額從1895年的69萬英鎊上升到了1901年的88萬英鎊。

### 其他的東方問題

正如歐維爾斯通和其他人所意識到的，運河股份的購買只是一幕英國大規模參與埃及金融事務（最根本的是參與政府事務）的序曲，它同時也發出了英國決定在東方的共性問題上重新發揮影響力的訊號。早在1876年7月，柏林就到處盛傳"英國政府已經用1000萬英鎊購買了埃及的主權"。然而，如果將1875～1882年軍事佔領期間的道路描繪成一條直線的話，那就完全錯了；而且如果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急不可耐地想走上這條道路，也同樣是在誤導。緊隨蘇伊士運河的這招妙棋之後，德比派出了斯蒂芬·凱伍前往埃及，作為對總督早些時候提出要求英國財政援助的迴應。凱伍的首要目標是建立起對埃及經濟進

行某種控制的體系，至少要保證剛購買的運河股份5%的利息能夠得到持續的支付。隨之而來的是需要羅斯柴爾德家族幫助對埃及政府的多種債券進行清算和轉換--這種觀點得到了國債辦公室的主審計長查爾斯·雷伍爾斯·威爾遜的支援，他當時是英國政府在蘇伊士運河委員會裡的代表，而他們私人間的通訊證明羅斯柴爾德家族是非常勉強帝國主義者。從很早的時候開始，他們就明確反對公開發表凱伍的報告，並且向迪斯雷利強調"讓我們自己處理這種大規模金融事務所面臨的困難"。他們的勉強部分原因是基於狹隘的金融考慮：儘管對於小規模投機埃及債券非常樂意，但是列昂內爾和阿爾方索仍然覺得凱伍和雷伍爾斯·威爾遜低估了在伊斯邁爾仍然留在總督的位置上的時候想穩定埃及經濟所面臨的那些困難。

還有就是政治上的保守。列昂內爾和阿爾方索對維持大國間--在這個案例中是法國和英國--的和諧更為關注，而對埃及的金融控制則顯得熱情不高。事實上，正是通過阿爾方索，英國政府第一次瞭解了法國總統邁克馬洪的妥協性提議：由一個多國委員會來監督埃及的經濟情況，委員會由包括來自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代表平等組成。艾爾弗雷德從巴黎轉達了德卡茲對德比那種支支吾吾的態度的"憤怒"，並且警告政府不要對法國的建議"潑冷水"。列昂內爾轉達了迪斯雷利的迴應："他們希望法國政府能做一個很好的計劃，而不是隻做把錢裝進自己的腰包，卻對總督沒有任何好處的事。"困難的是在那些持有含息埃及債券的人與那些--主要是法國和埃及的銀行--給總督提供了短期借款的人之間存在著利益衝突。從本質上說，債券持有人不接受那些短期借款人有與他們同等的申索權，因此否決了對所有埃及債券總體減值20%的方案，然而這個減值方案得到了英國政府的支援。這次否決使5月份新建立的公共債務信託局陷入了癱瘓。如果英國和法國不能達成一致，羅斯柴爾德家族只可能拒絕重組埃及債務的任務，因此只能將待清算的大約為7600萬英鎊的債務留給一個調查委員會去處理（這個數字不包括1500萬用總督的土地擔保的私人債務，以及一份鉅額的可能高達600萬英鎊浮動債務）。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16）

在1878年之前，這些困難似乎都沒有辦法克服。在成立了一個由各家銀行的代表、勒塞普斯、雷伍爾斯·威爾遜以及一名埃及人組成的

委員會後，由他們推薦，委派了一個由努巴·帕薩領導的"國際政府"，雷伍爾斯·威爾遜出任財政部長，法國人尤金·德·布利格尼爾斯出任公共工程部部長。與此同時，英國和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同意籌措850萬英鎊的貸款，以總督領地中的大部分土地作為擔保。這次貸款籌措除了帶給投資人極大的信心之外，其重要意義更在於它讓人們覺得英國和法國之間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爭鳴雜誌》說得更誇張，把它描繪成"相當於在法國和英國之間結成了聯盟"。這據說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最希望看到的局面。然而，這與投資人對埃及的信心一樣，同樣註定是短暫的。

英國和法國的埃及政策不應該孤立起來看，這只是土耳其債務危機這部長篇小說裡的一小個章節，而這次債務危機是總督出售蘇伊士運河股票的前提條件。土耳其債務危機也需要放到大國外交的背景下來看，這終歸是由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保加利亞省發生的反對土耳其統治的起義所引發的。這是俄國外交官夢寐以求的用於對外政治理由的藉口，而且也是英國自由黨人非常需要用於國內政治的口實。如果說羅斯柴爾德在埃及的作用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那麼他們在1875～1878年的巴爾幹危機中的地位也基本上是這樣的。他們對迪斯雷利的同情很自然地使他們傾向於支援他那本質上支援土耳其的政策，但是，他們對俄國的金融承諾直接與此相左。

從1870年10月開始，俄國就對土耳其施行了"進攻"政策，當時沙皇駁斥了1856年《巴黎協定》的《黑海條約》。確實，海峽結束中立狀態後--海峽的中立是克里米亞戰爭為數不多的、實實在在的成果之一--應該在倫敦的國際會議上得到其他大國的同意。俾斯麥在"三大帝國"聯盟的旗幟下聯合德國、奧地利和俄國的政策，在19世紀70年代早期似乎限制了俄國的巴爾幹政策。然而，發生在俄國與英國之間的針對土耳其事務的衝突極有可能實現迪斯雷利打破三大帝國聯盟的夢想。1875年夏天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起義一爆發，迪斯雷利馬上指責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煽動分裂土耳其帝國。事實上，無論是奧地利-匈牙利外交大臣安德拉希，還是其俄國的戈爾查科夫，都會滿意於一個對土耳其採取"有效的手段"的六大國協議，而德比很可能會接受這個做法（與法國和義大利一致）。但是，迪斯雷利對此沒有興趣。

1876年5月26日，列昂內爾寫信給迪斯雷利："我希望很快能就一項達成的安排向您表示祝賀，這項安排將由於一項有力而堅定的政策，可以保證之後很多年的和平。"事實上，向貝斯卡灣派出艦隊的舉動，尋求分裂三大帝國聯盟的"有力政策"的努力，幾乎把英國引向了戰爭。蘇丹在1876年5月退位，塞爾維亞和黑山隨即在6月份加入到了反土耳其起義的陣營中，而"保加利亞暴行"--其間，據稱有15000名保加利亞基督徒被巴希-巴祖克斯的土耳其準軍事組織殺害--給了格萊德斯通重新復出的非常完美的機會。當6月9日迪斯雷利在列昂內爾家的一次晚宴上碰到俄國大使蘇瓦羅夫的時候，他對英國孤立的外交政策的不滿之情溢於言表。事實上，當印度部長薩利斯伯利爵士到君士坦丁堡出席由德比召集的國際大會的時候，他傾向於同意俄國特命全權大使伊格奈特耶夫提出的土耳其應該授予被分割的保加利亞自治的權力。同時迪斯雷利很魯莽地企圖收買奧地利退出三大帝國聯盟--"你開價多少"是他很生硬的問題--的企圖無功而返。列昂內爾在9月8日給迪斯雷利的信--給首相提供鼓勵和金融界情報的一系列的信中的一封--確認他正面臨"一場非常困難的山頭攻堅戰"。如果英國和俄國之間在1877年6月發生戰爭，迪斯雷利和戈爾查科夫幾乎應該負有同等的責任，或許還應該更多。因為事實上，他在這個問題上與兩名資深的大臣（德比和卡納萬爵士）背道而馳。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17）

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這樣一場戰爭的前景是非常堪憂的，尤其是在為了一個高尚的理由的時候。在1870～1875年之間，倫敦和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聯手發行了總價值為6200萬英鎊的俄國債券，最後終於圓了長期以來一直使他們耿耿於懷的影響俄國金融的夢想。這是一個盈利非常豐厚的生意：這隻5%利率的俄國債券的價格從1870年3月的85，上漲到了1875年8月的106，上漲比例達到了24%。1875～1877年的東方危機不僅僅遏制了這個上漲的勢頭，而且引發了價格的節節下跌--1876年10月跌到了74，而當俄國在第二年4月向土耳其宣戰的時候，又跌到了68。這種情況在所有歐洲主要市場的絕大多數政府債券上都有反映。納蒂自己後來稱這場1878年的金融危機為"有史以來英國金融史上"最大的危機，它以格拉斯哥城市銀行的倒閉為開端，以英格蘭西部銀行的破產為頂點。列昂內爾和納蒂（因為他正準備繼承

他那已經病痛纏身的父親的財產和職責）所面臨的困境是相當嚴峻的：他們應該支援俄國嗎？眼睜睜看著土耳其帝國受辱甚至是滅亡，而所有這一切可能意味著將殃及埃及和英國本身也在所不惜？

他們選擇了土耳其，把1877年的俄國貸款讓給了由門德爾鬆率領的銀團，而法國的那些股份合作制銀行--著名的有貼現銀行和里昂信貸--在一旁虎視眈眈。迪斯雷利可以在8月份拍著胸脯向女王擔保，羅斯柴爾德家族"對俄國現有的政策極端討厭，而且已經拒絕了幫助沙皇渡過目前的難關的請求"。這是一場真正的犧牲，因為這樣的舉動或多或少在隨後的15年間將羅斯柴爾德家族排除在俄國的金融活動之外。這不能只用他們在土耳其帝國的經濟利益來解釋，因為在1877年的危機期間幾乎就見不到什麼利益。巴爾幹地區主要的鐵路特許權掌握在赫希的手裡，他們仍然繼續排斥來自君士坦丁堡尋求金融支援的請求，而且第一筆稍大的給埃及的貸款一年多以後才貸出來，唯一可信的解釋應該是來自非經濟方面的。

格萊德斯通和羅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在蘇伊士運河股份的購買過程中作用的攻擊，極大地破壞了列昂內爾對政黨政治的忠誠基礎。更為重要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認為一個斯拉夫民族主義在巴爾幹地區的勝利從他們"宗教共存"的觀點來看並沒有什麼必要。格萊德斯通自從1876年9月印發了他的小冊子《保加利亞恐慌以及東方的問題》後，就發動了他反對迪斯雷利政策的一次宗教聖戰運動。從其最根本的性質來看，這種站在巴爾幹基督徒的立場上的訴求，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其他有錢的猶太人，像戈爾德施密特）的利益的影響有限，特別是投票人總是能記起迪斯雷利的猶太人血統--還有他的那些支持者。正如德比評論的："格萊德斯通.....指責'猶太虔誠'的影響，並不僅限於那些自稱是猶太人的人，關於東方的問題是否是指迪斯雷利，還是指那些明確的猶太人，抑或指羅斯柴爾德.....所有這一切完全都是模糊的。"列昂內爾對那些攻擊土耳其，而對於"起義和騷亂的原因"隻字未提的"所有這些工作聚會"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他所關心的與他們十分不同，這可以從他寫給迪斯雷利的信中看出，這封信在柏林的議會大會上被大聲地讀了出來，是關於東歐（特別是羅馬尼亞）的猶太人迫害的，他希望這種情況能引起大家的重視。阿爾方索也試圖通過佈雷希羅德對俾斯麥施加同樣的壓力。最終定案的《柏林協定》

的第44款，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眼裡明顯要比七彎八扭的對於保加利亞的妥協有價值得多，而《柏林協定》目的就是保護巴爾幹地區各種信仰相互依存的。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18）

列昂內爾因此對迪斯雷利的政策給予了毫不含糊的支援。"我是多麼高興看到，"他在1877年3月底的時候寫道，"一個愛國主義者的成功，而且只是通過政策的調整所取得的--由於您偉大的堅毅和政治家風度，使我們終於可以充滿信心地期盼不久之後就可以為一個普天同慶的和平向您表示祝賀。"納蒂也向蒙塔古·科瑞確認了他對土耳其毫不動搖的同情。在整個危機期間，他們定期地向迪斯雷利送交他們從歐洲大陸收集來的情報的彙編，並且也作為與維也納聯絡的一個非官方渠道。例如在8月份，迪斯雷利向女王報告說，他已經"下定了決心，就這個問題祕密地去徵詢羅斯柴爾德先生的意見"，他所說的這個問題就是俄國有關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中立給奧地利的承諾。"他們正頻繁地與奧地利皇室進行接觸。羅斯柴爾德男爵同意給家族在維也納的負責人發電報，而且我們要求他在做任何推進之前，在他們收到不同於當時通行的說法的資訊回覆兩天後，他應該從安德拉希公爵處得到對有疑問的問題所做出的明確表示....."這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與首相的親密關係，這讓其他關鍵的外交人物--包括俄國大使和英國外交部長--都確切地感覺到自己被邊緣化了。"蘇瓦羅夫告訴德比夫人，他發現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所發生的一切瞭如指掌。"德比在1877年12月抱怨道：

與那些大臣相比更是這樣，他證實了他們每天都保持著與首相的聯絡，得到所有提交過去的資訊並用於他們自己的目的。通過從其他途徑得來的訊息，我敢肯定，我們時常抱怨的內閣機密的洩漏，主要就是就是在這個環節，因為當貝肯斯菲爾德爵士出城的時候，通常很少有那一類的流言飛語.....羅斯柴爾德家族毫無疑問是自己直接得到的訊息。

迪斯雷利與羅斯柴爾德之間的關係也不是沒有引起自由黨領導層的注意。"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行為非常討厭。"格蘭威爾這樣向格萊德斯通報告，時間是1877年8月，也就是格萊德斯通在下院提出了他的《女王陛下政府已公佈政策的重大或者事實變更的決議案》之後3個

月。4個月之後，當"N·羅斯柴爾德聽到一個盛怒的土耳其人嘲弄迪斯雷利打算開戰的說法"的時候，他憤怒了。"他說土耳其人把自己置於他的掌控之下（一個非常令人嚮往的信任），還說俄國人將會放棄。"按照納蒂的說法，"迪斯雷利的意思並不是為反對將海峽向所有的戰艦開放而發動戰爭"。這跟他後來告訴歷史學家J·A·弗勞德的完全不一樣。納蒂曾經試圖勸說J·A·弗勞德"按照他的觀點"去寫一本迪斯雷利的傳記，但是沒有說動。納蒂後來在回憶中說"他（貝肯斯菲爾德勳爵）決定支援戰爭，這對於他的政策來說是必要的：這是女王強壓著他這樣做的.....而他面臨著他碰到的那些每天在內閣進進出出的反對黨人的指責"。

無論是否有詐，迪斯雷利都是幸運的。第一，俾斯麥選擇的是不支援戈爾查科夫和伊格奈特耶夫，他擔心俄國人太完美的成功可能會讓奧地利-匈牙利從大國的位置上降級。第二，俄國人在1877年12月在普列文的進軍被察覺的時候，他們開始在軍事上顯得非常躊躇。第三，他們在矢口否認他們以前讓奧地利-匈牙利佔有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保證的同時，試圖通過《桑·斯特法諾協定》建立一個新的"大保加利亞"的做法上手伸得太長了。所有這些使薩利斯伯利在取代德比於1878年春出任外交部長後，肩上的擔子變得比以前輕鬆了很多。在結束了一系列與俄國（得到了比薩拉比亞和巴圖）、土耳其（把塞普勒斯讓給英國以換取英國對它的亞洲領土的保護）以及奧地利（允許它佔領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以及位於塞爾維亞和黑山之間的諾伍巴扎州）的一番討價還價之後，薩利斯伯利快步走向迪斯雷利在柏林的外交"勝利"。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19）

柏林到底獲得了多大的勝利？這個問題事實上也是見仁見智：把保加利亞分成了三份的瓜分方案--獲得自治的保加利亞，仍然處於土耳其宗主國統治之下的東魯梅利亞，以及仍然作為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的馬其頓--看上去似乎並不是最終的解決方案，而且土耳其對其在巴爾幹地區的勢力並沒有打算完全放棄。可以肯定的是，俄國的軍隊到1879年底的時候已經從巴爾幹地區撤出，而迪斯雷利毫無疑問地重新建立起了英國在東方問題上的外交主導地位。他也很滿意地看到俄國與德國和奧地利-匈牙利之間產生了紛爭。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迪斯雷

利的熱情讚揚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無論如何，這種可以讓人產生無限遐想的處理方式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得到了柏林國會的肯定。

在1879年4月，總督解散了"國際"政府，這個政府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埃及納稅人的牴觸。解散政府導致羅斯柴爾德新發行的債券的價格一落千丈。而通常的看法是，從這一刻起，納蒂開始對英國在埃及的軍事幹預產生了動搖。但這其實並不正確。納蒂接受雷伍爾斯·威爾遜關於"政府一紙詔書，馬上就廢除了總督，這一行動得到了列強的支援，幾乎與此同時任命了他的長子"圖菲格的說法。但是他反對暫停1877年的貸款，這位前大臣相信，這會使這次解散"國際"政府的後果得到加強，他宣稱他和他的法國堂兄"強烈反對威爾遜取消貸款的提議，他們認為這個建議所提出的做法非常卑劣"。再一次，他們的目標是格萊德斯通不大可能有理由反對的：一次與其他列強協商一致的行動，廢黜伊斯邁爾，用圖菲格取而代之。然而，過去那些在不同的債權人之間存在的紛爭又再次浮出了水面。很自然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第一要務是重建他們1877年債券的保障體系，而這個目標並不被持有早期埃及債券的投資人所認可。一直到1879年12月，他們才得到了奧地利和希臘政府的同意，並達成了一項妥協，確定了用於羅斯柴爾德貸款擔保的土地範圍，同時也沒有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無論如何，新的政權--完全置於一個新建立的以英國和法國為主導的清算委員會的控制之下--與它的前任幾乎同樣短命。就在幾個月之內，這種"雙層控制"的體系分崩離析，再也沒有恢復。

### 從投資到投兵

格萊德斯通在贏得了1880年春季選舉的勝利之後沒有浪費一秒鐘，讓羅斯柴爾德家族馬上就陷入了最糟糕的境遇之中。他緊隨土耳其的另一次破產宣告掌握權杖，而且幾乎是馬上就尋求代表規模龐大而又幾乎互不相關的土耳其債權人組織某種形式的經濟制裁，他自己作為這個組織的成員。除了按照在柏林達成的協議，從土耳其撤出英國的軍事領事，並迫使土耳其政府對希臘和黑山做出讓步外，他老謀深算地佔領了斯邁爾納港口。這個做法讓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常擔憂，至少是因為像納蒂對迪斯雷利指出的，斯邁爾納的稅收已經抵押給了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1855年貸款的擔保。他提醒迪斯雷利，只有俄國或許還有義大利似乎會支援這個政策，納蒂預言，格萊德斯通的"傲



慢"將會導致很複雜的國際局勢："在股票交易所，人們都在說，歐洲音樂會的門票已經在廣為發售。""如果其他大國不同意，"他在10月8日告訴佈雷希羅德。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20）

沒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像格萊德斯通這樣感情用事而又喜怒無常的人，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如果他繼續獨斷專行地與俄國和義大利狼狽為奸，這將會給人造成最壞的印象，而且不會被大眾所接受。只有一個人可以應付這種糟糕的局面--這個人就是俾斯麥親王，他可以讓埃及恢復秩序。因此，人們都在期待他能接手這個難題。

當格蘭威爾在那天早上拜訪德國大使曼斯特公爵的時候，他看到艾爾弗雷德已經在那裡了。"當他和艾爾弗雷德·羅斯柴爾德看到對方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有一點尷尬。"格蘭威爾這樣告訴格萊德斯通，"我問羅斯柴爾德想知道什麼。曼斯特說，他來告訴我，他知道那是斯邁爾納。"納蒂覺得很肯定"格萊德斯通會獨斷專行地繼續走下去"，但是納蒂也很有信心，認為他也做不到--"如果不徵詢其他公使（外國大使）的意見。英格蘭沒有德國的同意就不會行動，根本不會只跟俄國來往--我對我的看法有充分的理由。有最好的訊息來源的人告訴過我，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前所未有的強硬"。

正如後來出現的情況，格萊德斯通不需要佔領斯邁爾納也能達到他的目的。1881年12月20日，蘇丹頒佈了《齋月敕令》，宣佈削減土耳其的債務以及每年的收費，並且建立一個新的土耳其公共債務管理局，這是得到了債券持有人首肯的對防止列強以柏林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的相關條款為口實，進行直接干預的搶佔先機的正式行動。實際運作過程中，在管理局中的不同國家的代表的任命都預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而且管理局的最高職位由英國和法國的代表輪流擔任，這給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埃及"雙層控制"體系（儘管有例外，比如像菸草壟斷分派給了一個由維也納羅斯柴爾德家族、商工銀行和佈雷希羅德等共同組成的銀團）。格萊德斯通又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而對此羅斯柴爾德家族幾乎無法反對。儘管阿爾方索在保持土耳其經濟的穩定問題上一直都保持著剋制，但他們還是在獲得了新的特許權後又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貸款，一次在1891年，金額是690萬；另一次在3年之

後，金額是900萬（與土耳其銀行合作）。很顯著的特點是，與他們1855年的土耳其貸款一樣，這兩次也是用埃及的賦稅作為擔保。

為深刻理解《齋月敕令》，有必要分析一下這一時段內歐洲各個大國之間外交關係的變化。在俄國與土耳其的戰爭之後，俾斯麥曾經努力想在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俄國之間恢復三大帝國聯盟，這項努力以1879年10月與奧地利建立祕密共同防務聯盟為起點。接下來就是俄國，他隨後即鼓勵俄國尋找與奧地利的某種形式的相互諒解，最終在1881年6月達成了第二次三帝國同盟。從本質上說，這是一份三國之中的任一國家與第四國交戰時其他兩國保持中立的協定，而它有關巴爾幹地區的條款是它最為重要的方面。與土耳其的衝突不包括在聯盟關係的規定裡，但是奧地利-匈牙利實質上同意讓俄國自由"團結"保加利亞，而與此同時，俄國接受奧地利吞併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這個地方在柏林大會的時候就已經在它佔領之下）。另外，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建立起了一個等同於保護國的體制，在1881年的時候承認了米蘭國王，而在兩年之後，得到了德國的承諾，保護魯瑪尼亞不受俄國的攻擊。與此同時，一個十分獨特的三國聯盟於1881年5月在德國、奧地利和義大利之間形成，部分原因是為了直接反對法國的地中海擴張戰略（其訊號是1881年佔領了突尼西亞），但是也獲得了義大利在奧地利與俄國發生戰爭的時保持中立的承諾。在三大帝國和三國聯盟之間很明視訊記憶體在著矛盾，但是如果奧地利和俄國之間沒有戰爭，這個矛盾就是隱性的，而且，三帝國同盟在1884年3月的修訂也沒有遇到多少困難。1878年在柏林簽訂的協議非常快速地解體了。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21）

這給英國和法國留下了什麼呢？答案是如果他們在埃及的關係惡化，他們之間就很有可能彼此孤立--除非是支援俄國的政策被某方或者雙方所接受。英國與俄國相互諒解的機會在俄國的影響力從中亞向波斯、阿富汗和拉吉西北前線擴充套件的時候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儘管共和制與沙皇體制存在巨大的政治差異，法國-俄國的親善關係更有現實的可能，而且對這樣一種局面的擔心在很多方面是瞭解俾斯麥精心佈局的鑰匙。從本質上說，他能夠讓德國在殖民地爭端中不僅扮演經紀人的角色，甚至可能是潛在的同盟者。

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顯然被這種可能性所吸引。1880年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政策因此也變得越來越多地受俾斯麥的影響，佈雷希羅德最終能夠扮演中介的角色，而他的這種想法以前則一直遭到拒絕。俾斯麥這位曾經的經濟穩定的毒藥，在19世紀80年代顯然成為了經濟穩定的保護者。當英國大使艾姆梯爾爵士在1882年拜訪過佈雷希羅德後，他報告說他看到了一份來自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電報，想了解關於愷撒健康狀況的最新訊息。"我詢問佈雷希羅德，法國的金融家認為皇帝的辭世對巴黎交易所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總體下跌10%~15%。'他回答道，'因為在一個新的君主統治下，俾斯麥的任期很不確定。'"一年之後，納蒂告訴德國駐倫敦大使，英國和德國之間的相互諒解是"除了少數幾個大臣外最有理智的英國人"所期待的。事實是在1881年之後，土耳其債務比例的上升被柏林的資本市場所吸收--由德意志銀行扮演領導角色--為解釋這種親德國的浪潮的出現提供了答案。

從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觀點看，英國-德國的親善關係不利的方面是，這似乎潛藏著損壞英國-法國關係的可能。事實上，當由阿拉比·帕薩領導的反對圖菲格總督無能統治的愛國武裝起義使埃及的"雙層統治體制"陷入癱瘓後，這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法國1880年在摩洛哥以及次年在突尼西亞出現的威信掃地的情況，可以解釋格萊德斯通政府為什麼對啟動英國-法國干預的政策不是太熱心的原因。這與格萊德斯通式的關於對埃及事務干預本身的神經質基本沒有關係，他曾經在非常短的時間範圍內，命令放棄了亞利桑德利亞（1882年7月），又推翻了阿拉比（9月）。

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這一系列的驚人事件中的作用，從根本上來說是在英國和法國政府之間做調停工作。在倫敦方面，這已經非常困難，因為納蒂和格萊德斯通相互之間根本不信任；他們在法國的政治地位使這項工作更加困難，但是為大眾聯合銀行的危機幫了個大忙。

大眾聯合銀行的興衰作為左拉小說《金錢》的原型在前文中已經有所提及。現在讓我們把它與第三共和國和東方問題的複雜政治背景結合起來看，因為在這些問題中，它曾經在一定時間內扮演了幾乎與蘇伊士運河同等重要的角色。從根源上看，大眾聯合銀行產生於由朗格朗德·杜蒙梭發起並由赫希在19世紀60年代末繼續推進的，建立一條

通過巴爾幹地區聯結君士坦丁堡的鐵路連線線--東方鐵路--這個巨集偉計劃之中，但是這個計劃在土耳其破產以及《桑·斯特法諾協定》把這原本屬於土耳其的特許權部分轉給了新近獨立的巴爾幹國家之後，遇到了很大的麻煩。保羅·尤金·邦圖斯是一名名不見經傳的法國鐵路工程師，在於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動手構築自己的奧地利-匈牙利商業帝國之前，他曾經為帝國與皇家御準奧地利國家鐵路公司和羅斯柴爾德擁有的南線鐵路工作過。開始的時候，他希望把法國的資本引到中歐的業務中。然而，當他於1878年從南線鐵路離開的時候，他非常清楚需要在維也納建立一個新的金融機構來挑戰羅斯柴爾德-商工銀行集團的統治地位。如果說在1878年以2500萬法郎的資本金重新啟動大眾聯合銀行是第一步，那麼第二步就是在1880年建立奧地利土地銀行。在奧地利財政部長塔夫的支援下，本圖克斯購買了奧地利-匈牙利鐵路和煤礦的股份，而且還試圖在開發連線貝爾格萊德、君士坦丁堡和薩羅尼卡的鐵路的時候取代赫希。後來他開始進行多元化投資，所以大眾聯合銀行在整個歐洲大陸建立起了廣泛的控股關係。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22）

然而，大眾聯合銀行基本上也就是按照地產信貸銀行模式建立起來的另一家信託投資機構。與之前的朗格朗德·杜蒙梭一樣，本圖克斯採用教皇至上以及對抗羅斯柴爾德的藉口來鼓動那些自我意識比較保守的天主教投資人到他那兒存款。衛道士德·恰姆博德伯爵是那些投資了大眾聯合銀行股份的人之一。對這個企業的規模不應該被誇大：在其最頂峰的時候，其資產略高於

3800萬法郎。然而，本圖克斯增加其名譽資本的做法遠遠超過了他所能募集的真實認購，這也就意味著大眾聯合銀行是一家投機性的、不切實際的企業，其長期投資類的資本項下是赤字，而用來彌補資產負債表的是短期的存款。到1881年12月，面值為500法郎的股票站上了3000法郎，但是銀行的預計利潤只是預估數，一點也不真實，而且儘管本圖克斯自己不承認，大量的大眾聯合銀行的股份（超過10000，價值約1700萬法郎）由銀行自己掌握。到1881年年底，由於法蘭西銀行開始推高利率，因此，其投機泡沫接近破滅。在1月4日後的兩週之內，股價從3005下跌到了1300；而到了1月31日，大眾聯合銀行不得不暫停支付。在他被判犯有金融行為不當罪，並且逃到西班牙

後，本圖克斯反覆聲稱他是一個"猶太陰謀的犧牲品"，但是他根本沒有任何證據支援。事實上，就是靠一筆來自主要的巴黎大銀行的貸款--其中羅斯柴爾德家族貢獻了1000萬法郎，才使巴黎的金融市場能夠倖免於一場多米諾骨牌式的金融倒閉風潮。（我們將會看到，這種形式的集體救援在8年後的巴林銀行倒閉中再次在倫敦採用。）

大眾聯合銀行倒閉的歷史意義主要在於其倒閉的時機選擇上。因為在1881年11月，倒閉發生的前夜，萊昂·甘必大成為了法國總理，他施行（表面上看起來）對外冒險、對內激進的政策。儘管導致他在位僅兩個月就下臺的直接原因是選舉改革的議案在國民大會遭到慘敗，但是也有可能是1月份的金融危機真正地擊垮了他，使他的大規模債務轉換和鐵路國有化的嘗試遭遇失敗。這些證據仍然是推斷性的，但是毫無疑問，甘必大的倒臺（以及萊昂·塞回歸財政部）受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從國際觀點的角度的歡迎。1月25日，阿爾方索寫信給納蒂，警告他甘必大不願意與英國在埃及問題上按由英國大使萊翁斯爵士提出的方案進行合作，而且對正在討論中的《英國-法國商務協定》也產生了懷疑。納蒂將信轉給了迪爾克（時任外務部的次長），同時附上了他含糊的評論："無法令人滿意。"緊接著第二天，甘必大被迫辭職。過了不到14天，阿爾方索在法國外交部遇到了萊翁斯並問他："關於埃及問題，希望我對德·弗雷辛內特先生說什麼？在認真想了好一會兒後，他回答，'告訴他讓商務協定生效。'"看起來納蒂和阿爾方索似乎正在扮演他們的先輩們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作為新上臺的法國政府非官方的交流渠道，納蒂"按照迪爾克指出的意思"寫信給巴黎，阿爾方索很確定地回覆"整個法國內閣沒有人對英國商務協定的重要性認識得比萊昂·塞更清楚"。儘管他們都習慣性地懷疑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動機，格蘭威爾和格萊德斯通也認為這個訊息很"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來自阿爾方索的強烈暗示，法國政府不大可能反對英國擺脫阿拉比·帕薩的行動。按照阿爾方索的說法，對於參與全面的"武裝干預"，法國政府可能會在議會遭到太多的反對，他和萊昂·塞都明確希望英國能自行行動。這個訊息傳到倫敦的時候，格萊德斯通還正在期待著能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國際大會上達成一個多邊的決議，儘管面臨著來自他的內閣成員（特別是哈亭頓）要求單邊軍事行動的壓力。當英國艦隊在7月炮擊亞利桑德利亞的時候--城裡發生騷亂

似乎為軍事行動提供了更多的藉口--阿爾方索很高興，他注意到"英國在法律和秩序重新在整個國家建立起來之前不再會撤出；這對於那些在埃及有法律利益的所有人來說，是最好的保障"。之後還不到兩個月，沃爾斯雷將軍在特爾·艾爾·克彼爾取得了大勝，訊息傳來，他感覺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很難繞過這樣的結論，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慫恿英國政府跨越了格萊德斯通很負責任的謹慎，並且（根據內閣7月31日的會議記錄所示）強制性地去"推翻阿拉比"。做出這個決定的那一天正好是甘必大的繼任者弗雷辛內特提出英國-法國聯合佔領運河區的建議被國會否決的日子。到9月7日，格蘭威爾或多或少接受了納蒂的觀點，認為在埃及"不言而喻，英國將在以後保持領先優勢"。如果沒有法國很明顯的默許跡象，這次的立場改變是否會有可能出現很令人懷疑，而法國方面的這些情況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常樂意提供的。只有在一種情況下，阿爾方索和納蒂會認為對埃及的佔領存在困難：對於前者，是因為打算把這作為向俾斯麥發出英國-法國團結的訊號，而對於後者，是想按與德國財政部長一致的步調行動。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23）

如果羅斯柴爾德家族希望給格萊德斯通設一個陷阱，可能找不出比引誘他佔領埃及更好的辦法了。格萊德斯通自己很準確地預言了這樣一個行動可能產生的複雜情況；現在，他發現自己已經被這些問題給困住了。第一，怎樣重組總督的政府根本就是一堆亂麻。第二，存在著那些長期懸而未決的金融問題，而債權人應該在這方面得到優先的考慮。第三，還存在國內政治困境，因為格萊德斯通通過如此勉強地採用帝國主義手段的方式為反對黨謀得了很多的方便。第四，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給另一個歐洲大國送去了一根大棒，而這根大棒是用來打英國的。

法國居然默許英國佔領一片法國在很久以前獲得了很大經濟利益的領土，總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這並沒有持續太久，在沃爾斯雷取勝後不足一個月，按照古斯塔夫給納蒂的報告，以及納蒂給格蘭威爾的報告，巴黎流言滿天飛，說英國政府已經在嘗試從公開市場上購買蘇伊士運河的股份，目的是絕對控股這個公司。這似乎是納蒂希望政府做的，但是格萊德斯通仍然對當初迪斯雷利在1875年購買原始股份的有關任何事情都存在著深深的戒備--他一直覺得當時交易的情

況都在故意瞞他，而且在很多條件下都證明與勒塞普斯和在運河公司內的法國股東們根本不可能達成協議。

運河只是埃及問題的一部分。或許並不讓人感到奇怪，因為我們下面將要討論原因，格萊德斯通把埃及的金融看成是一件"神聖的事情"，但是他仍然決定通過"歐洲的一致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在俾斯麥式的現實主義政治時代，這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事情。佈雷希羅德不久轉達了來自柏林的訊號，似乎暗示德國對英國的埃及政策忽然轉變了立場，而且倫敦大會上格萊德斯通提出了他希望在1884年夏天打破僵局的想法。由於受到孤立，格萊德斯通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把埃及的金融重組委託給金融城裡羅斯柴爾德和巴林的經典組合。8月4日，海軍大臣諾斯布魯克爵士--巴林家族的成員，儘管從未做過銀行的合夥人--被派往埃及去調查這個國家的金融情況。正如倫道爾夫·丘吉爾在下院裡憤慨地指出的，他的堂兄弟伊維萊恩·巴林（後來的克羅梅爾勳爵）已經以總領事的身份出現在開羅。"因此，"丘吉爾大發雷霆，

偉大的巴林銀行的兩名成員都得到了委託，按照我所能夠理解的，他們獲得了幾乎是無限的獨自處置英國在埃及的政治和金融利益的權利.....我希望指出，在這個關係中，實際上派兩名羅斯柴爾德銀行的成員還是派兩名巴林銀行的成員並沒有什麼區別。這兩家在規模和他們在東方的經濟利益的程度方面幾乎沒有什麼區別；而且我們也可以推斷出，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提出建議--提出了一名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成員，根據他自身的條件以及他的公共地位，適合執行這項任務--派遣這樣一位成員，那麼從下院和整個國家可能就會發出很大的噓聲。但是，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地位和巴林之間似乎不應該有什麼不同.....

考慮諾斯布魯克過往的政治記錄（他是前印度總督），丘吉爾的得分並不高，而且他宣告說"這個國家的公共服務從此不再與倫敦城裡的商業和金融私人企業有任何的聯絡"，這當然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有意思的是，他相信羅斯柴爾德家族參與到埃及的政策制定中，會比巴林的參與引起更多公眾的反對。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24）

丘吉爾不知道的是，在諾斯布魯克被派往埃及後的第二天，納蒂給格蘭威爾做了一個保證，他的公司會為彌補埃及當前的赤字提供100萬英鎊的短期貸款，儘管他明確地要求知道"政府會為他的貸款提供什麼樣的擔保"。對更新這筆貸款的需要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了對丘吉爾錯誤地依靠巴林家族的政策進行調整的槓桿：在很沮喪地討論隨時可能出現的埃及破產問題的時候，納蒂在12月26日告訴格蘭威爾，他能夠同意的延長這筆貸款期限的時間只限於兩週，目的主要是為了促進與其他大國進行的談判。當納蒂"上緊螺絲"的時候，他似乎很高興用爭論以及來自柏林和巴黎的那些矛盾的訊息來折磨政府。"我們唯一的機會是同意俾斯麥的條件。"他在8月的時候告訴漢密爾頓。9月1日，他警告格蘭威爾說："俾斯麥非常生氣，而且說他要維護德國債券持有人的權利.....因此他將反對對於埃及事務的任何非法行動，而且給了我們一個絕對的比率原文如此。，把歐洲的管轄權讓給法國，在他看來，我們不會願意面對這樣的情況。"但是當他在3個月後與格萊德斯通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又"嘲笑法國對埃及土地稅收的計算方法"，並且非常支援諾斯布魯克在上一個月報告裡的測算，這份報告提出由英國獨家控制埃及財政。

格萊德斯通心無旁騖地朝一個事實上的英國保護國方向進行推進的努力，不由得讓人肅然起敬：由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似乎無處不在，因此他指責他們向法國政府洩露了關鍵的資訊--在哈亭頓為納蒂提供諾斯布魯克報告以轉給俾斯麥的那個時候。或許這裡面有些問題：在10月份，法國總理朱利斯·費瑞告訴俾斯麥的兒子赫爾伯特"英國正在煽動那些大的金融企業，特別是羅斯柴爾德銀行，而且讓他們知道如果英國政府被迫走極端的話，埃及的貸款可能會變成一張廢紙，債券持有人會一無所獲.....金融家們現在真的非常擔心，而且都在試圖影響法國政府的態度，朝英國的方向轉變"。羅斯伯裡對在這個關鍵時刻加入內閣非常猶豫：他很自然地想到了丘吉爾關於金融家族這個話題的另一次措辭激烈的講話。就在這時，丘吉爾發表了口無遮攔的講話，說"一夥倫敦和巴黎的猶太高利貸者誘使伊斯邁爾·帕薩落入了他們的網中"，而且聲稱"格萊德斯通把埃及人送回到了他們的猶太主人的羅網中"。



最後，也是最致命的，這裡存在一個問題，就是英國新的管轄權應該怎麼劃定。埃及南部在邁赫迪的領導下，宗教叛亂在整個蘇丹肆虐。羅斯柴爾德家族再一次鼓勵英國進行干預，格萊德斯通再一次發現自己無法抵禦這種國際國內交織在一起的帝國主義情緒與"騎虎難下"的過度的個人野心的混合勢力。所有相關的人都過分地高估了英國的實力。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興高采烈地重複著一個交易所的故事，說"戈登·帕薩帶著10萬英鎊英格蘭銀行的紙幣，這是平息暴亂最好的英國武器"。從蘇丹撤軍的後勤保障遠不是報告中說的那樣，由於接到了相關的命令，戈登試圖進攻馬赫迪。傳到倫敦的訊息說他可能戰死於1885年2月5日。正是這個危機最終說服羅斯伯里加入了政府，這個決定得到了納蒂的歡迎，他公開說："您無與倫比的判斷力和愛國熱忱將會給政府以極大幫助，並拯救這個國家。我希望您關注已經派到尼羅河的援軍。索丹的戰役將會是一個輝煌的成功，而且肯定不會有錯。"

##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85年）（25）

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直接受益於英國對埃及的佔領這樣的說法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正如古斯塔夫說過的，英國的控制對於大多數（儘管不是全部）埃及債券的持有人來說是個好訊息，因為"如果英國與埃及共同為埃及的對外義務負責，埃及的信用明顯將會從中受益"。不僅如此，它還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了發行新形式債券的機會：1884年之後，所有的埃及債券發行都將由英國認購。在1885～1893年之間，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巴黎和法蘭克福銀行聯合負責了四次大型的價值將近5000萬英鎊的埃及債券發行。這些發行由羅斯柴爾德家族與佈雷希羅德合作，其中一次與貼現公司合作，具有重要的外交意義。在1885年3月，大家一致同意這些貸款中的第一批應由所有有關的大國共同擔保，但是俾斯麥批准這個協議的前提條件是德國的銀行--意指佈雷希羅德--要獲得一定比例的份額。這就排除了通過英格蘭銀行發行債券的可能性（為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債券發行採用的就是這種模式），使得羅斯柴爾德的操作成了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薩利斯伯利第一批在1885年夏天組建臨時管理機構的任務之一，就是向英格蘭銀行釋出訊息，說他被"授權籌措貸款中的英國部分，由N·M·羅斯

柴爾德公司作為代理，因為它在巴黎和法蘭克福都擁有銀行，而且與柏林的佈雷希羅德銀行關係很好”。

在所有擔保中更為重要的，是伊維萊恩·巴林穩定埃及經濟的努力取得的成功。1890年和1893年的貸款是轉換貸款，發行的目的是調低埃及債券的利息。這也不應該按埃及民族主義者的說法說成是外國投資人為自己在埃及的利益上所取得的勝利：在巴林的管理下，出現了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鐵路以及最著名的在1898年到1904年間修建的阿斯旺大壩）；然而，絕對債務負擔卻從1891年最高峰時的1.06億英鎊下降到了1913年時的9400萬英鎊，而且按人頭徵稅。換個角度說，在這個時期一開始，債務負擔是當時收入的10倍；到這個時期結束的時候，這個數字只是5倍。英國的金融控制是如此嚴格，以至於羅斯柴爾德家族馬上就抱怨說他們在埃及業務上的佣金被壓榨了。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巴林於1907年離開埃及後，將越來越多的領域放手給厄內斯特·卡塞爾的原因，儘管更為可靠的解釋是納蒂擔心英國的控制力在面對埃及民族主義者的暴動時出現下滑。

這種向正式的英國控制轉換的代價最慘重的部分不是由債券持有人或者納稅人來承擔，而是由英國的外交政策來承擔。1882～1922年，英國覺得有必要對其他大國承諾它將結束對埃及的佔領，這樣的承諾總計不少於66次，但是所有想從埃及脫身的努力均在面對其他大國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之中無功而返。在1885年9月，納蒂被要求在柏林就關於杜魯蒙德·沃爾夫提出的由土耳其軍隊在埃及替換英國軍隊的建議發表意見。俾斯麥的兒子赫爾伯特代表俾斯麥所做的迴應是反對。由外交部在1887年提出的“在英國保護下埃及中立”的意見也同樣註定不可行，法國堅持要蘇丹反對。在實際的操作中，“一個垂簾聽政的政體”（米爾納的說法）建立起來了，而且開了一個很有影響的先例--正好契合了購買蘇伊士運河股份的時候格萊德斯通警告可能會發生的情況。

最讓人無法理喻的是這次行動中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不是別人，而正是格萊德斯通自己。1875年末--可能正是他竭力反對購買蘇伊士運河股份之前--他購買了面值為45000英鎊的1871年土耳其埃及貢賦貸款券，價格只有38英鎊。按照他的日記所證實的，到1878年（柏林大會召開的那一年），他又增購了5000英鎊（面值）；而且在1879又購

買了另外15000英鎊的1854年土耳其貸款券，同樣也是以埃及的賦稅作擔保。到1882年，這些債券佔了他整個資產組合（面值51500英鎊）的37%。甚至在武裝佔領埃及之前--這是他自己下達的命令--這些投資看起來都非常不錯：1871年債券的價格從38漲到了1882年夏天的57，事實上在上一年還漲到過62。英國的佔領讓首相獲益更多：到1882年12月，1871年債券的價格漲到了82。到1891年，它們甚至摸高到97--僅資本收益率比他1875年購買的時候就多達130%。因此，當某一次聽他把土耳其的政府破產描述為"所有###罪之最"的時候，也就不會覺得太奇怪了。每當我們說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虛偽，常常讓我們想起格萊德斯通對性所持的壓抑態度；而他對待帝國經濟的態度才是真正的虛偽。在他反對迪斯雷利代表政府購買蘇伊士運河的同時，卻在他所反對的行動的支援下做出了他個人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個人投機，讓我們不得不說他真是一個虛偽到極點的人。東方問題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格萊德斯通之間在這個時期分歧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格萊德斯通的雙重標準--這與迪斯雷利充滿浪漫色彩的誇張對比起來是如此強烈--是不和的根源。

### 第三章 政黨政治 (1)

迪斯雷利在這裡……我們的朋友精神狀態非常好，根本就沒有對在議會遭到的暴力襲擊有任何抱怨。你能對我在寫東西時與親愛的媽媽在一起的來訪者說什麼呢——這個情況我剛聽說，赫赫有名的格萊德斯通先生正在跟她一起喝茶、吃麵包和黃油，我懷疑他是否會來看我。

——列昂內爾給里奧和莉奧諾拉的信，1876年3月

可以肯定的是，19世紀70年代關於埃及和土耳其的爭論並沒有讓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格萊德斯通造成太大的隔閡。然而，如果據此認為他們與自由黨的關係完全破裂或者對保守黨無條件接受，都是錯誤。對這個事實最好的證明就是迪斯雷利在1876年的某一天拜訪列昂內爾，而就在同一天，格萊德斯通與夏洛特在一起喝茶。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現象。4年之後，費迪南德給他的朋友以及羅斯伯裡伯爵家的姻親寫信，描述了一個類似的場景：「貝肯斯菲爾德爵士正與艾爾弗雷德在一起——而另一天，我們不得不把他送到納蒂那裡去吃飯，因為格萊德斯通要來吃飯，並與劍橋公爵會面（私事）。」一直到1905年，羅斯柴爾德的政治立場總是有點像「旋轉門的性質」：儘管家族的成員（具體來說就是納蒂）越來越認同保守主義——或者可以說是自由黨的聯合主義——但是與格萊德斯通黨人的聯絡渠道卻從未關閉過。與迪斯雷利之後的保守黨領導人的關係也並不完全和諧。1900年之後，猶太移民問題的政治化為這個家族為什麼變成了自由黨人提供了一個可信的說法。

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第四代與他們的父輩和祖父輩相比，對政治的看法變得更加註重意識形態——最明顯的是在對待愛爾蘭的問題上，但是與此同時也針對歐洲城市人滿為患而引發的「社會問題」（或者說是各種社會問題）。這些問題讓他們與格萊德斯通的分歧越來越大。然而，一直到世紀之交，納蒂才完全放棄了他的自由主義立場。與他父親和祖父之前所做的一樣，他仍然相信，無論是經濟還是外交，羅斯柴爾德家族應該保證無論哪個政黨掌權都應該受到重視。這就可以部分解釋他與不同的政治取向的政治

家，比如羅斯伯裡、倫道爾夫·丘吉爾爵士以及阿瑟·貝爾福都能保持良好關係的原因。在維多利亞晚期私下的政治生活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經常碰到這一類人，在金融城裡（在紐科特的午宴上討論金融問題）以及在西區（在俱樂部或者匹克迪利大街家裡的晚宴上討論政治問題），這些訪客與其他數不勝數的政治精英們，無論是自由黨人還是托利黨人，都是羅斯柴爾德鄉間莊園（特別是特靈、瓦德斯頓和霍爾頓）的常客。很多那個時期最重要的政治決策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做出的。而當羅斯柴爾德家族無法對他們政治界的朋友親口說的時候，他們就寫信——這對於歷史學界來說是很幸運的事情，然而納蒂決定在他死後把他的所有信件全部銷燬，因此在羅斯柴爾德自己的檔案裡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儘管來自巴黎的信件仍然可以使我們推斷出很多發生在紐科特里的事情，但是我們依據的主要還是政治家們自己的檔案，因此也給歷史學家留下了很多讓人無法解釋的關於羅斯柴爾德家族政治作用的懸念。

### 第三章 政黨政治（2）

#### 自由主義追求

羅斯柴爾德家族中的部分成員事實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他們的自由主義追求。一直到他們生命的最後一刻，梅耶和安東尼在意識形態上都是堅定的純粹的自由黨人。梅耶擊退了托利黨人鄉紳的進攻，保衛自己的海斯席位，爭取到了來自福克斯通地區漁民的支援，而安東尼繼續依靠黨內的科博德耐特派的支援。人們聽到安東尼在1866年9月宣佈「我們擺脫殖民地越快，對英國的好處也就越大」——這是一個很令人吃驚的鼓動，對於這一時期的羅斯柴爾德來說，這句話可能會被理解成一句對毫不妥協的經濟自由主義的表述。人們也不應該忘記安東尼的女兒康斯坦絲和安妮仍然通過她們的生活活動與自由黨緊密地聯絡在一起，而且梅耶的女兒嫁給了一位將繼格萊德斯通之後出任首相的自由黨人。

甚至列昂內爾的兒子們也是以公開的自由黨人身份開始他們的政治生涯的。當他們的堂兄里奧在1865年首次參與議員競選時，他明確問投票人：「你們到底喜歡誰來領導，是帕爾梅斯頓、羅素和格萊德斯通，還是德比和迪斯雷利？」明顯前一組得到了他的支援。在同一年代表艾勒斯貝利以自由黨人身份參選的時候，納蒂「一直駛到密森

頓，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迎接，他們一直伴著我穿過城市，來到一片丘陵地區，像馴服的熊一樣走了很長的路」。有非國教投票人問他是否支援廢除教會規費，他很直截了當地回答說：「支援。」這個立場讓人們回想起當初他還在劍橋上學時所表現出來的教條式的自由主義。

還應該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點是，到格萊德斯通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之前，一直都有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員與他繼續保持著聯絡。他在1868年12月首次獲得首相職位後並沒有改變他們始於19世紀50年代的交往模式。格蘭威爾爵士在他於次年住在門特摩爾期間向格萊德斯通轉述了羅斯柴爾德對1868年選舉的看法，而格萊德斯通也於1869年和1870年在匹克迪利148號與列昂內爾和夏洛特一起吃飯；也經常與列昂內爾舉行「業務」會談。比如在1869年4月，兩人碰面討論預算，而且正如我們看到的，格萊德斯通在1870年和1871年的法國—普魯士戰爭期間，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員進行了幾次重要的會談。他也在1874年7月到紐科特拜訪過列昂內爾，而且一年之後又再次來訪（儘管他的日記並沒有透露拜訪的原因）。只是在蘇伊士運河股份矛盾爆發之後，這些會面表面上看起來才停止了——儘管列昂內爾仍然通過格蘭威爾偶爾傳過一些不很重要的話。

甚至在蘇伊士問題之後，格萊德斯通仍與列昂內爾的妻子夏洛特保持了一種超越熟人的關係。在1874年，他把自己的肖像畫送給了她，一年之後，他在日記裡記下了與她「關於信仰狀況」的一段對話。這引發了雙方不斷的信件往來，一直持續到第二年的8月份，夏洛特送給他一套由猶太作家寫的《聖經》評述，顯然是為了幫助他進行他的理論研究。夏洛特在丈夫死後對此表現得興致不高，但是格萊德斯通繼續到加奈斯貝里去拜訪她——這些拜訪被她的兒子描述成是「我最敬愛的母親在病倒之前最後的樂趣」。夏洛特在1884年辭世。儘管他們的政治信念各異，他和納蒂在1884年和1885年還是經常一起吃飯，並且在他的第三次任期內，也經常在其他的很多場合碰面（主要是討論埃及問題）。走出辦公室之後，他在晚宴上依然很受歡迎，並且在1891年2月訪問了特靈。

### 第三章 政黨政治（3）

格萊德斯通在與納蒂的妻子艾瑪恢復了他早先與她的婆母所進行的學術性通訊上也沒有感到有任何不便。比如在1888年8月，他寫信給

她，要求她幫助探討「關於《摩西法典》與其他同時代或古代體系就其道德和社會層面領域進行比較這樣一個很流行而且也能有很多理由進行說明的話題——而比較之後得出的結果很顯然對《摩西法典》非常有利。」艾瑪對神學沒有興趣（她喜歡討論英國和德國文學），但是她顯然很高興能被這樣一位大人物所青睞，並且盡她的所能幫助他找到共同的立場。為了感謝他送給她的一本有他簽名的他的《聖經》研究的專著，她評論說：「儘管我們的需求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但基督徒和猶太人對那些神聖的《聖經》教義的忠誠都是一樣的，對此，正如您說的，‘它們用中立的方式武裝我們，把那些爭鬥帶來的相互傷害從我們的身上清除！’」兩人對歌德的熱情也為通訊提供了新的話題。格萊德斯通同時也與費迪南德和他的妹妹艾麗斯，以及康斯坦絲和她的丈夫塞瑞爾·弗勞爾保持著社交聯絡，他還在他的第四個以及最後一個任期內為塞瑞爾·弗勞爾爭取了貴族身份和新南威爾士總督的位置。在1893年，安妮也高興看到這位大人物。在給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她很高興地描述了「當他說到那些可恥的土耳其人的時候，他的那張老臉被憤怒和火光點亮」。讓那些激進的報紙錯愕的是，格萊德斯通儘管這一時期與納蒂在政治見解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他還是在同一年接受了訪問特靈的邀請。而納蒂和艾瑪在1896年對哈沃登的回訪表明，政治問題在當時被迴避了。這次訪問之後，艾瑪和格萊德斯通的通訊中討論的話題是一棵白樺樹最大的樹圍。似乎格萊德斯通先生和她的丈夫最後終於找到了兩人共同的熱情所在——樹木。

然而，這些持續不斷的個人接觸也無法掩蓋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格萊德斯通的政治信念的不同。簡單地說，這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與迪斯雷利之間獨特的親密關係不無聯絡。在他早年的日子裡，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曾在他的小說裡描繪了他們之間的浪漫關係，而且經過長期的培養，讓列昂內爾獲得了對法國鐵路進行投機的一次良機。這些並不成功，而且迪斯雷利的財務狀況——一大堆混亂的債務以及高利貸利息的支付——在19世紀50年代末期達到了最糟糕的狀況。應該強調的是，與當時的傳言相反，羅斯柴爾德家族並沒有給他任何救助。1862～1863年間，一位名叫安德魯·蒙塔古的有錢的地主給他提供了幫助，而且還安排購買了迪斯雷利所有的債務，獲得了57萬英鎊，以哈根登的3%做抵押，這就很顯著地減少了迪斯雷利每年的支

出。在此後不久，他從布萊基斯·威廉斯夫人處繼承了3萬英鎊，這是一位虔誠的年邁女士，他贏得了她的信任和青睞；另外，他還從他的小說中獲得了大約2萬英鎊。有人聲稱在迪斯雷利死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在他的侄子科寧斯比繼承之前付清了哈根登的按揭款，但是我們找不出他們這樣做的明顯的原因。

在早前的日子裡，與迪斯雷利過分的熟悉曾經導致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蔑視——不只是因為他對他的父輩信仰的特異態度。然而，到了19世紀60年代，他的政治立場高尚到足夠使不敬讓位給欽佩。夏洛特在改革法案期間的信函反覆對他的政治能力進行稱頌。「迪斯雷利先生讓人覺得非常和藹可親。」她在1866年很有特點地這樣寫道：「我們全神貫注地聽他說話，敬愛的爸爸和我……聽他講話真的是一種享受，甚至迪斯雷利太太的出現也不會破壞這種愉悅。」列昂內爾也明顯地對迪斯雷利熱情了起來，因為他已經距離頂峰不遠了。在1867年進行的改革辯論的過程中，兩個人明顯地走得很近，議會結束後也經常一起吃飯，並交換相互的政治信念。這些信件中的語氣表明了幾乎完全沒有政黨政治那樣的摩擦存在：迪斯雷利肯定沒有拿財政部長對待反對黨議員的那種態度來對待列昂內爾，而與此同時，列昂內爾在他倖存的信件中的政治評論也是如此中立，以至於如果僅從這些評論來看，很難推斷他的政黨傾向。只有在很偶然的情況下，迪斯雷利才會顯得含糊其辭。例如，在1867年8月，他「在星期六的內閣會議結束後來訪，但是，」夏羅特很失望地注意到，「爸爸盡了最大的努力也無法突破這位大人物的冠冕堂皇——他就是不跟爸爸透露一個字，而且改革法案的命運仍然很不明確」。梅耶也對這一時期迪斯雷利勇猛的領導風格印象深刻，其程度與他的侄子納蒂幾乎別無二致。

### 第三章 政黨政治（4）

當迪斯雷利最終獲得了可貴的首相職位的時候，瑪麗·安娜馬上把這個訊息告訴了羅斯柴爾德家族，而且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馬上寫信表達他們對這位「非凡人物」的勝利感到高興。儘管面臨少數派政權存活機會不大的現實，列昂內爾對德稜給予了嚴厲批評，因為後者在《時報》上攻擊新當選的首相。迪斯雷利很坦誠地告訴列昂內爾他有關於內閣組成計劃的打算，儘管他的立法計劃仍然使他頗費思量。對於愛爾蘭教會問題，列昂內爾在1868年3月的時候這樣說道：「我懷



疑他還沒有拿定主意，而且改革法案將會因勢利導。」「還沒有人知道，」他在兩天後又補充道，「迪斯雷利將要怎麼來保證獲得勝利。」列昂內爾非常積極地通過「洩露」反對黨的打算的訊息來盡力協助迪斯雷利。「昨天，迪斯雷利是我們唯一的訪客。」他在3月9日告訴他的妻子，「他沒有告訴我們什麼，但是想要知道所有的報告。當我告訴他，他們（他的自由黨資源）說他的很多支持者可能會在愛爾蘭問題上反對他時，他說他提出的任何提案都會得到每個人的支援。我建議他組織一些有趣的晚會。」當迪斯雷利在1868年的選舉中被擊敗的時候，列昂內爾仍然給予了支援。「在那個偉大的議會鬥爭中，您幹得非常漂亮。」他在次年的3月寫道，「如果潮向稍有更改，就會為您提供更多展示您的雄辯和才能的機會，而我們將會永遠分享您的成功，感受您珍貴的個人友誼，這種感情無論在什麼場合下您都向我們展示。」作為一種標誌性的舉動，他以迪斯雷利的小說《羅泰爾》中一個人物的名字來命名一匹賽馬，這部小說是在他的選舉失敗之後匆匆收的尾，而安東尼則提供了「大量的野雞，還有一些兔子」。

在迪斯雷利成為反對黨的時候，他們的關係仍然維持著原來的狀況。迪斯雷利在1870年的時候，至少三次被邀請到匹克迪利148號，而且還有其他型別的社會接觸。他為康斯坦絲的一本書提供了關鍵的構思，而當他自己的房子無法居住的時候，艾爾弗雷德為他在倫敦提供了住房。「請您同意在這間屋子裡待些時間。」夏洛特於1873年9月在加奈斯貝里寫道，「希望您儘早到來，儘量留下來多待一些時間，起碼要待到10月1日之後，因為這是我們盛大的齋戒日以及贖罪日，這樣我們所有人才會更加高興，而且也備感榮幸。」除了熱情好客，列昂內爾總是能提供來自其他政治渠道的有價值的新聞。比如，內部關於《自由法案》內容的資訊，或者德稜計劃在《時報》上發表的社論。「羅斯柴爾德男爵.....是自由黨人，」迪斯雷利在一次內部通氣會上對布萊德福德爵士說道，「而且.....知道所有的事情。」迪斯雷利在1874年重新掌權之後，自由黨人擔心迪斯雷利會搶在他們之前授予列昂內爾貴族爵位就不足為奇了。

迪斯雷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之間在那些年間的親密友情怎麼評價都不會誇張。有種說法（儘管不是十分準確）認為他被看做是家族裡

的一員，特別是他的妻子瑪麗安娜在1872年去世之後。當漢娜在1878年嫁給羅斯伯裡的時候，是迪斯雷利送走了她；而當首相在12月份立遺囑的時候，他指明納蒂與他的律師菲利浦·羅斯爵士一道作為他的遺囑執行人。在列昂內爾去世後一年的6月，他的兒子們在回覆迪斯雷利的弔唁的時候告訴他，他們的父親「把你看成是‘他最親愛的朋友’」。很難想象出在晚年的日子裡，還有誰會比他走得更近了。

### 第三章 政黨政治 (5)

列昂內爾的兒子們繼續了他們的父親的「貝肯斯菲爾德主義」的傾向，儘管也像他一樣繼續坐在下院的自由黨一邊。在迪斯雷利對東方問題的「沙文主義」政策1878年放到下院來表決的時候，自由黨領導層多多少少對納蒂有些不放心的。格萊德斯通的皇室副官威廉姆·哈科特認為，與很多其他「商業人士」一樣，「他們發現他們的金錢利益被目前這種局面極大地損害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投入了託利黨日的懷抱」。與威廉姆·哈科特所設想的非常類似，納蒂在政府2月份尋求緊急信貸支援的時候，挑戰了自由黨制定的以棄權作為底線的官方態度，而且兩個月之後，當威爾弗雷德·羅森爵士在4月份提出修正案來反對使用儲備的時候，他在兩次投票中均投了政府的支援票。他還反對哈亭頓爵士關於印度軍隊調動的兩次決議案（5月23日）以及《柏林協定》（8月2日）。這些就像有時候人們所爭論的那樣，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其他富有的猶太人來說，就是他們政治的十字路口，他們在爭取猶太人權力的長期鬥爭中形成的對自由主義的忠誠，最終屈從於迪斯雷利式的帝國主義訴求。更準確一點說，應該把這看成是19世紀40年代前後，大量的貴族或以鄉村為基礎的輝格集團脫離格萊德斯通式的自由主義公開邁出的第一步。

隨著迪斯雷利的政府招架不住格萊德斯通對「貝肯斯菲爾德主義」（歷史書上記錄為米德羅錫安運動，這是在格萊德斯通被說服去競選蘇格蘭國家席位之後所發動的）的猛烈攻擊，而在1879～1880年間下臺。納蒂越來越像是穿著自由主義外衣的托利黨人。就像他顯然覺得很尷尬地告訴門提·克瑞的那樣，有一次，他「正好在準備投票的環節走進議會，而且因為沒有任何人給我任何提示，我發現我跟多數派的人投了同樣的票，而這個議案是譴責政府的。我寫信把這些情況告訴你，儘管你知道，以後就算把我的雙手砍掉我也不會再做這樣的

事了」。他在1879年3月做了些補償，當時他警告迪斯雷利說，查爾斯·迪爾克打算推動一次譴責政府南非政策的自由黨人投票，這個政策是在伊桑德爾瓦納取得祖魯勝利之後做出的，而且「很多保守黨人將被禁止投票」。這類資訊，用納蒂的話說，是「通過在西區的俱樂部裡以及在金融城裡的各種談話」收集得出的，用現在的眼光看顯得有些瑣碎，但他確實是這位維多利亞式的首相「傾聽大家（指政治精英）心聲」的唯一途徑。到1879年12月，納蒂拐彎抹角地通過把自由黨領袖說成是「那個魔頭格萊德斯通」來表達自己新的政治立場，這句話出現在他給迪斯雷利的新年祝詞的結尾處，而且他還提出希望「他（格萊德斯通）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來給您提供幫助」。費迪南德也附和了這種情緒，他這樣告訴羅斯伯裡：「我希望您的格萊德斯通大人深陷海底。」

在自由黨人獲得了1880年的選舉勝利之後，艾爾弗雷德在他自己位於希莫爾區1號的宅子裡給迪斯雷利提供了一套住房，而納蒂仍然繼續給他提供自由黨內部紛爭的最新訊息——儘管有人懷疑他現在的更多的應該是讓一位老人感到高興，而不只是想煽動他進行有效的反擊。當另一部以紐薩泰爾的形式來表現戲劇化的羅斯柴爾德的小說《恩底彌翁》發行的時候，納蒂的讚譽顯得很虛假（或許從中可以看出希東尼亞與阿德廉·紐薩泰爾的一個不同點正好是他自己與他父親之間的差異）：

### 第三章 政黨政治（6）

在那些「聖喬治的大旗飄揚在拉瑟拉斯平原上」，而塞普勒斯是一片富饒的殖民地的日子裡，「那些在文學和藝術上遭遇慘敗的人」不會再像一位詩人或者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那樣談論您的作品，但是他們將像我一樣一如既往地把你看成是一位偉大的英國政治家。

他宣稱，這是「對英國文學的一個偉大的貢獻」。這位風燭殘年的作者繼續與艾爾弗雷德——「這位世界上最好、最有愛心的東主」——住在一起，一直到1881年1月，當時他搬進了他用《恩底彌翁》的稿費購買的位於科贊大街19號的房子裡；而且當他首次以及最後一次於1881年3月10日在那裡宴客的時候，艾爾弗雷德都是到場的客人之一。當迪斯雷利4月19日凌晨去世時，輪到納蒂去履行他的最後願望，把他送到哈根登與他的妻子葬在一起，而且他的葬禮「與她的一樣非

常簡單」。也就是說他們委婉地拒絕了格萊德斯通提出的公共葬禮的建議。

###

用阿爾方索的話說，迪斯雷利曾經是「我們家族最好、最值得信賴的朋友」。但是把羅斯柴爾德家族從自由黨那邊爭取過來，並不只是靠這份友誼。同等重要的是在格萊德斯通式的自由派人士——他們當中有的人非常激進——與具有非常明顯保守傾向的輝格黨人之間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這些差異在選舉過程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當羅斯柴爾德家族在19世紀50年代期間首次以一股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現在白金漢郡的時候，在艾勒斯貝利及其周邊已經建立起來的輝格黨人的領導地位所形成的大環境非常不友好。卡林頓爵士提到他們的時候，很刻薄地說他們是「紅海」，而艾克頓·丁達爾則大談拒「割禮」於黨門之外。在1865年，納蒂以無可爭議的選舉結果回到他的席位，但是他與丁達爾的政見仍然存在明顯的差異（比如對於教會費的廢止問題）。然而，三年之後，似乎忽然之間變成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黨內站對了路線。激進派聯盟祕書長喬治·豪威爾有點死纏爛打地在艾勒斯貝利硬纏著他們，結束了那種簡單的局面，並由此讓一名羅斯柴爾德人和一名托利黨人沒有懸念地退回到了這個有兩名成員的選區。在金融城裡，列昂內爾發現他自己很尷尬地與一名自由黨候選人在哈姆萊茲大廈競爭，這名候選人是一位名叫約塞弗·德阿吉拉·薩姆達的改變了信仰的猶太人。這很可能是他失去他的這個席位的原因之一——在總體上自由黨人票數領先的選舉中出現這樣的失敗顯得很不尋常。6年之後，列昂內爾又再次遭遇失敗。然而，這一次失敗的原因在於他和格萊德斯通之間對於財政政策的分歧被公佈了出來。按照《時報》後來所回憶的，列昂內爾（「在或許是他參加過的唯一一場重要的選舉會議上」）指出：

格萊德斯通先生提出的廢止所得稅提議將會讓國家每年失去900萬英鎊，而且盈餘可能達不到那個數額的一半。對於另外的一半，必須徵收更多的新稅種。當他的聽眾大喊「反對」和「經濟」的時候，他回答說經濟並沒有走得這麼遠，可以每年節約400萬。德·羅斯柴爾德男爵的意見是，新稅種必須開徵，而且必須針對財產來徵。他提出了執照稅，比如在奧地利由商人支付的那種情況。

提倡高稅會對選舉產生負面影響的發現並不是現代的事情。列昂內爾的說法被諾斯科特爾1874年的預算所驗證，他們仍然徵收所得稅，儘管對於年收入在400鎊以下的提高了起徵點，並採用了較低的費率。

### 第三章 政黨政治（7）

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格萊德斯通之間的黨內政治緊張局面在1876年終於徹底地爆發了，當時迪斯雷利升到了上院後，需要在他的白金漢郡選區進行一次補選，而此時恰逢格萊德斯通的「殘酷」運動進行到最高潮的時候。格萊德斯通非常急需一場自由黨的勝利，而且他顯然看到了保加利亞問題可以作為實現那個目的的一種手段：他送給了自由黨候選人魯波特·卡林頓「250份小本」（他寫的小冊子的副本），而且以熱切的興趣追蹤著這場運動。當格蘭威爾的一個朋友在投票前5天試探列昂內爾的口風的時候，他發現：

他很狂熱地支援迪斯雷利和德比——但說起話來似乎他在支援卡林頓原文如此。——譯者注。但是在當下的投票體系中又沒有可能去了解選票的流向。舉個例子說，對於他的三個佃戶，他也不可能說出他們是跟隨著他的方向投票，還是跟隨著教區長的方向投票。他的看法是，弗雷門特爾（託利黨候選人）可能會以5票勝出，總得票數為600票。

最後的結果證明這個預測相當準確。

兩年之後，當艾勒斯貝利的第二個席位被自由黨候選人喬治·W·E·羅素——約翰爵士的侄子——贏得的時候，他們的分歧更加嚴重。在反猶太人運動的暗流中，在打倒「貝肯斯菲爾德主義」的一個完美的例子中，羅素就像格蘭威爾對格萊德斯通所承認的那樣，「攻擊迪斯雷利是猶太人、沙文主義者和陰謀家」。當這在當地的保守派報紙《白金漢郡信使報》上進行報道（儘管羅素努力取消了「猶太人」這個字眼）的時候，納蒂頓時火冒三丈，馬上在他再次見到格萊德斯通的時候，抓住「一切機會給羅素扣屎盆子」。那些帶頭的自由派人士願意以這種方式行事的事實，使得人們很難再只把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向迪斯雷利偏移的理由僅僅說成是與格萊德斯通在對外政策上的不合。

外交因素無疑也是很重要的。當自由黨人贏得1880年大選的時候，在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眼裡是一件有些「遺憾」的事情，因為他們認為保守派政府似乎會有更多的「古老英格蘭的威望和影響」。而「格萊德斯通先生對外交政策的輕視」，是他們熱忱地希望薩里斯伯利能夠留在權力位置上直到1885年年底的主要原因。真實的情況是，當費迪南德在1885年決定進入政治領域的時候，他堅持聲稱他希望以自由黨人的立場出現。但是，他對有偏激傾向的迪爾克明確表示，他對這個黨的對外政策有疑慮，並且暗示他的政治信念可能會建立在堅持帝國主義路線的自由派人士的條件之上。這封信註定要被大量地引用來說明這一時期羅斯柴爾德家族政治觀念的矛盾性：

我並不是如你所想象的天生就是一個保守派。保守主義已經毀了好幾個海外的國家，而自由主義政治一直是英國的立國之本。對於自由主義，我們（包括你）都應該心存感激。無論對任何形式的託利主義，我都沒有任何理由和方式去傾慕。從另外的角度看，儘管我沒有能力來對這個問題表達決定性的意見，我為生我養我同時也是我所衷心熱愛的祖國，為它對現任政府的限制政策而感到難過，而政府已經做出了極大的犧牲，就算犧牲的不是利益，而是英國的旗幟和名稱對於那些刻板的國會改革問題所具有的神奇魔力。我或許「比教皇更像一名天主教徒」，但是我會為英國國旗插遍玻利尼西亞的各個島嶼、東方的每一個尖塔而歡欣鼓舞。您（我指的是政府）在經過長期的摸索實踐之後，還是得回到這條道路上（帝國主義）。看看現在對喀土木的遠征，以及為您的殖民地理論提供的論據.....

### 第三章 政黨政治（8）

如果我能成功進入到下院，我會支援現在的自由黨政府.....（但是）如果我最終在未來的政治生活中發現他們自己的風格逐漸成形，而且如果這種風格讓我感到不安（我有意使用了強調），我將退出這場遊戲，退回到平常的低調生活狀態之中。

這封信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只要人們能記得費迪南德成為新設立的白金漢郡中區單人選區議會候選人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堂兄納蒂已經被授予了貴族身份。現在已經證實，格萊德斯通選擇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快結束的時候提升納蒂的原因之一，是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替換他在下院的位置，而且現在應該不難理解他為什麼想這樣做。

1884年10月29日，哈亭頓的祕書勒景諾德·佈雷特就這個問題給自由黨總督導和機要祕書理查德·格羅斯維諾爵士寫的信上，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佈雷特的信開門見山地提出：「您和格萊德斯通先生應該對納蒂·羅斯柴爾德特別客氣。他並不是一名很死硬的自由黨人，但是我認為讓他自己放任自流可能不會有太多人反對，而且如果把他推向托利黨人陣營的話，反對就更少。」這是一個拐彎抹角的提議，一個羅斯柴爾德貴族身份的想法重新被提了出來。但是，他隨之警告格羅斯維諾在下院用費迪南德替換納蒂可能不會產生自由黨領導層所期望的結果：

如果期望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會相互傾軋，期望費迪南德更容易相處或者是更聽話，是可以用納蒂作為代價來替換，實際上這將會犯下一個很大的錯誤。

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團結已經有了幾代人的歷史了，如果自由黨與納蒂分道揚鑣，就意味著與他們的整個家族決裂，而在我的想象裡，這樣的作法對我們來說一無所得。

費迪南德給迪爾克的信充分地證實了這個判斷：如果他取代了納蒂的位子，羅斯柴爾德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場仍然會與之前一樣。正如收信人酸溜溜的評論所說的：「費迪南德·羅斯柴爾德想進入國會，而我告訴他他是托利黨人，而且應該站在托利黨人的立場上……他永遠不會以現在這樣的自由黨人的身份進入，這一點我很確定。」這最終證明基本上是正確的：儘管費迪南德開始的時候是以自由黨人的身份參選（為爭取那些非國教人士的選票，他甚至對戒酒也表示了支援），到1890年，他在議院裡描述自己是「薩利斯伯利政府堅定和狂熱的支持者」。

儲存在費迪南德的瓦德斯頓的訪客簽到簿上的那些名字，為辨析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提供了很好的佐證。在1881～1898年間經常出現的政治訪客名單中，自由黨人士略佔優勢：愛德華·漢密爾頓以不少於52次的到訪數領先於其他人，然後是自由黨領導人哈亭頓（10次）、自由黨內政部長和財政部長哈爾科特（9次）、羅斯伯裡（9次）以及迪爾克（2次）。其他的自由黨人訪客包括格萊德斯通、勒景諾德·佈雷特、歷史學家艾克頓爵士以及他的同事詹姆斯·布萊斯（後來的蘭喀斯特公國的首相以及商會的主席），該黨未來的領導人赫爾

伯特·阿斯奎斯、卡林頓爵士（後來當上了新的南威爾士總督）以及達爾豪斯伯爵（後來當上了蘇格蘭的國務卿）。兩位最常見的訪客是自由統一黨人士：總檢察長亨利·詹姆斯，他到過17次，以及約瑟夫·張伯倫，他曾12次做過瓦德斯頓的客人，而且通常由他的兒子奧藤陪同前來。同時，幾乎有與自由黨人同樣多的托利黨人：哈瑞·查普林（農業委員會的主席以及後來的地方自治政府的主席），他在瓦德斯頓停留過26次；薩利斯伯利爵士的侄子和繼承人阿瑟·貝爾福（8次來訪）；薩利斯伯利的助理私人祕書兼印度副國務卿喬治·科贊（也是8次）；農業委員會主席沃爾特·龍（5次）；倫道爾夫·丘吉爾爵士（兩次）；戰爭部次長布朗羅伯爵（也是兩次）；以及外務部次長詹姆斯·弗格森爵士。

### 第三章 政黨政治（9）

就像費迪南德給迪爾克的信中所指出的，促使羅斯柴爾德家族脫離自由主義的並不只是帝國問題。他們對以城鎮為根據地的激進的自由黨人，比如張伯倫和德勒科本所倡導的社會政策的懷疑越來越深。

「我不稱自己是激進分子，」費迪南德解釋道：

是由於我認為那些偉大的領導人，像張伯倫和您本人為得到群眾的支援而推行那些瑣碎的措施根本就不值得，比如說廢除那些可能會激發不健康的對社會和金錢貪慾的狩獵規則，而這種情況所導致的嚴重後果已經在法國有了很好的例證；你們應該做的正事是在廣泛的原則下管理好人民，並把他們帶入到廣闊的天地中。

甚至張伯倫關於由地方當局強制購買土地分配給工人階級的說法都讓納蒂大為震驚。羅斯柴爾德脫離格萊斯通式的自由主義所反映的不僅僅只是對他那不溫不火的帝國主義政策的不滿，同時也是對他的政黨的國內政策走向的不信任。為什麼愛爾蘭問題會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如此決定性的角色的一個原因，正是提高愛爾蘭佃戶的土地份額的提議喚醒了英國地主們心中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樣的對保護自己土地財產的擔心。

### 統一主義

儘管在那個時代有些人總是先入為主地把愛爾蘭想成是英國的殖民地，愛爾蘭其實從17世紀以來就一直是聯合王國內部的一個組成部



分，自1800年起，愛爾蘭的下院就一直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下院裡。那裡也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很熟悉的地方。他們在那裡沒有任何經濟利益，事實上家族中有的成員根本就沒有涉足過這個地方。安東尼與他的女兒們在1865年的時候到那裡度過假，並且對他參觀過的有些地方自然風光留下了不錯的印象。費迪南德在三年之後去了那裡，他對「特別荒蠻」的風光沒有表現出太多興趣，但是發現了那裡人民「最好客」——儘管他對於在都柏林被錯誤地當成天主教徒而倍感茫然。對於大多數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來說，那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夏洛特在寫於186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它描繪成與最偏遠的殖民地一樣偏僻和奇異：一個當地政府「管理不善」的國家，世風粗俗，到處是醉漢以及無意間的暴力。如果納蒂去過那裡，現在似乎沒有任何相關的證據保留下來。

然而，這個問題卻是那個時期影響他的政治操守的所有問題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有兩個。不僅是那些鞏固愛爾蘭佃戶在與地主關係當中的地位的企圖似乎威脅到了所有財產所有人的權利，授予愛爾蘭「地方自治」——也就是某種形式的下放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想法也似乎威脅到了聯合王國的統一，而且會為在整個帝國範圍內出現大範圍的分權化情況開啟不好的先例。正是愛爾蘭問題這兩個雙重的重要性造就了這種非常規的政治聯盟，有「年輕的輝格黨人」納蒂·德·羅斯柴爾德、「託利民主黨人」倫道爾夫·丘吉爾爵士以及激進自由黨人約瑟夫·張伯倫，並因此破壞了格萊德斯通式的自由主義，重振了後迪斯雷利時代的保守主義。

羅斯柴爾德在愛爾蘭問題上反水的最初跡象出現在1880年，當時納蒂在投票反對格萊德斯通的《愛爾蘭土地法案》的過程中，參與了主要由貴族中的「年輕輝格黨人」組成的群體，這個法案試圖為那些不繳租的要求遭到地主拒絕的佃農提供補償。他們反對的理由是一種很原則性的說法，也就是沒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壞合同的神聖性。正如納蒂告訴迪斯雷利的，他所關心的是這種方式帶來的後果比「徵用」還要壞。納蒂是反對自由黨領導層所制定的政策的人中最堅定的6人之一，兩次投票反對《干擾補償法案》，兩次投票反對對方提出的修正案。這使他與輝格黨中的顯貴比如J·C·敦達斯、C·W·菲茲威廉姆和阿爾伯特·H·G·格雷（後來的格雷伯爵四世）處於同一戰線。在1885年

12月的選舉結束後（這次選舉給了帕奈爾的愛爾蘭國民黨在威斯特敏斯特得到了同等的權力），當格萊德斯通開始考慮更為激進的地方自治解決方案時，很顯然納蒂將會按提案反對者的原則來調整自己。

### 第三章 政黨政治（10）

事後我們可以知道，格萊德斯通的想法——「通過愛爾蘭人的立法機構進行管理來作為與帝國事務的區別」——還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應該能在反對「羅馬統治」的傾向在烏爾斯特冒頭的這一敏感時刻令人信服地讓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滿意。設計中的愛爾蘭議會只擁有有限的權利，而把國防、外交和海關留在了「帝國政府」的手中，同時取消或者說至少是減少了愛爾蘭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代表權。如果托利黨人的眼光能夠放得更遠一點，他們應該給帕奈爾提供一些與他們自己類似的東西（就像事實上他們想要去做的）。然而，對地方自治的反對與英國政黨政治的內部動力的關聯，遠勝於愛爾蘭自身的追求；至少，這是納蒂倖存下來的信件中對這個問題的說法。

格萊德斯通重新恢復對自由黨的領導一度讓納蒂十分沮喪，因為他希望看到的是由哈亭頓（一位繼承了德文郡公爵爵位的輝格黨人精英）來坐鎮。在一封寫於11月29日的晦澀的信裡，他告訴哈亭頓：

「格萊德斯通的名字應該改成愛查波德」，並隨附了摘自《舊約》的一份解釋性的說明：「埃裡的孫子被叫做愛查波德，或者‘榮耀已經離開了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擊敗後出生。」在格萊德斯通的兒子暗示過他父親對愛爾蘭的決定5天之後（1885年12月17日），納蒂與倫道爾夫·丘吉爾舉行了一次會談，納蒂在會上告訴他，為了薩利斯伯利的利益，應該考慮自由黨分離的可能性，並解釋說「約翰·莫雷和張伯倫已經被分開，前者沒錢，只能依靠國家的工資，自然對G.O.M表示完全服從……帕奈爾已經牢牢控制了格萊德斯通，而且後者已經把自己交了出去。」這次會談的目的非常明顯。丘吉爾和杜魯蒙德·沃爾夫爵士（丘吉爾自詡的「第四黨」中另一個關鍵人物）兩人都已經在考慮「通過羅斯柴爾德為（與輝格黨人）聯合進行談判」，儘管丘吉爾對愛爾蘭與大陸進行進一步的政治「融合」或者一體化的想法，讓很多輝格黨人覺得令人吃驚的激進。

還沒有得到答案的問題，是輝格黨中的哪一派願意捨棄格萊德斯通分裂分子與保守黨人的關係會是什麼樣子？因為保守黨人的政府一

直要執政到1月30日。在《地方自治法案》於6月8日遭受致命失敗前非常關鍵的幾個月裡，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做法就像是政治上的騎牆派。比如在1月8日，丘吉爾可以為薩利斯伯利提供來自自由黨陣營塞瑞爾·弗勞爾出於禮節性考慮所提供的情報，塞瑞爾·弗勞爾剛好聽到格萊德斯通譴責丘吉爾是「一個沒有原則性的小流氓，或者其他類似的東西」；而從納蒂那裡得到訊息是，他曾經告訴過佈雷特「哈爾科特和迪爾克的看法是……格萊德斯通先生會放棄《地方自治法案》，並且考慮他的同事們的意見」。為了鼓勵###者，艾爾弗雷德告訴哈亭頓說薩利斯伯利願意在由他領導的聯合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長，他可以向丘吉爾保證：「關於哈亭頓投降的說法沒有絲毫的證據；事情完全是相反的。」

到了3月份，注意力轉移到了張伯倫的身上，他在一段時間內曾經渴望與格萊德斯通斷絕關係。在勒景諾德·佈雷特的一次晚宴上，貝爾福遇到了張伯倫，同行的還有兩名重要的輝格黨人，阿爾伯特·格雷和納蒂。按照貝爾福告訴薩利斯伯利的說法，所有在場的人都「公開表示，張伯倫將會離開政府」，格萊德斯通給大家講了很多他的愛爾蘭計劃，「讓喬相信他至少是不會食言的」。在這個討論的過程中，納蒂和格雷確認他們已經計劃好了在金融城裡舉行「一次大型的反對地方自治的大會」，儘管無論是納蒂還是張伯倫都覺得這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作用。然而，大會還是於4月2日在吉爾德廳召開了，而且納蒂自己公開宣佈次月在威斯特敏斯特宮飯店舉行第二次會議。正是在這次大會上，他被選進自由統一黨總務委員會，這標誌著他與格萊德斯通最終的政治決裂。與他一起加入的其他有名的猶太人議員還包括他的堂弟費迪南德和弗蘭西斯·戈爾德施密特，但是其中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他們的猶太人身份，金融城的企業——包括喬治·高森、勒維爾斯托克和很多的其他人——都是絕對的統一黨人。

### 第三章 政黨政治（11）

按照阿爾方索的說法，羅斯柴爾德家族最期待的事實上是「一個哈亭頓—薩利斯伯利政府」，一個聯合政府，換句話說，就是自由統一黨和保守黨的聯合政府。然而，事實證明這樣的目標並不容易達成。丘吉爾和納蒂說服哈爾科特加入他們計劃的嘗試沒有成功；而6月13日——《地方自治法案》在下院被否決後的第5天——在瓦德斯頓舉

行的一次會議上，張伯倫告訴貝爾福，他認為一個自由統一黨-保守黨聯合政府「沒有可能」。他能提供的至多是「對哈廷頓肯定的而且完全的理解，以及足夠儘管不是完全的對我的理解，並通過在發言席後的各種諮詢」確保「行動中有足夠的團結性」。當納蒂在三天之後見到他的時候，這從本質上說其實應該是哈廷頓的意見。

「擺脫格萊德斯通」的共同目標在一種報復的心態中實現了。那年7月份的大選結果對於格萊德斯通和《地方自治法案》來說是「毀滅性」的：選出的代表中保守黨人316名，自由統一黨人78名，而格萊德斯通派有191名，愛爾蘭國民黨人85名。蘇格蘭地區的失敗特別慘重——「老頭子……屁滾尿流」——這裡由納蒂督促著丘吉爾和張伯倫競選。脫離G?O?M在鄉村選區的說法與費迪南德在艾勒斯貝利的一樣。但是統一黨內的和諧——反映在佈雷特的記憶中的丘吉爾、納蒂和張伯倫「三人齊心協力領導帝國的事務」——並不長久。召集「大量的自由統一黨人」一起到門特摩爾打獵很簡單，但是要讓他們一起在政府裡工作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早在12月份，薩里斯伯裡、丘吉爾和張伯倫對政府的《縣級議會法案》的看法出現了分歧，而且丘吉爾因為自作主張在同一個月討論國防預算而辭去了財政部長的職務。在次年的2月份，納蒂對政府的愛爾蘭政策徹底失望——一個他認為「非常腐朽的」脅迫和《新土地法案》簡單混合的政策。「你會發現你的老同事被那些無休止的熬夜和越來越強烈的對一個強硬愛爾蘭政府的要求弄得精疲力竭。」他這樣對丘吉爾說。他預言，如果政府再不「小心，那種以某種形式出現的，認為地方自治更適合目前的混亂和不滿情緒的想法將會反彈」。

納蒂在這個時期真正的政治忠誠似乎只是對哈廷頓。佈雷特告訴哈廷頓，納蒂、丘吉爾和張伯倫達成一致的，是「維護好（自由）統一黨，而且您的願望和意見似乎是他們全部考慮中最優先的因素……因而根本的問題是，借用倫道爾夫的說法，‘不讓格萊德斯通那幫人掌權。’」塔迪在3月份使用了一個真正的地主才會採用的隱喻，建議丘吉爾說，如果由統一黨人發起或者支援的措施通過的話，他們應該知足：

哈廷頓不是乳臭未乾的小孩，而且也沒有失去他的羊群（意思是指他的支持者），他和喬以最大的熱情和精力支援政府，都是跟稍後

的《刑事法案》和《大額採購法案》有關。草場上還放養著幾匹血統存疑的馬，他們的老子有兩匹或者三匹的種馬都有可能（也就是在下院與相當數量的目的各異的贊助人有關的立法措施）。如果有人問我的話，我應該說，這些……措施最早提出的人很難確定，但是其中之一肯定是喬。

當愛德華·漢密爾頓在8月份與納蒂一起吃飯的時候，有人直截了當地告訴他說「哈廷頓馬上就要當首相了，而且是真正的‘自由黨’首相，儘管現在是所謂的保守黨在做代表。哈廷頓不會再次被安排去做那些激進黨人的髒活累活。他的忍辱負重已經超出了對黨的忠誠感情」。而納蒂披露了自己對張伯倫也越來越不信任，而在張伯倫自己的說法中，似乎那些自由黨過去的宗派可以重新團結起來。

### 第三章 政黨政治（12）

對於張伯倫來說，他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大人物。他是披著托利黨人羊皮的激進主義的狼。他是典型的民主主義者——一個大肆揮霍的沙文主義者——與丘吉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為後者在經濟和外交問題上是一名很典型的皮爾派人士。而對於格萊德斯通先生來說，他沒有任何機會——對最近兩年甚至是兩個月中自己心裡想什麼事情他從來都弄不清楚，這對國家來說是一種持續的危險。因此，一個像漢密爾頓那樣對格萊德斯通派如此忠誠的人也對此表示了自己的蔑視，對此也就不足為奇了（儘管他無法否認納蒂「對將要發生的事情所具有全面的知識」）。但是讓人覺得有意思的是，漢密爾頓接下來的活動安排居然是與羅斯伯裡在門特摩爾一起吃飯，而此時的羅斯伯裡已經被看成是（最起碼將會是）自由黨人將來某一天在上院裡的代表。

換句話說，他們所爭論的話題事關自由黨的命運，由哈廷頓牽著走向東，張伯倫拉著走向西，而羅斯伯裡則處於兩者之間，想著從格萊德斯通的沉淪中搶救點什麼東西出來。當然，納蒂想盡量把丘吉爾和哈廷頓調和到一個「真正的」自由黨的標籤下面的願望，由於前者糟糕的身體和精神狀況而夭折。但是在這個過程中，自由統一黨似乎還是有可能避免被保守黨人一鍋端的機會。還有就是為什麼納蒂要建議在1890年的大選中為哈廷頓提供自由統一黨的競選經費，而且鼓勵德比爵士也這樣做？不應該不切實際地像納蒂在1888年所做的那樣去

推測，格萊德斯通已經被「適時地逐出了權力的舞臺」，而且「隨著格萊德斯通先生的離去，《地方自治法案》就會自生自滅」。甚至格萊德斯通在自由黨獲得1892年勝利後的政治反擊，最後也都證明是短命的；而羅斯伯裡的繼任者也只能很謹慎地樂觀，他必須時刻提醒他自己，對《地方自治法案》和上院的改革只可能是表面上的。

### 與政治家的關係

或許，納蒂在19世紀80年代風雲變幻的政黨政治中的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遠離作為一個銀行家所應該關注的那些東西。或許我們可以說，一名羅斯柴爾德人首次以職業政治家的身份為了自身的利益參與到政治活動中時，在他們對愛爾蘭或者是社會政策的辯論與他們自己作為富裕的地主的利益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實際聯絡。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時刻牢記在心，當所有這一切都在發生的時候，納蒂仍然還是把他大多數的工作時間花在紐科特，而且作為一個銀行家，他最優先的政治考慮是對外的政策，而不是國內的政策。甚至就在我們探尋並且重建他在關於地方自治的辯論中的作用的時，我們也應該記住其實他考慮最多的還是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的角度。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們的政治關係來影響這個時期的外交政策？解答這個問題的方式之一是考慮他們在後迪斯雷利時代與兩位政治家的關係。他們與這兩位的關係最為密切——倫道爾夫·丘吉爾和羅斯伯裡。而且有必要在此簡單說明一下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帝國屬地中最為重要的地方：印度。

在1880年之前，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印度沒有太多的興趣，儘管他們與在那裡的公司有些業務。當他們的親戚加布裡埃爾和莫里斯·沃爾姆斯在喪失音信25年之後，於1865年從塞倫回來的時候，夏洛特不僅被他們的外貌——「蒼老、猥瑣的英國高加索印度人」所震撼，同時也被他們描述的茶葉種植生活所迷住。那些赤身裸體的苦力，悶熱、蛇、大象、豪豬、吃珍珠的昆蟲，彷彿就像是發生在另外一個星球的事情；沃爾姆斯把他所擁有的一個種植園叫做「羅斯柴爾德」，只是一種讚譽，並不是說明這個家族在拉吉有經濟方面的參與。然而，在1880年之後，這一切都變了。1881～1887年間，夏洛特的兒子們負責為印度鐵路發行股票，價值總計640萬英鎊。

### 第三章 政黨政治 (13)

自由黨的下臺以及丘吉爾被薩利斯伯利爵士在1885年夏天任命為印度國務卿，似乎預告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印度的興趣開始萌發。與他整個短暫而輝煌的政治生涯相矛盾的是，丘吉爾正刻不容緩地在印度事務上與納蒂和他的兄弟們建立起一種跟他早先譴責過的格萊德斯通政府與巴林家族為埃及事務建立起來的那種關係。在計劃為印度中部鐵路發行籌款債券的時候，丘吉爾特別告訴總督都費爾林爵士：

「如果明年我還在位……當這筆貸款提出來的時候，我將會打一場針對貝特拉姆·居里的大戰，把這筆貸款交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手裡，因為他們的金融知識在英格蘭銀行都還不存在的時候就已經非常淵博，而且他們的委託人簡直難以計數。」

丘吉爾的傳記作者羅伊·弗斯特認為，發行新鐵路股票確實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了幫助。當時的人們也認為，丘吉爾決定吞併緬甸——在1886年元旦宣佈——也與他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係日漸親密有關。正如愛德華·漢密爾頓所譏諷地評論的：「沙文主義越來越流行，因為它能產生利潤。」理所當然地，在宣佈吞併後的一週時間裡，他們要求取得「緬甸的所有鐵路，並把線路延伸到邊境」，丘吉爾向薩利斯伯利保證，那些說法都是「一派胡言」。事實對此作了證明：在1889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負責成功發行了鉅額的緬甸寶石礦的股票——當時的認購者人數是如此之多，甚至納蒂都被盛傳只能通過梯子才能爬到他的銀行辦公室，而且股票的升水高達300%。難道佈雷特沒有在1886告訴哈亭頓說「丘吉爾和納蒂、羅斯柴爾德在張伯倫的協助下聯手領導著帝國的業務」？難道漢密爾頓後來沒有對羅斯伯裡評論說讓張伯倫「深陷困境」的是他與「某一家金融企業」的「過從甚密」？難道薩利斯伯利夫人沒有在與赫爾伯特·馮·俾斯麥和羅斯伯裡的談話中大肆譴責「倫道爾夫，說他把所有的事情都通報給了納蒂·羅斯柴爾德」，而且「暗示說沒有人會無緣無故為那些金融大鱷提供政治訊息而不為所圖」？過度親密的關係的證據似乎是很令人矚目的，特別是考慮到丘吉爾個人金融狀況不是十分穩固的時候。正如我們現在已經非常瞭解的——儘管丘吉爾早期的傳記中掩蓋了這個事實——他去世的時候欠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銀行的債款「高達驚人的

66902英鎊」，雖然他曾經聽從羅斯柴爾德的建議，投資礦業股票也賺了些錢。

然而，經過更加仔細的觀察發現，丘吉爾在印度辦公室和財政部中有限的能力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銀行業務中所能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是有限的，而且同樣的，他們作為丘吉爾的銀行顧問對丘吉爾的重要性也是在他離職以後才顯現出來的。緬甸寶石礦所發行的股票只是區區30萬英鎊，而且是在丘吉爾結束他短暫的印度辦公室任期後4年才正式發行。一直到189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才發行了200萬英鎊的緬甸鐵路債券，他們在10年前首次接觸印度金融委員會的時候則吃了閉門羹。在薩利斯伯利第二屆政府的財政部，丘吉爾徵詢過他們對金融政策的意見（任命納蒂進入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去質詢公共開支）。但是，很難說清楚丘吉爾的那種自我毀滅和極端格萊德斯通式的對軍費開支的反對，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都有利於羅斯柴爾德的利益，事實上，丘吉爾對埃及和貨幣政策的看法很快就與納蒂產生了分歧。羅斯柴爾德家族跟他在1886年12月份那次非常關鍵的辭職決定也沒有關係。當勒景諾德·佈雷特詢問他是否可以把這個訊息告訴納蒂的時候，丘吉爾說「不要，因為他正在生艾爾弗雷德·羅斯柴爾德的氣，後者顯然發表了反對他的言辭激烈的談話。『他抱怨說我沒有徵詢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意見。無論如何我都很高興把他們當朋友，但我不是雷伍爾斯·威爾遜，而且也沒有領他們的工資』」。對納蒂來說，丘吉爾的辭職只是「鬧情緒」，儘管丘吉爾自己堅持說是「一次單純的誤判……他不知道薩利斯伯利已經『早就備好了王牌』，換句話說，他早已準備好任命高森來補這個缺」。

### 第三章 政黨政治（14）

相關的資料表明，只是在他離開了這個職位之後，他才開始向羅斯柴爾德家族大量地借錢：截至1888年，他的債務只是900英鎊；但是到了1891年，就膨脹到了11000英鎊。儘管納蒂繼續鼓勵丘吉爾相信自己還很可能會在某一天回到政府裡，但是考慮到這位前財政部長越來越古怪的表現，他不大像是相信這樣的說法。按照愛德華·漢密爾頓在1888年8月說的：「R·丘吉爾所有的東西都向羅斯柴爾德要……但是作為他的主要財務顧問，羅斯柴爾德已經把他看成是毫無希望的政治家，而把他拋棄了。」事實上，把納蒂在1886年之後對丘吉爾的資金



支援當成是一項本質上的友誼之舉，就像梅毒冷酷地拿走它應得的部分一樣；因為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看，丘吉爾現在更多的是負債而不是資產。這門鏽蝕的大炮在1891年的時候再次開火，當時丘吉爾從一次由羅斯柴爾德資助的到馬希侯諾爾蘭德的探險中歸來，但只是報告了這個地區的經濟前景——這讓納蒂大為光火，就像我們將在下文中看的一樣。更多的不是出於算計，而是出於對可悲的丘吉爾的同情，促使羅斯柴爾德更多地關注他雄心勃勃的兒子，他們對年輕的溫斯頓1904年時以一名代表曼徹斯特的自由黨議員的身份反對《外僑法案》時無疑覺得相當滿意。

羅斯伯裡的情況幾乎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儘管關於羅斯柴爾德影響程度的類似問題再次冒頭。這個在格萊德斯通的第三和第四個任期中出任外交部長並且在1894年接替他出任首相的人娶了一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在政治上是否有什麼重要的意義？正如像對待丘吉爾一樣，當時有些人也是這樣認為的。「這個結合不好，」自由黨的機關報《正義》在格萊德斯通於1893年9月訪問了特靈之後發表評論說，「當外交部長通過婚姻與同樣陰險的金融企業緊密聯絡起來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格萊德斯通先生與羅斯柴爾德爵士推杯換盞。」

毫無疑問，幾乎從他娶了漢娜的那一刻起，家族中更加政治化的成員就開始對羅斯伯裡的政治生涯更加關注。在1878年9月——也就是婚禮後的第6個月——費迪南德向羅斯伯裡披露了這種關切的程度：

納蒂與往常一樣跟我談了很多關於你的事情，而且竭力向我灌輸你的追求和政治抱負。他希望知道，當自由黨再次執政，如果給你比較低階的職務，你是否會考慮接受。我只能向他表示我對此一無所知。艾爾弗雷德今天早上11點的時候來了，而且似乎對我的行動瞭如指掌……他知道我們昨晚一起去看戲——廢除宗教裁判所真的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我的這些親戚怎麼都是一些喜歡刺探別人隱私的人啊！

在丘吉爾的案例中，私人的金融聯絡確實是發生在他離職之後，而在羅斯伯裡的案例中卻是發生在之前。1878年11月，費迪南德建議羅斯伯裡：「如果你手頭有幾千英鎊的閒錢（9000～1萬英鎊），你可考慮把它們投資在新的……埃及籌款債券上，我們的銀行下週將會開始開放認購。」一封來自納蒂的1880年的信進一步說明了羅斯伯裡從

他的妻兄那裡得到的「有關投資的良好建議」。他帶點調侃地寫道：「我很高興地說，我以前從來不知道要聽聽那些部長們要做什麼。我只能告訴你，我今天為紐科特買了10萬，而且我應該建議你去告訴梅先生（可能是羅斯伯裡的經紀人，或者是羅斯柴爾德的一名工作人員）付款給你。」

### 第三章 政黨政治 (15)

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當格萊德斯通在1884年給羅斯伯裡工廠專員的職務，以及在內閣裡任掌璽官的位置時，他為什麼在開始的時候會拒絕。他引用政府關於埃及金融問題所做出的那些緊急的決策，告訴格蘭威爾：「你可以猜到我與這個問題之間那種特別脆弱的關係，儘管我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員，但是我與他們的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這種聯絡既是親情的，也是友情的，而且我覺得在這個時候進入內閣特別困難……」然而，當戈登將軍被暗殺後，羅斯伯裡終於被說服接受了格萊德斯通的提議，他和羅斯柴爾德家族都沒有做任何努力來切斷他們之間的經濟聯絡。在他加入政府後的兩週之內，他至少在四個場合見到過家族的成員，包括與納蒂的兩次晚宴。在1885年8月，也就是格萊德斯通辭職使他再次暫時離開了這個職位後僅兩個月，羅斯伯裡分得了5萬英鎊由羅斯柴爾德家族倫敦銀行發行的新的埃及籌款券。有意思的是，「根據羅斯伯裡的願望，埃及的收入付到漢娜的銀行戶頭上」。

這種模式在羅斯伯裡1886年當上外交部長的時候又重複了一次。這一次，納蒂表達了公眾的疑慮，他在1月份告訴勒景諾德·佈雷特說羅斯伯裡作為一個可能的自由黨外交部長「根本沒有疑問，不會因為他與羅斯柴爾德銀行的關係而受到影響」。在1887年加奈斯貝里的一次晚宴上，他向愛德華·漢密爾頓發難——他曾經期望他吹捧一下羅斯伯裡……「沒有為通過聯姻建立起如此緊密的聯絡而有任何的驕傲」——針鋒相對地頂撞說：「羅斯伯裡是一個沒有政治綱領的演講者。他的講話是蒼白的，他作為外交部長的名聲被過分高估——事實上他向巴圖姆派兵這件事毀壞了他的名聲，他這次的做法只是叫喚的聲音很大，但是根本沒有咬人的打算和實力，俾斯麥對他感覺非常失望」。但這不應該按表面的現象來看。像以前一樣，羅斯伯裡和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保持著在外交問題上的密切接觸（特別是阿富汗問

題），而且艾爾弗雷德從紐科特寫來鼓勵性的信函：「從所有的方面，甚至是偏遠的地方，我們聽到的全部都是對新外交部長任命的溢美之詞。」當羅斯伯裡在《地方自治法案》遭遇失敗後再一次離職時，是納蒂鼓勵他擔任新建立的倫敦縣議會主席而保持了政治影響。他也在1892年回到政府之前的那幾天與阿爾方索討論過產業間的關係問題——這預示了他次年將會對礦工罷工進行干預。而且似乎並不像德國大使所宣稱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不鼓勵羅斯伯裡回到外交部長的位置：從這個期間保留下來的信件表明他們仍然繼續給他提供金融和外交方面的訊息（比如有關埃及的）。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很歡迎他繼格萊德斯通辭職之後升任首相的職位，而且艾爾弗雷德採取了很不尋常的舉動——在一場與英格蘭銀行關於據稱是銀行前總司庫錯放的保險箱的爭論中，代表首相出現（他的調解最終獲得了不少於2萬英鎊的庭外補償賠款）。納蒂非常遺憾羅斯伯裡隨後辭去首相職位的舉動，不只是因為這代表了哈爾科特的勝利——「前所未有的浮誇和狂躁，而且更加奸詐」——還有就是他越來越進步的財政政策。

羅斯伯裡一直堅持格萊德斯通的路線，比納蒂更加持久，但是他在1902年組織帝國主義性質的自由黨聯盟表明他的立場從來沒有脫離統一黨太遠，而且他的政治生涯在1905年與自由黨徹底決裂後基本上與納蒂的很接近，但是並沒有相交（例如兩人都在1909年反對羅伊德·喬治的預算，以及削弱上院權力的《國會法案》）。

### 第三章 政黨政治（16）

然而，正如與丘吉爾的關係一樣，問題仍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否從他們與羅斯伯裡的關係中得到任何物質上的好處。答案大體上可以說是沒有。可以肯定，留存下來的信件表明羅斯柴爾德家族給羅斯伯裡提供了經濟和外交資訊，但是很少有直接的，無論是以何種形式提出的行政方面的要求，除了一些非常小的羅斯伯裡偶爾以他的禮物方式提供的照顧業務。對羅斯伯裡外交政策的最新的研究也沒有任何可以說成是羅斯柴爾德影響的結論。因此，對由激進的自由黨人提出的擔心羅斯伯裡與「陰險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聯絡的任何結論，都是沒有根據的。然而，至少還是有那麼一次，羅斯伯裡確實在一項重要的外交決策之前提前給他們發出了警告。在1893年任外交部長的時

候，他派勒景諾德·佈雷特去通知紐科特，政府打算加強埃及游擊隊的力量。「我見到了納蒂和艾爾弗雷德，」佈雷特報告說，

而且告訴他們，您對他們一直給您提供的所有資訊深表感激，並且因此希望他們在報紙上公佈（增援的訊息）之前就知道這個事情……當然他們都非常高興，而且非常感激。納蒂希望我告訴您，他能為您提供的任何訊息和幫助完全由您自由支配。

這有可能是一次完全獨立的偶然情況；從另外的角度看，這種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也就是這種內部的資訊通常都由口頭轉達，因而沒有出現在留存下來的書信裡。

### 法國的保守主義

毫無疑問，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政治活動與其法國兄弟的活動是同時平行進行的。當然，阿爾方索在他的信件中對政治一直都表示出很高的關注，法國的共和國體制是一種與英國的情況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在這裡，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採取了比英國更為極端的立場。另外，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了更高程度上的意識形態方面的中立（或者說是靈活）的立場，這主要是他們在生活中經常面臨頻繁更換統治者的情況所造成的一個結果。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阿爾方索與他的兄弟們一樣都繼承了他們母親的奧爾良黨人的思想：在他們的信件中有足夠的正面證據來說明他們的君主復辟思想。但是與他們的父親一樣，他們都時刻準備著與共和黨人政治家一起工作。他們的區別在於溫和的和保守的共和黨人，與激進的或者「赤色的」共和黨人的區別。他們很平靜地看待梯也爾的共和國總統位置在1873年被馬歇爾·邁克馬洪取代，並在4年之後為在5月16日一場流產的政變之後邁克馬洪的下臺而悲傷，因為共和黨在選舉中的勝利喚醒了阿爾方索內心深處對公社的記憶。只是在他的老朋友萊昂·塞在12月被任命為財政部長之後才讓阿爾方索有所釋懷。儘管萊昂·塞準備直接向公眾發售新的3%票面利率的公債減少了他們傳統的承購佣金收入，羅斯柴爾德家族還是成為了熱情的認購者。他們對1881年中期的政府貸款並沒有減少支出，認購的總額超過了1億法郎。

如果對土地資產的「尊重」是納蒂眼中區分真假保守主義的標準，法國羅斯柴爾德對私營的法國鐵路公司也有類似的情節，這當然

是因為他們仍然持有大量的股份。在19世紀70年代早期，又出現了一波新建鐵路的熱潮，阿爾方索擔心北線鐵路公司的優勢會被其他公司超越。後來，更為嚴重的威脅來自於鐵路國有化——1848年時提出的目標——這是他心裡一直耿耿於懷的問題。

### 第三章 政黨政治（17）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可以很容易理解羅斯柴爾德對萊昂·甘必大這位1870年戰爭中的共和國英雄的態度。羅斯柴爾德家族完全支援甘必大，儘管他在1869年的貝勒威爾計劃被認為相當瘋狂，因為他繼續致力於推動法國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有一份著名的關於在甘必大短暫的首相生涯（1881～1882年）中一次晚宴的報道，其中提到了他本人和阿爾方索：

他們在一個窗簷下愉快地交談，這兩位統治者——法國事實上的主人甘必大和羅斯柴爾德……甘必大想搞一次海軍的武力炫耀：五艘炮艇到突尼西亞港、派5個連登陸，並以適當的方式對被伊說：「接受攝政的方式，要不就滾蛋。」這個事情24小時就搞定了……之後，阿爾方索·德·羅斯柴爾德開始說話，他知識非常淵博地談到了義大利和英國的政治家。甘必大聽著，帶著羨慕和吃驚的混合神情：他一點都不懷疑阿爾方索·德·羅斯柴爾德擁有如此令人稱羨的天生及後天開發的聰明才智。他們兩人談論了德普勒迪斯、卡爾羅裡、瑟拉、迪斯雷利、格萊德斯通、克瑞斯匹、哈亭頓、格蘭威爾……（當祝酒的時刻來到的時候）甘必大的祝酒詞是：「為復興的法蘭西！」阿爾方索·德·羅斯柴爾德的祝酒詞是：「為讓它復辟的人！」他的聲音有些含糊，只能剛好讓郭裡菲將軍和甘必大聽到。但是甘必大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因為他認為這句話指的就是他自己。他思索了一會兒，想找到一句恰當的迴應，但老是想不出來，隨後他就簡單地迴應：「好！我非常願意。」如果貝勒威爾的選舉委員會在這裡目睹他們的甘必大在這些王公貴胄的前呼後擁之下，他們會有什麼樣的感想。

這件逸事關鍵的地方當然是在於，它說明甘必大為了獲取權力出賣了自己。然而，甘必大在此期間所追尋的國內政策遠不如征服突尼西亞符合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胃口。首先，甘必大謀劃了一個大規模的行動，轉換大約600萬法郎5%票面利率的債券。萊昂·塞拒絕接受甘必大手下的財政部長職務，這發出了高階銀行將進行抵制的訊號。事實

上，按照警方的報告，阿爾方索在1881年12月告訴記者們說：「我想要的是一個全身心投入的運動，有必要在甘必大推翻我們之前先推翻他。」我們已經看到了大眾聯合銀行的倒下怎樣為這個推翻行動作出了貢獻。其次，甘必大似乎打算推行某種型別的鐵路國有化。在他垮臺之後才達成了一個協議，在國家行使回購這些鐵路的權利之前，授予鐵路公司另外30年的經營權。一位像甘必大這樣的「左派」政治家在追求帝國主義的政策方面，幾乎會與右派政治家一樣不相上下；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出於基本的國內政治原因，更希望他們的帝國主義是保守型別的。從另一個角度說，他們屬於謹慎的法國右派中的沙文主義流派——當然有他們自己的理由。他們不喜歡在鮑朗格爾將軍於1887年5月被解除戰爭部長職務後煽動群眾去支援他，因為這種行動（像之前的波拿巴主義一樣）混合了國內政治極端主義和對外的強權擴張，這種情況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看來與法國的實力不匹配；不過在這位「無用的」而且「無能的」將軍1889年下臺後，他們開始為他提供私人銀行業務服務。

### 第三章 政黨政治（18）

法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工會組織的社會主義政黨的興起所表現出來的擔憂遠甚於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儘管這很可能也反映了法國更容易受革命政治影響的歷史特徵。在1892年的時候，埃德蒙的信中越來越明顯地出現了社會主義者可能對「財閥」進行攻擊的警告，並且提到了隨時可能出現的「無政府」混亂狀態，而與此同時，阿爾方索預言說，「社會主義感染」在法國可能比在英國要更加危險。在1892年與羅斯伯裡討論產業間的關係的時候，阿爾方索強調他反對在勞資糾紛中政府以任何形式介入。他顯然把羅斯伯裡看成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他在他們的會面之後有些譏諷地說道：「在我們國家，那些住在大莊園裡而且年入10萬英鎊的人裡沒有激進主義者。」「站在我的角度，」阿爾方索在1897年告訴作家朱利斯·赫雷特，「我不相信這些工人階級運動，」

我敢肯定，通常說來，勞動人民對他們的狀況是很滿意的，他們根本就不會抱怨，而且他們對所謂的社會主義根本就不會有一丁點兒的興趣。很顯然有一些挑頭的人，他們試圖造出很多噪音而且想吸引一些跟隨者，但是這類人對那些誠實、勤勞的工人不可能控制，也不

可能影響。人民應該能夠區分出好工人和壞工人的差別。那些要求8小時工作制的人都是懶惰、無能的人。其他的人，比如那些家庭裡面穩重、嚴肅的父親，希望能夠工作足夠長的時間來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提供保障。但是，如果他們所有人都被強迫去每天只工作8小時，你知道他們中的大多數會做什麼嗎？他們會去喝酒……除此以外你還能指望他們能做什麼？

或許是赫雷特錯誤地引用了阿爾方索的話，但是在這封發往倫敦的信中表明，這或多或少就是他的想法：一個不妥協但不能說是魯莽的，對勞工市場聽之任之的看法，這種觀點在當時的實業家裡是一種司空見慣的說法。同樣司空見慣的還有阿爾方索對經濟不平等的辯解：

我從來就不明白「高階銀行」意味著什麼。「高階銀行」是什麼意思？有比較富裕的人和比較貧困的人，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些人今天比較富有，但是明天會比較貧困……每個人都面臨這樣的變化——沒有任何人可以例外！而且也沒有人可以誇耀自己能夠逃脫。至於說這些資本的積累，它所迴圈的是金錢……（而且）生長出果實。這是國民的財富！如果你把它嚇走，或者懲罰它，它就會消失。而且，到了那個時候，所有這一切都會失去。那將是國家繁榮的終點。資本是生產力！除了一些不幸的例外……每個人……都應該享受他的智力、體力和勤勞所應得的資本。

這篇洋洋灑灑的辯解充分說明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新世紀臨近的時候，所面臨的社會和政治的孤立局面，而且在一個新的時代裡，政治勢力不可能再輕易地在俱樂部以及鄉村莊園的餐室裡做出決定。